
MAKESI ZHUYI
ZHEXUE SHI
马克思主义
哲学史
北京出版社
1

国家“七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科研项目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第一卷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

北京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一卷，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历史。本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各自的道路实现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和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以及他们共同探索和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过程。本书在搜集和研究有关资料、总结教学经验和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重探讨和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它的基本原理的形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时期各个阶段上的思想发展以及他们对各种错误思潮的批判和斗争，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史上的伟大革命变革。

主　　编

黄楠森　庄福龄

林　利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孙克信　孙伯鍨

庄福龄　宋一秀

余其铨　余源培

吴仕康　张念丰

苏厚重　林　利

易克信　施德福

徐　琳　高齐云

商英伟　黄楠森

曾盛林　靳辉明

本卷主编

施德福　靳辉明

参加编写者

（以姓氏笔划为序）

江丹林　俞长彬

张战生　赵常林

施德福　钱学敏

靳辉明

总　　序

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任何一门其他科学一样，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的萌芽、产生、形成、发展都是一个过程。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人物、著作和思想摆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我们才能深刻理解其含义、意义、是非得失和历史地位。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我国哲学界十多年来广泛而深入地开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和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的编写就是这些活动中的一个项目。

本书的编写是1983年作为我国六五计划中哲学社会科学国家科研重点项目之一确定下来的，1986年又列入七五计划。全书编写人员57人，全是活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和科研第一线的哲学工作者，都努力把编写过程同教学过程、科研过程密切结合起来。在编写的过程中，我们遵循以下原则：

一、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线索及其规律，做到理论和实践统一，科学性和战斗性统一，逻辑和历史统一，观点和材料统一，使本书对我国四化建设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二、占有翔实而丰富的历史资料，一切论断均有充分材料作根据，同时，经过鉴别，充分吸收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丰富成果，使本书能达到我国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三、对每一本重要的哲学著作和每一个重要的哲学观点都做出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和评价，恰当地估计其历史意义和历史地位，

从而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反对形而上学的非历史观点和相对主义观点。

四、以革命导师的哲学思想的发展为主线，但也给予他们的战友、学生和专业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以应有的地位和足够的篇幅，特别是对当代哲学家的思想给以充分的重视。

五、以揭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为主，但对其他部分如自然辩证法、军事辩证法、伦理学、美学、逻辑学、哲学史思想等也视各个哲学家思想的不同情况给予适当的介绍和评价。

本书共八卷，八卷的顺序与时间的顺序不完全一致，这是为了保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特色。八卷内容可以分为四部分：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与发展（第一、二、三卷，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战友和学生的思想），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和苏联的传播和发展（第四、五卷），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第六、七卷），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国外的研究和发展（第八卷）。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40周年，决定1989年先出版第六、七卷，其他各卷按顺序随后陆续出版。

编者的话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历史过程,就难以正确地把握它的精神实质及其在哲学上所实现的伟大革命变革,也就将使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失去前提和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时期的界说,是个国内外都有争议的问题。我们认为,作为一种崭新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标志不能只是它的个别观点或个别原理的出现,也不应是它的完整体系的建成,而是指它区别于一切旧哲学的基本范畴和基本原则的确立。按照这一认识,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时期”的“下限”划定在 **1848** 年初。具体地说,就是它形成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问世于鲜明表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的思想发展,曾经历了一个从黑格尔出发,经过费尔巴哈,到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过程。在这个探索科学世界观真谛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更替频繁,变化迅速。在其发展的各个时期,往往是新旧思想交织并存;在沿用旧概念、旧术语中包含着新思想,而一些在早期和成熟时期都在使用的概念、术语,其实际含义却有重大区别;从客观事实出发所做的分析和得出的观点同哲学上的概括也并非完全一致;……所有这些,都给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的研究带来复杂性和特有的难度。在编写过程中,我们贯彻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和方法,力求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对

各个时期的思想以及它们间的联系和区别作出具体的分析，侧重于考察其动态的发展过程，不过多地作静态的结论。当然，主观愿望并不等于客观现实。我们的主观意图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得到实际体现，有待广大读者来评判。

本卷各章的执笔人是：第一章，施德福；第二章，靳辉明；第三章，俞长彬、钱学敏；第四、第五章，江丹林；第六章，赵常林；第七章，张战生。叶汝贤曾一度参加本卷的编写活动，并对编写工作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沈强、杨百成、谢东海曾参与部分初稿的写作。本卷由施德福、靳辉明统稿，江丹林也参加了部分统稿工作，最后由黄楠森、庄福龄、林利审定。本卷开头的《导言》是全书的导言，由黄楠森执笔。

我们感到，在本卷中有不少问题需要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探讨。由于编者的学识和水平所限，加上统稿和定稿时间比较仓促，书中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我们竭诚欢迎广大读者和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本卷主编

1990年5月

目　录

导　言…………………………………………………………（1）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时代……………………（1）
第一节　社会经济发展的新阶段…………………………（2）
一、"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 ………（2）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 ………………（5）
第二节　阶级斗争的新特点…………………………………（8）
一、"工业革命"与阶级斗争的新特点 ……………………（8）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阶级基础 ……………………（11）
第三节　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成果 …………………………（15）
一、19世纪自然科学的新成就 ……………………………（15）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自然科学依据 ………………（20）
第四节　思想理论领域的新思潮及其局限性 ……………（26）
一、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 ……………………………（27）
二、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35）
三、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的社会历史理论 ……………（38）
四、德国古典哲学 …………………………………………（42）
第五节　黑格尔学派的解体和青年黑格尔运动的兴起……………………………………………………（50）
一、黑格尔学派的解体……………………………………（52）
二、青年黑格尔运动 ………………………………………（55）
三、大卫・施特劳斯(1808—1874)对宗教的批判……………（59）
四、契希考夫斯基(1814—1894)的《历史哲学引论》 ………（61）
五、布鲁诺・鲍威尔(1809—1882)的自我意识哲学 ………（64）
六、费尔巴哈(1804—1872)的人本主义理论 ………………（69）

七、麦克斯·施蒂纳(1806—1856)的“唯一者”哲学 …………(77)
八、莫泽斯·赫斯(1812—1875)的“行动哲学” …………(82)
简短的结论…………(86)
第二章　马克思世界观的转变…………(88)
第一节　马克思转向黑格尔哲学…………(88)
一、思想的启蒙和走向黑格尔主义 …………(89)
二、对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批判考察 …………(99)
三、探求“定在中的自由) …………(107)
四、世界的哲学化和哲学的世界化，自我意识与具体现实的关系 …………(111)
五、发扬辩证法的革命因素 …………(114)
第二节　对黑格尔哲学信念的动摇 …………(117)
一、卷入现实斗争的旋涡…………(118)
二、为出版自由而斗争…………(127)
三、对利益、等级和国家关系的初步探讨 …………(135)
第三节　对黑格尔哲学的第一次“倒戈”…………(142)
一、“苦恼的疑问”和解决的途径 …………(142)
二、费尔巴哈在马克思世界观转变中的作用 …………(147)
三、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和《克罗茨纳赫笔记》…………(153)
四、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基础 …………(159)
五、君主主权与人民主权…………(166)
六、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初次批判改造 …………(171)
第四节　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177)
一、马克思和《德法年鉴》…………(178)
二、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 …………(185)
三、无产阶级是人类解放的物质力量 …………(193)
简短的结论…………(200)
第三章　恩格斯世界观的转变…………(202)
第一节　挣脱宗教枷锁　走向黑格尔主义…………(202)
一、世界观的最初冲突…………(202)
二、研究批判的神学　批判虔诚主义 …………(206)

三、倾心黑格尔哲学　寻找哲学基础 …………………………… (215)
四、哲学与政治相结合　成为革命民主主义者 ……………… (219)
第二节　批判谢林主义　转向费尔巴哈 ……………………… (226)
一、保卫黑格尔的辩证法 ………………………………………… (226)
二、抨击启示哲学 ………………………………………………… (231)
三、费尔巴哈的解放作用 ………………………………………… (238)
第三节　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 ……………………… (242)
一、唯心史观与现实的矛盾 ……………………………………… (243)
二、英国社会革命的可能性 ……………………………………… (247)
三、无产阶级最有前途 …………………………………………… (250)
四、共产主义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 ………………………… (253)
第四节　论证共产主义的最初尝试 …………………………… (265)
一、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 …………………………… (265)
二、探索历史的本质 ……………………………………………… (279)
三、工业革命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 (284)
四、国家和法对经济的依赖性 ………………………………… (288)
简短的结论 ………………………………………………………… (293)
第四章　对科学世界观的初步探索 …………………………… (295)
第一节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 ……………………………… (296)
一、从政治批判转向经济研究 ………………………………… (296)
二、异化劳动概念的提出 ………………………………………… (304)
三、异化劳动理论的出发点。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 ………… (309)
四、异化的主体和客体。异化和对象化 ……………………… (316)
五、异化劳动理论的深化 ………………………………………… (319)
第二节　异化劳动理论与唯物史观 …………………………… (323)
一、异化劳动理论与社会历史的本质 ………………………… (324)
二、异化劳动理论与社会基本矛盾 …………………………… (326)
三、异化劳动理论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 (328)
四、异化劳动理论与阶级斗争 ………………………………… (331)
第三节　异化劳动理论与共产主义 …………………………… (334)
一、《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前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

探索 …………………………………………………………………… (334)
二、异化劳动理论对共产主义的论证 …………………………… (336)
第四节 关于实践和认识的思想 ……………………………… (343)
一、对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的探讨 …………………………… (344)
二、对认识主体——人的本质的认识 ………………………… (346)
三、对认识客体——“人化自然”的认识 ……………………… (349)
四、对人的感觉器官、感觉的形成和发展及其作用的论述 …… (351)
第五节 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 ……………………………… (353)
一、关于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 …………………… (353)
二、对黑格尔否定性辩证法的批判和改造 …………………… (357)
简短的结论 ……………………………………………………… (363)
第五章 向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接近 …………………… (365)
第一节 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唯心主义,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唯物主义解决 …………………… (367)
一、对“批判哲学”的批判,论述思维和现实的关系 ………… (367)
二、揭露思辨哲学的秘密,阐明个别与一般的辩证关系 ……… (371)
三、对 17—18 世纪唯物主义发展史的考察 …………………… (375)
第二节 唯物史观基本原则的初步阐述 ……………………… (380)
一、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 ………………………………… (381)
二、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概念的接近 ………………………… (385)
三、对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的进一步探讨 ………………… (390)
第三节 批判“英雄”和“群众”的对立,阐明历史的活动是群众的事业 …………………………………… (392)
一、“批判哲学”关于“英雄”和“群众”对立的观点是黑格尔历史观的拙劣翻版 …………………………… (392)
二、对法国革命的分析。物质利益的作用 …………………… (394)
三、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 …………………………………… (396)
第四节 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论证 ………………………… (398)
一、资产者和无产者的辩证法 ………………………………… (398)
二、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初步论证 ………………………… (401)
三、《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进一步

论证 …………………………………………………………… (403)
简短的结论……………………………………………………… (411)
第六章　新世界观的创立……………………………………… (413)
第一节　哲学领域革命变革的新起点 ……………………… (414)
一、对社会生活本质的认识和科学实践观的确立 ………… (414)
二、人的本质的科学解答 ……………………………………… (420)
三、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实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 (423)
四、揭露黑格尔关于精神统治历史的思辨观念 ……………… (429)
第二节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社会历史规律的科学揭示 ……………………………………………… (433)
一、分工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 ……………………………… (434)
二、生产力思想的新探讨 …………………………………… (438)
三、生产关系概念的形成 …………………………………… (441)
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运动规律的揭示 ……………… (449)
五、历史主体和历史发展规律。社会形态理论的确立 ……… (453)
第三节　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奠定 ………………………… (459)
一、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科学共产主义 ……………………… (459)
二、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和历史必然性 …………………… (463)
三、国家的阶级实质。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提出 ………… (467)
第四节　对施蒂纳个人无政府主义哲学基础的批判 ……… (473)
一、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 ……………………… (473)
二、对施蒂纳虚构历史的唯心史观的批判 ………………… (476)
三、对施蒂纳唯心主义国家观的剖析 ……………………… (482)
四、批判施蒂纳对共产主义的曲解 ………………………… (485)
五、对施蒂纳利己主义思想的揭露 ………………………… (491)
第五节　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 ……………………… (495)
一、"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特征和阶级实质 …………… (495)
二、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的剖析 ……………… (497)
三、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对共产主义的歪曲 ………… (503)
简短的结论……………………………………………………… (506)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公开问世………………………… (508)

第一节　对蒲鲁东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508）
一、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新起点 ……………………（509）
二、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思想 ………………（512）
三、对蒲鲁东经济学思想的批判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基础的奠定 ……………………………………………（515）
第二节　历史唯物主义的更精确论述 ……………………（532）
一、经济范畴是社会经济关系的理论表现 ………………（533）
二、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原理的科学表述 ………………（536）
三、关于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思想 …………………………（543）
第三节　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批判改造………………（550）
一、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基础…………………（551）
二、拯救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阐明辩证运动的实质 ………（553）
三、关于否定之否定规律 …………………………………（559）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共产主义实践………………（564）
一、《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公开问世………（564）
二、深刻揭示了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569）
三、共产主义革命与人的自由发展 ………………………（577）
四、对历史上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的批判………（582）
简短的结论…………………………………………………（587）

导　言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以下简称马哲史）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和建设，在中国实际上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但短短十多年，它的成绩已斐然可观，马哲史研究呈现出一片繁荣兴旺的景象。任何事业都不可能是在风平浪静中前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自然也不能例外。近十多年来，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和历史发生了频繁的针锋相对的争论，其中有认真的严肃的理论探讨中的意见分歧，也有两条哲学路线、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不少问题是直接涉及马哲史的重大问题，例如马哲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进的历史还是倒退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和形成的具体过程怎样？怎样评价恩格斯和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如何评价斯大林的哲学思想？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过时了？它的历史命运怎样？此外还有一些比较具体的争论热点，例如怎样评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怎样正确理解实践唯物主义？怎样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道主义的关系？怎样评价《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等。一部科学的马哲史应该在系统地全面地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和发展的同时，根据确凿的思想材料，实事求是地回答这些问题。在这篇导言中，我们将对马哲史的一般问题作初步的原则性说明，并对上述重大问题表明我们的基本态度。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对象

马哲史，同任何历史一样，都具有两方面的含义：客观的历

史和书写的历史。书写的历史以客观的历史为对象，作为科学的马哲史无疑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和发展的客观过程作为自己描绘和研究的对象。因此，这里首先要明确的是历史上最初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些什么内容，包含哪些组成部分。

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观点有不同的回答，意见分歧，莫衷一是。但是，如果我们抱着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原著为依据，经过系统的研究，多数人还是可以达到比较一致的结论的。经过十多年的广泛研究和深入讨论，中国多数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自然观、历史观和认识论以及其它哲学观点的理论体系，但其中最早作为思想体系阐述的是历史观，即唯物史观，后来称作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自然观和认识论是以后才陆续作为思想体系阐述的，至于伦理学、美学等组成部分则是更后的事情。由世界观、自然观、历史观和认识论等主要组成部分形成的理论体系，后来被称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因此，马哲史的对象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及其各个组成部分的形成、建设和发展的历史，其他组成部分如政治哲学、伦理学、美学等等的历史无疑也应包括在内，而由于这些组成部分已有专门史，它们在综合的马哲史中往往语焉不详，而在简明的马哲史中甚至略而不谈。

应该特别指出，世界观，或曰宇宙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部分，它的历史在马哲史中居于主导地位。大家知道，世界观在整个中外哲学史上都居于主导地位，有第一哲学、纯粹哲学之称，历史上重要的思想家的思想无不有其世界观的根据。今天仍然如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哲学理论）当然也有其世界观的根据。现代的实证主义思潮否定世界观成为科学的可能性，从而提出“拒斥形而上学”（否定世界观）的口号，这一思潮近年来在我国哲学界也颇有影响，有些人也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证主义化，贬低甚至否定世界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这并

不符合马哲史的过程，也决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未来。马哲史应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发展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这是不能动摇的。当然，其他组成部分，特别是历史观和认识论的发展，也是马哲史研究的同样重要的对象。

还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虽然经典作家多所论述，由于在他们那里迄今未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而理论工作者的研究也未臻成熟，因而意见分歧，难于统一，如方法论、辩证逻辑、人学等。马哲史无疑也不能把这些组成部分排斥在研究对象的范围之外。

以上是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来说的，就人物而言，马哲史的对象有以下层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著作无疑是马哲史的研究对象，他们的非哲学著作中的哲学思想当然也是马哲史应该研究的。例如马克思的《资本论》虽然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却包含了丰富的哲学思想，属于马哲史重点研究之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和学生如狄慈根、梅林、考茨基、拉法格、拉布里奥拉和普列汉诺夫等人的哲学著作和哲学思想也包括在马哲史的对象之内。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如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哲学著作和哲学思想也应作为重点来阐述。西方一些学院哲学家不承认这些革命领袖是哲学家，因为他们都没有正面系统阐发自己哲学体系的宏篇巨著，最多有一些论战性的哲学著作、短篇哲学文章和包含在其他性质著作中的哲学言论。这种观点是不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中的哲学，它虽然有其久远而广泛的思想来源，却是深深植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之中，并在革命实践中发挥其指导作用和丰富其科学内容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无不自觉地把它运用于自己的实践活动并从而对它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他们不是专业哲学家，没有时间，也没有任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种专门问题进行全面系统详尽的研究和阐发。他们的哲学思想理应是马哲史重点研究的对象。他们被称为哲学家，毫无逊色。对他们的哲学思想无疑要

具体评价，不能一概而论。例如斯大林，他不仅在政治上犯过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也在哲学上犯过简单化的错误，但因此就完全否定他的哲学著作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积极作用，完全否定他在哲学上的贡献,认为他的哲学著作是小学生的作业，不值一谈，也是片面的。不少政治领袖如考茨基、陈独秀在实践和理论上都犯过严重的错误，也不能因此把他们的哲学思想排除在马哲史的研究之外。

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特别是在二次大战胜利以后，建立了一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些国家中涌现出数量极大的专业哲学家，他们的任务不仅在于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在于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门科学需要专业哲学家加以专门的研究、建设和发展，这是他们的任务而又为革命领袖难以承担的。由于种种原因，专业哲学家们几十年来未能充分发挥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用，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设和发展未能达到应有的水平，但是，他们也作了不少工作，取得了大量成就。由于改革开放，他们可能取得更大的成就。他们的哲学著作和哲学思想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他们的成功与失败也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他们的哲学思想是马哲史对象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未来的岁月里，在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中，他们将是传播、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力量。

历史上的修正主义思潮的哲学也是马哲史应该研究的对象。修正主义思潮是资产阶级思想在马克思主义队伍中的表现，但它与一般资产阶级思想不一样，它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企图回答马克思主义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尽管它的回答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史的对象应该包括修正主义，因为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只有通过对修正主义的研究和批判才可以完整地描绘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道路。同样的道理，只有通过对修正主义思潮的哲学的研究和批判才可以完整地描绘出马克思主义哲

学发展的道路，并从中总结出理论发展的经验教训。

当代“新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无疑也应该包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对象之内。这两种思潮包括哪些学派？包括哪些代表人物？如何评价他们的思想（包括哲学思想)？这些问题国内外理论界有很大意见分歧。但不管人们对它如何评价，它毕竟也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试图回答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面临的问题，即使它作了错误的回答，它的回答也为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以上均包括在马哲史的对象之中，至于时代经济政治形势、世界人民革命运动、各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当代各种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则属于马哲史的背景之列，当然也是要涉及的。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分期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一门科学，而且是一种意识形态，即现代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一方面是现代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革命运动的反映，另一方面又是为实现无产阶级根本利益服务的，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因此，它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而且与经济政治形势、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也有密切的联系。马哲史的分期当然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本身的变化情况为依据，而由于它的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它的分期不可能与生产史、经济史、科学史、政治史、革命史的分期毫不相干。事实表明，它的分期与生产史、经济史、科学史、政治史、革命史的分期大体上是一致的，尽管其间也有许多不一致之处。

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形成于19世纪40年代，迄今已有140余年的历史。这段时期内，无论从生产史、经济史、政治史、革命史或科学史来说，大体上都可区分为前50年和后90年两大阶段，即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从世界范围来讲，前一阶段和

后一阶段在各个方面都有明显的区别。在前50年，发达国家的实业革命均已完成，以蒸汽动力为主的机械化生产居于生产的主导地位；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发展，逐渐向以垄断为特征的帝国主义转化，并向全世界扩展其经济势力；现代资产阶级主要在欧美建立了稳固的政治统治，并向全世界扩展其政治影响，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此伏彼起，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趋于缓和，革命主要处于积蓄和组织力量的阶段；牛顿力学在自然科学中占居主导地位，自然科学中若干新成果的不断出现酝酿着一场新的科学革命。在20世纪，生产力先后跨入电气化和自动化的时代，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经济制度上，世界进入帝国主义和两种社会制度并存、斗争和互有消长的时代；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被苏联、中国和其他国家相继打破，两种经济政治制度经历了十分曲折的发展道路；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进入高潮，20世纪上半叶革命运动高潮迭起，先是俄国革命，后来是东欧的革命和亚洲的革命，特别是中国的革命，根本动摇了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当然，应指出，在20世纪中，后半叶比起前半叶来又有巨大的变化。

第二次大战给欧洲和亚洲的广大地区带来了严重的经济破坏和深重的灾难，欧亚人民，特别是挣脱了剥削制度枷锁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靠自己的努力迅速恢复和进一步发展了生产，使世界科学技术和生产水平大幅度提高。据统计，如以1980年的工业生产指数为100，全世界的工业生产指数的增长由1952年的27增至1987年的113，其中发达国家由1952年的29增至1985年的109，发展中国家由1952年的16增至1985年的98，即增加了三倍左右。这种增长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是普遍的，这是由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由于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的相对稳定，由于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一定的经济计划和福利政策，缓和了经济无政府状态和工人阶级的不满情绪。这种局面的出现使一些人产生了幻觉，认为世界形势和时代性质已经根本改变了，即从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转变成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这种观点

是难于成立的。下半叶的变化是巨大的，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但认为时代性质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就太过分了。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把资本主义制度能够容纳的生产力幅度大大提高了一步，这是早二、三十年前的人们没有估计到的，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政治危机并未消失，几十年间大规模的战争就发生过三次：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海湾战争，其他局部的小规模的战争没有一年停息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萧条时有所闻，还有不少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处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民生活十分困难的境地。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实现各个国家、各个阶级的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改革一方面是要解决制度内部不完善环节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对变化了的世界形势的适应。用改革来适应这种变化是正确的，但在改革中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搅乱了自己的阵脚，近年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内的动荡正是不适当地适应了这种变化的结果。这种动荡以至挫折不过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难于避免的曲折，说社会主义已经失败，是毫无根据的。总之，下半叶并不是什么根本区别于帝国主义时代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虽然和平与发展是我们努力达到的目标，过早地断定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到来是会搞乱自己的思想，应付不了这个各种矛盾纵横交错、世界风云激荡的局面的。把20世纪区分为大时代中的两个阶段，是合适的；把20世纪看作两个大时代，与19世纪后半叶鼎足而立是不合适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过程应该同时代的发展相应而区分为两大阶段。19世纪下半叶是它诞生、形成和系统化的阶段，20世纪是它传播、运用、发展和作为现代科学来建设的阶段。第一阶段的标志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基本形成；第二阶段的标志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在总结和概括时代变化和新的科学成果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各种哲学问题，重新建构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当然，每一个较大阶段又可区分为较小阶段。19世纪的分期是比较简单的，在我国哲

学界已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可，即分为三个较小的阶段：1. 1841-1848年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萌芽到形成的阶段，2. 1848-1871年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欧洲革命运动和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运用、验证和发展的阶段，3. 1871-1900年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化和进一步传播和发展的阶段。20世纪大体上也可分三个阶段，1. 1900-1917年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运用和发展并向全世界传播的阶段，2. 1917-1949年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在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权的支持下进一步传播和发展的阶段，3. 1949年以后为建设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体系并在西方各国得到重新重视和研究的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划分同世界历史阶段的划分基本上是一致的：1900-1917年期间，资本主义世界第一次发生总危机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1917-1949年期间，资本主义世界第二次发生总危机和东欧、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1949年以后，资本主义危机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和社会主义国家大力进行建设和改革。难以预言何时会爆发资本主义总危机，但可以断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全世界的问题，首先是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其次是世界持久和平问题，第三是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全球性问题，是得不到彻底解决的，只有全世界都实现了社会主义，这些问题才谈得到比较彻底的解决。

当然，这些较小的阶段还可划分为更小的阶段。这种划分在19世纪比较单纯，我们只要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发展过程来进行就行了，但在20世纪，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已在全世界传播和发展，而各国情况千差万别，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不同国家的传播和发展同这些国家本身的历史进程不可分，更小阶段的划分就很难一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和苏联的传播和发展有其特色，因而会有其特殊的分期；它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当然也有其特色，因而也会有其特殊的分期，在其他各国亦然。但分期的原则对各国当然是一致的，即不但要根据该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发展线索来划分，而且要使这种划分同该国无产阶级革命运

动的发展一致起来。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它的创立是和他们的革命实践活动分不开的，也是同他们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和自然界的理论活动分不开的。它的直接理论来源是西欧传统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他们最初是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在哲学上属于青年黑格尔派，后来受费尔巴哈的影响转向唯物主义。他们在参加德国进步青年的政治活动中，深入接触工人农民，了解了他们的生活和痛苦，并在空想社会主义影响下成了社会主义者。他们最初未能彻底摆脱人道主义历史观，仍然以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异化的扬弃来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并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作论证，这就是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劳动异化理论和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提出的从全人类利益出发来论证社会主义的理论。但他们又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的历史观已包含了许多唯物史观因素。他们尽管采用了人道主义历史观的总公式，却强调研究劳动、实践、经济生活、阶级关系，并以之为出发点来分析人类历史的发展，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武装斗争的必要性，他们在这些著作以及其他著作中甚至已表述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一般原则，这些已大大突破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因此，当他们于 1845-1846 年期间发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时，便丢掉了人道主义历史观这根暂时用来支撑自己的拐棍，创立了唯物史观，并从而使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这个转变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实现的，这两本著作便成为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形成的标志。但它们当时没有公开出版，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是在《哲学的贫困》(1847) 和《共产党宣言》(1848) 中才公开问世的。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创立是欧洲哲学史上的革命变革，它使哲学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状况进入了作为一门科学来建设的阶段，它要求自己像一般科学那样以实践为基础，由实践检验自己的真理性；它第一次使哲学走出私有者阶级的殿堂而变成历史上最先进阶级——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意识形态；它把单纯解释世界的哲学变成不仅正确地解释世界而且成功地指导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改造世界的哲学。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哲学经常称作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用得最多，也最为确切，因为当时真正以理论体系阐述出来的是历史观，至于世界观、自然观、认识论等哲学部门在当时只是作为历史观的理论基础与前提，以或详或略的观点包含在历史观之中。今天流行的实践唯物主义并不是他们所使用过的术语，而不过是从他们的一句话“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中引申出来的。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当然可以逻辑地引申出“实践的唯物主义”，但按照他们当时对唯物主义的理解，也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绝对引申不出今天有些人所说的把“实践”等同于“物”的“实践唯物主义”，“实践的”一词不过是强调其指导实践的功能而已，这可以那句话的全文为证：“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① 后来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把唯物史观称做历史唯物主义。正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把唯物主义的主要内容限于历史观，所以在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唯物史观这种片面的观念。马克思主义当然应有自己的世界观、自然观和认识论，即后来形成的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经常把辩证法仅仅看成是一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本书引用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均为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页。

种方法，马克思曾表示过想用通俗的方式把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体系表述出来，即列宁所说的"大写字母的逻辑"，但由于他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占去了他的大部分时间，他的志愿未能实现。在他的后半生中，他的哲学思想只能在他对其他理论问题如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中表现出来。马克思的《资本论》、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手稿和晚年关于早期人类社会史的笔记中都包含了丰富的哲学思想。初步完成马克思的志愿，提出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框架和主要原理，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完整化、系统化的是恩格斯。

恩格斯从来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的发展，70年代着手研究自然辩证法。恩格斯深知自然科学是哲学的基础之一，他研究自然辩证法的目的不仅在于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而且在于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他在《自然辩证法》中首先提出的辩证法的三个主要规律，即质量互变、对立统一和否定之否定，就是最一般的规律。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中，他明确提出了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物质与运动；物质与时空、生命的起源、人类的起源等一系列原理。在《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论》中，他又明确提出了关于哲学基本问题、反映论、实践和认识的关系等一系列原理。在他的著作中已经大体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体系。他没有用过辩证唯物主义一词，但用过唯物辩证法一词，而且他把辩证法看成既是方法，也是科学，他所说的唯物辩证法可以看成是同辩证唯物主义同义的。第一次明确提出辩证唯物主义一词的是狄慈根（《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1886）和普列汉诺夫（《黑格尔逝世60周年》，1891）。但由于多年形成的观念，辩证唯物主义一词在当时没有流行起来，在广大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流行着马克思主义缺乏世界观、自然观、认识论的观念。一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如梅林、拉法格、考茨基和拉布里奥拉等人都把研究重点放在唯物史观上，这固然是由于唯物史观与革命运动的关系极其密切，也不能说与上

述观念无关。狄慈根和普列汉诺夫提出辩证唯物主义一词不但忠实地概括了恩格斯著作中的思想，也是一个杰出的创造。可以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基本理论框架，在恩格斯在世时已基本形成了。有的人为了诋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硬说它是斯大林创立的，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后面我们还要谈到这个问题。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有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使辩证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确立起来，指出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部分，它与历史唯物主义是不可分割的一块整钢。

20世纪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第二个大阶段，第一个能够代表这个新阶段的无疑是列宁。这不仅是由于列宁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付诸实践，而且是由于列宁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阶段。列宁在人类历史的新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分析和解决俄国革命问题，使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内取得了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他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在体系上取得了两项重大的进展，其一是在捍卫辩证唯物主义过程中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系统化。他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9) 中进一步发展了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在实践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认识论的三个重要结论，还着重论述了真理论的基本内容和在掌握客观规律性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等问题。其二是在深入研究辩证法的基础上于《哲学笔记》中提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体系的理论和任务，并提出了“辩证法的要素”16条，它实际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的雏型。但是，列宁本人由于十月革命胜利后革命工作极度繁重和过早的逝世，未能完成建立哲学体系的任务，这一任务是由苏联的一大批哲学专业工作者在二、三十年代完成的。为了宣传和教学的需要，他们根据恩格斯和列宁的一些论述，形成了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部分构成的体系，而辩证唯物主义又包括唯物主义（世

界观和认识论）和辩证法（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一框架是符合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和列宁在《卡尔 马克思》中的设想的。其中原理多来自《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及其他著作。这个体系并不是经过认真的长时间的研究和讨论才形成的充分反映时代水平的完整而严密的科学体系，它甚至不是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所设想的。当然，它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只是它未能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应该达到的完整性和严密性。斯大林1938年在《联共党史》中提出的体系是把当时流行体系简化的结果。作为《联共党史》中的一节，斯大林的体系比较简略是合理的，但后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把它看作最理想的最终完成的体系，一切哲学教科书均以它为蓝本，不允许有一点点变动，这就窒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科学体系的建设，并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当然，也应指出，斯大林的体系在将近20年间成为全世界共产党人的统一的哲学读本，对于传播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有积极作用的。斯大林逝世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摒弃了他的体系而恢复了原二、三十年代的体系。近30多年来，苏联哲学家们开展了对体系问题的研究，尽管至今还没有建立起多数哲学家认可的崭新的哲学体系，但提出了若干关于建立哲学体系的理论，并提供了若干哲学体系模式，这就为这个间题的解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近30多年来，苏联哲学界还深入研究了自然观、历史观、认识论、逻辑学、方法论、伦理学、美学等各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胜利。中国第一批共产党人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都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运用和研究，特别是用唯物史观来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和观察中国革命的命运。陈独秀把唯物史观误解为庸俗生产力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不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中国革命运动的基础上，毛泽东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不仅写作了专门的哲学文章和著作，如《反对本本主义》《实践

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从哲学的高度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而且写出了像《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那样包含有丰富哲学内容的论述中国革命间题的著作，可以说，毛泽东的大部分论著都包含了或多或少的哲学内容。在矛盾理论、认识论、军事辩证法、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理论等方面，毛泽东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应该着重指出，毛泽东把一般哲学原理转化为一般思维方法，创造了一系列易为广大干部群众掌握的工作方法如调查研究、一分为二、解剖麻雀、弹钢琴等等，努力使哲学成为广大干部群众头脑中的锐利的思想武器，这是毛泽东的特殊贡献。毛泽东善于把哲学和实际问题的分析在他的论著中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也是不多见的。

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就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研究和传播的理论工作者，如李达、艾思奇等，他们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宣传、教育和科研的需要，中国涌现了大批哲学专业工作者。40年来，他们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在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们认真贯彻了“双百方针”，解放思想，深入研究和讨论了各种哲学间题，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以及各个哲学原理的问题，努力根据全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的发展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的新成就以及中国10年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所引起的巨大的变化来重新建设和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尽管自始至终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干扰，许多问题还需要作进一步研究才能作出满意的结论，其积极的成就仍然是主要的。最早开展讨论的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后来还有人道主义和人的异化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现代化问题、本体论能否成立的问题、辩证法的核心问题、认识的本质问题、社会经济形态问题、如何运用自然科学新成就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间题、应用哲学能否成立间题以及

其他问题，呈现出一片繁荣兴旺的景象。应该特别指出的是，邓小平同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其中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及其他许多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已对中国建设和改革开放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并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其他各国也得到广泛的传播、研究和发展。在东欧社会主义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受到极大重视。在这些国家最初主要是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50年代末逐渐走上独立研究和发展的道路。东欧各国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自己国家的传统哲学、特殊条件和特殊问题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些有自己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或研究重点。例如保加利亚对反映论的研究在国际上很负盛名，捷克斯洛伐克则以科学技术哲学为国际哲学界所瞩目，南斯拉夫形成了辩证法派和实践派两大流派，匈牙利卢卡奇在20年代的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中的人道主义思潮，尽管他后来部分放弃了他的观点，但其影响至今不衰。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大致可以区分为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各国共产党的哲学家们，他们循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开辟的道路，深入研究历史和现实所提出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另一部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他们的构成十分复杂，或是从共产党中分化出去的，或原本是非党的，或在政治上是倾向于民主社会主义的。他们对十月革命的道路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以及苏联的哲学采取批判的态度，尤其是其中的人本主义流派宣称直接继承马克思早期的人本主义思想，硬说恩格斯和列宁背离了马克思。他们力图把马克思主义同某一西方哲学流派结合起来，另辟蹊径，提出了一些包括经济学、政治学、哲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回答现实所提出的各种问题。人本主义流派萌发于20年代，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公开发表后受到极大鼓舞，而大盛

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与当代西方两大哲学思潮——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相呼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也出现了科学主义流派,虽然其势力和影响远不如人本主义流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若干观点，特别是哲学观点，是明显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但这个思潮的出现总是现代西方社会向马克思主义寻求解决西方社会问题的途径的表现，总是马克思主义重新在西方得到广泛重视和研究的表现。

四、时代的挑战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运

近二、三十年，无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间呈现出意见分歧、学派林立的局面，而在更早时候，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在观点上则是比较一致的。如何评价这种现象？如何估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运和前景？

有人认为哲学本来就是多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多元的,意见分歧、学派林立的局面是正常的，而过去那种观点比较一致的状况是不正常的，是理论上的自由讨论被窒息的结果。这种观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混为一谈了，抹杀了二者之间的一个本质区别：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我们总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来研究和建设，总是用人类的实践来检验它是否与外部世界及其规律一致，因此，当过去实践证明它是符合实际的,它就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可,出现了意见比较一致的局面。而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一般都不把哲学看成科学，它没有与外部世界及其规律一致或不一致的问题，当然也谈不到多数学者认可或不认可的问题，因此，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是多元的，意见分歧，学派林立，在他们那里当然是正常的。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今天为什么也出现这种局面呢？这是由于时代变化了，人类实践前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新的考验，它受到了时代的挑战。

前已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时代性质总的说来没有变，但在某些方面的变化仍然是很巨大的，出现了若干原来没有，甚至没有想到的东西，要求哲学作出新的回答。

首先是自然科学的发展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自己的形态，这是需要认真对待的一次挑战。上半世纪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向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根据相对论每个主体观察事物都有自己的参考系，如果根据量子力学人们测量不到没有主体作用的微观粒子的运动，那么，我们还能论证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世界的存在及其可知性吗？下半世纪流行起来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协同学、突变论、耗散结构论等横断学科的出现，以及新的物质结构理论、分子生物学、认知心理学、人工智能的突破性进展，不仅改变了许多旧哲学原理的内容，而且增加了许多新哲学原理。近年来，人们讨论很多的问题如因果性、规律性、系统、层次、信息、有序和无序、矛盾、质变与量变、反映与建构、控制与反馈等等，有的是原来没有的，有的是原来有的，但内容改变了。在这些问题上目前分歧都是比较大的。

其次是国际国内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新问题。第二次大战后形势的发展大大有利于社会主义，而不利于资本主义。一方面涌现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除美国以外，都在战争造成的创伤和苦难中挣扎。在此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树立了崇高的威望，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内成了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普遍学习的理论。一种理论获得人们如此广泛的承认，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许多人认为资本主义的日子不长了，共产主义为期不远了。后来，世界形势的发展并不是原先所设想的那样。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在60年代以后不但从战争中恢复了过来，而且由于新的科技革命大大推动了它们经济的发展，它们又采取了一系列缓和其固有矛盾的措施，从而使它们的生产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出现了一定的经济

繁荣和政治稳定的局面。而社会主义国家近40年来虽然在整个经济政治实力方面达到了在旧制度下难以达到的前所未有的水平，但经济上政治上都发生了许多问题，不时引起经济上或政治上的动荡。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崇高地位在人们心目中发生了动摇，它面临着新的挑战，在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和争论，例如五种经济形态的转换规律能否成立、唯物主义一元论历史观能否成立、现时代的根本性质是什么、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能不能或应该不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应如何进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景如何等等都是理论界的热点。这些问题当然不仅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但不少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不管怎么回答这些问题，不立足于新情况、新根据，不提出新观点、新论证，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第三是当代西方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这种挑战不仅表现在它们的存在和发展，而且表现在它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评和攻击。当代西方哲学的两大思潮，即人本主义思潮和科学主义思潮，与西方哲学的大陆传统和英美传统有关，而更主要的根源则是西方社会的两大突出现象：社会关系的复杂化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人本主义主要从事历史观和人学的研究，从人的需要、情绪、意志、欲望以及人性、人的自我实现、人的自由发展来说明人类社会的发展；科学主义主要从事科学活动中的认识论、方法论、逻辑学、语言学的研究，把“经验”(实证的)看做最后的东西，否定任何经验以外的东西。在这两大思潮中，又是学派林立，日新月异，新学派不断取代老学派。西方当代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比较起来，显得异彩纷呈，多姿多态，令人有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之感。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和多样性，尤其是它们对人的各个方面的研究和对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的探索，无疑有很多可以借鉴和汲取之处。由于这两大思潮都是唯心主义的，它们都不遗余力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用种种“新的”论据来反驳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学”和“没有人的”世界观。对

于这种挑战我们要认真对待。在当代西方哲学面前，我们用不着妄自菲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当然不能像艺术那样变化多端，争芳斗艳，但我们也决不能墨守成规，故步自封，我们必须在坚持的基础上大力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据有理地回答当代西方哲学的挑战。

这些挑战都是时代的挑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运如何，取决于它能否满意地回答这些挑战。有一种观点是不能令人同意的，这种观点认为从马克思到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是一种倒退，而不是进步。在他们看来，马克思的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而他们所说的“实践唯物主义”就是实践本体论（存在＝实践）或实践一元论（世界统一于实践），辩证唯物主义就是直观唯物主义或物质一元论，是倒退回费尔巴哈去了。所以应该在更高基础上恢复“实践唯物主义”，完成一次否定之否定。辩证唯物主义是19世纪的思维方式，“实践唯物主义”是20世纪的思维方式。这种观点违背了马哲史的事实，不是恢复，更不是发展而是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上一节所叙述的马哲史的线索就是对这种观点的有力驳斥。

还有一种观点更是不能同意的，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凡是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历史决定论的都陷入了僵化、保守、空虚、贫困的境地，走投无路了。果然是如此吗？否！当然不能过高评价近十来年哲学研究的成就，今后要走的道路还很长，但仅就我国来讲，以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契机，十年来在哲学研究上的成就仍然可以说是巨大的。不妨列举几个突出的方面：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问题。一个完整而严密的逻辑体系是任何一门科学的前提之一，而这个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是没有彻底解决的。过去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虽然也是一个科学的体系，然而问题甚多，缺点不少，亟须改进。近年来围绕着旧体系的评价和新体系的建立展开了热烈

的讨论，,至今未出现多数学者认为满意的体系，但在根据什么原则建立科学的哲学体系方面得出了不少共同的看法，例如从抽象到具体的原则，这就为体系问题的解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关于世界观问题。受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思想的影响，我国不少学者也主张否定物质本体论，这实际上是要从根本上否定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但是，大多数哲学工作者不理会这一错误偏向，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的成就为根据广泛开展了世界观研究，深入而广泛地研究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人与世界、人化自然与自然的人化、世界的各式各样的一般辩证规律，力图构建一个现代的科学的世界图景，这个图景虽然还未形成，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已是呼之欲出了。

（三）关于历史观问题。十多年来对实践的重视和研究推动了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特别是历史观的研究，因为所谓历史不外就是人类全部实践的总和。实践总是人的实践，有的人从此出发否定辩证唯物的历史决定论，但大多数学者主张在实践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历史决定论，更精确地更细致地揭示和表述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并进行了大量工作和热烈讨论，酝酿着新的突破。

（四）关于人的间题。人学的研究是10年来的一个热点。过去由于革命和战争的严峻环境，理论工作对个人的研究有所忽视，因而对人的许多问题研究不够。10年来人们认识到对人的本质、人性、人权、人的价值、人的自由平等、人际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等一系列间题不研究是不行的，问题在于怎么研究，是不是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大多数学者都力图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赞成抽象地，实际是用资产阶级观点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人学在我国方兴未艾。

（五）关于主体与客体关系的问题。过去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也是忽视的，有时谈论也限于认识论范围。近年来人们认识到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首先不是认识论问题而是历史观问题，人作为

主体首先也不是认识的主体而是实践的主体。人是一切活动的主体，而人的活动大体上可区分为实践、认识和评价，而三种活动又相互交叉，错综复杂，因而三种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也相互交叉，错综复杂。此外还有三种活动的主体性与客体性及其相互关系问题。

(六) 关于认识论的问题。10 年来发表了大量关于认识论的论著。尽管认识论研究受到否定反映论思潮的干扰，它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也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关于认识的前提、认识的本质、认识的过程和阶段、知性和理性、认识的检验、真理与谬误、认识与决策，都发表了有一定水平的论著。

(七) 关于应用哲学问题。应用哲学能否成立，学者们仍有分歧，但许多学者不理会这种分歧，对各种应用哲学，如改革哲学、管理哲学、教育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人的哲学、语言哲学、科学哲学，等等，都进行了专门研究，并写出了专著。实际上，人们早就开始研究的自然观（自然哲学）、历史观（历史哲学）、伦理学（道德哲学）、美学（艺术哲学）、人生观（人生哲学）等等都可以说是应用哲学。无论如何，应用哲学可以在哲学与具体科学之间发挥中介桥梁作用。

当然还有其他方面。仅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哲学领域中呈现出来的是兴旺发达、欣欣向荣的局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会逐渐枯萎，慢慢退出历史舞台。任何科学，只要是作为科学建立起来了的，亦即经过实践的长期检验而得到证明了的，就会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而修正、丰富和发展，决不会被推翻，马克思主义哲学既然是一门科学，当然不会例外。从它目前的状况和处境来看，还没有任何实践从根本上动摇了它，更不用说推翻它。它经得住时代的挑战，经过修正、补充和丰富，它完全能够满意地回答时代所提出的问题，成功地指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它将以崭新的完全现代化的姿态呈现在我们面前。它的命运只能是不断发扬光大，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日新月异，它的基本

观点不会被动摇，更不会被推翻。

从以上叙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和发展的过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哲学、实践的哲学，它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又是为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服务的，因此，马哲史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和哲学理论相统一的历史，是二者互相推动的历史。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哲学，它是在人类实践总和和科学发展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又指导着人类实践活动和科学的发展，因此，马哲史是科学发展和哲学理论互相统一和互相推动的历史。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断前进的哲学，因此马哲史是一个前进的过程。马哲史中无疑有失误，有曲折，甚至有暂时的倒退，但从总体上看，它是前进的，而不是倒退的。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战斗的哲学，它是在同错误的观点作斗争中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因此，马哲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同各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不可知论斗争的历史。

（五）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有着无限前途的哲学，它将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而不断被修正、丰富和发展，但决不会被根本推翻，因此，马哲史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无限发展的历史。

五、马哲史的历史和研究马哲史的意义

不仅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其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作为一门历史科学，也有其历史，即有其萌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它当然不会形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之前，但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反省自己的哲学思想时，马哲史也就开始萌芽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等等都是重要的马哲史著作，其中包含

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他们的世界观、历史观的性质和基本内容以及他们的哲学思想同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的联系和区别的自我评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系统的研究并阐明其萌芽和形成的过程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和学生，其中有重要贡献的是梅林、普列汉诺夫等人。梅林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马克思传》和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以及其他著作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科学对象来研究，不但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过程和发展，而且研究它的史前史，借以说明它的创立是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果。列宁的《什么是人民之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卡尔 马克思》和《哲学笔记》等著作中包含了大量关于马哲史的论述，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进行系统研究是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的事情。

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对系统研究马哲史提供了极其优越的条件。苏联理论界大力开展了这种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苏联从20年代开始陆续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普列汉诺夫全集》、《斯大林全集》，特别是公开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一些未发表过的手稿和笔记，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自然辩证法》、《哲学笔记》等，为研究马哲史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第一手材料。苏联学者在掌握丰富资料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和讨论了马哲史的许多专题，如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同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哲学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转变过程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问题，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人的哲学思想在马哲史中的地位问题，这些问题的研究为系统地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萌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准备了条件。苏联大学在50年代开设了系统的马哲史课程。1957- 1965年陆续出版的苏联敦尼克等主编的《哲学史》(6卷)中有一半篇幅是马哲史，此书的初稿曾在50年代初内部发行，其中包含了对马哲史的完整阐述。60- 80年代苏联理论界对马哲史

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发表了大量论文、专著和教材。

马哲史的研究自30年代以来也逐渐受到西方理论界的重视，特别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兴起之后，一些马哲史问题更成为争论的热点，例如如何评定《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性质和它在马克思主义史中的地位就成为争论的焦点。后来，马克思的古代社会史笔记（又称人类学笔记）又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围绕这些笔记和手稿，学者们讨论了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与列宁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涉及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根本性质，涉及了两种世界观、两条认识路线、两种意识形态的争论，这一争论直到今天还远远没有结束。

中国对马哲史的研究起步较晚。中国理论界从来重视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著作的学习和研究，但对其历史性比较忽视。50年代也出现了少量马哲史论著，少数大学课程中也包含了马哲史内容，但对马哲史进行专门的系统的研究是70年代以后的事情。10多年来，中国学者们围绕马哲史的各种问题开展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发表了大量论文和专著。1981年出版了第一本马哲史的专业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后来又出版了这种专业教材十余种。这10多年出版的论著，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是前30年无法比拟的。在大学中，哲学专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都开设了系统的马哲史课程。马哲史作为一门科学在中国已经建立起来了，今后的任务是如何进一步加以提高和深化。马哲史的研究也呈现出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马哲史为什么近10多年来会受到我国理论界的高度重视呢？马哲史的研究有什么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呢？

首先，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及其思想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中加以研究，我们才能正确地理解其精神实质和正确地评价其是非曲直。曾经有过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形态，这就否定了这些著作的历史

制约性，把它们看成凝固僵化的东西，这当然是不对的。而另一种观点则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既然它们是历史上的东西，现在早已过时了，这也是不对的。像任何其他科学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历史的产物，既有相对性，也有绝对性；既有局限性，也有普遍性，只有把它同它的历史环境联系起来，才能把它的相对性和绝对性区别开来，才能看清楚它的成就与不足、长处与短处，才能避免教条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错误。

其次，与此相联系，只有弄清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思想线索和它在不同时期的是非曲直，我们今天才能正确完成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前面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大发展的前夜，有人企图借机根本推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马哲史就能使我们在这种企图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因为马哲史以充分的实践材料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是经得起革命实践和科学实践的长期检验的，是打不倒、推不翻的；同时，根据马哲史的丰富材料，我们也清楚哪里不足，哪里是弱点，需要大力加以丰富和发展。这就是我们经常谈论的既要坚持，又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而缺乏对整个马哲史的理解，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第三，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今天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还直接涉及如何解决某些马哲史问题。如果按照有些人的观点，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思想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后来主张唯物史观的马克思是一种倒退，那么，今天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只有否定唯物史观而恢复人本主义历史观了。

第四，与此相联系，马哲史的研究还直接涉及中国今天是否应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甚至涉及在世界范围内是否应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问题。大家知道，唯物史观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如果主张唯物史观的马克思是一种倒退，主张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就更是一种倒退了。

许多马哲史问题不仅仅是历史问题，而且是具有重大现实意

义的问题。唯物史观史问题的现实意义是很直接的，辩证唯物主义史问题同现实的关系似乎间接一点，但其现实意义也是很明显的，例如马克思究竟是否是一个地道的唯物主义者就涉及马克思是否承认外部世界及其规律的客观性问题，其中包含是否承认人类社会及其规律的客观性问题，这就同人类历史的社会主义前景明显地联系起来了。从此可以充分看出，马哲史研究决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研究。

我们今天进行马哲史的研究和马哲史的教育决不是为历史而历史，而是为了推动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设和发展，为了推动社会主义的两个文明的建设，简单点说，就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但是这种服务是以马哲史这门科学来服务，而不是根据一时的需要来随意剪裁历史。因此，一方面我们要避免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的偏向，另一方面也要避免“六经注我”的实用主义的偏向。我们认为正确的态度是从整个人类社会实践和科学研究的现代水平出发，从我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需要出发来研究和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和发展的过程，而这种研究和阐述是有充分根据的，有理论分析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的。进一步建设和发展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自觉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这就是今天我国马哲史研究工作者的任务。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时代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历史上任何一种哲学学说，都是以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条件为前提，为表达和满足一定社会需要而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崭新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自己所处时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结晶和升华。

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于19世纪40年代。“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因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① 毛泽东的这段论述，概括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时代的主要特征，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客观可能性和历史必然性。

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举世公认为最有影响的一种哲学学说。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一种哲学能如此迅速地掌握亿万群众的心灵，如此深刻地改变人类社会的生活。单是这一事实，就使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成为意义重大、引人关注的重大课题。

当然，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时代并非只有历史的意义。更重要的还在于，只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时代出发，才能正确理解它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革命变革及其精神实质，才能正确说明它与前人思想成果之间的批判继承的关系，才能正确把握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1991年6月第2版（下同），第300页。

它对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事业的巨大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固步自封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和探求真理的方法。它在实践中产生，也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理论和实践相统一，是它的内在要求和生命力之所在。在马克思主义迫切需要有新的发展的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时代，还有助于我们正确估价它在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贡献和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并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历史经验和方法论的指导。

第一节　社会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相对地说，哲学是一种更加远离经济基础的意识形式，但是，归根到底它也是根源于物质的经济事实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例外。有人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严格地说，这是不精确的。因为它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上都能产生，而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机器大工业的社会化生产为物质前提才能创立的。

一、“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14世纪后期就已在西欧封建社会内部孕育成长。从16世纪开始，欧洲的先进国家加快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以手工技术和雇佣工人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日益广泛地发展起来。美洲大陆的发现，绕过非洲的新航路的开辟，为新兴资产阶级开拓了新的活动场所。世界市场的扩大使商业、工业和航海业空前高涨。所有这一切，都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加快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取代封建生产关系的过程。但是，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是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时候，它还不可能彻底地改造封建生产方式。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工场手

工业既不能掌握全部社会生产，也不能根本改造它。”

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一场以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代替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的革命兴起了，这就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工业革命（又称“产业革命”）。这场革命不仅使生产技术发生了质的飞跃，而且也引起社会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从而把资本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工业革命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资本家为了追逐更多的利润，不断地改进生产技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因而有必要采用大机器生产；世界市场的扩大，工场手工业已远远不能满足对工业产品日益增长的需要，也要求采用新技术、新方法，迅速扩大生产。而16至18世纪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又为生产技术的革命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文艺复兴以来民主、自由思潮的传播，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16世纪70-80年代的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17世纪40年代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18世纪末叶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和资产阶级政权的建立，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解除了封建势力的束缚；资本原始积累为建立机器大工业提供了大量自由劳动力和巨额货币财富；工场手工业的长期发展，使分工日益发达，劳动工具日趋专门化，这就为从工场手工业过渡到大机器生产准备了物质技术条件。

以工具机的发明和使用为起点的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18世纪30年代，英国的约翰 怀亚特发明了纺织机，到60至70年代已被普遍采用；从80年代开始，随着蒸汽机的应用和机器制造业的出现，工业革命扩展到各个部门，迅速改变了整个工业生产的面貌。到了19世纪30至40年代，英国各主要部门的生产都先后采用了机器，形成了工厂制度。当时的英国制造着全世界需要的工业产品，成为“世界工厂”。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07页。

继英国之后，法国也于19世纪初开始了工业革命，工业生产中机器的使用迅速增多，1830年拥有蒸汽机625台，到1847年猛增到4853台，其中增加最快的是纺织部门。

在经济发展方面落后于英、法的德国，在19世纪30和40年代的工业革命中，也取得了比较迅速的发展。特别是1834年关税同盟的建立，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高涨，机械化生产逐年增加。1826年全普鲁士拥有蒸汽机仅58台，1837年增加到328台，至1848年又增至1138台。到40年代末，除莱茵 威斯特伐利亚已成为重工业区外，萨克森、西里西亚和柏林等地区的工业生产也有了飞速的发展。

此外，欧洲其他国家如比利时、瑞士、西班牙等国，资本主义大工业也都有了显著发展，到了19世纪上半期，这些国家都先后进入了工业革命时期。

工业革命的胜利，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工场手工业时代相对迟缓的进程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狂飚时期。在英国，棉花输入1764年约为380万镑，到1789年增至3200多万镑；煤的产量1700年为260万吨，1790年增至760万吨，1795年又增至1000万吨；生铁产量1740年仅1.77万吨，1788年为6.8万吨，1796年增至12.5万吨以上；铁路总长1836年为251公里，1848年猛增至8203公里。在法国，棉花消耗量1831年为2800万公斤，到1845年增到6400万公斤；煤的消耗量1830年不过250万吨，到1847年提高到76。万吨；钢铁的产量1832年为14.8万吨，到1847年增至37.3万吨。铁路线长1831年仅38公里，到1847年达1500公里。在德国，工厂生产的产值1820年为8500万英镑，1840年为15000万英镑；棉织品和生铁的产量从1836年到1844年约增50%；仅在普鲁士邦，采煤量就由1831年的700多万吨增到1842年的1490万吨；1835年始建铁路，1840年铁路总长为469公里，到1850年达5856公里。

工业革命不仅是生产技术上的革命，也引起了生产方式上的

重大变革。随着机器对一个又一个工业部门的占领，随着工厂制度的建立和工业中心城市的形成，终于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战胜封建主义生产方式，使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进一步得到确立和巩固起来。

然而，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工业革命的实现，不仅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而且导致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的矛盾趋于激化。1825年7月英国爆发的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1836年和1847年又先后爆发的波及欧洲各国的经济危机，就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和突出表现。这说明，“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巫师那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① 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发展，预示着未来社会革命的性质和历史发展的方向。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

恩格斯曾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②19世纪初期的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之所以陷入空想，正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还不很发达的时代，他们只能是这样。他们不得不从头脑中构想出新社会的轮廓，因为这些轮廓在旧社会本身还没有普遍地、明显地表现出来；他们之所以限于为自己的新建筑的基本特征向理性求助，正是因为他们还不能求助于同时代的历史。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所以能奠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正是因为它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阶段——社会化的大生产为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6页。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82页。

③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6页。

物质前提的。

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对工场手工业和分散小生产的取代，科学技术在生产上的广泛应用，使人类的实践活动（首先是物质生产活动）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能动作用得到空前充分的发挥。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它第一次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移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① 历史的实践不仅进一步暴露了唯心主义的荒谬性，而且也表明了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和机械性已失去其依据，科学地阐明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把唯物主义学说推向新的更高的阶段，已有了客观的需要和可能。

资本主义大工业带来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深刻而迅速地改变了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支配作用日益充分地显示出来，构成社会形态诸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日益明朗，阶级斗争与物质利益之间的联系更加充分的显露，这就使人们有可能去科学地揭示社会形态的物质基础及其发展、变革的动力。

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充分显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性质，日益证明了每一种社会制度在历史的长河中都是暂时的、相对的和有条件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生产力发展之迅速，生产关系变动之急剧，是以往任何时代都不能比拟的。马克思、恩格斯写道：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页。

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① 这种社会关系急速变动的状况，有力地打破了以往社会历史观中那种"古已有之"、"永恒不变"的形而上学观念，为确立唯物主义的辩证发展观提供了客观依据。

"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② 资本主义社会化的大生产，使资产阶级社会成为历史上最发达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通过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关系和结构的理解，也使人们能够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私有制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同时，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所建立的物质基础和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占有的私人性质的矛盾的暴露，也为人们预测历史发展的方向提供了客观依据。因而也就有可能揭示社会形态的发展和更替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的发展，迅速地开拓和扩大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日益具有世界性。新的大工业排挤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遥远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也供世界各地消费。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多方面的互相交往和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生产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5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108 页。

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被打破了。这就使得人们有可能通过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社会历史的比较研究，发现其中的常规性、重复性，从而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并不是它的创始人主观想象的产物，而是由于时代的发展，首先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它提供了客观的依据。它植根于现实的基础之上，首先是植根于经济事实之中。

第二节　阶级斗争的新特点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一对孪生子。作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它们始终存在着阶级利益的对立和斗争。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状况相联系，无产阶级及其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18 世纪后期开始的工业革命，不仅创造了一个大工业资本家阶级，同时也创造了一个与大工业相联系的近代无产阶级，从而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出现了一系列不同于以往一切阶级斗争的新特点，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提供了阶级基础。

一、“工业革命”与阶级斗争的新特点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在封建社会内部孕育成长的。早期无产阶级身受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和剥削，他们不仅积极参加了反对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而且也始终不断地进行着反对资本家的斗争。马克思曾指出，“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之间的斗争是同资本主义关系本身一起开始的。在整个工场手工业时期，这场斗争一直如火如荼地进行着。”① 英国的一位牧师在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468 页。

1767年出版的著作中也谈到，“不幸的是，业主和工人彼此总是处于战争状态。业主的一贯目的是尽可能廉价地取得工人完成的劳动，他们不惜使用各种诡计来达到这一目的；而工人同样也总想利用一切机会强迫业主满足他们的更高要求。”① 不仅如此，无产者在参加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还曾发动过本阶级的独立运动，如英国大革命时期杰腊德 温斯坦莱领导的“掘地派”运动，法国大革命时期巴贝夫组织的“平等派”运动等。

不过，在资本主义早期，雇佣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它还不带有直接的政治目的，工人们也不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个根本问题，斗争目标主要是实现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经济要求。这种斗争是自发地和分散地进行的，斗争锋芒主要是对着个别资本家而不是整个资产阶级。

雇佣工人反对资本家斗争的这些特点，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状况和无产阶级本身成熟程度所决定的。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对不发达。由于这种生产方式还建立在以手工业占统治地位的基础上，还不存在资本和生产高度集中的条件，因而也不存在大量工人群众集中的可能性。同时，由于资本主义企业的规模比较狭小，在相当程度上还是彼此孤立和互不依赖的，因而也没有可能使全国的无产者联合起来，组织和形成为一个独立的和自身团结的阶级。第二，在那时，新兴资产阶级既是新生产力的承担者，也是一般历史和社会进步的代表者。因此，它在为实现自己的阶级利益而进行的斗争中，能够而且必须把所有受封建势力压迫和剥削的群众联合在自己的周围，成为自己的同盟军，因而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一般说来还处于次要的地位。在17世纪英国和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年代，情形都是如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68页注193。

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也带来了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深刻变化。随着机器大工业对工场手工业和封建生产关系的取代，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它们之间的矛盾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益突出；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工业中心城市的形成和工厂制度的建立，使无产阶级不仅在数量上迅速增加，而且觉悟性、组织性和战斗性也不断加强；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迅速发展，并没有使工人的境遇得到改善，相反地，机器大工业的扩展，使工人日益成为机器的附庸；资本家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采取种种方法大幅度地降低工人工资、延长劳动时间和增加劳动强度，廉价雇用女工、童工，拼命压榨工人的血汗，使大多数工人挣扎在死亡线上。所有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使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提高到新的水平。

在工业革命初期，雇佣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首先以捣毁机器，烧毁工厂的形式表现出来。当时，工人们把机器视为他们的竞争者和敌人，认为机器夺去了他们的工作岗位，使他们遭受失业、饥饿和痛苦。因此，他们反对机器，而不是反对使用机器来剥削工人的资本主义制度。在英国，1769年布莱克浦的哈里夫工厂的工人捣毁了新发明的纺纱机；同年英国国会通过法令，宣布将以死刑来惩治破坏机器和厂房的人；1797年兰开夏的工人又开展了破坏机器的运动，参加者近8万人。19世纪20年代30年代，在法国和德国也发生过工人捣毁机器的风潮。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当时的工人们“捣毁机器，烧毁工厂，力图恢复已经失去的中世纪工人的地位”①。这表明，工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还处于感性阶段，还远未形成同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作用相适应的思想。

然而，破坏机器的运动遭到政府和资本家的残酷镇压，而且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9页。

它也不能阻止机器的更广泛采用。斗争实践促使工人进而采取罢工运动的形式，为提高工资、缩短劳动时间和改善劳动条件而开展经济斗争，并在斗争中建立了互助会和工会等组织。1794－1796年间，在英国的羊毛加工业、缝纫业工人中已建立了最初的一批工人团体；1813年，苏格兰纺织工人举行了大罢工；1816年格拉斯哥纺织工会成立；1818年，兰开夏纺织工人和苏格兰矿工又举行了大罢工。此后，工会组织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到20年代，已经出现了全国性的蒸汽机制造业工人联合会和木工联合会。工人们通过自发的经济斗争，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才能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利益，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阶级基础

19世纪30年代，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发展发生了重大转折。在1830年法国的七月革命和1832年的英国议会改革中，资产阶级在同封建势力的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它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统治得到进一步的确立和加强，也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这些国家中开始上升到了首位。与此同时，无产阶级通过斗争实践的锻炼，在觉悟水平和组织程度上都不断得到提高，日益发展成为独立的和自身团结的阶级。特别是1825年以来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不仅给无产阶级造成更为深重的灾难，而且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得到更为充分的暴露，从而使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更趋激烈和尖锐。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从30年代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① 这种特点，在19世纪30到40年代英国、法国和德国的阶级斗争中，已充分显示出来。

(一) 法国里昂工人的两次起义

1830年7月，法国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推翻了波旁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3页。

王朝的统治，政权转到金融贵族即大资产阶级手中，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都被排除在政权之外，在革命中流血牺牲的无产阶级，不仅没有得到什么利益，它的经济状况反而比过去更加恶化，这就引起群众的普遍不满。

1831年11月21日，里昂丝织工人和其他手工业者为抗议厂商破坏定货合同、拒绝增加工人工资而宣布罢工。当工人队伍走向市区时，遭到政府军的突然袭击，于是工人被迫举行武装起义。他们高呼“工作不能生活，毋宁战斗而死”的口号，手持腰刀、长矛、棍棒和步枪，经过三天激战，驱逐了政府军，占领了里昂市，拘禁了省长。工人在告市民书中宣布：“里昂将成立普选的初级代表大会，听取本省人民的要求，同时并将组织一个新的公民保安团。”这是工人对政权问题第一次提出的不十分明确的要求，虽然这个计划没有来得及实行，起义最后失败了，但起义者固守这个当时法国最大的工业中心达10天之久。

1834年4月9日，里昂工人为了抗议政府逮捕工人互助会的领袖和颁布禁止工人集会结社的法令，又举行了第二次武装起义。起义工人们明确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使这次起义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质。这次起义得到巴黎、马赛等城市工人的积极响应和整个欧洲工人的热烈同情。起义者同政府军警进行了6天的英勇战斗，最后由于寡不敌众而被镇压下去。

(二) 英国工人的“宪章运动”

如果说，法国里昂工人起义还只发生在个别城市，那么，19世纪30到40年代英国无产阶级发动的“宪章运动”则是一场全国性的争取政治权利的运动。

1832年英国议会实行选举制度改革，满足了工业资产阶级的要求，而在争取选举制度改革运动中起主导作用的工人，却仍然被剥夺了选举权，这就迫使工人用自己的独立行动来争取政治权利。

1836年6月，“伦敦工人协会”成立。次年，这个协会起草了

一份致国会的请愿书，提出了争取普选权的六项要求。1838年5月8日，公布了这个请愿书，并被命名为《人民宪章》。到1839年，在这个请愿书上签名的就有125万多人。但在同年7月，请愿书遭国会否决，运动被镇压下去。1840年的经济危机，造成大批工人失业，农业歉收又导致了全国性饥荒，并由此掀起了第二次宪章运动的高潮。1840年7月，在统一全国宪章团体的基础上成立了宪章协会，也称宪章党。“这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1]这一次的请愿，除坚持争取普选权外，还提出了废除贫民法、限制工作日、实行政教分离等要求，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有300多万人（约占英国成年男子的一半）。1842年5月，请愿书再次遭议会否决，工人们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罢工以示抗议，也被镇压，运动转入低潮。

在1847年的经济危机和1848年欧洲革命的影响下，宪章运动掀起第三次高潮。这一次的请愿书宣布：劳动是一切财富的唯一来源，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成果应享有优先权，人民则是权力的唯一来源。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扩大到500万人。但是，随着法国巴黎工人6月起义的失败，欧洲的反动势力得势，宪章运动也终告失败。

宪章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宪章主义的旗帜曾吸引了成百万的工人和劳动群众参加政治斗争。特别是奋起反对资产阶级的整个无产阶级，首先向资产阶级政权进攻。它还组织了第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列宁认为，英国工人的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三）德国的西里西亚工人起义

继英国和法国之后，德国也于1844年6月爆发了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起义。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7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811页。

在当时的德国，资本主义还没有完全占统治地位，工人们受到工厂主、包卖商和封建主的重重剥削和压迫。40年代初，工厂主为了同英国商品竞争，大幅度地降低工人工资，以减少生产成本，致使大量工人的生活处于极端困苦的境地。当时工人中流行着一首名为《血腥的屠杀》的歌曲，愤怒地控诉工厂主和包卖商的贪婪残忍的欲望和罪行，发出了反对私有制社会的呼声。1844年6月4日，忍无可忍的西里西亚织工们高唱着这支歌曲，发动了对资本家的暴力斗争。起义者们捣毁了工厂和企业主的住宅，销毁了帐簿和财产契据，并与前来镇压起义的军队展开了英勇的搏斗。经过两天的浴血奋战，起义被镇压下去。

西里西亚织工的起义，是一次直接反对资本家残酷剥削的斗争，并明确地把斗争矛头对准私有制，表现出比英国和法国工人的起义对社会制度问题有更深刻的理解，组织性和计划性也有了进一步的加强。在起义发生后两个月，马克思对它作了高度的评价："法国和英国的工人起义没有一次像西里西亚织工起义那样具有如此的理论性和自觉性"①。

英、法、德三国阶级斗争的历史进程表明，当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争夺政权的斗争尚未结束的时候，无产阶级已经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为争夺统治而斗争的第三个战士"②而提出了自己独立的政治要求，发出了消灭私有制的呼声，建立了自己独立的政党，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性斗争。这些事实充分说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已成为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

毋庸讳言，上述三国阶级斗争的进程同时也表明，无产阶级在实践上还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自发性，特别是在理论上还没有达到与其伟大历史使命相适应的水平。这就迫切需要应用科学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6页。

方法，把无产阶级在长期斗争实践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总结起来，形成科学的世界观，用以武装无产阶级，指导他们的解放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他们站在时代的前列，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通过参加现实斗争和艰苦的理论研究，系统地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经验，批判地吸取了人类认识史上的优秀成果，创立了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阐明了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途径和方法。

总之，国际无产阶级斗争实践的发展，需要有科学世界观的指导，科学的世界观也只有以无产阶级斗争实践的经验为基础才能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适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形态。

第三节　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成果

恩格斯在总结哲学发展与自然科学发展的关系时指出：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大体上经历了由笼统直观阶段发展到分门别类研究的阶段，再到辩证综合阶段的过程，与此相应，唯物主义也有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三种主要形式。同样，哲学史上辩证思维的发展——从古代朴素辩证法到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辩证法，再到唯物辩证法的历史发展，也是同自然科学的发展状况密切联系的。

那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时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的关系如何呢？

一、19世纪自然科学的新成就

近代自然科学大体上可分为两个时期。从16世纪到18世纪

上半叶为前期，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主要特点是对实验材料的经验分析，即经验自然科学阶段；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上半叶，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后期，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显著特点是对实验材料的理论综合，自然科学进到理论自然科学阶段。

近代前期的自然科学，一经从宗教神学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便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推动下，获得长足的进步。其中最辉煌的成就是牛顿所创立的经典力学。1687年，牛顿发表了他的划时代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从理论上总结了前人和同时代人的科学成果，系统地阐发了力学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第一次实现以力学为中心的自然科学体系的大综合，成为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伟大里程碑。但是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其他部门，比起力学的发展则相差很多。物理学从总体上说还处于搜集经验材料阶段，化学刚刚借燃素说从炼金术中解放出来，地质学和古生物学还没有超出矿物学的胚胎阶段。总之，真正的科学当时还没有超出力学——地球上的和宇宙的力学的范围。

近代前期自然科学发展的这种历史局限性，使得形而上学自然观盛极一时。尽管它的产生有其重大的历史根据，但终究不能适应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如果说，哥白尼天体运行论举起了自然科学革命的大旗，那么，牛顿却以神的“第一推动力”使这一革命黯然失色，这就明显地暴露了形而上学自然观与自然科学革命本质的尖锐冲突。自然科学的发展，内在地要求并准备了新世界观的诞生，为哲学的进步带来了曙光。

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的欧洲工业革命，是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发生的，是“科学和实践结合的结果”①，而工业革命的胜利，又反过来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和观测、实验、交通等有利条件，把自然科学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自然科学在宏观领域的理论综合，接二连三地突破了形而上学自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67页。

观的局限。在天文学上，康德于1755年发表了《自然通史和天体论》，提出关于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这是近代第一个有科学根据的宇宙自然发生说，它不仅用物理学上的吸引和排斥的作用力彻底否定了牛顿的“第一次推动”，而且在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僵化的自然观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恩格斯指出，康德的这一学说“是从哥白尼以来天文学取得的最大进步”①，而且“包含着一切继续进步的起点”②。因为既然地球有其演变的历史，那么地球上的一切，包括地质、地理、气候、植物和动物等也都必然有其演变的历史。1831年英国的地质学家赖尔发表了《地质学原理》，提出了地球缓慢变化的渐变论，否定了居维叶“突变说”，这就“以地球的缓慢的变化这样一种渐进作用，代替了由于造物主的一时兴发所引起的突然革命”③。在化学领域，英国化学家道尔顿于1803年提出科学的原子论，实现了近代化学发展中的一次重要的理论综合；1824年德国化学家维勒人工合成尿素，第一次跨越了无机界和有机界之间的鸿沟。然而，代表这一时期自然科学最高成就的，则是被恩格斯誉为“三大发现”的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以达尔文名字命名的生物进化论。

细胞学说的发现：早在17世纪初，英国科学家胡克和意大利生物学家马尔比基就曾先后通过显微镜发现过植物细胞；荷兰解剖学家列文虎克甚至已在显微镜下观察到轮虫、滴虫、细菌等动物细胞。虽然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细胞的重要性，但他们观察所得的资料却为后来细胞学说的建立提供了依据。到了19世初，德国耶拿大学植物学教授施莱登于1838年首次建立了一个较为系统的细胞学说。他认为，细胞是一切植物结构的最基本的活的单位，植物发育的过程就是活细胞形成和增殖的过程。继他之后，德国卢万大学的解剖学教授施旺于1839年把细胞学说从植物界扩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6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0、451页。

大到动物界，指出不仅外部类型多种多样的植物是由细胞组成的，而且外部类型比植物更多样的动物有机体，也是由细胞构成的，都是遵循同样的规律形成和成长的。这样，细胞学说便作为一种科学理论确立起来。

细胞学说的科学价值和哲学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恩格斯说："有了这个发现，有机的、有生命的自然产物的研究——比较解剖学、生理学和胚胎学——才获得了巩固的基础。机体产生、成长和构造的秘密被揭开了；从前不可理解的奇迹，现在已经表现为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依据一切多细胞的机体本质上所共同的规律进行的。"① 细胞学说不仅以有机体的显微结构证明了有机界的统一性。填平了动植物之间的形而上学的鸿沟，而且使人们认识到一切多细胞有机体所共同遵循的规律性。这就是说，它所揭示的正是生物界本身不断运动、发展、转化的辩证法。

能量守恒和转化规律的基本思想早在17世纪就由笛卡尔从哲学上提了出来。1644年，他在《哲学原理》一书中写道：物质运动有一个固定量，这个量从来不增加也不减少，虽然在物质的某些部分中有时候有所增减。从18世纪末开始，力学、物理学和化学中的一系列发现，证明了各种运动形式之间的相互转化关系，从而为确立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准备了条件。到了19世纪40年代，这一定律几乎同时被几个人提出。1840年，德国的医生迈尔发现，人体中的静脉血在热带比在欧洲更为红亮。他认为，这是因为在热带静脉血中含有更多的氧；而之所以含氧更多，是由于在热带维持体温所消耗的热减少了，因而使人体中由氧化反应所释放的能量减少。由此他得出一个结论：机械能、热能、化学能是等价的，可以相互转化。这样，迈尔就成为首次发现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科学家。如果说，迈尔的结论由于尚无严格的科学实验证明而未引起人们的重视，那么，英国的焦耳则通过长时间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6页。

的、大量的实验，用各种方法系统地测定出不同运动形式间相互转化的当量关系，从而把这一定律奠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与此同时，丹麦的柯尔丁、英国的格罗夫、德国的赫尔姆霍茨都通过各自的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发现，不仅以科学事实证明了自然界的物质统一性和运动形式的多样性，而且也证明了它们是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自然界中整个运动的统一，现在已经不再是哲学的论断，而是自然科学的事实了。”① 也就是说，这一定律所揭示的，正是自然中各种物质形态本身不断运动、发展和相互转化的辩证法。

“但是还剩下了一个重要空白。如果一切多细胞的机体——植物和动物，包括人在内——都各按细胞分裂规律从一个细胞中成长起来，那末这些机体的无限差异性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呢?解答这个问题的，是第三个大发现，即达尔文首先系统地加以论述并建立起来的进化论。”② 1831 年，22 岁的达尔文登上“贝格尔”号军舰，开始了历时五年的环球航行考察。在这以前，达尔文还是一个神创论者，认为物质是不变的。但在考察中的地质调查，使他成为赖尔关于地质渐变理论的信徒，这与他原来的观念发生尖锐的冲突：变动不居的地球表面岂能允许不变的物种存在？在南美和太平洋各岛屿所得的大量材料，使他进一步明确得出物种可变的思想；(1) 在南美发现的巨大的哺乳动物的化石与现存的较小的动物非常相似，这一事实使他想到古今动物的联系；(2) 南美大陆的一些密切相近的物种在地理分布上呈现出由北而南逐次代替的状况，而南北两端的差异则显现为完全不同的物种。这一事实使他联想到历史上不同物种之间的连续更替和新物种的形成；(3) 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生物大都具有南美生物的性状，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52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526 页。

群岛中各岛屿上的物种彼此又有某些差异。这一事实使他想到物种差异同它所生活的环境之间有内在联系。综合这些事实，达尔文得出一个总的结论：物种是逐渐变化而来的。1836年，他回国后继续进行研究，一方面对采回的标本资料进行分析，寻求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继续进行观察和实践，亲自培育动植物新品种。他发现，人工选择是造成家养品种变化并使之适合人类需要的原因。经过长期努力，达尔文终于形成了系统的生物进化观点，于1859年出版了《物种起源》(全名为《论通过自然选择或生存斗争保存良种的物种起源》)，以丰富的材料论证了物种在生存斗争中，经过自然选择，逐渐产生新的物种，实现生物进化的理论，从而确立了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生物进化论，解开了自然界物种进化之谜。

达尔文的学说标志着生物进化论的完成，它用自然界本身的作用揭示了有机体无限差异性的奥秘，给唯心主义目的论与形而上学的物种不变论以沉重的打击；它把历史观点引进了生物学领域，论证了有机界的历史过程，证明了现有的植物、动物包括人类在内，都是延续亿万年历史发展的产物，从而揭示了整个有机界的辩证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自然科学依据

总之，近代后期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和其他成果，深刻地揭示了自然界的物质统一性及其过程的辩证本质，这就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而且对传统的分门别类的研究方法也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因为它在被人为地划分为相互隔绝的领域之间找到了“亦此亦彼”和“由此及彼”的桥梁，从而大大地开拓了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范围。这些成就还使人们有可能根据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去证明自然界的主要过程，从而使以往时代中人们用臆想的联系去填补尚未认识的真实联系的一切企图失去了意义。恩格斯在谈到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特点及其对哲

学的影响时说：经验自然科学积累了如此庞大数量的确实的知识材料，以致在每一个研究领域中有系统地和依据其内在联系把这些材料加以整理的必要，就简直成为不可避免的，建立各个知识领域相互之间的正确联系，也同样成为不可避免的。因此，自然科学便走进了理论的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就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能有所帮助。恩格斯还指出，“新的自然观的基本点是完备了：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① 这都说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已日益失去其客观依据，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产生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然而，在具体考察自然科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关系时，国内外理论界并不是没有分歧的。

分歧之一是作为“三大发现”之一的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自然科学基础。持否定意见的人提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出版于1859年，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40年代，时间上晚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问世的科学成果，怎么能成为先于它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呢？

当然，如果把达尔文进化论看成只是《物种起源》一书，那么这种意见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是这种看法是把问题简单化了。

首先，从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系统阐发，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来说，的确是在《物种起源》出版之后。但却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达尔文进化论思想到这时才产生。如前所述，早在30年代后期，这一思想就已形成。达尔文本人曾说过：“我把这部著作（指《物种起源》一书——引者）的出版从1839年，即全部学说确立的时候，延搁至1859年，这也使我受到许多益处！” 根据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3－454页。

② 《达尔文自传》中文版，第71页。

的学者的研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他22年工作的结果，早在1837年他就备置了一个笔记簿，其中记下了自己关于有机界的思想。1842年达尔文写成了有机界发展理论的简短纲要，而在1844年又写成相当详细的纲要。①

其次，达尔文进化论并不是达尔文个人的偶然发现，而是有其长远源流的。

耐人寻味的是，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对19世纪自然科学上"三大发现"的提法是："细胞、能量的转化和以达尔文命名的进化论"②，在《自然辩证法》中则把第三个大发现称为"达尔文首先系统地加以论述并建立起来的进化论"③。这些提法表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之一的恩格斯看来，达尔文进化论虽然以达尔文命名，但不是达尔文个人一蹴而就的发现，而是在继承前人进化论思想的基础上，由达尔文加以系统论述和建立起来的科学体系。

事实也正是如此。早在古希腊时代，进化论的思想就已萌生；欧洲文艺复兴以来，进化论思想再度活跃，"它主要出现在哲学家(如培根、笛卡尔、莱布尼兹与康德)的著作中。"④ 到了18世纪末，法国、英国和德国都出现了各种不同形式的生物进化学说。如：法国皇家植物园园长布丰就曾提出物种变化的思想，德国的胚胎学家沃尔夫也认为物种是可变的；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达尔文主张一切生物都是由低等形式渐次进化而来，近代胚胎学的创始人卡尔·贝尔在达尔文《物种起源》问世前25年就曾对有机界存在的进化作过说明。达尔文以前生物进化思想的最高成就是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的进化学说，他首先使用了"生物进化论"一词，以"用进废退"为核心阐述了生物进化的一般特征。尽管他的学

① 参看《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载《苏联哲学资料选辑》第1辑。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6页。

④ 丹皮尔：《科学史》，商务印书馆，第370页。

说还有种种缺陷，但他毕竟是近代科学史上第一位提出科学的生物进化论的生物学家。

当然，达尔文是近代生物进化论的集大成者，他在生物进化学说中的巨大贡献是不容置疑的。他以多年的观察和亲身实践所取得的丰富材料为依据，以“自然选择”为核心建立了生物进化论的科学体系，成为近代生物进化论的完成者。但是，达尔文进化论并没有全部推翻以往的进化论思想，相反地，它正是在前人的成果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正因为生物进化论在达尔文进化论中达到最高成就，所以用达尔文的名字来命名这种进化论是合理的；也正因为达尔文进化论继承了前人的思想成果，所以在考察达尔文进化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时，也不应把在他之前的生物进化论思想完全排除在外。

分歧之二是有些论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并没有对自然科学作过多少研究，因而怀疑以至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自然科学基础。

应当承认，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重点是社会历史理论，他们首先作出系统论述的是唯物史观。相对地说，对自然科学的研究较少，用恩格斯的话说，在70年代之前，他们对自然科学只作了“零星的、时停时续的、片断的研究”①。但是，如果由此而怀疑或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19世纪前期的自然科学为基础，那就不正确了。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中可以看到，从他们开始探索新世界观时起，就注视着自然科学的发展，重视自然科学的社会作用及其与哲学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谈到了18世纪以来地质学的成果的哲学意义，指出大地创世说受到地球构造学(即说明地球形成、生成是一个过程，一个自然产生过程的科学)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页。

的致命打击。自然发生说是对创世说的唯一实际的驳斥。尤为重要的是，马克思还强调指出哲学和自然科学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说，自然科学展开了大规模的活动并且占有了不断增多的材料。但哲学对自然科学始终是疏远的，正像自然科学对哲学也始终是疏远的一样。在过去把哲学和自然科学结合起来，不过是离奇的幻想。存在着结合的意志，但缺乏结合的力量。甚至历史学也只顺便地考虑到自然科学，仅仅把这看作启蒙、有用性和某些伟大发现的因素。然而，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

恩格斯早在1844年初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就强调指出，人类所支配的生产力是无穷无尽的。应用资本、劳动和科学就可以使土地的收获量无限的提高。这种无穷无尽的生产能力一旦被自觉地用来为大众造福，人类所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恩格斯特别强调科学因素在发展生产中的作用。他说，仅仅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这样一个科学成果，在它存在的头五十年中给世界带来的东西就比世界从一开始为发展科学所付的代价还要多。他批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无视这种事实。"科学是与他无关的。尽管科学通过贝尔托莱、戴维、李比希、瓦特、卡特赖特等人送了许多礼物给他，把他本人和他的生产都提高到空前未有的高度"①。恩格斯在论述18世纪英国状况的文章中还论述了自然科学在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等方面的成就，并指出，"各门科学在18世纪已经具有了科学形式，因此他们便一方面和哲学，另一方面和实践结合起来了。科学和哲学结合的结果就是唯物主义（牛顿的学说和洛克的学说同样是唯物主义所依据的前提），启蒙时代和法国的政治革命。科学和实践结合的结果就是英国的社会革命。"②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0?、666－667页。

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一书中，他们不仅考察了17世纪英国唯物主义、18世纪唯物主义同自然科学的关系，并且强调指出，从历史中排除了自然科学和工业，不去认识某一时期的生产方式，就不能真正认识这个时期①；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又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高度，指明了自然科学与生产的相互作用。一方面强调："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材料的"②；另一方面又强调指出自然科学在发展社会生产中的巨大作用。例如，英国工业化的过程表明，理论力学的创立是产生大工业的条件之一。③

还应指出的是，如果把自然科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中的作用，仅仅看成是它的创始人直接研究某种自然科学成果，并从中概括出或者用以论证某个哲学原理，那就未免过于狭隘。事实上，自然科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发挥的作用是复杂的，多方面的，除直接的作用，还有以隐曲的形式发挥的间接作用。

第一，自然科学的新成就，日益深刻地显示出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在提高整个社会的理论思维水平，破除传统形而上学观念中发挥巨大作用。比如恩格斯就曾谈到，在19世纪，尽管多数人并没有直接去研究自然科学，但是，关于"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这一"伟大的基本思想"，已经深入一般人的意识，为人们所接受。④这种情况，显然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打下基础。

第二，自然科学通过转化为直接生产力，推动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日益充分地显示出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根源和辩证的性质，有力地打破社会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

---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1－162、19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9－50页。

③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7页。

④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240页。

和形而上学。在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表现尤为突出。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头一个世纪中，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行，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是过去无论哪个世纪都无法想象和比拟的。①这种情况，显然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

第三，自然科学成果在前人和同时代人的哲学思想中"积淀"，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了解自然科学发展状况和作出哲学概括提供了依据。众所周知，康德不仅是一位哲学家，而且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曾作出过杰出的贡献。黑格尔哲学盛行的时代恰恰是在地质学、胚胎学、植物和动物生理学以及有机化学都已建立起来，并且在这些新学科的基础上到处都产生了预示后来的进化论的天才猜测（如歌德和拉马克）的时候。事实上，在黑格尔哲学（特别是《自然哲学》和《逻辑学》）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自然科学的成果。据统计，仅在《自然哲学》中提到的科学家就有73位之多，其中对伏特、奥斯特、道尔顿、拉瓦锡、林耐、居维叶、拉马克等都作了评价，并对一些自然科学成果作出了哲学分析（尽管并非都是正确的分析）。而马克思早在1837年在施特拉劳养病期间，就曾通读了黑格尔的全部著作。1839年，为准备写作《博士论文》，马克思还曾写了关于黑格尔自然哲学的提纲的三个方案。这些无疑都有助于马克思了解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状况。

第四节　思想理论领域的新思潮及其局限性

近代经验自然科学积累的大量实证知识材料，为崭新的哲学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6页。

思维的形成开辟了道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也打破了多年的沉寂局面，取得了不少新的突破，出现了从不同方面反映现实社会矛盾的新思潮。其中主要有：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的历史理论和德国古典哲学。尽管这些思潮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是，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18世纪后到19世纪初期社会经济、政治、思想矛盾的发展和自然科学上的新成果，提出了许多合理的新思想，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材料和理论来源。

一、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简称“古典经济学”）是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理论。它产生于17世纪中叶，完成于19世纪初的英国和法国，特别是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得到最大的发展。它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中经亚当·斯密的发展，到大卫·李嘉图为止；在法国，从比埃尔·布阿吉尔贝尔开始，中经以弗朗斯瓦·魁奈为代表的重农学派的发展，到西蒙·西斯蒙第为止。其主要代表作是斯密（1723—1790年）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和李嘉图（1772—1823年）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古典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年代，正是资本主义手工业发展的时期到工业革命初期。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在封建社会内部迅速成长，并逐步发展成为统治形式，英法资产阶级先后取得了政权，但封建势力仍在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主要矛盾主要表现为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或其残余势力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尚未充分展开。古典经济学表达了这个历史时期资产阶级的要求和愿望，力图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扫清道路。马克思说：“古典派如亚当　斯密和李嘉图，他们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残污、扩大生产力、使工商业具有新的

规模的资产阶级。”①

古典经济学虽然属于剥削阶级意识形态，但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对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比较客观的、无所顾虑的研究，取得了若干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成果。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来源，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也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它“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②，探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古典经济学家适应着新兴资产阶级扩大资本主义生产的要求，竭力反对封建贵族的特权和封建行会的各种垄断，反对国家干预资产阶级的经济活动，提出“自由放任”的口号，鼓吹经济自由主义。他们认为，经济生活是受永恒的“自然规律”支配的，国家的干预只会破坏这些规律而给社会带来不幸和灾难。用斯密的形象说法，就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对经济生活起指导作用，不需要国家用“有形的手”去调节经济和规定经济活动的目的。古典经济学家在探讨这种内在的自然规律时，还突破了重商主义的局限性，第一次把理论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并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作了初步的分析，从而使政治经济学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古典经济学家关于“自由放任”和“自然规律”的思想，实际上承认了经济生活中存在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对推进人们去正确认识社会历史，是有意义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古典经济学家已经发现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恰恰相反，他们研究的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但却自认为研究的是一般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当作永恒的自然规律，从而也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说成是永恒的、合乎自然的生产方式。不仅如此，他们在解释这一规律的发生时，不是从社会物质生产方式本身的内在矛盾出发，而是从“人的本性”出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8页。

发的。例如斯密就把自然规律的基础归结为利己主义，在他看来，无论是商品交换，还是分工、货币等一切经济现象，都是个人的利己主义活动的结果。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新的科学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关系和需要的表现，而是永恒的理性的表现，新的科学所发现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不是历史地规定的经济活动形式的规律，而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它们是从人的本性中引申出来的”①。

第二，古典经济学在理论上的主要贡献，是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并在地租、利润、利息等特殊形式上考察了剩余价值。而劳动价值论不仅具有经济学的意义，而且也包含哲学意义，是以经济学形式对劳动作为主体的创造能力的肯定。配第是最先提出劳动价值论的古典经济学家，他接受了霍布士于1651年在《利维坦》一书中提出的关于“劳动是财富的源泉”的观点，但与霍布士不同，他已认识到劳动创造财富要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他说：“土地是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因素。”②并通过对生产和交换的考察，得出了商品价值（他称之为“自然价格”）是由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的结论。不过，在他那里，价值和使用价值、价值和交换价值、价值和价格都还没有区分清楚，因而在理论上是混杂的。斯密是劳动价值论的奠基者。他明确提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比配第前进了一大步。但斯密同时又提出另一种错误的说法，即商品价值是由这种商品所购买的或支配的活劳动量决定的，并进而又引申出价值是由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构成的错误结论。李嘉图批评了斯密的错误，坚持和发展了商品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正确观点，并把这一规定当作资产阶级制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90—191页。

② 威廉　配第：《赋税论　献给英明人士　货币略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71页。

度内在联系的基础，分析了反映资产阶级制度表面运动的一系列范畴如工资、利润、地租同这个基础之间的关系，说明这个制度的表面运动和它的实际运动之间的矛盾。马克思认为，李嘉图在科学上的巨大历史意义也就在这里。当然，由于阶级立场的局限，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同样也存在缺陷。比如他只注意了对价值量的分析，而对价值实体和价值形式缺乏了解。至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以及同量资本得到同样利润怎样与价值规律相符的问题，他更是无力作出科学的说明。

第三，研究了对于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有重大意义的劳动、分工等经济范畴。马克思曾指出，劳动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但是在经济学上对劳动作出科学抽象，把握劳动一般，却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其中古典经济学家在研究这一范畴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此之前的经济学家，如货币主义者还把财富看成是完全客观的东西，看成存在于货币中的物。重工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虽然比这个观点有了进步，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转移到主体活动，即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但他们仍然只是局限于把这种活动本身理解为取得货币的活动。到了18世纪下半叶，法国古典经济学的重农学派才把劳动的一定形式，即农业看作创造财富的活动，不再把对象本身裹在货币的外衣之中，而是看作产品一般，看作劳动的一般成果了。不过，这种产品还与活动的局限性相适应，仅仅被看作自然规定的产品，即农业产品（主要是土地的产品）。斯密比起重农学派又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具体规定，抽象出一般的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是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的“序言”中写道：“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这也就是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

马克思指出：“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的发

展的地方"①。对劳动作出科学的抽象也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充分发展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因为要做到对任何种类劳动都同样看待，必须具备下列条件，第一，要"以一个十分发达的实在劳动种类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种类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第二，"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在这种情况下，"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是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在一种特殊性上同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②。因此，古典经济学在研究劳动范畴上取得的成果，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他们所处时代的历史关系的产物。

古典经济学家对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分工，包括工场内部分工和社会内部分工进行了考察。这项工作，从配第那里就已开始，而斯密则是对分工作了最周详考察的古典经济学家。

斯密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的主导形式是工场手工业，而工场手工业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它的内部分工。因此，为了论证资本主义生产的优越性，他就特别强调分工的作用，并由此开始论述自己的经济理论。

在他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强调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是分工的结果。他说，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他认为，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所产生的高度的生产力，就是同劳动分工推动着技术改造和采用机器生产直接联系的；分工的程度同时就是劳动生产力增进程度的标志，也是社会进步程度的标志。

斯密还认为，分工和交换是人们相互联系的纽带，人们在劳动中通过分工、交换，便构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这是因为，分工一经完全确定，一个人自己劳动的生产物，便只能满足自己欲望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7页。

的极小部分，他的大部分欲望，须用自己消费不了的剩余劳动生产物，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别人劳动剩余生产部分来满足，于是一切人都成为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地说，也成为商品社会。在这里，斯密显然混淆了两种不同的情况，即把人类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即商品社会）中的分工和交换，看成人类社会一般存在的分工和协作的关系。但他通过分工、交换的考察，从经济联系上去理解人们的关系，不能不说是一个合理的、进步的思想。

古典经济学家对分工的考察同劳动价值理论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在配第看来，社会上各种各样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的总和就是分工，而分工必然引起交换，所以交换无非是劳动与劳动的交换，从而得出商品交换价值取决于劳动的思想。由于斯密对分工作了更详尽的考察，因而更明确地把价值取决于劳动的规定与社会分工联系在一起。

斯密所讲的分工，主要是指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此外，他也讲到了农业和工业的分工，甚至还触及到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问题。比如他曾指出：随着社会的进步，哲学或推想也像其他各种职业那样，成为某一特定阶级人们的主要业务和专门工作。他还根据分工，将人类社会区分为野蛮时期的狩猎社会和畜牧社会，从野蛮时期过渡到文明时期的农业社会，以及最后的工业社会。

斯密还分析了分工的根源问题，虽然他的看法是错误的。他认为，分工是一种“人类倾向”逐渐发展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那么这种倾向又是如何发生的呢？斯密把它归结为人类的“利己心”。人类从利己心出发，为了能够发挥各自的才能，生产出较多的劳动产品，因而总是委身于一定特定的业务，而不亲自生产自己生活上的必需品和便利品。但也正因为如此，“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来满足自己生活上的需要，这就引起彼此有利的交换。不是从生产出发说明分工和交换，而用“利己心”来解释分工和交换，这就陷入

历史唯心主义。

第四，马克思说："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① 这里所说的经济学家，首先就是古典经济学家。

古典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社会构成和对立状况的考察，是随着阶级关系的变化而逐步深入的。

重农学派的魁奈，从"纯产品"出发，把社会划分为三个阶级，即生产阶级，包括农场主（农业资本家）和农业工人；土地所有者阶级；不生产阶级。这是对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最早划分，但由于他不是以生产资料占直状况作标准，结果是掩盖了资本家和工人的阶级矛盾。

与重农学派不同，斯密明确地把社会分为地主、工人和资本家三个阶级。他认为，地租、工资和利润是文明社会的三种基本收入（其他如利息、租金等等都是从这三种收入中派生出来的），与此相应而形成"以地租为生、以工资为生和以利润为生的"三大社会集团，"构成文明社会的三个主要的基本阶级"②。这表明，斯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已有了较明晰的认识，特别是他第一次把资本家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提了出来，这是对阶级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他还初步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和相互关系，指出"两个上层阶级压迫下层阶级"③，即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压迫雇佣工人。他认为，资本是"对他人的劳动的支配权"①，资本家就凭借这种支配权压迫工人，以利润的形式取得工人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因此劳资"两方面的利害关系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页。

②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40、60页。

③ 斯密：《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137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93页。

绝不一致，劳动者盼望多得，雇主盼望少给。”[1] 他还认为，土地所有者也压迫工人，他们不参加生产和流通，又不冒任何风险，“不用劳动，不用劳心”，单靠土地所有权索取工人劳动所生产的一部分剩余价值，过着安乐、懒散的生活。

斯密的这些论述虽然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同阶级之间的利害关系，但还只是对阶级矛盾的初步分析。而且在他看来，各阶级的经济利害关系是自然形成的；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社会一般利益的增加，各阶级利益必然得到增进，因此从根本上说，它们是一致的，而不是互相对立的。斯密之所以得出这种看法，不仅因为他是产业资本的代言人，而且也由于当时阶级矛盾尚未发展到尖锐对立的程度。

作为工业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图对于由斯密提出的社会三个阶级和三种基本收入，有了更明确的认识。斯密还不能把雇佣工人和小商品生产者严格区分开，而往往把这两种人统称为“劳动者”。李嘉图则已不再使用“劳动者”这个模糊的概念，而把雇佣工人看作一个特殊的阶级。更重要的是，他还通过分析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马克思说：“李嘉图揭示并说明了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正如内在联系所表明的那样——这样一来，在政治经济学中，历史斗争和历史发展进程的根源被抓住了，并且揭示出来了。”[2]

法国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西斯蒙第，进一步从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并对资本主义制度作了严厉的批判。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以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存在为前提，而这两者的存在及其发展又意味着社会阶级的两极分化。他是第一个明确提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社会阶级两

---

① 斯密：《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13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 第183页。

极分化和无产阶级形成的经济学家。他指出，工业化的结果是“中产阶级完全消灭了。社会中，除了大资本家和其雇佣外，没有其他阶级存在的余地。我们看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阶级－－完全没有财产的阶级－－迅速成长”①。社会上一个根本的改变，就是在人类的行列中，出现了无产阶级。

古典经济学家从经济的角度对资本主义阶级关系所作的分析，虽然着眼点是分配，因而未能揭示阶级划分的实质，但他们从经济而不是法权来分析阶级，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二、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

正当古典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制度当作永恒的“自然形式”来论证的时候，19世纪初期的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却已对它进行尖锐的批判了。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圣西门（1760－1825)、傅立叶（1772－1837）和英国的欧文（1771－1858)。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反映了尚未成熟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对资本主义制度丑恶现象的不满和反抗情绪，反映了他们要求摆脱资本主义剥削和向往美好未来的愿望。从哲学上说，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是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理性原则的继续和发展，因而在历史观上还是唯心主义的。但他们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在对社会历史的研究中提出许多有价值的见解，给予马克思恩格斯以重大启迪，因而他们的学说不仅为科学社会主义所继承，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空想社会主义试图论证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制度不是自然的、永恒的，而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它必将为未来的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代替。圣西门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五种社会

①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论丛》第2卷，巴黎1838年版，第124页

形式：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神学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未来的“实业制度”，即社会主义社会。他认为，这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其中每一个新的社会制度都是以往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因而是有规律可循的。他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指出在法国的社会中，国王、贵族、官僚等养尊处优、对社会无益的人居于统治地位，而生产社会财富、创造了科学和推动技术进步的人则属于被统治阶级，到处都是无才能的人统治有才能的人，没有道德的人支配善良的人，因而是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而在未来的理想制度——“实业制度”下，将由“实业家”和学者掌握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权力，一切人都必须劳动，不允许有任何特权。傅立叶在社会历史观方面，“和他的同时代人黑格尔一样巧妙地掌握了辩证法”。他把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过程分为依次更替的蒙昧制度、宗法制度、野蛮制度和文明制度四个阶段，未来的历史发展将上升为新的“协调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说，他和圣西门一样，把现存的社会制度看作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必将被更高的社会制度所代替。

第二，空想社会主义者触及到了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试图用社会的经济状况来说明政治制度。圣西门认为，生产是任何社会联合的目的，“所有制是社会大厦的基础”。因此，政府的形式不是本质，所有制（财产关系）才是问题的本质。他指出，15世纪以前的欧洲，农业是主要的生产部门，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资料，贵族占有土地，在经济上居于支配地位，因而也就掌握了政权。后来，随着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逐渐在经济上取得了支配地位，于是他们就要求从贵族手中夺取政权。他还指出，“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历史进步的合乎规律的趋势应是日益广泛地组织物质生产和改善社会关系，它将导致人类更加广泛的协作。随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1页。

着历史的发展，政治将完全溶化在经济中①，政治上对人的统治将变为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另一位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则把生产的发展看作是从一种社会制度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制度的基本原因。比如，宗法制度向野蛮制度过渡，是同小生产过渡到中等生产相适应的；而当大生产出现时，社会就由野蛮制度过渡到文明制度。

第三，空想社会主义者还看到了阶级斗争对社会生活的重大影响，肯定阶级斗争在历史上的作用。圣西门认为，15世纪以来，西欧的历史是厂主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史，而这一斗争是两个利益对立的阶级之间的斗争，法国大革命不过是这种长期斗争史中的一个"插曲"。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不是以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但他们同情和关心无产阶级的命运。和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不同，他们认为法国的革命不仅是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之间的斗争，而且也是"无财产者"同封建贵族、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

第四，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对未来社会的预测中，提出了不少关于人的合理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从法国唯物主义的学说中不难看出，"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② 空想社会主义者正是从法国唯物主义学说中找到理论出发点，来预测未来社会和人的发展的。但两者又有所不同，法国唯物主义者提出按照人的本性去建设人的生活环境的要求，是为了反对封建制度，而空想社会主义者则用它来反对资本主义制度。

---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0－41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6页。

圣西门的著作表明，每个人的全部才能的自由发展，是他的基本愿望和要求。因此，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工作；任何形式的人对人的剥削都应由人对自然的开发所代替；政治上对人的统治应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

傅立叶认为，劳动不仅是财富的源泉，而且也是人的真正的生活需要和自我锻炼。但劳动的这一特性，在文明阶段（即资本主义社会）是不能自由发展的。因为在这个阶段上劳动沾染了一种令人厌恶的性质。因此，未来的社会制度必须保证按照人的愿望自由地选择劳动。

欧文接受了法国唯物主义的主张，认为人的性格是先天组织和自己一生、特别是发育时期的环境这两个方面相结合的产物。他和傅立叶一样，在资本主义工业中看到了劳动分工畸形发展的结果——工人失去对劳动的兴趣以及其他后果。他认为，为了发展生产力和所有人的共同福利，就必须使用被企业所有者所占有的利润；而生产资料只有作为共同的财产，才能造福于所有的人。因此，他主张未来的社会应建立在财产公有的基础上，人人参加劳动，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各取所需。

三、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的社会历史理论

继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之后，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在探索历史哲学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所谓“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是指波旁王朝复辟时期（1815－1830）的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梯叶里（1795－1856）、基佐（1797－1874）、米涅（1796－1884）等。他们的历史理论，在许多方面继承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思想，同时又具有自己的特色和新的发展。

已往的历史哲学，包括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的观点在内，总是把历史的发展，归结为个别杰出人物自觉活动的结果，而群众、人民，对它来说几乎是不存在的。而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一个

重要贡献，就是他们开始突破这种英雄史观，明确提出在历史研究中应当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他们尖锐地批判已往的历史学家“总是顽强地不承认人民群众有首创精神和思想”①，而把一个新国家的建立，以至一种社会新风习的形成，都看作是某个“英雄”或者“王公”的创造物，人民群众则“不过是某个人的思想的掩饰物”②。这是不正确的。梯叶里写道：“你们愿意确实知道是谁创立了某一制度，是谁发起了某一社会事业吗？为了这，你们要弄清楚实际上是谁需要这个制度和这个事业，——就是他们最初想到这个制度和这个事业，就是他们萌发了按照这个方向去行动的意志，就是他们是实现这个制度和这个事业的主要参加者。Is fecit，cui prodest［意为“谁需要这个，谁就干这个”——引者注］——这个公理既适用于历史，也适用于司法。”③也就是说，正是按照自己的利益行事的群众，才是历史的主要创造者和参加者。

梯叶里等人之所以提出上述思想，并不是偶然的。首先，18世纪启蒙学者所主张的英雄史观，虽然是不科学的，但它有一个优点，那就是这种观点有利于使受当时的政府和王公贵族压迫的群众接受知识界革命英雄人物的思想影响；但到了19世纪初期，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的思想家们满以为它本身应该而且能够成为历史前进运动的主要力量了。第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历史上最彻底的反封建的革命，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广泛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当时的革命刊物上已出现了诸如“伟人们之所以看起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跪着。站起来吧！”这样的著名警句。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这次大革命，但这场在复辟时代的人们中记忆犹新的社会大变动和人民群众所显示的巨大作用，显然给他们以深刻的影响。

---

①②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哲学选集》第2卷，第520页。

③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哲学选集》第2卷，第520－521页。

④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

当然，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所说的“人民群众”，主要是指资产阶级，而对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他们是蔑视的和敌视的。正如普列汉诺夫所指出的，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热烈地赞助过资产阶级对世俗贵族及宗教贵族进行斗争，同样也赞助过资产阶级打破新兴无产阶级要求的企图。” 这是他们的阶级局限性的表现。但是他们毕竟突破了英雄创造历史的传统观念，提出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问题，这是一个有重要价值的历史贡献。

如果说，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对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那么法国的这些历史学家的另一个贡献就在于，他们结合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对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作了考察，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阶级斗争和经济利益之间的联系。

在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看来，17 世纪英国革命和 18 世纪法国革命的历史，都是第三等级反对贵族斗争的历史。贵族和第三等级是欧洲社会中最主要的因素，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着欧洲政治的发展。财产关系是阶级关系的基础，阶级斗争的原因在于各阶级之间经济利益的对立和冲突。梯叶里认为，在 17 世纪英国革命时期，长老派和天主教派之间的斗争，也只不过是各阶级利益矛盾的反映。用他的话说，就是“双方面都是为了这种真正的利益而进行战争。其余的一切都不过是掩饰或者借口。”[2] 米涅对法国大革命过程中各政党之间的斗争作了生动的分析，并把这种斗争概括为“变化破坏利益；利益产生政党；政党进行斗争。”[3]

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对阶级斗争的看法，显然已远远超过 18 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但是，作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他们热烈赞扬第三等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却否认第三等级（包括除

---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 2 卷，第 353 页。

②③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 2 卷，第 737、524 页。

贵族与僧侣以外的一切等级）内部有阶级矛盾；只承认过去的阶级斗争是进步的，但否认资产阶级统治下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把后一种阶级斗争说成是“疯狂的举动”。1830年以后，他们公开为资产阶级的统治辩护，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基佐成了屠杀工人的刽子手。

复辟时代历史学家的第三个贡献是，他们不满意于法国唯物主义者关于政治机构决定社会生活的理论，,试图证明财产关系是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统治思想的现实基础。

基佐在其所著的《法兰西论丛》中说，大部分作家、学者、历史学家和政论家，都力图用社会的政治制度来说明社会的某一状况，说明社会的文明程度和性质。其实，为了理解社会的政治制度，首先就应该研究社会本身。因为“制度在成为原因之前首先是结果；在社会因受制度影响而发生变化以前，社会就创造了制度。”①在他看来，社会状况是由财产关系、公民生活所决定的。而在西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一切民族那里，财产关系、公民生活是和土地关系密切联系着的。因此，“要了解政治制度，就必须研究这个社会中的各个阶层及其相互关系。要了解这些不同的社会阶层，就应该理解土地关系的性质。”②法国历史学家们还研究了社会关系和思想潮流之间的因果关系，他们断言，思想、学说以及宪法本身，都服从于环境，“只有当它们能够成为工具和人民利益的保证的时候，人民才会接受它们。”③

法国历史学家们的这些思想，比起主张“意见支配世界”的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来说，无疑是个重大的进步，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恩格斯曾指出，国家的政治行为是历史上决定性的东西这种观念，曾经支配着以往的整个历史观，它“第一次为法国

---

①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哲学选集》第2卷，第740、525页。

② 转引自《普列流诺夫哲学选集》第2卷，第740、525页。

③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528页。

复辟时代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所动摇”①。

法国历史学家们虽然没有达到唯物史观，但由于他们看到了社会政治制度根源于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又是由财产关系所决定的，这就走出了环境与人的意见相互决定的“二律背反”。但由于他们不了解生产关系是社会财产关系的基础，财产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因而在谈到财产关系的产生及其变化时，仍然没有解决这一矛盾而不得不求助于“征服”论，即认为财产关系是由“征服”引起的。例如梯叶里认为，封建阶级是由于德意志人征服了高卢——罗马的土著后裔而形成的封建贵族，被征服者则形成第三等级。这实际上回到用政治暴力来解释财产关系的产生。不仅如此，当进一步说明征服现象又是如何产生的问题时，他们又转而用“人的天性”来摆脱困境。如米涅就认为，征服现象的发生，是由于在人的天性中有一种“征服欲”、“统治欲”；基佐在其《欧洲文明史》一书中，甚至认为世界的构造和运动取决于人的情感、思想以及道德上精神上的倾向，这就重新回到用纯观念解释历史的唯心主义立场上去了。

四、德国古典哲学

马克思曾经指出，德国的革命是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的。活跃于18世纪末期和19世纪初期的德国古典哲学，就是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先导。它还使当时在经济上落后于英、法的德国，以哲学上成就而达到欧洲先进国家的水平。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约翰·特利勃·费希特（1762－1814）、弗里德里希·威廉·谢林（1775－1854）、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费尔巴哈也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但是，由于他的主要活动年代、哲学性质和历史作用都与上述代表人物有显著的区别，因此我们把他放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99页。

下一节中加以考察。

德国古典哲学是在它所处年代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独特条件下产生的，但是就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来说，并不限于德国。当时西欧正经历着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重大变革，特别是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强有力地推动了资本主义取代腐朽的封建制度的进程。德国也面临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但是由于德国的经济落后和政治上的不统一，新生的资产阶级极为软弱。它虽然向往资本主义制度，有革命性的一面；但又缺乏勇气和力量用革命手段去推翻封建政治，倾向于自上而下的改良，具有妥协性。作为德国资产阶级利益和愿望的理论表现，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它的辩证法思想，反映了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所引起的急剧的社会变化，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的革命要求；而它的唯心主义和抽象思辨的形式，又表现了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对此，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德国只是用抽象的思维活动伴随了现代各国的发展，而没有积极参加这种发展的实际斗争”①。这种情况在黑格尔哲学中表现得尤为典型。

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把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作为最重要的哲学问题来研究。从康德到黑格尔，都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不同的回答，并使这一问题的解决日益深化。

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首先提出并着重探讨了这一问题。他的观点具有二元论的特点。他承认有某种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独立的“自在之物”存在，但又认为“自在之物”本身在原则上是无法认识的，因而陷入不可知论。从这种观点出发，他建立了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学说。他把人的认识分为三个阶段：在感性阶段上，人借助于先天的感性直观的纯形式，即时间和空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2页。

把由“自在之物”作用于感官而产生的感觉的混乱状态整理出秩序，使之成为时空中的现象；到了知性阶段，人使用先天的知性的纯概念或范畴，对感觉表象作进一步加工整理，使之带有条理性和规律性，形成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真正知识；当人们不满足于知性所获得的知识而进入理性阶段，试图超越现象世界而去认识“自在之物”，如灵魂、世界、上帝之类的东西时，就必然陷入自相矛盾而遭失败。在他看来，带普遍性、必然性的规律并不是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而是人的主观意识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说，知性不是从自然界抽引出规律，而是为自然界制定规律，用他的话说，就是人是自然界的立法者。因此，康德认为应当抛弃传统的那种“认识必须与对象一致”的假定，而代之以“对象必须和认识一致”的假定。显然这是先验唯心主义的观点，但在历史上，康德不仅深入地探讨了主体能动性，而且具体地考察了主体认识能动性的结构，认为主体从感觉开始到获得知识的整个认识活动，从来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过程，恰恰相反，知识的层次越高，主体的能动性就越加明显，这对反对认识论上的形而上学和机械论，具有重大意义。他割裂现象和本质，否认“自在之物”的可知性是错误的，但在驳斥宗教神学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也具有积极的作用。

费希特继承和发展了康德的主观唯心主义，批判了康德的“自在之物”。他反对康德把思维和存在割裂开来，主张思维创造存在，在唯心主义基础上建立二者的统一。首先，他把“自我”作为自己哲学的出发点，认为“自我”的存在是不证自明的、唯一的实在，它不依赖于任何东西，而是自我产生、自我肯定的；其次，“自我建立非我”。“非我”是与“自我”相对立的周围世界的一切事物，它以“自我”的存在为前提，是“自我”的创造物。最后，是“自我建立本身和非我”，即把“自我”和“非我”、主体和客体统一起来，从而达到无条件的、不受任何东西决定的绝对主体，即“绝对自我”。这样，费希特就把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理

解为由主体产生与本身相对立的客体，最后又在“绝对自我”中实现主、客体的统一。费希特的这种思维和存在的同一论，虽然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但其中也包含着合理的因素，特别是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他强调“行动”，认为“自我”不仅是认识着的主体，而且更重要的是行动着的主体。他认为，主体的能动作用不仅表现于“理论认识”，而且表现为“自我”克服“非我”的“实践活动”，“自我”就是“理论认识”和“实践活动”的统一。当然，由于他的唯心主义立场，他所说的主观能动作用和“实践活动”，只是自我意识的活动，而不是感性的、现实的物质活动，因而他只是抽象地发展了主体的能动方面。

谢林用“同一哲学”否定了康德的二元论，也反对费希特“自我„产生“非我”的学说。他认为，“自我„不能离开“非我”而存在，因而不能说“自我”产生“非我”；同样，“非我”也不能离开“自我”而独立存在，因而也不能说“非我”产生“自我”。在他看来，要真正解决“自我”与“非我”的关系问题，就必须有一个超乎二者之上的更高的原则，它既不能是主体，也不能是客体，更不能同时是这二者，而只能是绝对的同一性。在这种同一性里，“自我”和“非我”、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都融合为一，没有任何差别，只有这种原始的、无差别的同一性，才是真正的绝对。谢林提出这种“同一哲学”，是企图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实际上他所说的“绝对同一性，”只不过是一个精神实体，即自我意识；他否定费希特的“自我”，实际上是用一个更高的精神实体作为世界的本原。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的最大代表，他创立了一个庞大而又有严密逻辑结构的辩证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他清除了康德的二元论和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克服了谢林“同一哲学”的非理性主义，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他认为，“绝对精神”或“绝对理念”是宇宙的永恒的本原，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从精神派生出来的。“绝对理念”在

自我发展中外化为自然界，又通过进一步的发展而克服了外化，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回到自身，最后在精神发展的最高阶段——绝对精神中认识了自身。尽管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论是彻底唯心主义的，但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合理思想。在黑格尔看来，绝对理念是按辩证规律运动、变化和发展的，黑格尔的辩证法也就是绝对理念运动、发展和转化的一般规律；而绝对理念的发展是通过逻辑体系展开的，是从一个概念到另一个概念的逻辑推演过程，从这方面来说，它也是逻辑学；绝对理念的发展过程，同时又是它的自我认识的过程，因而又是认识论。这样，黑格尔就在唯心主义基础上提出了辩证法（本体论）、逻辑学和认识论三者同一的思想。黑格尔对康德的二元论和不可知论的驳斥也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康德的“自在之物”是“不真实的、空洞的抽象”。因为它摆脱了一切规定性，所以就等于“无”。他反对康德把现象同“自在之物”绝对地割裂开来，认为现象和本质之间有着辩证的联系，而且是可以互相转化的。现象是本质的显现，本质表现在现象中，认识了现象也就可以进而认识本质。因此所谓“自在之物”是可以认识的。

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成果，是全面而深刻地探究了辩证的发展观，从世界观的高度用辩证法代替了形而上学，虽然这种辩证法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

如前所述，康德早在《自然通史与天体论》中，就以其关于天体起源的“星云假说”动摇了自然界在时间上没有任何历史的观点，在主张宇宙永恒不变的形而上学观念上打开一个缺口，从而为辩证的自然观开辟了道路。康德还着重探讨了认识论中的辩证法问题。他所提出的高于普通形式逻辑的“先验逻辑”和十二对范畴，也含有辩证法的因素。特别是他提出的“二律背反”的学说，揭示了人的思想认识在一定范围内发生矛盾的必然性，对刺激以后辩证思维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辩证法在费希特和谢林的哲学思想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费希特把矛盾对立看作是发展的必然环节。“自我”只有设置自己的对立面“非我”，才能存在和发展，并通过矛盾斗争而达到新的、更高的统一。他已明确地把“正、反、合”看作发展的基本原则。谢林比较明确地提出了对立统一的思想，认为对象本身含有内在的矛盾，正是矛盾着的对立面构成对象自身的同一。例如，他认为“自我”不是像费希特所说的那样去设置“非我”，而是它本身就含有自己的对立物“非我”，对立双方互相依存，没有一方就没有另一方。谢林还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事物发展的动力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认为这是一切运动的“最后根据”。他还认为，自由和必然并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辩证地同一的，即“自由应该是必然，必然应该是自由”。不过，谢林哲学就其总体来说是以无差别的“绝对的同一”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他的辩证法思想也只限于在整个形而上学体系所允许的范围内活动。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辩证法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前人的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并加以系统化。在哲学史上，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阐明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并力求给以普遍的应用。恩格斯认为，黑格尔的巨大功绩就在于：他第一个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的过程，并试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黑格尔关于整个世界辩证发展的学说，彻底打破了形而上学世界观的统治，其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就在于它永远结束了以为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黑格尔深入地探讨和论证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他是哲学史上最先把质量互变作为一条普遍规律提出来的哲学家。他认为，质是某物之所以为某物的规定性，质的规定性一旦丧失，某物就不成为某物。量是事物的外在规定性，它的变化一般不影响事物的比质。但这是有一定限度的，量变达到一定的限度就会引起质变。量变引起质的关节点就是“度”。他还指出，量变是“渐进的过程”，而质变则是“渐进过程的中断”，是“飞跃”。他说：“一

切生和死，都不是连续的前进，倒是渐进的中断，是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① 黑格尔着重阐述了对立统一即矛盾学说。他批评了康德把矛盾只限于理性本身的观点，指出矛盾是客观的、普遍的，它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认为天地间绝没有任何事物不包含矛盾。他强调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内在源泉，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正因为事物之中包含着矛盾，它才会运动，才具有趋向和活动，才成为活生生的统一体。黑格尔还第一个明确提出关于否定之否定的概念和理论。他用“否定之否定”来描述绝对精神规定自身、超出自身、又复归到自身的辩证发展过程，并以此作为构造其整个哲学体系的方法。在黑格尔看来，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自我实现，是一系列概念的活动和展开，而任何概念都是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肯定就是概念自身，是概念的抽象状态；否定是和概念自身性质相反的规定，概念由肯定转化为否定，即由抽象转化为具体。概念的本性是抽象和具体的统一，因此，否定必须再次被否定，重新回到肯定，使否定和肯定，即具体和抽象结合起来，这就是否定之否定。否定之否定是对原来概念的扬弃，使它具有更丰富的内容，获得新的发展。每一次否定之否定，既是对原来概念的说明和返回，又是新的发展的起点，即下一个否定之否定过程的开端。这样，黑格尔就在抽象的、思辨的表述中，猜测到了事物之间联系和运动规律。

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另一个重要的历史贡献，是在历史观上提出了不少深刻的、有价值的思想。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形式是唯心的，内容是现实的”②。他从发展的观点去看待历史，把社会历史看作一个发展的、有内在联系的过程，从而提出了“世界历史”的思想。他反对把社会历史看作只不过是无数偶然现象的堆砌，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服从于一定规律的，并

---

① 黑格尔：《逻辑学》下卷，商务印书馆 1976 年版，第 6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32 页。

力图去揭示这种规律；他不满意用人的思想、意见去说明历史的观点，认为历史人物的表面动机和真实动机都不是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在这些动机背后，还有应当而且必须加以探究的动力。但是，黑格尔只是提出了认识历史规律的任务，而未完成这个任务，他没有找到历史发展的真正原因，而是把历史发展的动因归结为绝对观念。然而，他提出从思想动机背后寻找动力，从偶然中探究必然的思想，无疑是深刻的、合理的。不仅如此，黑格尔还以人类意识发展史的形式，深刻地揭示了人的个体发展和人类社会发展两个方面的历史辩证法。虽然黑格尔把历史过程归结为意识的异化和异化的扬弃的过程，从而把历史中人的异化的不同形态，归结为意识异化的不同形态，但在这种颠倒的形式中，包含着对劳动本质的深刻认识，即把现实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①恩格斯曾指出："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② 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平行着，现实的内容到处都渗透到他的哲学中。"在《现象学》、《美学》、《哲学史》中，到处都贯穿着这种宏伟的历史观，到处是历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的（虽然是抽象地歪曲了的）联系中来处理材料的。""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③。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上的革命变革，也是人类认识史上优秀成果的综合和发展。19世纪初期先进思潮中的合理思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而它们所提出而未解决的问题，又给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新世界观以启迪，它们的失足之处也给马克思、恩格斯以鉴戒。马克思主义哲学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相反，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1页。

它的科学力量正在于它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提出的种种问题。

第五节　黑格尔学派的解体和青年黑格尔运动的兴起

如果说，康德作为初次登上历史舞台的德国资产阶级的代表，还把资产阶级的愿望当作软弱的“绝对命令”，看作不能实现的“应当”的话，那么，黑格尔作为发展了的德国资产阶级的代表，就已经不再满足于这个软弱的“应当”，而试图把资产阶级的要求解释成绝对精神发展的必然结果了。在黑格尔那里，“精神是否定物”，是自己变成他物，或变成它自己的对象和扬弃这个他物的运动，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在这个绝对的运动面前，没有任何东西是神圣的。对它来说，现在或过去存在的一切东西都只不过是它的一个特殊环节、一个特殊的方面，而作为一个环节、一个方面，它们就必然要过渡到它们的反面，就必然要扬弃自己、重建自己。因此，“应当”就不再仅仅是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的道德律条，而是现实运动的必然结局了。③

但是，正如黑格尔自己所说的那样，任何一个哲学家都不可能跳出他的时代④，黑格尔也不能例外。德国资产阶级的瞻前顾后、软弱、妥协、不敢与现实决裂的怯懦，仍然像无法摆脱的影子一样，亦步亦趋地紧紧跟随在他的后面。所以，和那种把一切都看作是暂时的、变化的、发展的观点相反，在黑格尔体系的末尾，国家理念在普鲁士伪善君主等级制中得到了实现，宗教在它的一种特殊形式——基督教中获得了绝对的意义，而哲学则在黑格尔自己的体系中达到了对自身完全的、真正的认识。于是，一

---

① 黑格尔：《逻辑学》上卷，第4－5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② 黑格尔：《逻辑学》下卷，第203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③ 参看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第23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④ 参看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2页，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切发展都终止了，一切矛盾都调和了。哲学和宗教结成了亲家，精神和现实跳起了小步舞。一切现存的都是合理的，等级制度是合理的，警察国家是合理的，书报检查也是合理的。对现存制度的这种辩护，是怎样地使弗里德里希三世和他的亲信大臣们激动啊，以致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黑格尔哲学被当成了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

然而，历史并没有因为黑格尔的判决而停住自己的脚步，它从来就不具有那种要照顾某个哲学家的永恒结论的好脾气，恰恰相反，它的发展总是让那些自认为已经穷尽一切的哲学家们倍感尴尬，因为它不厌其烦地向世人证明：一切绝对的真理都是相对的，一切神圣的东西都是世俗的，一切永恒的东西都是暂时的。

1830年的欧洲革命，撕破了复辟时期笼罩在欧洲上空沉重的铅云，给令人窒息的德意志吹入了一阵自由、清新的风。随着工业革命的逐步实现，特别是1834年关税同盟的成立，促进了德国经济的普遍高涨和德国资产阶级力量的增强。与此同时，作为资产阶级对立物的无产阶级也在成长壮大，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于是那些感觉到了自己力量的人们，已经不愿意忍受压制了，他们对这个丑恶的现实和为现实所作的一切辩护都厌恶透顶，希望在德国能有一个普遍的变革。对于这样一些人和这样一个目的来说，黑格尔哲学显然是不适用的。需要一个新的哲学，一个反对现存制度和论证自由的哲学，一个能为他们的行动做辩护和做指导的哲学。但是，任何一个新的理论运动，都必须拥有前人的思想作为它的材料，而当时在德国最渊博、最深刻、影响最大的哲学便是黑格尔哲学——这个拥有庞大体系的哲学。由于它的内在矛盾，给各种不同的实践党派都留下了可资利用的活动场所。因此，黑格尔哲学的解体和黑格尔学派的分裂就成为无法避免的了。于是，就像雅典娜全副武装地从宙斯头中跳出来一样，一个穿着黑格尔铠甲、拿着黑格尔辩证法长矛的新哲学运动，也从黑格尔哲学的

头脑中喧嚣鼓噪着来到这个世界。这场新哲学运动就是青年黑格尔运动。

青年黑格尔运动，实质上是正在兴起的德国资产阶级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尽管其参加者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哲学上，都存在着分歧，但他们之间又有其共同之处：他们都从黑格尔哲学出发，都对德国的现状不满，并把矛头指向基督教和专制制度，都试图通过改造黑格尔哲学以得出新的结论。由于内部分歧的增大和专制政府的高压政策，青年黑格尔运动存在的时间并不长(1835- 1845)；而且由于用语晦涩，它在哲学圈子之外的影响也甚为有限。但它确实是为1848年的革命做了某种理论准备，而且也正是在这场运动中，马克思、恩格斯开始了他们最初的哲学、政治活动。

一、黑格尔学派的解体

1818年秋，黑格尔受普鲁士政府之邀，到柏林大学任教。在那里，以黑格尔为中心，在他的学生和崇拜者们之间，逐渐形成了一个黑格尔学派。1826年，他们成立了“科学批判协会”，1827年1月，又创办了《科学批判年鉴》杂志。由于顺应了那个时代的需要，也由于黑格尔哲学本身的博大、精深、包罗万象，再加上普鲁士政府的大力支持，黑格尔学派影响迅速扩大，到了30年代，它的影响达到了顶峰。

1831年，当黑格尔由于感染霍乱在柏林猝然去世时，他的许多学生们都真诚地相信，黑格尔哲学是已经穷尽了世上一切的真理，后人只需要遵奉和解释它就行了。他的两个学生马尔海奈凯和弗斯特甚至把他比作耶稣，认为在抛弃了尘世的锁链后，人们反而能用比过去更纯粹的方式去掌握他的永恒精神。他的一个很有才华的弟子——爱德华 甘斯也在一份讣告中写道：“哲学现在已经达到圆满的境界，人们认为它的发展只是根据它的题材按以

往已经这样明确表示过的方式进行有创见的工作而已。”①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把黑格尔当作救世主，把黑格尔哲学的每一个结论都看作绝对真理的。他们在用黑格尔哲学分析现实时，不可避免的要产生这样那样的疑问。因此，没过多久，黑格尔学派内部就发生了争论。由于政治在当时是一个荆棘丛生的领域，所以，一开始，争论是围绕着宗教神学问题——关于上帝、灵魂不死和基督的人格等学说进行的。

黑格尔在宗教哲学中，没有直接对上帝本身和个人的灵魂不死做什么论证。从他的一些含糊的论述中，人们既可以得出否定灵魂不死的结论（1830年的费尔巴哈就是这样做的），也可以得出承认灵魂不死的结论。因此，黑格尔受到了正统的神学家们的猛烈攻击，他们称黑格尔为“不信上帝的人”。为了替老师辩护，黑格尔的一些门徒便力图把灵魂不死的观点说成是黑格尔哲学必然的逻辑结果。但这种牵强的解释，既不能使正统派神学家满意，也不能使黑格尔学派中愿意独立思考的人们满意。争论继续进行，逐渐把问题集中到宗教和哲学的关系上。

在黑格尔看来，哲学和宗教是同一的，它们的区别仅仅在于对绝对的认识方式不同。哲学以概念的形式去认识，宗教以表象的形式去认识。黑格尔写道：“哲学的内容，它的需要和兴趣，同宗教是完全相同的，宗教的对象是永恒真理、神和神的启示。当哲学揭示宗教时，只不过是揭示自身，而当它揭示自身时，它也就在揭示宗教。……无论是宗教还是哲学，都不过是为神服务的特殊方法。二者的不同就在于为神服务的这种特殊性。”② 黑格尔把宗教教义看作哲学概念的象征。比如，三位一体就是理念按照三段式原则辩证地运动的象征：圣父（上帝）是绝对精神的象征，圣子（基督）是在自身中结合着精神和自然界的具体观念的象征，

① 转引自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页。

② 《黑格尔全集》第12卷，第291页。

圣灵则是理念通过宗教向哲学的转化而表现出来的象征。这样，在黑格尔那里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一方面，他用哲学论证宗教，恢复了宗教和哲学、信仰和知识的同一；另一方面，他又把宗教教义归结为简单的哲学信条，从而取消了宗教的特殊地位，他说："一般讲来，天启宗教的精神本身以及在它里面互相区别着的诸环节，都归属于表象并且有对象性的形式，表象的内容虽是绝对精神，不过还须进一步扬弃这种单纯形式。"①

显然，从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出发，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条承认宗教和哲学的同一性，承认宗教的神圣意义，用哲学为宗教作论证，它的终点便是神学；另一条否认宗教和哲学的同一性，把哲学看成高于宗教，否认宗教的神圣意义，它的终点是无神论。

围绕着哲学和宗教的关系的争论越来越激烈。1835年，大卫•施特劳斯在图宾根出版了他的《耶稣传》，他声称：哲学和宗教并不具有同一性，基督教也并没有什么神圣的意义。《耶稣传》的出版导致了黑格尔学派的公开分裂，并按其思想倾向形成左、中、右三派。

右派（又称老年黑格尔派）是正统派，他们大多是黑格尔的嫡传弟子，大学教授。他们极力维护老师的学说，试图证明黑格尔哲学与基督教神学完全一致，他们中的有些人，如辛利克斯，甚至用神学观点修正黑格尔，把宗教看作比哲学更适合认识上帝的手段。在哲学上，这些人大都很重视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把黑格尔哲学看作穷尽一切的绝对真理。在政治上，他们维护现存制度，反对任何变革。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加布勒、格舍尔、道布、马尔海奈凯、亨宁、辛利克斯等人。

左派（又称青年黑格尔派）主要是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反对黑格尔调和哲学和宗教的做法，认为只有哲学才能认识真理，他们中间的很多人最终都走向了无神论。在哲学上，他们特别强

①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第258页。

调黑格尔的辩证法，反对他的体系，并试图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改造黑格尔哲学。在政治上，他们反对粉饰现实，反对与现实和解或妥协，因为在他们看来，现存秩序远不是合理的。它和黑格尔所主张的那种理性与实在的统一还相距甚远，因此他们主张彻底地批判和变革这个不合理的现实。这派的代表人物有：大卫•施特劳斯、奥古斯特•冯•契希考夫斯基、布鲁诺•鲍威尔、埃德加•鲍威尔、阿尔诺德•卢格、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莫泽斯•赫斯、麦克斯•施蒂纳以及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等人。

徘徊在左派和右派之间的，还有一个人数众多的中派，这派人对宗教持比较温和的态度。尽管他们也把哲学和宗教的内容看作同一的，但同时，又强调它们之间有着重大的区别。在哲学上，他们一方面把黑格尔哲学当作已经达到了的绝对真理，但另一方面也不否认它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在政治上，他们虽然也把现实看作是理性的实现，但又认为这种实现还远没完成，还需要继续向前发展。这派的代表人物有：卡尔 米希勒、卡尔 罗森克兰茨、爱德华•甘斯等人。

二、青年黑格尔运动

继“青年德意志”的文学——政治民主自由主义运动之后，青年黑格尔运动从哲学出发，对当时的宗教和国家进行了批判。批判是以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方法——辩证法为依据的，受到特别推崇和强调的是发展和否定。

19世纪30年代的德国，封建专制势力还相当强大。政府的高压政策和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使得任何政治上的反对意见都很难问世，而对宗教的批判，相对地说要容易得多。因此，青年黑格尔运动的兴起，首先是从批判宗教开始的。当时，基督教作为普鲁士等级君主制的精神支柱，对人们的思想起了极大的禁锢作用，它就像一条装饰着鲜花的锁链紧紧地束缚着人们，使他们漠

视现实的苦难而把希望寄托于来世的天国。因此，要想使人们正视现实，改变他们的现实的苦难，就必须有一个广泛的思想解放运动，就必须对束缚人们思想的宗教进行批判。而对宗教的批判，间接地也就是对普鲁士国家的批判，它早晚要走向批判国家的政治道路上去。

施特劳斯的《耶稣传》拉开了宗教批判的序幕。在《耶稣传》中，施特劳斯反对黑格尔调和哲学和宗教的做法，认为《福音书》的记载大多是不可靠的，它们只不过是原始基督教团体在无意识中形成的一些神话和传说。耶稣不是什么神人，而只是一个到处飘泊的犹太传教士。

对《福音书》的这种解释，在当时富有宗教情趣的德国激起了很大反响。虔信的基督教神学家们激烈地攻击施特劳斯，把他看作企图摧毁基督教的神圣基础的魔鬼。正统的老年黑格尔派分子也指责他，说他歪曲了黑格尔的宗教哲学。但同时，他也受到了那些对宗教的禁锢不满的人们的热烈欢呼。

围绕着对《耶稣传》的争论，青年黑格尔派逐渐团结起来，一场哲学——政治批判运动迅速兴起。

奥古斯特·冯·契希考夫斯基可看作政治批判的先驱。1838年，他的《历史哲学引论》一书出版，他认为，黑格尔只思索过去，从过去引出世界历史的规律，因此，他的哲学只能解释历史，而不能塑造未来。他主张把黑格尔的理论哲学改造成行动哲学，并号召人们从理论转向实践。

阿尔诺德·卢格在哈雷创办了《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给青年黑格尔派提供了一个发表意见的论坛。在《哈雷年鉴》的初期，青年黑格尔派的大多数人还忠实于黑格尔的国家学说，把普鲁士看作是理性国家，他们还相信自己的理想能够在普鲁士国家的范围内得到实现。严酷的现实告诉他们，任何理性的要求，都是和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本质不相容的。因此，随后的《哈雷年鉴》便逐渐采取了更激进的立场。1839年10月，卢格在《新教和

浪漫主义》一文中，开始批驳普鲁士政府，他把普鲁士政府的反动倾向归之于浪漫主义的影响。不过这时的他，还希望理性的普鲁士能够自己清除掉和其本质相对立的东西。但在 11 月发表的《卡尔•施特列克福和普鲁士主义》中，他已经把普鲁士政府斥为“天主教”的了。他说：“普鲁士现时就他的深远的趋向来说，甚至就它的国家生存本身来说，都是天主教的……这就是普鲁士的弱点和对自由德意志的危险。”①“天主教的”一词在青年黑格尔派那里意味着国家生活缺乏公开性，人民不能参与国事，也就是说，缺乏民主、自由，缺乏理性的原则。因此，卢格要求普鲁士政府改变国家的方针，实行“新教人”，亦即自由发展的理性原则；同时，他还呼吁其他青年黑格尔派成员投入到政治批判中去，以促使普鲁士国家的改变。卢格的这种呼吁得到了柏林“博士俱乐部”的响应，这个俱乐部当时在布鲁诺•鲍威尔的领导下，正表现出日益激进的趋向。

更为可贵的是，费尔巴哈开始了他的彻底批判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工作。他在《哈雷年鉴》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指出，黑格尔的根本错误就在于颠倒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要真正地克服黑格尔哲学的错误，就必须抛掉黑格尔哲学的基础，回到自然去。

1840 年春，随着老国王弗里德里希三世的去世和新国王弗里德里希四世的登基，对普鲁士的幻想又重新回到青年黑格尔派身上。尽管在上台伊始，弗里德里希四世也采取了某些伪善的开明措施，但没过多久，他就和自由派发生了冲突，进而对一切形式的自由主义进行镇压。由于新任文教大臣艾希雷恩不像他的前任阿尔坦施因那样喜欢黑格尔主义，所以青年黑格尔派就受到了更严重的迫害。1841 年 6 月，卢格的《哈雷年鉴》被迫停刊，他只好迁至德雷斯顿出版《德意志年鉴》。现实使青年黑格尔派逐渐意识到：必须推翻德意志的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民主共和国。在这

---

① 转引自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 1 卷，三联书店 1963 年版，第 164 页。

之后，《莱茵报》在马克思的主持下也变得越来越激进，青年黑格尔派也开始公开地主张摧毁教会，制定宪法和出版自由了。

这期间，对宗教和哲学的批判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复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1841－1842) 中，鲍威尔对福音书重新做了考察。他认为，福音书中的故事是其作者们为了某种特定的宗教目的虚构出来的。鲍威尔对福音书的解释，比施特劳斯更彻底地否定了基督教的神圣意义。在《对黑格尔、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的末日宣告》(1841) 中，鲍威尔开始公开主张无神论，宣称拥护资产阶级革命。就在鲍威尔完成他的自我意识哲学的同时，费尔巴哈出版了他的影响深远的《基督教的本质》(1841)，在这本书里，他把宗教、思辨哲学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并在人和自然的基础上建立了他的人本主义理论，从而突破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罗网。

从 1842 年起，普鲁士政府对青年黑格尔派采取了更为严厉的镇压措施，青年黑格尔派中的许多人被解除了教职，他们的机关刊物《德意志年鉴》和《莱茵报》相继遭到粗暴的查封。而青年黑格尔派内部也正在酝酿着两种不同的观点，外部的打击使得原本潜蕴于内部的分歧逐渐表面化，这种分歧的进一步发展，最终导致了青年黑格尔运动的分裂。一派聚集在《德法年鉴》周围，主张唯物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另一派聚集在《文学总汇报》周围，主张唯心主义和自由主义。前者以费尔巴哈、马克思、卢格、赫斯、恩格斯为代表，这一派此后又发生进一步分裂，马克思、恩格斯、赫斯从革命民主主义又走向了共产主义。到了 1845 年，马克思、恩格斯又从一般的唯物主义走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空想社会主义走到了科学社会主义。后者以鲍威尔兄弟和施蒂纳等为代表，这一派的最终结果，是在 1844 年形成了施蒂纳的绝对唯我主义的“唯一者”哲学。

到了 1845 年，作为一个派别的青年黑格尔派就不存在了，作为一场运动的青年黑格尔运动也就终结了。运动中的人要么销声

匿迹，不再有影响力，要么就完全跳出了黑格尔哲学的圈子，已经不能再把他们归结到黑格尔名下了。

三、大卫·施特劳斯（1808－1874）对宗教的批判

大卫·施特劳斯从黑格尔哲学出发，对早期基督教史进行了批判的考察。但考察的结果却使他做出了不仅是对宗教而且也是对黑格尔哲学自身的批判。

在黑格尔那里，概念和观念是有区别的。“概念乃是内蕴于事物本身之中的东西，事物之所以是事物，即由于其中包含概念。”① 就是说，概念是一种客观的、与人无关的理念，而观念则是主观的，是人所具有的意见。他说：“因为我的观念只不过是，我这个人所具有的不错观念罢了。”②对于概念来说，无所谓正误问题，因为它本身就是事物的真理。至于观念，它只有在它和对象、和事物的概念相符时，才具有真理的意义，而且，只有通过对一系列真实的中间环节的不断扬弃，它才能逐渐由低级阶段发展到概念的认识形式。不过，黑格尔并没有把观念的这种不断发展的思想贯彻到底。比如在谈到宗教时，尽管他也指出了宗教和哲学的区别，说宗教只能用表象的方式认识绝对，就是说，宗教只是一种处于较低阶段的观念，但同时他又认为宗教也能完全把握绝对，就是和哲学一样也具有绝对的意义。黑格尔的这种折衷主义引起了施特劳斯的强烈不满，施特劳斯说：“如果概念和观念二者实际上不是彼此相异的，如果我们在‘扬弃’观念时又始终拘守于这种观念，从而如果在作为抽象思想的哲学中，实际上不克服宗教这一作为纯粹想象的、信仰的意识，那末对概念与观念进行区别又有何必要呢？”③

---

①②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39页、第397页。

③ （东德）马·克莱恩、埃·朗格、弗·奇希特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6页。

施特劳斯决定克服黑格尔的不彻底性，把概念和观念的区别贯彻到底。因此，在研究早期基督教史时，他首先想要弄清的就是这样一些问题："圣经，即福音书所由构成的史实与概念处于何种关系"，"福音书的史实不仅个别地说来，而是连同观念实现的世界历史系列一起来看，究竟是不是真实的，或者说，在每一个史实中观念的集中表现，对想象的意识来说究竟是不是仅作为一种缩影。"①

为此，施特劳斯详细地考察了《新约》中的马可、马太、路加、约翰四部福音书，考察的结果便是1835年出版的《耶稣传》。在《耶稣传》中，施特劳斯断言：福音书中所记载的故事，既不像正统的神学家们所说的那样，是圣灵口授的神史；也不像黑格尔所认为的那样，是哲学概念的象征，而是在原始的基督教社团内部无意识地形成的神话和传说。他认为，这些神话的产生源于人们对救世主的普遍期待，在产生福音故事的那个时代，由于世界上存在着普遍的苦难，由于人们对这种普遍的苦难无可奈何，所以很多人都只得把希望寄托在一个能把他们从困厄中解救出来的救世主身上。于是，人们就无意识地把期待中的东西都转嫁到了耶稣身上。在口耳相传之中，每一个人都加进了一点他认为是耶稣身上的东西。这些传说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多，最后形成了福音书中那些耶稣的神奇的故事。

由于耶稣只是一个现实的历史人物，那么，显然就不能像黑格尔那样，把他作为联系着精神和自然界的具体观念的象征，作为绝对精神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作为"神——人"。由于基督所拥有的一切奇迹、神力都不过是无意识地附会的结果，那么，显然，基督教也就不再是什么绝对的宗教，它只不过是精神发展中的一个阶段罢了。

---

① （东德）马·克莱恩、埃·朗格、弗·奇希特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5-86页。

施特劳斯把世界历史的基础赋予自我运动的“实体”。他认为，实体绝不可能在某一特殊的个人、某一特殊的宗教那里完全地实现，它只能通过整个人类的一切高级精神活动的总和才能实现。因此，施特劳斯仅仅把黑格尔哲学看作是实体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定的阶段。

施特劳斯的重要贡献在于，他断然否定了宗教具有和哲学相同的内容，从而给黑格尔的自得其乐的体系撕开了一个裂口。施特劳斯否认基督教的神圣意义，否认黑格尔哲学是最终真理，从而破除了对黑格尔哲学的迷信，给人们思想的解放带来了很大的促进。最后，由于试图从历史联系中研究《圣经》，施特劳斯也就第一次做了把黑格尔的辩证法运用于历史现实的尝试，尽管这个尝试并不怎么成功。

施特劳斯的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由于把福音神话仅仅归结为无意识的传说，而忽视了福音书作者的个人创造，所以，当他把神话发生说用之于最后两部福音，即路加和约翰福音时，就显得有点牵强。此后的鲍威尔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提出他对施特劳斯的责难的。另一方面，虽然施特劳斯否认了基督教，但他并不一般地否定宗教，他用一种泛神论的观点把上帝解释为“实体”，这种“上帝——实体”存在于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之中。

在《耶稣传》之后，施特劳斯还写了《基督教教义的历史发展和与现代科学的斗争》(1840年-1841年）等书，在这些著作中，他进一步发挥并完善了自己的思想，但由于其它青年黑格尔派成员的崛起，他的这些书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影响。

四、契希考夫斯基（1814-1894）的《历史哲学引论》

如果说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开了青年黑格尔派宗教批判的先河，那么，契希考夫斯基的《历史哲学引论》则唱出了青年黑格尔派历史——政治批判的第一句清音。施特劳斯批判了黑格尔宗教观上的泛逻辑主义，契希考斯基则批判了黑格尔历史观上的

泛逻辑主义。施特劳斯通过对宗教的历史的考察，抛弃了黑格尔对宗教的臆想和对宗教的调和主义，契希考夫斯基则通过对现实的历史的分析，斥责了黑格尔对未来的忽略和对历史的温情主义。尽管无论是施特劳斯还是契希考夫斯基，都是从黑格尔哲学本身出发的，但他们却在黑格尔那里发现了一个深刻的内部矛盾，即一切都是变化发展的辩证法和一切都达到了它的终点的体系的矛盾。利用那个不承认任何终极存在的辩证法，施特劳斯动摇了“神圣宗教”的基础，同样是利用这个辩证法，契希考夫斯基则破坏了“完美现实”的根基。

黑格尔哲学认为，“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会出现。”① 因此，哲学的任务只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它只能解释历史，而不能昭示未来，任何企图把未来纳入自己视野的哲学，都只能是空洞的幻想。应该说，黑格尔的这个思想有其正确的一面。哲学，作为历史的总结，当然无法跳出它的时代，当然应该对他所处的时代做出解释；但是，黑格尔却忽视了哲学的另一个功能，那就是，预示未来，指引行动。因为，哲学不仅仅是对历史的解释，它还是人们行动的指南。黑格尔逃避未来，因而，他把对人类很重要的那扇大门给堵死了。契希考夫斯基不满黑格尔哲学的这种消极态度，认为黑格尔之所以把哲学局限于解释历史，是因为他把思维着的理性而不是把指导行动的意志，看作人类活动的真谛。如果把世界历史仅仅看作观念、精神的发展，那么，一旦世界理性认识了自身，历史就终结了。但是，在契希考夫斯基看来，“思维无宁是意志的不可分离的因素，因为重新成为存在的思维首先是意志和行为。”② 因此，人类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对历史规则的认识，而必须把这种

---

①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第 13 页。

② 转引自马利宁、申卡鲁克著《黑格尔左派批判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52 页。

认识付诸于行动，并在行动中进一步认清自己的本质。

黑格尔把认识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感性、知性和理性；按照他的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观点，相应地，世界历史也有三个时期：东方、古希腊罗马和日耳曼基督教。契希考夫斯基则把认识分为感觉、知识和行动，因此，相应地，他也把历史划成三个时期：古代、从耶稣到黑格尔的时代、未来。古代是感觉的时代，从耶稣到黑格尔时代是从信仰过渡到知识的时代，而未来则是行动的时代。在未来时代，人们活动的结果将不再是无意识的“事实”，而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行为”。在那时，由于个人的行动都是自觉的，他将不再和社会对立，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才能。在那时，社会将达到完美、和谐的形式。

和历史的三个时期相应，契希考夫斯基认为，指导未来的方式也有三种：第一通过感情，这是先知的方式；第二通过知识，这是哲学家的方式；第三通过实践，这是未来真正的人的方式。契希考夫斯基断言，未来的哲学必然是实践的，“实践的哲学，或者更确切地说，实践底哲学，它对生活和社会关系的最具体的影响，真理在具体活动中发展——一般说来，这就是哲学的未来的本分。”① 契希考夫斯基是青年黑格尔派中第一个赋予“实践”范畴以重要意义的哲学家，他把实践作为他的“行动哲学”的首要原则，并试图用这种实践哲学改造黑格尔，因为在黑格尔那里，人只不过是世界精神的不自觉的工具，而实践哲学，则使人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契希考夫斯基不满于黑格尔的思维的哲学，而诉诸于意志、行动、实践。但他不是把实践理解为现实的人的物质活动，理解为对世界的改造，理解为革命的实践，而是把实践看作是理论的批判，看作是单个人的自由行动，看作是实践的意志。因此，他只

---

① 契希考夫斯基：《历史哲学引论》，转引自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第154页（注释部分）。

能把未来当作理性原则的实现，而不是当作现实的历史发展的结果，他仍然没有摆脱唯心主义。另外，尽管他诉诸未来，诉诸行动，但对于如何建立未来，由什么样的现实力量来实现未来，却找不出合理的答案，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道德和精神方面日益完善的个人。要说明这种“自我完善的个人”的软弱无力，我们只需要看一看契希考夫斯基后来的行动就可以了：他竟然求助于“革命的”天主教和波兰的“救世主降临说”。但不管怎样，要求从思维走向行动，从理论走向实践，毕竟是一个进步，它表明了青年黑格尔派转向政治批判的现实的要求。

契希考夫斯基的行动哲学对后来的鲍威尔、赫斯，间接地也对马克思、恩格斯有着很大的影响。

五、布鲁诺·鲍威尔（1809－1882）的自我意识哲学

施特劳斯把实体当作世界历史的根源，契希考夫斯基把意志看作历史的根本动力，而鲍威尔则把自我意识推崇为哲学的最高原则。

1835年，鲍威尔还是一个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那时，他和他的老师马尔海奈凯一起，刚刚做完黑格尔《宗教哲学讲演录》一书的整理、出版工作。所以，施特劳斯的《耶稣传》一出版，就受到了他的激烈反对。他指责施特劳斯歪曲了黑格尔关于耶稣和基督教的观点，他还力图从理论上证明福音书的史实性，以反驳施特劳斯的福音神话说。但是，和施特劳斯的争论，不能不促使他对福音书做出更深入的研究，而这种研究却使他对从前的观点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怀疑，最后终于使他站到论敌一边，并成为最激进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之一。

1838年，在《启示史批判》中，鲍威尔开始把《新约》看作是比《旧约》更高的启示阶段。他认为，《新约》的这种进步标明了《旧约》的局限，并进而证明，任何一种自封为绝对真理的启示，都不能避免自身的矛盾，因为妄称为绝对真理的启示本身只

不过是绝对真理的一个有限的环节罢了。1839年，鲍威尔发表了《致亨格斯坦堡博士阁下》一文，批判亨格斯坦堡的正统神学观点，从而正式宣告了和右派的决裂。此后，在相继出版的《约翰福音史批判》(1840年)、《对黑格尔、无神论者和反基督者的末日宣告》(1841年)、《复类福音[①]作者的福音史批判》(1841－1842年)等著作中，鲍威尔对福音书、宗教、黑格尔哲学做出了新的解释，并提出了他的“自我意识哲学”。

鲍威尔认为，福音书是其作者的有意识的虚构，是这些作者的自我意识的产物。第一个福音书作者马可为了他的特定的宗教目的，有意识地编造了关于基督的神奇故事，写出了《马可福音》。后来，路加和马太又根据他们自己的意见，修改和补充了《马可福音》，这就是《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最后，约翰又以希腊的“逻各斯”观念对这些福音书做了进一步的加工，形成了他的《约翰福音》。鲍威尔反对施特劳斯把福音书解释为基督教团内部无意识形成的神话，因为这种理论无法解释各福音书之间存在的不同特征。尤其无法解释第四福音——《约翰福音》，这部福音表现了与前三部福音更为不同的宗教倾向。另外，他认为，把福音故事当作在无意识的传说中形成的和当作圣灵启示下记载的，并没有很大的区别，因为二者都是先验的，都以同样的方式损害了自我意识的自由和无限性。鲍威尔也反对施特劳斯赋予福音书以“实体”基础，就是说，反对说福音书具有现实的历史内容，反对把耶稣看作一个历史人物。按照鲍威尔的分析，福音书是它的作者的纯粹的文学虚构，而耶稣，也只是一个纯粹虚构的文学形象。

鲍威尔对福音书的批判比施特劳斯又前进了一步。施特劳斯

---

① 《复类福音书》的前三部，即《马可福音》、《马太福音》与《路加福音》。其内容、结构、观点大体一致，故称复类福音书，又译作《对观福音书》、《同观福音书》。

虽然也否定了基督教的绝对意义,但他还给它留下了属神的内容,他还没有否定上帝的存在。鲍威尔则否认基督教有任何属神的内容,否认有任何神灵存在。当然,仅就福音书的形成这个问题本身来看,无论是施特劳斯还是鲍威尔,都有一定的片面性,严格说来,福音书既是传说的结果,同时也是其作者创造的产物。另外,施特劳斯和鲍威尔都没有考察基督教形成的社会、政治、历史、经济根源,尤其是经济根源。由于不了解基督教产生的现实的物质原因,所以,他们的解释尽管在某些地方显得相当精辟,但往往不可避免地流于臆想。

鲍威尔指责施特劳斯承认无意识的实体的力量,指责他把历史归结为一种神秘的、超自然的本质,鲍威尔还认为,施特劳斯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会忽略人的有意识的创造活动,忽略人的自我意识。而依鲍威尔的观点,只有自我意识,才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历史就是自我意识的发展过程。鲍威尔说:"实体只是体现'自我'的局限性和有限性的转瞬即逝的火焰。运动不是由实体完成的,而是由自我意识完成的,自我意识才是真正无限的,它把实体的普遍性当作自己的本质,包摄于自身。"①

施特劳斯和鲍威尔都只抓住了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方面。在黑格尔那里,无论是实体还是自我意识,都是绝对精神发展的一个环节。绝对精神既是主体又是实体,主体离开了实体,就是不真实的,而当它赋予自己的规定性以具体存在时,"就扬弃了抽象的、也就是说仅只一般地存在着的直接性,而这样一来它就成了真正的实体,成了存在"。② 实体也不能离开主体,实体只有通过自身的否定运动,只有在转化为主体时,才具有真理性。黑格尔说:"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③实体是精神的否定之否定运

---

① 转引自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第296页。

②③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册,第21、10页。

动的一个环节，精神自我异化为实体，实体又否定自身转化为精神。在黑格尔那里，人的自我意识和绝对精神的自我意识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人的自我意识，只是意识发展的一个阶段，它首先是对直接的自我的意识，然后过渡到思维的自我意识，最后达到理性。黑格尔是把人的自我意识当作为精神发展的一个较低阶段来描述的，他认为自我意识在哲学上的代表就是斯多葛主义、伊壁鸠鲁主义和怀疑主义。绝对精神的自我意识就不同了。可以说，绝对精神的发展过程，就是达到它的绝对的自我意识的过程：作为自在自为的精神，绝对精神把自己自由地外在化为自然，然后又在这种异在中认识了自身，达到了对自己的绝对的自我意识，从而又重新回复到自身。

施特劳斯把实体的自身运动当作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因此，他否定历史发展有一个终点的思想，打破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自我运动的圆圈，但同时，他也忽略了作为主体的人的能动作用。鲍威尔把具有绝对意义的绝对精神的自我意识改造为具有绝对意义的人的自我意识，把自我意识从逻辑的天空拉近到尘世的人，把最高的神性赋予了人的自我意识，但他也分裂了自我意识和世界的关系，把世界只看作需要由自我意识克服的实体、质料。因此，鲍威尔和施特劳斯各有其片面性。就他们不承认任何终极真理来说，他们都可说是真正的发扬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从而超越了黑格尔；但就对哲学的整体性把握来说，他们又可说是从黑格尔哲学的一种倒退。

鲍威尔认为，自我意识是自因，它的本质就是自我发展，这种自我发展使得它不可能有任何终极的形式。一旦自我意识在一种形式、一种实体中得到实现，那么，这种形式、这种实体就会成为发展的阻碍，从而必须被一种更高的形式所取代。在自我发展中，自我意识创造了世界，在这个创造活动中，它也认识了它自身。鲍威尔说：“自我意识在创立世界、创立差别时，也在它所创造的东西里面创造自己本身，因为它重新扬弃了它的创造物同

它自身的差别，并且只是在创造活动中和运动中才是自己本身。”① 自我意识实现自己的手段是批判，批判是自我意识对其外部世界的克服，是对有限世界的超越。批判通过扬弃对象达到自我意识。鲍威尔写道：“迄今为止，历史并未产生任何不被批判的烈火所燃烧的真理。但是他现在通过批判所产生的最高的真理，即人、自由、自我意识，则是最可能阻碍批判和历史前进的真理，因为这个真理不是别的，就是那最后的无限制的发展。”②

像契希考夫斯基一样，鲍威尔也把世界区分为现存的和应有的。他认为，只有应有的东西才是真实的和合理的。因此，他号召人们采取行动，推翻那些同哲学的自我意识相矛盾的现存关系。他说：“因此，哲学也必然会在政治方面发生作用。如果现存关系同它的自我意识相抵触，哲学就会直接攻击现存关系。使它发生动摇。”③ 和契希考夫斯基不同的地方是，契希考夫斯基仅仅限于空泛地要求人们行动，而没有告诉人们应该如何行动，鲍威尔则明确地指出了行动的方法，那就是“批判”。对现存的一切事物进行哲学批判，以期动摇它们，改造它们。当然，由于缺乏现实的物质力量，鲍威尔的这种“行动”也还是贫弱无力的。

鲍威尔把宗教看作是人的自我意识的异化的产物。在自我意识发展的早期阶段，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本质——自我意识，因此，这时的人们把自然、家庭和民族精神当作神来崇拜。到了基督教时期，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了自己的本质，但这种本质还是在一种异化的形式中实现的。鲍威尔说：“自我意识在福音书中同自己发生关系，尽管是同异化了的自己，也就是同自己的极其

① 鲍威尔：《基督教真相》。转引自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09 110 面

② 鲍威尔：《犹太人问题》。转引自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62 页。

③ 黄楠森、庄福龄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资料选编》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下同），第 133 页。

滑稽的模拟品发生关系，但毕竟是在同它自己发生关系。”在这个时期，“自我”把自己的普遍力量、把自己的本质当作一种异己的力量同自己相对立，并把这种对立的本质当作自己的统治者，当作上帝。因此，基督教是最深刻、最严重的异化，是异化的最完全的形式，它剥夺了人的一切，把所有属于人的自我意识的东西都归之于一种彼岸的本质，因而它压制人的自由，把自由变成一种普遍的精神奴役，这种发展到极端的异化，不可能继续保持自己，因而必然要过渡到它的对立面，过渡到异化的克服。实现这个过渡的中介仍然是那个被鲍威尔在世界历史中广泛使用的手段——“批判”。通过对宗教的批判，自我意识扬弃了它的异化，从而真正地达到了它自身，达到了自由。按照异化——异化的扬弃这个模式，鲍威尔把人类历史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异化、缺乏自由的时期；一个是异化的克服和人的完全回复的时期。鲍威尔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看作是两个历史时期的转折点。

鲍威尔把人的自我意识提高到了原则的地位，表达了上升时期的德国资产阶级对受压制的状况的不满和对自由的向往。但由于他把自我意识和世界抽象地割裂开来，因而使他的“自我意识”显得苍白无力，“自我意识”只能靠一小部分与“群众”对立的“批判家”的“批判”来实现自己，它不拥有任何现实的基础和任何现实的力量。鲍威尔把自我意识当作历史的动力，就是说，把一种抽象的精神性的东西当作世界的本原，因而他不可能跳出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怪圈，也不可能真正地理解历史和现实，无限丰富的历史在他那里最终只剩下了干巴巴的宗教和对宗教的克服。

六、费尔巴哈（1804－1872）的人本主义理论

费尔巴哈从来都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黑格尔主义者，即使

---

①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资料选编》上册，第13。页。

在推崇黑格尔的早期，他也没有把黑格尔哲学当作不可更改的最终真理来接受。早在1830年，在用黑格尔的方法研究个人的灵魂死不死的问题时，费尔巴哈就得出了黑格尔决然不会说出的结论：个人的灵魂是要死的。为此，他被解除了爱尔兰根大学的讲师职务；此后，尽管他仍然用理性来研究宗教，但已经公开宣称基督教是一种“反宇宙的宗教，一种与自然界、人、生活以及整个世界脱离的宗教”①了。1936年，继施特劳斯之后，费尔巴哈也断然否定了基督教有和哲学同一的对象，他指出，“在哲学看来，世界是必然的产物；而在神学看来，世界是偶然的产物。”② 二者对立的根本原因，就“植基于神学和哲学的本质上的不同观点之中。”③ 1838 1839年间在《哈雷年鉴》上发表的《实证哲学批判》(1839)、《论哲学和基督教》(1839)、《黑格尔哲学批判》(1839)等文中，费尔巴哈进一步论证了宗教和哲学的根本对立，开始着手全面地批判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在《黑格尔哲学批判》一文中，费尔巴哈指出，类不可能在一个个体身上得到绝对的实现，因此，作为一个特殊的、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宗教的基督教也就不可能具有永恒的意义。同样，“黑格尔哲学是在一个时代里产生的，在这个时代里，人类正和在任何其它时代里一样，是处在一定的思维阶段上，……在这个时代里，是有一种一定的哲学存在的；黑格尔的哲学与这种哲学相联系，甚至与这种哲学相结合；因此它本身就应当具有一定的、因而是有限的性质。”④费尔巴哈认为，黑格尔的这个自满自足的体系的根本错误就在于颠倒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它从抽象的脱离人的理性出发，而不是从人的直接的感性出发，因此他才可以大言不惭地宣称穷尽了一切真理。在《黑格尔哲学批判》这篇文章中，费尔巴哈还提出了后来成为他的哲

---

① 《费尔巴哈哲学史著作选》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7页。

②③ 《费尔巴哈哲学史著作选》第2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09、110页。

④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0页。

学基础的自然、人、人的本质等概念，他说，“哲学上最高的东西是人的本质。……哲学是关于真理的、整个的现实界的科学；而现实的总和就是自然（普遍意义上的自然）。”①但这里的自然还被理解为客观的理性，类还被当作“以宇宙为他的求知欲的对象”的“普遍的实体”②，世界历史毕竟还只是一种理性的运动。

1841年，费尔巴哈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与施特劳斯和鲍威尔不同，费尔巴哈主要把一般宗教作为他的批判对象，他说：“鲍威尔将福音书的历史，就是说……将《圣经》神学作为其批判的对象。施特劳斯将基督教的信仰论和耶稣的生活，就是说……将教条神学作为其批判的对象。而我，却将一般基督教，就是说将基督教的宗教作为批判的对象。”③费尔巴哈对宗教的起源和本质做出了杰出的分析，并简略地论述了他的人本主义原理。但在这本书中，费尔巴哈还没有全面地论述他的唯物主义哲学原理，只是到了此后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1842）和《未来哲学原理》（1843）等书中，这个原理才得到了比较全面的阐发。

费尔巴哈认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不是别的，只是一种从有限之中抽取出来并与有限相脱离的有限精神。但是，这种抽去一切规定的抽象，这种先于世界的虚无却被黑格尔当成了存在的主体。因此，和现实的人的关系相反，在黑格尔那里，事情竟成了这样：思维是主体，存在是宾词。当思维这个主体在《逻辑学》中意识到自己的抽象时，它就把自己外化成现实的存在，外化成自然界；可是这个被建立的自然界，也并不就是真正的自然界，而是异在的理念，就是说，在他在中的思维，一旦思维意识到了它的异在，它就会重新扬弃这个异在，从而回复到它自身。费尔巴哈认为，黑格尔这种自然为理念所建立的学说，无非是用理性的

①②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83页。

③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21页。

说法表达出的自然为上帝所创造的神学学说而已，他说："黑格尔辩证法的秘密，最后只归结到一点，就是：他用哲学否定了神学，然后又用神学否定了哲学。"①因此，费尔巴哈把黑格尔哲学称作"神学最后的避难所和最后的理性支柱。"②但是，费尔巴哈并没有因此就把黑格尔哲学当作纯粹的谬误抛弃掉，而是把它当作他的新哲学的出发点，他说，"我们只要经常将宾词当作主词，将主体当作客体和原则，就是说，只要将思辨哲学颠倒过来，就能得到毫无掩饰的、纯粹的、显明的真理。"③

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是从人和对象的关系出发的。在他看来，人不可能脱离对象而单独存在，因为没有了对象，人就成了无。对象不是别的，它就是那和它发生本质关系的人的固有而客观的本质。对象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什么样的，对象的本质就是人自身的本质，"谁耕种土地，谁就是农夫；谁以打猎为生，谁就是猎人；谁捕鱼，谁就是渔夫"④。因此，人对于对象的意识，就是人的自我意识，在对象中，人认识到了他的公开的本质，他的真正的客观的"我"。费尔巴哈把对象分为两种，一种是"实际上的对象"，这种对象是感性的对象，是在人以外的、不依赖于人的一种客观存在，人对这种对象的意识虽然也是对其本质的认识，但还不能等同于他的自我意识；另一种是"我们的对象"，这种对象是我们思维观念中的对象，是存在于人以内的对象，人对这种对象的意识其实就是人的自我意识。宗教对象便是这样一种"我们的对象"。在宗教中，"人使自己对象化，然后又使自己成为这个对象化了的、转化为主体、人格的本质的对象。"⑤那个对象化了的本质就是上帝，它是我们的最高的本质的外化。但是，人的这种对象化了的本质在基督教那里却变成了人的异己的统治力量，

①②③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49、115、102页。

④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26页。

⑤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29、56页。

在基督教中，上帝拥有一切，而人则一无所有，人自己的本质反过来成了压迫自身的力量。

人为什么会把自己的本质异化为上帝呢？对此，费尔巴哈从认识和心理两方面进行了分析。费尔巴哈认为，人们认识到的不是事物的本来面目，而是事物对人的表现。因此，一开始人们只能想象事物，而不能把握事物自身。费尔巴哈说："直接的感性直观反倒比表象和幻想晚出。人的最初的直观——本身只是表象和幻想的直观。"① 人对自身的本质的自我意识也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人先把自身的本质转移到自身之外，把它想象为一种与自己不同的本质——上帝；最后，人们终于认识到，上帝的本质原来就是他自己的类本质。从心理方面来说，由于人是一种依赖于自然界的受动者，所以，出于自身的利益，他对那种掌握他命运的自然力就本能地有一种敬畏感。这样，那些自然力首先就成了人们崇拜的对象，这种崇拜造就了自然宗教。当人们逐渐掌握了自然，成了主宰时，对人自身的崇拜的基督教就产生了。不过基督教在这样做时并不是有意识的；在它那里，对人的崇拜还处于一种异化的形式之中。

在批判宗教和黑格尔哲学的同时，费尔巴哈提出了他的人本主义哲学。这种哲学是建立在自然和人的基础之上的，费尔巴哈写道："新哲学将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当作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因而也将人类学连同生理学当作普遍的科学。"② 新哲学把直接的存在，把物质看做它的开端，在它看来，"思维与存在的真正关系只是这样的：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词。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然而存在并不来自思维。存在是从自身、通过自身而来的——存在只能为存在所产生。存在的根据在主体自身中，因为只有存在才是感性、理性、必然性、真理，简言之，存

---

①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 **174** 页。

②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分上卷，第 **184** 页。

在是一切的一切。”[①]存在和思维是统一的。思维的本质是普遍性，而现实存在的本质则是个别性，因此思维并不完全和存在契合，反映在思维中的往往只是事物的某一方面、某一部分，但是，并不能因此就说思维和存在是分裂的，因为通过感性直观的不断校正，思维最终是可以认识存在的；而人作为实在的实体，当然能认识实在的事物，思维作为这样一个现实的实体的属性，自然也不会脱离存在。因此，“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只有在将人理解为这个统一的基础和主体的时候，才有意义，才是真理。只有实在的实体才能认识实在事物，只有当思维不是自为的主体，而是一个现实实体的属性的时候，思想才不脱离存在。因此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并不是那种形式的统一，即以存在作为自在自为的思维的一个特性，这个统一是以对象，以思想的内容为依据的。”[②]

人是思维和存在统一的基础，那么，人是什么呢？费尔巴哈认为，人是一个具体的感性的现实的存在物，他跟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他能把自己的类、自己的本质当作自己意识的对象，而动物则只能将个体当作对象，所以人不像动物那样，只有一种生活，他的生活是双重的：一重是和自己的个体性发生关系的外在生活，一重是同他的类、他的本质发生关系的内在生活。因为同类、本质发生关系，所以人可以自己意识到自己的本质，而这个被自我意识到的人的本质就是“理性、意志、心”。

人能意识到自己的类的本质，但由于每一具体的个人都是有限的存在物，所以无论是谁都不可能完全拥有这个本质，这个本质是为人们所分有的，在世界历史过程中实现的那些人类特殊的总体。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只能分有类的本质的某一方面，类的本质只有在所有人们的总和中才能实现，因此，人的作为人的本质，就只有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在社会中才能显现出来。在社

①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15页。

②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81页。

会中，一个人代替另一个人，一个人补足另一个人，因此，人就不再是那听命于自然力的偶然性的孤独的个人，而是有着强大力量的人类整体的一员了。当然，在整体中，个人也不会被完全消融，因为，虽然“人的本质只是包含在团体之中，包含在人与人的统一之中，但是这个统一只是建立在‘自我’和‘你’的区别的实在性上面的。”① 费尔巴哈认为，把所有这些相互区别的个人联系到一起的就是“爱”。爱使人类组成了一个整体，因而把人提升为类存在物，同时，爱也使有限的个人具有了无限的意义，费尔巴哈说，“只有在爱之中，‘这个’——这个人，这种事物，亦即个别事物，才有绝对的价值，有限的东西才是无限的东西”②。

从人本主义出发，费尔巴哈对他之前的唯物论和唯心论都进行了批判。费尔巴哈认为，唯物主义把感觉作为观念的源泉是正确的，但唯物主义在这样做的时候却忘了人的最主要的最基本的感觉对象是人本身，忘了意志和理智的光辉只在人的视线中才呈现出来；唯心主义试图在人里面寻找观念的起源，这是它的正确之处，但唯心主义不是从现实的人，而是从孤立的、固定为灵魂的人中去找寻观念的起源，所以，唯心主义也必然得不出正确的结果。只有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费尔巴哈说：“只有存在与本质结合、直观和思维结合、被动与主动结合、法国感觉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反经院派的热情原则与德国形而上学经院派的冷淡态度结合起来的地方，才有生活和真理。”③

费尔巴哈把具有感性确定性的、以自身为基础的肯定，同黑格尔的作为否定之否定的结果的那个绝对的肯定对立起来，把存在、物质看作是世界的本原，把思维看作是存在的属性，因而重新确立了唯物主义的权威，这是他的极大的功绩。但是，在抛却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同时，费尔巴哈也丢掉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也

---

①②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85、167页。

③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11页。

许这不是他的本意，因为按照他的想法，他的哲学是黑格尔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可是由于他的方法本身的缺点，使得他找不到黑格尔哲学的真正合理的内核。黑格尔辩证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否定之否定，作为原则，它贯穿于体系的每一个组成部分之中，它的实质和精髓就在于发展，在于自我创造。但是费尔巴哈却把这个否定之否定简单地斥为肯定神学——否定神学——重新肯定神学，他不理解黑格尔用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语言表达出的人产生的活动，发生的历史——尽管还不是作为现成的主体的人的现实性的历史，因此在谈到人和对象，亦即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时，他便只能以静观的态度，把现实、事物、感性仅仅看作与人并列的、独立于人的、在人之外的自然存在，而不同时也把它们看作是人的感性活动，人的实践的结果。所以尽管他把人当作他的哲学的最高原则，当作主体和客体统一的基础，他还是没有正确地理解人，没有正确地理解人的能动作用——在他那里，人的能动性仅仅表现为“理性、意志、心”。因此，费尔巴哈仍然没有超出那种他非常乐意超越的旧唯物主义的局限。

费尔巴哈分析了人在宗教中的分裂、人的本质在宗教中的异化，并力图把宗教归之于它的世俗基础，但是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对天国的异化的批判之后，事情还远未完成，因为对造成人在宗教中的分裂的现实的物质基础自身的分裂，我们还一无所知。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但这种人的本质不是现实的、实践的、处于自然——社会的各种关系的制约中的具体的人的本质，而是抽象的、联系着所有的个人的内在的、无声的共同性——类。有时，他似乎打算用人与人的交往来说明人，但他所知道的交往只有一种形式，那就是“爱”。“爱”把孤立的个人联结为类，“爱”使人和人、人和自然界获得了和解和统一。“爱”甚至使宗教获得了真正的意义，而一部世界史无非就是爱的宗教的实现的历史罢了。

总之，费尔巴哈虽然最终未能在历史观上避免唯心主义，但

他的唯物主义原则，尤其是把研究的视角转向自然和人，无疑是启发了善于思考的马克思、恩格斯，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直接理论来源之一。

七、麦克斯·施蒂纳（1806－1856）的“唯一者”哲学

施特劳斯利用黑格尔的“概念和观念的区别”的思想把基督教和黑格尔哲学降到了概念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降到了概念的一种特殊表现这样一种地位。他把概念，或者用他的说法，实体，看做世界历史的根本动力，世界历史在他那里只是实体的发展的代名词。施特劳斯并没有破坏掉什么，他所做的一切无非是把黑格尔的原则贯彻到底。鲍威尔试图把那种脱离了人的抽象精神重新交回给人，他用人类的普遍的自我意识代替黑格尔的无主体的绝对精神，在他眼中，只有人的自我意识才是世界历史的真正主宰。但自我意识还不是人本身，人在自我意识中还仍然是一个抽象的精神性的东西。必须把人还给人，必须把人归结为人本身，归结为存在于自然中的以自然为其前提的自然的人，这个工作是由费尔巴哈完成的。但是费尔巴哈在这样做的时候，还没有真正地认识现实的人。在他那里，人还只是抽象的类。费尔巴哈的这个缺陷受到了两方面的诘难：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从彻底的唯物主义角度对它进行了批判，从而做出了他的划时代的伟大发现——唯物史观；另一方面，施蒂纳从唯我主义出发对它进行了批判，并在这个批判的基础上筑起他的“唯一者”哲学。

施蒂纳把费尔巴哈带给人们的解放称作是“神学意义上的解放”①。他认为，费尔巴哈固然批判了基督教，但费尔巴哈这样做时却并不是为了摈弃它，而是想把它拉到自己那里去；他把神的本质看作是人的最高本质，然而，“最高本质无疑是人的本质，但恰恰是因为最高本质是他的本质而不是他自己，这样我们究竟是

①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资料选编》上册，第182页。

在他之外看到它并看作 '神', 或者在他之中发现它并称之为 '人的本质', 或称为 '人'就完全一样的了。"① 因此, 费尔巴哈虽然消灭了" '我们之外的彼岸东西', 从而完成了启蒙主义者的遗愿, 但他同时也创造了我们之内的彼岸东西--人的抽象, 想让我们受这一抽象束缚。"② 施蒂纳认为, 费尔巴哈抽象地对待人, 他把人分裂为一个本质的"我"和一个非本质的"我", 同时, 又把这个本质的"我"——类, 也即泛称的人、抽象、理念看成真正的实体, 而把现实的个体的人只当成一种非本质的东西。

公正地说, 施蒂纳对费尔巴哈的指责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但这种指责并不十分准确, 因为费尔巴哈并不轻视感性的、个体的人, 他只是希望能把个人和类融合起来。他的错误仅仅在于, 他不是对现实的个人和类的关系做出分析, 而是希图用一个抽象的"爱"把二者联系起来。

和费尔巴哈相反, 施蒂纳只重视个别的东西。在他看来, 真实的存在只能是个别的东西。而一般、共性不过是人们的臆想, 是根本不存在的"幽灵"、"怪影", 所以, 他反对把任何普遍的东西, 不管是绝对理念、实体, 还是自我意识、类当作哲学的最高原则。

施蒂纳把他的哲学称作"唯一者哲学"。所谓"唯一者"就是指单个的现实存在着的自我。施蒂纳认为, 他的这种"自我"和费希特的"自我"不同, 他说: "当费希特说 '自我就是一切' 的时候, 那么看来他的话与我的观点一致。"但是, "费希特谈论的是 '绝对' 的自我。而我谈论的是自己, 是一时的我。"③ 由于唯一者哲学把基础建立在易逝的、难免一死的单个人身上, 所以, 施蒂纳说: "我把无当作自己事业的基础。"④ 不过, 施蒂纳认为, 他的这种无并不是空洞无物意义上的无, 而是创造性的无。作为无

---

①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资料选编》上册, 第 183 页。

② 转引自《黑格尔左派分析》, 第 234 页。

③ 转引自《黑格尔左派分析》, 第 233 页。

④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资料选编》上册, 第 194 页。

的唯一者从无中创造出一切，而这种创造物就是唯一者的所有物。显然，尽管施蒂纳试图把他的哲学建筑在真实的感性的个人身上，但因为他的这种“唯一者”只是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存在，所以他最终也不免要像费希特那样从自我推出非我。

施蒂纳认为，唯一者是利己主义者，他只关心他自己的事。从前，人们被告知：神的事、人类、真理、自由的事、人道和正义的事，以及人民、君主和祖国的事，才是他们的真正的事业；而他们自己的事则是可鄙的，毫无意义的事业，他们应该为神圣的事业牺牲一切。但是，神只关心他自己，他并不为一项更高的事业效劳，“神的事业是纯粹利己主义的事业。”[1] 而人类呢？人类也只看到自己，它只想使它自己得到发展，为此，它让人民和个人在为它效劳的过程中受尽折磨，而一旦他们干了人类所需的事情，他们就将被人类扔进历史的粪堆，因此，人类的事业也只不过是纯粹利己主义的事业。其它诸如真理、自由、正义、人道和祖国等等也只管它们自己的目的，而不考虑其它，它们全部是利己主义者。“既然神和人类不外乎只将它们的事业置于自己的基础上；那么，我也就同样将我的事业置于我自己的基础上。……我的事业不是神的事业，不是人的事业，也不是真、善、正义和自由等等，而仅仅只是我自己的事，我的事业并非是普通的，而是唯一的，就如我是唯一的那样。对于我来说，我是高于一切的！”[2] 施蒂纳从神、人类、真理等等的利己主义推出个人的利己主义，这样做是很荒唐的。虽然施蒂纳一再声明从现实出发，但一接触到实际的问题，他就不免要用抽象的东西论证现实的东西了。

照施蒂纳的看法，人一开始并不就是“唯一者”，成为唯一者需要一个过程。人的一生有三个阶段：童年、青年、成年。儿童是现实主义者，他还拘泥于这一世界的事物，当他洞悉事物背后

---

①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资料选编》上册，第171页。

②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资料选编》上册，第172页。

的情况，摆脱外界事物的控制时，他就成长为青年。青年是理想主义者，他只有精神的兴趣，精神对他来说成为一切中的一切，而他自己则是不完善的精神，所以，一方面，他作为精神第一次发现了自我，从而摆脱了与神相关的东西，即摆脱神秘、幽灵和上帝的威力；另一方面，他又对着这个并非他自己本身的，彼岸的完美的精神顶礼膜拜，从而再一次失去了自我。只有成人是唯一者，“成人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把握世界，而不是到处对其胡思乱想并改善它，即意欲按照他的理想塑造世界，这就使成人有别于青年；在成人心目中牢固树立起了这样的看法：人们必须按照他们的利益，而不是按照他们的理想来对待世界。”① 如果说，青年作为精神是自我的第一次发现，那么，作为有形体的，精神的成人则是自我的第二次发现，他不再是一个自然物，也不再是一个精神，他随心所欲地处理事物和思维并将他的个人利益置于一切之上，他是利己主义的唯一者。

和人生的三个阶段相应，人类历史的发展也经历了三个时期：古代、近代、最近和将来。古代人和儿童一样，顺从于自然界，对他来说，“这个世界是他必须服从的一个固定的法则”这个世界决定他的命运。”② 当古代人窥探到自然界的秘密，把神性赋予精神时，古代史便终结了。这时，人争得了对世界的所有权：“第一份所有物，第一份‘光荣’被争得了！”③ 但是争得了对世界的所有权的近代人又成了精神的奴隶，精神是神圣的，个人则算不了什么，这个神圣的精神在基督教那里就是上帝，在黑格尔那里则是绝对观念，对黑格尔来说，“概念应处处起决定作用，概念应规定生活，概念应进行统治。”④黑格尔之后的那些自由主义者们希望把神圣的精神人性化，使它接近人或者使人靠拢它。但是，自由

---

①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资料选编》上册，第176页。

②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资料选编》上册，第184页。

③④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资料选编》上册，第185、187页。

主义者只是用人的概念来代替神，用国家的概念来代替教会，用科学的概念来代替信仰，个人在他们那里仍然没有成为目的。政治自由主义者固然取消了主人与仆人的不平等，但是主人又以国家的身份重新出现，仆人则以臣民的身份再度出场；社会自由主义者废除了财产的不平等，然而由于财产作为社会的财产而出现，操劳重又作为劳动产生；人道自由主义者消灭了神，赋予人以最高的意义。"然而由于没有人能成为'人'这一观念所意味着的东西，这样，人对于个人来说保持为一个崇高的彼岸世界，一个达不到的最高本质，一个神"①。这样，"人"这一理想的东西成为世界历史的自我，成了真正发展自己和使自己得以实现者，他是真正的实在，有形体者，因为历史是他的形体，"在这之中个人只不过是组成部分。…… '人'作为世界历史的自我封闭了基督教观点的圆圈。"②只有在存在和使命之间，即在"实际上的我"和"应该成为的我"之间的紧张关系消灭之后，基督教魔法的圈子才能被破除，这就是唯一者的出现。

施蒂纳反对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类而诉诸于单个的人，但是由于他不了解一般和个别的辩证法，所以他把个人和类截然割裂开来。这样，施蒂纳的"唯一者"就成了和任何类都不相关的、不受任何制约的存在。可是，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脱离社会、脱离自然的单个的人，任何个人都必然地处于一定的自然、社会关系史中，因此，"唯一者"就只能是一种毫无现实根据的幻想。施蒂纳把这个幻想的存在，这个抽象的唯一者当作世界的创造者，把世界当作这个唯一者的所有物，当作唯一者创造的结果，因此，虽然他并不诉诸个人的观念、心、精神，虽然他高扬起感性的个人的大旗，他仍然只能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者。

施蒂纳是无政府主义的始祖，他反对国家、社会、法律、人民，一句话，反对有任何高于个人的普遍的东西存在，个人在他

①②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资料选编》上册，第189、192页。

那里没有任何义务和约束。用他的话来说："我自己就是我的类，对我来说，既没有任何规范，任何规律，也没有任何模式"[①]。因此，施蒂纳主张取消国家，而代之以利己主义者的联盟。施蒂纳认为，联盟与国家的不同点就在于，联盟以契约为基础，而国家以规范为基础。规范一旦固定下来，就取消了个人的自由意志，而契约随时都可随个人的意志而取消。很显然，施蒂纳对国家的这种看法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他不是从现实出发对国家作出分析，而是从抽象的唯一者出发去虚构一切。

施蒂纳抓住了单个的人，就以为已经抓住了现实的一切。其实，由于不了解现实的个人间的真正的联系，他的关于人生，关于人类的历史，关于国家的理论最终都不免流于虚构，而且总是流于相当拙劣的虚构。

八、莫泽斯·赫斯（1812- 1875）的"行动哲学"

莫泽斯·赫斯是最早转向空想共产主义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也是跟马克思、恩格斯一起走得最远的一个青年黑格尔分子。

早在1837年的处女作《人类的神圣历史》中，赫斯就表述了他的共产主义构想。他把共产主义看作是神的和谐的天堂，在共产主义时代，"整个大地将变成一座大花园。那里只居住着幸福勤劳的人们，他们将过着人所应享受的那种生活。那时将为了消灭贫穷而去寻找贫穷，但很少能够找到；人们将永远和不幸诀别了。"[②] 赫斯把人类历史描述为共产主义最终获得实现的过程。在原始时代，人与上帝处于一种无意识的统一中，财富为整个社会所拥有。但在基督教时期，随着私有制和继承权的出现，原始社会的那种宁静的和谐被破坏了，利己主义和社会不平等的状况越来越严重，贫富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后来，以斯宾诺莎的出

---

① 转引自《黑格尔左派批判分析》，第242页。

② 转引自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第256页（注释部分）。

现为标志，人类开始自觉地追求社会的统一和完美，这个运动在法国大革命中达到了极致。将来，由于财富的不断扩大和集中，由于人民的普遍贫困化，必然要引起社会革命，革命将通过法、德的联合而获得成功，从而废除私有制和继承权，铲除利己主义的根源，把世界变成天堂。

在《欧洲的三头政治》(1841年)一书中，赫斯试图给他的共产主义学说奠定一个哲学基础。赫斯认为，从前的哲学都缺乏一种积极性，它至多是一种对现实的认识，因此，对现实的丑恶只能"坚决地抗议一番"而已。赫斯像契希考夫斯基一样，把行动当作他的哲学的最高原则。他说，"我在我所是之前首先必须行动"①。不是存在本身，而是行动，才是第一性的因素，才是最初的和最终的因素，个人只有通过行动才能使自己与存在同一。在《人类的神圣历史》中，赫斯还把共产主义的实现看作是理性命定的过程，人只不过是这个理性实现自身的工具；在《欧洲的三头政治》一书中，他已开始把人的本质归结为自由自觉的活动，把共产主义看着是人的行动的结果。但是，"行动"在赫斯那里还仍然是一个抽象的东西，"行动"被归结为社会成员的道德完善化过程。

在1843年发表的《行动哲学》一书中，赫斯进一步论证了他的行动哲学，赫斯认为，"生活就是行动"②，只有在行动中，人才能够意识到他的存在并实现他的存在。"一切在于行动而不是存在。"③行动的主体是自觉的我，"自觉的我，是全部哲学的出发点。……我思'对于我们表现为包括构成我'的三个因素的行为，根据同样道理，它既不是思维着的存在(Sein)，也不是被思维着的存在(Sein)，而是一个行为的完成：生命的运动对于自己本身表现为另一回事，或是说表现为区别于自身但在这种区分或变异

---

① 转引自《黑格尔左派批判分析》，第188页。

②③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资料选编》上册，第156页。

性中承认与自身的同一性。”① 从前的哲学，还处于抽象的沉思阶段，它从来不把它的行动看着是现在的行动，它从来没有面对现在，仅仅是面对过去，因此，它还把自由自在的观念看作真实的存在，还相信为奴役人服务的宗教信条和政治信条，只有把行动看作是自在的目的，消除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的压迫，才能获得个人的完全解放和独立，从而实现完全的平等和共产主义。这个任务只有通过法国和德国的联合才能完成。法国已经克服了政治的幻想，德国则克服了宗教的幻想，但由于它们不是一致地，而是分割地追求自由，“因此，在法国和德国均产生一种反动：在法国，人们还没有获得精神的自由，这个反动就来自宗教和教会；在德国，人们忽视社会自由，这个反动就来自政治或国家。”② 只有法国和德国联合起来，才能最终实现自由。这种实现了的自由和社会平等是一致的，“自由，这就是自我限制对外在限制的胜利，就是精神在它的活动中的自我意识，就是自然的偶然性向自我决定的转化。”③因此，自由并不影响平等。

1844 年初，赫斯为《德法年鉴》写了一篇非常重要的论文——《论货币的本质》。由于《德法年鉴》的停刊，这篇文章到 1845 年才在《莱茵社会改革年鉴》第 1 卷上发表。在此篇文章中，赫斯试图把费尔巴哈的宗教的异化的分析应用到经济学研究上。这时，他已不满于抽象地议论行动，而试图把行动和生产交换联系起来。在赫斯看来，“生命是生产性的生命活动的交换。”④个体的生命只有在相互的交换过程中，在共同的生活活动中才能得到实现，离开了社会的中介，个人就无法生存。因此，个体的实现本质上就是个体的生命活动的相互交换，赫斯说：“人与人的交往决不是从人的本质中产生的，这种交往就是人的现实的本质，而且它既是

①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资料选编》上册，第 156 页。

②③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资料选编》上册，第 159 页。

④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资料选编》上册，第 160 页。

人的理论本质，人的现实的生命意识，又是人的实践本质，人的现实的生命活动。”① 由于只有在交往中，在类生活中，个体才能实现它的本质，所以类就毫无疑义地应该成为生活的目的。但是基督教世界却把这一切都给颠倒了，在这个世界上，“个体被提升为目的，类被贬低为手段”②。从理论上说，这个颠倒的世界的典型形态就是基督教的天国，在天国中类存在物即上帝生活在个体之外，这些个体不是上帝赖以表现出来的中介，不是类存在物赖以生存的中介，而是相反，个体借助于上帝而存在，因此，在这里，类存在物被贬低为个体生活的手段。想通过类仅仅为自身而生活的个体，在实践上也为自己创造了一个颠倒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类生活就是货币，“上帝对理论生活所起的作用，同货币对颠倒的世界的实践生活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这是人的外化了的能力，人的被出卖了的生命活动。”③ 货币是彼此异化的人、外化的人的产物，人的这种异化是在交往活动中产生的。作为孤立的人，为了能够生活，就需要交往，但是由于我们还不知道我们的力量的联合就是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在我们之外寻找它，在相互斗争中去赢得它，可是通过斗争赢得的东西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这种异化在现代意识中表现得越来越突出，一方面，我们毫无结果地浪费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这些力量通过生产力的过剩又根本不能进一步得到发展。一方面，是劳动者的贫困化和苦难，另一方面，是资本家的奢华和可鄙的贪图享乐。因此，“在我们所达到的这个发展阶段，如果我们不彼此在爱情中联合起来，那么我们就只能更厉害地互相剥削、互相吞噬。”④必须用爱来拯救劳动者。使他们不至于因为生产力的发展而日益陷入贫困，必须用爱来代替利己主义，以便所有的人都能按他们的真正本质来生活。在这篇文章中，赫斯还提出了交往和生产力具有一定关系

---

①②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资料选编》上册，第161页。

③④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资料选编》上册，第162、166页。

的猜想，他说："人与人的交往越发达，他们的生产力也就越强大，在这种交往还狭小的时候，他们的生产力也就低下。"①

1844年以后的赫斯，一度曾希望用马克思已经明确表述出来的唯物史观来解释历史。但由于他无法抛弃抽象、抛弃空想，所以他最终也只能做到用真正的人的本质的恢复来构想未来的共产主义，用爱和道德作为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手段。

赫斯的哲学思想有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的过程。终其一生，他都想为人类寻找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但由于不了解物质生活过程对人类历史的作用，所以他对历史的描述往往采取臆造的、歪曲的形式。他不满于费尔巴哈仅仅停留在对理论上的异化的揭露，而试图寻找出实践上存在着的异化。他把这异化归之于货币，但由于他没有对人的生产活动作出进一步的分析，所以他最终也没有解释清楚这种异化产生的原因。至于异化的消除，他只能求助于空泛的"爱"。

赫斯把人的本质归结于行动，即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甚至把人的本质归结于人与人的交往，这是他高于费尔巴哈的地方。但由于他不是把人的本质看作特定时代的交往、行动，而是看作贯穿于整个历史过程中的根本的动力，所以，历史在他那里就成了一部分人的异化和异化的克服的过程史了，而共产主义当然也就是人的本质的复归了。

简 短 的 结 论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发展的产物，是"时代的关系和需要的表现"。

18世纪后期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推动了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也带来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深刻变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①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资料选编》上册，第160－161页。

所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的矛盾已充分暴露出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欧洲最发达国家的历史中上升到首要地位。成熟了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阶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和阶级基础；19世纪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为它的产生提供了科学史的依据；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法国和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和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的历史理论中的合理思想，为它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来源。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激化和阶级斗争的深入，消灭私有制、解放全人类，已成为时代的呼声；无产阶级以其所处的待殊历史地位和在斗争实践中所显示的强大威力，表明自己是旧制度的掘墓人和新社会的创建者。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迫切需要有反映它的根本利益和要求的科学理论的指导，而这是当时既有的理论，那怕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理论，都因其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而不能胜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实现了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立场转变的基础上，总结了无产阶级斗争实践的经验，批判地吸取了人类认识史上的优秀成果，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新成就，从而创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全人类，特别是给了无产阶级。这是哲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革命变革。

第二章　马克思世界观的转变

马克思不是一个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最终能够成为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曾经历了一个痛苦摸索和艰难的理论创造过程。正如同个体发展能够再现整个人类的演化和成长史一样，马克思早期思想演进的历程，在一定程度上也以浓缩的形式再现了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发展。传统观念无疑对马克思有着巨大的影响，但马克思的思想首先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他站在新的时代实践的高度，在当时德国和欧洲的具体政治环境里，批判地审视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思想，特别是雄踞人类精神高峰的德国古典哲学，锻造出为先进阶级的实践所需要的理论武器。所以，马克思世界观的转变，必然是逐步摆脱旧的传统观念，综合一切合理的思想因素，以适应社会变革和发展的需要的过程。作为这个过程的终端的思想，就是一种新型的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马克思世界观的转变，首先是要寻找到一个立足点和出发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开始自己新的理论创造和精神的发展。

第一节　马克思转向黑格尔哲学

在青年马克思思想演进中，对他具有重大意义和对其思想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是他转向黑格尔哲学。在黑格尔学派解体过程中，马克思通过参加青年黑格尔运动，放弃了他原来的哲学见解，逐渐接受了黑格尔哲学。但他对黑格尔哲学的理解，与青年黑格尔派有着原则的区别，这就是青年马克思不是从自由主义立场，而

是从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新的论述。这种对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理解，是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最初出发点。

一、思想的启蒙和走向黑格尔主义

卡尔 马克思在他的故乡普鲁士莱茵省的特利尔城度过他的童年和中学时代。当 1818 年 5 月 5 日马克思诞生的时候，这一地区三年前才刚刚摆脱法国拿破仑的统治而重新归还普鲁士。作为德意志土地上四分五裂的三十几个独立邦国之一的普鲁士王国，当时还是一个落后的封建的农业国家，而莱茵省 1794 年至 1815 年在拿破仑统治下，由于推行拿破仑法典和实行一系列重大的社会改革给它带来了经济上的蓬勃生机和政治上的自由气息。尽管拿破仑帝国覆灭以后被推翻的封建势力又重新复活，普鲁士专制政府也试图在莱茵省重新恢复昔日封建的社会结构，但暂时的历史复辟和倒退并没有完全消除革命曾带给人们的自由精神及其所产生的深广影响。

马克思出身于特利尔的一个犹太法律学家家庭。父亲亨利希 马克思是当地一个有名望的律师，他有着极好的文化修养，特别爱好伏尔泰和卢梭的诗歌，具有宗教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启蒙精神，积极参加特利尔自由反对派的学术团体“文学俱乐部”的活动。这对少年马克思思想的发展曾产生过巨大影响。马克思还从他未来的岳父，特利尔政府枢密顾问威斯特华伦男爵那里得到了不少教益。威斯特华伦是一个十分有教养的人，酷爱莎士比亚和古希腊的诗篇，非常关心社会问题。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培养少年马克思健康成长的第一所学校。

决定马克思最初精神发展方向的是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

在自由空气比较活跃的莱茵省里，特利尔城的自由主义启蒙精神尤为盛行。19 世纪 20 年代，这里就成立了作为自由主义反对

派中心的两个学术团体——“益学会”和“文学俱乐部”，同时，傅立叶主义和圣西门主义在这里也颇为流行。1834年1月，“文学俱乐部”曾主办过自由主义的示威性活动，颂扬启蒙派的自由精神，演唱《马赛曲》和《巴黎人》等革命歌曲，甚至还有人打起了法国的三色旗。马克思的父亲参加了这些活动，还发表了比较温和的演说。

在马克思度过了6年学习生活的特利尔中学，自由主义的精神更加活跃。18世纪末克里门斯·文采尔（1768-1808）等所宣扬的自由主义启蒙精神打动和影响了具有激进民主思想的中学教师。特利尔中学校长、历史和哲学教师约翰·胡果·维登巴赫（1767-1848），是一个有激进的民主主义自由思想并对马克思产生重大影响的教育家。他竭力用理性主义规定学校的教育发展。他曾经因参加1832年汉巴赫自由者集会而遭受警察局的监视。马克思的数学教师施泰宁格尔也因信奉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而受到当局的严厉申斥。

马克思的这种生活和学习的社会环境，决定了他最初的精神发展方向，从而也极大地影响着马克思早年的政治态度，使马克思从少年时代起，就受到了进步思想的熏陶，萌发了自由主义的思想和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

真实记录马克思早年思想发展进程的最早资料是他1835年中学毕业考试写的三篇作文。

中学时代的马克思就具有虚心好学、认真钻研、独立思考问题和判断问题的能力。论宗教问题的作文——《根据约翰福音第15章第1至14节论信徒和基督的一致，这种一致的原因和实质，它的绝对必要及其影响》，这篇不足三千字的文章主要讨论了新教基督教的观念和道德观念。虽然很难确定这篇文章在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但它却肯定地表明，宗教观念在马克思当时的精神世界里就没有多大的地盘。

标题为《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应不应当算是罗马国家比较幸

福的时代?》的拉丁文作文，得到了校长维滕巴赫和拉丁文教师的好评：作文不论在内容方面，还是在显示出来的历史知识和拉丁语知识方面都不错。不过，对我们讨论少年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有意义的，并不在于这些文章所分析的问题或语言知识，而是马克思对问题的独立思考和判断。“如果一个时代的风尚、自由和优异性受到了损害或者被破坏了，同时，贪得无厌、铺张浪费和荒淫无度充斥泛滥，那么这个时代就不可能称为幸福时代”①。这些不同凡响的文字反映了少年马克思把伦理道德当作评判社会现实问题最有力的理论武器的思想特征。

《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是由马克思自由命题的毕业德语作文，集中反映了少年马克思当时的精神理想和受启蒙学说深重影响的思想状况。它是未来马克思确立自己世界观的重要起点。“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②。为人类劳动，是少年马克思远大的理想。

马克思提出，职业选择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自身的完美。马克思所说的是人类的幸福，而不是某些人所追求的仅仅为了自己的、自私的乐趣。马克思所理解的自身的完美，同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的自我完善也是迥然相异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③这就是马克思当时对自身完美的理解。在他看来，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大哲人、卓越的诗人，但他决不可能成为真正完美的伟人。在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中学时期所形成的这种精神理想，影响了他后来整个一生加事业。

在选择职业上马克思所考虑的是，如果人们选择了力不胜任的职业，那么就不可能把它做好。例如，对于那些还没有坚定原则、不具备牢固而又不可动摇的信念的人，不经考虑、凭一时冲动就仓促从事艰深清苦的“抽象真理”研究，这是很危险的。如

①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825、7页。

果从事这一职业的人不能为这一职业而牺牲生命、竭尽全力、奋勇献身，那么，这一职业必定会使这些人的一生彻底毁灭。这一见解是深刻而又卓越的。职业选择会遇到体制与才能的限制和社会因素的制约。即使在今天，少年马克思这一职业观的现实意义也没有因为历史年轮的增加而减弱。马克思的这些看法，对于那些各自怀着美好愿望四处奔走的求职者来说，是不会没有启发乃至指导价值的。

少年马克思不仅树立起了远大超群的精神理想，而且，他在实现自己的目的时还表现出了对待周围社会现实的极其冷静和客观的态度。这是更为可贵的。他在作文中这样写道："我们并不总是能够选择我们自认为适合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有能力对它们起决定性影响以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确立了。"① 这表明，马克思处理实际问题的态度是唯物的。观察和对待社会现实的这一态度本身远比对个别问题的正确看法更值得注意。它在根本上预示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方向。

走向黑格尔主义是青年马克思最终"走向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② 历程的一个重大转折。马克思中学毕业时所确立起来的自由主义的启蒙思想和带有浪漫色彩的理想主义，只是他思想进一步向前发展的起点，而柏林大学时期同黑格尔思想的接近才是他探索新世界观的开端。在马克思彻底完成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转变之前，黑格尔主义在其世界观中居有主导的、根本的地位。

19世纪30年代，黑格尔主义在德国获得了"全线的胜利"。恩格斯曾指出："正是在1830年到1840年这个时期，'黑格尔主义'的独占统治达到了顶点，它甚至或多或少地感染了自己的敌人；正是在这个时期，黑格尔的观点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大量浸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5页。

② 《列宁全集》第1版（下同）第38卷，第387页。

了各种科学，甚至渗透了通俗读物和日报”①。因此，向黑格尔主义转变，就成了当时德国哲学界的一个普遍现象。一批真正有理想、有作为的知识分子都为黑格尔哲学所吸引。对这一现象，德国自由主义哲学家鲁道夫•海姆曾作过生动的描述，他写道，当时，德国知识分子如果不是黑格尔分子，就会被认为是野蛮人和白痴，或者是可鄙的经验主义者。特别在那些兴办教育的权威们眼中，做一个非黑格尔派简直是犯罪。②

正是在黑格尔主义的影响日趋高涨的时候，马克思于1836年10月从波恩大学转到柏林大学。黑格尔虽然已于5年前去世，但他的哲学却有着巨大的影响。黑格尔本人曾做过柏林大学的校长，并从1818年到1831年在该校讲授哲学和哲学史。黑格尔逝世后，他在20年代末所创立的“黑格尔学派”③开始活跃起来，柏林大学中最重要的讲座都是由他的弟子们主持的。

但是，青年马克思并非天生的黑格尔主义者。他在波恩大学，直到柏林大学初期，曾一度倾向于康德和费希特。青年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在主要方向上是沿着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费尔巴哈这样一个历史轨道往前推进的。这恰恰同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相吻合。尽管这一过程是短暂的，但它作为青年马克思思想发生史的真实过程却是不能被忽略的。

在柏林大学初期，马克思阅读了不少有关法学的著作，约•哥•海夸克齐乌斯《按照〈罗马法全书〉次序叙述的民法原理便览》、安•弗•尤•蒂博《罗马法全书的体系》、萨维尼的《占有法》、殷根海姆的《法规大全》，还翻译了《罗马法全书》的前两卷等。他自己还打算写一部法哲学著作，并仿效康德的《法学的形而上学的基本原理》建构了一个法哲学的体系。在作为法哲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1页。

② 参见鲁•海姆：《黑格尔和他的时代》1962年，柏林，第4－5页。

③ 参见［苏］B•A马利宁和B•H申卡鲁克：《黑格尔左派批判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第一部分的“法的形而上学”中，马克思试图先验地规定法的基本原则。这无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思维方式上都受到了费希特《根据科学原则的自然法原理》的重大影响。然而，浪漫色彩的理想主义是很难在法哲学研究中贯彻到底的。“这里首先出现的严重障碍正是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是唯心主义所固有的；它又成了拙劣的、错误的划分的根源。开头我搞的是我慨然称为法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也就是脱离了任何实际的法和法的任何实际形式的原则、思维、定义，这一切都是按费希特的那一套”①搞的。于是，这部马克思曾经写满三百印张的法哲学巨著最终不得不流产。

“康德和费希特在太空飞翔，
对未知世界在黑暗中探索；
而我只求深入全面地领悟
在地面上遇到的日常事物。”②

在现实世界面前，割裂理想和现实，应有和现有的康德、费希特哲学便软弱无力，一筹莫展。马克思只有同它决裂。当替代旧的哲学信仰的新的哲学还没有树立起来时，马克思陷入了全面的精神危机，为了寻找精神出路，他又把自己投身到文学艺术之中。

这时，他阅读并摘录了莱辛的《拉奥孔》、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佐尔格的《关于美学和艺术的四间答》，并研究了缪司的舞蹈和萨蒂尔的音乐。青年马克思是一个很有文学才能的学生。早在中学时代他就开始写诗。马克思的被保存下来的最早一首诗是1833年作的《致查理大帝》，他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1837年写的题为《狂歌》的两首小诗（《小提琴手》、《夜恋》，1841年1月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651－652页。

在《雅典神殿》上发表)。在波恩大学，他参加了青年作家协会。除了选听法学方面的课程外，还选听了道尔顿教授讲授的《现代艺术史》，浪漫主义理论家奥 威 施勒格尔教授讲授的《普罗佩提乌斯的哀歌》、《荷马研究诸问题》，韦尔凯尔教授的《希腊罗马神话》等等。同时，马克思也创作了不少作品。他献给燕妮的《爱之书》和《歌之书》，收集了他主要在1836年至1837年写的诗歌八十五首；1837年2月献给父亲的诗册，主要是他在1835年至1836年间写的六十首诗。此外，马克思还写过幽默小说《斯科尔皮昂和费利克斯》和《乌兰内姆》(第一幕)的剧本等等。这些作品本身并没有体现出特别高的艺术和文学价值。马克思自己就严格地指出，在这些作品里面，一切现实的东西都模糊了，而一切正在模糊的东西都失去了轮廓。“对当代的责难、捉摸不定的模糊的感情、缺乏自然性、全凭空想编造、现有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完全对立、修辞学上的考虑代替了富于诗意的思想”①。但是，这些作品却是我们研究马克思个性形成时期精神活动的宝贵资料。

马克思不是一个为了自己的兴趣而牺牲自己理想的人。当他发现从事文学诗歌不是自己的特长时，就果断地烧掉了自己的诗歌和小说草稿。诗歌创作所带来的烦恼，建构法哲学体系方面所遇到的困难和失败，使他“渴望专攻哲学”②。他强烈地感到“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③。当然这已不是康德、费希特的哲学，也不是数学独断论。在马克思看来，数学独断论的方法一开始就是认识真理的障碍，它使主体围绕着事物转，并没有深入事物本身，揭示其多方面展开的丰富性。那么，应该怎样呢？他认为，“在这里，我们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决不应任意分割它们；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9–1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3页。

开，并且在自身求得自己的统一”[1]。“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2]，“从理想主义……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3]这些观点表明，马克思已经转到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上来了。

马克思转向黑格尔哲学决不是无关紧要的。他自己就把这种转变看成是指示生活新方向的界碑。向黑格尔哲学的转变，大大缩短了马克思探索新世界观的过程。没有黑格尔，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指出，他们的智慧的发展，有很多地方得益于德国的大哲学家，尤其是黑格尔。”[4]

黑格尔是坚决反对康德，反对应有和现有对立的。他认为，“哲学所研究的对象是理念，而理念不会软弱无力到永远只是应当如此，而不是真实如此的程度。”[5]黑格尔对应有和现有关系的理解是辩证的。他批判说：“惯于运用理智的人特别喜欢把理念与现实分离开，他们把理智的抽象作用所产生的梦想当成真实可靠，以命令式的‘应当’自夸，并且尤其喜欢在政治领域中去规定‘应当’。”[6]这个世界好像在静候他们的睿智，以便向他们学习什么是应当。但是，“如果这个世界已经达到了‘应当如此’的程度。哪里还有他们表现其老成深虑的余地呢？”[7]

马克思最终转向黑格尔哲学，是经过了一番内在的“冲洗灵魂，冲淡茶水”的思想斗争的。这也是他对自己所经历的深刻的精神危机彻底反思的结果。一开始，马克思并不喜欢黑格尔那离奇古怪的调子。1837年春，在柏林郊外施特拉劳渔村休养期间，他从头到尾阅读了黑格尔的著作和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促进了

---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5页。

④ 《列宁全集》第2卷，第5页。

⑤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5页。

⑥ 黑格尔：《小逻辑》，第44页。

⑦ 黑格尔：《小逻辑》，第45页。

马克思迅速向黑格尔哲学转变，并成为“博士俱乐部”的成员。

“博士俱乐部”是1837年在柏林出现的青年黑格尔派激进分子的组织，倡导“自我意识哲学”。最重要的成员有柏林大学神学讲师布鲁诺·鲍威尔、多洛亭高级中学近代史教员卡尔·弗里德里希·科本以及柏林军官学校的地理学教员阿道夫·鲁滕堡，还有刚刚通过博士学位答辩的爱德华·梅因，路德维希·布尔，以及卡·瑙威尔克、伊·卡·施米特（麦克斯·施蒂纳）和埃德加尔·鲍威尔等等。马克思虽然不是博士，当时也不过二十岁，但他却以自己独特的个性，出色的才能，独到的见解，赢得了战友们的尊敬。比他年长九岁的鲍威尔对他十分看重。莫·赫斯称赞马克思是一位“最伟大的哲学家”，是当今活着的“唯一真正的哲学家”。并把他看作是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的“结合”。弗·科本在1841年6月3日给马克思博士的信中，更把马克思称誉为“思想的仓库和制造厂”或“思想的牛首”①。

集合在“博士俱乐部”周围的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在没有蜕化为柏林“自由人”之前，个个激情满怀，斗志昂扬，奋发有为。他们经常聚集在柏林大学附近的施特黑利咖啡馆里无休止地争论那些玄妙思辨的哲学问题，勇敢地举起了批判宗教教条、捍卫信仰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大旗，并试图从黑格尔哲学中引出革命的结论，使之适应他们斗争的需要。这在客观上推动了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发展，传播了激进政治观点。1839年以后，“博士俱乐部”成了马克思经常活动的场所。

在马克思转向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爱德华·甘斯的影响是重大的。在柏林大学的第一学期，马克思除了听冯·萨维尼教授

---

① 参见［法］奥·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卷，第187页。

的“罗马法全书”、斯特芬斯教授讲授的“人类学”① 外，还极其用心地选听了爱 甘斯教授的“刑法”。作为具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黑格尔分子甘斯，他同法的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冯·萨维尼关于立法依据的争论，实质上是一个哲学问题。在政治观点上甘斯对法的历史学派的批判，以及他对工人阶级不幸命运的同情和对社会问题的关心，同他在立法依据观点上所体现出来的黑格尔精神一样，都对年轻的大学生马克思产生了重大影响。与此相反，当时马克思对教授萨维尼的观点基本上是否定的。他曾认为，法的历史学派不过是“通过昨天的卑劣行为来使今天的卑劣行为合法化”②。

如同失落在无边的海洋里的求救者发现天边淡淡的帆点后的喜悦和激动的心情一样，马克思在经受了全面的精神危机后接触到黑格尔哲学，其兴奋之情也溢于言表：

“发现了最崇高的智谋，领会它深邃的奥秘，
我就像神那样了不起，像神那样披上晦暗的外衣，
我长久地探索着，漂游在汹涌的思想海洋里，
在那儿我找到了表达的语言，就紧抓到底。”③

“我们已陷进黑格尔的学说，
无法来摆脱他的美学观点。”④

当然，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态度并非没有保留，特别对黑格尔借以表达其思想的复杂形式和隐晦语言，马克思是指责的：

① 谢林的学生斯特芬斯教授讲授的“人类学”，其内容主要是具有物活论色彩的自然哲学。他同以探讨人类本质和本性为目的的德国传统的以自我意识为中心的哲学人类学有联系，但更具特色。当时的学者普遍相信，要掌握一种关于社会的理论，必须先弄明白构成社会的人的本质，马克思所在的柏林大学，不止是法律系，神学、医学、哲学各系都开设人类学。

② 参见［德］H E 西格里斯特：《为人类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8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第 651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第 652 页。

"我给你揭示一切，我献给你的仍是一无所有！"①

马克思转向黑格尔哲学是自觉的、有目的的，而不是盲目的。他再次钻进"大海"，并不想"再练剑术"，而是想"把真正的珍珠拿到阳光中来"②。马克思惯于用革命的批判的眼光对待一切理论遗产。"凡是经不起我批判的东西就应该废弃，哪怕这种观点是代表公认的权威的。"③ 正是青年马克思所具有的这一革命的批判精神导致了以后他同青年黑格尔派的彻底决裂，并最终超出了黑格尔哲学。

二、对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批判考察

黑格尔死后出现在德国哲学舞台上的青年黑格尔派运动，曾经导演了不少有声有色的剧目。除了把高悬于半空的黑格尔哲学引向广阔的社会领域、并运用它来反对封建束缚这一历史功绩外，他们在其他具体哲学领域，尤其在宗教哲学和历史哲学领域中，也取得了非同一般的成就。施特劳斯对原始基督教史的考证，布•鲍威尔对复类福音书作者的福音史批判，契什考夫斯基的历史哲学观念等等，在思想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学术地位。他们对古代哲学的研究，也是很有特点的。当时，青年黑格尔派最为感兴趣的，是古希腊的伊壁鸠鲁学派、斯多葛学派和怀疑论哲学。布鲍威尔就研究了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论派哲学同基督教的关系，而弗•科本在他1840年出版的献给卡尔 马克思的著作《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反对者》中，更把这三个流派看成是反映古代社会内在本质的哲学派别。青年黑格尔派热衷于研究这三个哲学流派不是偶然的，它们是受压抑的"苦恼意识"的产物。在古希腊极端缺乏民主和自由的政治生活中，它们只有借助于抽

---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65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5页。

③ 转引自H•E•西格里斯特：《为人类工作》，第8－9页。

象的哲学外衣来表达反抗现实的政治思想，这归根到底反映了当时社会矛盾。同时，青年黑格尔派在古希腊这些主张不为外物所动、以心灵宁静为最大幸福的哲学流派中也找到了与他们强调个性自由、强调自我意识相一致的共同语言。

青年马克思在这种精神氛围中对古希腊罗马哲学也颇为关注。早在特利尔中学读书时，他就接触过古代哲学史的著作。他在阅读了柏拉图的著作后，曾写下了“对一种更高本质的深切追求，是柏拉图在哲学上的重要贡献”① 的批注，这个评价是很有见地的。

从1839年起，马克思对西方哲学史又作了专门研究。他特别深入地研究了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主义和怀疑论哲学。马克思阅读了大量有关著作。1839年写下了七本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摘录了第欧根尼・拉尔修、塞克斯都・恩披里柯、普卢塔克、卢克莱修、约翰・斯托贝、鲁齐乌斯・安涅乌斯・塞涅卡、西塞罗等有关伊壁鸠鲁哲学的评述以及古代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等人的观点。不止如此，在1841年离开柏林之前，马克思还对近代许多著名哲学家如斯宾诺莎、莱布尼兹、休谟、康德、罗森克兰等人的著作作了深入研究，并写下了八本笔记、摘录。这些笔记和摘录涉及认识论、逻辑学、伦理学、宗教和本体论等有关问题。此外，马克思还参阅了欧塞比乌斯・培尔、给巴赫、奥古斯丁、费尔巴哈、西姆普利齐乌斯、斐洛波努斯等人的著述。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准备联系整个希腊思想来详细地分析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主义和怀疑论派哲学体系的相互关系，写一部哲学史专著。马克思在1841年3月完成的题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博士论文，就是这部未能完成的哲学史专著的

---

① 参见（东德）格尔德 伊尔尼兹和狄特 吕布克编：《马克思恩格斯论哲学史》，陕西人民出版社。

导论。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曾把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主义和怀疑论哲学视为仅仅高出感性，还没有达到理性认识水平的自我意识哲学。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也把三个哲学流派看成是“自我意识哲学家”，并且认为，在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论那里，自我意识的一切环节都得到了充分表述，“这些体系合在一起形成自我意识的完备的结构”①。一改黑格尔对自我意识哲学的轻视，马克思充分肯定了它们对于希腊生活和希腊精神的重大意义。马克思对自我意识哲学体系的重视和深入研究，不仅是出于学术探索的兴趣，而且主要是出于同普鲁士专制国家的政治斗争的需要。正如1857年12月21日他在给斐迪南·拉萨尔的信中所说的：“在古代的哲学家中……伊壁鸿鲁（尤其是他）、斯多葛派和怀疑论者，［我］曾专门研究过，但与其说出于哲学的兴趣，不如说出于［政治的］兴趣”②。

对于哲学史的深入钻研，使年轻的马克思认识到，把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等同起来是错误的，这是历史上一个根深蒂固的偏见。马克思指出，“黑格尔这样一个最早了解全部哲学史的人”③，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中，虽然大体上正确地规定了上述诸体系的一般特点，但他却不能深入研究个别细节，不了解它们之间的差别。

马克思还指出，不但黑格尔，古代不少哲学家也都歪曲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真实关系。学院派哲学家科塔认为，伊壁鸠鲁的物理学“大部分是重复德谟克利特的话”。西塞罗说：“伊壁鸠鲁在他特别夸耀的物理学中，完全是一个门外汉，其中大部分是属于德谟克利特的；在伊壁鸠鲁离开德谟克利特的地方，在他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9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2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29页。

想加以改进的地方，恰好就是他损害了和败坏了德谟克利特的地方。”普卢塔克在他的著作《科洛特》中断言：“伊壁鸠鲁从整个希腊哲学里吸收的是错误的东西，而对其中真正的东西他并不理解。”这种偏见影响深远。哲学史上人们一般都认为伊壁鸠鲁是德谟克利特的剽窃者。近代哲学家莱布尼茨还坚持说“我们关于这个伟大人物（德谟克利特）所知道的东西，几乎只是伊壁鸠鲁从他那里抄袭来的，而伊壁鸠鲁又往往不能从他那里抄袭到最好的东西。”①

马克思敢于突破历史上一切陈词旧说，不同意把亚历士多德之后的希腊哲学看作希腊哲学的衰退。马克思认为：“只是现在，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论派体系为人理解的时代才算到来了。”② 他指出，在亚历士多德以后，主要是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这一系列学派在其性质方面“较有意义”，“这些体系是理解希腊哲学的真正历史的钥匙。”③ 他坚决反对把伊壁鸠鲁哲学当作德谟克利特的物理学和昔勒尼派道德思想的混合物。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改变了历史上那种把自我意识哲学诸流派贬低为折衷主义的观点，彻底纠正了把伊壁鸠鲁的物理学和德谟克利特的物理学等同起来的历史偏见，详细地考察了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别。第一次深刻指出了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所具有的独特的革命精神及其深远意义，重新恢复了伊壁鸠鲁哲学充分的精神上的公民权，终于“解决了一个在希腊哲学史上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④。

博士论文不但是一篇学术性很强的哲学史著作，而且它也集中体现了青年马克思的革命民主主义的哲学观点。尽管它是马克思参加青年黑格尔派运动时期写的著作，但在主要之点上同其他

---

① 引文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96—19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8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88页。

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存在重大分歧。首先，和其他青年黑格尔派分子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主义不同，在政治观点上，马克思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当青年黑格尔派分子还在为刚兴起的资产阶级的利益鸣锣开道时，年轻的马克思已经开始把自己的关注倾向于全体人民的利益。其次，在哲学世界观上，青年黑格尔派分子满足于纯理论的批判，他们许多人在自我意识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从黑格尔倒退到费希特，从而把自我意识和现实、人和周围环境更严重地对立起来。而马克思却在吸收黑格尔合理思想的基础上重点论述了二者的辩证统一，这就找到了改变现存社会制度并对它施加积极影响的方法论原则，从而为科学阐明人在自然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准备。

青年黑格尔派分子所阐述的自我意识哲学，同古代的自我意识哲学有着思想上的远缘关系，可以说，它是古希腊自我意识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积极发展。青年黑格尔派着重探讨了自我意识哲学的“主观形式”。马克思对自我意识的阐发，为这种哲学提供了历史的和理论的论证。同时，马克思也高扬了自我意识的能动作用，把自我意识视为体现时代精神的“精神承担者”。

写作博士论文时期的马克思还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把自我意识当作决定一切的力量。列宁曾指出，在1841年马克思发表的论伊壁鸠鲁哲学的学位论文中，“马克思所持的还完全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观点。”① 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对马克思思想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这篇论文所体现出的马克思的独立创新精神。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写作博士论文时，“马克思已经精通黑格尔的辩证法，不过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还没有迫切感到要以唯物主义辩证法来代替它，但就在那时，他在运用黑格尔辩证法方面，而且就是在毫无疑问是黑格尔学说中最强有力的方面，即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第59页。

思维的历史方面，已经脱离黑格尔而完全独立自主了。”①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及其准备著作《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对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作了批判考察。并从一般原则和具体细节上分析了二者在自然哲学上的差别，在理论上发挥了自我意识哲学的主体能动性原则和意志自由观点。

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都是古希腊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原子论哲学的重要代表。他们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留基波所创立的原子论学说。在理论上伊壁鸠鲁接受并继承了德谟克利特原子论学说的基本观点，即用虚空及在虚空中运动的原子说明世界的产生和形成。不过，在原子论学说的具体见解上，二者又存在着重大差别。

在哲学发展史上，德谟克利特首次把拉克里特的“存在”与“非存在”的对立统一发展为“原子”与“虚空”的对立统一，第一次将“虚空”概念引入哲学体系，把原子和虚空看成构成万物的本体。德谟克利特认为，只有形状、次序和位置差别而没有性质不同的原子，在虚空的旋涡运动中产生了现象世界。

伊壁鸠鲁也用原子和虚空说明世界的产生。他认为，原子在形状方面的差别只是“数不清”而非“无限”，但每一形状的原子数目完全无限，这些原子由于虚空而运动起来。马克思指出，在原子论见解上，伊壁鸠鲁不同于德谟克利特的地方在于，伊壁鸠鲁没有把原子运动看作仅有直线式下落和诸多原子由于相互排斥所引起的冲撞这样两种形式，而更重要的是确立了原子偏离直线的运动这一运动形式。正由于原子的偏斜运动，才会有原子的冲击、排斥、遇合和碰撞，从而才会形成世界。马克思形象地说：“就像宙斯是在库列特的嘈杂的战争舞蹈声中长大的一样，在这里，世界就是在原子的斗争声中形成的。”②原子进入现实世界，下

①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8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23页。

降到物质的基础，成为充满多种多样关系的世界的负荷者。

在关于原子及其结构的看法上，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也存在差别。在德谟克利特看来，原子仅仅是一种“元素”，即物质。而伊壁鸠鲁却把存在于虚空中作为“始原”的原子和作为原理的“元素”区别开来。马克思把这种区别看作是伊壁鸠鲁对原子论的一大贡献。

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的根本分歧还体现在他们的哲学观点上。伊壁鸠鲁试图按辩证法的观点建构原子论。他把原子的“所有特性都规定成自相矛盾的”①，并且只在排斥和因排斥而产生的组合上应用原子的“重量”这一质的规定性。因此，他在原子概念内在矛盾的极端尖锐的情况下把握住了矛盾并使之客观化。而德谟克利特却只客观化了原子概念内在矛盾的一个环节，即原子概念的被动的单纯物质性规定。马克思指出，伊壁鸠鲁把原子概念中本质与存在的矛盾客观化了，因而提供了原子论科学，而德谟克利特从他的经验自然科学知识出发，只是提出了一些经验所需要的假设。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把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哲学一同视为独断主义哲学。马克思赞同黑格尔的这一观点。他指出，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两个人在每一步骤上都是互相对立的。一个是怀疑论者，另一个是独断论者”②。怀疑论者德谟克利特注重经验科学和实证知识，投身于经验知识的怀抱，是“哲学家中的科学家”③。而独断论者伊壁鸠鲁的目的不在于自然知识本身，他想寻求自我意识的宁静，因此，他轻视经验知识，安于从内在原则上汲取自己的知识，用感觉判断一切。这说明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的差别不仅限于理论范围，也表现在实践领域。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1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0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67页。

马克思对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关系的批判考察是深刻而独到的，并彻底改变了历史上人们对伊壁鸠鲁哲学的贬低和误解。马克思深入揭示了伊壁鸠鲁哲学所具有的独特革命意义，高度赞扬了伊壁鸠鲁所确立的原子偏斜运动产生的重大影响。“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说就改变了原子王国的整个内部结构。”①

古希腊原子论哲学在哲学和科学发展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作为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人类认识之网的网上纽结，原子论既是对早期希腊各派哲学的综合和系统化，也是对自然认识的深入。它把古希腊的唯物主义推向高峰。原子唯物主义确立了自然之自在性的观念，不再从外在于自然的意志那里理解自然，成为后来一切唯物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青年马克思对原子论哲学的专门研究，表明了马克思对唯物主义哲学的重视。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重点研究的是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在自然哲学上的差别，但马克思无论在博士论文中还是在后来的著作中，都没有否认二者在哲学理论上的一致性。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更倾向于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运动，但他也没有完全否认德谟克利特哲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给德谟克利特以很高评价，称赞他是“经验的自然科学家和希腊人中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② 马克思不否认伊壁鸠鲁对德谟克利特的继承关系，但他认为重要的还是二者的差别。1858年2月，在给拉萨尔的信中，马克思再次重申了自己的一贯观点：“对伊壁鸠鲁则可以详细地指出：虽然他是以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为出发点，但是他到处都把问题要点颠倒过来。未必应该责难西塞罗和普卢塔克没有理解这一点。因为像培尔，甚至像黑格尔本人这样的聪明人都没有想到。”③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1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4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29页。

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是机械的。自然事物的全部变化被归结为机械的位置运动，在方法上，宏观层次的质变被还原为原子层次的量变，世界的多样化最终被归结为同质原子的几何形状与形式结构的不同。从自然科学知识的要求出发，德谟克利特十分重视因果关系的必然性，在他那里，没有什么东西是任意的，一切都遵循必然性，为留基波所肯定的必然性范畴成了德谟克利特原子论得以建立的基石。尽管如此，这种具有机械性的原子唯物主义在对世界认识的合理性上却优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它坚决否定了任何神学目的，启导人们去认识物质世界本身固有的客观规律。罗素曾指出，原子唯物论的决定论"把人们引到了科学的知识"，而科学研究中的目的论却"把科学引进了死胡同"①。

青年马克思对古希腊哲学的专门研究无疑在他的思想发展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但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进程来说，重要的不是他的一系列见解在哲学史科学发展中包含了多少真理性的颗粒，而是马克思在对哲学史的专题研究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意向以及由此所确立的思想状况，它才是马克思最终完成其思想自我转折的内在根据。诚然，马克思在创建自己的学说时吸收了历史上不少优秀的认识成果，不过，无论多少优秀成果加在一起也产生不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独立的学说，马克思主义自有其特殊的逻辑。困难而有价值的也就是对这一逻辑的准确把握。

三、探求"定在中的自由"

马克思对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差别的分析没有停留在表面观点的对比上，而是深刻揭示了这种差别所具有的哲学和社会实践意义。

在马克思看来，德谟克利特的原子直线运动并没有能够真正

---

①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第 99、100 页。

实现原子的概念。处在直线下落运动中的原子，在它所描绘的直线中，丧失了个体性，只有纯粹空间的规定性，是单纯的物质规定和相对性定在。因此，原子的直线运动“是原子应该给予否定的定在”①。原子只有扬弃自身的相对性、物质性和原始存在，与另一他物发生关系，原子的质才能得以实现。而否定原子直线运动这一定在的另外一种运动形式就是伊壁鸠鲁的原子“偏离直线的运动”。在因偏斜而产生的排斥里，原子的概念得以实现。表现在直线下坠中的原子的物质性和表现在偏斜中原子的形式规定，都综合地结合起来了。所以马克思说：“原子偏离直线的运动实现了原子的形式规定，而这些相反的规定又被看成是直接相反的运动”②。

与此相联系，在必然性和偶然性关系的间题上，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也是对立的。他们各执一端。德谟克利特把必然性看作万物的主宰、命运、法律、天意和世界的创造者。一切事物所从产生的那个原子旋涡支配了一切。他曾经表示，宁肯找到一个因果联系的说明，也不愿获得波斯国的王位。而伊壁鸠鲁从自我意识哲学的根本原则出发，不承认必然性的存在。他说：“在必然性中生活，是不幸的事，但是在必然中生活，并不是一个必然性。”③ 在伊壁鸿鲁看来，承认了必然性就等于把人的独立和自由完全交给了命运。命运是最冷酷无情的必然性。人不是物理学家所说的命运的奴隶，一切并非由无情的命运决定。人是自由的。“通向自由的道路到处都开放着”，“在生活中谁也不会被束缚住，而对必然性本身加以制约倒是许可的”④。

把必然性和偶然性对立起来都是片面的。在这种对立中，马克思更倾向于伊壁鸠鲁对偶然性的看法，反对机械决定论。在命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1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13页。

③④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04页。

运面前无所作为是和马克思改造世界的一贯立场背道而驰的，也是和他当时对自我意识的重视相矛盾的。但是，他并不否认必然性。在对自然界的看法上，他更多地受黑格尔的影响，把自然看作是有理性的，并且试图用黑格尔的观点来解决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关系问题。

偶然性是伊壁鸠鲁居支配地位的范畴。马克思特别强调指出，原子的偏斜运动不是特殊的、偶然出现在伊壁鸠鲁哲学中的规定，而是贯穿在他整个哲学中的基本原则。马克思把原子偏离直线看作是原子的“规律”、原子的“脉动”和原子特有的“质”。他十分重视原子偏斜运动所具有的社会实践意义。认为“‘偏离直线’就是‘自由意志’”①，偏斜运动彻底打破了命运的束缚。只有在原子的偏斜运动中才体现了原子的真实的灵魂，即自我意识的绝对性和自由。

对必然性和偶然性的不同看法反映出对待个人命运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把一切都归结为铁的必然性意味着扼杀了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活力，把本来是支配命运的主体变成了被命运任意摆布的奴隶。伊壁鸠鲁用他那偏离直线运动的原子的重锤打碎了这条排斥人的一切能动性的铁链，给德谟克利特僵硬的自然界注入了生命和活力，恢复了人的能动性和自由。马克思赞扬他是希腊最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最先理解了排斥的本质”②。

在马克思看来，排斥是自我意识的最初形式。作为自我意识外化的原子，由于偏斜运动，由于排斥，就从自己的相对存在、从直线中解放出来，显现出自己的形式规定，即自我运动，从而实现了纯粹的自为存在和不依赖于直接定在的独立性，实现了原子概念所包含的矛盾。

马克思进一步发挥了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说。如同原子只有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第 12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第 217 页。

在偏离直线的运动中、在相互碰撞中才能扬弃自身的相对性定在一样，马克思在论文中指出，一个人只有当他与另一个人发生关系时，他才不再是自然的产物。“所以一个人，只有当同他发生关系的另一个人不是一个不同于他的存在，而他本身，即使还不是精神，也是一个个别的人时，这个人才不再是自然的产物。但是要使作为人的人成为他自己的唯一真实的客体，他就必须在他自身中打破他的相对的定在，欲望的力量和纯粹自然的力量。”① 把自己封闭起来，割裂与社会其他成员的交往，就无法摆脱自然存在而实现社会存在，这些见解是深刻的。

马克思很重视伊壁鸠鲁原子偏斜运动对确立人的自由观念所具有的重大意义，赞同他对德谟克利特宿命论的否定。但马克思不同意伊壁鸠鲁把自由理解为脱离外在世界的自我意识的宁静。伊壁鸠鲁是自我意识哲学家。他强调遵循个别性的原则，把心灵的宁静视为最高目的。自由被当成了不受任何外在对象牵累的任意性，内心的恬静就是一切。无所适从，没有所求是其根本特点。这实际逃避了现实生活，完全遁入了内心空虚的精神世界。马克思是不赞成这种自由的。他批评说：“抽象的个别性是脱离定在的自由，而不是定在中的自由。它不能在定在之光中发亮。”②

马克思用黑格尔的“定在”概念说明人的自由，使人的自由具有了更多客观规定性。黑格尔的“定在”是存在论中一个重要范畴。“定在”是“存在”的发展，又是向“自为存在”的过渡。“定在”是“限有”，是具有“规定性的存在”③，是“有与无皆被扬弃于其中的统一”④，而不是空洞抽象的孤立存在。马克思所说的“定在中的自由”，实际是说，人的自由存在于人的社会联系中，不是任意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第 21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第 228 页。
③ 黑格尔：《小逻辑》，第 202 页。
④ 黑格尔：《小逻辑》，第 200 页。

马克思不满足于与现实相对立的自我意识的内心宁静，主张在与现实的对立统一中充分实现自我意识的力量。他用哲学的偶然性概念有力地论证了自己的民主主义的政治观点。马克思不认为个人在坚硬的必然性“这个大力士面前只是一偶然无力的东西”①。他重视的正是人的主体的能动性和自由，坚决否定非人性的神性，不承认在主体之外有所谓能决定人一切吉凶祸福的“命运”存在，人们臆想出来作为外在力量支配自己的“命运”，如黑格尔所说，是“一种未被揭发的必然性”，是“完全非人格的、无自我的、盲目的。”② 在他看来，这些都是同自我意识的原则不相容的。马克思的以上思想是卓越的，它为其民主主义的政治思想提供了有力的哲学基础。

四、世界的哲学化和哲学的世界化，自我意识与具体现实的关系

“自我意识”是与“实体”相对立的概念。作为一对古老的哲学范畴，它是古希腊全部哲学所围绕的主题。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指出，“希腊生活和希腊精神的灵魂是实体”③。这是希腊哲学的优点，也是它的弊病之所在，它只和实体精神相联系，一开始，这种实体是自由的、活泼的，实体的内部生活是由他们的富有鲜明个性的认识直接构成的。后来实体则越来越观念化了。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对自我意识和实体作了系统的阐述，特别是具体分析了实体到作为人类精神的自我意识的发生史。自我意识是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核心概念。

马克思很重视自我意识的作用。和黑格尔一样，他相信自然的理性本质，并用自我意识说明自然的实在性。在马克思看来，伊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95页。
② 黑格尔：《小逻辑》，第30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63页。

壁鸠鲁关于原子的各种相互矛盾的规定不过是在矛盾运动中实现了的自我意识的特殊整体。他的原子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化身。“原子不外是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的自然形式。”因此，感性的自然也就是“客观化了的、经验的、个别的自我意识”①，是自我意识的感性存在、对象化和外化。作为自我意识化身的原子成了“自然界的实体”②。

马克思指出，作为一种意志力量，自我意识必然要与外在世界发生关系，变成实践力量。“一个本身自由的理论精神变成实践的力量，并且作为一个意志走出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转而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世俗的现实”③。显而易见，虽然马克思十分强调自我意识，但和青年黑格尔派其他成员的自我意识学说不同，马克思没有把自己限制在自我意识之中，他看重的是自我意识与现实、哲学和世界、人和自然的联系。鲍威尔反对施特劳斯缺少生命力的“实体”，但他却既“攻击存在于人之外的自然，也攻击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本身”④，把自己同自我意识混为一谈。“这种自我意识的本质不是人，而是理念”，是“人化了的理念”。它已经不再是人所具有的属性，相反，“人的一切属性就这样神秘地变成了想象的‘无限的自我意识’的属性。”⑤人和自然的关系被完全颠倒了。

而为马克思所重视的自我意识，并不是一个要吞并一切的赤裸裸的主观精神，实质上它是以思辨形式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理论表达，是在抽象形态上对人和自然真实关系的一种把握。在这里首次表露了后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提出的人的对象性活动的思想萌芽。马克思所阐明的自我意识，同独断论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3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2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5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80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76页。

哲学的“理性实践的自我意识”也是不同的。作为理性实践的自我意识，如黑格尔所说，不过是“思想以最确定的方式把握自己的最高点”①。马克思没有从和外在世界的对立中退回自身，只在自身中去寻求现实世界中已经再也找不到的和谐与平衡。他面向现实，面向世界，把自己的双眼投向了自然和社会，主张在和外部世界的作用中检验主体的能动性和力量。他的目的是“征服世界”②，从而理论地提出了实践问题。

马克思说：“哲学已经不再是为了认识而注视着外部世界；它作为一个登上了舞台的人物，可以说与世界的阴谋发生了瓜葛，从透明的阿门塞斯王国走出来，投入那尘世的茜林丝的怀抱。”③ 哲学不应脱离现实生活，它应“给现象打上它的烙印”④。

在哲学和世界的关系上，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⑤。哲学在世界化即在转化为行动的过程中就同生活结合成完整的统一体，实现了自己的彻底性。哲学的这种直接实现虽然从其内在本质来说是充满矛盾的，然而它却取得了具体形式，并与生活结合在一起，从而自我否定。哲学在其外部的实现中扬弃了自己内在的缺陷和错误，世界则因与哲学的结合而理性化。在相互作用中，哲学和世界不断克服自己的缺点，达到新的境界。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问题，实际上表现了马克思要按照理性原则对普鲁士封建制度进行改造的强烈愿望，也是他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一种思辨表述。

马克思把实践概念引入自己的哲学具有重要意义。有了实践观念，主体和客体、自我意识和外在的现实就找到了相互联系从而彼此制约的中介，为正确理解主体的能动作用开辟了道路。不

---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 3 卷，第 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第 189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第 135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第 258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第 258 页。

过，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的实践概念还没有超出唯心主义的界限。他仍然以观念为标准来衡量个别存在和特殊现实，认为“哲学的实践本身是理论的”①。但马克思在自我意识与外在现实、哲学和世界、人和自然关系上所表现出来的辩证法思想，推动了他最终走向辩证唯物主义，彻底实现世界观的转变。

五、发扬辩证法的革命因素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处处都闪耀着辩证法的思想光辉。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史上，博士论文所占的重要地位并不在于它提出了多少为自己所特有的辩证法原理，而是取决于马克思对辩证法实质的深刻理解，他在吸收运用黑格尔辩证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要把辩证法贯彻到底的独特革命精神，以及他对辩证法革命性的重视。

对于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向来是很注重的。他强调要深入阐发黑格尔体系的内在本质、真正精华，正确区别他的真正的哲学意识和现象学的主体意识。但马克思又从不迷信黑格尔的辩证法。博士论文就明确揭示了黑格尔哲学的内在缺陷，指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不彻底性和局限。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最终走向调和，在他的体系中表现为表面适应性的那种妥协的最深刻的根源“在于他的原则的不充分或在于哲学家对于自己的原则没有充分的理解。”② 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这一批评，是他思想不断深化的一个标志，比起其他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之内的所有争论都要高明。

彻底的辩证法是革命的。在《关于伊壁鸿鲁哲学的笔记》中，马克思对辩证法的革命性作了热情的颂扬：“辩证法是内在的纯朴之光，是爱的慧眼”，“辩证法又是急流，它冲毁各种事物及其界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第 25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第 257 页。

限，冲垮各种独立的形态，将万物淹没在唯一的永恒之海中。”①这既显示了青年马克思毫不畏惧的精神气魄，也标明他准确抓住了辩证法的内在实质。他把辩证法看作是人类认识史上所取得的最优秀成果。马克思说，辩证法是“精神花园中欣欣向荣、百花盛开景象的体现者，是盛着一粒粒种子的酒杯中冒出的泡沫，而统一的精神火焰之花就是从这些种子中萌发出来的。”②

对物质和运动、物质和时间的关系，马克思也作了精彩的阐述。马克思认为，无论德谟克利特还是伊壁鸠鲁，都没有能够解决时间和原子的关系问题。德谟克利特把时间从原子中排除出去，把时间规定为永恒的东西。马克思指出，尽管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都认为实体是在时间中形成的，这有其深刻的合理性，但同时也把时间实体化了，从而也就取消了时间概念，“因为绝对化了的时间已经不复是时间性的东西了。”③在马克思看来，感性世界是在时间中运动发展的。时间是永恒地吞噬着现实并给现实打上依赖性和非本质性烙印的本质之火，而不是实体的属性。他反对割裂时间和本质世界的联系。认为物质是在时间中永恒运动的。除非“从物质中抽掉时间的成份，物质才是永恒的和独立的。”④

马克思在分析伊壁鸠鲁的原子论时还运用了异化概念。伊壁鸠鲁的自我意识哲学是建立在个别性原则之上的。如马克思所说：“这个在抽象的个别性形式下的自我意识对其自身来说是绝对的原则，是原子论的取消和普遍的东西的有意识的对立物。”⑤原子的抽象个别性使它不能承认那标志原子真实存在的特质。它本质上是永恒不变的。但原子彼此之间又不是完全同它们的概念直接符合的，它们具有质的差异性。正是“由于有了质，原子就获得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44－14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4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3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29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42－243页。

同它的概念相矛盾的存在，就被设定为外在化了的、同自己的本质不同的定在。"[1] 具有质的规定的个别原子，集中反映了原子概念中所包含的存在与本质、物质与形式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它背离了自己的概念，另一方面它的本性又在它自己的结构中获得完成。现象世界正是从"完成了的并且同自己的概念异化了的原子"中产生的。于是，原子世界成了显现着的自然界的本质，显现着的自然界成了本质的自然界即原子的映象。这样，伊壁鸠鲁就把本质世界和现象世界统一起来了，因此，马克思说："只有在伊壁鸠鲁那里现象才被理解为现象，即理解为本质的异化，这种异化本身在它的现实性里作为异化表现出来的。"[2] 在从本质世界到现象世界的过渡里，原子概念所包含的矛盾达到了自己最尖锐的实现。

马克思这些分析，与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所阐述的自然界是"理念的异在或外在化"，理念的"退化"，是"在外在化的形式中"的理念、"存在着的理念"等观点没有任何质的不同。他对"异化"的理解还是建立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然而，透过这种分析马克思把握到了现象与本质、概念与内容的对立，并把存在与本质的矛盾当作异化的重要内容和异化发生的根本环节。

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上，马克思不但用辩证的观点来理解自我意识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而且把辩证法的革命精神贯彻到了社会和政治革命之中。马克思坚决反对半途而废的思想家。他认为，自我意识同社会实际生活之间的冲突，总是要达到这样的限度，那时，只有通过"泰坦式"的斗争才能得到解决。不能害怕斗争，只有经过斗争才能导向幸福时代。

辩证法不能只停留在意识形态之中，它的革命性不完全体现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1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31页。

在理论方面。重要的是面向现实，改造现实。马克思说，哲学为实现自己的冲动所鼓舞，当它作为意志反对现象世界的时候，它就“成为世界的一个方面”，“那本来是内在之光的东西，就变成为转向外部的吞噬性的火焰。” 现实才是哲学所把握的永恒对象。“自我意识永远具有一个双面的要求：其中一面针对着现实，另一面针对着哲学本身。”② 这表现出了马克思顽强的实践精神。

在辩证法问题上，马克思坚持了彻底的革命性，他对辩证法实质的理解同那些调和妥协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马克思坚决反对把黑格尔哲学体系绝对化，批判那种“热情地赞扬黑格尔的一切片面的说法”③。马克思赞同黑格尔所说的“科学不是某种现成的东西而是一种正在形成的东西”④的观点。在马克思看来，“质的任何差异都是飞跃”⑤，没有什么万古不变的东西。马克思这时的辩证法思想是唯心主义的，但他对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是革命的。

第二节　对黑格尔哲学信念的动摇

认识源自实践，思想之光需要生活激流的碰击。青年马克思思想转折的关键，是他离开平静的校园生活而投身于火热的现实斗争。《莱茵报》的报界生涯，给马克思世界观转变提供了理想的沃土，在这块世俗的天地里，有无数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和社会的问题不断向他袭来，迫使他去思考、探索、研究、开拓，同时也使他怀疑、苦恼、彷徨、呐喊。所有这些矛盾综合的结果，使马克思开始冲破旧的传统观念的樊篱，走出黑格尔哲学的迷宫，而开辟一条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唯物主义新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第 25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第 259 页。

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第 257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第 246 页。

一、卷入现实斗争的旋涡

40年代初，德国资产阶级有了长足发展。随着它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势力的增长，它需要有自己的舆论阵地，《莱茵报》作为德国资产阶级利益的最初表达者便应运而生了。

在此之前，德国自由主义思想没有发表的园地，只有通过普鲁士境外的报纸如《曼海姆晚报》、《莱比锡总汇报》等传播。普鲁士报纸慑于书报检查机关的控制，避而不谈政治，只能给读者提供一些毫无意义的报道或无聊的谐谑之谈。形势的发展，要求改变这种不合时宜的舆论环境。在德国，第一个公开而大胆地出来保卫自由主义思想的是《科尼斯堡文学报》。但这家报纸基本上以知识分子为对象，而即将问世的《莱茵报》则力图公开捍卫莱茵工商业的利益。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简称《莱茵报》，是1841年9月由科伦富商康普豪森、奥本海姆等人在合股接办奄奄一息的《莱茵总汇报》的基础上创办起来的，1842年元旦以新的名称出版。当时《莱茵报》的资产阶级反对派立场并不鲜明，因而得到政府的支持和协助，同时政府当局也企望它支持政府的政策，反对教皇至上论者及其喉舌《科伦日报》。只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特别是马克思的积极参与，《莱茵报》的革命倾向和激进的政治观点才日益显露出来。

马克思同《莱茵报》有密切的联系。在《莱茵报》筹建始初，他便结识了参与该报筹备的荣克和赫斯，他们对马克思的才能非常赏识。《莱茵报》的首任主编是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斯特的学生赫天铿。他试图把报纸办成温和的自由主义的机关报，于是便同持激进倾向的荣克和赫斯等人发生了冲突。在赫天铿辞职后，由于马克思的推荐，因激进观点而被解除了中学教师职务的鲁滕堡担任了报纸主编。尽管鲁滕堡不能胜任此项工作（马克思也曾为之深感不安），然而，从这时起，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和持激进观

点的人便成为《莱茵报》的主要撰稿人，并左右着报纸的方向，从而使报纸的性质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特别是从1842年10月15日马克思继鲁滕堡任《莱茵报》主编后，该报的革命民主趋向愈来愈明显，它竭力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奔走呼号。

报界生活对于刚刚走向社会的青年马克思犹如一所政治大学校。这里，有许多复杂而又敏感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促使马克思去思考，去探索，社会不平现象激起马克思的无比愤懑，劳动群众的苦难生活引起马克思的极大同情和关注。他开始放弃纯理论问题的研讨而转到现实的、具体的政治问题上来，以饱满的战斗热忱投入现实生活的激流，同时又极其清醒地意识到面临的严峻现实和艰巨任务。诚如他在给卢格的信中所说的那样，“不要以为，我们在莱茵省是生活在一个政治的埃尔多拉多①里。要把《莱茵报》这样的报纸办下去，需要最坚强的毅力。”②

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在参加《莱茵报》后，便都立刻着手给该报撰稿，为之而进行战斗。马克思从1842年5月起为《莱茵报》撰稿，使该报的战斗力显著增强。他原来计划对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作全面的批评，以便证明它为什么不符合人民的愿望，为什么不能体现普遍利益原则，同时揭露政府的政策。他试图先讨论出版自由问题和“大主教问题”，即政府和科伦大主教之间的纠纷问题，然后再对省议会的社会立法以及关于林木盗窃、禁区狩猎和分割地产的法律进行批判性的分析。但是，马克思的计划并没有完全实现。在他预想发表的文章中，只有关于出版自由和林木盗窃法的文章发表出来，关于普鲁士政府与大主教的冲突的文章未被书报检查所通过，其余的根本就没有动笔。此外，马克思还深入农村，进行社会考察，撰写政论和评论文章，并同《科伦日

---

① 意为政治乐园。——引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29页。

报》等反动报纸展开论战。青年马克思的文章，犹如匕首投枪，深深刺痛了敌人，使反动当局颇感震惊，同时也大大鼓舞了为自由民主斗争的人们。马克思的战友们对这些文章更是称颂备至，如卢格在《德意志年鉴》上写道，“从来没有人说出，甚至也不可能说出任何比这些文章更加深刻、更加论据充足的意见来”，“我们应该为这种完美、这种天才、这种善于把那些依然经常出现于我们政论中的混乱概念整理得清清楚楚的能力感到庆幸。”①

为了办好《莱茵报》，使之真正成为革命民主派的舆论阵地，马克思呕心沥血、发奋工作，在两条战线上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一方面，他要反对反动的封建势力及其舆论工具对自由民主运动的扼杀；另一方面，还要反对这个运动内部的极端分子的“左”的行为和愚蠢之举给报纸造成的危害。

首先，马克思坚决捍卫报纸有讨论任何问题的权利，不论是宗教的和哲学的问题，还是政治的问题，都应允许自由发表，政府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干涉。在当时的德国，最大的实践问题是政治，而在政治领域，首当其冲的是出版自由。因为没有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政治问题便无从谈起。《莱茵报》不仅是出版自由的捍卫者，而且也是实践者。它积极宣传自由主义思想，披露当时最敏感的现实问题，抨击现存制度和现行政策，把矛头指向普鲁士专制制度。《莱茵报》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反政府倾向，使普鲁士政府深感不安和痛恨。于是，他们加强了书报检查，在一般检查官检查之后，还要受到高级官吏即行政区长官的检查，并且还威胁说，《莱茵报》若不改变办报方向，就要把它查封。在这种极其严峻的形势下，马克思非但没有退却，而且竭力将《莱茵报》办成战斗的报纸。他利用每一个机会向反动的封建专制制度进攻，用种种迷惑书报检查机关的形式来巧妙地掩护自己的激进批评，从而使《莱茵报》得以继续存在下去。

---

① 转引自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Ⅰ，第365－364页。

与此同时，马克思还同《科伦日报》等反动报纸进行了斗争。该报的政治编辑、反动政论家海尔梅斯，对《莱茵报》进行了种种污蔑和攻击。在1842年6月28日的社论里，他指责《莱茵报》攻击作为国家基础的基督教，说它违背传统，竟然在报纸上讨论宗教和哲学问题，呼吁政府禁止这种讨论。他还诬陷《莱茵报》动机不纯，“它主要目的不是在教诲和启发人民，而是要达到其他另外的目的”。马克思驳斥了这种谬论，称海尔梅斯是一个“十分愚昧、庸俗和迂腐”的人，正当整个思想界力求摆脱书报检查制度的桎梏时，他竟然还呼神唤鬼地向书报检查制度求助，还硬要和它结成同盟。马克思揭露了海尔梅斯在国家问题上的反动立场，认为这种可悲的立场是和维护基督教国家相适应的。基督教国家是理性国家的对立物，它以基督教为精神基础，因此，必然禁止对宗教的任何批评。而现实的、理性国家，则是通过哲学的批判才得到发展的。

在同《科伦日报》论战中，结合对现实生活的体验，马克思大大深化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如前所述，马克思在黑格尔影响下，主张意识和生活辩证统一的观点。尽管开始他是唯心主义基础上理解两者统一的，但是，这种思维方法，有可能使马克思对哲学问题采取较为现实的态度，并促使他逐步转向唯物主义。马克思同当时德国哲学家一样，高估哲学对历史发展的作用，然而，与他们不同的是，他深深感到，德国哲学的致命弱点是脱离实际，陷入抽象思辨之中。它“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它不是通俗易懂的；它那玄妙的自我深化在门外汉看来正像脱离现实的活动一样稀奇古怪；它被当作一个魔术师，若有其事地念着咒语，因为谁也不懂得他在念些什么。”①这些论述，可谓是鞭辟入里，切中要害，道出了旧哲学的主要特征，预示了新哲学所必备的实践品格。

---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0页。

哲学要想对世界发生实际作用，完成自己的使命，就必须从纯思辨的天国降到现实的尘世。同现实接触，才符合于哲学的真正本质。哲学源自现实生活，真正的哲学家产生于现实斗争。“然而，哲学家的成长并不像雨后的春笋，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那种曾用工人的双手建筑起铁路的精神，现在在哲学家的头脑中树立哲学体系。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就如同人脑虽然不在胃里，但也不在人体之外一样。”①“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②。马克思的这个脍炙人口的至理名言，深刻地指明了真正的哲学对自己的时代、对自己的人民的依赖，同时也指出作为理论思维的哲学同人们的普通意识有原则的差别。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克思上述论述里，已开始把哲学思想同经济发展（如建筑铁路）联系起来，这对他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这是马克思能够冲破黑格尔唯心主义统治、求得自己思想发展的重要机制。

在上述思想的基础上，马克思又进一步阐明了哲学与世界的辩证关系。他说，“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③这是他对博士论文中关于意识与现实辩证统一思想的进一步发挥。马克思对哲学在各个时代的作用作了思考，提出如下著名论断：“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④。这就是说，哲学不是脱离现实生活的孤芳自赏的东西，它要深入现实生活，指导改造世界的活动，成为实践的哲学。同时，世界也并非与哲学相对立的，通过与哲学相结合，世界将成为合乎理性的世界。这里，马克思强调使世界合乎理性，显然还带有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色彩，但他突出了哲学对世界的改造作用和精神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0页。

②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

的能动性，有着重要的意义。

其次，为了办好《莱茵报》，马克思还同青年黑格尔派进行了斗争，直至同他们决裂。

如前所述，马克思曾积极参加过青年黑格尔派运动，与布鲁诺 鲍威尔等人过从甚密，但他们在哲学、宗教和政治观点上从一开始便存在着分歧。随着马克思深入实际生活，这种分歧不断扩大和深化，他们终于分道扬镳，走上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马克思沿着主体与客体、意识与现实辩证统一的方向，勇敢而又冷静地参加当时的政治斗争，研究复杂的社会理论问题，一步一步地走向唯物主义。与此相反，青年黑格尔派坚持应有和现有、主体和客体对立的观点，逃避和惧怕现实斗争，片面地鼓吹“批判”，试图通过“纯批判”来改变现存事物。1841 年底，在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分子成立了一个无神论组织，即“自由人”团体。其基本成员，除先前“博士俱乐部”的成员以外，还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批判的克 施米特（施蒂纳）、法赫尔、克 瑙威尔克等人。他们生活放荡不羁，思想空洞晦涩，在激进的言词下掩盖极其保守的思想倾向。从“博士俱乐部”到“自由人”反映了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蜕化趋势，它从一个曾经是进步的政治力量，完全沦为脱离实际、蔑视群众，醉心于抽象的哲学批判的庸人团体。

在宗教问题上，“自由人”仍持激进的批判的态度。然而，它依然死抱住黑格尔的国家观，相信普鲁士国家是理性的体现，其最高使命就是继续进行批判，反对国家的基督教性质，使理性得以实现。在他们看来，要在国家生活中确立自由原则，主要是通过宗教批判。这样一来，他们就把一切现实生活问题，都变成神学问题。与此相反，马克思则把对宗教的批判服从于迫切的政治斗争。针对“自由人”的观点，马克思强调，要“更多地联系着对政治状况的批判来批判宗教，而不是联系着对宗教的批判来批

判政治状况"①。同时，他提出一个深刻见解："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随着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灭，宗教将自行消灭"②。这不仅反映了马克思的宗教观，而且可以看出他哲学思想的深化。他认为，谈论哲学，用哲学来批判宗教，并不是挂着"无神论"的招牌，而是要切切实实地向人民宣传哲学的内容。

"自由人"继续对反动政治势力进行斗争，但也是以极端的面貌空谈批判。1842年3月29日，布鲁诺 鲍威尔被撤职，他们认为这是世界性的事件，是普鲁士反动政策的一个象征，于是动摇了对普鲁士国家的信心，并且使他们反政府的倾向和激进的政治情绪更加激烈。他们不仅对政治进行批判，而且对那些并非无条件地拥护自由的政派也展开了批判。他们在《莱茵报》连续刊载文章。批判"中庸之道"，批判"妥协者"，甚至打算批判那些"没有原则"的南德意志的自由主义者。在"自由人"看来，"中庸"和历史是彻底对立的。历史力图把原则贯彻到底，通过对立而发展自己；而"中庸"害怕原则，厌恶对立，总想保持中间状态。他们不去研究现存的事物和复杂的政治关系，一味空谈批判，否定一切，把这些概念完全变成只能"激怒庸人"、而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空洞词句。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有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他还指出："《论中庸》一文的作者号召进行批判；但是，一、我们都知道，政府怎样来回答这样的挑战；二、光是某个人屈服于批判，是不够的；问题在于他是否选择了适当的场所。"③ 可见，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不分场所、不分时机，空谈批判的做法是十分厌恶的。这样做，只会促使政府加强书报检查，使《莱茵报》处于更加困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3页。

难的境地，同时，也会把那些本属进步运动的成员或者是同情和倾向于这个运动的人，驱赶到敌人一边去。马克思已经清楚看到“自由人”愚蠢行为会给事业带来的严重危害。

为了制止“自由人”的愚蠢行为，当时持有进步观点的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卢格和海尔维格等人曾到柏林劝说“自由人”，警告他们切不可用轻率的行动损害了大家为之战斗的神圣的事业。“自由人”不仅置若罔闻，而且“对这一警告却报之以嘲笑”。布鲁诺 鲍威尔竟说，单从理论上消灭宗教和政治反动派便足够了，根本用不着用实际行动去消灭他们。他们所知道的就是“否定一切”。卢格认为，这种愚蠢行为，就如浪漫主义的空想一样，只是一种任性，一些十分可笑的东西。

1842年11月29日，马克思根据海尔维格给《莱茵报》编辑部的来信，发表了批评“自由人”政治立场和生活方式的短评。这更加激起“自由人”对马克思的不满。他们不理解马克思的观点和革命策略，指责马克思使《莱茵报》具有机会主义比质，给马克思加上保守的罪名，他们还狂妄地要马克思表明，在鲍威尔同卢格的争论中究竟站在哪一边。在对“自由人”的看法上，马克思与卢格是完全一致的。他同“自由人”的决裂已不可避免，梅因写给马克思的一封蛮横无理的信，更激化了他们之间的冲突。马克思考虑的是整个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利益，而梅因考虑的只是“自由人”这个小集团的利益。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信中，详尽地陈述了事情的原由。他说，“书报检查机关每天都在无情地摧残我们，报纸常常弄得我们几乎不能出版。因此 ‘自由人’的大批文章都作废了。不过我自己淘汰的文章也并不比1 报检查官淘汰得少，因为梅因一伙人寄给我们的是一大堆毫无意义却自命能翻转乾坤的废料……在鲁滕堡负责的时候，由于他毫无批判能力，又缺乏独立性和才能，这班人已习惯于把《莱茵报》看成是自己的唯命是听的机关报，而我则决定不让他们再像从前那样空谈下去。因此，把 ‘自由’——这种自由主要地是力图 摆脱一切思想，的自由

——的几篇毫无价值的作品去掉，就成了柏林上空阴云密布的第一个原因。”① 关于“自由人”论自由的作品，马克思坦率而尖锐地批评道：“这些作品不是从自由的、也就是独立的和深刻的内容上看待自由，而是从不受任何约束的、长裤汉的、而且是方便的形式上看待自由。我要求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②。基于这种认识，为了保持住《莱茵报》这个阵地，为了民主主义运动的利益，马克思回敬了梅因，给他写了一封措词相当尖锐的信，宣告了同“自由人”的决裂。

马克思同“自由人”的决裂，是有深刻的原因的。从政治上说，马克思坚持愈益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并由此而开始走向共产主义；而青年黑格尔派始终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表现了德国资产阶级的特殊的软弱性。从思想上说，马克思坚持意识与现实统一，认为思想乃是一种深刻的信念，它不可能脱离行动和实践，从而孕育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而“自由人”在反动势力的压力下，离开了积极的政治斗争，把批判、否定变成了目的本身，把思想、观念变成一种空洞的主观随意性，最后走上个人主义和极端唯心主义的道路。这种道路的分野，反映了他们世界观的根本的分歧。

在马克思的主编下，《莱茵报》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订户迅速增加。正如赫斯在12月6日致奥艾巴赫的信中所说的：“《莱茵报》的地位现在不管对读者来说，还是对政府来说都已经比较稳固了，不久之前我们和政府的关系还稍稍有些紧张，目前一切都很顺利，同时我们也没有损害自己的体面。”③ 然而，这只是暂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4－43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6页。

③ 转引自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Ⅰ，第446页。

时的现象。随着《莱茵报》的政治影响扩大和革命民主主义倾向的加强，使得它同普鲁士政府的矛盾也逐渐激化。尽管马克思采取了灵活的斗争策略，《莱茵报》还是未能逃脱被查封的命运。1843年1月，普鲁士内阁会议决定从4月1日起停止《莱茵报》的出版。《莱茵报》虽然只存在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但它极大地锻炼了马克思，对于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二、为出版自由而斗争

刚踏入实际斗争的马克思所遇到的第一个现实问题是出版自由问题。在德国，出版自由是政治生活中十分尖锐的问题，争取出版自由是争取其他一切自由的前提。“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① 推行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威廉四世，为了缓和矛盾，故意打出了自由主义的旗号，于1841年12月24日颁布了新的书报检查令，虚伪地重申切实遵守1819年10月18日的书报检查令，即立即取消出版物所受到的违背陛下意志的、不适当的限制。这个表面上反对加于写作活动的“各种无理的限制”的新检查令，得到了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的欢迎，他们幻想春天似乎真的回到每个人心间，自由的时代似乎即将到来。青年黑格尔派中的某些人物甚至公开表示相信，这个书报检查令会对德国政治生活的发展起无限的促进作用。但是，马克思却以其特有的洞察力发现了这个检查令的反民主、反自由的实质，写下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的评论文章，对书报检查制度和普鲁士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批判。

马克思揭露了普鲁士书报检查令的“虚伪自由主义”本性。它只制造改善的假象，而不从本质上去改善事物。检查令的制订者声称，书报检查中的非法行为和令人愤恨的现象，不是由书报检查制度，而是由个别检查官的品质造成的，企图把人们的注意力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94页。

从检查制度转移到个别检查官身上。马克思指出，把制度本身的客观缺点归咎于个别人，只不过是为了保存这个制度制造假象。“虚伪自由主义的表现方式通常总是这样的：在被迫让步时，它就牺牲人这个工具，而保全事物的本质——当前的制度。这样就转移了表面看问题的公众的注意力。”①

书报检查令所谓的“不得阻挠人们严肃和谦逊地探讨真理”。这实际上使书报检查官更加随心所欲地按照他们所理解的“不严肃”和“不谦逊”来压制和破坏出版自由。因此，这些规定从一开始就使探讨脱离了真理。“它是上司加于探讨的一种对结论的恐惧，是一种对付真理的预防剂。”② 马克思指出，与其说这是害怕虚伪的标志，不如说是害怕真理的标志。“真理像光一样，它很难谦逊”③。严肃和谦逊都是十分不固定的字眼。把可笑的事物说成是可笑的，就是严肃的，把虚伪说成是诚实就是不严肃。过分的严肃就是最大的滑稽，过分的谦逊就是最辛辣的讽刺。让人们“严肃”与“谦逊”地探讨真理，实际也就等于让人们的命运由检查官的脾气来决定，等于禁止人们去自由地探讨真理，等于把探讨看成是一种与真理相对立的东西，也就等于把人们的精神变成了“枯燥地记录真理的检查官”④。这实际就扼杀了自由，因而也扼杀了真理，因为自由才是探讨真理的必要前提。“哲学研究的首要基础是勇敢的自由的精神”⑤。

马克思强调写作风格的多样性，反对普鲁士书报检查令加于写作的种种限制。普鲁士政府不允许作者用自己的风格写作，怎么指示你，你就怎么说；命令你说什么，你就写什么。作者完全丧失了他本应拥有的对自己精神的自由支配权，自己没有权利表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9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12页。

露自己的精神风貌，只能按指定的表现方式写作。马克思尖锐指出，这不过意味着“强颜欢笑”。“风格就是人”，限制了作者的写作风格也就侵犯了人的权利。马克思说：“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① 每一滴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为什么就不能有多种色彩，而只准它产生一种色彩——官方的色彩呢？

马克思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上，从根本上否定书报检查制度。他认为，书报检查制度的骨子里隐藏着一种任何法律都无法医治的痼疾。问题并不在于个别书报检查官品质的好坏，“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②。这个见解大大超过了当时的一般认识。

马克思在《莱茵报》接触到莱茵省议会的有关出版自由的辩论的材料，进行了认真分析研究，进一步就出版自由问题发表了意见，深化了他对自由的认识。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于1841年5月23日至7月25日在杜塞尔多夫举行。关于出版自由的辩论，是由于讨论公布省议会记录问题和许多城市出现的关于出版自由的请愿而展开的。针对这个辩论提出的问题，马克思写了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第一篇论文——《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这是马克思为《莱茵报》撰写的第一篇文章，是马克思参加该报战斗的真正开端。

在这里，马克思首次探讨了社会物质利益，触摸到社会深层的东西，觉察到省议会辩论的背后深深隐藏着各种利益的对立。不同等级的思想和行动，原来都受着一定物质利益的制约。这种认识对马克思的传统世界观无疑是一次重大的冲击。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1页。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的思想中充满着深刻的矛盾，即理性与现实、传统与进步之间的矛盾。他的世界观转变过程是不断解决思想矛盾的过程。他虽然猛烈地抨击普鲁士的反动制度，不时显现出唯物主义的思想闪光，但总的说来，他的世界观还是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像整个黑格尔学派一样，他特别强调精神、理性的作用，认为这种精神"无所不及，无处不在，无所不知。它是从真正的现实中不断涌出而又以累增的精神财富汹涌澎湃地流回现实去的思想世界。"① 由此出发，他认为，法律不是植根于社会物质利益关系，而是源自人的自由本性。"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手段"，"恰恰相反，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② 只有体现自由精神的法律，才是真正的法律。在马克思看来，为物质利益斗争是粗陋之举，而为自由斗争才是高尚的。"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本质，因而也就是出版的类的本质。"③ "自由的出版物是变物质斗争为精神斗争"，而且使"斗争的粗糙的物质形式"获得"理想化"的体现。④ 轻视物质利益，重视思想观念，是黑格尔主义者的共同特征，也是当时德国民族的一个弱点，如果仅仅囿于思想的范围，对现实利益漠不关心，那末，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就会"在政治上毫无建树"⑤。而能否消除这种弊病，不仅取决于理论的进步，而首先取决于实践的发展。马克思当时所进行的政治和社会斗争，还带有唯心主义的性质，这是无庸置疑的。然而，从自由原则出发去批判普鲁士政府的书报检查制度，固然成效甚微，但仍有重要意义，即它深化了马克思的认识，使他开始看到自由不是抽象的，而是同一定等级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4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2页。

莱茵省议会由不同的等级组成，但它并不代表广大人民的普遍利益，而是捍卫封建贵族的特权，为其特殊利益进行辩护。在辩论过程中，不同等级的态度表现出明显的差别，反映了不同等级的利益。诚如马克思所说，“在关于出版的辩论中，特殊等级精神表现得无比明确而完备”，“某个集团的精神、一定等级的个体利益、先天的片面性都表现得极其强烈、凶狠，露出一副狰狞的面孔。”①还说，在这里，“实际上进行论战的是他们的特殊等级”②。

贵族代表根本不容许任何出版自由和思想自由，他们认为，实行最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出版自由是不合理的。他们对出版自由表示深恶痛绝和严厉的斥责，这种态度反映了“十分明显的诸侯的信念”③，完全符合神圣的精神，因为在神圣同盟时期，整个德意志民族遭受奴役，精神生活完全被窒息，人们不知道出版自由为何物。

贵族等级的辩论人表现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中世纪观点。他们为特权所作的辩护，放肆无礼，而又庸俗圆滑。在贵族等级看来，人民似乎还没有成熟到可以给予自由的程度，“由于这种人的不完善，那万恶所宗的妖女之歌对群众起着强大的作用”，就是说，出版自由对人的精神的完善和发展，不是起促进作用，而是起腐蚀作用。对此，马克思反驳道，“如果人类不成熟成为反对出版自由的神秘论据，那末，无论如何，书报检查制度就是反对人类成熟的一种最现实的工具。”④ 因为，“一切发展中的事物都是不完善的”⑤。要求完善才能发展，等于取消发展；要求完善才能存在，等于取消存在。按照这种逻辑，“人根本没有生存权利”⑥。书报检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60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0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1页。

制度只能扼杀人的发展。同时，这种庸俗的观点，必然陷入逻辑的矛盾。既然，一切都处于不完善之中，那末，为什么不完善的等级会议却要求完善的出版物呢？

马克思还驳斥了贵族等级的所谓出版自由造成道德败坏的观点，指出："起败坏道德作用的只是受检查的出版物。最大的罪恶——伪善——是同它分不开的……，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至于人民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①

马克思反对封建诸侯、贵族等级并不意味他完全赞成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市民等级也要求出版自由，但是他们把出版自由和企业经营自由混为一谈，或者说，把出版自由归结为行业自由。这种要求完全符合这个阶级的本性。马克思认为，这两者不是一回事情，不能把精神活动从属于经营的利润。作品就是目的本身，作家绝不能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手段。"作家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②。出版的最主要的自由就在于不要成为一种行业，如果诗一旦成为诗人赚钱的手段，那诗人就不再成其为诗人，而变成商人了。同时，马克思也看到，以行业自由为特征的资产阶级出版自由，并非是真正的出版自由。就以典型的资产阶级国家法国的出版物为例，它的自由决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虽然它不受精神检查，但是它却要受物质检查，即缴纳高额的保证金。"③这样的出版物，"被人拉出了自己真正的领域，引进了大规模商业投机的领域"④。在这里，马克思已经对资产阶级的出版事业和出版自由的实质有了初步认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7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87 页。

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77 页。

识。

马克思鲜明地赞扬农民代表的发言，称之为“绝妙的演讲”，“真正的历史观点”，认为“农民等级的几个议员的发言同省议会的普遍精神是完全背道而驰的”①。农民等级毫不隐晦地讲，“人类精神应当根据它固有的规律自由地发展，应当有权将自己取得的成就告诉别人，否则，清新的河流也会变成一潭恶臭的死水。”德国人民“需要的不是书报检查制度的精神钳子，而是使他们冲破麻木状态的刺激”②。可见，在这个问题上，农民等级具有比较彻底的态度和激进的反封建意识。但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省议会上这种英勇果敢的可贵观点，是多么孤立。因为，如上所说，省议会尽管有市民和农民等级的代表参加，但实际上贵族等级居多数，农民代表只能发出微弱的呼声。

考察莱茵省议会关于出版自由的讨论，是青年马克思第一次触及社会深层的东西，即触及到制约人们思想和行动的利益原则。尽管这还是初步的，而且他的总的世界观还是唯心主义的，然而，社会生活因利益的对立而激起的波澜，已经对他内心世界形成强烈冲击，悄悄地在改变着他的思想观念。

首先，在他的自由观上已经打开一条裂缝。马克思当时和其他黑格尔主义者一样，从理性出发来看待自由，认为自由是人固有的本性，“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并由此出发来考察出版自由问题。但是，现实生活的冲击，使他逐渐摆脱抽象的思辨，而开始触摸到自由的实际内容，看到自由是现实的，在不同人那里有着不同的自由。他说，“自由确实是人所固有的东西，连自由的反对者在反对现实自由的同时也实现着自由”，“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可见各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遍权利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9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94页。

而已。"① 现实中存在着各种自由，自由在不同等级那里有着不同的含义。普鲁士的诸侯、贵族等级，并不是反对一般的自由，他们反对的只是别人的自由，而维护自己的自由，即特权。这种认识对青年马克思有着重要意义，表明他不再把自由看成是抽象的东西，开始对它作具体的分析。

其次，在马克思思想中已产生了某些唯物主义的萌芽。在分析各个等级对待出版自由的态度时，他已经深深感到各个等级之间的对立，认识到德国的社会结构，探索这场辩论背后隐藏的各等级的利益。正是从这种不同的物质利益中，产生出各等级之间的差异和不同意见的分歧。他说，"在形形色色反对出版自由的辩论人进行论战时，实际上进行论战的是他们的特殊等级。"②还说，"在这里论战的不是个别的人，而是等级。"③把在省议会里进行辩论的人，不是看作孤立的个别的人，而是看做由一定物质利益维系起来的等级、集团的代言人，这种认识，显然已经孕育着关于个人、等级和利益之间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青年马克思已经捕捉到影响他整个思想进程的新的认识内容。

与此相联系，马克思进而认识到，省议会只是封建贵族享有的特权机关，不是人民代议制。它不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是与所代表者的意愿背道而驰。因此 "与其说省必须通过它的代表来进行斗争，倒不如说它必须同这些代表进行斗争。"④ 对于这种等级会议来说，自由这种人类最神圣的精神不过是"异国的"植物而已。"一切生物只有在空气流通的优良环境下才能繁茂，同样，真正的政治议会也只有在社会精神的最高保护下才能昌盛。"⑤ 就是说，只有具备自由的环境，代表能真正表现所代表的人的意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6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51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42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53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58 页。

才会产生真正的议会自由。所以，真正重要的不是乞求议会自由，而是为自由去进行斗争，马克思对等级会议的批判，实际上是对普鲁士封建国家制的批判。它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

马克思在《莱茵报》第一篇论文里所取得的认识，还是初步的。而且处处还表现出唯心主义和理性至上主义的色彩，然而，在当时的精神环境里，却给人以清新之感，给人以很强的感染力。马克思当时的战友卢格，对马克思的文章称颂备至，他在《德意志年鉴》上撰文说，“关于出版自由以及为保卫这种自由，从来还没有人说出，甚至也不可能说出任何比这些文章更加深刻、更加论据充足的意见来……我们真应该为这种完善、这种天才、这种善于把那些依然经常出现于我们政论中的混乱概念整理得清清楚楚的能力感到庆幸。”① 这并非过誉之词，这种说法恰好反映了马克思思想的逻辑力量和善于从复杂纷纭的事物中把握事物本质的能力。

三、对利益、等级和国家关系的初步探讨

在评关于出版自由的辩论的论文里，马克思还只是间接地触及到物质利益问题，而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的论文中，他已直接探讨了物质利益及其同等级和国家、法的关系，并且公开地捍卫备受压迫的劳苦群众的利益。这种探讨，开始动摇他对国家和法的唯心主义观念，促使他向唯物主义转变，并成为推动他不久以后去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初动因。

早在 1821 年 6 月，普鲁士法律就规定了有关盗窃林木的刑罚。后来，又不断作了有利于保护林木所有者利益的补充规定。但由于农民破产、生活贫困，林木盗窃案件逐年增加。到 19 世纪 40 年代，普鲁士政府审理的 20 万件左右的刑事案中，约有 15 万件

---

① 参见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 1 卷，第 363-364 页。

是属于盗窃林木和违反关于森林、狩猎和牧场的立法的“罪行”。但是，封建地主还是认为惩罚不严，于是，把一个更加严厉的新法律提交省议会审议，要求把捡拾枯树枝也列入盗窃林木的范围，予以法律制裁，莱茵省议会就此议题展开了辩论。这一消息传到全国各地，自然引起人们的严重不安。因为与出版自由相比，这个问题更加直接关系到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出版自由主要是在精神领域里驰骋，劳动群众可以漠不关心，而林木盗窃法则是与贫苦人民生死攸关的现实问题。

马克思在自己论文中，旗帜鲜明地捍卫贫苦群众的物质利益，猛烈抨击普鲁士的国家和法律制度。他公开申明，要“为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而揭露那些卑躬屈节唯命是听的所谓历史学家们所捏造出来的东西，他们把这种东西当做真正的哲人之石，以便把一切肮脏的欲求点成法之纯金。我们为穷人要求习惯权利，但并不是限于某个地方的习惯权利，而是一切国家的穷人所固有的习惯权利。”①

马克思首先从习惯权利为贫苦群众的利益进行辩护。他认为，自古以来，农民就有在森林里拣枯枝的权利。这是一种习惯权利，是合法的。“习惯权利按其本质来说只能是这一最低下的、备受压迫的、无组织的群众的权利。”②只是由于农民所处的无权地位，这种权利还没有具备法律的形式，但其内容同法律形式并不相抵触。因此，农民在森林里拣枯枝的行为并不是违法的。

与此相反，贵族的习惯权利则是与普遍的法律形式相抵触的，实际上是一种“习惯的不法行为”③。因为贵族等级的习惯权利，就是一种传统的违法行为，正如强盗的儿子抢劫并不能因为是他的家庭传统而宣告无罪一样，也不能因为一个人的违法行为已成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41－14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4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43页。

习惯就不再是不法行为。问题的实质在于，林木占有者的习惯权利其实是压迫贫苦人民的封建特权。

其次，马克思驳斥了省议会把拣枯枝视为盗窃林木的偏见，指出拣枯树枝与盗窃林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决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林木占有者占有的是林木，林木成为他们的财产，所以谁盗窃林木，谁就是盗窃财产。但拣枯树枝的情况恰好相反，因为林木占有者只是占有树木本身，而从树木上脱落下来的枯树枝已不属于树木的一部分，不再是他们的财产，所以，拣枯枝不能算作盗窃。法律应当真实地揭示事物的法的本质，应当区别不同的情况，如果完全撇开各种不同行为之间的差别而只给它们一个共同的定义，那就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是"在不应该用盗窃这一范畴的场合用了这一范畴"①。这样的法律，"就是撒谎，而穷人就会成为法定谎言的牺牲品了。"②马克思的论辩才能和逻辑力量，在这里得到充分显示。

再次，马克思还借助于自然界的现象为贫苦人民的利益辩护。他把拣枯树枝看成是自然界对于穷人的怜悯，并用自然现象来比附社会贫富对立的现象。他说，"自然界本身提供了贫富对立的例子，它提供的例子是这样的：一方面是脱离了有机生命而被折断了的枯树枝，另一方面是根深叶茂的枝干，……这是对贫富的自然描绘。人间的贫穷有同病相怜之感，它从这种感觉中导出自己的所有权；它认为，如果自然界的有机财富是早已肯定的所有者的财物，那末自然界的贫穷则是贫民的不定财物。在自然力的这一作用中，贫民感到一种仁慈的、比人类力量还要人道的力量。"③并且说，"这种自然力夺取了私有制永远也不会自愿放手的东西"④。马克思借助自然界的现象，谴责特权者残酷压迫贫苦人民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3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46－14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47页。

的不人道行为，表现了他对剥削制度的深恶痛绝。

从上可见，马克思为贫苦人辩护的立场是自觉的、公开的和鲜明的。但是，他更多的求助于法律，而不是求助于经济分析；求助于自然，而不是求助于对社会的深入剖析。这清楚地反映了开始摆脱思辨哲学的青年马克思所不可避免的思想局限。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分析这种特权的产生时，马克思第一次尖锐地指明了社会阶级的对立。他把历史过程划分两个基本时期：不自由的时期和自由的时期。在不自由的时期，即封建制度的时期，"人类史还是自然史的一部分"。马克思指出，"封建制度就其最广的意义来说，是精神的动物世界，是被分裂的人类世界"，这里"人类简直是按抽屉来分类的"。"人类就像分裂成许多不同种的动物群，决定他们之间的关系的不是平等，而是法律所固定的不平等。"① 在人类社会的这一时期，一个等级靠另一等级为生，"后者就像水螅一样附在地上，他只有许多只手，为上种人攀摘果实，而自身却靠尘土为生"②。马克思这时虽然还不可能从社会经济结构来揭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但他已经清楚地看出，由于物质利益的不同，社会分裂为相互对立的等级，而在等级之间存在着不平等和残酷的剥削现象。马克思对这种现象表示极大的愤慨，他痛斥那些不劳而获的剥削者说："在自然动物界中，工蜂杀死雄蜂，而在精神动物界中则恰恰相反，是雄蜂杀死工蜂——用工作把它们折磨死。"③马克思直接痛斥的是封建社会，实际上他批判的是一切剥削制度，他所说的历史的自由时期，实际是他所向往的不存在压迫和不平等的未来的理想社会。

这时马克思思想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他已清楚地看到物质利益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物质利益的差别使社会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利益原则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和国家领域，支配着人们的思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142 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143 页。

想和行动。但是，马克思对此问题的认识却是十分复杂的．就其总体来看，他的国家观还属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点，即把国家和法看作是理性的体现。他认为，真正的国家应该是普遍利益的代表，应该平等地对待所有的公民。法律“是事物的法的本质的普遍和真正的表达者”①，无论是林木所有者还是森林法违反者，都是国家的公民，都有权受国家的保护。

然而，现实生活同马克思的国家观是矛盾的。通过林木盗窃法的辩论，马克思清楚地看到，普鲁士国家并不代表所有公民的利益，而是维护林木占有者的利益，为少数特权者服务。马克思尖锐地指出，“国家权威变成林木占有者的奴仆”，林木占有者的利益“成为左右整个机构的灵魂”，“一切国家机关都应成为林木占有者的耳、目、手、足，为林木占有者的利益探听、窥视、估价、守护、逮捕和奔波。”② 在马克思看来，这样的国家不符合国家的概念，有悖于国家的本质。他在理论上仍然固守唯心主义国家观，但在实际上已经深刻地洞察到国家的实质，看到了私人利益对国家和法的不可抗拒的决定作用。他说：“应该为了保护林木的利益而牺牲法的原则呢，还是应该为了法的原则而牺牲林木的利益——结果利益占了法的上风”③。由此可见，现实生活、人们物质利益的冲突，给马克思的唯心主义国家观以极大的冲击，使这种国家观的理论基础开始发生根本动摇。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关于私人利益对国家的支配作用的认识，不仅仅是对个别现象的直观，而是开始进行带有普遍性的概括，把经验的事实，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他说：“在西伯利亚也像在法国一样，林木仍然是林木，在堪察加也像在莱茵省一样，林木占有者仍然是林木占有者。因此，林木和林木占有者本身如果

---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3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6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79页。

要颁布法律的话，那末这些法律之间的差别将只是它们颁布的地方和书写的文字不同而已。”[1]就是说，凡是在利益对立的地方，林木占有者和特权者所制定的法律，不论形式上有多少差异，其本质总是一样的，都是为了维护某种利益。

总的看来，马克思这时的思想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深深感到物质利益对国家和法的支配作用，物质利益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这是马克思的最可宝贵的思想。但另一方面，他又从黑格尔唯心主义国家观出发，斥责“怕见天日的私人利益”，把私人利益对国家和法的支配作用，咒骂为“下流的唯物主义”，是“违反人民和人类神圣精神的罪恶”[2]。这表明，马克思在国家观上已获得某些正确的认识，但又不自觉其为正确。他的思想发展，还处于朦胧的盲目状态。

几个月后，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他的思想又取得了新的进展，触摸到由社会利益形成的客观社会关系，对国家和法的活动起着制约作用。

摩塞尔地区的葡萄酒业，大量破产，农民生活异常贫困。《莱茵报》记者彼捷尔·科布伦茨为此撰文作了报导，引起政府的不满。莱茵省总督冯·沙佩尔指责文章的报导失实，是对政府的恶意中伤，并要求记者用具体事实作出答复。科布伦茨迫于压力，致信马克思表示“离开战场”。于是，马克思起而应战，并为摩塞尔记者进行辩护。他收集了丰富的材料，阅读了大量文件，对摩塞尔地区农民贫困原因作了考察，驳斥了沙培尔的指责，通过论战，马克思加深了对国家问题的理解。

普鲁士当局的官僚们，极力为自己辩护。他们认为，摩塞尔地区酒农的贫困状况同政府当局的管理毫无关系。他们贫困的原因不在政府治理范围之内，而在客观的自然条件，或在与政府当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8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80页。

局无关的个人生活条件和某种偶然事件。总之，他们极力掩盖造成贫困的社会原因，掩盖官僚制度的罪恶。针对上述种种遁辞，马克思指出，“不能想象摩塞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和政府无关，正如不能认为摩塞尔河沿岸地区位于国境之外一样。”① 因为，这种贫困状况，“同时也就是治理的贫困状况”②，它集中反映了政府的管理原则同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内在于官僚制度的本质，即使政府当局具有最善良的意图，它还是不可能摧毁“这些本质的关系的势力”。“这些本质的关系就是管理机构内部的官僚关系以及管理机构和被管理机构之间的官僚关系。”③ 政府官员就是以这种历史地和现实地形成的关系中进行活动的。值得重视的是，马克思在这里提出这样一个重要思想，即“官僚等级制度的法律和那种把公民分为两类（作为治人者的积极的、觉悟的公民和作为治于人者的消极的、不觉悟的公民）的理论，是互相补充的。”④ 官僚制度的特点就在于脱离“治于人者”的广大公民，只是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内容和矛盾表现形式罢了。

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这种矛盾，认为这种矛盾不是由个人意志决定的，而是由客观关系决定的。他阐明了如下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决定私人和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一样地不以他们为转移。只要我们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客观立场上，我们就不会忽此忽彼地去寻找善意或恶意，而会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在活动的地方看到客观关系的作用。”⑤ 在这里，马克思强调了观察问题的客观性，强调了在人的活动背后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1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2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29－23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26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16页。

观的社会关系的作用，看到了客观关系对国家的制约性。马克思从前认为私人利益对国家和法的制约不符合国家的本质，现在则探求国家制度和管理原则产生的客观基础，提出客观关系对国家生活的决定作用，这无疑是向历史唯物主义迈进了一步。尽管由于马克思当时没有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还不理解这种客观关系的经济内容，特别是不理解生产关系对这种客观关系的决定作用，因而它仍是一个抽象的、原则的提法。但是，这个认识为马克思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确定了方向。

第三节　对黑格尔哲学的第一次“倒戈”

恩格斯曾经写道：从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过程中还产生了另一派别，这个派别主要是同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1843年3月马克思退出《莱茵报》，至10月赴巴黎前，半年多时间大部在克罗茨纳赫度过的。这期间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新的变化：通过总结、消化《莱茵报》时期的经验，深入地研究历史，他对黑格尔哲学最保守部分——法哲学进行了第一次系统批判。这一研究批判的结果，是保存下来的十印张手稿和五个笔记本①，它为不久后马克思实现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思想转变奠定了基础，也为划时代的哲学贡献——唯物史观的创立铺下了第一块基石。

一、“苦恼的疑问”和解决的途径

《莱茵报》被查封和马克思退出该报，是马克思同普鲁士专制

---

① 十印张手稿1927年由苏共中央马恩研究院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题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发表，据苏联学者考证，其写作时间为1843年春夏之季。另题为《克罗茨纳赫笔记》的五个笔记本，是马克思对24本历史、政治著作的研究摘要。

制度不妥协斗争的结果，某种程度上就预示了马克思将要走的道路。早在 1 月 25 日，即查封《莱茵报》的消息到达科伦当天，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信中就写道：“我一点也不惊奇。您知道，我从一开始就对书报检查令抱着怎样的看法。这件事在我看来不过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我把《莱茵报》的查封看成是政治意识上的某种程度的进步，因而便辞职不干了。而且，在这种空气里，我简直感到窒息，就是为了自由，这种桎梏下的生活也是令人厌恶的；我讨厌这种小手小脚而不是大刀阔斧的做法。伪善、愚昧、粗暴的专断使我感到厌倦，委屈求全、周转应付和字斟句酌地对付吹毛求疵的生活我也过够了。……在德国，我已再没有什么可为，在这里，人们自己作贱自己。”① 普鲁士政府剥夺了马克思合法斗争的手段，为了不“自己作贱自己”，马克思希望侨居国外去，寻找一个新的能公开自由发表自己政治见解和哲学观点的阵地。在新的地址没有选好前，马克思暂回到克罗茨纳赫岳母家中。此间马克思还回绝了已故父亲的朋友、高等法院枢密顾问埃塞尔关于邀请马克思在普鲁士政府机关任职的建议，全力以赴地投入自己新的工作。

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的工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为计划中与卢格合办的新杂志做必要的准备工作。二是对已积累下的经验进行理论上的认识和概括。

马克思是带着z 徨的心情，同时仍保持着对真理的执着追求离开《莱茵报》的。他 15 年后在总结这一思想进程时写道：“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1842— 1843 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分析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7 卷，第 440 页。

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① 正如马克思说明的，他一开始就与其他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不同，更注重政治批判和结合实际。《莱茵报》时期的政治——思想斗争虽然集中在国家和法问题上，但却是紧紧围绕着现实生活而展开的。对现实的国家和法的认识，特别是对构成它的基础的社会物质生活的深入了解，使马克思获得了“法学或哲学上都不曾提供的新观点”②，这些观点与支配着他的唯心主义哲学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例如，在马克思原来接受的黑格尔哲学中，国家和法是普遍理性和自由的体现，国家作为“自在自为理性的东西”，其“目的就是普遍的利益本身，而这种普遍利益又包含有特殊的利益。”③ 黑格尔承认市民社会作为“需要的体系”，其私人利益之间存在深刻的矛盾，但是这种矛盾在国家中总能得到解决，总会达到“个人目的与普遍目的这双方面的统一”④。黑格尔对君主立宪制度的理想化，就是其保守性质的最明显表达。但是，马克思亲身经历的实践却一再地否定黑格尔这些说教：普鲁士法令中，书报检查成为一些人的自由，却“反对别人的自由”，因而以自由为基础的法律有时为“普遍权利”，有时则成为“特权”。私人利益的矛盾在国家与法中似乎也没有调和，甚至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了保持私有者的利益而牺牲法，国家和法沦为“私人利益的工具”。实践所提供的自发的、零星的唯物主义思想尽管还没有上升为自觉的系统结论，却促使马克思对已开始突破的唯心主义基础本身进一步产生怀疑和动摇。马克思思想上的矛盾，实际上也是黑格尔哲学同现实的矛盾，对苦恼疑问的反思及对矛盾的解决，便首先指向对黑格尔哲学的自觉清算与批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7－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09页。

③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2页、第169、258页。

④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2页、第16、258页。

判。

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过程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对法哲学的批判则是对整个黑格尔哲学批判的突破口。马克思所以选择批判法哲学，这不仅是因为它是黑格尔哲学最保守的环节，最集中地表达了对现存国家与社会制度的唯心主义辩护，而且也与马克思本人思想形成的内在逻辑进程有关，即马克思是从国家和法批判开始，一步步深入到社会“物质生活关系”、“市民社会”批判的①，其间便是向自觉唯物主义的转变。早在《莱茵报》工作初期，1842年3月至8月马克思在信件中，便多次提到他在写作一篇关于对黑格尔自然法批判的文章。“主要内容是同君主立宪制作斗争，同这个彻头彻尾自相矛盾和自我毁灭的混合物作斗争。”② 这篇文章后来给了卢格主编的《轶文集》③，虽然具体命运不得而知，但可以看作是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开始。《莱茵报》上的文章，是马克思对现实的批判，其中涉及的法学问题却可以看作对黑格尔法哲学的进一步怀疑与批判。正是《莱茵报》的实践，使他从政治上的“厌恶”转入理论上的自觉清算，从零星的认识，转向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系统批判。

1843年春夏之季写于克罗茨纳赫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一书第260－313节的全面分析和批判④。黑格尔在这些章节中，主要讲述了国家法，其中包括王权、行政权、立法权等等内容。黑格尔的论述系统地表达了他的国家观，也最集中地反映出他的法哲学的神秘、保守的性质。黑格尔

---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21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4页。

④ 由于缺第一张手稿，马克思对260节的分析没有保存下来。但马克思写道：“上一节已经告诉我们，具体的自由在于私人（家庭和市民社会）利益体系和普遍（国家）利益的同一性（应有的二重化的同一性）”。说明马克思的分析正是从该节开始的。

在客观唯心主义立场上，把绝对精神的逻辑贯穿到法哲学中，认为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他从逻辑理念的单一、特殊、普遍三环节的统一，推论出作为君主、行政、立法三者统一的君主立宪制，“不是思想适应于国家的本性，而是国家适应于现成的思想。”① 黑格尔还把家庭和市民社会包含在国家概念的领域之中。国家作为现实的理念，成为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前提和目的，这样，他就把家庭、市民社会同国家的实际关系做了思辨的颠倒。在法哲学批判中，对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重新认识成了他注意的中心。黑格尔推崇君主立宪制，但在他理想化的制度中，王权是顶峰和起点，行政权则由担任官职的特殊等级行使（把国家瓜分给官僚），而立法权也以国家制度为前提。② 立法权包括三个等级，其中贵族等级具有“实体性的巩固地位”，而人民“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只是一群无定形的东西”③。黑格尔一再强调立法权的中介作用，而最终则掩饰现实矛盾并为现存制度辩护。正如马克思后来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完整的阐述；对这种哲学的批判不但是对现代国家和对同它联系着的现实的批判性分析，而且也是对到目前为止的德国政治意识和法意识的整个形式的最彻底的否定，而这种意识的最主要、最普遍、升为科学的表现就是思辨的法哲学本身。”“如果德国国家制度的［现状］表现了［旧制度］的完成，……那末德国的国家学说的［现状］就表现了现代国家的未完成”④。马克思的批判揭露了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同现实的尖锐矛盾，这一批判为深入社会基础本身的批判开辟了道路，也为马克思实现世界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67页。

②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73节、第287－289节、第298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08页。

③ 《法哲学原理》，第319页、32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9－460页。

观的转变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二、费尔巴哈在马克思世界观转变中的作用

在1843年马克思的思想进程中，还有两方面重要因素需要考察，一是费尔巴哈哲学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另一是马克思的新的历史研究工作。

恩格斯在讲到19世纪40年代德国共产主义者的情况时曾经写道，在公开拥护这种改造的人们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通过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克服而走向共产主义的。40多年后，恩格斯在《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又讲道："我认为我们还欠着一笔信誉债，就是要完全承认，在我们那个狂风暴雨时期，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他在某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①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也肯定这一点，讲到马克思从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又从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可见，如果说对黑格尔哲学的克服与清算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中的重要任务，那么其间费尔巴哈的影响及对这种影响的最终超越，则是另一部分重要内容。而这两部分内容又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

40年代初德意志意识形态史上，伴随普鲁士反动统治的加强，青年黑格尔派运动再次发生激剧的分化。"自由的、无限的自我意识哲学"曾因批判宗教，并试图消除黑格尔哲学政治上的保守结论同其革命辩证法的矛盾而名盛一时。但是，由于它们始终局限于唯心主义的思辨哲学基地，脱离现实社会条件，脱离甚至敌视人民群众，也最终离开了现实政治斗争。在这场动荡的变革进程中，费尔巴哈代表了摆脱黑格尔唯心主义，并建立同生活联系的新方向，这就是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或哲学人本学。

---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08、207页。

费尔巴哈作为唯物主义者，早在1839年《黑格尔哲学批判》一文中，便宣告同黑格尔哲学决裂。通过对宗教的世俗生活内容的研究，他在1841年6月发表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对宗教作了更深入的批判。费尔巴哈认为，宗教的本质不是早期基督教社会精神的实体属性（如大卫·施特劳斯认为的那样），也不是福音书个别作者的自我意识（如布·鲍威尔认为的那样），而是包含着精神和肉体、个体和类特质的完整的人的本质，不过它是被歪曲和异化了的。"上帝对人的爱——宗教之根据和中心点，——不就是人对自己的爱吗？不过这种爱被对象化为、被看作是至高的真理、人的至高的本质罢了"。因此"神学的秘密是人本学"①；基督教并不是精神发展的绝对阶段，而只是精神异化的暂时历史形式，消灭基督教将使人把自己的本质力量从虚幻的人那里夺回来还给自己，以人与人的现实之爱去代替上帝对世界及世界对上帝的神秘之爱。

《基督教本质》一书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甚至恩格斯在回忆中也写道："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也成为费尔巴哈派了。"恩格斯所肯定的，是费尔巴哈在思辨哲学长期统治之下重新树立了唯物主义的权威，并代表着与黑格尔哲学及青年黑格尔哲学相对立的新的方向。但是，当时大多数人包括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在内，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费尔巴哈在《德国年鉴》的文章和《基督教的本质》的再版序言中，又反复说明自己的观点。在关于《改革哲学的必要性》一文中，费尔巴哈还把对宗教的批判推广到世俗的政治批判上，认为只有废除政治异化，废除君主制，异化的扬弃才能完成。为此，费尔巴哈倡导创立一种新的哲学。1843年1月，他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中，以警句的形式阐述了自己关于新哲学的本质观点；半年后，又把"纲要"发展成

①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册第103、101页，下册第87页。

《未来哲学原理》(1843年7月)。在这两部著作中，费尔巴哈更深入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唯物主义信条。当时青年黑格尔派处于困难重重、危机四伏之中，费尔巴哈的思想代表了进步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新理论，并给处于“信仰危机”、歧途z徨中的青年马克思以强烈影响。

费尔巴哈新哲学的基本论点如下：

第一、人本学是被掩饰的神学的本质，而神学是思辨哲学的本质。正像神学把人的本质异化，即移置于人范围之外将其变为彼岸之神一样，思辨哲学也把人同其本质相异化，使人的思维脱离人，成为彼岸的绝对精神。黑格尔哲学是思辨哲学的顶峰，也是神学的最后避难所。由于“一般思辨哲学的改革宗教的批判方法，与宗教哲学曾经应用过的方法并没有什么不同”，因此，批判思辨哲学的方法与批判宗教用过的办法也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只要将宾词当作主词，将主体当作客体和原则，就是说，只要将思辨哲学颠倒过来，就能得到毫无掩饰的、纯粹的、显明的真理”①。

第二、哲学的开端不是神、不是绝对，不是存在的理念，而是实际的、有限的、确定的存在。“思维与存在的真正关系只是这样：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词。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然而存在并不来自思维。”而存在又以自然为根据，“作为存在的存在的本质，就是自然的本质……自然是与存在没有区别的实体，人是与存在有区别的实体。没有区别的实体是有区别的实体的根据——从而自然是人的根据。”②

第三、新哲学主要是关于人的学说，是人本学。这不仅因为“思维和存在的统一，只有在将人理解为这个统一的基础和主体的时候，才有意义，才有真理”③。而且还因为实在存在的人，“是自

①②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册，第102、115－116页。

③ 《未来哲学原理》第51节，第181页。

觉的自然本质，是历史的本质，是国家的本质，是宗教的本质。”①与思辨哲学把人的某种属性（如自我意识、需要）抽象化、逻辑化不同，费尔巴哈所理解的人是理性与感性本质的统一、肉体和精神的统一、具有心脏和思考的头脑。

费尔巴哈新哲学的核心思想，是用人的精神的异化来揭露神学和思辨哲学，指出它们的根本特点是歪曲了主词（人、存在）与宾词（思维、属性）的相互关系。他致力于把异化归结为它的现实基础——人和人类。但是他对人与其属性的认识本身仍然是抽象的。他过多强调人的自然属性而不顾其社会特性，特别是离开实践活动形式——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相互关系的统一——的生产方式，去看待现实人及其属性，因而对于表现着人（主词）的性质（宾词）的属性本身及其多样性、相互关系与历史暂时性等等方面都缺乏说明，这正是费尔巴哈关于人本质异化命题的根本弱点。

尽管费尔巴哈哲学包含着矛盾的观点，并对后人产生复杂的影响，但在1843年间，他对宗教和唯心主义批判的基本方向仍然是进步的和主要的，不少青年黑格尔派成员都接受他的观点。卢格作为《轶文集》的编辑，早在《纲要》发表以前许久便知道其内容，因而他在《德国年鉴》上发表的文章中，明显地接受了费尔巴哈的某些论点。他较早地注意到《纲要》中可直接用于分析政治现象的系统观点，但是还不明白其中蕴含的一般哲学意义。费尔巴哈对莫·赫斯的影响较深，后者把费尔巴哈的学说当作一种创造性的、用以解决迫切社会问题的方法。赫斯认为异化概念是费尔巴哈哲学的方法论核心，并加以推广：不仅颠倒了的意识（宗教、思辨哲学）是异化的形式，而且颠倒的社会存在（社会制

①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册，第116页。

度、金钱关系）也是异化的形式①，要消灭异化、必须消灭利己主义，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关系，使社会建立于利他主义和爱的基础上。赫斯采用异化观念直接解释社会问题，而人本主义影响又使他把社会问题最终变成伦理问题。只有马克思才真正领会了费尔巴哈哲学所强调的哲学唯物主义方向，并且贯彻到底，用于新的方面，分析国家和社会制度等复杂问题。

费尔巴哈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费尔巴哈批判宗教及思辨哲学时，把被颠倒了的主客体关系又颠倒过来的方法上。它为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国家观提供了借鉴，对整个黑格尔哲学的改造，也是从重新颠倒主客体关系入手的。例如，马克思写道："假如黑格尔从作为国家基础的现实的主体出发，那末他就没有必要神秘地把国家变成主体。……黑格尔把谓语、客体变成某种独立的东西，但是这样一来，他就把它们同它们的真正的独立性，同它们的主体割裂开来。……神秘的实体成了现实的主体，而实在的主体则成了某种其他的东西，成了神秘的实体的一个环节。正因为黑格尔不是从实在的对象出发，而是从谓语、从一般规定出发，于是神秘的理念便成了这类体现者。"②

费尔巴哈关于神学的秘密是人本学的观点，关于一切法律、意志、自由等在人之外，都是没有根据、没有实在性的思辨的观点，也影响了马克思。马克思在论及君主制与民主制的对立时也写道："黑格尔从国家出发，把人变成主体化的国家。民主制从人出发，把国家变成客体化的人。正如同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宗教

① 赫斯在1843－1844年所写的四篇论文《行动哲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唯一的和完全的自由》《论金钱的本质》中，应用异化概念批判资本主义，把费尔巴哈哲学同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费尔巴哈在宗教领域内发现并认为是万恶之源的异化现象，实际上具有社会的性质。如人们把自己的本质异化为所生产的财富，并受这些财富奴役。财富以金钱形式出现，金钱成为社会真正的神，人拜倒在自己异化了的本质金钱面前等等。他同正在转变中的马克思的思想，有一定相似之处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2－273页。

一样，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在民主制中，不是人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在这里人的存在就是法律，而在国家制度的其他形式中，人却是法律规定的存在。”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马克思在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中，也受到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异化的命题的影响。异化是黑格尔哲学的范畴，当费尔巴哈用人的异化批判宗教时，就包含有对绝对精神异化观的颠倒。费尔巴哈和赫斯用异化来直接说明社会问题，马克思则用“异化”来批判现实的政治和国家。他认为，政治制度到现在为止一直是宗教的领域，是人民生活的宗教，是同人民生活现实性的人间存在相对立的人民生活普遍性的上天，政治生活就是人民生活的经院哲学。君主制是这种异化的完整的表现，共和制则是这种异化在它自己的领域内的否定。在批判黑格尔所推崇的君主立宪制时，他还讲到：“我们的时代即文明时代，却犯了一个相反的错误。它使人的实物本质，即某种仅仅是外在的，物质的东西脱离了人，它不认为人的内容是人的真正现实。”②

费尔巴哈对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尽管这些影响中包含着消极的方面。还应指出，在马克思接受费尔巴哈影响的过程中，由于他们追求的个人及社会生活目标不同，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不同，使得马克思一开始对费尔巴哈就有所保留，并有所超越。1843年3月13日，马克思给卢格的信中写道：“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然而这一联盟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③ 费尔巴哈所关注是宗教的批判，但由于他把人与人的关系主要理解为自然关系，认为宗教是在意识中对人的自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4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42－443页。

然本质的歪曲，因此他把宗教归结为它的世俗本质时，并没有说明宗教产生及扬弃的真实基础。与此不同，更关注于政治批判的马克思从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条件方面看待人本质的歪曲，特别强调私人利益对人与人关系的破坏及其在意识中的反映，因此马克思认为必须“更多地联系着对政治状况的批判来批判宗教，而不是联系着对宗教的批判来批判政治状况”，“……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人间，随着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灭，宗教也将自行消灭。”① 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现实”是构成宗教的社会基础方面的内容，要远比费尔巴哈所说的丰富深入得多。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也是借鉴于费尔巴哈对宗教批判的唯物主义方法，对现实政治国家作批判性分析。这一批判的结果，不仅回答了费尔巴哈所不能回答的问题－－人们是如何把宗教幻想塞进头脑中的，为马克思“开辟了通往唯物主义”的道路，而且远远超出人本学唯物主义的范围，最终导致新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

三、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和《克罗茨纳赫笔记》

马克思在通过批判黑格尔法哲学而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转向唯物主义的过程中，还同时着手一项重要的理论准备工作，它不仅为马克思正在写作中的法哲学批判直接提供了经验材料和具体论据，而且为后来新的研究工作打下了稳固的基础，这就是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其结果是称为《克罗茨纳赫笔记》的摘录。

1843年夏季，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又称《1843年手稿》) 的同时，为了充分地占有材料、更深入地认识所研究的内容，他还大量阅读了在该地所能获得的历史和政治著作，并按照习惯做了九本详细的摘录笔记。这些笔记是

---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24、436页。

对24本著作及几篇文章的摘要,它们的作者有政治学的古典作家(马基雅弗利、孟德斯鸠、卢梭),也有近现代的德国、法国和比利时作家。其内容包括法国、英国、德国、瑞典、波兰、威尼斯共和国和美国的历史,时间则从公元前6世纪至19世纪30年代、涉及共2500多年世界史的事件。马克思摘要的题目所涉及的方面异常广泛,马克思本人在笔记中也只加进很少的注解和评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笔记是杂乱无章的,或仅仅是一些简单的经验事实。根据马克思选择的资料内容和做的注解与索引,可看出是在明确的观点支配下研究和对比不同国家和时期的历史,所摘引的材料也是明确地为他面临和提出的理论任务服务的。这就是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时所反复研讨的主题: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相互关系、前者从后者异化的历史过程。按照这一主题,全部笔记可分为三组相对独立的研究内容。

第一组内容,是关于所有制,它的产生和在历史不同时代(古代、封建社会、现代社会)的发展及不同形式,财产关系与政治关系的联系,前者对于国家和整个社会制度的影响。它们可以用第二册笔记中占主要地位的标题"所有制及其结果"来概括。

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关于欧洲主要国家封建社会历史的摘录占了相当的篇幅。马克思关注于政治史(王朝及国王更迭、外交冲突、战争等),并侧重于摘录政治变化对社会经济、社会法律过程的影响。例如,在第一、二册笔记中,马克思从德国历史学家克·哥·亨利希的《法国史》中详细摘录的内容,是封建社会的产生过程,封建财产的不同形式,封建国家及最重要机构的形成,以及各种法律关系和制度。马克思对卡洛林王朝的研究,证明了封建国家的军队体制同财产关系的直接联系。在第三、四、五

① 如第一册笔记中的内容提要和附注,第二册笔记中各著作的内容概要和进一步综合成的内容提要,第四册笔记中的简短"评论"和索引等。(以上参见新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通称"梅佳"第四部分,第2卷,第25、26、84、88、90、102-104、181、116-119、221页。)

册笔记中，马克思对英、法、德等国历史著作的摘录，主要集中于公共财产转变为私有财产、封建占有的不同形式和封建财产的结构、封建社会内部新的资本主义关系萌芽形式的产生等等。

第二组内容，以第四册笔记索引标明的“等级差别”，第二册笔记条目“贵族”、“关于特权的产生”、“特权的融合”、“市民等级”等为标志，主要是研究阶级的产生和阶级特权、等级特权的性质，以及封建等级向资产阶级社会阶级结构的过渡等方面的材料。经过对欧洲封建制度的研究，马克思获得了关于封建社会阶级、阶层及中间阶层划分的较明确认识。国王“以三重关系出现，对于他的扈从来说他是王侯，对于自由人来说是部族的首脑，……历来是最高的采邑主。”① 采邑主作为贵族等级，其根基是“恩赐地产或采邑制”，“采邑主的威望与价值 则’取决于采邑的数量大小”②。自由、独立的土地占有者的中间阶层，是随着封建制度的巩固加强而与其融合的。封建等级制的基础则是数量最大的但无权的依附农阶级。马克思还从不同著作中摘录了有关中世纪贵族和城市上层的地位与权利的论述，其中特别是有关特权的产生及其政治权力的根源。马克思确认，封建社会里“任何等级特有的荣誉与尊严都同它的等级、职业相适应”③。例如，在摘录法国历史学家比埃尔 达鲁的著作《威尼斯共和国史》时，马克思肯定作者关于“力量”和“卓越的才能”不是社会优先权的分析，将所摘段落概括为“在这里财产就是头衔”，并且不是一般财产，而是地产。在另一本有关《英国史》的摘录中马克思则肯定，“乡绅的地位密不可分地同地产的数量大小相联系”④。

马克思在研究封建社会结构发展时，还特别注意了英法两国封建社会内新的资本主义制度萌芽的产生。例如，他以法国为例探究了中世纪城市的产生与发展、资产阶级的形成及其为自己权

①② 新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部分，第2卷，第187、147、150页。

③④ 新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部分，第2卷，第156、88、139页。

利而进行的反封建斗争。在菲力浦二世奥古斯特时期,“两个阶级——采邑主和自由人——之间的中间等级,它依靠争取和接受的权利,同强权和独裁相对抗。市民取代了城市居民的地位,城市居民的状况经常是与农奴的状况相同;市民的自由得到承认,接受权利方面达到妥协(通常采用自我行动),这归功于他们的勇气和他们双臂的力量,或者说通过劳动而获得的货币手段”。这个等级唤起了“发明精神”,为“辛勤的手工业劳动和贸易”的迅速发展作出了贡献。[①]在研究英国的相同过程时,马克思还特别注意到王室为了王国政权的利益而支持城市市民反对大封建主的斗争。如约·林加尔德讲到,中世纪的英国在市民阶层与骑士阶层之间并不存在着固定的分界线,它们是彼此融合在一起的。拉斯贝尔格讲到,盎格尔萨克逊时期一个富裕的商人就可能成为贵族。马克思注明,在13、14世纪的瑞典,同样是“通过服军役而获得贵族的自由,逐渐使旧的氏族制度丧失了它的最富裕的成员”[②],即自由土地占有者阶层的一部分可以进入贵族的行列。在这部分,马克思还摘录了反封建的起义和农民战争的重要事件。

第三组内容,是国家与法的问题,即立法权与行政权,同专制主义形成相联系的官僚机构及其产生,官员与国王权力间的相互关系,国王的特权,代议制和人民主权等问题。它们以第二册和第四册笔记索引中马克思注明的小条目为标记,反映出国家与法的问题是马克思当时思考的中心。

马克思对法国、美国和德国的历史研究,了解到中世纪的等级代表制机构,是资产阶级国家代议制的历史先驱。在第一册笔记(摘录亨利希著作)中,马克思探讨了法国三级会议的产生、组成和作用方式。在第三册笔记(约·罗素英国宪法史著作摘录)和第四册笔记(约·林加尔德著作摘录)里,马克思通过英国议会

① 新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部分,第2卷,第150-151、210页。

② 新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部分,第2卷,第150-151、210页。

(欧洲最古老议会）产生与发展的例子，了解到英国议会的性质与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认识到欧洲先进国家议会制度的局限性，并把它看成拥有大量财产的社会阶层的政治统治形式。例如，在罗素的著作中马克思看到这样的事实，在18世纪末英国的“腐朽的市镇代表”制中，由84名财产主把157名代表派进英国议会，但当人民的看法同政府的看法不一致时，“下议院越来越多地与其说倾向于人民方面，倒不如说倾向于政府方面”①。在马克思对法国、美国、议会制度史的摘录中，也反映出这些制度的根本缺陷。对代议制研究的历史材料支持和证实了马克思在同期形成的思想：代议制是在城市与市民阶层的影响日益增长之下，在新兴的资产阶级同王权联盟反对封建主的斗争条件下形成的。它是进一步发展的立宪制，是争取政权或获得统治的资产阶级用以同封建制度相对立的国家形式。因此，它决不像理想化的代议制理论所宣扬的，是人民主权的表现，它所表达的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和物质利益。1843年9月，紧接着笔记写作后马克思给卢格的信中，便明确地表达了这一思想：代议制是同封建等级制相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关系，它是以政治方式表现了私有制的统治。②

在占有广博的历史材料基础上，马克思对以上三组内容——所有制、阶级和国家法关系的研究，为他正在写作中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提供了充分论据和新的启发。在这部“手稿”的后半部分，马克思对问题的论述变得更加清楚和具体，对市民社会及内部结构也越来越引起注意，并明确提出，在批判了黑格尔的国家学说之后，一定要“批判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看法”③，即进一步深入对市民社会的研究。在把“笔记”和“手稿”对比中，

---

① 新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部分，第2卷，第128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44页。

可以看到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联系。例如，笔记中对封建财产形式及政治关系的研究，对特权与阶级、政治权力根源的研究，支持和证实了马克思在“手稿”中的论断：“在我们一直在研究其结构的政治国家中，独立性就是以不可转让的地产为最高表现的私有财产”①，并且“国家制度在这里就成了私有财产的国家制度”②。又如，马克思在第四册笔记中，在摘录了列·兰克主编的《历史政治杂志》(1832年汉堡第1卷）的有关内容后写道：“在路易十八时代，宪法是国王的恩赐（钦赐宪章)，在路易·菲力浦时代，国王是宪法的恩赐（钦赐王权）……主语变为谓语，谓语变为主语，被决定者代替决定者，……因此，当黑格尔把国家观念的因素变为主语，而把国家存在的旧形式变成谓语时——可是，在历史真实中，情况恰恰相反：国家观念总是国家存在的 [旧] 形式的谓语——他实际上只是道出了时代的共同精神，道出了时代的政治神学。这里，情况也同他的哲学宗教泛神论完全一样……一切非理性的形式也就变成了理性的形式。但是，原则上这里被当成决定性因素的在宗教方面是理性，在国家方面则是国家观念。”③ 马克思在这里透过历史的假象，以讽刺的笔调批判黑格尔把国家观念变为主语的唯心主义(这同手稿中的论述一致)。同时马克思称为“政治神学”，是批判黑格尔的保守性质，即法哲学把过时的普鲁士国家形式描绘成与国家的“真正理念”相适应的形式。在“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展开这一思想，批判黑格尔把新时代的、已不具有旧政治意义的“等级”(市民社会领域的差异）同封建的旧的等级混为一谈，指出，这还是用新眼光来解释旧世界观的那一套非批判的神秘主义做法，这种非批判性，这种神秘主义，既构成了现代国家制度形式（它的等级形式）的一个谜，也构成了黑格尔哲学、主要是他的法哲学和宗教哲学的秘密。

---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78、38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368页。

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还有一部分贯穿于整个笔记的特殊内容，是马克思对法国革命史的研究，它不仅有助于马克思当时的研究工作，而且对《德法年鉴》乃至后来研究的一系列问题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例如，马克思研究革命时期与所有制问题相联系的平等问题，他详细摘引了从人权宣言到“忿激派”关于平等的要求、观点及各派间为此发生的尖锐争论。这些摘录以生动的材料表明了马克思最后达到的见解：资产阶级革命没有、也不可能实现真正普遍的平等和建立尊重人的社会。正是基于对法国革命分析所得来的认识，使马克思不久后提出“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并做出正确的回答。此外对革命中代议制、人民主权、虚假的“普遍利益”的认识等等，都为马克思认识和批判资产阶级革命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并转向共产主义奠定了基础。

《克罗茨纳赫笔记》是马克思完成世界观转变的直接理论准备工作。新编国际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者在概述“笔记”内容的序言中指出：“对世界史、对法国革命历史的研究，对于下述情况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前进到唯物主义立场，并从这种观点出发认清了历史的推动力，首先是关于私有财产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私有财产对于政治制度的发展、对个别阶级与社会集团的政策的影响，以及人民群众和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马克思研究了最近几个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深信资产阶级不能实现法国革命所宣告的一切人的自由与平等，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性质并得出结论：必须为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而斗争；这种新制度将消除现存社会的基本矛盾并结束对人的压迫。”

四、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基础

正是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影响下，借助于同期历史研究所获得的材料，马克思选择了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三篇第三章第一节“国家法”作为直接批判的对象，而其中的首要问题，是国

家和市民社会的相互关系。

黑格尔的法哲学是用思辨模式建立起来的。他把国家看作自在自为的现实的最高理性本质，它“把自己分为自己概念的两个理想性的领域，分为家庭和市民社会，即分为自己的有限性的两个领域，目的是要超出这两个领域的理想性而成为自为的无限的现实精神”①。从逻辑推演的排列上看，黑格尔把家庭和市民社会放在国家之前，但这只是现象和经验的关系，本质的关系则是，家庭和市民社会没有独立性，国家是它们追求的目的，它们是从属于国家的。国家的意志和法律对它们具有外在的必然性，家庭和市民社会的矛盾也只有在国家中才能得到解决。这样，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中，私人利益体系（家庭和市民社会）和普遍利益体系（国家）的关系是颠倒的，简言之，不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

针对着黑格尔这种头足倒置的观点，马克思在摘录了262节上述有关引文后写道：“这一节集法哲学和黑格尔全部哲学的神秘主义之大成。”“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在这里已经暴露无遗。”② 马克思从唯物主义立场上对黑格尔的神秘主义进行了剖析。他指出，在黑格尔那里，“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象的内部活动。”③“它们结合成国家，不是它们自己的生存过程的结果；相反地，是理念在自己的生存过程中从自身中把它们分离出来。”“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④ 与黑格尔的观点相反，在马克思看来，“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真正的构成部分，……是国家存在的方式。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

---

①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4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3、25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1－252、250－251页。

是原动力。”“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必要条件］。”① 理论上对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唯物主义颠倒，表明马克思较之《莱茵报》时期前进了，并且超过费尔巴哈。因为马克思是在政治——社会领域里，强调和发挥费尔巴哈所阐述的唯物主义，这就预示着将超越人本主义的狭窄范围。

马克思对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颠倒，包含着双重意义，其一，是对现实事物与理念、逻辑概念关系的颠倒；其二，是对国家和市民社会本身关系的颠倒。前一颠倒反映出对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实质与方法的认识和批判，后一颠倒则揭露出黑格尔哲学的保守性质，为马克思正确阐述二者相互关系的新原理开辟了道路。

马克思在简要地叙述了黑格尔关于家庭和市民社会向国家推移的论点后继续写道："这正是黑格尔在逻辑中所玩弄的那种从本质领域到概念领域的推移。……永远是同样的一些范畴时而为这一些领域，时而为另一些领域提供灵魂"。因此，"他不是从对象中发展自己的思想，而是按照做完了自己的事情并且是在抽象的逻辑领域中做完了自己的事情的思维的样式来制造自己的对象。"② 马克思揭示的，正是黑格尔颠倒现实事物与理念的关系、以逻辑理念代替现实、现实事物服从于逻辑推演需要的方法论特征，这种特征使整个法哲学带有脱离、歪曲现实的神秘主义。"在这里，注意的中心不是法哲学，而是逻辑学。……哲学的工作不是使思维体现在政治规定中，而是使现存的政治规定化为乌有，变成抽象的思想。在这里具有哲学意义的不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而是逻辑本身的事物。不是用逻辑来论证国家，而是用国家来论证逻辑。"③

---

①《马克思恩格思全集》第1卷，第251－25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4、25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63页。

"整个法哲学只不过是对逻辑学的补充"①。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尽管是从国家和法问题入手的，但是已深入到问题的最要害方面，即客观唯心主义的泛逻辑主义特征。马克思后来回忆说，"将近三十年以前……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②。正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观的神秘方面的批判，为不久后全面清算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打开了一个缺口。

对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颠倒，同时暴露出黑格尔哲学的保守性质：用国家理念来消融现实矛盾而证明现实国家的合理性。可是，如果说现实政治制度是不合理的，它并不符合关于政治国家（"作为一个总和的整体的国家"③）的原则，那么依据市民社会是国家前提的原理，其不合理性和异化的根源仍然在于市民社会，即"非政治"的生活组织形式本身。为此，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研究进到更深入的层次：探究市民社会同国家的对立，这一对立的历史性质、市民社会同国家结合的不同类型。这一课题的研究，成为马克思制定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决定性出发点。

在黑格尔哲学中，"市民社会"是指与国家或法律——政治领域相区别的、人的共同生活的经济——社会领域，实际上反映着以资本主义私有财产为基础的个人社会生活。同时黑格尔还常常用它来分析封建制度和古代社会的社会——经济关系。黑格尔虽然对国家和市民社会做了区分，并看到了二者的矛盾，但是对矛盾本身做了不正确的解释。马克思写道："黑格尔从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从现代的状况）这个前提出发，并把这种状况想象为理念的必然环节……。他把国家的自在自为的普遍性同市民社会的特殊的利益和要求对立起来。……另一方面，……他不愿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6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42页。

意市民生活和政治生活有任何分离。”[1]他希望在国家内部表现出国家的统一。由此马克思概括说：“黑格尔把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分离看作一种矛盾，这是他较深刻的地方。但错误的是：他满足于只从表面上解决这种矛盾”[2]。

与此相反，马克思是从历史发展方面来看待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离的过程与性质。这不仅为认识“现代国家”的性质、矛盾内容提供了基础，而且也为最终解决这种矛盾、论证现时制度的不合理性及变革要求提供了依据。马克思认为，在古代社会或“古代国家”，人民与国家之间存在着实体性统一，即国家还没有发展为与“人民”（实际为自由民）的日常生活有区别的特殊形式。由于市民社会，即从事生产活动的人还不是“人民”，劳动仅仅是奴隶的事情，所以市民社会是政治社会的奴隶。到中世纪，由于等级制度的存在，它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中起着相同的作用，通过等级的中介实现二者的同一，所以市民社会也就是政治社会，二者远没有分离。但是，由于每个等级所严格规定的职能，所以较之古代社会有了变化，人民成为不自由的人，国家职能也丧失社会职能的性质，成为某个等级的特权。伴随封建社会的解体，市民社会同政治国家、社会领域同政治领域分离开来。这种分离最重要的表现，是反映普遍利益的国家从私人利益占优势的市民社会中异化出来，成为虚幻的共同体（“官僚组织”），“政治国家是脱离市民社会的一个抽象。”[3]同时，“普遍事务”本身也成为个别特殊等级——官僚们的特权。由于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离，也意味人本身的二重化，即作为“国家的公民”和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市民”也是彼此分离的。市民要成为公民，要“获得政治意义和政治效能”[4]，必须“脱离市民社会，脱离自己固有的、真正的、经

---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3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3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43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41页。

验的现实性”。因此马克思提出,“历史任务就是要使政治国家返回实在世界,但是各个特殊领域并不因此就意识到:它们自己的本质将随着国家制度或政治国家的彼岸本质的消除而消除”②。可见为了克服国家同市民社会的异化、人的二重化,还必须对造成异化根源的市民社会本身进行改造。马克思当时是把“社会化了的人”③,即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本身当作克服政治异化和人异化基础的。

由于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马克思对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相互分离及扬弃这种分离的必然性的论述还很抽象。通过对法国革命史的研究,马克思在手稿的后半部分,对这一问题有了更具体的论述。他指出,政治国家同市民社会的分离,最重要的内容和中介,是旧的政治等级转变为社会等级,尽管这一转变在君主专制政体中就已开始,但是“只有法国革命才完成了从政治等级到社会等级的转变过程,或者说,使市民社会的等级差别完全变成了社会差别,即没有政治意义的私人生活的差别。这样就完成了政治生活同市民社会分离的过程。”④ 随着这一过程的完成,一方面,人从封建等级特权中被解放出来,拥有以不可剥夺的个人财产为基础的政治权利,“人民的单个成员在他们的政治世界的天国是平等的,”但另一方面,人在“人世的存在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也是市民社会),仍然存在社会等级差别,仍然是不平等的。在研究社会不平等的内容和根源中,马克思当时注意到了“需要的差别和劳动的差别”、“城市和乡村间的差别”。在论述市民社会差别标准时,他讲道:“金钱和教养是主要标准”。马克思还提出:“被剥夺了一切财产的人们和直接劳动即具体劳动的等级,与其说是市民社会中的一个等级,还不如说是市民社会各集团赖以安身和活动的基础。”⑤

①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41、283、28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44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45页。

但总的说来，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本身的分裂、异化还讲得很少（甚至还没有用异化分析市民社会）。马克思更多的是通过人的本质的二重化来揭露和说明国家同市民社会的异化，来批判现实社会。例如，马克思认为，如果说中世纪的等级制度，国家职能变成特权而使人脱离自己普遍本质的话，那末“我们的时代即文明时代，却犯了一个相反的错误。它使人的实物本质，即某种仅仅是外在的，物质的东西脱离了人，它不认为人的内容是人的真正现实。”① 马克思还写道：“现代的市民社会是彻底实现了的个人主义原则，个人的生存是最终的目的；活动、劳动、内容等等都不过是手段而已。”②这里，马克思是把异化同人在市民社会中的物质活动连在一起的，由于市民社会中人的物质活动成为个人的私事，失去真正人的本质，所以也就成为某种人之外同人相异化的东西。可见，对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研究，预示着马克思将要转入解剖市民社会、研究作为私有制异化根源的异化劳动。马克思当时已表明，在批判了黑格尔的国家观后，打算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的观点进行批判。

随着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深入，同时借助历史研究所获得的材料，马克思在“手稿”结束部分对黑格尔关于私有财产和国家关系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这反映出马克思对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认识的深入。

在黑格尔构想的政治国家中，为了稳定和安全，最重要的保证是独立的地产。因为黑格尔认为，地产的不可转让性和不可分割性，即稳定和遗传，才使得“拥有独立财产的人不会受外界环境的限制，……毫无阻碍地出来为国家做事。”③ 他还进而把长子继承制看作是政治要求，应当从政治地位和政治意义方面来考察。与此相反，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把长子继承制描写成政治国家对私有财

---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46页、345－34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66页。

产的支配权，这是"倒因为果，倒果为因，把决定性的因素变为被决定的因素，把被决定的因素变为决定性的因素。"因为政治国家对私有财产的支配权，实际上"是私有财产本身的权力，是私有财产的已经得到实现的本质。"① 而国家制度也成了"私有财产的国家制度"。马克思这时的论述虽然还不是从"生产关系"方面来说明私有财产②，但对于后来的认识却有积极意义，即为进一步揭示现代资产阶级政治国家对私有制(市民社会)的依赖性打下了基础。

五、君主主权与人民主权

揭露现代政治国家同市民社会的异化，是为了要克服这种异化。在马克思看来，就是要确立人在一切活动领域(包括市民社会)内的自由的原则，实现"真正的民主制"的社会制度。为此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还对黑格尔颂扬君主立宪、为现行制度辩护的保守政治观点进行了批判，初步论证了他将转向的未来共产主义的理想。

黑格尔哲学虽然频繁地爆发出过革命的火花，但是最终没有摆脱政治上的庸人气味，这在《法哲学》关于"内部国家制度"一节中便明显表现出来。黑格尔认为，历史上存在过的国家形式，如君主专制、贵族制、民主制，都有缺陷，都是片面的。因为"它们每一种对合乎理性地发展的理念都不符合，而理念也不能在它们任何一种中获得它的权利和现实性。"③ 例如，民主制同君主制一样也是一种"专制"，它使"人民的意志"这种"特殊的意志本身就具有法律的效力或者它本身就代替了法律"④。那么什么国家形式才是合乎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69页。

② 例如，马克思有时又把私有财产解释为法律的关系："私有财产的真正基础，即占有，是一个事实，是不可解释的事实，而不是权利。只是由于社会赋予实际占有以法律的规定，实际占有才具有合法占有的性质，才具有私有财产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82页。

③④ 《法哲学原理》第288、295页。

理性而具有现实性呢？黑格尔认为是君主立宪制，“国家成长为君主立宪制乃是现代的成就”①。历史上君主立宪制是多种多样的，从黑格尔推崇的关于君主立宪制的具体权力划分中，便明显地暴露出保守性质。黑格尔把一般资产阶级政治学关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民主思想，改造为王权，行政权、立法权结合，而以王权为首的制度。“王权，即作为意志最后决断的主观性的权力，它把被区分出来的各种权力集中于统一的个人，因而它就是整体即君主立宪制的顶峰和起点。”②黑格尔论证道：“国家本身也只有通过这种个人因素才能成为单一的东西，……因此，整体的这一绝对决定性的环节就不是一般的个体性，而是一个人，即君主。”③“国家的人格只有作为一个人，作为君主才是现实的”。黑格尔在对君主立宪制的颂扬中，还表达出反人民的立场：“把君主主权和人民主权对立起来是一种混乱思想，这种思想的基础就是关于人民的荒唐观念。如果没有自己的君主，没有那种是同君主必然而直接联系着的整体的划分，人民就是一群无定形的东西。”④针对黑格尔这种荒唐保守的政治观点，马克思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首先马克思揭露黑格尔把现实神秘化，而唯心主义地论证君主政权的虚假“合理性”。他写道：“黑格尔把近代欧洲立宪君主的一切属性都变成了意志的绝对的自我规定。他不说君主的意志就是最后决断，却说意志的最后决断就是君主。……他这样做是为了制造出体现‘在一个个人’身上的‘理念’。”⑤即把国家的统一说成是意志的统一，而一个人的意志似乎又是意志统一的最好基础，由此证明君主制是合理的。可是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应该补充一句：单一的东西唯有作为许多单一体才能成为真理。……人也只有在自己的类存在中，只有作为人们，才能是人格的现实的理念。”⑥因此，不是君主、而是人民才真正构成现实的国家制度，国家的形式

①②③④《法哲学原理》第287、296、298页。

⑤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5、277页。

也依赖于人民即市民社会的组织形式。马克思在对王权一节的分析中还指出,黑格尔"抽象地、单独地来考察国家的职能和活动","忘记了特殊的个体性是人的个体性,国家的职能和活动是人的职能"①。黑格尔虽然讲到国家的职能和活动与个人有联系,但认为只是外在的、消极的联系,不是"实体性的联系",这与他离开市民社会中人的具体活动、以思辨方式论证国家职能和权力的观点实际上是一致的。马克思认为:"'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而国家的职能等等只不过是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和活动的方式。……个人既然是国家职能和权力的承担者,那就应该按照他们的社会特质,而不是按照他们的私人特质来考察他们。"②马克思这一论述,既表示了对人的本性的社会性的看法,也表示了他此时对国家的看法,即国家是人的社会存在、社会特性、社会现实。

其次,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颂扬君主制而反对人民,以君主王权来混淆和"伪造"人民主权的观点。黑格尔认为没有君主,人民就是无定形的东西。马克思写道:如果人们已经有君主以及同君主联系着的整体的划分,就是说,如果人民已经组成为君主国,那离开这个组织,人民自然就成为无定形的。但是这不意味着,人民的政治组织就必须是君主制,国家也始终以不同于人民的形式而存在。"君主制则只是国家制度的一种,并且是不好的一种。"③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不是国家把一定的组织带到人民中去,"把人变成主体化的国家",而是人民本身将自己组成一定的国家,"把自己变成客体化的人","正如同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宗教一样,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④黑格尔表面上似乎是调和君主主权和人民主权的对立,而实际上却以此论证君主主权的合理性。为此马克思指出,有"混乱思想"和"荒唐观念"的只是

---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0页。
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0、281页。

黑格尔。“因为主权概念本身不可能有双重的存在，更不可能有和自身对立的存在。”如果主权已存在于君主方面，那么人民方面就是无权，所以“不是君主的主权，就是人民的主权”①，二者必居其一。其次，君主主权与人民主权是“完全对立的”，“一个是能在君主身上实现的主权，另一个是只能在人民身上实现的主权”。马克思坚持人民主权，“人民的主权不是从国王的主权中派生出来的，相反地，国王的主权倒是以人民的主权为基础的。”②

通过对黑格尔君主主权理论的批驳，马克思最后详细地论述了代替封建的和资产阶级国家的未来民主制度的理想。他是通过把民主制与君主制及其他国家形式加以对比的方式来说明的。马克思指出：“在君主制中，整体，即人民，从属于他们存在的一种方式，即他们的政治制度，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就是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则是人民的国家制度。”③ 即民主制度的基础在人民之中，是人民自己的创造物。“国家制度不仅就其本质来说是自在的，而且就其存在、就其现实性来说也日益趋向于自己的现实的基础、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民，并确定为人民自己的事情。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④在民主制中法律也同国家一样，“不是人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在这里人的存在就是法律”⑤。马克思在对民主制同君主制的比较中认为，后者只是政治制度的特殊形式，因为其中政治的人同非政治的私人(指市民社会的人)相分裂，它们具有自己的特殊存在。而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法律、国家本身都只是人民的自我规定的特定内容”⑥，因此国家(民主制)本身就成为政治制度。马克思反对以私有制为基础的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9页。

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1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2页。

社会制度，所以他把私有制基础上的国家常常称为“国家形式”、“物质国家”，而只有代表全民利益的国家才成为真正政治国家，这种国家意味着整个社会生活和社会制度经过了改造。①

马克思在手稿结尾部分更详细地论述了一些民主制的内容。例如，他认为，在民主制中由于一切公民都是国家的直接部分，自觉地参与国家事务，所以不再需要代表，“立法权作为代表权机关就完全失去了它的意义”②。因为作为类活动的一切特定的社会活动都只代表类，“每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的代表……他之所以起代表作用，原因不在于他代表了其他某种的东西，而在于他是他自己并且他在做自己所做的事情”③。为了实现未来真正的民主制，马克思还开始研究了一些具体政治要求。如民主制中立法权的主要任务，是发现和拟定真正的法律，这些法律应从“整个国家的观点”和“社会意义上来考察”④。马克思赞同扩大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使选举权尽可能普遍化”⑤。并认为选举权的真正实现则要求废除政治国家及市民社会，“选举制的改革就是在抽象的政治国家的范围内要求取消这个国家，但同时也取消市民社会。”⑥马克思最后还打算叙述从利益方面提出的选举制改革问题⑦，但手稿中马克思未能实现。

马克思从理论上论证“真正民主制”，是想通过它实现真正的国家，即实现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的自由，实现人的最高现实性。在人民中，在人民自我意识的意志中，揭示合乎规律的历史过程的推动力。这是马克思在1843年夏季的认识水平，同时也构成他向共产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转变的基点。

---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3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9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95页。

⑤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96页。

⑦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96页。

六、 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初次批判改造

在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国家观批判同时，马克思还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进行了第一次系统批判和改造，并将由此所获得的观点和方法直接运用于新的研究工作，为即将深入的对市民社会的解剖提供了有力的武器。

黑格尔是辩证法大师，恩格斯曾称他为"所有时代中最有学问的人物之一"，"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①。但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性质及其所论证的保守政治结论，使得转向唯物主义的马克思在批判其国家哲学时，必然要深入到对其辩证法的批判和改造。其实，在对黑格尔关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颠倒中，马克思就已经触及到了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根本缺陷"：把理念变为独立的主体，头足倒置地以"思维的样式来制造对象"，以纯逻辑的演绎来代替事物真实联系的泛逻辑主义。虽然黑格尔把政治制度看成是辩证联结的机体，但是马克思认为："从机体的一般理念通向国家机体或政治制度的特定理念的桥梁是没有的，而且这种桥梁永远也架设不起来"②。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同样是从揭露它的这种唯心主义性质人手的。

马克思指出，由于黑格尔"用客观的东西偷换主观的东西，用主观的东西偷换客观的东西"③，不仅使他最终不能摆脱二元论，而且也窒息了革命的辩证法，导致非批判的结论。历史上，黑格尔哲学是以致力于解决实体和主体、存在和精神抽象对立的"二元论"而出现的。但是，在黑格尔哲学中，一方面，普遍物不是被看成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92页。

现实的本质,而是某种独立存在的本质(观念)①;现实性不是被看作事物本身的现实性,而是某种其他外来的现实性②;经验的合理性也不是存在本身中的合理性,而是附加上的一种超出其本身范围的意义③;现实事物的差别不是事物本身的差别,而是理念自我规定的差别。这样,黑格尔承认在现实事物之外,存在着某种独立的精神本源(马克思称之为"极端唯灵论");另一方面,这种包罗一切的理念,为了证明自己的现实性并实现自己,又不得不接受和求助于经验,转而在它所鄙视的经验面前卑躬屈节,满足于找到一件与自己的范畴相对应的事实,从现实材料中去"寻找逻辑概念的历史的再现"④(马克思称为"粗劣唯物主义"),实际上又承认了理念之外的存在。因此思维和存在在黑格尔那里(尽管辩证联结)仍然是两个外在的系列,"两种来历:奥秘的和明显的"⑤,如果说奥秘部分关心的是在现实中寻找逻辑概念的历史再现,那么真实的"发展却恰巧是在明显的方面进行的"⑥。

正是黑格尔哲学对真实发展的这种唯心主义表达,又使它的"革命"辩证法最终得出保守的非批判结论。如马克思指出的,从理念出发,"把某种经验的存在非批判地当作理念的现实真理,……随便哪一种经验的存在都可以解释为理念的实在环节"⑦,只要使结果恰恰成为现实中存在的那样。普通人说:"君主拥有主宰一切的权力,即主权,"黑格尔说:"国家的主权就是君主",结论:国家主权只能以君主制形式而存在。这是把暂时的经验提升为绝对的原则,用现存的东西去冒充事物的"本质"。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普鲁士王国也就成了理念的最高体现。可见,黑格尔哲学的保守性正来源于它的唯心主义性质,而对它的改造则必须对它进行颠倒,"从现存的现实本身的形式中引出作为它的应有的和最终目的的真

---

①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3、250、253页。

④⑤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1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92—293页。

正现实。”

在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同时，马克思已深入到黑格尔体系的殿堂中，对辩证法的合理内容进行改造，首先是对矛盾学说进行批判改造。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处处都从各种规定的对立出发，并把这种对立加以强调。例如黑格尔把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裂看作一种矛盾，君主、行政权、立法权、等级等，彼此也处于一定的相互矛盾之中。可是，马克思又指出，黑格尔虽然承认矛盾，但并没有说出对立的全部尖锐性，相反却满足于表面上解决矛盾。如借助于“等级要素”、“立法权”等中介，来调和市民社会同君主间的对立。在马克思看来，这些调和的因素与其说是中介的存在，还不如说是矛盾的存在，它们不仅没有调和对立，而且使“对立尖锐到随时可能发生斗争的地步，甚至还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性质”①。为什么中介因素只是表面解决矛盾和调和矛盾？这源于黑格尔对矛盾本质的认识及克服矛盾途径的认识。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所讲的矛盾并不是现实事物本质的矛盾，而仅仅是作为理念本质表象的“现象的矛盾”，而黑格尔所讲的调和矛盾的中介(如立法权)，也不是从“实践着眼”、从实际事物发展中引申出来，而是以“外交方式虚构出来”②、作为“合乎理性的关系”从逻辑中推演出来的。这样，通过把现实矛盾融为抽象的推论环节(如“普遍性和单一性”的对立)，而推论环节又冒充为“真正的对立面”③，经过逻辑范畴推论中互为中介的推移④，客观矛盾便得到中介和取消。所以马克思得出：“黑格尔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把现象的矛盾理解为本质中的理念中的统一，而事实上这种矛盾的本质当然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6页。

④ 例如黑格尔把中介作用轮流强加于国家组织的一切要素，包括国王在内。君主的必要性，就是因为它是等级和政府之间的中介人。

某种更深刻的东西，即本质的矛盾。”①

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并阐明同黑格尔区别的，并不在于是否承认本质有矛盾(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把矛盾也解释为本质关系)，而是在于对矛盾和本质的理解。马克思把矛盾和本质都看作客观的，当他强调把矛盾归结为本质的矛盾时，实际上就是致力于把矛盾归结为它的客观基础和寻找矛盾的更深刻根源。正如马克思说明的，“所谓立法权自身的矛盾只不过是政治国家的矛盾，因而也就是市民社会自身的矛盾”②。而黑格尔关于使客观(实际上也是本质)的矛盾从属于观念上的逻辑推论，在理念本质中统一的观点，只是“想象中的幻觉”，“是政治国家关于本身的实体性或自相适应的幻想。这只是寓言式的存在”③。在马克思看来，只有把矛盾归属于它的客观基础和根源，才能进一步认识矛盾、区分矛盾、解决矛盾，在矛盾运动中揭示事物的必然联系和规律性。马克思此时不仅超过黑格尔，并且同发现到处都有矛盾、却不知如何把握矛盾根源的青年黑格尔派也有区别，马克思是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来运用辩证法武器的。他写道：“对现代国家制度的真正哲学的批判，不仅要揭露这种制度中实际存在的矛盾，而且要解释这些矛盾；真正哲学的批判要理解这些矛盾的根源和必然性，从它们的特殊意义上来把握它们。……这种理解不在于像黑格尔所想象的那样到处去寻找逻辑概念的规定，而在于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④认识矛盾的根源及必然性，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这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矛盾学说批判所得出的积极成果，它被成功地贯彻和运用到马克思后来的理论工作中：从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矛盾，进一步揭示矛盾根源——市民社会本身的矛盾，揭示社会历史发展基本矛盾，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殊对象的特殊矛盾逻辑，这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6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9页。

些使马克思完成了历史观上的深刻革命。

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法唯心主义成分的剔除，马克思提出了关于矛盾类型的认识，尽管其中还包含着不成熟的提法和概念，这对于唯物辩证法的创立起了奠基的作用。针对黑格尔用中介推论调和矛盾，马克思指出："真正的极端之所以不能被中介所调和，就因为它们是真正的极端。同时它们也不需要任何中介，因为它们在本质上是互相对立的。它们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点，它们既不相互吸引，也不相互补充。一个极端并不怀有对另一个极端的渴望、需要或预期。"① 任何矛盾都是对立面相互依存中的统一。马克思此时所以强调矛盾不可调和，主要是同黑格尔调和矛盾的立场相反，强调把相互作用中的相互否定因素贯彻到底，而在矛盾类型上则是指事物本质的矛盾。按照马克思当时的看法，矛盾可分为两类三种：即同一本质存在的矛盾（"存在上的差别"）和"本质的矛盾，"后者又包括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和各种不同本质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所指不可调和的，就是最后一种"两种本质的差别"②、各种本质的真正对立。马克思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还分析了两种可能提出的反对意见。其一认为，北极和南极相互吸引，女性和男性也相互吸引，马克思指出，这正是"同一种本质"存在的矛盾，它与不同本质矛盾是不一样的③。其二认为，任何极端都是相反的另一极端，如抽象的唯灵论就是抽象的唯物主义。马克思认为这是把概念脱离开它应反映的"内容"，对概念本身又以抽象形式把握的结果。马克思指出，如果正确地区别了不同矛盾类型，不把它们相混同，即"在一种本质所存在的范围内的差别既没有和转化为独立本质的抽象相混同，也没有和相互排斥的各种本质的真正对立相混同，那末就可以避免三重错误"④。显然这些错误正是混同了上述矛盾不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355 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355、356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356 页。

同类型的结果。第一种错误是，认为“只有极端才是真理”而滥用辩证法，其结果导致片面性，“任何一个原则都只表现为脱离某一他物的抽象，而不表现为整体本身”①。第二种错误是，“把真正对立面的尖锐性以及这些对立面的转化为极端看做有害的，”并“阻止”这种转化。在马克思看来，对立面的转化正是矛盾自我解决的形式，“这种转化却不是别的，而是这些对立面的自我认识，以及它们对决定性斗争的热烈渴望”②。第三种错误，即用中介调和矛盾。为什么对立面的互为中介并不意味着矛盾调和，马克思认为，两个极端虽然都真正存在，但是它们“地位各不相同”，一个的“特性”包含在另一个“本质”中③，一个占了另一个的上风。他举例说，基督教以及一般宗教同哲学是极端对立的，但是“宗教对哲学来说并不是真正的对立面，因为哲学把宗教当作虚幻的现实来理解”，哲学在自己的运动中将克服宗教。马克思最后再次重申：“本质的真正二元论是没有的。”④即对立面在自身发展中所形成的本质的不同表现和不同本质的对立都是不能调和的。马克思对矛盾类型的初步区分及对混淆矛盾类型错误的批判，实际上阐明了认识和解决矛盾的一些基本原则：防止片面性，注意矛盾转化，反对调和矛盾。

为了在对辩证法的改造中恢复其革命因素，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还对黑格尔的庸俗进化论倾向进行了驳斥，把革命的辩证法贯彻到其政治主张中。黑格尔《法哲学》的保守性质，除了为普鲁士专制制度进行辩护外，还表现在实际上主张维持现存制度而反对革命变革。例如，黑格尔以理念本质逐渐生成的观点来看待现代国家制度变化，认为：“国家制度存在着，同时也本质地生成着，……这种前进的运动是一种不可察觉的无形的变化。”⑤黑格尔还举出许多例证来说明这种逐渐变化，并最后得出结论：“一种状态的不断发展从外表看来是一种平静的觉察不到的运动，久而

---

①②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6页

⑤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11页

久之国家制度就变得面目全非了。"① 针对这种保守观点，马克思指出："逐渐推移这种范畴从历史上看来是不真实的，这是第一。第二，它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② 在马克思看来，固然许多国家中制度变革总是新的要求逐渐产生而旧的东西逐步瓦解，但要"建立新的国家制度，总要经过真正的革命。③ 马克思认为，要使国家制度不是被迫改变，不是最后被暴力所粉碎，就必须使"前进运动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从而必须使国家制度的实际体现者——人民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这时，进步本身也就成了国家制度。"① 经过改造的革命辩证法，成了马克思论断推翻旧制度、建设新制度的锐利思想武器。

马克思退出《莱茵报》到最后离开自己的祖国，只有半年多的时间，但是这一期间马克思在理论上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马克思摸索到把唯物主义贯彻到社会领域、把唯物主义同辩证法结合起来，从而发展唯物主义的新的途径。马克思所从事的多方面理论工作（哲学、历史、政治），也为他再次投入新的实践准备好了条件。正是在新的实践中，马克思思想进一步深化，产生和制订出新的世界观。

第四节 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

1843年10月底，马克思和燕妮离开德国，前往当时革命者的集合地巴黎。在这里，通过对无产者活动的接触与认识，马克思得到了论证共产主义的新的论据。作为《德法年鉴》的编辑、马克思从事的活动及发表的文章，标志着他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1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15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15页。

义、从革命民主主来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一、马克思和《德法年鉴》

《德法年鉴》是马克思和卢格一起于1844年2月在巴黎创办的德文刊物。杂志仅仅出版了一期创刊号(一、二期合刊),便由于马克思同卢格的原则分歧而停刊。但是,杂志所登载的文章表明,它较《莱茵报》前进了一步,带有鲜明的共产主义性质。马克思是年鉴的发起人,并通过年鉴实现了自己的创办纲领。

早在《莱茵报》被查封后,马克思就在寻找能公开发表自己哲学——政治观点的新阵地。开始他接受海尔维格的邀请,打算赴苏黎士同后者一起编辑计划创办的新杂志《德意志通报》,但是海尔维克被驱逐出苏黎士使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与此同时,卢格打算在国外恢复被查封的《德意志年鉴》①,并建议马克思担任该杂志的主编。马克思同意跟他合作,但是却不赞同仅仅是恢复旧的刊物。在同卢格的通信中马克思写道:"即使《德国年鉴》重新获准出版,我们至多也只能做到一个已停刊的杂志的很拙劣的翻版,而现在这样已经不够了。"② 在马克思看来,不仅《德意志年鉴》的名字应改为《德法年鉴》,而且出版地方也应改在具有象征意义的斯特拉斯堡(法德长期争夺的边境地带、亚尔萨斯的城市)。马克思认为:"这才是原则,是能够产生后果的事件,是能够唤起热情的事业。"③马克思的思想,与当时广为流传的法德两国进步力量联合的思想是一致的④,即未来的新杂志应该把德国的哲学激进主义与法国的政治激进主义结合起来,把思想理论的力量同实践行动的力量结合起来。作为两国革命者的政治理论机关刊物,它应摆脱

---

① 《德意志年鉴》(1841-1843)原为《德意志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文学——哲学杂志,1843年1月被普鲁士政府查封。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41页。

④ 例如费尔巴哈当时认为:"一个真正的、与生活,与人同一的哲学家,必须是高卢人和日耳曼人的血统"。《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册,第111-112页。

民族的局限性，从新的立场和高度来认识和评价任何国家发生的事件。对于马克思的建议，卢格在回信中表示赞同，他们共同开始了新杂志的筹备工作。

为创立新的《德法年鉴》，首要的任务是如何实现联合法德两国革命者的宗旨，争取更多的撰稿人及优秀稿件。为此，曾计划邀请一些当时法国有影响的作者为杂志撰稿，如拉马丁、拉梅耐、路易 勃朗、卡贝和蒲鲁东。出于各种原因，这些人都拒绝了。马克思在离开克罗茨纳赫赴法前，还曾写信邀请费尔巴哈撰写批判谢林的文章。他在信中写道："您是第一批宣布必须实现德法科学联盟的著作家之一。因此，您必然也是旨在实现联盟事业的第一批支持者之一。而现在要轮流发表德国和法国著作家的著作。巴黎的优秀作者们已经表示同意。我们十分高兴从您那里得到稿件，而您手头想必有一些现成的东西。"① 如果您马上给创刊号写一篇评论谢林的文章，那就是对我们所创办的事业，尤其是真理，做出了一个很大的贡献。您正是最适合做这件事情的人，因为您是谢林的直接对立面。"② 马克思的邀请是热烈而真诚的，但在德国当时险恶的形势下费尔巴哈踌躇了，甚至援引他自己的"高卢——日耳曼"原则也没有能说服他，费尔巴哈没有给杂志撰稿。杂志的创办是艰难的，但最终却得到了一批著名革命者的支持，如恩格斯、海涅、海尔维格、赫斯等等。恩格斯曾在为一家报纸撰写的文稿中，为新刊物做宣传："创办一种主张彻底改造社会的定期刊物会得到怎样的反应。这样的定期刊物已经在巴黎创办，名为 德法年鉴，，它的编辑卢格博士和马克思博士以及其他一些撰稿人都是德国的 共产主义学者，；支持他们的还有法国最杰出的社会主义作家。……就在创刊号出版以前，它的成就就已经是肯定的了。"③ 为了解决出版经费的困难，卢格和负责出版者弗吕贝尔曾打算创办一家股份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7 卷，第 444 页、445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595 页。

公司为杂志积资,但没能实现。为保证出版近几期刊物,卢格投入了六千塔勒的股金。而马克思到达巴黎后则全力投入编辑准备稿件的工作。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德法年鉴》于1844年2月在巴黎出版,立即引起了反响,也遭到反动政府的敌视和迫害。普鲁士政府驻巴黎大使向政府报告了《德法年鉴》的政治倾向,普鲁士当局通令封锁边境,查禁杂志,授意各省并命令警察机关,马克思、卢格、海涅和贝尔奈斯一进入普鲁士国境就予以逮捕。一些具有反动倾向的报刊,也发表评论攻击《德法年鉴》。在严酷的外部压力下,内部的分歧也加剧,马克思和卢格在观点上的日益分歧和对立,使年鉴仅仅出版了一期合刊号后,便没有再维持下去。

马克思与卢格的分歧早在创办杂志过程中就存在,围绕着年鉴的性质、任务等方面,两人实际上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纲领。尽管与此有关的文件没有全部载入年鉴,但从年鉴开篇关于《〈德法年鉴〉计划》和题为《1843年通信》中便可以明显反映出来。

《〈德法年鉴〉计划》是卢格所起草的关于年鉴的《法文和德文的出版广告》的一部分。在没有载入年鉴的法文广告中,卢格曾拟标题为《〈德法年鉴〉的纲领》,而用德文撰写的《〈德法年鉴〉的计划》同"纲领"基本一样,只是论述顺序上有些调整,内容比前更为详细。在"计划"中卢格首先提出杂志的行动方针:(1)讨论那些对未来社会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的政治制度、宗教制度和社会制度;(2)评论报刊杂志,注意它们的目的和倾向,它们对社会意识的影响;(3)批判地分析莱茵河两岸出版的书籍。接着卢格强调法国和德国之间的联合斗争对争取民族自由的重要性。卢格认为,"在德国哲学还远远没有成为民族的事情,但它应当成为民族的事情……一个民族在使哲学成为它的发展原则之前不可能自由的;而哲学的任务就在于把民族提高到这样的水平。"① "哲学就是自由

① 《德法年鉴》1844年柏林版,第4页。

并且能产生自由"，这种"真正人的自由，即政治自由"。在卢格看来，当前的任务，是应把德国的纯粹原则在法国实现，使法国人摆脱宗教压迫，德国人摆脱政治压迫，德国精神和法国精神的联合，"是在人道主义原则上的一种联合"①，为实现这种联合，卢格认为所采取的实际步骤，是交流文化促进教育，并通过创办真正自由的刊物来实现这些内容。作为一个革命者，卢格在 1843 年底提出的关于革命斗争的具体任务，显然还停留在自由民主主义的观点上。原则是实现哲学，手段则是通过创办自由刊物，最终任务没有超出人民精神解放的范围，只是用费尔巴哈人道主义代替黑格尔哲学，用新的德法机关报代替旧的德国刊物。对于这样的纲领，马克思显然不再满意了。

题为《1843 年通信》的八封通信，是马克思同卢格等围绕着年鉴等筹备工作的动因、计划、指导方针等方面交换的意见，这些通信发表时，虽然经过卢格的编排并做了删改，但仍能看出马克思关于创办杂志的思想动因及拟定的纲领性意见。在卢格病后马克思一人审定年鉴稿件时，《通信》内容还最后经马克思做了核阅。

马克思信件中的第一封信，是 1943 年 3 月马克思在荷兰旅行期间给卢格的信，作为整个《通信》集的序曲，实际上反映了马克思关于创办杂志的思想缘由——对当时卑贱的德国感到羞耻和深信革命即将来临。面对威廉四世上台后加强书报检查，查禁报刊、严密控制思想的高压政策，马克思指出："普鲁士制度及其明显的本质再也骗不了人了。……自由主义肩上的华丽斗篷掉下来了，极其可恶的专制制度已赤裸裸地呈现在全世界的面前"②。作为一个德国人，马克思认为，如果为德国已深深陷入泥坑而感到耻辱的话，这种"耻辱本身已经是一种革命"③，"实际上就是法国革命对 1813 年曾战胜过它的德国爱国主义的胜利"④。马克思深信，专制制度

---

① 《德法年鉴》1844 年柏林版，第 7 页。

②③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407 页。

所扮演的这场闹剧，必然要向着“不可幸免的命运驶去”，“这命运就是即将来临的革命。”①

1843年5月写于科伦的第二封信(致卢格)，是马克思对于普鲁士1841至1843年初政治状况的理论概括，这种概括不仅为他正在写作中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提供了前提，而且也直接构成年鉴纲领的组成部分。马克思把普鲁士的专制制度称为“政治动物”的“庸人的世界”，即一方面是支配着土地和臣民的封建所有主、军官和容克地主的统治阶级，另一方面是构成这一制度组成部分的、也包括那些支持和维护封建制度的各阶层的代表。马克思认为，封建专制制度(“君主政体”)，无论以老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 威廉三世的面貌出现，还是以新国王“自由的无上君权”表现出来，其共同的“原则”和“事实”，“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②。此时，马克思是把真正自由的人同“庸人世界”对立起来的，认为“哪里君主制的原则占优势，哪里的人就占少数；哪里的君主制的原则是天经地义的，哪里就根本没有人了。”③“庸人是构成君主制的材料，而君主不过是庸人之王而已。只要二者仍然是现在这样，国王就既不可能使他自己也不可能使他的臣民成为自由的人，真正的人。”④为此，马克思要求“丢下这个世界的基础，过渡到民主的人类世界”⑤。因为“工商业的制度、……私有制和剥削”所引起的“现今社会内部的分裂，……旧制度是无法医治的”⑥，而要改变这一制度，就必须唤起人们的自尊心，唤起对自由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重新成为一个人们为了达到崇高目的而团结在一起的同盟，成为一个民主国家”⑦。马克思还提出“能思想的人”和“受苦难的人”团结起来，“受难的人在思考，在思考的人又横遭压迫，这些人的存在是必然会使那些饱食终日、醉生梦死的庸俗

---

①②③④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08、11 、412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4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09页。

动物世界坐卧不安的。""我们的任务是要积极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1] 针对着卢格在1842年激进运动失败后垂头丧气的情绪，马克思满怀信心地写道："让死人去埋葬和痛哭自己的尸体吧。最先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令人羡慕的。"[2]

注明为1843年9月于克罗茨纳赫的第三封通信中[3]，马克思更明确地把哲学的任务同政治发展的目标结合起来，并对《德法年鉴》将采取的方针，提出了直接的纲领性意见。

针对卢格把现有的哲学理论教条式接受下来，只须加以实现的原则，马克思指出，对于"从何处来"的问题没有疑问，但对于"往何处去"，即未来社会如何发展，朝什么方向进行斗争，在现今的理论家观念中却很混乱，因此盲目支持现存学说中的某一学说，只能是扩大这种混乱。"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4]马克思指出："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以为"一切谜语的答案都在哲学家们的写字台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要张开嘴来接受绝对科学的烤松鸡就得了。"[5]与此相反，我们的原则，"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6]。

马克思对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傅立叶、蒲鲁东)和空想共产主义(卡贝、德萨米、魏特林)提出了批评，因为他们仅仅是用新的原则对抗旧世界，而这些理论的任何一种都没有全面地研究和掌握新的原理。当时马克思把社会主义解释为对人的现实存在的全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08页。

③ 卢格曾把《1843年通信》收入自己的文集出版，但对马克思的这封信，卢格却没有收入，为此有学者推断"卢格这样做是想强调，他不同意这封信。"(参见尼 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第198页。)

④⑤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

面深入研究，以求在实际上实现真正人的生活。而人的存在分为两部分，一是“人类实质的实际存在”，二是人的“理论生活”①。上述的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囿于社会发展的特殊目的，实际上只涉及了普遍原则的一部分，所以马克思称它们为“社会主义原则的一种特殊的片面的实现”②。例如，空想共产主义理论当时把全部注意力放在消灭私有制上，并提出与此对立的公有制条件下的各种规则。马克思认为消灭私有制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这种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人道主义原则的特殊表现，它还没有摆脱它的对立面即私有制的存在的影响。所以消灭私有制和这种共产主义绝对不是一回事”③。马克思所理解的社会主义，除了对私有制的批判外，还包括理论生活，“应当把宗教、科学等等当作我们批评的对象”④。

马克思此时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黑格尔的影响，但得益于对法哲学的批判，已能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指出，批评家应该“从现存的现实本身的形式中引出作为它的应有的和最终目的的真正现实”⑤。从现实出发，马克思认为当时最重要的问题是宗教和政治问题。“正如宗教是人类理论斗争的目录一样，政治国家是人类实际斗争的目录。”⑥在马克思看来，正是现代政治国家在自身的矛盾——作为理想的使命与现实前提的矛盾中，反映和表现了“一切社会斗争，社会需求和社会真理”⑦。例如，等级制和代议制的区别，只不过是用政治言辞表明的人的统治和私有制的统治的区别而已。而代议制的真正内容还包括人的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实际利益”)，因此当批评者阐明了代议制的真实含义后，就可以使代议制的追随者们越出纯政治斗争的范围。

在通信最后，马克思指出未来杂志的任务，是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他写道：“什么也阻碍不了我们把我们

①②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

⑤⑥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7页。

的批判和政治的批判结合起来，和这些人的明确的政治立场结合起来，因而也就是把我们的批判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做同一件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是以空论家的姿态，手中拿了一套现成的新原理向世界喝道：真理在这里，向它跪拜吧！我们是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我们并不向世界说：'停止斗争吧，你的全部斗争都是无谓之举'，而是给它一个真正的斗争口号。我们只向世界指明它究竟为什么而斗争……这样，我们就能用一句话来表明我们杂志的方针：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批判的哲学）。这是既为了世界，也为了我们的工作。"① 马克思所提出的纲领已远远超过了卢格的意图，而成为《德法年鉴》的实际纲领。

二、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

按照《德法年鉴》的纲领，马克思在年鉴上发表了两篇文章：《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它们是"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在理论上，则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提出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观点的深化和发展。

《论犹太人问题》一文是马克思 1843 年秋天开始写作、到巴黎后完成的。主要内容是就布鲁诺·鲍威尔关于犹太人问题的两部著作同他展开公开的论战。通过批驳鲍威尔把犹太人解放归结为宗教解放，而又把政治解放同人类解放混淆起来的错误，马克思发挥了国家公民和社会成员之间分裂决定政治国家同市民社会之间分离的观点，首次论述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实际上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

犹太人问题在 19 世纪初德国政治生活中较为突出。由于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分歧，在德意志基督教国家里犹太教遭到迫害，在政治权利方面受到极大限制。1816 年 5 月 4 日普鲁士政府曾颁布法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417－418 页。

令，犹太人不得担任国家公职而只能在国家中居于从属地位。为了反对这一法令，犹太人一直进行斗争，要求与基督徒享有平等的权利。这种斗争又客观上汇入到当时德国反对旧的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因此犹太人问题也成为各派普遍关注的话题，也引起青年黑格尔派的兴趣。

马克思早在1842年8月，就曾想给《莱茵报》写一篇论犹太人问题的文章，以回答鼓吹反犹太主义的海尔梅斯。他在给《莱茵报》的发行负责人哥贝尔特·奥本海姆的信中写道："请您把海尔梅斯所有反对犹太人的文章都寄来，然后，我尽可能快地给您寄一篇文章，即使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也要把它纳入另一轨道。"①1843年3月，马克思在与卢格商谈筹备《德法年鉴》的信中又提到："本地的犹太教公会会长刚才到我这里来，请我替犹太人写一份给议会的请愿书，我答应给写。不管我多么讨厌犹太人的信仰，但鲍威尔的观点在我看来还是太抽象。应当在基教国家上面打开尽可能多的缺口，并且尽我们所能把最大量的合理东西偷运进去"②。在马克思看来，犹太人问题是同反基督教国家的政治斗争相关的。

但是鲍威尔却不这样认为，他在《犹太人问题》和《现代犹太人和基督教获得自由的能力》两部著作中，把犹太人问题这一实际的社会、政治问题，变成为纯粹神学问题。鲍威尔认为，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最顽强的对立形式是宗教，由于犹太人坚持自己的宗教，因而使自己与社会进步对立起来，把自己排除于人类社会之外。相反，只要国家还是基督教国家，就不会让同基督教信仰者相对立的犹太人得到平等权利。因此，犹太人的政治解放要以消灭基督教国家为前提，但是首先必须从自己宗教中解放出来，使无神论成为政治解放的前提。鲍威尔写道："犹太人，只有当他们不是作为犹太人，亦即不是作为把基督徒总是看成异己者的那种存在物而得到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3、443页。

解放,并且不再以虚假的界限把自己同其他人分离开来的时候,他们才算得到彻底的、成功的和确实的解放。"① 同样,鲍威尔也要求基督徒放弃基督教,"基督徒和犹太人都必须彻底抛弃自己的本质"②。

针对鲍威尔政治解放"要犹太人放弃犹太教","要求一切人放弃宗教"③ 的教条主义批判态度,马克思是从具体历史事实出发,去看待德国犹太人争取政治解放斗争的。他指出,由于各国历史条件不同,犹太人问题有不同的提法。在德国还没有资产阶级国家制度,没有实现政教分离,所以犹太人问题是个纯粹神学问题,犹太人和把基督教作为自己基础的国家处于宗教的对立状态。而在立宪国家由于政治解放不彻底,还保存着国教的假象,犹太人问题是个宪政问题。在北美合众国,废除了国教,宗教已成为每个公民的私事,国家仅仅从政治角度对待宗教,犹太人问题失去神学的意义,成为真正世俗的问题。因此在马克思看来,犹太人的解放并不像鲍威尔所认为的,必须先从犹太教中解放出来,才能在政治上得到解放。因为即便在"政治解放已经完成了的国家,宗教不仅存在,而且表现了生命力和力量"④。这说明,宗教的存在和政治国家的完备并不矛盾,因此,科学的任务在于揭示宗教存在的社会政治根源,认识政治解放的局限性,而不是把社会政治问题变成为神学宗教问题。马克思写道:"我们用自由公民的世俗桎梏来说明他们的宗教桎梏。我们并不认为:公民要消灭他们的世俗桎梏,必须首先克服他们的宗教狭隘性。我们认为,他们只有消灭了世俗桎梏,才能克服宗教狭隘性。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在我们看来,政治解放和

---

①② 参阅: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册,第562-56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3、42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5页。

宗教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问题。”

从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入手，马克思首先深入地揭示了宗教的世俗根源，把对宗教的批判引入到政治的批判和对政治解放局限性的揭露。马克思指出，国家和宗教的关系不是哲学和神学的抽象，而是组成国家的人同宗教的具体关系。人们即使通过国家的中介废除了宗教而获得政治解放，实际上仍然会受到宗教的限制。因为宗教是间接通过一中介物（如上帝）来对人进行承认的，当人们依靠国家中介摆脱宗教限制时，国家就成为人与人自由之间的中介物。因此“正像基督是一个中介物，人把自己的全部神性、全部宗教狭隘性转移到他身上一样，国家也是一个中介物，人把自己的全部非神性，全部人的自由寄托在它身上。”[②]可见，国家同人的关系与宗教同人的关系是同一类型关系，这里马克思是联系着政治批判、即现代政治国家仍然使人的自由同人相异化来批判宗教的。政治国家为什么是异化的产物，并使“宗教依然存在”[③]？其更深刻的根源在于政治国家同市民社会之间的矛盾，这一“世俗矛盾”还构成人作为政治国家公民与作为特殊宗教信徒之间矛盾的基础。[④]

马克思指出，那怕最发达的现代资产阶级政治国家取消了选举权被选举权的财产资格，宣布了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等为非政治差别，每个人都是人民主权的平等参加者，但是这一国家仍然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它不仅没有解决作为其基础的市民社会内部私人利益的分裂和对立，相反，“只有在这些差别存在的条件下，它才能存在，只有同它这些因素处于对立的状态，它才会感到自己是政治国家”[⑤]。伴随着政治国家的二元化还存在人的二元化：“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

---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5、42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第427页。

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做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别人看做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成为外力随意摆布的玩物"①。"在市民社会中，人是世俗存在物……相反地，在国家中，即在人是类存在物的地方，人是想象中的主权的虚拟的分子；在这里，他失去了实在的个人生活，充满了非实在的普遍性。"②在马克思看来，正是人分裂为国家的抽象公民和市民社会的现实的私人，人们相互交往的共同体和自由成为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虚幻的彼岸存在，这便构成了宗教的真正世俗根源。所以马克思最后总结道："政治国家的成员之所以信奉宗教，是由于个人生活和类生活、市民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二元性；他们信教是由于人把处于自己的现实个性彼岸的国家生活当做他的真实生活；他们信教是由于宗教在这里是市民社会的精神，是人们相互脱节和分离的表现。"③ 由于政治解放不是消灭这种二重化，而恰好是完成了这种二重化，所以"政治上从宗教解放出来，宗教依然存在……国家从宗教得到解放并不等于现实的人从宗教得到解放"，"政治解放并没有消灭人的实际的宗教观念，而且它也不想消灭这种观念"④。马克思对宗教世俗根源的揭露，对政治解放不能消除异化也不能废除宗教的揭露，有力地驳斥了鲍威尔把政治解放归结为宗教解放、把废除信仰做为政治解放前提的观点。

虽 当马克思把宗教归于它的世俗基础，并用世俗本身的分裂来说明其根源时，他已指出市民社会是利己主义领域，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通过分析鲍威尔的第二篇文章，马克思更明确地阐述和发挥了这一思想。马克思指出，在鲍威尔笔下，犹太人的解放"变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5、430页。

成哲学兼神学的行为”、“纯粹宗教问题”①,而要驳倒这种神学提法,就应该研究必须克服什么样的“特殊社会因素,才能消灭犹太”,“犹太和现代世界解放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从犹太在现代被奴役的世界中的特殊地位必然产生出来的”②。犹太人生活的特殊社会因素和地位即现代市民社会,而“实际需要、利己主义就是市民社会的原则;只要政治国家从市民社会内部彻底产生出来,这个原则就赤裸裸地显现出来。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的神就是钱。”③因此马克思认为,如果“不是到犹太人的宗教里去寻找犹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现实的犹太人里去寻找犹太教的秘密”④的话,犹太教的世俗基础就是实际需要、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偶像是做生意,他们的世俗上帝则是金钱,“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却向他膜拜。”⑤可见,在马克思看来,犹太教的异化本质(如金钱)不仅是犹太教的本质,而且还是现代市民社会中人的上帝。如果说历史上基督教来源于犹太教、在基督教的统治下,市民社会才完全从国家生活中分离出来,代之以利己主义和自私需要,把人的世界变成互相隔绝互相敌对的个人的世界,那么随着市民社会的完成犹太教又达到了自己的顶点。作为“实践中完成”的宗教,犹太教“才能把异化了的人,异化了的自然界,变成正在异化的对象、变成奴隶般地屈从于利己主义的需要、屈从于生意的买卖对象”⑥。所以基督教起源于犹太教,又还原为犹太教,犹太人生活的现实本质在市民社会中得到了普遍的真实的实现,得到了普遍的世俗体现。既然犹太人的本质不是“犹太人的狭隘性,而且是社会的犹太人狭隘性”⑦,那么从做生意和金钱中获得解放,即从实际的、现实的犹太人中获得解放,也是“现代的自我解放”,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中获得解

---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5、444页。

③④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8、446页。

⑥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0、451页。

放,"就其终极意义来说,就是人类从犹太① 中获得解放"②。

马克思对犹太人解放的具体内容的揭示,不仅成功地把宗教问题变成了世俗问题,而且最后引出更深入的问题,即犹太人的解放实际上就是克服国家同市民社会的异化、市民社会自身异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既然政治解放不仅不能实现这一任务,而且恰好是政治解放才使异化实现和普遍化,所以犹太人的解放最终便要越出政治解放的范围,提高到争取全人类的解放,即对使犹太原则普遍化的市民社会本身的改造。这样,政治解放和宗教解放的关系就变成了马克思所说的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深入论述,使马克思实际上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

在批驳鲍威尔关于通过政治解放完全废除宗教时,马克思不仅依据事实说明宗教不可能为政治解放所废除,而且从理论上对政治解放进行了分析,他指出:"这里指的是哪一种解放?人们所要求的解放的本质要求有哪些条件?只有对政治解放本身的批判……才能使这个问题真正变成'当代的普遍问题'。"③ 在马克思看来,政治解放作为标志着"专制权力所依靠的旧社会的解体"④,尽管还不是"一般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⑤,但仍然是一大进步。这种进步就在于作为市民社会的革命,它是"市民社会从政治中获得解放"⑥,它使市民社会从封建政治国家中分离出来,推翻了专制权力,使国家事务变为人民的事务。通过摧毁一切等级、公社、行帮和特权,粉碎了原来束缚市民社会利己主义精神的羁绊,使人们脱离了旧的直接的政治共同体,成为利己主义的独立个人,获得了作为

① 德语 Jude,除"犹太人"、"犹太教徒"基本含意外,还有"高利贷者"、"商人"的意思。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446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423 页。

④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441、429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442 页。

利己主义的人的自由并承认这种自由。

但是，正因为如此，政治革命没有对市民社会本身的组成部分"实行革命"和进行批判"①，而是把市民社会、利己主义个人、私人利益和私人权利看作"自己存在的基础"。所以马克思指出，政治革命有自己的"限度"，这种限度在于：如果说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的话，那么"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②。也就是说，它并没有克服市民社会同政治国家的相互异化，而是通过把人二重化而完成了这种异化。例如，通过政治解放所获得的不同于公民权的人权，只"是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即脱离了人的本质和共同体的利己主义的人的权利"③，私有财产这种人权，就是任意地，不受社会束缚地使用和处理自己财产的权力、自私自利的权力。政治解放所获得的宗教、财产、行业等自由，也只是"作为孤立的、封闭在自身单子里的那种人的自由"④，它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结合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与人分离的基础上，它使每个人不是把别人看作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作自己自由的限制。因此自由也成为与人相外在的东西，国家可以成为共和国，自由人同样不自由。可见"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⑤，而人类解放，则是为反对人类自我异化的极端实际表现而奋斗。马克思此时对人类解放的表述还很抽象，但从对政治解放局限性的分析中，不难看出，这是指与不触犯大厦基础的"纯政治革命"相区别的、对构成异化(宗教、国家、人)根源的市民社会本身的改造。马克思写道："在人类自我解放竭力采取政治自我解放的形式的时期，国家是能够而且也一定会达到废除宗教、消灭宗教的地步的。但这一步，它只有通过那种达到废除私有财产、限定财产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3页。

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7、438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5页。

最高额、没收财产、实行累进税的办法”，通过“同自己的生活条件发生暴力矛盾，宣布革命是不停顿的，才能做到”①。就是说，政治革命只有深入并扩展到对市民社会的改造，废除私有制时，才转变为人类解放。而随私有制的废除，人的二重化也将克服，“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作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②

三、无产阶级是人类解放的物质力量

如果说人类解放是人的全部生命力的解放，不仅消除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而且消除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那么实现这一解放的实际前提和动力是什么？马克思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第二篇文章探讨了这一问题。文章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认识，标志着马克思已完全转到共产主义立场上。

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向德国制度开火、“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③。同时，马克思还指出，这种彻底的革命，除了需要彻底的理论外，还需要“物质基础”。因为理论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现实需要的程度，“彻底的革命只能是彻底需要的革命”④。在远远落后于英法等国的实际历史进程，而在抽象思维活动中、在国家哲学、法哲学中伴随现代各国发展的德国，具备了产生彻底革命的前提和基础吗？马克思从对德国的现状分析及与英法等国的对比中，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回答。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0–43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2页。

马克思指出，近代德国由于政治经济落后，没有同英法等国一起经历资产阶级革命，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结的事物，在德国才刚刚开始。这样，它不仅没有分享到资产阶级革命的积极成果，相反却分享到封建制度敌视革命、防备革命的复辟，没有分享这一革命所带来的“欢乐和局部的满足”，却分担到这一革命消极方面所带来的痛苦。例如，德国各邦政府，把现代国家的文明缺陷和旧制度的野蛮缺陷结合起来，其结果还远远超出文明缺陷本身。德国的君主想扮演一切国王的角色，封建的和官僚的、专制的和立宪的、独裁的和民主的，正像罗马百神庙中可以看到一切民族的神一样，在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也集中“一切国家形式的罪孽”①。这种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制度交织在一起的状况，决定了德国“形成一种特殊世界的政治现状的缺陷”，要消灭这种缺陷不可能再重复英法式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治革命），而是需要彻底的革命，因为“不摧毁政治现状的一般障碍，就不可能摧毁德国特殊障碍”②。

马克思接着从德国阶级关系、阶级力量的变化中，进一步说明进行彻底革命的必然性。他指出：“对德国来说，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并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只有部分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③这是由德国特殊的社会状况和阶级状况决定的。所谓部分的纯政治革命，就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解放自己，取得普遍统治，就是一定阶级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从事整个社会的解放。进行部分政治革命的根据在于，市民社会的一个阶级能在一瞬间激起自己和群众的热情，“这个阶级本身的要求和权利真正成了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④，因而这一阶级也被看成是“社会的普遍代表”。“只有为了社会的普遍权利，个别阶级才能要求普遍统治。”⑤与此同时，作为革命所要推翻的另一阶级，社会的一切缺点都必须集中于这个阶级身上，这个

①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3页。

④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4页。

阶级成为“一般障碍的化身”、“共通的障碍的体现”，这一阶级的作用领域也“被看成整个社会公认的罪恶，……从这个领域解放出来就表现为普遍的自我解放”①。例如，在法国革命中，具有普遍积极意义的资产阶级和普遍消极意义的法国贵族和僧侣，便具有上述特征。但是，这种进行政治革命的阶级关系基础，如果说在法国具有典型形式的话，那么在德国却不具备。因为德国这样一个受到资产阶级革命影响，但又保持着封建君主专制的国家，“任何一个特殊阶级，不仅缺乏那些把自己标志为社会消极代表的彻底、尖锐、勇敢、无情，同样，任何一个等级也缺乏和人民心胸相同……的开阔的胸怀，……缺乏革命的大无畏精神”②。在分散的、利己主义的固步自封中，形成了德国特有的阶级关系态势：每个阶级不是当它处于受压迫地位的时候，而是当产生了另一阶级，并且它自己则处于压迫者地位时，才开始意识到自己，才提出自己的特殊要求。结果是“一个阶级刚刚开始同高于自己的阶级进行斗争，就卷入了同低于自己的阶级的斗争”③。当诸侯同帝王斗争、官僚同贵族斗争、资产者同所有这些人进行斗争的时候，无产者就开始了反对资产者的斗争。资产阶级“未等庆祝胜利，就遭到了失败，未等克服面前的障碍，就设置了自己的障碍，未等表现自己的宽大本质，就表现了自己的狭隘本质”④。

马克思由上述分析得出，在德国，部分的纯政治革命是不可能的。如果在法国，部分解放曾是普遍解放的基础，那么在德国，普遍解放则成为任何部分解放的“必要条件”。在法国，由于阶级关系明显，人民中每个阶级都并不感到自己的特殊阶级，解放者的角色随着革命进程由法国人民的各个阶级顺次担任，直到最后的阶级实现社会自由。在德国，“市民社会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是它的直接地位、物质需要、自己的锁链强迫它，它一直也不会感到普遍解放

---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4页。

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5页。

的需要和自己实现普遍解放的能力"①。

那末,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呢?

马克思回答:"就在于形成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即形成一个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一个由于自己受的普遍苦难而具体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并不要求享有任何一种特殊权利,因为它的痛苦不是特殊的无权,而是一般无权,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权,它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发生片面矛盾,而是同它的前提发生全面矛盾,最后,它是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并同时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是这样一个领域,它本身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这个社会解体的结果,作为一个特殊等级来说,就是无产阶级。"②

马克思接着分析了德国无产阶级的形成,指出:"德国无产阶级是随着刚刚着手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工业的发展而形成起来的",伴随社会的急剧解体,特别是中间等级分化和破产,不断地"充实无产阶级的队伍"③,即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同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有着必然联系。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宣告现存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的身上,即无产阶级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④ 这样,马克思对实现人类解放的途径和动力的探讨,最后成为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阐述和论证。无产阶级由于其客观地位,是同现存资本主义制度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6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6-467页。

提和基础相对立的阶级，它是历史上唯一不谋求建立自己对社会的统治而斗争，而是要取消任何统治与任何奴役的阶级。同时，如果不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无产阶级自己也不能获得解放。无产阶级革命和自身解放同社会的、人类的普遍解放是完全一致的。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虽然还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但是基本方面却标志着马克思完成了两个转变。正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的一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而"马克思最初提出这个学说，是在1844年。"① 在《德法年鉴》文章发表不久，1844年6月，德国爆发了西里西亚职工起义，马克思同卢格就这次起义发生的意见分歧及公开争论中，马克思进一步发挥了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观点，特别是进一步阐明了政治解放和社会(人类)解放的关系。

在卢格看来，西里西亚职工由于贫苦状况而起义，就像地方性的水灾或饥荒一样，只有局部的意义。而普鲁士国王认为，产生赤贫现象的原因是行政机关办事不力和慈善事业办得不够。马克思驳斥了这种观点，指出曲解工人贫困的原因，并不是德国的特点，在英国也是如此。英国是资本主义制度较发达的国家，也是个赤贫的国家。在英国，工人的贫困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普遍的现象；贫困不只限于工厂区，而且也扩展到农业区。由贫困引起的抗议运动，几乎整整一个世纪以来，都在此起彼伏地重演着。但是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舆论如何看待贫困呢？托利党把原因推在辉格党身上，一切祸害都在于自由主义、竞争和过度发展的工厂制度。相反，辉格党人则认为，赤贫原因是大地产垄断和反谷物法。每一个党都认为原因只是和自己对立那个党的政治。英国政治经济学家麦克库洛赫极力美化英国工人状况，另一些人则把贫困归结为教育问题，工人缺乏教育，不懂商业规律，因此才暴动。马克思总结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437页。

道：资产阶级“国家永远也不会认为社会疾苦的根源在于国家和社会结构”。凡是有政党存在的地方，每一个政党都认为一切祸害的根源就在于执政的是别的和它敌对的政党而不是它自己。连激进的和革命的政治活动家也不是在国家的实质中去寻找祸害的根源”①。与资产阶级的态度和观点相反，在马克思看来，“赤贫现象的迅速发展乃是现代工业的必然后果”②。要消灭贫困、消灭所谓国家行政机关的无能，“就必须消灭现在的私人生活，而要消灭私人生活，国家就必须消灭自己”③。因为“国家是建筑在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的矛盾上”④。

为了驳斥卢格贬低西里西亚职工起义的说法，马克思发挥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观点，赞扬这次起义。他指出，英法工人起义没有一次像西里西亚职工起义那样具有如此的理论性和自觉性，这从起义的战歌中就看得出来，其中并没有卢格所诬蔑的狭隘内容，而是毫不含糊地、尖锐地、直截了当地宣布，它反对整个私有制社会。所以马克思说：“西里西亚起义一开始就恰好做到了法国和英国工人在起义结束时才做到的事，那就是意识到无产阶级的本质。”⑤ 至于德国工人所接受的文化和知识水平，也不因国家的落后而降低，马克思举出了魏特林，“资产阶级及其哲学家和科学家哪里有一部论述资产阶级解放(政治解放)的著作能和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媲美呢？只要把德国的政治论著中的那种俗不可耐、畏首畏尾的平庸气拿来和德国工人的这种史无前例光辉灿烂的处女作比较一下，只要把无产阶级巨大的童鞋拿来和德国资产阶级的矮小的政治烂鞋比较一下，我们就能够预言德国的灰姑娘将来必然长成一个大力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7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76页。

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0、479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3页。

士。”“德国无产阶级是欧洲无产阶级的理论家”②。

卢格认为，西里西亚职工起义失败，是因为它是在人们不幸离开共同体而孤立，思想脱离了社会原则的情况下爆发的，而社会革命没有政治精神是不可能的。卢格所讲的共同体是指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共同体，而政治精神即关于这种共同体的观点，抽象的整体的观点。实际上，这是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根本反对变更社会制度的革命。马克思指出，所有革命毫无例外地都是在人们离开共同体而孤立的情况下爆发的，例如1789年法国革命就是如此，而革命的任务，却正是为了消灭被压迫阶级被排斥于政治共同体之外的状况。其次，说人们离开共同体，实际上首先是离开了构成政治共同体基础的现实社会生活本身的共同体，即“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人的道德、人的活动、人的快乐、人的实质”，而“人的实质也就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③正是人被排斥于现实生活共同体之外，现实生活共同体同人相异化，它远比政治共同体的异化更加广泛、更加可怕、更加难以忍受，因而迫使人们起来反抗，发动起义。这种在人的生活领域内消灭孤立状态的起义，也远比政治生活领域更具有普遍性和深远意义。这里，马克思继续贯彻和发挥了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是触犯大厦基础的革命的思想。

针对卢格关于没有政治精神的社会革命是不可能的观点，马克思分析道：这是指那一种政治精神，如果是革命的政治精神，那就正是指没有政治地位的阶级渴望消除自己被排斥于国家和政治之外的状况，而这种精神又根源于人们建立相互联系的真正共同体的要求之中。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本身就具有这种政治精神。如果政治精神本身是代表那种脱离真正生活的抽象政治国家的观点，那么具有这种政治精神的革命，无非是重复这种狭隘的二重性，靠牺牲社会本身的利益，在社会之上组织一个统治阶层。这正是资产阶级革命。由此马克思总结道，具有政治精神的社会革命要

①②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3、487页。

末是一堆废话，要末是人们从前所谓“政治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的同义语。因为“每一次革命都破坏旧社会，所以它是社会的。每一次革命都推翻旧政权，所以它具有政治性。”① 与卢格关于具有政治精神的社会革命的口号相对立，马克思提出“具有社会精神的社会革命”，即“一般革命”(也是人类解放)，由于要推翻现政权和破坏旧关系，所以也同时是政治行为。“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需要这种政治行为，因为它需要消灭和破坏旧的东西。”②但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是最终消灭阶级的政治统治、消灭国家和社会分裂(从而也消灭国家)的革命，所以它在革命进程中，也将突破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局限，“抛弃政治的外壳”。马克思关于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关系的探讨，为后来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建立开辟了道路。

简短的结论

马克思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曲折的、充满矛盾斗争的发展过程。在德国当时特殊的思想、政治环境里，年轻的马克思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经受了自由思想的熏陶，从人类精神之树上吮吸着丰富的营养。经过他认真地分析、比较和思索，终于选择了集以往哲学之大成的黑格尔哲学，使之成为自己思想发展的出发点。但是，马克思并不是像自由派知识分子那样，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上接受黑格尔哲学，而是从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上去理解和发挥黑格尔哲学，这就使青年马克思能够关心和同情广大劳苦群众，面向现实生活和实践斗争，从而在理论上发掘了黑格尔哲学的积极的革命的内容。尽管这时马克思仍然是黑格尔唯心主义者，但是这种革命的倾向，很快使马克思卷入社会斗争的旋涡，同他昔日自由派的朋友们分道扬镳，并在他思想深处产生了激烈的矛盾斗争，即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8页。

他原有的黑格尔哲学观念与他从现实生活中得出的新思想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在青年马克思思想陷入极度苦闷和深刻危机之时，费尔巴哈鲜明的唯物主义观点的出现，犹如一针清心剂一样，使马克思迅速摆脱困境而走向唯物主义。

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不意味他已经创立了科学形态的哲学世界观，而完全同他先驱者的哲学观点划清了界限。这里所谓的转变，是指他对思维和存在、理论和实践作了唯物辩证的理解，同时，他诉诸无产阶级，将无产阶级视为人类解放、即实现共产主义的物质力量。马克思的这一转变，虽然距离他形成自己的完备理论体系还相当遥远，但对他创立这一崭新理论体系却具有根本的意义。马克思和他的战友恩格斯对科学世界观的探索，正是从这一前提出发的。

第三章　恩格斯世界观的转变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他为创立无产阶级的理论体系贡献了自己的全部智慧和才能。恩格斯的早期思想是他整个思想发展的胚胎阶段。在这个阶段，他在批判虔诚主义过程中找到黑格尔哲学作为自己世界观发展的起点，并在反对启示哲学的斗争中开始接受费尔巴哈的影响。而参加社会革命实践活动则促使他比马克思更早地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

第一节　挣脱宗教枷锁　走向黑格尔主义

如果说，由于家庭环境的差异，使恩格斯的思想起点有别于马克思，那末，大致相同的、对人们的思想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现实社会矛盾，又使他和马克思一样，接受黑格尔思想的影响，并开始了自己的哲学活动。

一、世界观的最初冲突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1820年11月28日出生在普鲁士莱茵省巴门[1]的一个纺织厂主的家庭里。这个家族很久以前就定居在乌培河谷，是当地的名门望族。经营漂白、纺纱和花边生产。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起初在他祖父的纺纱厂里主持业务。1837年以后与彼得·欧门在英国曼彻斯特共同创办了欧门·恩格斯纺纱厂，1841年又在巴门创办了纺纱厂。1825年以后

---

① 巴门和邻近的爱北斐特两个城市于182。年合并为乌培河谷市。

他还担任当地的学监和革新教区教会负责人。作为一个工厂主、商人、企业家，他既有发展生产、追求利润、渴望冲破封建闭关自守、开展自由贸易的进步性，又有蔑视劳动群众、害怕工人反抗、宁愿与封建势力妥协、极力维护其精神支柱——宗教虔诚主义的保守性。

恩格斯是家里的长子，父亲对他寄予极大的希望，从小对他管教很严。父亲不仅自己笃信宗教，而且教育子女要永远无条件地相信基督教的圣经、宗教教义以至每一个传教士的教义宣传。在家庭里，父亲的专横意志支配一切，妻子和子女都必须服从他，以至少年恩格斯阅读古代英雄和骑士的故事书，都被父亲看成是大逆不道和亵渎神灵的行为，严厉制止。然而，父亲愈是想使儿子禁锢在祖辈传统的加尔文教的枷锁中，儿子愈是厌恶宗教的清规戒律，甚至厌恶这个普鲁士的基督教家庭；而老恩格斯经常外出经商，见多识广，性格豪爽，爱好音乐，这些也给小恩格斯以有益的熏陶。

恩格斯的母亲伊丽莎白 恩格斯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心地善良，很有教养，性格开朗，酷爱文学艺术，颇受孩子们的敬爱。恩格斯二十岁那年，母亲送给他《歌德全集》作为礼物。恩格斯自幼爱好文学艺术直至一生，可以说，他的母亲是第一位启蒙老师。

恩格斯童年和少年时代还从他的外祖父范 哈尔这位语言学家、哈姆中学校长那里听到不少古代著名的英雄故事，激励他英勇、顽强、乐观，受到崇高的精神教育。古希腊神话中动人的英雄形象一直成为青年恩格斯追求的楷模。

总之，恩格斯在家庭里所受到的极端正统的虔诚主义教育，虽然长期禁锢着恩格斯幼小的心灵，然而母亲和外祖父，通过文学艺术，特别是古典文化的形式，有意无意地也在恩格斯的心田里播下了人文主义——这一新兴的资产阶级思想。在恩格斯心目中对于父母和家庭最初的、朦胧的爱与憎，实际上是笼罩在家庭中

的宗教虔诚主义与人文主义思潮的矛盾反映。

构成恩格斯世界观形成过程中最初冲突的原因，除家庭以外，更重要的是学校教育与社会影响。当恩格斯走出家门，穿过乌培河谷，步入学校以后，他的视野从狭小的个人家庭扩大到社会群体。时代的动荡、社会的弊端、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的矛盾、人文主义与虔诚主义的对立、自然科学与神学的相悖等等，纷繁杂乱地呈现在眼前，它促使恩格斯不断地思考，也给了他思考的方法与勇气。

莱茵省一方面靠近法国，另一方面靠近莱茵河，交通方便，又有丰富的煤炭和矿石资源，是当时政治和资本主义工业都非常发达的地区，而巴门和爱北斐特则是莱茵省纺织工业的中心，素有"德国的曼彻斯特"之称，人口约四万多。恩格斯在上学回家的路上，常常目睹工人郁闷、忧愁，有的甚至醉倒在路边，这种惨景激起恩格斯对劳动人民的无限怜悯与同情。不仅如此，恩格斯还接触到与工人处于完全不同地位的工厂主与牧师，看到他们过着优裕的生活，整天计算着如何榨取工人的血汗以及由于惧怕工人的反抗与罢工而与封建势力妥协以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一面。至于在精神领域中，当时的乌培河谷虔诚主义占了统治地位。而受这种影响最深的是教育事业。当时在教会学校里，教学的主要内容就是讲解宗教教义，采取各种方式使学生信奉上帝。有时虽然也教学生阅读、书写和计算，但那只是副课。当恩格斯开始在巴门市立这所教会学校上学时，他却厌恶宗教而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834 年 10 月，恩格斯转入当时普鲁士最好的学校之一的爱北斐特中学。这所学校虽是宗教改革协会的财产，但因为学校经费不足，学校管理委员们忙于计算经费开支，无暇过问教学，传教士们对课程安排亦不感兴趣，因而宗教虔诚主义影响略少，自由主义思想比较浓厚。除了宗教课外，学校还开设了拉丁语、希腊语、德语、法语、希伯来语、文学、地理、历史、物理、数学、

博物学、音乐、绘画等课程。高年级还增设了哲学基础知识。这些系统的基本知识教育有意无意地传播了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和科学思想，这就使从小受着严格的虔诚主义教育的恩格斯接触到被虔诚主义斥之为异端邪说的精神世界。

恩格斯从少年时代起，还显露出掌握语言的非凡才能。在中学时期就能毫无困难地迅速掌握几国语言，并能准确而熟练地翻译拉丁语、希腊语、法语等文学作品。

语言是构筑文学之宫的材料。外国语为恩格斯打开世界文学之窗，接受了新思潮的洗礼。在爱北斐特中学高年级学习的时候，他以极大的兴趣钻研了欧洲的优秀文学名著，阅读了李维、西塞罗、味吉尔、贺雷西的散文与诗歌，深为荷马史诗和欧里庇得斯的作品所陶醉。但是，给恩格斯早期思想发展以巨大推动力的还是以莱辛、伏尔泰、莫里哀、孟德斯鸠、卢梭等人为代表的法国和德国启蒙思想家的文学作品。这些充满人道主义和战斗激情的作品，为恩格斯展示了一个崇高而自由的精神境界。它催发了恩格斯面对现实，更加不可遏止地鄙视伪善、自私、贪婪，渴望挣脱宗教虔诚主义的枷锁。当然，那时他这种对自由的追求还不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和确定的目标，更多地出于个性自由的要求和对为自由而斗争的英雄业绩的向往与崇敬。

由上可见，少年恩格斯的家庭、社会环境以及精神生活，使之在世界观形成的最初阶段，伴随着激烈的内心冲突，主要是：信仰与知识的矛盾、现实与教义的冲突、争取民主自由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为解决这些内心的冲突，打消对宗教的怀疑，他曾希望返回到童年的纯朴信念，天真无邪、自由、安宁，甚至在迷惘之际，他也曾祈盼真正有一位能够驱散人间一切痛苦与不平的上帝降临尘世，使内心永远幸福与欢乐，让新的生活充满光芒，生命之花重新开放。但是，幻想并不能代替现实。因而随着恩格斯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他就必然要关心政治、面对现实、走入社会，积极参加争取自由与民主的斗争，进而为解决上述的内心冲

突创造必要的条件。

二、研究批判的神学　批判虔诚主义

恩格斯原打算从中学毕业后,就升入大学攻读经济学或法律,但老恩格斯却让儿子辍学经商,继承父业。1837年9月恩格斯屈从父命,先到巴门的商行实习。一年后又被送往不来梅继续学习商业,并被安置在圣马丁教堂牧师长特雷维拉努斯的家里,以便使之在宗教精神的熏陶下成长。

然而,影响一个人的思想,性格发生变化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现实的社会环境,不来梅的社会环境给予恩格斯以深刻的影响。这个位居德国北部的大商港,是德国当时四个自由城市之一。交通发达,商业繁荣,与德国内部和欧洲各国都有贸易往来。在精神方面,这个城市虽然和乌培河谷相似,虔诚主义渗透到一切领域,但它毕竟是享有行政自治权的自由城市,比乌培河谷开放得多,出版也比较自由,来自国内外世界各地的报纸、刊物、书籍传播着自由、民主的先进思想,这就为恩格斯打开了新的视野,唤起了他对政治的兴趣,逐渐深化了对个人的生活、理想以及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的理解。

恩格斯虽然被父亲安排在亨利希　列波尔德　大商行里工作,但他非常讨厌这种忙忙碌碌的生意经,时刻企望摆脱商业工作,成为自由人。他对文学、历史、艺术、诗歌、语言甚至音乐都有着特殊的兴趣与爱好,因此,他把全部业余时间都用来学习、研究、写作,借以摆脱内心的苦闷与冲突,寻求智慧与真理。

在不来梅,恩格斯不仅看到了歌德、席勒的名作,而且还读到当时民主主义作家海涅、白尔尼以及"青年德意志"的一些作家和政治家的作品。然而,他当时并不理解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

---

①　亨利希　列波尔德是老恩格斯的世交,萨克森王国派驻不来梅的领事,经营大规模的进口贸易。

深刻的政治内容和社会背景，他对自由向往主要是从个人情感出发，还缺乏理智和理论基础。起因于他从少年时代起就从内心里厌恶、愤恨家庭、学校强加给他的虔诚主义枷锁，以及周围伪善、庸俗的市侩作风，也就是愤恨阻碍人的个性发展、阻碍人自由地发挥自己才智的一切社会观念和社会关系，渴望得到个人的自由。其政治目标还不十分明确。1838 年 9 月他在《不来梅杂谈》上发表的第一首长诗《贝都英人》就体现了这一点。

从《贝都英人》这首最初的诗作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当时对自由的理解，可能受到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影响。卢梭认为在原始社会的“自然状态”下，人人都是自由平等的。随着人类知识的积累和技术的改进，产生了私有制，才有贫富的对立，出现了不平等不自由和一切罪恶。因此，青年恩格斯当时也把自由与奴役的矛盾归结为自然与文化（或社会）的对立。还没有完全看到人类寻求自由与平等的正确道路。因而，按照卢梭的“返回自然”的观点，劝告贝都英人返回故乡——荒凉的原野。当然，这首诗也是对当时颇有名气的德国反动作家、政治家奥　科采布的一个讽刺。

《贝都英人》发表后，得到一些人的赞赏，然而，恩格斯并不满意这一诗作，他继续利用业余时间广泛阅读各种文学作品和他所能得到的所有报刊的通俗读物，并注意步入社会观察实际生活，捕捉新鲜事物，以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后来，他发表的《佛罗里达》一诗虽然题材与《贝都英人》一样，但在思想性方面确实有了些进步。在这首构思新颖的诗篇里，恩格斯不再把通往自由的道路引向“返回自然”，而是按照歌德提出的坚持“进步的生活”的要求，把人们实现自由、解放的美好愿望同反对殖民主义者的压迫与奴役的正义斗争联系起来。同时也试图在自己的诗歌中表现德国的现实生活，肯定德意志青年联盟在为自由而斗争，它使帝王将相为之震颤。可见，恩格斯这时已开始认识到自由的敌人是殖民主义者，是德国的统治者——大小王公，并相信被压迫、

被奴役的人民有力量团结起来进行战斗，争取自由。由此，显露出青年恩格斯强烈的自由主义的政治倾向和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比起写《贝都英人》时进了一大步。恩格斯在潜心钻研歌德、席勒等人的著作的同时，也阅读了许多报刊、杂志。各种文学流派的作品，并加以对比、评价。他逐渐感到“青年德意志”这个文学派别具有鲜明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因而引起他的共鸣，给予他强烈的感染和鼓舞、

“青年德意志”产生于19世纪30年代初期。当时德国封建统治者严厉镇压反抗活动，政治迫害的风潮席卷全国，许多进步人士、诗人被迫流亡国外，侨居巴黎的路　白尔尼和亨　海涅在精神上对这个文学派别予以极大的支持。德国的政论家和批评家白尔尼 (1786- 1837)，作为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激进主义的代表，他痛恨暴君专制，力图建立一个能够给予人民自由，并为人民开辟幸福道路的德意志共和国。他的民主观点带有某种社会主义的色彩，他那为争取民主与自由的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使他享有很高的威望。德国伟大革命诗人、资产阶级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海涅 (1797- 1856) 认为，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课题，解决了它就把人类再向前推进一步，而“我们时代的伟大课题是什么呢？就是解放”。海涅所向往的“解放”，不是白尔尼所设想的以共和国代替君主国，而是根本改变现有的社会关系，解决人民的物质福利问题。他认为当绝大部分人还生活在贫困之中，只能用宗教里的天堂来安慰自己的时候，旧的唯灵论和宗教就必然存在。但是，当工业和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能够摆脱物质的缺乏，能够在地上过幸福生活，而又不损害艺术和天才的时候，人们就会理解我们了。海涅的观点虽然极为深刻，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资产阶级的眼界，但他所憧憬的社会主义也多少带有圣西门主义的痕迹。

恩格斯对于他们的思想和主张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是文学中的一种新气象。1839年4月初，恩格斯兴奋地告诉他的老同学弗　格雷培说：我应当成为青年德意志派，或者不如说，我已经

是一个诚心诚意的青年德意志派了。但是，他对“青年德意志”派的文学作品中所流露出的悲观厌世的情绪以及空泛无味的辞藻，一开始就不欣赏，认为是些陈腐不堪的东西。

恩格斯在不来梅从事文学活动，通过世界文学特别是德国当代的进步文学——“青年德意志”的文艺思潮的影响。使他的思想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他对自由的追求已不再仅仅停留在早期朦胧的个性解放的要求上，他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已达到能与现实社会政治生活相联系，并以反对宗教蒙昧主义和封建反动统治为目的。接受这种时代的要求、时代的精神也加速了他摆脱宗教虔诚主义和传统观念的思想进程。这个时期，他写了不少作品。主要代表作是 1839 年 3 月匿名发表在谷兹科夫编辑的《德意志电讯》上的《乌培河谷来信》一文。这是根据他青少年时期在家乡乌培河谷的亲身经历与观察而写的。揭露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阴暗面，抨击了伪善的宗教虔诚主义，痛斥了荒谬的先定学说，对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制度都作了重新评价与批判。文章指出虔诚主义是工厂制度的精神支柱，工厂劳动摧残了人的肉体，造成劳动人民普遍贫困，而占统治地位的宗教虔诚主义则扼杀了人民的精神，成为工厂主的护身符。尽管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那些大腹便便的厂主们的良心还是感到轻松愉快。文章还揭露了虔诚主义者的虚伪与专横，在虔诚主义和神秘主义的中心——爱北斐特的宗教改革协会甚至可以对异教徒进行正式审间，谁不到教会去听道，谁看过小说，谁参加过音乐会，那他们就将被没头没脑的罪过吓得胆战心惊，甚至如果有一个传教士和他们有一点点意见分歧，那他们也会死盯住他，看他穿的衣服是不是真黑色，正统的颜色，如果泛了点蓝色，那他也必然要倒霉，不得安宁！

《乌培河谷来信》可以说是青年恩格斯所写的第一篇批判现实的政论性文章，显示着他思想独立发展的开始，他已不再把拯救人们于苦难的希望寄托在上帝的身上，他痛斥宗教虔诚主义，坚

信现实的时代巨流的力量。这一思想上的进步导致他对自己宗教信仰的进一步批判与决裂。当然，文章也还有不足之处，例如：他看到了工厂劳动造成的恶果，却没有找到产生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的真正根源；他同情下层人们的疾苦，敏锐地觉察到了工厂主与工人的对立，可是还未能把工人作为一个阶级从一般劳动群众中分离出来；他洞察到物质利益的冲突，但还没有注意探讨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揭开了虔诚主义伪善的面纱，然而他认为先定学说不仅和理性相矛盾，也与圣经是根本矛盾的，说明他还没有深刻地认识到圣经与理性的矛盾，还不是对整个基督教的彻底否定。尽管如此，《乌培河谷来信》在恩格斯早期思想发展过程中，仍不失为一篇值得研究的重要文献，它标志着青年恩格斯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萌芽。

沿着这一思路，恩格斯在“青年德意志”的影响下，逐渐把视野投向整个德国，并在涉足政治斗争的过程中，日益深刻地感到基督教和旧政权是结为一体的，只要基督教还对人民群众发生影响，旧政权就不可能被摧毁。因此，他决心彻底批判宗教神秘主义这个贵族专制国家的精神支柱，摆脱长期束缚自己和民众的精神羁绊，消除宗教在人们心灵中的毒害。为此，从1839年春天开始，恩格斯专心研究批判的神学。当时所谓批判的神学并不是全盘否定神学，而是不带任何框框和成见地去考证、研究神学。“1835年出版的施特劳斯的《耶稣传》成了头一个推动力”[1]，这本《耶稣传》就是用批判的方法对基督教的《圣经》，耶稣的生平和事迹进行校订的一本重要著作。它为恩格斯冲破宗教神学的藩篱提供了锐利武器。

正在探求真理的道路上踌躇迷惘的青年恩格斯认真地钻研了《耶稣传》以后，仿佛是在昏暗中忽然得到了一盏明灯，感到豁然开朗。他在给准备当牧师的格雷培兄弟的信中兴奋地说，大卫·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7页。

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使你们的观点丧失了一切基础；你们的观点的历史基础已经无可挽回地毁灭了，教条式的基础也将相继垮台。施特劳斯是根本不会被驳倒的，这就是为什么虔诚主义者如此疯狂地仇恨他的原因①。自此，恩格斯以极大的兴趣开始对基督教的产生和本质问题进行了长年的研究，直至他临终的前一年写成并发表的无神论名著《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中，还记忆犹新地高度评价施特劳斯说："杜宾根学派，广义来说，应该把大卫弗·施特劳斯也算在内。在批判研究方面，这个学派达到了一个神学派别所可能做到的最高限度。"②

青年恩格斯在批判乌培河谷伪善的虔诚主义、荒谬的先定说和宿命论之后，虽然开始摆脱了困扰他许多青春岁月的宗教羁绊，但仍然没有彻底解决理性与宗教的对立，科学与宗教的矛盾，所以，他一度受到施来艾尔马赫尔（1768-1834）超自然主义的影响。他在给老同学的信中说："宗教是心灵的事情，谁有心灵，谁就虔诚；……宗教之树生长于心灵，它荫蔽着整个人，并从理性的呼吸中吸取养料。而它的果实，包含着最珍贵的心血的果实，是教义。除此以外的东西都来自魔鬼。这就是施莱艾尔马赫尔的学说，而我赞同的也正是这个学说。"③这就把神、宗教归结为人、人的心甘情愿结为人性。然而，神学唯理论虽与正统的宗教神学有所不同，有少许进步的因素，因而受到正统的虔诚主义者的歧视与谴责，但它终究只是经院神学受到启蒙思潮冲击而形成的一朵浪花，它所追求的不过是理性与宗教，人性与神性的统一，并没有真正以科学的、理性的原则荡涤宗教神学中的一切不实之处。这也是当时德国哲学和神学思想发展的体现。

施特劳斯关于基督教的神话起源说，虽然还不是完美无缺，十

---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53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3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511－512页。

分科学的，但他揭露出圣经中的种种矛盾，这给了还带有超自然主义和唯理主义色彩的恩格斯以深刻的启迪。当恩格斯按照施特劳斯的思路开始用比较科学的、理性的和现实的观点，重新考察耶稣的生平和圣经里的种种故事时，他也更加清晰地看出其中矛盾重重，难以令人置信。他在1839年4月底给弗·格雷培的信中说："我无法理解，当圣经中出现一些相当明显的矛盾时，正统派的传教士们怎么还能这样拘泥于正统的观点。"① 接着，他就提出圣经中有关约瑟的家谱问题。童贞女马利亚奇迹般地怀孕生下耶稣基督的说法，以及"正统派所炫耀的Christi ipsissima verba② 在每一本福音中都不尽相同"③等等。

在恩格斯看来，圣经的教义不仅应当符合人性，而且更应当可以用理性去说明，去领会，理性、人性应该同上帝的神性一致、统一。"只有能够经受理性检验的学说，才可以算作神的学说"④。否则，它就无法令人信仰和崇拜。然而，恩格斯看到，圣经中矛盾百出，教义与理性相悖。由此可见，恩格斯这时对宗教虔诚主义的认识比他在乌培河谷时期有所前进，他不再把理性与圣经相提并论，而看到了圣经与理性的根本对立与矛盾，因此，彻底抛弃了虔诚主义，恩格斯强调了理性与人性，反对宗教虔诚主义和圣经中的种种根本教义，但他认为自己并不是个唯理论者，而是个先锋战士、自由主义者。

怀疑和动摇促使恩格斯更深入地探索与思考。在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引起恩格斯对圣经与神迹的一系列怀疑之际，这位年青人还以自然科学知识为标准，进一步衡量和思索宗教和圣经的合理性、真实性、科学性。他愈发感到宗教不仅与理性，而且与科学之间也存在着根本矛盾。例如：圣经中摩西写的《创世纪》，叙述了宇宙和人类的起源，提出上帝用了六天时间创造了宇宙万物

---

①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462－463页、第463、502页。

② 基督亲口说的话。

之后，发现大地上的人个个罪孽深重，终日所谋所为不离邪恶，于是让洪水泛滥，淹没一切，唯有得到上帝启示的诺亚方舟存留，成为以后人类万物的祖先。恩格斯当即感到这种神乎其神的创世说，与地质科学中关于地球、万物以及人类起源的发现不符。因此，可以说它既不真实，也不科学。

活生生的现实也教育了恩格斯，使他认识到教义中的原罪说，赎罪论，都是麻醉人们的鸦片。恩格斯看到，他所敬重的争取自由的先锋战士"白尔尼在巴黎的时候，只能勉强维持自己的生活，他却把自己的全部稿费散发给穷苦的德国人，他甚至没有因此得到报答。那么，应当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了吧？可是，白尔尼确实没有'再生'。"① 因而，他明确了罪恶的根源不是先天的，与生俱来的，"罪恶是由尘世生活的各种条件引起的"②，当然也就没有必要每天向上帝请求赎罪，而应当与各种罪恶及其产生根源作斗争。在对待教义的基本理论上，年轻的恩格斯已不再站在宗教唯心主义的立场上去理解它，而是以社会现实的各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条件来驳斥有关罪恶的教义，揭露原罪说、赎罪论的伪善面纱。这实际上也是以一种科学的态度对待宗教蒙昧主义。

深入地探求与思考更加促进恩格斯对宗教信仰的怀疑以致最终转向无神论。当恩格斯以理性与科学来衡量和批判圣经和教义之后，他认为，基督教虽已有一千八百年的历史，但是，如果它不敢正视理性，害怕科学，回避矛盾，只是往对手身上抹污泥，拿不出任何论据，那还有什么值得信任呢？怎么还想继续让人们逐字逐句地相信圣经或维护上帝对人的直接感化呢？恩格斯彻悟："不论是普通的基督教徒还是亨斯滕贝格③都无法回答这些'似是而非的矛盾'，因为这是些真实的矛盾。老实说，谁要是满足于这

---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529、530页。

③ 亨斯滕贝格·恩斯特·威廉（1802—1869），德国神学家，柏林大学教授，反对青年黑格尔派。

种状况并且炫耀自己的信仰，那他的信仰就没有任何基础。”

恩格斯在摆脱宗教信仰，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思想斗争是极为严肃而激烈的，为了卸下宗教信仰这一沉重的精神枷锁，内心时常陷入痛苦的深渊，甚至不得不噙着泪水反复思考，让科学与神学、理性与信仰在头脑中拼命厮杀，他对格雷培兄弟说："当然，你在你的信仰中就像躺在温暖的被窝里那么舒适，你不了解我们这些人为了解决有无上帝这个问题而不得不进行的斗争"。向往自由的恩格斯勇敢地与形形色色的宗教神秘主义观点交锋，不让自己的信念停留在不成熟的状态中，他认为只有在自己的头脑中战胜一切怀疑的人，才是自由的人。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帮助恩格斯最终克服了对宗教教义的怀疑，动摇了他对圣经的信仰。施特劳斯的神话起源说给恩格斯打开了历史地理解基督教的道路，使他自觉地以理性、科学、现实作为向宗教进行斗争的锐利武器。因此，他终于与乌培河谷时期的宗教信仰告别了。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青年恩格斯能够迅速接受施特劳斯批判神学的观点，以理性与科学为武器彻底批判虔诚主义和宗教神秘主义，其思想基础除了来自现实政治生活的严酷教育以外，不能否认法国、德国启蒙思想家的人道主义、自由民主主义思潮对他的影响，同时，也不应忽视当时自然科学最新成果在推动他思想发展、形成正确世界观中的积极作用。然而，恩格斯虽然声称："永别了，宗教信仰！"但他实际上只是与正统的宗教信仰告别了，还不能说此时已经成为一个纯粹的无神论者了。他从正统的宗教观念和超自然主义中解脱出来之后，还有一个短暂的时期陷入了泛神论，他认为施特劳斯是神，观念是神，甚至整个自然界都充满了神意，他加入了泛神论者的行列。不久以后，在黑格尔特别是费尔巴哈的影响下，恩格斯才彻底转向无神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1 卷 第 508、511 页

三、倾心黑格尔哲学　寻找哲学基础

恩格斯思想的启蒙与发展和他对宗教的思考交织在一起，他走向哲学的道路也是从与宗教的论战开始的。大卫　施特劳斯的《耶稣传》不仅帮助恩格斯摆脱了宗教的束缚，而且给恩格斯带来了黑格尔思想的光辉，引导他从青年德意志运动走向青年黑格尔运动。恩格斯自觉地把黑格尔哲学作为自己政治志向的理论基础。黑格尔的历史观成为恩格斯建立新世界观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恩格斯青少年时期，正值黑格尔哲学在德国的鼎盛时期，它甚至被提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恩格斯年轻的时候开始是从各种书报和通俗读物中，间接地了解黑格尔的思维方式，领悟黑格尔的哲学观点。他曾阅读过麦尔克林的《对现代虔诚主义的说明与批判》(1839年版)，麦尔克林在这本书中认为，宗教是把精神本身作为绝对的一种意识，因此，宗教不应是主观的，如施莱艾尔马赫尔所理解的那样，也不应是外表的像虔诚主义所理解的那样，而应当是客观的，如哲学所理解的那样。还认为，哲学是绝对在思维领域中的一种客观的构思。可见这里已散发着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味道。尤其是通过施特劳斯的《耶稣传》，使恩格斯接触到黑格尔思想和青年黑格尔派，开始把黑格尔哲学作为自己哲学思想的出发点。他在与格雷培兄弟进行宗教论战的书信中，反复运用绝对、理性、科学、观念等思想概念，就有力的说明了这一点。

施特劳斯是恩格斯转向黑格尔的中介人。恩格斯首先钻研的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因为它比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逻辑学》、《法哲学》等专著通俗易懂，比较适合当时恩格斯的文化水平和哲学素养，是他学习黑格尔哲学最便捷的入门书。黑格尔的历史观集中体现在《历史哲学》一书中，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不是个别人物随心所欲的创造，也不是杂乱无章的现象和偶然事件的堆积，而是理性发展的必然过程，是自由概念（或绝对

观念）发展的历史，世界历史从没有自由的古老的东方开始，经过希腊、罗马，最后发展到日耳曼民族，自由概念完成了自己的发展过程。尽管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许多东西十分古怪，但他毕竟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他的历史观中的合理因素在于：他把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视为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对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来说，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条件的变化，原有的社会制度就过时了，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因而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同样要走向衰落和灭亡。

1839年底，当恩格斯开始转向黑格尔哲学时，黑格尔的历史观对于当时日夜渴望民主自由的青年恩格斯来说，是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的，他觉得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正好写出了自己的心意。为此，他兴奋地告诉威 格雷培说："我正处于要成为黑格尔主义者的时刻。我能否成为黑格尔主义者，当然还不知道，但施特劳斯帮助我了解黑格尔的思想，因而这对我来说是完全可信的。"① 不久，他又给小格雷培写信说："由于施特劳斯，我现在走上了通向黑格尔主义的阳关大道。"② 他还说：《历史哲学》是一部了不起的著作；我每晚必读，它那宏伟而惊人的思想紧紧地吸引着我。他认为黑格尔的哲学扎实、严谨、具有威力。1840年1月，牧师马莱特在《不来梅教会信使》杂志上攻击黑格尔体系不过是些"松散的语言"时，恩格斯则嘲笑他们说，黑格尔体系像块巨大、坚实的花岗岩，这些花岗岩思想散落下来，哪怕是一块小碎片，都不仅能把牧师马莱特先生的脑袋砸碎，而且能把整个不来梅庸俗陈腐的观念砸得粉碎。③

由于恩格斯在政治上，已开始成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而

---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540、544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547页。

《耶稣传》又使他消除了对传统宗教的信仰。因此，当恩格斯一接触到黑格尔关于人和神按其本质来说是同一的、世界历史是自由概念的发展等这样一些辩证的观点时，他立刻倾心黑格尔哲学，并且站在青年黑格尔派一边。其实在半年以前，恩格斯就曾态度鲜明地支持青年黑格尔派，反对老年黑格尔派。恩格斯在读了莱奥的《黑格尔门徒》以后，曾明确地指出，莱奥所攻击的正"是借助黑格尔所特有的辩证法而从公认的前提中必然得出那些结论"①，莱奥攻击的虽然只有施特劳斯、卢格等四人，其实也就攻击了同这四个人不可分割的整个学派。恩格斯嘲笑这位教授不仅政治上反动，而且学术水平太低。他说："谁要攻击黑格尔学派，他本人就必须是黑格尔这样的人物，并且创立一门新的哲学来代替这个学派。可是这个学派对莱奥不屑一顾，它在日益扩大。"②恩格斯表露这些看法的时候只有19岁，足见其对黑格尔哲学一开始就能有较好的理解，而且显示了他勇敢善辩的才能。

在青年黑格尔运动的影响下，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并非全盘接受，而是采取了分析批判的态度，他深信黑格尔哲学具有真理价内容、严谨的逻辑和革命的结论。因此必须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政治要求"汲取这个精深博大的体系中最重要的要素"即黑格尔体系中最本质的思想——辩证法并予以革命的解释与发挥。恩格斯赞赏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是自由概念的发展"这一历史观的基本观点，并从自由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把它理解为世界历史就是人们不断争取自由、发展自由的战斗历程。并认为自由概念应体现时代精神或时代观念。当青年德意志作家谷兹科夫针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把历史的进程比作一条直线的时候　恩格斯吸取了黑格尔的思想，阐发自己对历史辩证发展的理解。他说；"但

---

①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498页、第499、541页。

④　谷兹科夫：《论历史哲学》(1836年版) 中，写道："历史的形式不是上升和下不是同心圆或螺线，而是一种带有时而合拢、时而分开的线条的史诗式的平行现

是，我宁愿把历史比作信手画成的螺线，它的弯曲绝不是很精确的。历史从看不见的一点徐徐开始自己的行程，缓慢盘旋移动；但是，它的圈子越转越大，飞行越来越迅速、越来越灵活，最后，简直像耀眼的彗星一样，从一个星球飞向另一个星球，不时擦过它的旧路程，又不时穿过旧路程。而且，每转一圈就更加接近于无限。谁能预见到终点呢？就在历史仿佛转回到它的旧路程的那些地方，自以为是的鼠目寸光的人站出来洋洋得意地喊道，你们看到吗，他就曾经有过这样的思想！于是我们又听到：普天下没有什么新东西！我们那些难以理解的裹足不前的英雄好汉们，我们那些开倒车的达官显贵们欢天喜地，企图把整整三百年当作进入禁区的大胆旅行，当作热病的臆语从世界历史的年表中一笔勾销，——他们看不到，历史只是沿着最短的路程奔向新的灿烂的思想星座，这一星座不久就会以其太阳般的威力使他们呆滞的眼睛昏花迷乱。"① 在《时代的倒退征兆》的这段文字中，恩格斯与黑格尔哲学中的历史观、国家观已不尽相同，他摈弃了黑格尔把国家视为世界历史的更确切的对象，以及有了国家才有世界历史、国家的发展和世界历史的发展相一致，普鲁士国家是历史发展的顶峰等保守的政治结论，汲取了黑格尔关于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恩格斯在这里，不是把国家的出现当作历史的起点，而是认为历史的真正起点是很早的，他肯定人类历史的发展不是直线式的，而是螺线式的前进运动；他预料历史发展的规模与范围也将日益扩大；他预言社会发展阶段愈高级，历史的变化和运动就愈迅速这样一种规律性；他认定历史的发展虽然也伴随着暂时的后退，但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它没有终点、没有止境。这是恩格斯最早对历史发展辩证形式的表述，表现出恩格斯探索历史过程的卓越才能。实际上，这是以黑格尔的汹涌澎湃的历史发展辩证法，冲开黑格尔自己设置的堤坝——保守的政治结论。也说明年青的恩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1 卷，第 32 页。

格斯一开始接触黑格尔哲学，就采取了分析批判的态度，敏锐地意识到了黑格尔哲学中体系与方法的矛盾，他明确地站在青年黑格尔派一边，力图把握、解释和阐发黑格尔的辩证方法，克服其保守的一面，引出革命的政治结论。

尊重真理是聪明睿智的开端，恩格斯以黑格尔辩证发展的观点审视一切，仿佛站在高山之巅，透过黎明前灰色的云雾，看到了真理的霞光。恩格斯认为，真理是在斗争中发展的，它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有可能遭到抨击，经受磨难，但是真理终将战胜谬误。他无情地批判了那些达官显贵、庸夫俗子们安于现状和既得利益而散布的"普天下没有什么新东西"的谬论，他说："这是一条走运的伪真理。这类真理有过锦绣前程，由于众口相传，胜利地游遍全球，历经数百年，仍然不时为人津津乐道，仿佛刚刚问世。真正的真理却很难这样走运；它们必须奋斗，必须忍耐，它们受到残酷折磨，被活活埋葬，而且每一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心意塑造它们。"① 在恩格斯看来，新旧事物、新旧思想的斗争规律与真理和谬误（伪真理）的斗争规律一样，新事物、新思想必然战胜旧事物、旧思想，如同真理必然战胜谬误。恩格斯的这些思想，实际上已开始揭示真理的辩证法。

总之，当恩格斯潜入黑格尔思想的海洋，发现这"动荡"的辩证法之后，也就把这丰富而深邃的黑格尔哲学作为自己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志向和人道主义思想的坚实的哲学基础，从而增添了他争取民主与自由的信心。

四、哲学与政治相结合　成为革命民主主义者

在德国革命的前夜，要不要从思维到行动，从哲学到政治，这是当时青年黑格尔运动面临的重大课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克服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弱点，也超过了青年德

---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1 卷，第 31 页。

意志，他认为实现黑格尔的辩证法，不能依靠哲学自身，而应通过政治斗争，使哲学与政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黑格尔作为一个唯心主义者，夸大了思维、观念、精神的能动作用。在黑格尔那里，精神活动的本质仅仅表现在纯意识活动的范围内，即只表现为一种理论活动。他完全忽视现实的革命实践活动的意义。这个弱点也“遗传”给了青年黑格尔派，他们只重视理论的批判活动，认为仅仅依靠这种批判，坐而论道，就能改变现存制度，甚至可以震撼世界，从而低估了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活动在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奥·契希考夫斯基的行动哲学，虽然最早提出了实践范畴，强调了实践的作用，试图把哲学“从理论的云端下降到实践的大地。”然而，他对实践的理解还只停留在对现实的批判上，并没有作为革命实践活动去理解，因而，仍是一种抽象的理论实践。这种观点与青年黑格尔派最初的思想倾向相吻合，也影响了某些青年黑格尔分子。例如，卢格把政治实践活动和“善良愿望”、思想批判等同起来。施特劳斯认为，只要对宗教和德国的普鲁士封建专制国家进行客观的批判，而不需要付之实际行动，就能够冲决一切反动的水闸，推动社会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曾嘲笑他们反对的只是现实的影子而不是现实本身，揭露他们只不过是些“自称为狼、别人也把他们看作是狼的绵羊”①。

恩格斯最初在某种程度上也曾受到契希考夫斯基强调实践作用的行动哲学的影响，然而，由于他终日接触社会现实、经济关系和广大群众，因而对实践的理解更深一层，他从时代需要和理论与实践相互制约性出发，认为只有把先进的哲学与革命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才能把崇高的理想变为现实。在恩格斯的心目中，黑格尔是当时先进哲学的代表，这种哲学正“从理论的风平浪静的港湾驶向事件的波涛汹涌的海洋，……这种哲学正是为了抨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5页。

现存事物的实际状况而已经剑拔弩张”①。在施特劳斯和卢格等人的思想感染下，他仿佛透过黑格尔模糊不清的思辨星云看到了灿烂的思想明星，预感到“这些明星必将照耀着世界的运动。”② 他也十分崇拜本国的政治家，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著名代表白尔尼，接受了白尔尼要求自由、平等和人民主权、反对君主立宪制、提倡共和制等政治观点，赞赏白尔尼这位勇敢的政治实践家，认为他是以刚毅的性格在革命烈火中，发出了自己全部光和热的伟大战士。恩格斯还把白尔尼的许多著作和文章看作是“争取自由的行动”③，称赞白尔尼的“理论是从实践中奋斗出来的并作为实践的一朵奇葩而盛开怒放”④。因而，恩格斯很早就把白尔尼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在不来梅期间，他不顾普鲁士森严的书报检查令，往故乡巴门偷运白尔尼的《吞食法国人的人》、《巴黎来信》等禁书，并积极向友人推荐。

自1840年起，恩格斯深切地感到要完成时代赋予的任务，就不但要掌握先进的理论，而且要有革命的行动。他自觉地把黑格尔的辩证发展的历史观同白尔尼的革命政治倾向统一起来作为自己世界观的起点，他反复强调理论与实践、哲学与政治相结合的必要性，这就摒除了青年黑格尔分子的弱点。1840年2月，他在《时代倒退的征兆》一文中，就提出期待“科学和生活、哲学和现代倾向、白尔尼和黑格尔的相互影响”⑤。1840年12月，在他的文章《恩斯特·莫里茨·阿伦特》中，更加明确地指出：“我们时代的任务就在于完成黑格尔思想和白尔尼思想的相互渗透。”⑥ 1842年夏天，他又在《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一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15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151－15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15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296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35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152页。

文中，强调白尔尼与黑格尔的结合已在德国的现实斗争中，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他说："如果没有白尔尼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从黑格尔学派中产生出来的自由派的形成就会更加困难。现在的问题只在廓清黑格尔和白尔尼之间的思想道路，而且这也并不困难。这两个人的距离比表面上所看到的要近一些，白尔尼的爽直和健康观点至少是黑格尔理论上所指的那些东西的实践方面。"① 恩格斯认为，这种思想和行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十分必要，但是，还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到，还没有深入到国民之中，他希冀黑格尔和白尔尼这两颗闪烁的明星交相辉映，相辅相成。

恩格斯当时所理解的实践还不是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主要是指实际的政治斗争和革命战争。他对实践的这种理解虽然还不完善、不全面、也没有完全摆脱黑格尔的思想体系，但显然已超过了黑格尔和其他青年黑格尔分子，这就为继续解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开辟了一条道路。恩格斯关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一极为深刻的思想，后来发展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和要求。

恩格斯意识到哲学与政治、理论与实践的密切关系，坚持进步的政治观点必须以先进的哲学为指导，先进的哲学又必须通过进步的政治观点和革命实践活动来实现，这就促进了他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观点的形成，甚至还显露出某些社会主义思想的色彩。因而在世界观上，较之青年德意志的一些作家和青年黑格尔派的一些政治评论家们更进了一步。从这种立场和观点出发，他更加憎恨封建统治者，普鲁士王朝和一切扼杀民主、自由的封建专制制度。他满怀革命激情，以文章、通讯、戏剧、漫画、诗歌，勇敢地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和向普鲁士王国开火。不仅如此，恩格斯为了唤起人民为争取自由、民主而战，他还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维护封建专制，反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动谬论。1841 年 1 月，恩格斯在《恩斯特·莫里茨·阿伦特》一文中，既高度赞扬了法国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524－525 页。

革命的伟大成就，又坚决反对拿破仑的侵略、掠夺，称霸欧洲的扩张政策。为此，恩格斯坚决谴责德国封建贵族对法国大革命所倡导的民主主义原则的仇恨心理——条顿狂，即德意志狂，同时也批判了与条顿狂对立的世界主义的自由主义。恩格斯看到，法国大革命冲击了腐朽的封建贵族统治，带来了犹太人的解放，建立了陪审法庭，以健全的民法代替了罗马法典，把文明的曙光射向欧洲。但是条顿狂则力图使德国摆脱一切外来的政治、思想和道德的影响，从而把德意志民族拖进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偏见之中，以维护保守、落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条顿狂的“整个世界观在哲学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按照这种观点，整个世界就是为德国人创造的，而德国人自己早就达到了发展的最高阶段”①。条顿狂的理论根据是反动的“血统论”，主张凡不是源于64代纯粹德意志祖先的后代，不是生根于本民族的一切，都应摈弃。“条顿狂总想把这个民族拉回到德意志的中世纪去，甚至拉回到源于托伊托堡林山的初期条顿精神的纯正中去”②。因而，它表面上尊重本民族的精神和传统，实际上是反对革新、反对进步、妄自尊大、看不起别的民族和国家，尤其是借以否定法国大革命的积极成果。这是对爱国主义的歪曲。

条顿狂者宣扬“血统论”，其目的并不在于把德意志民族说成是最优秀的民族，而主要是为了论证封建等级制度的合理性，论证贵族这个等级最高贵，因而理应占有大量土地、享有特权并且世袭下去。恩格斯无情地批判了这种维护封建制度的传统的特权思想，他嘲笑所谓贵族血统最纯正、最高贵的论调时说：“贵族中还有屠夫血统”③，他们自恃为高贵的等级、特殊的人物，真是傲慢得可笑。“按照一切国家的法律，贵族，不论从事军事，还是占有大量土地都根本不享有特权”④。恩格斯还批判了条顿狂关于国

①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148、155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155页。

家体制的观念，所谓“有机国家”的谬论。指出其实质就在于论证国家的公民分为贵族、市民和农民以及相应的一切差别，在萌芽时期就包含在国家这个有机体当中，无法改变。认为这是“在民族的脚上钉了专制政体的脚镣”①，抓住中世纪和旧制度不放。恩格斯明确表示“我们仍然坚持我们的要求：废除一切等级，建立一个伟大的、统一的、平等的公民国家！”②

恩格斯也清楚地看到，南德意志等级会议的世界主义的自由主义，其危害并不次于条顿狂。他指出：“这种世界主义的自由主义否认民族差别，致力于缔造一个伟大的、自由的、联合的人类。”③它的理论根据不过是18世纪的博爱主义，与宗教唯理论同出一源。有些人认为法国大革命，特别是法国1830年的资产阶级七月革命是世界主义自由思想的起因。其实，正是七月革命使得世界主义开始瓦解，因为七月革命“最重要的意义正在于恢复了法兰西民族作为大国的地位，从而迫使其他民族去争取更巩固的内部团结。”④恩格斯赞赏政治实践家白尔尼真正“撕下了条顿狂的徒有虚表的华丽外衣，同时，也无情地揭露了只有软弱无力的虔诚愿望的世界主义的真面目”⑤。是第一个真实地阐发了德国同法国的相互关系的人。

德国长期以来皆处于封建割据、各邦分裂的状态，民族不团结、国家不统一，阻碍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恩格斯论证了克服民族分裂的必要性，指出德意志的第一需要和使德国得到自由的基础就是“要谋求欧洲各民族之间彼此有充分的了解，并且争取内部的统一”⑥。他强调：“只要我们的祖国仍然是分裂的，我们在政治上就等于零，社会生活、完善的立宪制度、出版自由以及我们所要求的其他一切都不过是一些不能彻底实现的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154、155页。

③④⑤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149、150、159页。

虔诚的愿望而已。"①他说："我们再也不做外国人愚弄的傻瓜了，我们要团结成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强大的——以及像上帝所喜欢的自由的德国人民。"②至于怎样才能实现德国的统一、强大，人民享有自由、平等，当时著名的德国作家、历史学家恩•阿伦特认为国家的兴旺"就在于君主和人民彼此真诚相爱，致力于谋求普遍的幸福"③。恩格斯从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出发，摆脱了这种超阶级的人性论，而诉诸以法。他主张，"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在它能够成为并且保持这种亲善的关系之前，首先应当在法律上确立起来。"④首先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享有自由，尔后才有公道！人们所能拥有的一切，都不是上帝和君王的恩赐，而是靠自己去创造。为了争取自由与平等，要付出鲜血和生命。

青年恩格斯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是想号召人民以实际的斗争和暴力去推翻暴君的统治，这是他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精华。与此同时，在他的许多书信和诗篇里，还闪烁出社会主义思想的光彩。他在《黄昏》《夜行》，以及他译的诗《咏〔印刷术的发明〕》中，把诗歌与哲理融在一起，表达了他所向往的未来社会的图景：在那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战争与贫穷、人人自由、平等、友爱，世界永远幸福、和平。

恩格斯在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中，有关普遍自由、幸福和平等的社会主义思想，虽然还是朦胧的、空幻的，但却是十分可贵的，这构成他后来积极研究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潮，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思想基础。并使得他比马克思更早地走向共产主义。

总之，恩格斯在不来梅两年多的商业实习期间，在他紧张的工作之余，坚持自学，深入社会，认真求索，在政治上和世界观上都获得了明显的成就：他终于挣脱了宗教信仰的枷锁，摆脱了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159、160页。

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153页。

正统宗教观念的束缚，转向了泛神论（无神论）。同时，通过施特劳斯走向了黑格尔主义，参加了青年黑格尔运动。黑格尔哲学不仅帮助青年恩格斯进一步批判了宗教虔诚主义，而且为他的新世界观找到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为民主、自由而斗争的思想武器。在黑格尔与白尔尼精神的鼓舞下，他克服了青年德意志的软弱、涣散、缺乏革命坚定性的弱点以及青年黑格尔派只重视理论批判的不足，坚决主张把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哲学与现实结合起来，展开了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这表明他已从一个向往自由的中学生成长为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使他一开始步入社会就在思想上走在同时代青年的前列。

第二节　批判谢林主义　转向费尔巴哈

从 1841 年 9 月起生活在柏林的青年恩格斯，对谢林的“启示哲学”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确立了无神论的观点，为他向唯物主义的转变创造了条件。

一、保卫黑格尔的辩证法

1840 年 7 月，普鲁士国王弗　威廉三世去世，威廉四世上台，不再实行 1815 年的宪法，采取了公开反动的措施，加紧控制文化教育领域，这使大多数青年黑格尔分子丢掉了幻想，积极宣传从黑格尔哲学中得出的无神论和激进的政治结论。要求废除反动的封建专制制度，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为此，围绕着黑格尔哲学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而这场斗争的中心在柏林，特别是在德国享有盛誉的柏林大学，成为这场思想斗争的主要舞台。

1841 年 9 月，恩格斯来到柏林服兵役，当一名炮兵。紧张的军事训练，为他增长了军事知识，熟悉了军队生活，这为他以后参加革命斗争、研究军事辩证法，铺垫了一些感性知识。然而，恩格斯最感兴趣的是参加柏林青年黑格尔派小组的活动，同时利用

业余时间到柏林大学旁听哲学、文学、宗教史研究等课程，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进一步掌握和了解黑格尔哲学。不久，正遇谢林应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之聘到柏林大学讲学，以期在黑格尔哲学的中心阵地——柏林大学，消除黑格尔哲学的影响，"降伏黑格尔哲学这条喷吐不信神的火焰和晦涩难解的烟雾的凶龙"①。

1841年秋，谢林在柏林大学的讲坛上集中攻击黑格尔的辩证法，否定可以由此引出革命的结论，并把黑格尔哲学中的成就都说成是自己的创造与发现。他还鼓吹神秘的启示哲学，摈弃理性和科学的原则，借此为神学辩护，为人间的神——威廉四世效劳。刚满21岁的旁听生恩格斯，敏锐地感到这不仅是一场哲学论战，而且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他认为谢林的哲学是"为普鲁士国王的需要"②而编造的。因此必须批判这种扼杀自由哲学的最新企图。为此，他从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出发，以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无神论为理论武器，首先站出来批判谢林的启示哲学，保卫黑格尔哲学。他连夜奋笔疾书，写了一篇文章：《谢林论黑格尔》(1841年12月载于《德意志电讯》)和两本小册子：《谢林和启示》(1842年3月在莱比锡出版)、《谢林——基督的哲学家》(1842年5月在柏林出版)，这是恩格斯早期哲学思想形成过程中具有深远意义的作品，它反映了青年恩格斯哲学思想形成的具体过程及其特点，标志着他的哲学思想发展的新高度。

《谢林论黑格尔》是在谢林开讲后的半月之内发表的，这篇檄文是个"总论"，由此，拉开了反对谢林主义斗争的序幕。恩格斯在这篇文章的一开头就指明：与谢林这场论争的实质，不是单纯的学术之争，而是"在政治和宗教方面争夺对德国舆论的统治地位即争夺对德国本身的统治地位"③ 问题。接着；恩格斯具体地、

---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20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21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197页。

历史地考察了谢林与黑格尔分歧的由来。他指出:“两个青年时代的老友，杜宾根神学院的同窗，四十年后竟成为对手相逢了。一个，在十年前已经离开人世，却比任何时候都更有生气地活在他的学生中间；另一个，在这些学生看来，三十年来精神上早已死亡，如今却突如其来地自认为有充沛的生命力，要求得到公认。如果谁真正'不偏不倚'，……谁就会把谢林在柏林的讲演中对黑格尔所作的死刑判决，看作是诸神对黑格尔当年给谢林所作的死刑判决的报复”①。原来，谢林（1775－1854）这位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之一，早年曾接受康德、费希特的思想，后来转向客观唯心主义，提出所谓“同一哲学”，主张主观事物与客观事物、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绝对同一”，即无差别的同一，并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本原既不是主体，也不是客体，更不是这两者，而是高于一切的“绝对同一性”。后来，当谢林从哲学走向宗教时，黑格尔开始从宗教走向哲学，1807年黑格尔在他的《精神现象学》一书的序言里，对谢林和同一哲学进行了批判，指出谢林“把一切都归属于绝对理念之下，以致绝对理念仿佛已在一切事物中都被认识到了，并已成功地发展成为一门开展了的科学。但仔细考察起来，我们就发现他们所以达到这样的开展，并不是因为同一个理念自己取得了不同的形象，而是因为这同一个理念作了千篇一律地重复出现；只因为它外在地被应用于不同的材料，就获得了一种无聊的外表上的差别性。……这样做出来的不是从自身发生出来的丰富内容，也不是各个形态给自身规定出来的差别，而勿宁是一种单调的形式主义”②。可见，黑格尔当年反对谢林同一哲学并不是反对其唯心主义的绝对理念，而是反对其把绝对理念或“绝对同一性”视为无内在联系的、无差别的同一，亦即非具体的同一，黑格尔还批评谢林的主客观绝对同一，不仅是一种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197页。

②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9页。

形式主义，而且陷入了空虚的无底深渊。正因为如此，谢林始终记恨在心。谢林晚年从他的“同一哲学”转向为宗教效劳的“启示哲学”，否认理性，贬低科学，宣扬神秘主义，投靠普鲁士王国，这就更加深了他与黑格尔、尤其是青年黑格尔派的矛盾。所以，1841 年秋，谢林专程来柏林大学讲学，既是“对黑格尔当年给谢林所作的死刑判决的报复”①，又是对青年黑格尔派所继承和发挥的黑格尔哲学的攻击。

恩格斯根据自己的听课记录，首先剖析了新谢林主义的基本特征，指出谢林把本质、概念与实存区别开来，然后“把第一类问题归入纯理性科学或者说否定哲学，而把第二类问题归入尚待建立的含有经验要素的科学，即实证哲学”②，或称肯定哲学，它与强调理性认识的否定哲学即黑格尔哲学的区别就在于：实证哲学认为哲学归根到底应从属于宗教，只有神的启示才是“实证”知识的唯一源泉，反对理性认识，反对科学，从而也反对自由。这种带有宗教神秘主义色彩的实证哲学就是新谢林主义的主要特征。

其次，恩格斯准确地识破了谢林以褒扬黑格尔为名，行贬责黑格尔之实的卑鄙伎俩。谢林在演讲中，把他提出的同一哲学分为“否定”和“实证”两部分之后，胡说黑格尔只停留在他的同一哲学的否定部分，因而只能称为“半个哲学”，而只有他自己吸收了以往哲学体系的实证内容，从而上升为绝对哲学，这才使同一哲学成为一个“完整的哲学”。恩格斯揭露谢林说：“如果把谢林对黑格尔体系所宣布的死刑判决的官腔去掉，那么就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其实黑格尔根本就没有自己的体系，他只不过是从我的思想中拾取残羹剩饭以勉强维持其生存而已。在我研究高尚的部分即实证哲学的时候，他却沉湎于不高尚的部分即否定哲学；由于我无暇顾及，他便承担起完成和整理否定哲学的工作，并且因为我竟托付他做这件事而感到无限荣幸。……他毕竟在　伟大思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1 卷，第 197、200 页。

想家的行列中'还占有 '一席地位'。因为他是 唯一承认同一哲学基本思想的人，而其他人对此则抱着肤浅的表面的理解'。尽管如此，他仍然一无所获，因为他妄图把半个哲学变成一个完整的哲学。"① 恩格斯满怀不平地表示，决不能让谢林在黑格尔的墓碑上刻写上这些貌似科学的侮辱话语，也决不能让谢林"把本世纪哲学的全部发展，即把黑格尔、甘斯、费尔巴哈、施特劳斯、卢格和《德国年鉴》，全都说成是依附于他的"②。恩格斯愤怒地指出："如果谢林要求我们这个世纪把从事劳动和创造性活动的四十年，把牺牲了最珍贵的利益和最神圣的传统而进行思考的四十年当作白费时光和错误倾向一笔勾销，而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表明谢林并没有虚度这四十年，那么这就未免做得太过分了。"③ 谢林腆着脸把凡是经他认可的黑格尔的东西都说成是自己的思想财富，自己的创造物，自己的血肉，也是极为卑劣的行为。

最后，面对反动哲学权威谢林的挑战，恩格斯首先站出来，坚定地表示要捍卫黑格尔哲学中的宝贵遗产。他号召黑格尔的学生，主要是青年黑格尔派起来抢救黑格尔哲学中一切还能抢救的东西。恩格斯说："我们的任务是注意他的思路，保卫大师的茔墓不受侮辱。我们不怕斗争。……凡是真的东西，都经得住火的考验；一切假的东西，我们甘愿与它们一刀两断。对手们应当承认：……那些支配着我们的思想，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得到更广泛的发展；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这么多勇敢、坚定、才华横溢的人站在我们一边。因此，让我们勇敢地投入战斗，去反对新的敌人吧；我们当中终将有人出来证明，热情之剑也像天才之剑一样锋利"④。

当然，也不能否认谢林抨击黑格尔企图从思维中寻出自然界，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20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20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20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204－205页。

证明思维对于存在是第一性的论点是"退入纯思维的范围"① 和"要退出思想范围之外的任何存在"②，击中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致命弱点。但是，谢林也没能正确解决黑格尔哲学的根本缺陷，只是从右的方面对黑格尔进行了批评。恩格斯当时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影响，而是按照黑格尔的观点说："这里没有必要为了反驳谢林而去证明:实存无疑是属于思维范围的，存在对精神而言是内在的"③。但是，恩格斯随即在《谢林和启示》一书中，对谢林的实证哲学的神秘性、非理性、反动性予以机智有力的批判。

二、抨击启示哲学

恩格斯在《谢林和启示》这本小册子中，借助费尔巴哈的无神论，坚持在合理的形态上运用和发挥黑格尔的辩证法，继续对谢林的启示哲学展开更加深入的批判，它可以说是《谢林论黑格尔》一文的"分论"。

书中针对谢林对黑格尔的污蔑和攻击，高度评价了黑格尔哲学在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概述了黑格尔逝世后十年，黑格尔哲学的蓬勃发展。强调谢林与黑格尔虽然曾经互相影响共同论证过"同一哲学"，但是后来发生了分歧，不久就分道扬镳了。"黑格尔的深邃的非静止的辩证法只是在这时，即谢林的影响已经退居次要地位时，才开始有了真正的发展"④。1806年黑格尔写的《精神现象学》就大大超过了谢林 自然哲学的观点，当黑格尔的思想创造能力越来越充沛旺盛，生气勃勃和活跃主动时，谢林则已感到精疲力尽，极度失望，渐渐停止了写作活动。恩格斯认为整个黑格尔体系的大厦是一座值得骄傲的思想宫殿，黑格尔哲学只是在他去世以后才开始真正有了生气，结出了丰硕的果实。由于他的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200页。
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204、215页。

朋友共同为他出版了《黑格尔全集》，特别是他的讲稿的出版，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黑格尔主义者应该勇于求索，深入迷宫，抢救出其中的智慧之宝，并以这种新思想去探讨一切与科学和实践密切相关的迫切问题。恩格斯还把黑格尔看作是为我们开辟了意识新纪元的人。

但是，恩格斯此时对黑格尔哲学并不是毫无批判地全盘接受，原封不动地照搬黑格尔的观点。在《谢林和启示》里，青年恩格斯敏锐地发现了黑格尔哲学中原则与结论的矛盾，进而对黑格尔体系的形成及其局限性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写道："黑格尔本人设置了界限，它们像堤坝一样拦蓄从他学说中得出的强有力的、有如急流般的结论，这部分地决定于他所处的时代，部分地决定于他的个性。"① 恩格斯认为黑格尔的思想体系早在1810年以前就已经具备了自己的基本特征；直到1820年，黑格尔的世界观彻底形成。然而，正如黑格尔所说，任何哲学只不过是时代内容在思想上的反映。因此，黑格尔的政治观点，他在英国制度影响下形成的国家学说，明显地带有法国复辟王朝时期的烙印。另一方面，就他个人的状况来看，恩格斯当时认为，如果他能够更多地抛弃自己在当时的精神气氛影响下所汲取的实证要素，同时又更多地从纯粹思想中作出结论，那么他的宗教哲学和法哲学毫无疑间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这就是黑格尔思想的全部不彻底性和矛盾的根源。而所谓抛弃在当时的精神气氛下的实证要素，主要是指抛弃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庸人气味以及肯定神的存在，肯定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的保守思想；所谓如果能够更多地从纯粹思想中作出结论，主要是指如果能够更多地从黑格尔辩证法的思维逻辑中推导出的必然结论。恩格斯这时明确地指出黑格尔的"原则总是带有独立和自由思考的印记，但是结论……往往是细心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211页。

的，甚至是谨小慎微的。”①黑格尔的学生，青年黑格尔派的卢格、鲍威尔、施特劳斯、费尔巴哈等人忠于黑格尔的辩证原则，推翻他那些找不到立论根据的结论，这无疑对恩格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恩格斯这时虽然还没有发现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的根本弱点及其与宗教的密切关系，但他关于黑格尔哲学中原则与结论相矛盾的论述，及对这种内在矛盾产生的主观原因和客观条件的分析却是生动、准确的，显示了恩格斯对于黑格尔哲学的局限性与保守性的初步突破，也显示了恩格斯力图把握黑格尔哲学中辩证发展的原则和理性主义并对谢林启示哲学进行批判的意向。

恩格斯进一步揭露了谢林对待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一哲学基本问题上的谬论。他指出：“如果说先于任何存在的思维是否定哲学的原则，那么，先于任何思维的存在就是实证哲学的原则。”②谢林的启示哲学就是他自己所标榜的实证哲学，他企图以存在先于思维来反对黑格尔的思维先于存在的观点，但是，谢林所谓的存在（Existenz）与黑格尔所谓的存在（Sein）不同，它不是客观的物质存在、不是自然界、现实的存在，而是神秘的“绝对同一”或“绝对”，谢林认为“……这种绝对是个人和整个类族自由行动中的客观事物和主观事物和谐一致的真正根据”③。因此，谢林的无差别的“绝对同一性”实际上是指先验的、永恒的神的存在。在谢林看来，这种超越一切的“绝对同一性”即神，主宰着自然和历史的进程、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的同一。而神的存在是理性根本不可能认识的，只有通过启示。在虔诚的信仰中才能领悟神的存在。因此，谢林在对待哲学基本问题上，并不是以唯物主义代替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而是以神高于思维和存在这样一个形而上学非理性主义的宗教命题，代替黑格尔的思维高于存在这样一个辩证唯心主义的命题。

---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212、243页。

③ 谢林：《先验唯心体系》，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50页。

恩格斯捍卫黑格尔的理性原则，集中从谢林贬低理性作用和宣扬宗教神秘主义方面，批判启示哲学的实质——“绝对同一性”。他指出：谢林不愿通过理性的途径来论证自己的启示哲学，他“自己关上了理性论证的大门”，谢林抽去哲学脚下的基石——理性，并认为“自然的理性连一根草的存在也无法证明；它并不能用自己的全部论证、论据和推理来吸引人；它也决不会上升为神圣的东西，因为它的愚蠢使它永远留在尘世。……理性只能认识可能的东西，却不能认识任何现实的东西，更不能认识上帝和基督教的秘密。”① 只能通过接受神的启示才能真正认识现实的一切，理解救世主的死亡、复活和升天等等。因为，只有在真诚的信仰中，受到上帝启发过的眼睛，才能认识一切，洞察一切，因此，只有神的启示才是万物的始基、“实证”知识的唯一源泉。恩格斯明确地反驳谢林说：谢林把“观念看作世界之外的存在物，看作人格化的上帝，这是黑格尔连想都没有想过的。黑格尔认为观念的实在性不外是自然界和精神”②。而谢林宣扬启示哲学，让神来主宰一切，又把理性从基督教中驱逐出去，调和知识与信仰、哲学与宗教，这实际是把时代拉向后退，退到神学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谢林是自经院哲学以来第一个公开背弃理性的人，他把科学也变成了信仰的奴仆。因此，谢林的启示哲学就是神学。恩格斯还以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观点和无神论进一步批判谢林抽象地理解理性从而贬低理性的作用。这位年轻的炮兵在强调理性、精神的实在性与客观性时说：“只有费尔巴哈使我们对它有了透彻的认识；这种结论是：理性只有作为精神才能存在，精神则只能在自然界内部并且和自然界一起存在，而不是在完全脱离整个自然界的天知道什么地方以某种与世隔绝的方式生存着”③。理性不是抽象的，是现实的，但“只有通过认识的行动证明自己的可靠性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273-274、23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229页。

的那种理性，才是现实的理性”①，如同只有能确实看见东西的那种眼睛才是真正的眼睛一样。这里可以看到，费尔巴哈对恩格斯的最初影响，以及青年恩格斯在竭力以费尔巴哈的思维方式去理解和阐述黑格尔哲学的基本概念时所表现出的可贵思想。

恩格斯坚持黑格尔关于本质与存在的辩证法。谢林根据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原理，在事物中把本质（quid）同实存（quod）区别开来，把什么（Was）同实在（Daß）区别开来，并且认为理性完全没有能力证实某物的实存，必须通过经验才能证明某物是否真实地存在着。谢林还指责黑格尔哲学从理性出发，通过思维去研究现实，那么它只能了解事物是什么、只能了解事物的本质，但是不能了解存在、不能了解事物的实存。逻辑思维过程的结果只是关于世界的思想，而不是现实世界。由此进一步论证其实证哲学如何高于黑格尔的否定哲学。从字面上看，谢林把本质与存在割裂开来，贬低理性，强调经验，似乎击中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弱点，不无道理。但是，从谢林的整个思想体系来看，谢林哲学所研究的事物的实存、实在、存在等等其实并不是现实的、经验可以达到或接触到的事物，而是研究超越一切经验以外的东西，那就是神。谢林把存在与本质绝对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也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相悖，黑格尔早在1834年写的《逻辑学》一书中，就把本质与存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认为本质就是现实的存在，真实的存在。恩格斯汲取黑格尔的思想，敏锐地揭发了谢林贬低理性，割裂存在与本质的有机联系的根本目的，他在《谢林和启示》中指出：“按照谢林的观点，由此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纯思维中，理性的研究对象不是真实存在的事物，而是可能的事物，不是事物的存在，而是事物的本质，与此相应，只有上帝的本质而不是上帝的实存才能作为它的研究对象”②。谢林为了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229，22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218页。

对黑格尔哲学，提出了理性只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却不能认识事物的实存，然后又把“存在”与“存在物”混同，并提出“没有界限的存在”、“具有一定形式的存在”、“逻辑上的存在”、“现实的存在”、“平静的存在”以及“纯粹的存在”等等一大堆混乱不堪、互相冲突、互相排斥的概念，处处自相矛盾。恩格斯幽默地讽刺谢林说：“德国人将感谢这样的哲学，它拖着他们沿着一条不通的道路走去，还要穿过可能性这个无比寂寞的撒哈拉大沙漠，但是又不给他们任何现实的东西充饥解渴，也不引导他们走向任何其他目的地，而只是拖着他们往那里去，按照这种哲学自己的说法，在那里，现实世界对理性来说仍然是百思不得其解的”①。

恩格斯以黑格尔关于可能性与现实性的辩证法，批判谢林贬低理性在认识中作用的错误观点。谢林提出：“理性是认识的无限潜在力”“理性就是潜在力”，认为一切合乎理性的都只是可能的，而不是现实的。从而割裂了可能性与现实性的联系，恩格斯坚持并发挥了黑格尔关于一切合乎理性的也是现实的辩证思想，进一步批判谢林的非理性主义，从积极的意义上理解和论述了可能性与现实性的辩证法，认为一切合乎理性的不应当只是可能的、不现实的，它应当也是必然的，现实的，只有这样理解才具有实际意义。恩格斯说：“迄今为止，任何哲学给自己规定的任务都是把世界理解为合乎理性的。一切合乎理性的，当然也是必然的；一切必然的，应当是或者至少应当成为现实的。这是通向现代哲学的伟大实践结果的桥梁。”② 谢林不愿承认从黑格尔强有力的辩证法中引出革命的实际成果，所以他不承认世界合乎理性也是顺理成章了，他把可能性与现实性绝对对立起来，破坏了世界观的完整性，“成为最不能令人满意的二元论”③。这样，谢林就同所有先进的哲学家之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1 卷，第 22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1 卷，第 217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1 卷，第 218 页。

形成了一条鸿沟，站到了反动的哲学一边。而在青年恩格斯看来，普鲁士君主专制国家已经阻碍了民主与自由的事业，阻碍了理性的发展，因而失去了它的必然性，丧失了其继续存在与发展的理由和权利，成为不合理的政权，必须予以推翻。由此可见，恩格斯在与新谢林主义的斗争中，确实汲取了黑格尔思想的实质和原则，摈弃了他的保守的政治结论，对黑格尔的“一切合乎理性的也是现实的”① 这一命题作出了积极的、革命的解释与阐发，使它成了反对普鲁士君主专制制度的斗争武器。

1842 年初，恩格斯又匿名发表了《谢林——基督哲学家》这本小册子，可以说是他批判新谢林主义的“总结”。恩格斯不仅从哲学上逐一批判了谢林所谓的实证哲学的种种谬论，指出其实质是比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和神秘主义更加杂乱的货色，而且从政治上揭露“谢林恢复了善良的旧时代，当时理性为信仰所左右，世俗智慧像奴仆一样听命于神学，听命于上帝智慧，从而变为上帝智慧”②，其目的不过是想借助这种魔法，从他“不可追溯的存在”的无底深渊里召唤出上帝来，让上帝主宰一切，也就是让上帝智慧在人间的体现者——普鲁士国王及其封建专制国家统治一切。“他是为普鲁士国王的需要而维护自己的体系”③，谢林称得上是一位“基督哲学家”。

总之，恩格斯在与谢林论战、写作《谢林论黑格尔》、《谢林和启示》、《谢林——基督哲学家》时，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影响，没有充分认识到宗教神秘主义与哲学唯心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但是，这些作品表明年青的恩格斯已经把握了黑格尔的“强有力的辩证法”并能以此为武器对于神秘的启示哲学和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批判，通过哲学上的论战，卓有成效地促进了进步事业的发展。同时，这也集中地反映了当时青年黑格

---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1 卷，第 219、277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1 卷，第 216 页。

尔派的哲学观点。因此，这些论文和小册子一经发表，就立即受到国内外进步力量的重视与好评。《德国年鉴》的编辑、政治家卢格开始由于恩格斯的作品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握特”或匿名发表，便误以为是出自巴枯宁的手笔，曾称赞道：“这个有希望的青年正在超过柏林的一切老蠢材咧”①。后来卢格得知《谢林和启示》等是恩格斯写的，随即写信钦佩地称恩格斯为博士，还埋怨他为什么不把稿子投给《德国年鉴》，恩格斯回信解释未予投稿的原因之后说：“我决不是博士，而且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博士；我只是一个商人和普鲁士王国的一个炮兵。”②

三、费尔巴哈的解放作用

恩格斯对谢林的批判，使谢林的宗教和封建卫道士的面孔暴露无遗，终于被迫辞去柏林大学教职，悄然离去。在与谢林的论战中，青年恩格斯所以能击中谢林哲学的要害，除了他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使他具备了敏锐的政治嗅觉以外，黑格尔的辩证法，费尔巴哈的无神论思想和唯物主义观点成为他强有力的战斗武器，也提高了他辨别是非的能力。如果说施特劳斯是使恩格斯从宗教信仰走向黑格尔哲学的中介人，那么，费尔巴哈则是使恩格斯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中介人。

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一书揭露了宗教神学的本质，批判了启示哲学，宣传了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思想，也是对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体系的有力冲击。1841年恩格斯批判谢林启示哲学的前夕，费尔巴哈的这部名著已经轰动了德国思想界，因而也引起了恩格斯的重视，《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对于恩格斯哲学世界观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费尔巴哈的书促使恩格斯最终确立了无神论观点。这部公开

---

① 弗·梅林《马克思传》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0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28页。

宣传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反对思辨哲学的光辉著作，给人们观察周围事物以崭新的观点和方法，它与以往一切唯心主义和神学观察世界的方法和观点完全不同，可以说是从根本立场上颠倒过来了。这些思想给恩格斯以新的启迪，他在《谢林与启示》一文中抒发自己接受费尔巴哈无神论观点之后的喜悦心情时写道："宛若光辉的、自由的古希腊意识从东方的晨曦中脱颖而出，一个新的黎明，一个世界历史的黎明正在出现。太阳升起了。……人类焦急地期待着它的光辉。我们从沉睡中醒来，压在我们胸口的梦魇消失了，我们揉揉眼睛，惊奇地环顾四周。一切都改变了。"① 当时的德国社会状况并没有发生什么根本的变化，仍然是神学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君主制度的国家，社会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意识形态没有多大改变，而恩格斯却感到仿佛一夜之间一切都改变了。"天堂降临尘世，它的珍宝撒满人间，就像路上的石子一样，俯拾即是。"② 这说明恩格斯抛开了宗教神秘主义，按照费尔巴哈的观点，把所谓属神的世界，视为真正的、现实的属人的世界，理解到"神学之秘密是人本学"③ 之后，如梦初醒，从而转向了无神论。

费尔巴哈实际上使恩格斯迅速确立了世界统一性的观点。《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反对宗教和神学把世界二重化，即反对把世界分裂为天国和尘世、彼岸和此岸，认为天国、彼岸是人们的主观想象，是不现实的。恩格斯在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下，虽早已对上帝的天国不感兴趣，但世界究竟是什么？恩格斯还不能作出解答。因此，当他读到费尔巴哈关于世界统一性的详细论证时，便欣然赞同并在与谢林的论战中汲取、运用了这一唯物主义观点，他认为，究竟什么东西是从来就存在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1 卷，第 26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1 卷，第 267 页。

③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 1962 年版，第 315 页。

呢？如果我们从逻辑上推论，这个真正的存在物本身只能导致物质的永恒性。恩格斯还指出，世界是完整的、独立的、自由的。这里所谓世界是完整的，就是说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本没有天国与尘世之分，只是到了中世纪才被人为地分开了，当时，一些人宣扬天国与尘世的矛盾，人与神的矛盾，并把它提升为思想原则，这是极其荒谬的。恩格斯指出，谢林企图把世俗的智慧变为上帝的智慧，让人的理性服从于信仰、听命于上帝的启示，这实际上也是把世界分裂为天国与尘世，破坏了世界的完整性，为宗教神学论证。所谓世界是独立的，就是说世界不是上帝创造的，世界既不依赖于神，也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独立地存在着。世界本来就存在，它不需要任何证明。恩格斯认为世界是自由的，是因为世界本不受上帝的控制和支配，它自由地生存在寥廓的太空中，如同还俗的僧侣。

费尔巴哈关于自然界的基础作用，它的客观性以及人与自然界、精神与自然的关系的思想也给了青年恩格斯以强烈的感染。当恩格斯热烈赞赏费尔巴哈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无神论观点的同时，实际上也接受了他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恩格斯在《谢林和启示》中说：在此以前一直同我们格格不入的世界，像幽灵一样以它隐蔽的力量使我们担惊受怕的自然界，－－现在同我们是多么亲密，多么接近啊！在我们看来曾经像地狱一样的世界，现在显露了真实的形态，犹如我们大家——富人和穷人、贵族和平民都可以出入的宏伟的王宫。自然界向我们敞开了大门并且向我们热情地招呼：别离开我，我是不能被摈弃的，我没有背弃真理，过来看看吧，正是你们自己最内在的本质赋予我生命力和美妙的青春！恩格斯还认识到自然界是人的母亲——自然界的宠儿即人，人经过青年时代的长期奋斗，异国他乡的长年漂泊之后，又作为一个自由的人回到了自己母亲——大自然的身边。在保卫大自然母亲免遭敌人侵害时，在长期艰苦奋斗地追求与探索之后，人克服了自身的分化，自己内心的分裂，才逐渐产生了人的自我意识。这

里不仅生动地说明了自然界的客观性、基础性。而且表明了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的意识，这一精神现象也是人类在与自然界长期斗争中形成的。恩格斯还认为，理性也不是在世界之前或世界以外独立存在的，更不是如谢林所谓的受神启示后才能产生的认识，理性只有作为精神才能存在，精神只能在自然界内部并和自然界一起才能存在。

总之，费尔巴哈及其《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使得青年恩格斯超出黑格尔的泛神论，最终确立了无神论观点，并在自然观上向唯物主义迈出了第一步，显示了关于意识本质和起源的唯物主义思想萌芽，以及竭力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结合起来的可贵尝试。这就构成他尔后突破黑格尔唯心主义思想体系转向唯物主义的思想基础和契机。但是，由于当时恩格斯的哲学素养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他基本上还没有摆脱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所以没能充分领会和吸收《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的真正价值和意义，例如，他虽然初步意识到了哲学与宗教的关系，指出过黑格尔哲学是一种表面上的基督教、黑格尔的宗教哲学过于正统、黑格尔把辩证法神秘化是多余的等等，却没能看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和无神论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宗教观的本质区别，误认为“费尔巴哈对基督教的批判，是对黑格尔创立的关于宗教的思辨学说的必要补充”①。并把费尔巴哈视为黑格尔的“最年轻的继承人”②。

由于恩格斯的社会经历及其坚定的民主主义立场，使他对于费尔巴哈的哲学观点一开始就不是无分辨地兼收并蓄。例如，费尔巴哈在指出神学的秘密在于人本学之后，就以人本主义为基础，指出要克服现实社会中的一切邪恶与弊端只有通过“爱”，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不分男女，不分等级地互相亲吻。恩格斯对费尔巴哈这种把“爱”捧上了天的观点持保留态度。在争取自由、反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266页。

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中，他号召："我们将血战一场，我们将无所畏惧地直视敌人冷酷的眼睛并且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①]恩格斯能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发表后不久，就立即发现费尔巴哈在社会历史观方面人本主义思想中的弱点和局限性，这是极为可贵的。仅此而言，他超过了当时的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

恩格斯在与新谢林主义斗争的过程中，看到了谢林是从右的方面批判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是从"左"的方面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批判的。然而，当时费尔巴哈虽然宗教观是无神论，自然观是唯物论，但在社会历史观方面，基本上仍然是唯心主义的。所以，恩格斯在转向费尔巴哈期间，未能完全抛弃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点，在社会历史观中唯心主义亦占据着主导地位，他仍过高地评价"观念"，"人类的自我意识"的社会作用和力量，相信"观念的万能"[②]，认为"它比天地间的一切都强大，它横扫阻碍它前进的一切敌人，所向披靡。"[③]"它才是最高的启示，人对人的启示"[④]。号召大家为了实现人类的自我意识，为了观念的需要，我们应该腰悬利剑去战斗，继之而来的必将是自由的千年王国。由此可见，青年恩格斯在冲出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开始转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发展进程中，思想上充满矛盾与斗争。但他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无神论以及对黑格尔辩证发展观的深刻理解，使他后来在对社会现实的研究中迅速地超越了费尔巴哈。

第三节　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

列宁曾经指出，恩格斯是在英国的曼彻斯特认识工人阶级的。正是英国社会的现实矛盾和工人运动，推动了恩格斯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

---

①②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269、267－268页。

一、唯心史观与现实的矛盾

1842年11月，恩格斯告别祖国，前往英国曼彻斯特。途中他去科伦拜访了马克思。但由于马克思怀疑他与柏林“自由人”小集团有密切联系，对之比较冷淡。不过，他们还是达成了共同战斗的协议。后来事实表明，他们这次简短的会晤，只不过是暂时的误会。

当时，英国成了世界的工厂和银行，工业产品几乎占世界全部工业产品的一半，它比法国先进，比德国差不多早进入了一个时代，是西欧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曼彻斯特仅次于伦敦，是英国第二大城市，人口约有40万，是英国纺织工业的中心，恩格斯在欧门——恩格斯纺织公司任职。曼彻斯特也是最坚强的工会所在地，是宪章运动的中心。恩格斯对英国状况并不十分陌生，除因1840年初夏他曾来此一游之外，1842年在他批判谢林之后，为了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他放下写作，集中精力学习，并对英国进行了研究，广泛涉猎了英国问题的资料。然而，对于恩格斯分析英国问题影响最深的是莫泽斯 赫斯，这位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中最先转向共产主义的人。赫斯曾在《莱茵报》上撰文认为：在英国引起巨大灾难的客观原因根本不是政治上的原因。工业从人民手中转入资本家之手，商业先前由小商人小规模经营，目前已日益由少数大资本家或投机分子所操纵，地产根据继承法集中于少数贵族之家，所有这一切状况都不是政治性的，而是社会性的，这些状况到处都有，但在英国则特别显著，它们是当前巨大灾难的根源。赫斯的这种观点恩格斯早在赴英国之前就从《莱茵报》上看到，并相互交换过看法，恩格斯那时对赫斯十分钦佩。在此期间，恩格斯还阅读了法学家罗仑兹 施泰因写的《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该书强调平等是法国共产主义的主要原则，认为平等就是使工人们也得到有产阶级那样的物质待遇。在赫斯和施泰因的影响下，恩格斯开始关

注英国的社会问题。

恩格斯一到了英国，就继续注意调查研究英国的现状。作为欧门——恩格斯公司股东的长子，他不但对经商没有兴趣，而且从心底里讨厌那些锱铢必较的商人和利欲熏心的资本家，更不愿与那些矫揉造作的资产阶级太太小姐们周旋。因而每当工作之余，他便来到工人住区。正如他后来用英文写的《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一文中所说："我愿在你们的住宅中看到你们，观察你们的日常生活，同你们谈谈你们的状况和你们的疾苦，亲眼看看你们为反抗你们的压迫者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我是这样做了。我抛弃了社交活动和宴会，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和香槟酒，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的工人交往；对此我感到高兴和骄傲。高兴的是这样一来我在获得实际生活知识的过程中有成效地度过了许多时间，否则这些时间也只是在客厅里的闲谈和讨厌的礼节中消磨掉；骄傲的是这样一来我就有机会为这个受压迫受诽谤的阶级做一件应该做的事情。"①

当恩格斯走进英国社会生活的深处时，一种奇怪的现象使他感到惊奇：英国的统治者面临国内危机，仍然很镇定，对未来充满信心。他们认为，"目前英国确实处于危机的境地，但是由于它的财富、工业和制度，它有办法冲破困难，不致受到暴力的震荡；它的宪法非常灵活，经得起各种派别之争所带来的最沉重的打击，并且可以安然无恙地度过局势所引起的一切难关。"② 显然，英国统治阶级对革命持否定态度，甚至说革命对于最下层的人也没有什么好处，只会带来失业和饥饿。

作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恩格斯当然不同意这种看法。不过，由于他当时还没有完全摆脱黑格尔唯心史观的影响，仍然被表面现象所迷惑，面对现实的社会矛盾，他曾觉得："对于一个执迷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7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46页。

悟的不列颠人，无论如何也讲不明白在德国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一点，那就是所谓物质利益在历史上从来也不会是独立的主导的目的，而总是有意无意地为指出历史进步方向的原则服务。”① 从这种唯心史观出发，恩格斯曾试图依据英国落后的政治与先进的思想之间的矛盾，引出英国社会革命的必然性，这当然不可能真正揭示出英国社会革命的客观基础，也不可能找到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

然而，尖锐的社会现实斗争冲破了唯心史观对恩格斯的束缚，他难以回避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即物质利益和精神原则的关系问题、是物质利益导出精神原则？还是精神原则导出物质利益？是物质利益最终制约和推动社会历史发展？还是精神原则最终制约和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德国作为一个哲学的民族，它的哲学家们对抽象原则问题特别感兴趣，当原则问题和物质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他们总是轻视利益，看重原则。这当然不是说，物质利益在德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不起重要作用，而是因为德国当时的落后状况，还没有把各阶级物质利益的冲突充分而鲜明地暴露出来，精神原则的争论，往往掩盖了物质利益的冲突。而在发达的资本主义英国，物质利益的冲突已经赤裸裸地表现出来。所以，当恩格斯刚到英国还以德国哲学家的思维方式去观察英国的现实，自然就遇到了一个明显的矛盾，这就是唯心史观与客观现实的矛盾。铁一般的事实使恩格斯很快就认识到这一点，他深感自己的推论难以令人信服，不能改变“执迷不悟的不列颠人”的看法，所以，暂且撇开那些原则问题不谈，而去认真分析英国社会中由于物质利益的冲突所造成的种种矛盾。这是他对唯心史观重大突破的开端。

恩格斯看到英国当时主要有三个阶级：土地贵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与之相适应的有三个主要党派：托利党，它是土地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46－547页。

族的党，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是一个纯粹中世纪式的反动透顶的党。另一个是辉格党，它是金钱贵族的党，代表以商人和厂主为核心的资产阶级利益，它与土地贵族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但当工人觉悟起来威胁到资产阶级利益时，它又往往采取模棱两可的中庸立场。还有一个是宪章派，它是激进民主派，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体现了工人阶级的集体意识，是那个时代的第一个工人政党。

而各个党派围绕谷物法的斗争，更深化了恩格斯的认识。1815年托利党政府为保护土地贵族和富裕农场主的利益，颁发了谷物法。主要是规定国内市场上小麦价格每夸特低于80先令时，禁止粮食进口。这项法令促使国内粮价高涨，工业劳动力昂贵，它不但使工人生活更加贫困，而且也损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辉格党要求废除谷物法，提议实行每夸特粮食只收8先令的固定税率，以便于粮食的自由贸易。这样既可以削弱土地贵族和富裕农场主的利益，又可以降低工人的工资，从而使资产阶级能够攫取更多的利润。宪章派也反对谷物法，主张谷物自由进口，以维护工人群众的切身利益，但它不愿充当资产阶级反谷物法的斗争工具。恩格斯当时就预言，谷物一定会自由输入，在人民群众激愤的压力下，谷物法就要寿终正寝了。1846年谷物法的废除，证实了恩格斯的预见。几十年来围绕着谷物法而展开的尖锐斗争，使恩格斯异常清晰地看到：物质利益的冲突是阶级斗争和政党斗争的客观基础。只有把握住物质利益的冲突，才能认清英国社会各种斗争的根本内容。恩格斯晚年撰写《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时，回忆起这段经历和自己这时的思想认识时说：“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现代阶级对立所由产生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

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①

二、英国社会革命的可能性

恩格斯从物质利益出发，看到物质利益冲突是英国社会革命的客观基础，构成了英国社会革命的可能性。他注意到英国的物质财富比较丰富，但支撑英国社会大厦的基础却很薄弱。他分析了英国这个工业国的物质前提，初步揭示了英国由于物质利益的冲突而面临的种种矛盾。例如，英国的工业品与外国工业品的竞争以及英国商品的不断增长要求输出与殖民地市场难以完全容纳的矛盾；提高关税与国内商品价格随之昂贵的恶性循环；英国资产阶级日益富有与无产阶级不断贫困等等。所有这一切使英国处于进退维谷的窘境，而在继续维持资本主义生产的状况下，英国统治者靠自身的力量是难以解决这些矛盾的。宪法的灵活性也无济于事。由此，恩格斯得出结论说：“革命在英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正像英国发生的一切事件一样，这个革命的开始和进行将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原则，只有利益能够发展成为原则，这就是说，革命将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会革命。”②

恩格斯的这个结论标志着他开始抛弃以往自己的唯心史观，试图唯物主义地解决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认识到只有物质利益才能发展成为精神原则，恩格斯也超越了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立场，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一边，把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求的政治革命与解放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加以区分，初步阐述了在英国实现社会革命的必然性。

恩格斯晚年在回顾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中，再次强调了物质利益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他认为唯心史观的错误不在于承认精神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而在于没有进一步追溯隐藏在精神动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51页。

力背后的动力是什么。在以前的各个历史时期，要找出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因果关系是混乱而隐蔽的。而在英国，自1815年以后，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争夺统治权是英国全部政治斗争的中心。1830年起，工人阶级又成为争夺统治权的第三个战士。“当时关系已经非常简单化，只有故意闭起眼睛的人才看不见，这三大阶级的斗争和它们的利益冲突是现代历史的动力。”① 恩格斯的这些论述显然是肯定了自己初到曼彻斯特时所形成的观点，即从英国社会的经济事实出发，具体地分析各种物质利益的冲突，去观察和解决社会历史问题。这更加说明恩格斯到达英国以后，他的立场、观点、方法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渐摆脱黑格尔的唯心史观，趋向唯物史观，从而开始彻底转向唯物主义，由此开始了他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发展的新阶段。恩格斯把物质利益的冲突视为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的观点，实际上也是他在唯物史观创建时期最先铺下的一块基石。

通过什么方式进行社会革命？合法革命能否实现？这也是恩格斯一到英国就注意探索的问题。在他看来，工人阶级如果不能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就无法实现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任务，社会主义就只能是一种空想。英国工人阶级运动几起几伏屡遭失败，其重要原因就是未能找到正确的社会革命的方式，实现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解放。

恩格斯观察到，英国工人运动的两个派别：社会主义者和宪章主义者深受欧文的和平改良思想的影响，主张合法革命。

英国社会主义的创始者罗伯特 欧文（1771－1858）揭露了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的弊端，并力图找出一种方法，借以改善贫苦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同时又有利于企业主。他幻想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消灭贫困，消灭阶级对立，人人平等、财产公有、共同享受劳动成果。欧文想通过和平的方式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6页。

来改造资本主义制度，通过教育传播知识，以示范性的试验来实现社会主义。但是，他的理想和实验最后都失败了。欧文的这些思想在英国的影响很大，恩格斯说："当时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会运动、一切实际成就，都是和欧文的名字联在一起的。"①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大多来自资产者，少数来自工人。他们拥护欧文的学说，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但他们只注意争取社会舆论，而反对以暴力手段改变现存制度。他们看到，工人对资产者的痛恨和愤怒与日俱增，因而极力宣扬慈善和博爱。提出建立"国内移民区"，逐渐实行财产公有；要求为离婚提供便利条件；取消刑罚，给犯人以合理的待遇；成立合理的政府，使人们有充分发表意见的自由等等。欧文及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在批判和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以及描绘未来新社会的图景方面，对工人起了启蒙教育的作用。但他们和平改良的思想却有碍于英国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

宪章主义者主要是一些工人和其他劳动者，其中不少人也是欧文的信徒。宪章主义开始时，主要是在工人中间传播，还没有和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截然分开，正如恩格斯所说："工人的激进主义是和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携手并进的。宪章曾是他们的共同的口号"②。宪章运动虽突破了经济斗争，发展成为政治斗争，但宪章派内部观点也不完全统一，特别是在斗争策略上存在着严重分歧。合法革命的思想比较普遍。宪章派的一位领袖洛维特就主张只进行合法斗争，反对诉诸武力，宣称必须说服全体人民用和平的方法来实现宪章，他还说，为了对付统治阶级，需要的不是枪炮，而是教育。宪章派的另一位领袖奥康瑙尔也只是口头上承认革命暴力，实际行动上仍然是一个合法主义者。他往往在斗争的紧要关头，力劝工人安静，反对采用革命的暴力手段。只有宪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17页。

章派领袖哈尼认为，必须武装人民，实行起义，才能达到目的。但他当时处于少数地位，并没有真正掌握领导权，不能改变整个“合法斗争”的局势。所以恩格斯说：“在工人和宪章派心目中唯一的指导思想……就是合法革命的思想。”①

与社会主义者和宪章主义者相反，恩格斯认为，仅仅通过合法斗争，无产阶级是不可能获得解放的。因为他到英国不久就看到，举世皆知的英国自由和民主，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只不过是纯粹形式上的权利，它以不危害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英国的立法，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法律只是一堆杂乱无章、相互矛盾的决议，法学成了诡辩术，司法机关从不遵守法律，甚至能把一个无辜的人定为罪犯。英国的议会是全靠贿赂选举出来的团体，与人民毫不相干，随意践踏人民的意志；社会舆论也很难对政府发生一点影响，至多只能在个别场合对司法和行政起些监督作用。总之，在恩格斯看来，仅仅采取争取自由民主、修改法律、议会选举、社会舆论等合法斗争的方式，根本不能改变工人阶级受剥削压迫的地位。因此，“只有通过暴力消灭现有的反常关系，根本推翻门阀贵族和工业贵族，才能改善无产者的物质状况。”②

应该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史上，是恩格斯最早提出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来推翻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统治的思想，这是他对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重要贡献。

三、无产阶级最有前途

恩格斯在赴英之前，虽然对德国的工人状况已有所了解，工人的悲惨生活和非人待遇曾激起他内心的同情与愤慨，并初步揭露了厂主们的罪行。但那时他还没有把工人当作一个阶级，工人的状况与要求没有成为他注意和研究的中心。来到英国之后，英国社会各阶级的对立与区分比较明显，工人众多而强大。工人阶

---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50、550－551页。

级占了这个国家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甚至一半，已经成了英国最强大的一个阶级。英国的未来和这个阶级的命运密不可分。所以，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斗争便成了恩格斯注意和研究的重要问题。

恩格斯看到工业的发展不但给英国带来了巨额财富，而且也造成了一个受压迫，受剥削赤贫如洗的阶级。他在曼彻斯特及其郊区目睹了这个严酷的现实。但是，恩格斯不仅看到了英国工人是个受苦受难的阶级，而且通过他们美好的精神境界和文化素养，看到了他们也是一个最革命的阶级。最初，恩格斯参加工人集会，听到很普通的工人都能够随便在大厅里做政治、宗教、社会等方面的专题报告，而且，讲得头头是道，他感到惊讶不已；但是，当他进一步接触工人以后，他发现，英国工人拥有丰富的知识和先进的思想。他们认真阅读 18 世纪法国启蒙学者的著作和战斗唯物主义者的著作，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霍尔巴赫的《自然体系》和伏尔泰的各种著作。此外，在工人中还流传着托马斯 倍恩、雪莱、拜伦等进步的文艺作品，施特劳斯的《耶稣传》，以及各种阐明共产主义原理的小册子和报刊。工人们在业余时间里常到无产阶级的、特别是社会主义者的学校里去听关于自然科学、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讲演会，恩格斯也往往随着参加。因而“常常碰到一些穿着褴褛不堪的粗布夹克的工人，他们显示出自己对地质学、天文学及其他学科的知识比某些有教养的德国资产者还要多。”①

与此相反，英国的资产阶级上层却已精神空虚，日暮途穷。英国所谓有教养的阶级对任何进步都置若罔闻，他们根本不读那些进步的书刊，甚至觉得把雪莱、拜伦的作品摆在自己桌子上就会声誉扫地。恩格斯深切地感到“上流社会的书刊都已走向穷途末路，其内容正像饱食终日暮气沉沉的上流社会本身一样，是异常

---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芳第 2 卷，第 528 页。

枯燥的。"① 资产阶级在精神上已经萎靡不振，而无产阶级却眼睛雪亮地正视着一切，如饥似渴地汲取着人类文化的精华。恩格斯初步以人们的社会地位来解释人们的社会意识，他说："由此可见，在英国，一个阶级的社会地位愈低，愈'没有教养'(就一般的意义来说)，它就愈进步，愈有远大的前途——这一情况是非常显著的。"②

英国工人大多是无神论者，他们有一个纯朴的信念，就是只重视事实，不相信上帝。在曼彻斯特英国社会主义者主办的"共产主义大厅"讲演会上，工人们的演讲常常涉及工人生活的某些方面，也有时挪揄牧师神甫，抨击基督教，甚至把基督教徒叫做"我们的敌人"。恩格斯深深感到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人们这种反对教会、不信鬼神的观点十分可贵，它比法国的社会主义者更有原则，更重实际。

恩格斯也肯定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性与实现社会主义的献身精神，认为他们绝不像贵族和资产者那样瞻前顾后，自私自利。恩格斯看到，工人阶级的力量随着宪章运动日益壮大，反谷物法同盟已丧失元气。在英国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宪章派，当时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因此，当奥格斯堡《总汇报》驻伦敦记者撰文鼓吹"反谷物法同盟是目前国内的一种势力"时，恩格斯认为，这位记者撒下了弥天大谎。其实，反谷物法同盟自1838年曼彻斯特的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创立后，为了同地主阶级进行斗争，"同盟"曾企图利用工人群众的力量，但它目前已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了，托利党已把"同盟"从内阁和议会里赶了出来。宪章派则把它从社会舆论中赶了出来，在各个城市，各种公开的群众大会上，宪章派都能把它打得惨败。"同盟"虽然很有钱，也能募集到不少款子，但肯出钱的只是个别的盟员，而宪章派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2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61页。

成员尽管都是穷工人，但由于他们人数众多、团结一致，每一个会员都愿意出钱，因此，宪章派能募集到的经费大大超过了“同盟”。“同盟”的宣传虽然在农村中有些影响，但这并不是它所期待的结果，因为，与其说大批佃农将逐渐转向资产阶级，不如说大批雇农将倾向宪章派，从而大大增强工人阶级的力量了。总之，这时英国的社会主义正满怀信心地向前迈进并逐渐渗入社会舆论；一个人数众多的政党，几年工夫就在“人民宪章”的旗帜下形成了，它不遗余力地进行宣传鼓动和斗争，与之相比，反谷物法同盟只是一群渺小的可怜虫。

恩格斯对英国工人的生活状况、斗争精神和组织力量的考察，使他认识到工人阶级的革命本质及其历史作用，确信工人阶级是从事社会革命的主要力量，未来属于工人阶级。这种认识在他不久以后写的《英国状况　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一文中，表述得更为清楚，他写道：“只有大陆上不熟悉的那一部分英国人，只有工人、英国的贱民、穷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尽管他们粗野，道德败坏。将来拯救英国的却正是他们，他们还是可塑性的材料；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但他们也没有偏见，他们还有力量从事伟大的民族事业，他们还有前途。”①

恩格斯把社会主义事业同无产阶级的斗争紧密联系起来，看到工人阶级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强大力量。这就使恩格斯的社会历史观不致像以往的社会主义那样陷入空想；也不致像共产主义者赫斯那样耽于感伤，而是趋向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

四、共产主义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

随着欧洲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加剧，恩格斯开始思考共产主义问题。恩格斯在肯定了英国社会革命的可能性之后，便继续探索与此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28页。

如，社会革命在其他国家有可能发生吗？它的前途如何？未来社会的基础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引起恩格斯对欧洲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关注，促使他开始研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先驱者的学说和活动，以便从中吸取有价值的东西。与此同时，恩格斯在同工人群众的接触中，特别是在与英国社会主义者和宪章派的交往中，深深感到他们对大陆上各国的社会运动了解甚少。他从1842年8月大罢工的失败中，看到宪章派的领导人理论修养不够，罢工运动的目标亦不明确，在斗争的策略与方法上意见不统一，守法观念还在阻碍着运动的发展。宪章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北极星报》的编辑乔治•朱利安•哈尼虽然努力使《北极星报》体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但是，他起初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的理解还是抽象的，模糊不清的。后来哈尼自己也意识到，宪章运动的弱点就在于它缺乏完备的社会主义理论，欧文的信徒、空想社会主义者约翰•瓦茨尽管是个无神论者，出色的演说家，写过几本关于上帝是否存在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小册子，在工人中间很有威望，然而，他对法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似乎也缺乏充分的了解。英国社会主义者比宪章派看得远一些，但他们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重视不够，所以，恩格斯认为，有必要向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宪章主义者和广大工人群众介绍共产主义的学说和运动在大陆上的进展情况。而且要作到这一点也并不困难，只需把自己这个时期研究的初步成果奉献给英国读者。

恩格斯通过瓦茨已经与欧文派的机关报《新道德世界》建立了联系，恩格斯迅速写成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1843年11月初刊载在《新道德世界》上，由于哈尼参与编辑的《北极星报》从1843年9月起增辟了报道国外无产阶级运动和民主运动的专栏，所以，恩格斯在对这篇文章做了一些删节之后，同年11月中旬又在《北极星报》上发表。这篇文章实际上对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以前的各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派别和学说作了历史

的追溯和初步的分析与述评。恩格斯认为法国1789年大革命以后，空想共产主义最早的代表人物是格拉古・巴贝夫（1760-1797），他是平等派运动的思想家和组织者，1794年创办激进的刊物《新闻自由报》（后更名为《人民论坛报》），1796年初组织秘密革命团体“平等会”，密谋通过武装起义，推翻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督政府”，夺取政权。同年五月因混进组织内部的政府坐探告密而被捕，次年五月被统治者杀害。巴贝夫主张：人人都有天赋的平等权利，享受大自然提供的一切财富；人与人之间除了年龄和性别的区别以外，不应有其他差别；私有制是一切不平等的根源，只有消灭私有财产制度才能保证平等；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消灭不平等，达到普遍幸福，建立理想的社会——“平等共和国”；在共和国内组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国民公社，公社经济以农业为主，人人负有劳动的义务，实行平均分配。巴贝夫的共产主义思想有其合理的因素，但所反映的毕竟是不成熟的无产阶级利益与要求。恩格斯说：“共产主义者的密谋未能实现，因为当时的共产主义自身还是非常幼稚非常肤浅的，同时社会舆论也还不够开展。”①

恩格斯注意到另一个主张社会改革并创立了学派的法国人昂利・克劳德・圣西门（1760-1825），他同情法国大革命，然而也看到革命后的社会制度并没有解决社会矛盾和人民痛苦，资本主义社会是充满罪恶和灾难的“是非颠倒的世界”。他在1802年就了解到法国社会的阶级斗争，这是极为天才的发现，他渴望建立一个人人平等、幸福的新社会，设想了各种改造社会的方案。1816年他宣布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预言政治将完全为经济所包容，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但他还不了解社会进步的真正动力，不相信无产阶级的力量，主张由“最有教养”的企业家、银行家、商人担负社会改造的责任。他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77页。

对暴力革命，幻想通过宣传、教育、以及科学、道德的进步，实现他的理想社会。圣西门在晚年写的《新基督教》一书，宣称自己得到了天启，是上帝的传旨人。后来，他的一群信徒据此竟把圣西门主义突然间变成一种宗教，这样，圣西门派的“全部学说都笼罩了一层不可理解的神秘主义的云雾”①。恩格斯这时觉得“圣西门主义很像一颗闪烁的流星，在引起思想界的注意之后，就从社会的地平线上消失了。”②

年轻的恩格斯更为重视的是法国另一位空想社会主义者沙尔 傅立叶（1772—1837）。他以非凡的智慧研究了人类的社会制度。把人类历史分为蒙昧、宗法、野蛮、文明四个阶段，认为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它的上升时期和下降时期。傅立叶所谓的文明阶段相当于资本主义的阶段。他洞悉资产阶级社会的竞争、投机、欺诈等黑暗内幕。揭露资本主义文明是奴隶制的复活，社会的地狱。他认为生产无政府状态和竞争、投机造成贫困和失业，因此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他探索改革社会的道路，拟订了未来理想社会的计划。设想工农业相结合的“法郎吉”是理想社会的基层单位，在“法郎吉”内男女平等，共同劳动，自给自足，实行免费普及教育。恩格斯赞赏傅立叶的自由劳动理论并指出：“正是傅立叶第一个确立了社会哲学的伟大原理，这就是：因为每个人天生就爱好或者喜欢某种劳动，所以这些个人爱好的全部总和就必然会形成一种能满足整个社会需要的力量。从这个原理可以得出下面一个结论：如果每个人的爱好都能得到满足，每个人都能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那末，即使没有现代社会制度所采取的那种强制手段，也同样可以满足一切人的需要。”③ 恩格斯希望英国社会主义者注意傅立叶主义，但他也指出了傅立叶主义的不彻底性，即不主张废除私有制。因为在傅立叶主义的“法郎吉”内仍然有富

---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7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8页。

人和穷人、资本家和工人。全体社员的财产构成股份基金，所得收入除按劳动和技能分配以外，还有一部分作为资本家的利润。所以，恩格斯批判地写道："原来在关于协作和自由劳动的一切漂亮理论后面，在慷慨激昂地反对经商、反对自私和反对竞争的连篇累牍的长篇言论后面，实际上还是旧的经过改良的竞争制度，比较开明的囚禁穷人的巴士底狱！当然我们不能停在这一点上"①。

恩格斯在介绍法国现代共产主义的起源时，深刻地指出了平均主义派的错误，说他们都是一些相当"粗暴的人"。"他们想把世界变成工人的公社，把文明中间一切精致的东西——科学、美术等等；都当做有害的危险的东西，当做贵族式的奢侈品来消灭掉；这是一种偏见，是他们完全不懂历史和政治经济学的必然结果。"② 平均主义派和其他几个派别存在的时间都很短，法国工人的基本群众很快就接受了卡贝的伊加利亚共产主义学说。

在恩格斯看来，当时法国大多数优秀思想家都或多或少地倾向共产主义学说，其中最突出的是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809—1865) 他是法国政治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当时所以把他视为共产主义者，主要是因为他于1840年出版了《什么是财产?》一书，批判了资本主义，认为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是盗窃来的财物。但蒲鲁东并不主张消灭私有制。反而认为私有财产普遍化以后，小私有制便是社会幸福的基础。可见，他实际上是个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蒲鲁东还认为国家是万恶之源，任何国家，不管是民主制、还是君主制，都是凭借暴力进行统治。因此，他的结论是：我们要求实现无政府主义；不要任何政权，各人只管自己。

恩格斯把德国的社会改革运动追溯到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德国农民和城市平民的宗教改革家、德国农民战争的领袖托马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80页。

斯·闵采尔（约1490－1525）认为，宗教改革的目的不在于建立一套新的教义和仪式，而是要实行根本的社会政治变革。恩格斯认为闵采尔的思想虽然带有宗教迷信的色彩，但却包含了这样一些原则："按照圣经，任何一个基督徒都没有权利私自占有任何财产；只有财产共有才适合于基督徒的社会；一个善良的基督徒对其他基督徒不得施以任何权力和暴力，不得担任任何政府职务或享有世袭权力；相反地，既然一切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那末在人间也应该是平等的。"① 闵采尔力图使广大人民相信金钱和私有财产是"真正基督教"的障碍，要真正信仰上帝，就必须消灭私有财产，"不能既侍奉上帝，又侍奉财神"。这种思想是德国早期空想共产主义思想的表现。

德国工人空想共产主义的创始人是威廉·魏特林（1808－1871），他于1835年到达法国，曾先后参加流亡者同盟和正义者同盟，后到瑞士在工人中间从事共产主义的宣传和组织活动。他在法国期间，受到巴贝夫、傅立叶、卡贝等人的思想影响，并竭力把自己对于社会的各种观点和思想综合成一种完整的共产主义体系。1841年他在瑞士开始出版《年轻一代》杂志。次年他的名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问世。这本书评述了旧社会的制度，描绘了新社会制度的轮廓。主张实行财产公有，人人劳动、平均分配的平均共产主义，并妄想通过少数人的密谋和穷人的自发起义，达到革命的目的。魏特林的学说对德国早期工人运动有一定影响。恩格斯曾认为魏特林这一派是代表人民的，它无疑会把整个德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

恩格斯还向英国读者介绍了德国的哲学共产主义，这个派别基本上是从德国引以为自豪的古典哲学中产生出来的，其主要成员都曾经是青年黑格尔分子，如赫斯、费尔巴哈、卢格、布·鲍威尔等。马克思恩格斯也曾赞同这一派。其中赫斯是德国第一个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85页。

转向共产主义的人，他在1842年秋天就提出：只实行政治变革是不够的，唯有经过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革命，才能建立符合抽象原则的社会制度。后来，这一派的很多人也认为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达到共产主义。哲学共产主义与工人没有什么联系，主要是在有教养的人，即大学生和商人中寻找支持者。至于这个派别的学说，恩格斯认为它和英国社会主义的观点在很多方面都是一致的。不过，恩格斯特别重视共产主义同哲学的联系，认为共产主义是从康德到黑格尔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他指出："德国人是一个哲学民族；既然共产主义建立在健全的哲学原理的基础上，并且是——尤其是——从德国本国哲学必然得出的结论，那他们就决不愿意也决不会摈弃共产主义。"①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任务。我们的党应该证明：德国民族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全部哲学的努力，要么是毫无裨益，甚至比毫无裨益更坏；要么必须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结果；"德国人要不抛弃使本民族感到骄傲的那些伟大的哲学家，就得接受共产主义。"②由于哲学共产主义的成员观点很不统一，这个派别很快就不存在了。赫斯于40年代中，成为"真正社会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布·鲍威尔和卢格仍然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激进分子，费尔巴哈则始终坚持他的人本主义的共产主义，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才经过哲学共产主义，逐渐创立了科学共产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共产主义这个概念有过非常广泛的含义。欧洲1848年革命前夜，共产主义不仅是西欧各国工人阶级的利益与要求的体现，而且也曾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激进分子的一面旗帜，尤其在德国，当时几乎人人都是共产主义者，唯有无产者除外。共产主义是人们，特别是资产阶级用以表达反对现存制度的一种方式。恩格斯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了当时这一流行的观点，也是从广义上使用这一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1页。

概念。例如他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中，一开头就说："……在法国，就有 50 多万共产主义者，傅立叶派和其他不太激进的社会改革派还不包括在内；在瑞士，到处都有共产主义联合会，这些联合会在意大利、德国、甚至匈牙利都有自己的代表；德国的哲学经过长期的痛苦摸索过程，也终于达到了共产主义。"①

从发表在《新道德世界》上的这篇文章中不难看出，英国、法国，以至德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对于恩格斯虽有影响，但他对这些学说并非全盘肯定，良莠并蓄，而是弃其糟粕，取其精华，这篇文章中最基本的、最本质的东西就在于：他拨开了空想社会主义神秘的云雾，透过那美丽的幻想，找到了通往科学共产主义的道路。正如列宁所说："在数不胜数的准社会主义思潮和派别当中，恩格斯终于给自己打开了一条通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怕同那许许多多善人君子、激烈的革命者然而是坏的共产主义者决裂。"②

恩格斯在研究了西欧主要国家的社会情况和共产主义的各种派别与学说之后，第一次表述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共产主义并不是英国或其他什么国家的特殊情况造成的结果，而是以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情况为前提所必然得出的结论。"③这段话清楚地说明，恩格斯这一坚定的信念不是一时内心激动的产物，不是纯粹逻辑推演的结果，也不是基于个别国家的事实所得出的看法，而是从分析现代文明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情况而引出的科学认识，这种认识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尽管恩格斯在这里还没有具体地说明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情况是什么，但他从英国的现实生活中，看到了物质利益的冲突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接着，又研究了法国、德国、瑞士等国的情况，进一步认清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及其根源，从而实际上把共产主义建立在客

---

①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575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19 卷，第 560 页。

观物质条件发展的基础之上，在阐明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础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可见，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一开始就比以往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略高一筹。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论断无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学说，还是对于共产主义社会制度来说，都是正确的。它揭示了共产主义这三个方面统一的客观基础和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这就使共产主义学说不致成为空洞的教条，共产主义运动不会成为盲目的行动，共产主义制度不再是美妙的梦幻。

既然共产主义是从现代文明国家的一般情况为前提所必然得出的共同结论，那么共产主义就不是某一个国家无产阶级的特殊事业，而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共同事业。这样，恩格斯就以自己的论断预示了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本质，正是这一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后来才有可能明确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著名的战斗口号。

恩格斯还认识到社会革命是各国无产阶级达到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他说：“欧洲三个文明大国——英国、法国和德国——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来改变社会结构的那种急剧的革命，现在已经是急不可待和不可避免的了。”① 这个认识比他刚到英国时所形成的关于社会革命的观点又前进了一步，更为具体、更为深刻了。起初他仅仅看到英国有可能发生社会革命，而此时，他断定英国、法国和德国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社会革命；以前，他只是笼统地提出要改变反常的社会关系，这时，他明确主张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原先，他仅仅提出推翻门阀贵族和金钱贵族的统治，此刻，他肯定要改变社会结构。诚然，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并不是恩格斯最早提出来的，有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早已提出了这个主张，恩格斯继承了这一合理的思想，明确地把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作为实现共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75页。

主义的必要条件，这就同那些不主张消灭私有制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划清了界限。恩格斯把所有制的改变作为社会结构改变的基础这一观点，在理论上具有重大意义，它孕育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

确信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和社会革命的普遍性，乃是各国共产主义者保持政治上、思想上一致的共同基础，是他们团结战斗的根本条件，但这并不等于说，各国的共产主义者对一切问题的看法都完全一致，没有分歧了。恩格斯说得好，分歧总会有的，“因为共产主义学说在这三个国家的产生情况各不相同。英国人由于国内贫困和道德败坏的现象的迅速加剧，他们通过实践达到这个学说。法国人是通过政治达到的，他们起初只是要求政治自由和平等，但当他们意识到这还不够的时候，除政治要求而外，他们又提出了社会自由和社会平等的要求；德国人则是通过哲学，通过对基本原理的思考而成为共产主义者的。”① 既然共产主义学说在各个国家产生的情况各不相同，那么在一些次要问题上，彼此有些分歧也不足为怪了，它不应该妨碍各国共产主义者的亲密团结。恩格斯期望各国的社会改革派相互了解、相互鼓励、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恩格斯不仅总结了共产主义学说在英国、法国和德国产生的不同情况，而且指明了各个国家必然通过不同的道路，汇合到一个地方——共产主义。这就告诉我们，各国共产主义者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过程中，既要互相借鉴，又不把某一种方式绝对化，不应该采取统一的模式。各国共产主义者应该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制订符合本国国情的方针政策，卓有成效地解决自己国家的特殊问题，以逐步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

恩格斯深刻地意识到，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其结果将出现一个崭新的共产主义制度，这种社会制度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75－576页。

资本主义制度迥然不同，它将克服资本主义社会那种虚假的自由和平等，实现真正的自由和平等。恩格斯在追溯法国社会改革运动的历史渊源时就指出，法国大革命在欧洲奠定了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基础。这种民主制其实是自相矛盾的，骗人的，也无非是一种伪善，如同德国人所说的神学一样。所谓政治自由只是假自由，徒具空名，因而实际上是奴隶制。所谓政治平等也是虚伪的。“所以，民主制和任何其他一种政体一样，最终总要破产，因为伪善是不能持久的，其中隐藏的矛盾必然要暴露出来；要末是真正的奴隶制，即赤裸裸的专制制度，要末是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即共产主义。”① 恩格斯的这种认识，显然超出了当时一般共产主义者的观点。

在恩格斯看来，共产主义和宗教神学是格格不入的，共产主义学说不是宗教教条，共产主义运动不是教派的迷信活动，共产主义社会也不是基督徒心目中的天国。所以，恩格斯赞扬英国社会主义者和德国哲学共产主义者所持的无神论观点，不满意圣西门、傅立叶思想中的神秘主义色彩，并批判了法国共产主义者最喜欢的一个公式——基督教就是共产主义。恩格斯对基督教与共产主义问题极有兴趣，直到他临终的前一年，在《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一文中还提醒人们注意这个问题。他指出，虽然早期基督教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一样，都是由于被压迫者奋起反抗奴役和贫困而发生的运动，基督教和社会主义者也都宣传将来会解脱奴役和贫困，但是：“基督教是在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国寻求这种解脱，而社会主义则是在这个世界里，在社会改造中寻求这种解脱。”② 一个是在天国，一个是在尘世；一个是虚幻，一个是现实，完全相反，绝不能混为一谈。

共产主义不是虚无主义，一个人只有继承人类一切优秀文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57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525 页。

遗产，掌握先进的科学知识，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恩格斯的成长道路，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恩格斯虽然把自己列入德国哲学共产主义一派，但到达英国以后，他便逐步离开了哲学共产主义的观点。从《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可以看出，恩格斯这时已抛弃了精神原则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开始认识到物质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他不再认为共产主义是从抽象的哲学原理推演出来的，而把它理解为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他承认对抽象原则的偏好，对现实和私利的轻视，使德国人在政治上毫无建树；他发现德国哲学共产主义者在对待实践和有关现代社会制度的实际事物方面，远不如英国社会主义者，因此，主张应该多多向英国社会主义者学习，诚然，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也说过："英国人会觉得很奇怪，一个要消灭私有制的党，其绝大部分成员自身却是私有者，可是德国的情形恰恰就是这样。我们只能用受过较高教育的人，即用大学生和商人来充实我们的队伍；到现在为止，不论是在大学生或在商人中间，我们都没有遇到什么重大的困难。"① 这表明，在恩格斯的脑海里还留有哲学共产主义的痕迹。

总之，恩格斯在介绍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时，第一次比较详尽地评述了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派别与学说，显示了青年恩格斯科学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形成与以往的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渊源关系。尽管这一最初的评述并非完全恰当，旧观点的影响尚未彻底克服，但他已经确信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揭示了共产主义的客观前提和经济基础，肯定各个国家将通过不同道路达到共产主义，指出只有达到共产主义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和平等，说明共产主义与神秘主义、虚无主义截然不同，提出了各国共产主义者要相互了解、相互学习、相互支持的革命策略原则。所有这些，充分说明恩格斯这时不仅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2页。

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者划清了界限，而且也比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站得更高，他的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已开始萌芽。

第四节　论证共产主义的最初尝试

英国社会的特点，为恩格斯观察和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和阶级关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而也使恩格斯早于马克思开始从经济上、政治上进行论证共产主义的尝试。

一、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

恩格斯很早就注意观察和研究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问题。他年轻时，比马克思更早地离开学校，走向社会，因而也比马克思更早地接触到社会经济问题。还在家乡的时候，恩格斯就亲自观察到乌培河谷地区工人们的劳动条件极端恶劣，生活异常困苦，并认识到这是工厂劳动造成的恶果，是厂主们贪得无厌的罪孽。到了不来梅以后，他逐渐察觉到人们的罪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由尘世生活的各种条件引起的，因此，嘲讽了基督教的原罪说。他在柏林当志愿兵时，又以旁听生的身份，听取了柏林大学教授们的讲课，其中冯　亨宁教授在有关普鲁士财政制度的讲演中，介绍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及其在普鲁士的应用。但是，由于恩格斯赴英之前在世界观上还没有完全摆脱唯心主义的影响，特别是在历史观方面，还没有认识到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因此，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学问题，一时还没有成为他注意的中心和研究的主要课题。

恩格斯来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以后，便异常清晰地看到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发现物质利益产生精神原则并决定精神原则。于是他便集中精力去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同时，恩格斯在评论法国和德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学说时，深感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状况缺乏深入的了解，

他们的共产主义理想不是以科学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依据，为了克服这种弱点，也促使恩格斯倾心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

英国是政治经济学的故乡。英国的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生活已经作过一些探索，描述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经济现象，提出并分析过种种经济范畴。因此，恩格斯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问题时，除了通过各种方式搜集大量实际的经济资料外，还直接或间接地研究了英国经济学家的各种著作。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就是恩格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最初成果。

恩格斯在《大纲》中，简略地回顾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产生及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并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对这些学说做了初步的分析。从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对以往经济学说的扬弃以及他的新世界观形成同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之间的渊源关系。

恩格斯概述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他指出，起初人们以为金钱就是财富，因而，彼此都像守财奴一样，双手抱住心爱的钱袋，并想尽一切办法禁止“贵金属”外流，这就是所谓“拜金主义”，它是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最初阶段。后来，人们开始明白，一动不动地放在钱柜里的资本是死的，而流通中的资本却能增殖。于是，人们开始把自己的金币当做诱鸟放出去，以便在商业活动中把别人的金币引回来。重商主义学说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重商主义比拜金主义前进了一步，因为它不是从客观方面，而是从主观方面，即从人们的商业活动中把握财富的本质和源泉。重商主义的局限性在于，只从流通领域，而没有从生产领域去理解财富的源泉和本质，因而，未能对资本主义作出科学的说明。首先突破重商主义局限性的是重农学派，这是18世纪下半叶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它认为农业劳动是带来剩余价值或财富的唯一的生产活动，这就把财富的本质与源泉从流通领域转到直接生产领域，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奠定了基础。重

农学派的缺点是把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门的劳动，当作了财富生产的普遍形式，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看成是永恒的自然形式。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都是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在英国产业革命以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理论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23－1790）和大卫•李嘉图（1772－1823）是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恩格斯称斯密是政治经济学中的路德，肯定他的学说是一个必要的进步，并认为他的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奠定了新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但恩格斯当时还不理解斯密的价值论。在斯密看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国民财富的增长起决定作用，提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这是他的主要功绩。由于斯密所说的劳动不单是特殊形式的农业劳动，而是一般形式的社会劳动，所以超过了重农学派。但斯密并未将劳动价值论坚持到底，他在确认劳动创造价值的基本原理的同时，又认为商品价值还由工资、利润和地租决定。这个观点后来为庸俗经济学家所利用。斯密的根本弱点是把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看作永恒不变的“人类本性”，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理想的和永恒的制度。李嘉图在很多方面发展了斯密的学说，但也批评了斯密的价值论，他提出了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并据此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其它经济范畴，试图探讨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联系。他还考察了剩余价值的各种形式，说明了劳动与资本的对立，但他不了解劳动的二重性，不懂得劳动力和劳动的区别，未能弄清剩余价值的来源，并把价值和价格混为一谈。李嘉图在当时的情况下，比较客观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因而成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最后最伟大的代表。然而由于阶级的局限性，他仍然把资本主义视为永恒的、合乎理性的制度，并发表了一些庸俗的论点。恩格斯当时对李嘉图的功绩及其在古典经济学中的地位没有给予应有的肯定。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进一步

激化，逐渐超过资产阶级同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日趋解体。此后，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便逐步取代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的萨伊（1767- 1832）和英国的马尔萨斯(1766- 1554）等人首先以"注解„、"补充"古典经济学的方式，进一步发挥了古典经济学中的庸俗观点。英国的穆勒（1773-1836）则把李嘉图的学说庸俗化，认为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利润是积累起来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李嘉图的学生麦克库洛赫(1789- 1864）也把老师的劳动价值论庸俗化了，认为下等动物和自然力也能劳动并创造价值，因此，价值根本不同人的劳动相联系，这就掩盖了利润的真正来源，否定了资本与劳动的矛盾。他再三重复李嘉图、萨伊和穆勒等人关于供求恒等的论点，借以否认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必然伴侣。总之，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仅仅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表面现象，而抹煞了它的本质联系，掩饰资本主义的矛盾，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

恩格斯在《大纲》中，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共同本质，指出这种发财致富的科学，额角上就打着最丑恶的自私自利的烙印。他认为国民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在私有制社会当中实质上都是私经济学，"因为在这种科学看来社会关系只是为了私有制而存在"①。所以，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没有想到提出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②，这并不是说，资产阶级经济学不承认私有制的合理性，而是因为资产阶级经济学认为私有制本来就是永恒的、合理的，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前提和原则，因而，用不着再提出私有制的问题进行研究和论述。

恩格斯随后痛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伪善性和不道德性，他指出："商业就是一种合法的欺诈"③。各国之间在贸易当中各自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互献殷勤，彼此效劳，但实质上还是贪财和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00、59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01页。

自私，他们只要有利可图，甚至可以昧着良心使用诡计或暴力。重商主义学说在某种程度上还具有一种坦率的精神，它公开暴露自己卑鄙的贪婪，毫不隐瞒商业的不道德的本质。恩格斯还指出，新的政治经济学，即以斯密的理论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学说，也同样是伪善、矛盾和不道德的。它虽然假惺惺地对重商主义学说的血腥恐怖表示厌恶，但又创造了最粗暴、最野蛮的马尔萨斯人口论，马尔萨斯的错误并不在于他提出了人口增长和生活资料增长的关系问题，而主要在于他鼓吹通过战争、贫困和瘟疫等来消灭“过剩人口”。

恩格斯最后还批评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指出18世纪政治经济学的革命，也未能克服各种对立，它依然是孤立、静止、片面地观察问题，因而不仅把私有制凝固化、绝对化，而且，由于采用了纯经验主义和纯客观主义的方法，所以不能辩证地分析资本与劳动、价值与价格、供与求、竞争与垄断的关系，未能透过现象深入本质，通过偶然把握必然。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的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想利用一般的形而上学方法来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已是远远不够了，因而，不得不求助于诡辩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说：“我们所要批判的经济学家离我们的时代越近，我们对他们的判决就越严厉。……距离我们时代越近的经济学家越不老实。时代每前进一步，要把政治经济学保持在时代的水平上，诡辩术也必须提高一步。所以李嘉图的罪过就比亚当·斯密大，而麦克库洛赫和穆勒的罪过又比李嘉图大。”①

不过，从恩格斯无情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恩格斯还未能把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区分开来，反而把在政治经济学上有过重大贡献的斯密和李嘉图同在这门学科上微不足道的萨伊、麦克库洛赫等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8－599页。

相提并论。

尽管当时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研究还只刚刚开始，有些观点还不甚恰当，但《大纲》毕竟是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步，它为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

恩格斯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时，把私有制问题列为研究的中心。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相反，他在《大纲》中具体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的种种后果，自始至终都论证私有制的不合理性，以及消灭私有制的必要性。

恩格斯来到英国一年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个高度物质文明的国家，只不过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亲手创造大量财富的工人，生活依然像中世纪的农奴一样，贫困不堪，受尽凌辱。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却把这种贫富的对立视为永恒的自然现象。与此相反，无产阶级的思想家恩格斯则发现这是私有制造成的恶果，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国民财富”一词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的条件下，财产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恩格斯在《大纲》中具体地分析了私有制造成的各种分裂。私有制造成了资本与劳动的分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私有制把人的活动分解为资本和劳动，即分为所谓积累起来的劳动和活的劳动，二者相互对立，活的劳动依赖于资本。而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又分为原始资本和利润，一部分利润又加到资本上去，使资本不断增殖。甚至利润也分裂为利息和利润本身。私有制还造成了土地与劳动的分离。少数地主占有土地，劳动者丧失了土地，失去了人类生存的首要条件，劳动者要生活就得劳动，而地主则可以不劳而获，靠地租为生，地租归根到底是土地和劳动分离的产物。私有制保障地主能够肆意掠夺劳动群众，因此，地主的财富和权力完全是建筑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的。同样，劳动者的贫穷与无权也应归咎于私有制。私有制不仅造成资本与劳动的分裂，而且还

带来了资本与资本、土地与土地、劳动与劳动的分裂，使资本家与资本家、地主与地主、工人与工人之间互相对立。

在恩格斯看来，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一切终究都会归结为竞争。竞争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主要范畴，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最宠爱的女儿。竞争必然转化为垄断，垄断就是财产所有权。竞争者不管是个人还是小群体，都必然希望取得垄断地位来对付所有其他的人。然而，垄断也阻挡不住竞争的洪流，而且它本身还会引起竞争，正如禁止输入或高额关税会直接引起走私的竞争一样。竞争和垄断虽互相对立，但又互为前提，它们是私有制的一对孪生姊妹。

恩格斯指出："竞争的规律是：供和求始终力图互相适应，但是正因为如此，就从来不会互相适应。"①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谁也不知道需求究竟有多大，供应到底该多少？人们只好按照自己的愿望盲目生产，从而导致生产过剩，爆发商业危机。"这种危机就像彗星一样有规律地反复出现，在我们这里现在是平均每五年到七年发生一次。近八十年来，商业危机像过去的大瘟疫一样按期来临，而且它所造成的悲惨现象和不道德的后果比瘟疫所造成的更大"②。这表明恩格斯已经明确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产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它不断地冲击着资本主义制度。

恩格斯在自己的商业活动中，深深感到竞争贯串于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当然，也渗透到了道德领域。人们在竞争中尔虞我诈，损人利己，乘人之危，投机取巧，甚至互为仇敌，采取暴力，置对方于死地。因而，凶杀、抢劫、偷窃等刑事犯罪案件随着竞争的加剧而增多。这"表明私有制使人堕落到多么严重的地步"③。

为了避免财产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为了消除阶级的分裂与对立，为了铲除竞争和垄断，为了摆脱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为了

---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13、61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24页。

拯救人们堕落的灵魂，恩格斯在《大纲》中强调必须消灭私有制。

当然，在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对私有制及其恶果已作过不少批判，但他们只限于对私有制的忿懑和谴责，其中有些人，如蒲鲁东等甚至主张可以消除私有制的"缺点"，而保留私有制的"优点"。有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曾探讨过私有制的各种规律，但是，他们都没有把这些规律清楚地表达出来，也没有形成最后的结论。恩格斯对私有制的批判则深刻得多，他不单从道义上谴责私有制的非人道性，而且进一步从对经济关系的具体分析中揭示私有制的不合理性，《大纲》实际上阐明了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总根源，是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赖以存在和起作用的根本条件，并明确表述了支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一些重要规律。

恩格斯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已经作出消灭私有制和代之以公有制的结论。但他当时对私有制的批判尚未展开，而在《大纲》中对私有制的批判才有了重大的进展，这就为建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

年青的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分析，进一步论证了社会革命的必然性，说明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发展，如何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准备了前提和条件。他精辟地指出：只要资本家"继续照目前这样无意识地毫不思考地全凭偶然性来进行生产，那末商业危机就会继续下去；而且一定是一次比一次更普遍，因而也一次比一次更严重；这样就必然会使更多的小资本家破产，使专靠劳动为生的阶级人数剧增，因而也必然使急待就业的人数显著地增加(这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必须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最后，所有这一切势必引起一次社会革命，这一革命经济学家凭他的书本知识是做梦也想不到的"①。可见，恩格斯已经意识到，社会革命是社会经济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14页。

恩格斯把即将来临的社会革命称之为19世纪所面临的伟大变革，这场变革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由于恩格斯认为私有制造成劳动与土地、劳动与资本、劳动与劳动相分离，亦即造成人与自然、阶级与阶级、人与人相对立，所以，要实现人类同自然界的和解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解，就意味着要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

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恩格斯正确地预言，未来的社会将有组织地进行生产，克服生产的盲目性，消除资本主义的竞争和经济危机，摆脱一切人为的对立。他写道："如果生产者自己知道消费者需要多少，如果他们把生产组织起来，并且彼此都分担一部分，那就不会有竞争的波动和竞争引起的危机的倾向了。如果你们是像人那样有意识地进行生产，而不是像那些连类意识也没有的分散的原子那样，那末你们就会摆脱所有这些人为的无根据的对立。"① 到那时社会就能够考虑，靠它所掌握的资料能够生产些什么，并根据生产水平和广大消费者的需要来确定，应该把生产提高多少或缩减多少，应该允许生产或限制生产多少奢侈品。恩格斯的这些远见卓识显然为共产主义社会实行计划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

但恩格斯绝没有陷入空想，他在《大纲》中还正确地预见到，在消灭了私有制和阶级对立的社会制度下，还会有竞争，不过这种竞争同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竞争有着本质的区别。他写道："竞争的实质就是消费力对生产力的关系。在一个和人类本性相称的社会制度下，除此之外，就不会有另外的竞争"②。这里孕育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同人民不断增长的消费能力的矛盾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思想。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贯串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那末，在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阶级的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1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15页。

会里，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实际上只是一种竞赛，“这种竞赛将随着对立的利害关系的消灭而被限制在它所特有的合理的范围内”①。

至此，恩格斯已把不久以前对共产主义的理解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化了。他从经济学上对共产主义作了初步论证，突破了对共产主义抽象的、思辨的论证的局限性，从而把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包括他自己曾赞赏过的哲学共产主义）远远地抛在后面了。恩格斯对共产主义内容的理解日益丰富，《大纲》实际上描绘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某些基本特征，阐明了科学共产主义的若干原则，标志着他的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园地已抽芽发叶，一片新绿。马克思说得好：“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现代社会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1844年就以他首先发表在马克思和卢格在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引起了注意。‘大纲’中已经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一般原则。”②

恩格斯的《大纲》既是辩证地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最初成果，又是改造旧哲学、形成新的哲学和创立新世界观的第一步。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所以把私有制看作是永恒不变的范畴，其认识根源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即从静止的观点来看待私有制，把私有制绝对化。与此相反，恩格斯则运用辩证的思维方法来考察私有制，认为私有制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它不是永恒不变的范畴，而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是人类历史整个发展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同样，维护私有制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也只是人类整个认识发展链条中的一个环节。私有制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然会走向它的反面，“正如神学不回到迷信，就要进步到自由哲学一样，贸易自由不造成垄断的恢复，就要造成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1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59页。

私有制的消灭。"①

恩格斯从辩证发展的观点出发，肯定了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他明确指出，人类所支配的生产力是无穷无尽的。应用资本、劳动和科学技术就可以使生产无限提高。这种无穷无尽的生产力，一旦被自觉地为人类造福，人类所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看到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重大意义，促使年轻的恩格斯对未来充满信心。

对矛盾问题的分析在《大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大纲》透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分析，揭示出阶级与阶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说明了由于物质利益的冲突，"使资本同资本、劳动同劳动、土地同土地对立起来，同样又使其中的每一个因素同其他的两个因素对立起来。实力最雄厚的在斗争中取得胜利"②。为了预测这种斗争的结局，恩格斯还具体地考察了矛盾各方面的力量对比。他看到资本家和地主比工人和农民的经济实力要强得多，因此，他们在斗争中往往占优势，同样，大厂主和大商人比小厂主和小商人占优势，大地主比小地主占优势，较强的工人比较弱的工人占优势。这些矛盾斗争的结果，造成两极分化。因此，只有全面改革社会关系，消灭私有制，才能使这些矛盾得到解决。这样，恩格斯就论证了由于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斗争，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否定。

《大纲》不仅是恩格斯初次运用辩证法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作品，也是他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第一步。在黑格尔那里，辩证发展的主体是绝对观念，因而他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这种抽象、晦涩的思维方法最初曾使年轻的恩格斯难以理解，甚至觉得是一种折磨。而恩格斯在《大纲》中的分析表明，他已把现实的经济关系作为辩证发展的主体，从而扬弃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唯心主义成份，开始把辩证法置于唯物主义的基

---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9、622页。

础之上。恩格斯作为一个唯物主义的辩证论者认为，在给对象下定义时要注意客观性和全面性”即一个正确的定义要反映事物本身的发展，要包括实践中的一切情况。黑格尔所阐述的规律实质上是绝对观念发展变化的规律，是精神的规律。与此相反，恩格斯在《大纲》中把精神的规律与自然的规律加以区分。他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最欣赏的供求规律为例，说明社会经济规律不是精神的规律，而是一种纯自然的规律，是以当事人的盲目活动为基础的自然规律。这里，恩格斯实际上唯物主义地说明了社会规律也具有客观性。恩格斯在《大纲》中还进一步克服了黑格尔辩证法的不彻底性，坚持辩证发展的无限性。黑格尔认为社会发展到普鲁士王国就尽善尽美达到了顶点。当恩格斯还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时候，就批评了这种观点，当他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时候，又进一步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也并非完美无缺，不是社会发展的顶峰，它必然为更加理想而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恩格斯原则上还肯定了共产主义社会仍将存在着矛盾，这预示着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仍然不是一种停滞不前的制度，而将是一个永远充满活力、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

恩格斯在写作《大纲》的时候，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他指出18世纪的唯物主义是一种片面的、抽象的唯物主义，“它只是把自然当做一种绝对的东西来代替基督教的上帝并把它和人类对立起来”①。旧唯物主义反对唯灵论把上帝奉为至高无上的绝对者，而把自然界视为第一性的东西，这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在于它把自然界和人对立起来，认为人完全受自然界的统治和支配，看不到人对自然界的改造作用，否认了人的能动性。与旧唯物主义者不同，恩格斯强调了人对自然界的改造，重视人的能动作用，他指出：“土地没有人耕作仅仅是不毛之地”②。这就是说，自然界是要由人来改造的，人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7、612页。

通过生产活动，在自然界留下了自己的烙印，为自己创造生存的条件。后来，恩格斯在与马克思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又进一步强调了人的生产实践活动对改造自然界的意义。

恩格斯在《大纲》中所使用的“生产”这一概念，是他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制定的基本范畴之一。在他看来，生产体现了各种不同要素的辩证统一。生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自然的、客观的方面——土地和人的、主观的方面——劳动”①。这就是说，生产主要是自然界和人的辩证统一，客体与主体在生产过程中实现统一。然而，恩格斯并没有把生产的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等量齐观。而是具体地分析了它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肯定人的活动即劳动是生产的主要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把人的活动理解为肉体活动和精神活动的辩证统一。这里的精神活动，主要是指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当时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十分轻视精神要素，在他们看来，只要有土地、资本和劳动，财富就能源源不断地涌流出来，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似乎与他们无关，他们丝毫也不需要。尽管当时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通过贝尔托莱、戴维、李比希、瓦特、卡特赖特等人，使生产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仍视而不见，不把科学技术的成就列入他们的计算范围。针对这种观点，恩格斯明确指出，在合理的制度下，“精神要素当然就会列入生产要素中，并且会在政治经济学的生产费用项目中找到自己的地位。到那时我们自然就会满意地看到科学领域中的工作也在物质上得到了报偿，看到仅仅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这一个科学成果，在它存在的头五十年中给世界带来的东西就比世界从一开始为发展科学所付的代价还要多”②。恩格斯关于科学技术应该列入生产要素中的重要思想，后来在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理论中，得到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0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07页。

了进一步的发挥，同时也为现代化生产的蓬勃发展所证实。

还应该指出的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也只是停留在用自然界来取代上帝，只看到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是自然界的存在物，忽视人对自然界的改造作用，不了解人的主观能动性。因此，恩格斯对18世纪旧唯物主义的批判，实质上也就是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局限性的突破。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大纲》虽然是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但毕竟是马克思主义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实际上宣告了建立无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必要性。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政治学和哲学都是片面的，是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武器。这样的学说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是一种精神枷锁，无产阶级为了求得解放，必须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史上，《大纲》试图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运用唯物辩证的观点，把反映无产阶级利益，体现无产阶级要求的经济思想、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融为一体，这就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科学共产主义以及新世界观的创立铺设了稳固的基石。因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纲》是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

恩格斯的《大纲》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使马克思进一步认清了研究政治经济学，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意义。在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这一关键时刻，恩格斯的《大纲》促使马克思把自己的世界观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加速了马克思的思想成熟过程。

马克思十分重视并认真阅读了恩格斯的《大纲》，仔细地摘记了这篇论文的要点。《大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科学研究的方向，激励了马克思毕生紧张地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成了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言中，高度评价了恩格斯的《大纲》，称它是经济科学方面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当马克思已是一位成熟的经济学家的时候，他还对恩格斯的这篇《大纲》作了高

度的评价，称之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后来，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曾多次引用恩格斯在《大纲》中所阐述的某些论点，来论证自己关于经济理论方面最重要的结论。

列宁说得好："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① 判断一个人的历史功绩理应如此，评定一部著作的历史意义亦应如此。恩格斯的《大纲》作为马克思主义史上的奠基之作，就其基本观点来看，既超过了资产阶级经济学、政治学的著作，也胜过了当时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并且突破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局限性。因此可以说，《大纲》确实具有不朽的历史意义。

二、探索历史的本质

恩格斯在《英国状况　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一文中，明确地批判了卡莱尔的神学历史观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初步揭示了历史的本质和内容，强调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这篇文章是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同时发表在《德法年鉴》上。

是什么原因促使青年恩格斯提笔写出这篇文章的呢？这是因为1843年，英国虽然出版了不少书籍，但都使恩格斯感到枯燥乏味，只有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一书，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认为值得一读。

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是英国作家、历史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他在政治上倾向托利党，1848年后，成为工人运动的敌人。卡莱尔从反动的浪漫主义立场出发，从右的方面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尖锐的批判。1833—1834年，卡莱尔在他的第一部哲理小说《旧衣新裁》中，阐发了自己的"衣裳哲学"，按照这种哲学观点，社会、国家、宗教只是神的永恒本质所穿的暂时

---

① 《列宁全集》第2卷，第150页。

的、经常更换的“衣裳”。1841年，卡莱尔又出版了《历史上的英雄和英雄事迹》一书，宣扬英雄崇拜，说什么英雄、领袖是历史上唯一的创造力量，而群众、一般人则应被动地服从他们。这就是卡莱尔历史观的基础。

《过去和现在》一书就是从这种历史观出发，来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的。该书共分四篇：“前言”、“古代的僧侣”、“现代的工人”、“星占”。卡莱尔在书中写道：英国的状况是世界有史以来最危险的状况之一，英国有各种各样的财富，但生活在无限财富中间的人民却死于饥饿；住在黄金屋里和围在谷仓中间的人民，没有一个人生活得到保障和满足。卡莱尔认为，英国的社会到处是彻底的分离和分立，人们不是互相支持，而是互相敌视。实业贵族崇拜玛门（金钱），他们只是一伙工业强盗和工业海盗。议会是贿选产生的，一切生活关系一团混乱、纠缠不清，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工人阶级忍受着难以忍受的压迫和贫困，异常不满，民主主义向前推进，到处是紊乱不堪，无政府状态。这就是卡莱尔在书中所描绘的英国状况。

在卡莱尔看来，英国整个社会坏疽的毒根是由于宗教不再存在，人们不信上帝，丧失了自己的灵魂，徒然寻求医治脓疮的药剂。不管是绞死国王、法国革命、改革法案，还是曼彻斯特起义，都不是灵丹妙药。出路只有一条：恢复宗教，由贵族来领导和统治英国，返回到中世纪的封建秩序中去。

尽管恩格斯肯定了卡莱尔对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种种弊端和丑恶现象的揭露，但却不赞成他对英国社会病根的分析和医治的方法。卡莱尔是从封建贵族的立场来谴责资本主义制度，恩格斯则从无产阶级的立场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卡莱尔抨击资本主义社会是为了复辟和倒退，恩格斯控诉资本主义社会则是为了革命和前进。

《过去和现在》一书，就理论方面而言，涉及到历史观的基本问题，即人类历史的本质和内容归根到底是什么？谁是历史的创

造者和主人？恩格斯正是从这两个方面对卡莱尔的历史观进行了分析与批判，阐明了唯物主义地观察历史的方法，从哲学上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必然性。

卡莱尔认为，在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英国未来发展的前景时，只要人们坚持无神论，还未重新获得自己的灵魂，一切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因此，他幻想恢复宗教，但卡莱尔作为一个泛神论者，他不是把宗教理解为信仰一个人格化的神，而是理解为对宇宙内在的神的本质的信仰，相信神意支配事物发展的进程，从而把神的启示当作历史的本质和内容。

恩格斯以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观点来反驳卡莱尔的唯心主义和泛神论的观点。他明确指出，卡莱尔想创立一种新的宗教是根本不可能的，就连卡莱尔本人也承认，天主教、新教或其他任何一种基督教都不免要归于消灭；如果他了解基督教的本质，他就会知道，继基督教之后，不可能产生别的任何宗教，泛神论也不可能产生！

恩格斯指出，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荒谬性就在于轻视历史，无视人类的发展，否认真实的历史具有任何意义。基督徒们编造了一部奇特的“天国史”。硬说人类是基督创造的，说历史有一个虚幻的最终目的。他们只承认这种抽象的、杜撰出来的历史才有意义。然而，宗教按其本质来说就是剥夺人和大自然的全部内容。把它转给彼岸之神的幻影，然后彼岸之神大发慈悲，把一部分恩典还给人和大自然，恩格斯还认为，必须把宗教夺去的内容（人的内容，不是神的内容）归还给人，所谓归还就是唤起人们的自觉。

在反驳卡莱尔的神学历史观时，恩格斯发挥了费尔巴哈无神论的观点，唯物主义地解释历史的本质和内容，提出：“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0页。

“但我们认为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① 这就是说，历史的本质是人的活动，而不是神的创造。“卡莱尔当做‘崇拜’的劳动和自由活动也完全是人的活动”②，人的生产劳动和人类争取自由的斗争是历史的真实内容。

在阐述“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时，恩格斯实质上批判了以往一切哲学派别在历史观上的缺陷和错误，他说：“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在黑格尔看来，历史不过是检验他的逻辑结构的工具”③。这里所说的任何一个哲学学派，也包括费尔巴哈的哲学，费尔巴哈虽然把神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把人的事物从神的手中夺了回来，但是，他所理解的人，只是抽象的自然存在物，与社会活动无关。他不了解人类的生产劳动和争取自由的斗争在历史上的作用，以为“爱”可以在历史上创造一切奇迹。而真实的历史对费尔巴哈说来是一个令人感到不愉快的可怕的领域。在黑格尔那里，历史是绝对观念的外化，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及其纷繁复杂的现象，都是绝对观念的运动和展开。他将人类历史的发展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古代东方世界——希腊、罗马世界——日尔曼世界，以此证明在自己的哲学体系中到处可见的三段式（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逻辑结构。显然，黑格尔颠倒了现实历史与抽象观念的关系，他不重视人的活动，特别是生产劳动，只注意“自由概念”的发展。

恩格斯对卡莱尔宗教观的批判，比起他1842年对谢林启示哲学的批判更为深刻。在《谢林和启示》一书中，主要是批判正统神学，揭露宗教与理性的矛盾，维护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无神论。而这时他则把宗教批判扩大到泛神论，揭示了宗教与唯心主义的联系，把历史的现实内容从神那里夺回来，并把人、劳动和历史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这实质上是在探索新的历史观。

卡莱尔的社会政治观点与他的泛神论历史观直接相联。泛神

①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0、652、650页。

论认为有一种比人本身更高超的东西，因此卡莱尔就竭力鼓吹“英雄”的统治，即“真正的贵族”的统治，他把人分成山羊和绵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贵族和平民、老爷和百姓。总而言之，他认为英雄、贵族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理应成为统治者、历史的主人。恩格斯坚决摒弃这种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他指出：“只有大陆上不熟悉的那一部分英国人，只有工人、英国的贱民、穷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尽管他们粗野，道德败坏。将来拯救英国的却正是他们，他们还是可塑性的材料；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但他们也没有偏见，他们还有力量从事伟大的民族事业，他们还有前途。而贵族——目前还包括资产阶级——已经日暮途穷；它的全部思想，一直到最新的结论，都已卖弄净尽，见诸实际，它的统治迅速走向灭亡。”①与卡莱尔相反，恩格斯对工人运动的发展寄予无限希望。

当然，恩格斯也不否认天才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但他认为天才人物不应脱离群众，没有广大群众的斗争，任何天才的思想都不能实现，“天才的真正社会使命并不是用暴力去统治别人，而是去唤醒别人，带动别人。天才应当说服群众，使群众相信自己思想的正确，这样就不必担心自己的思想是否能够实现，因为思想被掌握以后就会自然而然地实现。”②

英国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各种腐败现象和种种弊端已是有目共睹，如何消除资本主义的坏疽，成了亟待解决的难题，这是一个历史的斯芬克斯之谜。当人们还把假象当成真理时，是不能猜中这个谜的。卡莱尔由于受到表面现象的迷惑，未能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刚满二十三岁的恩格斯没有落入斯芬克斯的魔爪，他从共产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解开了这个谜。他明确指出，英国目前的各种祸患是社会的灾难。其根源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它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2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2——53页。

不能像废除王权或特权那样消灭。只有通过社会革命废除私有制，才能摆脱社会的灾难，建立起人类利益一致的合理社会，实现人类的真正自由与平等。

三、工业革命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恩格斯在探索新的历史观时，不仅把历史与人的活动，特别是劳动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而且进一步研究了劳动的特殊形式——工业生产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他在《英国状况 十八世纪》一文中指出，18世纪这个革命的世纪，在欧洲大陆上，摧毁了整个旧世界，而英国却依然风平浪静，没有受到任何威胁。但是英国自18世纪中叶以来，却发生了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变革——社会革命（这里指工业革命）。

恩格斯认为，工业革命是科学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科学应用于生产的结果。18世纪综合了过去历史上零散的、偶然的认识成果，揭示了它的内部联系和必然性，使之变成了科学。而在"18世纪以前根本没有科学；对自然的认识只是在18世纪（某些部门或者早几年）才取得了科学的形式。牛顿由于发明了万有引力定律而创立了科学的天文学，由于进行了光的分解而创立了科学的光学，由于创立了二项式定理和无限理论而创立了科学的数学，由于认识了力的本性而创立了科学的力学。物理学也正是在18世纪获得了科学性质；化学刚刚由布莱克、拉瓦锡和普利斯特列创立起来；由于地球形状的判明和人们的无数次的旅行(旅行这种活动只是到了这时候才开始为科学服务)，地理学被提高到科学水平；同样，自然历史也被毕丰和林耐提高到科学水平；甚至地质学也开始从它过去所陷入的荒诞假说的深渊中逐渐挣脱出来"①。

科学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决定的，而科学再应用于生产实践就发明了新的生产工具，创立了新的生产技术，恩格斯具体地考察了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7页。

18世纪中叶以后英国机器的发明、发展和运用的历史。他注意到1763年瓦特着手制造蒸汽机，直到1768年制造成功。在此期间，哈格里沃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阿克莱发明了水力纺纱机，随后，克伦普顿又制造了骡机。1787年出现了卡特赖特的动力织机，经过多次改进，到1801年才得到实际应用。这些发明显示了使用机械生产和普遍应用科学原理是进步的动力，它们使社会的运动活跃了起来，其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英国工业的诞生，首先是棉纺织业的诞生。

纺织工业的发展刺激了其他工业的兴起，印染、漂白、煤炭、机器制造、钢铁的开采和冶炼等工业部门相继出现。工业的发展又推动了交通工具的改善，铁路、公路、运河等交通设施迅速修建起来。

恩格斯通过对英国工业发展历史的研究，深化并丰富了对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他指出："英国工业的这一番革命化是现代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①。这个论断更加清楚地表明，恩格斯的认识与传统的历史观截然不同了，他不是把生产、生产工具等经济事实只当作文化史中的从属因素，或历史发展中无足轻重的东西；不是在历史之外去寻找历史发展的动力。而是把工业革命这样的经济事实看作历史发展的基础，从历史内部寻找历史发展的动力。

首先，工业革命革新了传统的生产方式，由于机器的发明，蒸汽机的广泛应用，原来的手工劳动，由蒸汽动力和机器作业代替，家庭的个体劳动，被工厂的共同劳动代替，随着工厂制度的建立，生产过程日益社会化。各生产部门相互联系、依赖，工业的产品已不是个别工人或个别企业的产品，而是整个社会劳动的成果。

其次，生产工具的改进，社会化大生产的形成，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直接引起了所有制关系的变革，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瓦解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形成了。"本应属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74页。

全人类的力量便为少数富有的资本家所独占,成为他们奴役群众的工具"①。这说明恩格斯看到了工业革命所造成的生产力的发展是所有制关系变革的基础。

再次,工业革命的发展还带来了社会阶级关系的重大变化,旧阶级生存的基础和条件被破坏了,小土地所有者和小租佃者作为阶级被消灭了,变成一无所有的雇农和雇佣工人,形成了无产阶级,这是工业革命最重要的成果;另一方面,出现了工商业资产阶级,他们上升到真正贵族的地位;于是,英国社会分为三个主要阶级,即土地贵族、金融贵族、无产阶级。他们之间的斗争也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

第四,工业革命也是政治关系和意识形态变化的基础。在政治方面,工业革命增强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力量,形成了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和民主主义政党,他们不断同封建贵族争夺统治权,要求实行普选和议会制,争取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立法。同时,工业革命也促进了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在英国最先组织了工人运动——宪章运动。无产阶级成了同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争夺统治权的社会力量。在意识形态方面,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英国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故乡。工业革命在主观与客观之间所引起的矛盾,把英国哲学推向经验论和怀疑论,经验开始被看作唯一的救星,上帝是否存在是值得怀疑的。英国的功利主义②也是适应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需要而产生的,它表明了社会一切现存关系和经济利益的联系。

恩格斯从历史的观点出发认为,正是英国的工业革命,把人类从如同生活在社会幼年时期的封建主义和中世纪,推进到文明时期,如果说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质,那末英国人无疑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74页。

② 功利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一种学说,其代表人物是19世纪英国的边沁。他认为,个人利益是唯一的现实利益,社会利益只是一种抽象,它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强调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就有利于全人类。

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人。

最后，恩格斯还从总体上分析了工业革命（社会革命）、政治革命、哲学革命的辩证关系。他说："英国发生的革命是社会革命，因此比任何其他一种革命都更广泛，更深刻。人类知识和人类生活关系中的任何领域，哪怕是最生僻的领域，无不对社会革命有所影响，同时也无不在这一革命的影响下发生某些变化。只有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也必然以社会革命为依归"①。如前所述，工业革命直接引起了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而政治革命与哲学革命则主要是解决政权和意识形态问题。归根到底是受经济关系所制约，并为经济关系服务的。

自古以来在人类社会历史中，存在着实体和主体、自然和精神、必然和自由的对立。18世纪并没有克服这种对立，而是使这种对立发展到十分尖锐的程度，以致解决这种对立成为不可避免的事。这就引起了普遍的革命，这种革命在不同的国家是通过不同的方式实现的，法国人实行了政治革命；德国人经历的是哲学革命；而英国人则卷入了一场更广泛、更深刻的社会革命（工业革命）。德国人认定基督教唯灵论是绝对正确的，因而把宗教教会和哲学看作是人类普遍利益的代表。法国人认为唯物主义是绝对正确的，因而把国家当做代表人类普遍利益的永久形式。英国的工业革命造成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使得英国人不相信有什么普遍利益，因而也不相信教会或国家是人类普遍利益的代表，他们只注重私人利益。

因此，恩格斯指出，英国工业革命的第一个结果，就是把利益提升为人的统治者。资产者为了利益，他们霸占了各种新兴的工业力量，并利用它们来为自己服务。在英国，一切活动都是为了私人的利益，即使作为整体行动的时候也是为个人利益所驱使。原则要对历史有所影响必须先转化为利益。在这里，社会经济因素已逐渐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6页。

压倒并推动政治思想的因素。

但是，恩格斯也看到，在利益仍然保持着彻头彻尾的主观性和纯粹的利己性的时候，把利益提升为普遍原则，提升为人类的纽带，就必然会造成普遍的分散状态。必然会使人们只管自己，彼此隔绝，变成一堆互相排斥的原子。只要私有制还存在，利益就必然是私人的利益，利益的统治必然表现为财产的统治。财产被捧上宝座，金钱成了世界的统治者，人们不再是人的奴隶，而成了物的奴隶，因此，资本主义是现代的奴隶制。

工业革命一方面摧毁了中世纪的封建秩序，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也为这种制度的消灭创造了条件。现代的奴隶制必然要崩溃，国家也要消灭，为更加合理的自由联合的社会制度所代替，"人在金钱统治下的完全异化，必然要过渡到如今已经逼近的时候，那时，人将重新掌握自己"①。

总之，《英国状况　十八世纪》一文表明，恩格斯的认识又有了明显的进步。他具体地揭示了由于生产工具的改进而引起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的深刻变化。说明了经济关系的变化又成为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变化的基础，这就接近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法。由于他把工业革命、科学技术的进步、阶级斗争都视为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因而，对整个社会发展动力的理解就更为深刻和丰富了。这样，恩格斯就大体上明确了继续研究社会历史发展的指导思想。

四、国家和法对经济的依赖性

恩格斯在《英国状况　十八世纪》一文中，确立了研究英国现状时应该根据的一些原则和前提之后，便径直地转到研究英国的政治状况，主要是国家和法的本质与基础问题。

当时，英国被认为是最自由、最民主的国家，托利党人还夸耀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64页。

英国的宪法是英国理性最完善的产物。欧洲其他一切民族都以嫉妒和羡慕的眼光盯着英国。并出版了卷帙浩繁的著作赞美英国的成就和贡献。统治阶级甚至宪章派也都以为彻底实现国家的民主化,就可以解决资本主义制度面临的种种矛盾。

然而,恩格斯早就识破了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局限性,他到达英国以后,就指出,必须推翻门阀贵族和金融贵族的统治,才能使英国摆脱进退维谷的困境。在英国将近两年的生活实践和深入的调查研究,使他更为具体地感受到了资产阶级民主与自由的虚伪性,加深了他对资产阶级国家本质的认识。

在恩格斯看来,国家的本质也像宗教的本质一样,是人类对自身的恐惧。而在英国这个君主立宪的国家里,这种恐惧达到了最高点。国家为了欺骗人民、压迫人民就必然采取“恐怖”的措施。纯粹的君主政体、纯粹的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都是如此,这就说明以往的一切国家本身就是不合乎人性的,而且是所有不合乎人性的现象的起因。政体的变化不能改变国家的本质。这就实际上揭示了国家是统治的工具,而不是人民利益的代表。

那末,究竟是什么统治着英国呢?为了揭示这个秘密,恩格斯具体地分析了英国当时仍然保存着的君主、上院、下院三位一体的立法权。

君主(国王)是英国的最高元首,但王权实际上等于零,反对王权已无实际意义,因而这种斗争早已停止,人们对这种统而不治的人物反而崇拜得五体投地。恩格斯一如既往,十分厌恶把国王奉若神明。他的这一观点的积极意义在于,他把对神的批判和对国王的批判联在一起,把宗教的批判和政治的批判结合了起来,使得神和国王都不神圣了。国家也像宗教一样,对于人来说是一种异己的力量。这里所说的人,当然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人,即被压迫的人民群众。

英国的上院是贵族院,由土地贵族和上层教士控制,议员的职位是世袭的,必要时国王有权增添贵族议员。一百多年来,人们不

断嘲笑上院，大家都把它当作退休的政界人物的养老院。恩格斯直截了当地说：贵族的权力并不在于它有权在立法机关中获得世袭的席位，“贵族的势力就在于他的巨大地产，在于他的全部财富，因此贵族是和其他一切非贵族财主分享这种势力的”①。

那末，下院是不是体现了民主精神了呢？下院是众议院，议员按选区根据财产资格选出。它的选举最初是具有代表性的，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一点代表性很快就丧失了。1832年，贵族院被迫通过改革法案，并经过国王批准成为法律。此后，农业区代表选举条件还是完全照旧，被选出来的，仍然是土地占有者的代表，而且由于增加了郡的代表名额，代表土地贵族的托利党人至少可以获得80%的席位。在城市里，规定凡每年付房租10英镑以上并缴纳直接税(济贫捐等等)的房屋租赁者，才有投票权。这样，绝大多数的工人就被剥夺了选举权，如果实行宪章派所提出的普选办法，选民的人数至少可以增加两倍。此外，在选举活动中贿赂现象十分普遍，下院的议员没有一个不是靠贿赂而是靠选民自由选举出来的。有的城市的代表席位甚至完全公开拍卖，谁出的价钱高，就卖给谁，就像做生意一样地进行交易：你出多少多少英镑，我们就保证给你一个什么什么位置。

在具体分析了君主、上院、下院的真实情况以后，恩格斯尖锐地提出：“实质上究竟是谁统治着英国呢？是财产。财产使贵族能左右农业区和小城市的代表选举；财产使商人和厂主能影响大城市及部分小城市的代表选举；财产使二者能通过行贿来加强自己的势力。财产的统治已经由改革法案通过财产资格的规定所确认了。既然财产和通过财产而取得的势力构成资产阶级的本质，既然贵族在选举中利用自己财产的势力，因之他不是以贵族的身分出现而是和资产阶级站在同等的地位，可见实际上整个资产阶级的势力要比贵族的势力强大得多，可见真正进行统治的是资产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84页。

级。"[1] 这就深刻地揭示了立宪机构对财产的依赖关系，英国的君主立宪所代表的必然是贵族、特别是资产阶级的意志。

英国宪法和法律的根基也是财产。全部漫长的立法过程纯粹是一场滑稽戏，虽然任何一条法律草案在得到国王批准以前都要经过八次讨论，八思其事，但这只是形式，实际上，每一条草案的命运是预先就决定好了的，反复辩论也是毫无用处的。恩格斯还分析了一些成文的法规，如宣誓法、叛教法、市镇管理法、权利法、人身保护法、改革法案等。这些分析表明，法律的制订、修改、补充和废止都以保护富人的特权为转移。随着资产阶级财富的增多，封建的宗教势力也就受到削弱，金钱可以摧毁英国国教会的牧师。

虽然，从宪法上看，英国曾是政教合一的基督教国家，但是，历史的洪流是不可阻挡的，随着产业革命而迅速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到了 1828 年以后，也意识到国家与教会的合一对他们是不利的，而主张依仗财产的实力掌握国家的统治。同时，下院也觉察到必须改变对非国教徒的最苛刻的法律，废止了宣誓法和市镇机关法的宗教条款。结果，英国国教会就徒有其名了。英国处于"从确定的基督教国家向不确定的基督教国家过渡的阶段，也就是说，正在向一个不是以确定的宗教信仰为基础，而是以现存各种宗教信仰折衷而成的平均派——不确定的基督教为基础的国家过渡"[2]。

英国的公民能享有什么样的权利呢？当时，个人在宪法本身的范围内是没有任何权利的。只是由于习惯，或者由于个别法规才有一点权利。第一个权利就是出版自由，每个人都可以不经国家事先许可，自由无阻地发表自己的意见。然而由于诽谤法、叛国法、读神法沉重地压在出版事业的身上。所以出版自由就很可怜，只是苟延残喘了。英国人的第二个权利是人民集会的权利。但它只限于为讨论自身疾苦和向立法机关请愿减轻疾苦而集会的权利。超出这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687- 68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693 页。

个范围的集会，就要受到怀疑，甚至被认为是非法活动。不仅如此，中央和地方当局还可以出动警察事先禁止或中断、解散任何一个集会。第三个是结社的权利。英国虽然规定：凡以合法手段追求合法目的的一切结社都是容许的。但是这类会社只许成立一个不设地方支部的大机构，唯有为了慈善目的和一般金钱目的，经过许可才能建立。由于组织会社需要大批经费，因而结社仍然是富人的特权。此外，人身保护权、由自己同类人审讯的权利等，实际上也都是富人的特权。

英国的司法制度是否民主呢？英国虽然设有“不偏不倚”的法官、陪审员、陪审团、陪审法庭，但是法官和陪审员只能由少数具备一定资格和地位的人才能充任，他们都是富人，是穷人的死敌，而陪审法庭则体现了英国司法制度的真正本质，它实质上是个政治机关，而不是法律机构，它在制造法律谎言和不道德行为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被告人如果穷得请不起辩护人或相当数目的证人，即便无罪，也要遭殃。恩惠只赐予“值得尊敬”的犯人，而穷人、贱民、无产者却承受着法定野蛮行为的全部重压。当时英国流传着两句至理名言：“法律压迫穷人，富人管理法律”和“对于穷人是一条法律，对于富人是另外一条法律”，这就道破了英国司法制度的阶级本质。

恩格斯指出，全部英国宪法和一切立宪主义的舆论都是弥天大谎，“于是人们只好满怀厌恶地躲开这个由公开谎言和隐蔽谎言、伪善和自欺交织而成的罗网。”① 英国实行的不是真正的民主制，而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它的自由与平等只不过是空中楼阁，不能医治社会的痼疾。理论与实践处于惊人的矛盾之中。但是，这种状况能够长此下去吗？当然不会，因为实践反对谎言、生活反对空话、人反对不人道的行为，一定会胜利。

不过，恩格斯相信英国应当建立的不是过去那种同君主制和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704 页。

封建制度相对立的法国大革命的民主制，而是同资产阶级和财产相对立的民主制。是社会的民主制——社会主义。这又一次证明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

总之，恩格斯通过对英国政治状况和法律状况的分析，揭示了国家与法对经济关系的依赖性，论证了国家与法的阶级性，指明了超阶级的国家、超阶级的法是没有的，这表明了青年恩格斯已经认识到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依赖关系。

1844 年夏天，恩格斯结束了在英国的经商活动和“社会大学”的生涯，离开曼彻斯特返回故乡。他在回国途中来到他青年时代热烈向往的革命策源地——巴黎，再次拜访马克思。在巴黎期间，恩格斯主要的时间是和马克思一起交换意见，一连几个不眠之夜，他们在政治、经济、哲学等广泛的领域中进行探讨。终于彼此兴奋地发现：虽然各自的经历不同，但是在一切理论领域中的意见完全一致，共同的见解、共同的理想使这两位志同道合的战友亲密地结合在一起，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毕生合作。

这时的恩格斯已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了。

简 短 的 结 论

恩格斯世界观的转变经历了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程。这两个转变在时间上并非完全一致，走向唯物主义略早于走向共产主义。这期间，他为彻底挣脱宗教信仰的枷锁进行了艰苦的探索，直至到达英国以后，思想才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与马克思相比，恩格斯早期思想发展有自己的特点。马克思是通过对政治一哲学问题的批判，对国家与法的本质的分析和研究，进而考察社会的经济关系，即从对上层建筑的研究入手，去追溯它的经济基础，而实现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恩格斯则是首先通过对社会一经济问题的批判，分析研究物质利益和

工业革命在社会中的作用，亦即从对经济基础的研究入手，进而揭示它对国家与法等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从而成为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但是他们“殊途同归”，差不多同时在理论领域得出了大体一致的结论。

在恩格斯早期思想发展过程中，最直接的理论来源是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同时，也从18世纪末法国启蒙思想和17世纪——19世纪初的自然科学与科学技术成就中汲取了极有价值的丰富思想。因而，在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中，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是紧密相联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核心，经济学是内容，哲学则是其理论基础。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历史，把辩证法运用于经济学，并具体地论证共产主义的必然性，这是恩格斯早期思想的精华。

第四章　对科学世界观的初步探索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可以看到，他们已通过各自不同的途径实现了由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和由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在这两个转变中，虽然孕育着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体系的重要前提和因素，但还不是这种创立过程本身。因此，在此之后，他们在理论上所面临的重大任务，就是如何着手探索和制定科学的世界观，以适应日益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理论需要。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马克思对科学世界观的初步探索。在这部天才思想闪烁的著作中，马克思通过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对市民社会的初步解剖，形成了在探索科学世界观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异化劳动理论，朝着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①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大大深化了他在此之前关于到市民社会中去寻找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钥匙的思想，从而也使他能够从一个新的起点出发开始了对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法等问题的全面探索，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制定科学的世界观打开了大门。然而，马克思对科学世界观的这一初步探索，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了旧哲学的束缚，他的异化劳动理论在出发点、研究方法和理论前提上还有着浓厚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色彩和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的痕迹，它还没有形成为科学的理论。所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又是一部过渡性的和二重性的著作。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4页。

第一节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

恩格斯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曾指出：由于当时欧洲最先进的三个国家——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国情不同，这三个国家的革命道路各有迥然不同的特点。在英国，人们是直接从经济问题出发去研究社会变革问题的，例如欧文就是这样。在法国，任何一种理论学说，如果不具有某种政治形式，就不能在全国发生作用，就根本没有成功的希望。在德国，一切革命活动都首先表现为理论活动，因为德国是一个哲学民族。马克思也曾说过，"即使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理论的解放对德国也有特别实际的意义。德国的革命的过去就是理论性的，这就是宗教改革。正像当时的革命是从僧侣的头脑开始一样，现在的革命则是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① 马克思的理论探索道路，最初也是从接受德国古典哲学开始的。但是，革命的实践以及他本人思想的逻辑发展，又促使他冲破了哲学的思辨圈子，转入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异化劳动理论就是他对这一研究作初步的哲学总结时所取得的一项重大理论成果。虽然这一理论还不成熟，但在马克思对科学世界观的探索中却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从政治批判转向经济研究

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既不是他"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也不是"内心激动"的成果，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的。

就确立科学世界观的需要而言，政治经济学所探索的是人类社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进行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关系及其所服从的规律，这些基本的经济关系决定和构成了各个历史阶段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461 页。

的人与人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其它一切社会关系，因而它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所以，马克思要创立新的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不研究政治经济学是不行的。恩格斯说，“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① 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时期政治和经济的理论表现。它从财富的本质和来源出发，提出了关于劳动的作用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客观条件的合理观点，探讨了关于商品交换（人与人之间物的交换）的合乎规律的关系，考察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重要内容，提出了劳动、分工、生产力等许多重要的范畴。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认为：从威·配第以来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相反，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②，为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运动规律作了重要的准备，而这一切恰恰是德国古典哲学所不具备的。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使唯物主义重登王座，这给马克思以很大启发。然而，费尔巴哈没有研究政治经济学，仍停留在哲学的范围内，特别是停留在自然和抽象的“人”上，他的社会历史观仍然是唯心主义的。黑格尔虽然研究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使他对社会历史问题的认识比前人高出一筹。然而，由于其唯心主义的体系的局限，他的社会历史观仍然没有跳出思辨巢臼。所以，马克思只有突破德国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424 -42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98 页注 32。

思辨哲学的传统，跳出哲学的圈子，并作为一个普通人去研究现实，特别是开展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才有可能完成哲学上的伟大革命变革。

再从理论发展趋势来看，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决非偶然。19世纪上半期，在欧洲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而又影响深远的事件。1817年，黑格尔出版了他的《哲学全书》，使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达到了它的顶峰；同年，李嘉图发表了他的最重要的著作《政治经济及赋税原理》，进一步发展了亚当 斯密提出的劳动价值论，最终完成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1803年，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圣西门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著作《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提出了他的空想社会主义基本思想；同年，傅立叶发表了《全世界和谐》，公开宣布资本主义制度必将被“和谐制度”所代替；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从1813年开始著书立说，宣传他的“新社会观”。然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即主要局限在自己专业范围内。在各自的专业范围内，他们都是思想巨人，可是超出这个范围，就显得比较贫乏渺小。即使是黑格尔，对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有较深的造诣，但这并没有改变他哲学的唯心主义性质，因为他只是把它作为自己观点的例证。这是他们的理论必然由鼎盛转为衰落的原因之一。在19世纪30、40年代以后，黑格尔哲学体系和方法的矛盾，导致了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蜕化为庸俗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的成熟，渐渐失去其革命意义。而当时正在兴起的欧洲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伟大斗争，迫切需要扭转思想领域这一趋势，需要新的哲学作指导。而要完成这个任务，离开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显然是不行的。

就主观条件而言，1842年到1843年，马克思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了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题，这是推动马克思去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初动因。《莱茵报》时期的革命实践，使马克思对原有的哲学信念产生了动摇和疑问，为了解开

使他感到“苦恼的疑问”，他开始研究历史和重新批判地研究黑格尔法哲学。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直接或间接地研究了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派的著作。复辟时代历史学派以阶级斗争为基本线索，从阶级斗争追溯到经济利益，从政治制度探究到财产关系的方法论原则，无疑启发了善于思考的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发现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和私有财产，而是市民社会和私有财产决定国家。那么，市民社会和私有财产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它的运动规律是什么？马克思已经认识到研究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而且意识到这个间题是不可能仅仅靠哲学思辨来解决的。他在后来回顾中说：“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①

1843年底，马克思迁居巴黎以后，搜集了大量的材料，细心地研究了法国革命的历史，打算写一部国民议会史，这种研究使他认识到：社会革命是阶级斗争发展的结果，而阶级斗争又是由经济发展所决定的。这些情况表明，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他的思想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

再就时代的视角而言，19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已在英、法等国取得了高度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这时已开始像巫师那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资产阶级曾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已对准了资产阶级本身，消灭私有制，实现人类解放这已成为时代提出的任务。当时的许多思想家，都是通过批判私有财产，转向共产主义的，这使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

已经转向共产主义立场的马克思受到了有力的启迪：要想消灭私有制，就必须首先认识私有制，而要认识私有制，又必须研究政治经济学。就在马克思迫切感到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时，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分析批判。他简略地回顾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主要现象，得出了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完全相反的结论：不应该把社会经济关系看成某种永恒的东西，而应该看成历史的产物；现存的经济关系是历史过程中必然产生、发展并要被抛弃的，必须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矛盾来批判它，把这个制度的消灭看作它本身辩证发展的结果。这样，恩格斯便第一个证明了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在读了恩格斯的这一“天才大纲”以后，感到极为兴奋。他十分同意恩格斯的下述见解：既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私有制当作无庸置疑的前提来接受，把政治经济学看成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科学，那末，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揭示私有制的本质及其起源，指出私有制的消灭是历史发展不可避免的结果。这说明，马克思这时已最终认识到正是在政治经济学的领域内隐藏着人类关系的根本问题，只有走出哲学、进入政治经济学，把针对“副本”的批判，推进到针对“原本”的批判，才有可能创立全新的哲学。

以上情况表明，并不是偶然的原因，而是时代的发展，以及马克思本人思想的发展使他从政治批判转向经济研究，从而能够创立了无产阶级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此，马克思放弃了国民议会史一书的写作，并且改变了他原定的既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又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庞大计划，开始系统地研究从布阿吉尔贝尔和魁奈开始，经过A•斯密和D•李嘉图，最后到J•B•萨伊和J•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这是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重大转折。从1843年10月起，马克思先后仔细阅读了布阿吉尔贝尔的《德国详情，它的财富减少的原因和

补救办法之无效。论财富、金钱和租税的性质。论自然、文化、商业和谷物之利益》、麦克库洛赫的《论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成就、个别问题和意义》、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让·巴蒂斯特·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舒耳茨的《生产的运动》、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弗雷德里克·斯卡尔培克的《社会财富的理论》、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等15位作者的19部经济学著作，做了许多摘录和笔记，写了许多批评性的评论，这就是著名的《巴黎笔记》[1]（现保存下来有7个笔记本，其中5本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有关）。其中对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麦克库洛赫的《论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成就、个别问题和意义》以及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等书的摘录尤为详细，评语也最为深刻。例如《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就是马克思通过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以及人们相互关系所作的最初的详细论述。《巴黎笔记》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开端。

马克思在巴黎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曾跟达姆斯塔德的出版人列斯凯签定合同，拟出版两卷本的《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是一部预计要涉及到政治经济学同社会、政治、法、道德有关的巨著。后来由于迫切清算青年黑格尔派的需要，没有完成，留下的只有马克思写于1844年4月－8月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是他在巴黎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另一个重大成果。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由三个片断（三个手稿）组成。第一片断写在共有36页的一册稿纸上，马克思在上面划成并列的三栏，分别标以“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中文版排为前后次序的三章原来也是并列的，即：

---

① 马克思的《巴黎笔记》在1932年以《经济学研究札记》为题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第1部分第3卷。

工　资	资本的利润	地租
〔Ⅰ〕“**工资决定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敌对的斗争。胜利必定属于资本家。**”①	“〔Ⅰ〕(1)**资本**，即对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如果资本本身并非来源于盗窃和诈骗，那么，为了使之继承神圣化，仍然需要有立法的协助。’(萨伊，第1卷第136页，注)”②	“〔Ⅰ〕**土地所有者的权利来源于掠夺。**(萨伊，第1卷第136页，注)土地所有者也像所有其他人一样，喜欢在他们未曾播种的地方得到收获，甚至对土地的自然成果也索取地租。(斯密，第1卷第99页)”③

在前16页稿纸上，马克思在三个标题下写满了从斯密等人的著作中细心选择和整理了的摘录以及他本人批判性的分析。从17页开始，只写了“地租”这一部分。而在第22页到27页结尾处，就不再管原来的标题，只写马克思自己批判研究的成果。这一部分就由出版者冠以“异化劳动”的标题作为第四章。第一片断在第27页突然中断。第二个片断只有4页纸，是40至43页，前39页已经失散，而在第43页上的末尾是一连串的点，这表明马克思还有内容需要发挥。这4页由出版者冠以“私有财产的关系”的标题。第三片断是一本有68页的笔记本，其中最后23页是空白，而开头的两个部分是对第二片断第36页－39页的补充，由出版者冠以“国民经济学中反映的私有财产的本质”和“共产主义”的标题。第三部分由出版者冠以“需要、生产和分工”的标题，它还包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言，这个序言现已被移至

①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9、62、75页。

全书的前边。第四部分是一篇独立的、在排列顺序上与保存下来的片断没有直接联系的附录，由出版者冠以“货币”的标题。作为结尾的第五部分被冠以“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的标题，它本来是分别放在第三部分之前和之中的。

在马克思生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并未发表，直到1927年才由梁赞诺夫把第三片断的大部分冠以《〈神圣家族〉的准备工作》的标题编入莫斯科俄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3卷。1929年，它被编入俄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但它的形式是零乱的，标题也是错误的。同年，在巴黎的《马克思主义评议》杂志上，以《关于共产主义和私有制的札记》和《关于需要、生产和分工的札记》为标题，发表了另一些片断。1932年，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朗兹胡特和迈耶尔以节录的形式出版了这部手稿的第一个德文版。这个版本略去了第一片断，发表在《卡尔·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早期著作）》第1卷上，并被冠以《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标题。同年，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以《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的标题，在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部分第3卷上，予以全文发表。

马克思在巴黎研究政治经济学所取得的两项重大成果——《巴黎笔记》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写作上是互相交叉进行的。从1843年10月开始，马克思作了三本笔记，其中第一本是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的两个追随者法国人萨伊和波兰人斯卡尔贝克的著作的摘要和评语。第二本和第三本则对亚当·斯密的基本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作了详细的摘录，与此同时，马克思写出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一片断。在随后的第四和第五本笔记中马克思摘录了李嘉图、穆勒、麦克库洛赫等人的著作，他还对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作了摘要，最终完成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二、异化劳动概念的提出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虽然还不是一部系统的完成的著作，甚至也算不上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的草稿，而主要是原书的摘录、概括的转述、批判性的注释以及马克思自己在研究中产生的一些新的思想和观点，但不能因此就认为它不重要，其各个部分思想没有内在的联系。事实上，《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不仅包含着非常深刻的观点和丰富的内容以及新思想的闪光，而且各个片断之间也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表明了青年马克思对正在形成中的科学世界观的初步探索。其中，异化劳动理论就是马克思从哲学转向经济学的批判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果。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的提出以及对其内涵所作的分析，并没有离开世界文明的发展大道，而是在批判地吸取了前人和同时代人有关思想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关系进行批判研究的结果。

"异化"一词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用名词 Entfremdung 和动词 entfremden 来表示。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除了沿用德国古典哲学的二词来表示异化外，还有 Entäußerung（外化）和 Selbstentfremdung（直译"自我异化"）。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异化的含义就是指主体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由于自身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并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反过来反对主体自身。

史实表明，异化概念的形成，在西方思想史上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

异化概念到底起源于何时何地，其说不一。有的认为它启始于基督教的《旧约》中关于偶像崇拜的概念；有的认为应追溯到古希腊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拉图关于自然界乃是理念世界不完善的映象，等等。对于这些，我们在这里都置之不论，而仅从欧洲近代思想史谈起。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霍布斯（1588-1679）在运用社会契约论来批判君权神授和阐明国家起源时，认为人类最先处于一种人人自由和平等、每个人的权利都是完全和无限制的“自然状态”之中，然而，正是这种每个人都拥有的不受限制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必然造成互伤其自由和平等，从而最终导致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于是，人们为了自己的安全和权利，不得不彼此订立契约，大家都把一部分权利交给一个人或一些人的会议。“这就是那伟大的‘利维坦’（圣经里的怪兽，这里是指国家——引者注）的产生。”① 这样人们转让出来的权利就反过来成了统治人们的异己力量。可见，霍布斯是在“转让”的意义上使用“异化”的。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前驱让·雅克·卢梭在他的《论人间的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以及《社会契约论》中，除了继承和发挥了霍布斯有关思想来阐明国家的起源外，还直接运用异化（转让）概念来论证人民主权，说明人们为了保障自己自由的权利，在由“自然状态”进入“文明社会”的过程中，彼此订立契约“转让”自己的一部分权利，以便组成国家。这样，人们虽然由于社会契约的订立而失去了其“天然自由”，但却获得了“公民自由”。他还认为，如果国家转变成同它原来使命相反的暴君统治的工具的话，那么人民就有权运用暴力收回自己所出让的权利。更为可贵的是，卢梭在考察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时，他还看到了私有财产造成的第一个后果就在于使人不仅受自然的支配，而且受其同类的支配。这样，卢梭就把异化同财产所有权联系起来，强化了异化概念的否定性意义，增加其批判的革命色彩，从而使之内容更加充实和具体，并对德国古典哲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如果说霍布斯和卢梭关于异化的思想，主要还是一种资产阶级政治学说，那么，英国和法国的这种资产阶级学说一到了德国，

---

① 转引自：《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第 页。

就被披上了思辨的外衣而成为哲学学说了。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希特在其名著《知识学基础》中，已不是笼统地谈论人的自由权利，而是把它具体区分为可让渡的权利和不可让渡的权利，并使之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他把不可让渡的权利归结为“自我”，并从“非我”这个对立面的限制中，使“自我”获得了规定性，即“自我”创造了“非我”之后，“非我”反过来使“自我”丧失了独立性而变成了受限制的东西。所以，“非我”就是“自我”的外化(异化)，而整个世界史也就成了所谓“自我设定非我”的外化(异化)过程。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当费希特把“自我”看作是世界的本原时，他既把“自我”看作理性和认识，也把“自我”看作是意志和行动，因而以抽象的形式揭示了“自我设定非我”的外化(异化)过程，不仅仅是人改造自然界的过程，同时也是自然界改造人并使其日见丰富的过程。因此，能动性被强调为他的哲学的基础。

异化在费希特哲学中并未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只是到了黑格尔那里，它才发展成为一个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概念。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作为世界本原的具有能动性的绝对精神，就是异化的主体，而这种能动性，就是自身的否定性，或自身矛盾、异化的发展能力。因此，在绝对精神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即逻辑阶段中，自由的绝对精神由于其自身所包含的矛盾，必然要外化(异化、对象化)为自己的对立面——自然界，陷入不自由的阶段；而当绝对精神一旦认识到自然界只不过是自己的异化或外化，它就必然要扬弃这种异化而进入精神阶段，并在人的意识中回复到自身，从而完成绝对精神自我异化以及扬弃自我异化而达到自我综合的过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黑格尔异化观包含了以下思想：(1)把费希特的能动性的原则和卢梭否定性思想结合起来，使之发展成否定性辩证法，把绝对精神的自我异化及其扬弃当作绝对精神自我创造和自我生成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来理解。(2)以此为出发点，黑格尔运用异化理论，阐明了人类借助劳动创造自

己历史的思想。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①(3) 把异化看作是一个过程，特别是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并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各种各样的奴役形式，作了一定的合理分析，具有强烈的历史感。

黑格尔的异化理论之所以具有相当的合理性，首先因为黑格尔是西方哲学史上的集大成者，他曾对历史、政治、哲学史等许多学科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吸收了前人的思想成果，并积极地去思考和把握当时巨大的社会变革，从中吸取辩证的因素，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异化观。其次黑格尔是唯一仔细研究过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德国古典哲学家，古典经济学关于财产转让和劳动价值论启迪了黑格尔，使他能够以抽象思辨的形式抓住财产转让的异化本质，并把劳动规定为人的本质。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谈到黑格尔的异化观时指出：黑格尔是“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②的。但是，由于黑格尔是从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在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他的异化观的。因而它就不可避免地存在根本性的理论弱点：(1) 他混淆了对象化和异化；(2) 他把异化局限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中，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在于消灭了异化；(3) 他虽然把劳动规定为人的本质，但他对劳动本身的理解是唯心的。

费尔巴哈从感性的人出发研究异化，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异化观。他明确指出：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而唯心主义哲学只不过是宗教异化的哲学形式，是人的理智的异化。但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直观的唯物主义，他所讲的感性的人，实质上是抽象的、非历史的和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而不是现实的在社会历史中行动着的个人，因而陷入历史唯心主义。此外，他只看

---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页。

到宗教和唯心主义哲学的异化，忽视了尘世的经济、政治异化，并把建立所谓“爱”的宗教作为克服异化的途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相对于黑格尔的异化观而言，费尔巴哈的异化观既是进步，又是倒退。

赫斯把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从宗教和哲学的范围推广到社会历史领域。他认为异化是资本主义种种罪恶的根源，说明了要消灭异化就必须消灭私有制，这就在理论上开辟了从天国到尘世的道路。但由于他不了解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更没有对人的生产活动作出科学分析，因而也不能说明产生异化的原因。至于异化的消除，他只能求助于空泛的“爱”，因而陷入唯心史观。

由上可见，异化问题是近代思想史上人们研究、探讨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异化思想一步一步地由政治领域进入哲学领域并上升为一个哲学的概念，然后再推广运用于政治经济的领域，从而使异化概念逐渐日趋获得其完全的意义。但是，无论是霍布斯、卢梭，还是费希特、黑格尔、费尔巴哈和赫斯，都是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并在唯心史观的指导下研究异化理论的。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不能简单地把它拿来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全人类的解放作论证，而必须在批判吸取有关理论合理思想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异化理论。同马克思世界观转变的过程相适应，他的早期异化思想也经历了从哲学异化到政治异化再到劳动异化理论的演变过程。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总体上还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他对异化的理解也具有思辨唯心主义的性质。马克思认为，“现象世界只有从那完成了的、从它的概念异化了的原子才能产生”，“现象才被理解为现象，这就是说，才被理解为本质的异化，这异化本身是在它的现实性里显现为这样的异化。”① 在《关于伊壁鸿鲁哲学的笔记》中马克思还从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的事实出

① 《博士论文》，第337页。

发，说明了在生产极端落后的情况下，必须要产生自然的异化，得出了“对自然的任何关系本身同时也就是自然的异化”的结论。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在费尔巴哈异化观的影响下，开始把异化问题推向政治领域，揭示了政治异化同宗教异化的关系，探讨了它们同现实的关系，说明了它们都是人的本质的异化。

在《德法年鉴》的文章中，马克思进一步把异化问题的研究推向经济领域。在充分肯定了费尔巴哈对宗教异化的揭露的同时，又指出了必须把对宗教异化的分析推进到对其世俗基础异化的分析；说明了在私有制社会中，“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①，只有消除金钱统治，才能克服人的自我异化；并探讨了无产阶级的自我异化以及通过革命来克服这种异化等问题，这就把消灭异化同消灭私有制有机地联系起来，从而使自己的思想深入了一步。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哲学的研究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使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个明显的经济事实——工人与资本家的极端对立，看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深刻矛盾，进而把异化和劳动结合起来，从而第一次提出了异化劳动概念，创造性地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

三、异化劳动理论的出发点，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的提出，是同前人以及同时代人研究异化理论所取得的成果分不开的。但是，这些成果只是为马克思进行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合理思想观点和资料以及可供借鉴的思维方法。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决不能只是对前人异化理论的简单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8页。

综合，而必须在吸取前人以及同时代人所取得的成果和教训的基础上，去寻求新的出发点。事实上，马克思也正是这样做的。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批判研究，继承了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原理，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关于劳动是人的本质的合理思想，把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大大推进了一步，开始认识到“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劳动是人的本质，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从而找到了异化劳动理论的出发点。

首先，马克思既肯定了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合理意义，又洞察到了它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深刻矛盾。他说：“正像路德承认宗教、信仰为外部世界的本质并以此反对天主教异教一样，正像他把宗教观念变成人的内在本质，从而扬弃了外在的宗教观念一样，正像他把教士移到俗人心中，因而否定了俗人之外的教士一样，由于私有财产体现为人本身，而人本身被认为是私有财产的本质，因而在人之外并且不依赖于人的财富，也就是只以外在方式来保存和保持的财富被扬弃了，……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人本身被当成了私有财产的规定，就像在路德那里被当成了宗教的规定一样。因此，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引者注），在承认人的假象下，无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①。

其次，马克思通过对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根本矛盾的批判，从中剥离出了劳动范畴，说明了要解决这一矛盾，关键在于对劳动范畴的理解。他说：“国民经济学没有给我们提供一把理解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根源的钥匙。例如，当它确定工资和资本利润之间的关系时，它把资本家的利益当作最后的根据；也就是说，它把应当加以论证的东西当作前提。”② 而所以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112- 11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89 页。

产生这种情况，关键在于“国民经济学以不考察工人（即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来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①。所以在马克思看来，研究劳动范畴对解决劳动价值论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最后，马克思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关于劳动是人的本质的合理思想，把自己对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考察研究中所获得的劳动范畴同劳动主体人有机的结合起来，得出了“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②的结论，从而把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大大推进了一步，说明了劳动按其本性来讲应该是“自由的自觉的”，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雇佣劳动则是一种异化劳动而不是古典经济学所讲的“一般劳动”。

视“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为人的本质，这就使马克思开始扬弃黑格尔的异化观，用物质生产劳动取代了黑格尔的精神劳动，指出黑格尔对劳动唯心理解的实质在于把它仅仅看作是“自我意识的外化”，即设定物性，视之为精神的一个环节。他说：在黑格尔那里，“物性因此对自我意识来说决不是什么独立的、实质的东西，而只是纯粹的创造物，是自我意识所设定的东西”③。马克思还肯定了费尔巴哈“从感性确定东西出发”的原则，并把“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置于感性的基础上，使劳动的主体由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变为“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④。

视“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为人的本质，这就使马克思开始扬弃费尔巴哈的异化观。他从黑格尔的劳动观中筛选出了能动的原则，特别是把握住了贯穿黑格尔整个体系的“自我创造”的辩证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8页。

法，并使之引入了费尔巴哈的感性的但却是空洞抽象的“类”，这就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充实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感性原则，并开始超越费尔巴哈。

视“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为人的本质，这就使马克思开始扬弃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这是因为，马克思这时虽然所讲的并不是现实的物质生产劳动，而是理想化的生产劳动，但已开始克服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根本矛盾，说明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创造商品、资本和私有财产的劳动并不是抽象的“一般劳动”，而是异化劳动，从而开始超越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在为“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作注脚时，明确指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以至人正因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①

总之，把“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看作是人的本质，这是马克思在研究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过程中，既运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原则来克服黑格尔异化观的抽象思辨性，又运用黑格尔辩证法来克服费尔巴哈异化观的消极性和抽象性所获得的一项直接的成果，它表明了马克思这时已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是这种劳动的异化，从而找到了异化劳动理论的出发点。

由此出发，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分析，牢牢抓住了工人及其产品的异化这一经济事实，具体地得出了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

(1) 从生产结果看，劳动者的劳动和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

当马克思开始具体地研究异化劳动时，首先呈现在马克思眼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

前的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经济事实－－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劳动产品的数量越大，他就越贫困。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殖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不仅仅生产商品，它还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本身和工人，而且是按照它的一般商品的比例生产的。

通过对这一普遍经济事实的剖析，马克思发现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自己劳动的产品已成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进而得出了异化劳动的第一个规定，说明了作为工人劳动结果的劳动产品，已作为不依赖工人的异己的独立的力量同劳动者相对立。所以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同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①。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者的劳动和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与费尔巴哈运用异化来批判宗教的情况是类似的。费尔巴哈在把宗教看作人的本质的异化时，说明了在神的本质的观点中肯定的东西仅仅是人的东西，所以，作为意识对象的人的观点就只能是否定。费尔巴哈还说，为了使上帝富有，人就必须贫穷；为了使上帝成为一切，人就必须变为乌有，人在自身中否定了他在上帝身上加以肯定的东西。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马克思的这一分析，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

(2) 从生产过程来看，劳动者与他的劳动活动相异化

劳动者的劳动和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这仅仅是异化劳动的现象，而不是本质。马克思从异化劳动的现象入手，进一步揭示异化劳动的本质，得出了异化劳动的第二个规定。他说："以上我们只是从一个方面，就是从工人同他的劳动产品的关系这个方面，考察了工人的异化、外化。但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1页。

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如果工人不是在生产行为本身中使自身异化，那么工人怎么会同自己活动的产品像同某种异己的东西那样相对立呢？产品不过是活动、生产的总结。因此，如果劳动的产品是外化，那么生产本身就必然是能动的外化，或活动的外化，外化的活动。在劳动对象的异化中不过总结了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外化。"① 这就是说，劳动者的劳动同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仅是一种结果，原因还在于生产活动之中。

马克思具体地揭示了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与他劳动活动相异化的表现：首先，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这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毁。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而，他不是满足劳动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需要的一种手段。劳动的异化性质明显地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外在的劳动，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最后，对工人说来，劳动的外在性质，就表现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在宗教中，人的幻想、人的头脑和人的心灵的活动对个人发生作用是不取决于他个人的，也就是说，是作为某种异己的活动，神灵的或魔鬼的活动的，同样，工人的活动也不是他自己的活动。他的活动属于别人，这种活动是他自身的丧失。结果，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性行为，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3页。

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

(3) 从人的类本质方面来看，劳动者与他的类本质相异化

对于人类自身的认识，是历代哲学家孜孜不倦探讨的问题。费尔巴哈在对宗教的批判中，把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到了旧哲学的高峰，得出了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人的本质就在于人意识到自己既是一个个体，又是“类”的结论，强调了人与人的联系与交往。但是，他对“类”的理解还是唯心和抽象的，例如他说：“在人里面形成类，即形成人的人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就是理性、意志、心。”①马克思在研究异化劳动的第三个规定时，沿用了费尔巴哈的“类本质”的概念，但马克思由于已把“自由自觉的活动”看作是人的类本质，因而与费尔巴哈有了原则的区别。以此为立论的根据，马克思认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②。也就是说，“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所创造的产品是人的对象化了的类本质或“人化的自然”。但是，由于劳动者的劳动和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已不能使劳动者在他所创造的产品中实现其类本质；而劳动者与他的劳动活动相异化，又把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变成了被迫的、仅仅是借以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所以，从异化劳动的前二个规定中，马克思逻辑地推论出了异化劳动的第三个规定——劳动者与他的类本质相异化。

(4) 从人际方面来看，人与人关系的相异化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者与他的类本质相异化，只有通过与其他人的关系相异化才能表现出来。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创造的产品中的绝大部分之所以不能归己所有，是因为资本家拿走了它们，而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之所以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是因为

---

① 《基督教的本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27－2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

他们被迫为资本家而劳动，因而这种劳动给工人们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痛苦，他们创造的产品所带给他们的不是丰裕而是赤贫。这样，马克思就从异化劳动的前三个规定中逻辑地推出了它的第四个规定——人与人关系的相异化。

马克思认为在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中，劳动者与他的劳动活动相异化，是劳动者的“自我异化”，它是原因、根据；而劳动者的劳动与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是“物的异化”，它是结果，是劳动者的“自我异化”的表现。然后，马克思从异化劳动的第一和第二条规定，推出了异化劳动的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与他的类本质相异化。最后，由异化劳动的前三条规定，逻辑地得出了它的第四条规定——人与人关系相异化。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说：“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①

四、异化的主体和客体，异化和对象化

（一）异化的主体和客体

异化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它的含义是指主体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客体），然后这个对立面（客体）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转过来反对主体自身。所以，任何异化都必须包括主体、客体以及作为联系这二者的纽带的活动。然而，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对主体、客体以及联系这二者的纽带有着不同乃至对立的理解。

在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中，异化的主体是唯一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绝对精神，异化客体是被动的和消极的物质。但作为异化主体的绝对精神只有表现为对象性的存在才能体现它的客观性。因而，它在经过纯逻辑阶段的发展之后，必然要异化、对象化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98页。

自然。然而，当绝对精神对象化为物质存在后，它又感到不自由，因而它又必须扬弃这种对象化的存在和返回绝对精神以取得自由。而在这一过程中，作为联系异化主体和客体的纽带的活动则是绝对精神在其内部的纯粹的“不停息地旋转”①。可见，在黑格尔的异化主体、客体及其联系二者纽带的理论中，虽然唯心地混淆了异化和对象化，但却强调了主体能动性，因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费尔巴哈把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看作是异化的主体，认为宗教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或对象化，唯心主义哲学则是宗教异化的哲学形式。所以，在费尔巴哈那里，异化的客体是宗教。而在这一过程中，联系二者的纽带则是人对自然的畏惧和依赖而产生的一种情不自禁使之神化的想象活动，例如，基督教中的上帝就是这种想象力的最高产物。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与黑格尔的异化理论的区别，首先在于他把异化的主体由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发展为自然存在的人。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虽然重视劳动，得出了劳动创造价值的结论，但由于他们把私有制当作既定的永恒的自然现象，因而他们只研究劳动，不研究劳动者，在完全撇开资本对劳动剥削的前提下，把创造资本、商品和私有制的劳动看作是“一般劳动”，从而最终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既吸取了黑格尔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的合理思想，又扬弃了他对劳动的唯心思想理解；既吸取了费尔巴哈把人看作异化主体的合理思想，又扬弃了他对人的唯心主义理解；既吸取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中重视劳动的合理思想，又扬弃了其把劳动和劳动者分开的错误，进而把异化和劳动结合起来，既从劳动中看到了异化，又从异化中看到了劳动，从而说明了异化的主体既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也不是费尔巴哈的自然的人，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6页。

是具有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劳动）本质的人，进而从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说明了与人的本质相异化了的劳动产品、劳动活动、类本质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异化，是异化的客体，而在这一过程中，联系异化主体和客体的纽带的活动则是异化劳动。

（二）异化和对象化

异化和对象化的关系是正确理解异化理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在马克思以前，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理论的一个共同点，就在于把异化和对象化混为一谈。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由逻辑阶段异化为自然界，也就是绝对精神的对象化。费尔巴哈则把宗教对象化和人的异化看作是同一回事。马克思在研究异化主体和客体的过程中，由于他越出了精神领域而进入了经济领域，尤其是寻求到了异化劳动的出发点——“自由的自觉的”劳动，这使他能够把异化和对象化区别开来。马克思说：“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实现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被国民经济学作为前提（资本主义私有制－－引者注）的那种状态下，劳动的这种实现表现为工人的失去现实性，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① 这也就是说：(1) 对象化劳动是劳动的肯定方面，它是指人们在对自然界改造和占有的劳动过程中劳动的实现，说明了任何劳动都创造产品，而劳动产品是固定在对象中的物化劳动，所以，劳动的对象化是任何社会物质生产的共同内容，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2) 异化劳动是劳动的否定方面。这是因为，劳动者生产出的劳动产品虽然是劳动的对象化，但由于这一产品不仅不归劳动者所有，反而成为压迫、奴役劳动者的异己力量，因而它是私有制下的一种特有的劳动形式。(3) 对象化劳动不等于异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1页。

劳动，而异化劳动包含对象化劳动。也就是说，把对象化和异化联系在一起的前提是私有制。所以，对象化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发生异化。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说："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对象；但现在这个生命已不再属于他而属于对象了。因此，这个活动越多，工人就越丧失对象。凡是成为他的劳动产品的东西，就不再是他本身的东西。因此，这个产品越多，他本身的东西就越少。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作为敌对的和异己的东西同他相对抗。"①

马克思区别异化和对象化的意义就在于说明了扬弃异化劳动并非取消一切劳动，而只不过是取消劳动的否定方面而保留劳动的肯定方面，说明了异化仅仅是一个历史范畴，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暂时性。

五、异化劳动理论的深化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认识到要把异化劳动理论引向更深一个层次，还必须完成以下两项任务："(1) 从私有财产同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的关系来说明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的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2) 我们已经承认劳动的异化、外化这个事实，并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分析。现在要问，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② 为此，马克思又写了《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一书摘要》，对此作了进一步的研究。

如前所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已把"自由自觉的活动"看作是人的本质，从而找到了异化劳动理论的出发点。然而，马克思这时对它的理解还是比较笼统和抽象的。在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1－9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2页。

《詹姆斯 穆勒〈政治经济学〉一书摘要》中，马克思从分析流通、信贷、交换和分配等方面的经济领域中的异化入手，层层深入，最后抓住了生产方面的异化，从而比较具体地从人的活动、生活、享受和财富等方面说明了作为“自由自觉的活动”的人的本质在于“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他说：“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① 马克思还强调了要从社会生产来考察人的本质，他认为劳动是人的自由的生命表现，人在劳动中肯定了自己的个人生命，从而也就肯定了自己的个性特点，得出了“我们的生产同样是反映我们本质的镜子。”② 的重要结论更为可贵的是，马克思在谈到人的各种社会联系时，还把这些联系区分为“本质的联系”和“非本质的联系”，得出了“从本质联系”来看，人是一个“总体存在物”的结论。

以此为出发点，马克思进一步探讨了异化劳动理论尚未完成的两项任务，从而深化了自己的异化劳动理论。

首先，马克思通过对异化的社会和真正人的社会的特点比较，揭示了作为异化劳动结果的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

就异化社会的特点而言，马克思指出：“人自身异化了以及这个异化的人的社会是一幅描绘他的现实的社会联系，描绘他的真正的类生活的讽刺画；他的活动由此而表现为苦难，他个人的创造物表现为异己的力量，他的财富表现为他的贫穷，把他同别人结合起来的本质的联系表现为非本质的联系，相反，他同别人的分离表现为他的真正的存在；他的生命表现为他的生命的牺牲，他的本质的现实化表现为他的生命的失去现实性，他的生产表现为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7页。

他的非存在的生产，他支配物的权力表现为物支配他的权力，而他本身，即他的创造物的主人，则表现为这个创造物的奴隶。”①

就真正人的社会而言，马克思指出：“假定我们作为人进行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就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1) 我在我的生产中物化了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因此我既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物质的、可以直观地感知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2) 在你享受或使用我的产品时，我直接享受到的是：既意识到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物化了人的本质，又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3) 对你来说，我是你与类之间的中介人，你自己意识到和感觉到我是你自己本质的补充，是你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我认识到我自己被你的思想和你的爱所证实。(4) 在我个人的生命表现中，我直接创造了你的生命表现，因而在我个人的活动中，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本质，即我的人的本质，我的社会的本质。”②

马克思关于异化的社会和真正人的社会特点的论述表明，马克思这时已认识到，作为异化劳动产物的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就在于，作为创造财富的劳动者不仅不能占有自己创造的财富和享受自由，反而受到了不劳而获的财富占有者的奴役和丧失了自由。因此，在私有财产的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就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人创造了物却反而成了物的奴隶。简言之，劳动产品的异化形式就是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而异化的社会是暂时的、历史的，它必将为真正的人的社会所取代。

其次，马克思通过对自然经济向一般商品经济以及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转化历史过程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异化劳动产生的历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7页。

史过程，探讨了异化劳动的起源。

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探讨，是从劳动产品入手的，那么，“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对于这个间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没有作出回答，但已提供了解决的思路，表示要把异化劳动放到人类发展进程中去作具体考察。《詹姆斯 穆勒 ﹝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对此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马克思指出，在“在未开化的野蛮状态下”，人以自己直接需要的量作为他生产的尺度，人在这种状态下生产的东西不多于他直接的需要。需要的界限也就是他生产的界 限，因而供需正好相符。在这里马克思关于生产和需要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因为，虽然需要也反作用于生产，但首先是生产决定需要，. 贫乏的需要显然是由落后的生产决定的。然而，就异化劳动产生而言，它说明了在这种供需相符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生产的目的在于自己的消费，没有产品交换，因而也说不上有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脱离的异化现象。

一旦有了交换，就表明已有了超过占有的直接界限的剩余产品。这时，“产品的占有”就取代了在“未开化的野蛮状态下”产品的需要，成为衡量能在多大程度上使需要得到满足的尺度。如果说，在剩余产品的交换中，异化还只是一种局部的现象，那么在以交换为目的的“谋生劳动”(商品生产) 中，人的劳动就成了一种异化劳动。

接着，马克思对“谋生劳动”中的异化劳动作了四点具体规定。他说：“ (1) 劳动对劳动主体的异化和偶然联系；(2) 劳动对劳动对象的异化和偶然联系；(3) 工人的使命决定于社会需要，但是社会需要是同他格格不入的，是一种强制，他由于利己的需要，由于贫困而不得不服从这种强制，而且对他来说，社会需要的意义只在于它是满足他的直接需要的来源，正如同对社会来说，他的意义只在于他是社会需要的奴隶一样；(4) 对工人来说，维持工人的个人生存表现为他的活动的目的，而他的现实的行动只

具有手段的意义；他活着只是为了谋取生活资料。”① 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异化劳动四个具体规定相比较，二者的出发点都是把人的本质看作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不同的是马克思在这里通过分析劳动者个人的生产目的以及劳动者同社会生产的目的的关系，来进一步揭示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条件下所形成的个人与社会的对立，从而对其作出补充。

进而，马克思揭示了异化劳动的这种关系之所以达到自己顶点的原因。他说：“（1）一方面，谋生的劳动以及工人的产品同工人的需要、同他的劳动使命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而是不论就哪方面来说，都决定于同工人本身格格不入的社会组合；（2）购买产品的人自己不生产，只是换取别人生产的东西。”②

就这样，马克思通过对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自然经济同一般商品经济以及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转换历史进程的考察，初步地探讨了异化劳动的起源，从而揭示了其历史暂时性。

总之，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为了解开使他感到“苦恼的疑问”而走出哲学进入政治经济学领域所取得的一项重大理论成果，是马克思在自己哲学思想研究中的一次深化，因而对于马克思对科学世界观的探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二节　异化劳动理论与唯物史观

如果说，在1843年写作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所力图解决的“苦恼的疑问”是他在《莱茵报》时期革命实践中所产生的黑格尔国家学说同现实之间矛盾的“国家之谜”，那么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所力图解决的则是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得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的结论的基础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8－2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8页。

所产生的“历史之谜”。这也就是说，是关于社会历史的本质，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及其规律，关于从现存社会制度向未来社会发展等问题，而异化劳动理论则使马克思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一、异化劳动理论与社会历史的本质

人类是从自然观开始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学历程的。旧唯物主义在自然观和认识论上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认为自然界是万物的本质和本原，客观世界是感觉和认识的唯一对象。但一进入社会历史领域，他们就转向唯心主义，思维着的悟性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例如，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研究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观是分离的。

而唯心主义哲学在历史观上虽然是唯心的，但也提出了一些合理的见解。例如，黑格尔不仅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而且试图探索思想动机背后的动力。但是，他的历史观中的合理见解最终被唯心主义的体系所闷死。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是从异化劳动理论出发，解决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问题的。由于他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劳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把社会历史归结为劳动异化和扬弃这种异化的过程，因而也就很自然地要把生产劳动看成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他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①。他还强调指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②，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9页。

马克思的这些思想，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人本主义的局限，还是从理想化的、抽象的主体“真正的人”出发，而不是从现实的物质生产出发的，但把整个世界历史归结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毕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这一根本问题上的一个重大转折，对于唯物史观的形成具有重大的意义。

首先，马克思在这里把社会历史与劳动有机地结合起来，认为正是人通过人的劳动创造了人类历史。马克思突出强调了人类社会进入私有制社会的原因就在于劳动自身性质的异化，只有扬弃异化劳动才能进入真正人的社会，所以，全部人类社会的历史本质上就是在劳动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历史。马克思在谈到异化劳动为消灭私有制作好了物质准备和只有扬弃异化劳动才能实现“人类解放”时，十分明确地指出：“通过私有财产及其富有和贫困——物质的和精神的富有和贫困——的运动，正在产生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引者注)发现这种形成所需的全部材料”①。

其次，马克思把社会和自然有机地联系起来，说明了所谓人类社会的历史无非就是人改造自然的历史。自然界对人生成的过程，也就是人类社会历史形成的过程。而这两者统一的基础就是劳动。所以，人类社会的历史在本质上就是人类通过劳动变自然为“人化自然”的历史，是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批评了那种忽视物质生产而只强调宗教、政治、艺术和文学是真正人的活动的错误倾向。

再次，马克思把历史理解为自然史的一个部分，这就使他能够认识到社会历史虽然离不开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意识活动并通过这种意识活动反映出来，但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人的活动以及人的活动的对象都是以自然界为基础的，因而人类社会的历史就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6页。

像自然界一样，有其客观规律性，这就与黑格尔把社会历史归结为精神发展史的唯心史观划清了界限。反之，把自然史理解为“人化自然”历史，这又使马克思能够与费尔巴哈把自然界仅仅当作是人类的反映对象而不是实践对象的形而上学观点划清界限。

由上可见，马克思正是通过异化劳动的研究，从劳动入手去说明社会历史，把劳动和历史、社会和自然结合起来，并把历史理解为人的自然史，这就使他认识到社会历史在本质上是通过劳动而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是物质生产的历史，这就为他在以后进一步科学地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二、异化劳动理论与社会基本矛盾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不仅得出了生产劳动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的结论，而且对生产劳动的内在矛盾作了初步的分析。

首先他通过对异化劳动和对象化劳动的区分和研究，考察了人和自然界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是劳动借以进行生产的前提和条件，如果没有外部自然界，就使劳动者既失去了“劳动的生活资料（指土地、原料、劳动工具等等)”，又使劳动者失去了本身肉体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从而使生产无法进行。另一方面，劳动者进行生产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劳动的对象化，以便在合乎人的目的的意义上占有外部自然界。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劳动者越是通过劳动去占有外部自然界，他就越既失去“劳动的生活资料”，又失去本身肉体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而在这两方面都成为奴隶。“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

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而之所以会产生上述情况，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活动本身的异化，即对象化劳动已成为异化劳动了。马克思认为，只有扬弃异化劳动，消灭私有制，才能在劳动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

第二，马克思在对生产劳动的考察中，已经看到人不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而且人与人之间也发生一定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之外，任何单独的、孤立的个人都无法进行劳动。他说：“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② 但是，在私有制条件下，这种人与人的关系异化了。他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说明了工人之所以会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原因在于工人劳动自身性质的异化，而工人自身劳动性质异化的原因又在于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所以工人只能成为生产资料的奴隶和为了自己的餬口的生活资料而被迫去劳动，进而，马克思由劳动产品异化和劳动性质的异化推导出了人与人关系的相异化，即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这就在实际上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问题。所以，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概括，说明了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必然要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马克思深刻地指出：“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同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生产出其他人同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同这些人的关系。”③

---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9-100页。

由上可见，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研究，实际上已从人与自然界和人与人的关系的两个侧面，初步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内在的基本矛盾，涉及到了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以及生产资料所有制、产品分配和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等问题，接触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矛盾运动。尽管这些思想还是以理想化的“人的本质”为出发点的，但从探索科学历史观的过程来考察，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三、异化劳动理论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马克思能否解开“历史之谜”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第一次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的结论。《论犹太人问题》又指出：“完备的政治国家，按其本质来说，是和人的物质生活相反的一种类生活。物质生活这种自私生活的一切前提正是作为市民社会的特性继续存在于国家范围以外，存在于市民社会。”① 但直到这时，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理解还是抽象的，甚至认为“物质生活这种自私生活”与“完备的政治国家”是相脱离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虽然还没有能形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原理，但由于他通过对异化劳动的研究，已揭示了物质生产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接触到了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的思想，这就使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

马克思指出：“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以往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表现，也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8页。

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① 这里的前提，还是从人的本质出发，但具体内容却是强调生产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支配作用。这就为马克思探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虽已提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但对市民社会本身的了解还是笼统的、抽象的。现在把这个基础了解为物质生产，就赋予市民社会以确定的物质内容。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关于长子继承制的观点时，曾经谈到私有财产支配国家权力；这里则进一步指出私有财产运动是以往全部生产运动的感性表现，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这显然也是思想上的深化，并使马克思由财产关系进行生产关系成为可能。

在《德法年鉴》时期的文章中，马克思曾肯定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法和宗教；而在这里已突破了这个范围，提出物质生产支配包括道德、科学、艺术等等社会意识形态的多种形式。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在本书中，具体地考察了社会意识形式和“生产”之间的关系。例如，他在研究政治经济学说史时，就把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发展看作是社会经济本身发展在经济理论中的反映，而不是看作纯粹思维的过程，认为以魁奈为代表的重农学派直接地就是封建所有制在国民经济学上的解体，而斯密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则是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物。英国古典经济学理论上的矛盾，也是资本主义工业本身的矛盾。而在分析资本主义货币拜物教（“感性意识”）时，马克思认为古希腊的自然拜物教（“感性意识”）之所以与之不同，这是由于其“感性存在”不同，而感性存在又决定“感性意识”。他说：“拜物教徒的感性意识不同于希腊人的感性意识，因为他的感性存在还是不同于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1页。

腊人的感性存在"[1]。在马克思看来，不仅作为社会意识的道德、科学、艺术等等是由社会经济本身发展所决定，就是作为个人的意识也同样如此。他说："我的普遍意识不过是以现实共同体、社会存在物为生动形式的那个东西的理论形式"[2]。他还说："作为类意识，人确证自己的现实的社会生活，并且只是在思维中复现自己的现实存在"[3]。马克思还具体区分了两种异化，即经济的异化和国家、法以及意识形态的异化，认为前者是决定后者的"现实生活的异化"，只有首先扬弃前一种异化，才能扬弃后一种异化。他指出："因此，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4] 所以，费尔巴哈认为宗教异化和宗教变迁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宗教的异化本身只是发生在人内心深处的意识领域中，而经济的异化则是现实生活的异化"[5]。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面引用的那段话中，马克思已从纵的方面把生产——私有制——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这表明，马克思已开始对社会生活作全面的、综合的考察。这一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从而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由上可见，马克思虽然还没有明确地形成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但他已运用异化劳动理论说明物质生产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并对国家、法和各种社会意识形式起支配作用，因此对异化劳动的扬弃将导致一切异化的扬弃，这实际上已接近了历史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1页。

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原理。

四、异化劳动理论与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不是马克思的首创。马克思在1852年3月5日致约·魏德迈的信中谈到阶级斗争理论时，曾说过："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 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 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 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①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首先是指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他们把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史看成阶级斗争的历史。但是，由于他们未能触及到阶级产生的根本原因——生产资料私有制，因而在阶级起源问题上，采取了唯心主义的"征服"论；在阶级划分的标准上，采取分配决定论；而且只承认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宣扬阶级调和论。

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指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他们从经济上对各个阶级进行了一定的分析，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由于他们把利润看成是资本的收入，地租看作是土地的收入，工资看作是劳动的收入，因而歪曲了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掩盖了地租和利润的真正来源；特别是由于把资本主义看成是永恒的自然规律的表现，因而同时也主张阶级永恒论。

马克思在1843年夏写作《克罗茨纳赫笔记》时，就已研究过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派的著作，开始注意到了阶级的形成、阶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333页。

和等级特权的性质、封建等级转化为市民社会的阶级结构以及历史上重大阶级斗争等问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在研究古典经济学的过程中，通过对异化劳动研究，开始创立自己的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财富分配的三种主要形式——工资、利润和地租的研究，揭示了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对立的经济根源，得出了他们之间阶级斗争是不可调和的结论。他说："在国民经济学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各种利益的敌对性的对立、斗争、战争被认为是社会组织的基础。"① 例如，他在具体剖析劳动产品同劳动者相异化以及劳动与劳动者相异化时，就具体生动形象地论述了资本家与工人的阶级对立。马克思说："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跟劳动格格不入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同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同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雇主起个什么别的名字）同这个劳动的关系"②。

更为深刻的是，当马克思在研究异化劳动时，他开始把自己的视野由分配领域转向了生产领域，这就进一步从哲学上开始把握住了阶级划分的标准问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和古典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分配决定论"的理论错误。他说："人同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同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因此，如果人同他的劳动产品即对象化劳动的关系，就是同一个异己的、敌对的、强有力的、不依赖于他的对象的关系，那么，他同这一对象所以发生这种关系就在于有另一个异己的、敌对的、强有力的、不依赖于他的人是这一对象的主人。如果人把自身的活动看作一种不自由的活动，那么，他是把这种活动看作替他人服务的、受他人支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7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0页。

的、处于他人的强迫和压制之下的活动。”①

在马克思看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竞争的加剧，其结果必然导致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以及工人和农民区别的消失，从而最终使整个社会分裂为两大根本对立的阶级——“有产者阶级”（资本家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而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又由于其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工人生产的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就越没有价值；工人的产品越完善，工人自己越畸形；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钝和成为自然界奴隶。所以，工人阶级要使自己获得解放，就必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以扬弃异化劳动，而异化劳动的扬弃就是变私有制为公有制，这就开始克服古典经济学家在阶级发展趋势上的阶级存在永恒论的错误。马克思说：“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的解放、从奴役制的解放，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②。同时，马克思还把工人解放和人类解放联系起来，认为工人解放的同时也就是全人类的解放。他指出：“因为工人的解放包含全人类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同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③。

如果说，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并使之与人类解放有机地联系，那么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通过异化劳动的研究，进一步把这个问题的研究从政治领域推进到经济领域，从而为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由上可见，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研究，由分配领域追溯到生产领域，深刻地揭示了阶级斗争，尤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论述了两者的根本对立，说明了阶级划分的依据不在分配领域而在生产领域，指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

①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9、101页。

阶级消灭的历史必然性，从而大大深化了自己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

第三节　异化劳动理论与共产主义

异化劳动理论的创立，使马克思的理论探讨获得了一个新的更高的起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以异化劳动理论为基础，第一次对共产主义作了集中的研究，并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前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探索

马克思在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前，对当时流行的共产主义已作过一些研究和述评。

马克思最初接触共产主义问题，是在《莱茵报》时期，在他就任《莱茵报》主编后的第一天，就针对奥格斯堡总汇报攻击《莱茵报》有共产主义倾向而写作了《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作为回答。这是马克思第一次对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马克思在文中肯定了共产主义的要求是当时欧洲的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他说："现在一无所有的等级要求占有中等阶级的一部分财产，这是事实……不论奥格斯堡如何保持沉默，它仍然是曼彻斯特、巴黎和里昂大街上引人注目的事实。"①

同时，马克思也看到了空想社会主义存在着不着实际的倾向，他说："'莱茵报'甚至在理论上都不承认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现实性，因此，就更不会期望在实际上去实现它，甚至都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31页。

认为这种实现是可能的事情。”[1]

马克思非常重视共产主义的理论论证，并把它放在各种各样共产主义的实验之上。他说：“我们坚信，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际试验，而是它的理论论证”[2]。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标志着马克思开始了同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彻底决裂，也为他批判研究接受空想社会主义准备了条件。就在马克思准备同卢格一起创办《德法年鉴》时，他在给卢格的信中说：“这一刊物要着意于未来，着意于新的事业”[3]。这时，马克思虽然对空想社会主义持保留的不肯定的态度，认为卡贝、德萨米、魏特林等人宣扬的共产主义是“一种教条的抽象观念”，不过是人道主义原则的特殊表现。但又认为“社会主义的原则，整个说来，仍然只是涉及到真正人类实质的实际存在的这一方面”[4]。

马克思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两篇文章，区别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第一次表达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论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标志着马克思已经转到了共产主义。他从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的原理出发，对未来社会的状况作如下描述：“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5] 简言之，就是要消灭人的本质异化，把人的本质归还给人，使人在实际生活中成为类存在物，成为自己力量的主宰，组成新的社会共同体。很显然，马克思的这些见解，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和赫斯的哲学共产主义的影响下，从人的类本质出发推论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3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34页。
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3页。

来的。

二、异化劳动理论对共产主义的论证

当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共产主义进行论证时，由于他在巴黎这个“古老的哲学大学和新世界的首府”日益广泛地接触到工人运动和工人的革命团体，并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实地考察；由于他对政治经济学和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批判研究，以及对黑格尔哲学特别是否定性辩证法的批判改造，使马克思对现实社会的了解和理论上的准备，都比《德法年鉴》时期进一步深化了。因而，他在探讨共产主义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一）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从经济制度上讲，共产主义的核心问题就是消灭私有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首先是通过对异化劳动的研究，阐明了私有制的历史暂时性，论证了共产主义实现的历史必然性的。按照异化劳动理论，就劳动本来的含义讲，它应当是“自由自觉的活动”，那么，它又为什么会在私有制，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变成异化劳动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研究异化劳动与私有制的关系。马克思对此作了自己的独特的探索和分析。

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产物，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和这一外化的实现，这个秘密是在“私有财产发展到最后的最高的阶段”才暴露出来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劳动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前提的，是资本、地产和劳动三者分离的结果。同时，私有制又是劳动的凝结物，是异化劳动的积累。所以，从静态上来看，私有制和异化劳动是同时并存、共同发展，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但从动态上来看，异化劳动则是更为根本的东西，因为是异化劳动产生私有制而不是相反。马克思说：“我们通过分析，从外化劳动这一概念，即从外化的人、

异化劳动、异化的生命、异化的人这一概念得出私有财产这一概念。”① 他还说：“诚然，我们从国民经济学得到作为私有财产运动之结果的外化劳动（外化的生命）这一概念。但是对这一概念的分析表明，与其说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还不如说它是外化劳动的结果，正像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性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性迷误的结果一样。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②

马克思以异化劳动来探索私有制的起源，与后来从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分工和交换来探讨私有制的起源相比较，虽然是不成熟的。然而，其中也包含着丰富的历史辩证法的思想：(1) 私有制不是永恒的，而是有起源的，这就打破了古典经济学关于私有制永恒论的形而上学观点，揭示了它的历史暂时性，而异化劳动和私有制又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因此，扬弃私有财产就是对异化劳动的扬弃，反之，亦然。(2) 既然私有制是异化劳动的产物，因而也就包含着从劳动来探求其起源的深刻思想。(3) 异化劳动是人的自我异化，因而应当从人类本身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来探寻其原因。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说：“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异化劳动同人类发展的关系问题，也就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③

正是以私有制的历史暂时性为理论出发点，马克思深入到私有制内部，从私有财产运动的规律中得出了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运动的必然结果的结论。他说：“整个革命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引者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④ 这是因为，私有财产的运动突出地表现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而“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

---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2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121页。

达到极限，就必然成为全部私有财产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①

以私有财产的历史暂时性为理论出发点，以异化劳动产生私有制为理论依据，马克思进一步从私有财产的运动追溯到生产的运动，得出了共产主义是生产运动必然结果的结论。他说：“私有财产的运动……是以往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表现”②；而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③ 所以，资本主义社会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发展，孕育着共产主义的必然性。

以私有制的历史暂时性为理论出发点，马克思从异化劳动的产生追溯到人的本质的异化，进而从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看到了这种异化扬弃的必然性，得出了共产主义是人的本质自我异化扬弃的必然结果的结论。他说：“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④。

由上可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虽然还是把共产主义看作人的本质的复归，但这时他已不是直接从人的本质出发，而是通过异化劳动的研究，深入到“对运动的历史条件的真正理解”中去，从私有制财产的运动规律中引出共产主义，这就为他扭转用人的本质来论证共产主义和创立共产主义理论开辟了新的道路。

(二) 对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的批判

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的根本缺陷之一，是不能正确了解共产主义与私有财产的关系。因此，马克思在从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得出共产主义必然性的同时，对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学说进行了批判。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17页。

马克思认为“粗陋的共产主义”，即早期的共产主义，虽然已经提出了否定私有财产的要求，但它实质上只不过是要求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和追求财产的平均化。这种对财富的嫉妒、贪欲和它的平均化欲望，便导致它抹煞天赋、否定个性和否定文明的错误主张，因而它“不过是想把自己作为积极的共同体确定下来的私有财产的卑鄙性的一种表现形式”①，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没有需求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单纯倒退，恰恰证明私有财产的这种扬弃决不是真正的占有。”②

在马克思看来，另外的两种共产主义学说，即“（α）按政治性质是民主的或专制的；（β）是废除国家的，但同时是尚未完成的，并且仍然处于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的影响下”③的学说，前者想通过民主的或专制的国家帮助来实现共产主义，后者则想通过废除国家来实现共产主义。与“粗陋的共产主义”相比较，虽然它们已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人向自身的还原或复归，理解为自我异化的扬弃，但由于它们还没有弄清楚私有财产的积极本质，也还不理解需要的人的本性，没有把私有财产同产生它的基础即异化劳动有机地联系起来，更没有提出改造这一基础的任务，因而其虽然已理解了私有财产这一概念，但是还不理解它的本质，还是受私有财产的束缚和感染。

进而，马克思由结果追寻到原因，说明了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1) 从客观上看，只有到私有财产发展的最高和最后的阶段，即在现代工业高度发展情况下，异化劳动作为私有财产的真正主体的本质的秘密才会暴露出来，只有在这时才有可能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1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1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

形成真正的科学共产主义运动和理论，而在这之前，则是不可能的。(2) 从理论上看，“粗陋的共产主义”和企图通过专制或民主国家来实现共产主义以及想通过废除国家来实现共产主义的理论，由于对私有财产只是从客体方面去考察，而没有从主体方面去考察，见物不见人，因而也就不能够认识私有财产的真正主体本质，进而认识到其产生的基础，真正从根本上扬弃它。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还对蒲鲁东的改良社会主义进行了初步的批判，突出强调了只有消灭私有制和异化，才能使无产阶级获得真正的解放。

蒲鲁东有句名言：“财产就是盗窃”，他主张“工资平等”，并企图以此来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马克思则明确指出了这只能是一种空想。因为在异化劳动条件下，工资是异化劳动的直接结果，是工人全部劳动产品的一部分，是继续维持充当奴隶权利的那个部分。因此，在异化劳动条件下，“强制提高工资……无非是给奴隶以较多报酬，而且既不会使工人也不会使劳动获得人的身份和尊严。”① 只有在消灭异化劳动和私有制的前提下，工人才能真正获得解放。马克思指出：既然“工资是异化劳动的直接结果，而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因此，随着一方衰亡，另一方也必然衰亡。”②而要消灭异化劳动、私有制，使工人获得真正“人的身份和尊严”，就必须通过“工人解放”，而不是蒲鲁东的“工资平等”。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从异化劳动同私有财产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的解放，从奴役制的解放，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且这里不仅涉及工人的解放，因为工人的解放包含全人类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同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③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101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101 页。

此外，马克思还开始了对傅立叶、圣西门空想社会主义的分析批判。虽然由于资料的限制和内容安排上的考虑，马克思的这一分析批判没有展开，但毕竟是一个重要的开端。

总的说来，马克思对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的批判，是他对共产主义进行探索，创立科学共产主义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以异化劳动理论为理论基础，既批判它们的空想与错误，尤其是对私有财产本质的歪曲，又注意站在它们已经取得成果（如对资本主义种种罪恶的无情揭露和对私有财产的猛烈抨击等等）的基础上，进行广泛的探索。也正是在这一批判的、实践的道路上，马克思为创立科学共产主义作了理论和资料的准备工作。

（三）共产主义是对私有制的积极扬弃

马克思在扬弃了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他自己关于共产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他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① 从马克思的这段论述中，可以看到他当时在异化劳动理论基础上对共产主义理解所能达到的高度。

马克思把共产主义定义为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说明它并不取消私有财产运动和自我异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积极成果。扬弃异化劳动，但并不扬弃对象化的劳动，而是对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

劳动的对象即对象世界的真正占有。被扬弃的是一种劳动方式，而不是劳动本身。

对象世界是人的本质（劳动）的对象化，它是人们在迄今为止的劳动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因此重新占有对象世界不过是恢复人们一度失去了的本质。但这种占有不是作为彼此对立相互为敌的利己主义的个人并为了利己主义的目的去占有，而是由社会地联合起来的人并且为了社会的目的去占有。“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也就是说，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①这样的占有是符合人的本性的占有，通过这种占有恢复了人们一度被歪曲和丧失了的本质。

所谓人的本质的复归，并不是让历史倒退回去，恢复人类的原始状态，并不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没有需求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单纯的倒退”②。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因此，共产主义是以往全部历史运动的结果。

共产主义是自然界向人的生成，自然界通过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通过工业，变成了完全属人的自然界，即符合人的本质需要的自然界，所以是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也就是完成了的人本主义。因为扬弃了自然界的直接性，自然界就成为人的现实的对象性，就实现了人对自然界的现实的占有，因此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然而人只有作为社会的人才能占有自然界，自然界只有作为

---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18页。

社会的对象才是属人的对象。自然界的属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着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纽带，它既是自己也是别人的现实的生命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表现为他自己的属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才成为人的属人的存在。“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① 马克思认为，社会的性质是整个人类历史运动的普遍的性质，正像社会创造着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创造着社会。因此，社会性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共产主义就是社会的人和人的社会的形成，所以也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第四节　关于实践和认识的思想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时期，由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的需要和当时哲学发展的状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活动是以探讨和创建科学历史观为重点的。正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是从费尔巴哈那里产生出来的，是在与庸才们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自然，……他们所特别注意的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② 但是哲学世界观的各部分总是有机联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历史观的探讨也不能不涉及认识论问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虽然没有专章论述认识问题，但是由于他在科学历史观的探讨中取得了重大进展，因而在认识论方面也提出了极为丰富的思想。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336页。

一、对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的探讨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的。科学实践观的制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新世界观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马克思在其从事哲学活动的初期，就开始了对实践问题的探讨。在《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从辩证唯心主义立场出发，强调自我意识的能动作用，把实践看作理论批判活动。他认为"哲学上的实践本身就是理论的"，"实践是一种批判，它在本质上来衡量个别存在，从理念上来衡量特殊的现实。"① 实践不是被理解为变革现实的物质活动，而是理性发展中的一个环节。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注意的中心是人的解放，首次提出无产阶级是实现人类解放的物质力量。他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对德国社会制度的革命改造和对思辨的法哲学的批判，"只有用一个办法即通过实践才能解决"②。这表明，马克思已把实践同理论批判区别开来，把实践了解为改造现实社会的政治斗争。但是由于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马克思对实践的理解还有局限性，这不仅表现在还没有把生产活动作为实践的基本内容；没有说明实践对理论的决定作用，而且在对理论与实践的作用的估计上，更偏重于理论活动的意义。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借助异化劳动理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剖析，日益深入地认识到劳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因而在探索实践观以及实践和认识的关系方面也取得重大的进展。

在实践观上，由于马克思把生产劳动看作人区别于其他动物

---

① 《博士论文》第6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0页。

的基本特征，因而抓住了实践的最基本的内容－－生产活动。马克思指出，人确证自己之为人，不是靠单纯的意识活动，而主要是靠人改造无机自然界的生产劳动。这种生产劳动既是创造生命的活动，又是人的类生活。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马克思还没有明确区分劳动和实践的概念，但已明确地将生产劳动看作实践活动的基本内容。马克思还通过对人的本质的分析考察，初步揭示了实践的基本特征，即改造对象世界的能动性和客观现实性，并把实践看成一种历史过程。

马克思探索了实践和认识的关系问题。他认为，理论难题的解决是实践的任务，并以实践为中介，“真正的实践……是现实的和实证的理论的条件”①，“关于人的科学本身是人在实践上的自我实现的产物”②。共产主义理论只有从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中诞生，“对它的能思维的意识说来，又是它的被理解到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③。这说明了客观世界首先是人类实践对象和改造的对象，同时，人类也只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过程中，才能获得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强调了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

马克思还对真理的标准问题进行了探索。他说：“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④。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都把理论的对立的解决仅仅看作认识的任务，而不是看作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实践的任务，所以他们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理论的对立。只有在实践中和通过实践的“途径”、“中介”，才能解决现实生活的任务，从而解决理论的任务。

---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5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7页。

在马克思看来，理论并不能实现什么，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能动地改造世界。他强调指出："要消灭私有财产的思想，有共产主义思想就完全够了。而要消灭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① 同时，马克思还指出实践是现实的和实证的理论条件，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能动地推动认识的发展。

由上可见，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但在揭示实践的内容和特征、实践和认识的关系等问题上，较之《德法年鉴》时期已取得显著的进展。

二、对认识主体——人的本质的认识

要创立科学的认识论，首先要正确地了解认识的主体——人的本质。然而，这个问题是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所未能科学地解决的。黑格尔把绝对精神看作人真正的本质，而把绝对精神之外的客观世界当作精神的外在化。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黑格尔哲学中的主体"就是神，绝对精神，就是知道自己并且实现自己的观念。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界不过成为这个隐秘的、非现实的人和这个非现实的自然界的宾词、象征。因此，主词和宾词之间的关系被绝对地相互颠倒了。"②

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的这一观点，他认为，人是同时兼有物质和精神、灵魂和肉体、思维和存在的实体。人是自然的产物，自然在人身上达到了它发展上的顶点。客体怎样，主体也就怎样，人是可以认识自然的。然而，费尔巴哈的认识论是从人本学的唯物主义出发的，他不是把人当作社会的人加以说明，而是把认识的主体看作是抽象的、生物学上的"人"。这样，"人"就如同动物一样，只能消极地直观地反映事物的外部形态，而不能在改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4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6页。

客观世界中认识世界。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同时指出费尔巴哈的认识论“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上，而总是仅仅从外表的效用方面来理解”。所以，“这种心理学（认识论——引者注）就不能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①。

马克思当然也不否定人是自然的存在物，但和费尔巴哈不同，他所强调的是人的社会本质。他说：“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是不采取共同的、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②这是因为，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人的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此，马克思说：“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③。人的社会性，不仅在同别人的实际交往中表现出来，甚至当一个人从事科学之类的活动，即从事一种只是在很少情况下才能同别人直接交往的活动的时候，他也是社会的，因为他是作为人活动的，就是说，不仅他的活动所需要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本身，都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他的，而且他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的活动；因此，他从自身所做出的东西，是他从自身为社会做出的，并且意识到他自己是社会的存在物。据此，马克思认为：“我的普遍意识不过是以现实共同体、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页。

社会存在物为生动形式的那个东西的理论形式”①。

马克思不仅强调“个人是社会存在物”，还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关于认识主体能动性的合理思想，指出人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他认为人作为一个特殊的个体，即是“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地也是一个“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主体的自为存在，正如他在现实中既作为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②

正是基于对人的本质的这种了解，马克思又具体地阐明了作为认识主体的人既是受动的，又是主动的。他指出，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人作为感性的和自然存在物，也像一般动物一样是靠自然界的产物生活的，他的生命是同自然界有着内在联系，自然界是表现和确证人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同时，马克思又指出：“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③。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正因为他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他又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而自然界不是直接地同人的存在物相适应的，这就促使人必须去改造自然界，同时也改造自己。正是人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才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④。自然界的产物对人来说，也不仅是生存的直接物质条件，而且是他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的材料、工具和对象。自然界对人来说，也不是像对动物那样直接地存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

着，而是按照它被人的劳动改造的那种程度存在着。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就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具体地研究了人的社会性和能动性的本质，不但开始同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论划清了界限，而且为创立科学的认识论准备了前提。

三、对认识客体——“人化自然”的认识

认识对象的本质是什么呢？这也是马克思以前的哲学长期未能科学解决的问题。

黑格尔认为，“自然”（客体）是由“绝对精神”创造的，是“绝对精神”的外在化，因此，它必然带有它的创造主的印迹。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在自然观上坚持了唯物主义，但他作为一个人本主义者，只把自然当作人类感觉、直观的对象，而不是当作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和改造对象。“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①。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关于认识对象论述中的合理思想，并加以唯物主义的改造。他指出，处在原始状态下的自然界是不符合人的目的的；只是在把自然界加以改造过之后，它才变成人的存在物。所以，自然界对人说来并不像动物那样直接存在着，而是按照它被人们改造过的那种程度存在着。他说：“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② 因此，“正像人的对象不是直接呈现出来的自然对象一样，直接地客观地存在着的人的感觉，也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4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178 页。

不是人的感性，人的对象性。自然界，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都不是直接地同人的存在物相适应的。”①

马克思还通过考察工业发展的历史，提出了“人化自然”的著名命题。他指出，经过劳动和工业改造过的自然界，并不是单纯的自然存在物，而是人活动的结果，“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② 也只有这种自然界才是人们现实的认识对象。因此，“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认识论——引者注）”③。马克思还认为“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④ 肯定现实认识的对象是“人化自然”，这是认识发展史上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肯定认识的对象是“人化自然”，是就人的认识的实现和“人化自然”的关系来说的。它说明了认识对实践的依赖性，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但不能由此而得出结论说，人类认识的对象只能是“人化自然”，而应当排斥非人化自然。不承认人的活动和认识尚未触及的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和作为认识对象的可能性，就意味着彻底堵塞“自在之物”向“为我之物”转化的道路，使人永远局限于已知的范围，不可能向未知领域扩展（因为这个领域已被宣布为“无”，即非存在物）。这既不符合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也不符合马克思关于外部自然界处于“优先地位”的思想。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6页。

四、对人的感觉器官、感觉的形成和发展及其作用的论述

马克思在论述其异化劳动理论时认为，感觉是确证人的本质的一个重要方面。他说："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①。由此出发，他论述了人的感觉器官、感觉的形成和发展，提出许多富有认识论意义的思想。

马克思认为，对象如何成为人的认识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认识主体的性质。从主体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②。而且"眼睛对对象的感觉不同于耳朵，眼睛的对象不同于耳朵的对象。"③ 他还指出，人的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的范围与动物相比，要远为丰富，宽广和精细。人不像动物那样只为它感到有用的那些自然物的特性所局限。人则自由地与对象相对立，能在感知对象的过程中享受对象而不管对象是否有用。

马克思认为，人的感觉、感觉和器官是在人的本质对象化(也即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他说："不仅五官感觉，而且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④ 他还指出："只是由于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⑤这就是说，人在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也改造自己本身，改造了人的感觉和认识能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5－12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5页。

④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6页。

思指出：人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①

马克思在对异化劳动的分析中，还看到人的社会处境对人的认识有很大影响。他说，对于一切忍饥挨饿的人说来并不存在人的食物形式，而且只有作为食物的抽象存在；食物同样地可能具有最粗糙的形式，而且不能说，这种饮食与动物的饮食有什么不同。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征，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

马克思还从异化劳动理论出发，对比了两种不同社会制下人的感觉的区别：在私有制下，人们变得如此愚蠢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人们所拥有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它对人们说来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人们直接占有，被人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人们才把它看作自己的对象。这样一来，人们的一切活动都被局限于一个极其狭隘的范围之内，一个人拥有多少钱财、土地、工厂，他的眼睛才能看多远，他的耳朵才能听到多大范围内的声响，他的鼻子才能嗅到多远的气味，他才能有多大范围的活动和享受，而他的社会器官则失去了应有的效用。总之，人的一切感觉、认识都被私有制所限制而日趋贫困化。

只有到了共产主义，扬弃了私有财产，才能使人的一切感性和特性得到真正的彻底解放。到那时，“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② 到了那时，人的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变成人的。眼睛变成了人的眼睛，正像眼睛的对象变成了社会的、人的、由人并为了人创造出来的对象一样。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3页。

就使人的感觉不仅具有私有制条件下所无法比拟的丰富性和深刻性，而且有了质的不同。它不仅同原始人的类似动物的原始感觉不同，也同私有制下狭隘贫困的异化单纯占有的感觉有本质的区别，它成了真正的人的感觉。

第五节　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

在马克思对科学世界观的探索过程中，如何从黑格尔哲学中拯救出自觉的辩证法，并把它转变为唯物主义的新哲学，始终是他所面临的一项重要工作。

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和改造，可以说在《博士论文》就开始了，其主要表现是弘扬了辩证法的彻底革命精神，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不彻底性。不过当时马克思还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是从自我意识哲学出发，进行这种批判改造的。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已开始转向唯物主义。他批判了黑格尔用“中介”调和对立面斗争的思想，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类型矛盾的学说；批判了黑格尔否定国家制度发展过程存在着质的飞跃的思想，明确指出用新国家制度代替旧国家制度，“总要经过真正的革命”①。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异化劳动理论出发，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了更为全面的批判和改造，并取得了对于新世界观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的成果。

一、关于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

在德国，批判黑格尔的哲学革命是从费尔巴哈开始的。青年黑格尔派分子施特劳斯和鲍威尔虽然最先举起宗教批判的旗帜，但是他们的观点却始终没有超出黑格尔哲学的范围。他们批判了宗教，但在哲学观点和方法上继续受黑格尔哲学的支配，所不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15页。

的是他们把黑格尔哲学加以肢解和庸俗化了。他们满足于从其中抽出个别的要素，把它当作自己学说的基础。施特劳斯把黑格尔体系中作为抽象的自然界的“实体”当作自己的哲学的基础，而布鲁诺·鲍威尔则把抽象的人的“自我意识”作为自己的学说的出发点。他把黑格尔作为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的“绝对理念”偷换为和外在世界处于对立状态中的抽象的“自我意识”，从而把黑格尔哲学和他的辩证法主观化了。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在客观精神所固有的矛盾的作用下发生的，而在鲍威尔那里则成了自我意识同世界的不断的对立和斗争。马克思在指出这种批判运动的缺陷时说：“现代德国的批判着意研究旧世界的内容，而且批判的发展完全拘泥于所批判的材料，以致对批判的方法采取完全非批判的态度，同时，对于我们如何对待黑格尔辩证法这一表面上看来是形式的问题，而实际上是本质的问题，则完全缺乏认识。”①他们根本不了解，“现在已经到了同自己的母亲即黑格尔辩证法批判地划清界限的时候”②。

马克思认为，只有费尔巴哈的批判才在克服黑格尔哲学方面带来了真正的进步。费尔巴哈的批判虽然也是从宗教开始的，但是较之青年黑格尔派却具有彻底得多的性质。因为他把宗教的批判推广到唯心主义哲学方面，把这种哲学看作宗教异化的哲学形式。他认为，近代哲学的任务就是将上帝现实化和人化，将上帝的立场逐渐转变为人的立场，从而既扬弃和克服宗教，也扬弃和克服思辨哲学。他揭露黑格尔哲学是宗教的理性支柱，这种哲学的基础和宗教一样，是在思辨理性的名义下把人的本质转变为上帝或某种绝对的存在物的本质。为了恢复人的本质，必须克服这种人的自我异化的哲学形式。马克思说：“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5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57页。

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①

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主要历史功绩是：

(1) 费尔巴哈证明了黑格尔哲学不过是用思辨语言表达出来的宗教。如果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那么黑格尔哲学则是这种异化的另一种形式。所以和宗教一样，它也应当受到批判。费尔巴哈指出，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和宗教都把抽象的、非感性的、无形的东西看成第一性，都把人的观念变为独立的实体，并从观念中引申出整个具体的经验世界。“黑格尔式的思辨只是宗教真理彻底的完成而已。”②

(2) 费尔巴哈批判了唯心主义哲学之后，不是简单地恢复过去的唯物主义，他较之先前的纯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优越之处，是在于他把作为感性现实的人、人的生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当作他的理论的基本原则。这就是说，他提出了哲学人本主义的原理，而在当时的马克思看来，这就是“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现实的科学”③。

(3) 他揭露了黑格尔否定性辩证法的唯心主义性质，用唯物主义的原理同它相对立。在黑格尔那里一切真正的存在即绝对的肯定都是经过中介，经过证明的肯定，即否定之否定，但是作为最后结果而得到的绝对肯定的东西仍然不过是当作出发点的那个抽象物、空虚的精神。费尔巴哈认为，真正肯定的东西不是要经过中介的东西，而是立足于自身之上，以自身为基础的肯定，就是说，是一种具有感性确实性的东西。

具体地说，费尔巴哈是这样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的：首先，作为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运动的出发点的东西，是一种异化的实体，而不是真实的感性的实体。如在《逻辑学》中，他从纯粹的抽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57–158页。

②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7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58页。

无限者、绝对物出发；在《精神现象学》中，他从普遍的自我意识出发，实际上二者都是从宗教和神学出发；第二，随后，黑格尔否定了抽象的、无限的、绝对的东西，创立了感性的、有限的、特殊的东西，就是说，他扬弃了宗教和神学，创立了感性和自然界。第三，作为否定的否定，他重新扬弃了感性的、有限的东西，恢复了抽象物、无限者，就是说，他又恢复了宗教和神学。

由上可见，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就是把自己的从感性现实出发的唯物主义，同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相对立，揭露了黑格尔哲学的实质。在这个意义上说、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但是，“费尔巴哈把否定的否定仅仅看作哲学同自身的矛盾，看作在否定神学（超验性等等）之后又肯定神学的哲学，即同自身相对立而肯定神学的哲学。”① 这样一来，他在揭露、批判黑格尔否定的否定的唯心主义性质时，连同它所包含的辩证法的合理要素也一并抛弃了。也就是说，他只看到黑格尔哲学同自身的矛盾，而没有看到它以思辨的形式反映了事物发展的辩证法。这显然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可真正克服旧哲学的。所以，马克思在《序言》说：“我认为，本著作的最后一章，即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剖析，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这样的工作还没有完成”②。又说：“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的本质的发现，究竟在什么程度上仍然——星少为了证明这些发现－－使得对哲学辩证法的批判分析成为必要，读者从我的论述本身就可以看清楚。”③ 这说明，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虽然揭露了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本质，但并没有完成克服黑格尔哲学的任务，因而使得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批判分析，仍然是完全必要的。

在对待黑格尔辩证法的态度上，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始终不同。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15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46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48 页。

他不仅指出必须克服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的思辨唯心主义形式，而且也充分肯定它所包含的批判的、革命的要素。他说："由于黑格尔根据否定的否定所包含的肯定方面把否定的否定看成真正的和唯一的肯定的东西，而根据它所包含的否定方面把它看成一切存在的唯一真正的活动和自我实现的活动，所以他只是为那种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既定的主体的人的现实的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发生的历史。"① 在这里，马克思既揭露了黑格尔否定的否定的唯心主义本质，也揭示了它的真实的辩证方法的意义。在黑格尔那里，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并不是像费尔巴哈所理解的那种没有用自己的存在证明自身的、同以自身为基础的否定不相容的形而上学的规定,而是指绝对精神在否定的否定的整个运动过程中，包含这一过程所获得的全部丰富内容的肯定，因而是"真正的和唯一肯定的东西"；黑格尔所说的否定，也不是那种同肯定不相容的形而上学的否定，而是一种与肯定处于对立统一关系之中、具有能动性活动的否定，它是形成自我肯定的真正源泉，是"一切存在的唯一真正的活动和自我实现的活动"。因此，他以"纯粹思想辩证法"的形式为"历史运动找到了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猜测到了历史运动的辩证过程，尽管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既定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发生的历史。正因为如此，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就不能像费尔巴哈那样，仅仅停留于对其思辨形式的批判，而要对其进行唯物主义的改造，发挥其辩证法本来的批判作用，使之成为真正的批判的武器。

二、对黑格尔否定性辩证法的批判和改造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和改造，是以《精神现象学》为主要对象的。《精神现象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159 页。

是黑格尔第一次阐述自己独立的哲学观点的名著，也是他的整个哲学体系的导言。在这部著作中，黑格尔描述了其客观唯心主义的主体与客体统一的理论，叙述了以绝对观念为主体的异化和扬弃异化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实际上已是黑格尔整个哲学体系的雏形。因此，马克思把它看成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并明确指出，批判黑格尔哲学必须从《精神现象学》开始。马克思正是在对《精神现象学》的批判中，既揭露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实质，又肯定了他的积极成果，开始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改造。

黑格尔哲学的最具有独创性的特点，是把整个世界——自然界、人和社会看作一个统一的过程，有其辩证发展的历史。然而，这种把世界当作有机整体的世界观，是通过把自然界和人精神化之后才达到的。就是说，他把一切现实的东西及其发展都消融在精神之中，把现实的种种对立变为精神和精神的各种异化形式之间的对立。精神通过自我异化和异化的扬弃的“否定的否定”的运动而达到对立统一。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哲学全书》是从逻辑学即纯粹思辨的思想开始，而以绝对知识、即理解自身的哲学或绝对的精神结束的。“所以整整一部《哲学全书》不过是哲学精神的展开的本质，是哲学精神的自我对象化；而哲学精神不过是在它的自我异化内部通过思考理解即抽象地理解自身的、异化的世界精神。”① 在黑格尔的体系中，逻辑学起着“精神货币”的作用，它是表现为思辨逻辑的人和自然界的抽象规定性，是撇开了现实的自然界和现实的人的抽象思维。这种抽象思维的外化形式、它的外在形态就是自然界。由于自然界对抽象思维来说是外在的，因而是抽象思维的自我丧失；当抽象思维理解到自然界不过是具有感性外壳的抽象思维，因而把它当作抽象的思想来把握时，它就扬弃了自然界并返回自身，于是就出现了精神，即回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0页。

了自己的诞生地的思维。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在精神还没有达到绝对精神即抽象的哲学精神的发展阶段以前，它还处于“现象学”的阶段，就是说还处于与本质相异化的形式中，只有扬弃了这些形式，它才获得与自身相符合的存在，即绝对知识。因此，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全部外化和外化的扬弃，乃是抽象的、绝对观念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思维的生产史。

马克思在评述黑格尔的上述思想时指出：“黑格尔有双重错误。”①

首先是他根本颠倒了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在黑格尔哲学中，作为主体的是绝对观念，而客体是绝对观念的异化，人们在客体中认识的无非是绝对观念自身。因此，在黑格尔哲学中，主客体的对立，实际上是抽象思维同感性的现实在思想本身范围内的对立；全部外化和外化的扬弃不过是意识的运动，是意识的各个环节的总和。马克思明确地指出，在这里，“主词和宾词之间的关系被绝对地相互颠倒了：这就是神秘的主体一客体，或笼罩在客体上的主体性，作为过程的绝对主体，作为使自己外化并且从这种外化返回到自身的、但同时又使外化回到自身的主体，以及作为这一过程的主体”②。马克思还批判了黑格尔关于自我意识的外化就是创立“物相”的唯心主义理论，指明了对象的客观性。他举例说，饥饿是个自然需要，为了得到满足，得到食物，它需要在它之外的自然界，在它之外的对象。饥饿是我的身体对于存在于我的身体之外的、为了自己生存不可缺少的对象的公开的需要。马克思还指出，世界上的各种现象都是互为对象的。一个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的存在物，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6页。

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① 而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既不是对象，又没有对象，在它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存在的唯一存在，因而这种存在是纯粹的虚无。

第二是把现实事物的异化归结为抽象的哲学思维的异化。这是由黑格尔的第一个错误必然要导出的第二个错误，也是黑格尔哲学保守性的表现。在黑格尔那里，人、人的本质和自我意识是等同的。因此，人的本质的一切异化也就是自我意识的异化。因此，扬弃异化也就不是实际地改变客观对象，而是纯粹思辨的过程。例如，说财富和国家政权等等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实际上是说人们关于财富、国家政权等等的世俗观念是非哲学的概念，是抽象的哲学思维的异化。这样一来，人和外部世界、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现实矛盾，就仅仅归结为自我意识和一般意识之间的对立。由此而得出的结论是，那作为人的本质的异化而应被扬弃的东西，并不是由于它的非人化，由于它和人的本性相矛盾，而只是由于它和抽象的哲学精神不同。并且，人对异化了的本质力量的重新占有，也只能表现为纯思维中的占有，异化的整个复归仅仅归结为现存事物的哲学的消融和恢复。在《精神现象学》中出现的宗教、财富、国家、政权等等各种异化形式，不过是自我意识的不同形式，是自我意识的存在方式和发展环节，它们互相产生，彼此消融，最后结果是自我意识和当作对象的意识的同一，即绝对知识。因此，尽管有这种产生和消灭的运动的假象，但现实的宗教、财富和国家政权却依然如故，原封未动。黑格尔还把对象化和异化混为一谈。在他看来，自我创造、自我对象化的运动，即是自我外化和异化的运动。这样一来，扬弃异化就不是重新占有对象，反而扬弃了对象性。因为对象性本身被认为是异化的、不符合人的本质的东西。可是，被剥夺了对象的人是非现实的人，是唯灵论的存在物。而且，既然对象化就是异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8页。

那么异化也就成为不可克服的、永恒的东西。因为通过对自然界的改造而实现自我对象化和自我创造，是人类生活的永恒主题。

马克思揭露了《精神现象学》的唯心主义实质，同时也充分肯定了它所包含的合理因素，这种肯定是与他本人的异化劳动理论密切相关的。

首先，马克思明确指出，《精神现象学》的"最后成果"，是"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①，这是它的精华之所在。

第二，这种否定性辩证法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②。也就是说，人在能动地改造外部世界中，不断地把自己的本质对象化，从而形成了人与对象世界、主体和客体的对立；而这种对象化也就是失去对象和外化，只有扬弃这种外化，才能重新占有本质。这种对象化、外化和扬弃外化的过程，也就是人的自我创造和自我产生的过程。

第三，更重要的是，黑格尔已经把人的本质理解为有意识的劳动。"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③。就是说，他以抽象的和思辨的形式说明，真正的因而是现实的人的自我生成，是一个通过自己的劳动自我对象化和自我创造的历史过程，并且由于黑格尔把对象化和异化等同，因而在实际上也隐含着这样一种思想，即在人类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劳动的对象化同时成为劳动的异化；只有通过这种异化的扬弃，真正的人的社会或社会的人才能生成。就是说，只有通过异化和异化的扬弃这种中介运动，即否定的否定运动，"积极地从自身开始的积极的人道主义才能产生"④。

当然，作为一个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并没有也不可能真

①②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5页。

正了解劳动对于整个社会历史的意义。他虽然吸取了古典经济学家特别是斯密学说中关于劳动对象化及其创造作用的思想,“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但是,第一,他同古典经济学家一样,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而看不到劳动的消极的方面。古典经济学家承认劳动创造价值,而看不到劳动给劳动者带来的苦难,把劳动和劳动者分开。黑格尔也是这样。他也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只看到劳动是人赖以确证自己本质的方面,而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非人化的异化状况的一面,只是从对象化意义上理解劳动,而不是从异化的意义上来理解劳动(雇佣劳动)。因而他对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就不是采取批判的态度,而是采取肯定的态度。第二,他并不真正懂得物质生产活动的作用,按照马克思的说法;“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① 因为在黑格尔哲学中,整个自然界和社会都不过是绝对观念的异化,因而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实际上是自我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异在”的关系,因而并不需要一种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活动作为联系主体和客体的中介,劳动这个范畴不过是绝对观念运动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所以马克思说:“黑格尔把一般说来构成哲学的本质的那个东西,即知道自身的人的外化或者思考自身的、外化的科学看成劳动的本质”②。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异化劳动理论出发,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批判和改造。他对自己正在探索中的世界观同唯心主义的区别是明确的;但还没有自觉地意识到同费尔巴哈的根本分歧。虽然这时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在许多方面已超过费尔巴哈,在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态度上也与费尔巴哈有明显的区别,但仍对费尔巴哈的作用作了过高的评价。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164页。

简短的结论

法文版《资本论》第1卷的扉页上，登载着一幅古罗马万神殿的图案，它以无声的语言在启迪读者——《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万神殿”。如果我们把《资本论》看作是马克思理论探索之大成，那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它的伊始和雏形。在这部天才思想闪烁的著作中，马克思通过对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的解剖，形成了在科学世界观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异化劳动理论，找到了生产劳动这把理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钥匙，这就使他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开始了对科学世界观各个方面的初步探索，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

马克思以异化劳动理论为基础，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异化劳动的解剖，实际上开始接触到了社会历史的本质、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和动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斗争的理论等许多唯物史观的重要问题，使之对“历史之谜”的探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马克思以异化劳动理论为基础，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异化劳动的研究，提出了关于消灭私有和扬弃异化是共产主义实现的必要前提，关于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关于工人阶级的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等思想，使之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的探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马克思以异化劳动理论为基础，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异化劳动的研究，探讨了实践的内容和特征，提出了关于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关于认识主体和客体的本质及其相互关系，关于人的感觉器官、感觉和思维的形成、发展和作用等原理，使之对“认识之谜”的探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马克思以异化劳动理论为基础，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异化劳动的研究，找到了批判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关键所

在——生产劳动。由此出发，马克思既揭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实质，又肯定了它的合理成分，并加以唯物主义改造，从而开始了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总体改造。

由上可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它还不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首先，虽然就其实际思想内容来说，在许多方面已经超出费尔巴哈而接近于科学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但是作为说明历史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却没有完全摆脱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的旧模式。在这里，作为出发点的人的本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仍然带有抽象的、理想化的性质，而现实的劳动被归结为异化劳动，是人的本质的丧失，共产主义则是对异化的积极的扬弃，是人的本质的复归。这与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说明历史的唯物史观，显然还存在重大差别。第二，就其与旧哲学的关系来说，马克思对自己正在探索中的世界观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区别是明确的；对费尔巴哈也有所批评和保留，但还没有意识到同费尔巴哈哲学的根本分歧，以致认为，费尔巴哈的发现为自己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打下真正的基础”①，“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②。所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既是马克思对科学世界观的富有成果的探索，又不是这种探索的完成，片面夸大它的意义，以致把它看作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顶峰”，显然也是错误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50页。

第五章　向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接近

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哲学初期，都曾同青年黑格尔派有过密切的联系，但是，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上、政治上日益沿着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方向发展，而以布·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则在“1842年的激进主义”立场上蜕化、堕落，走向极端主观唯心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因此，批判和清算青年黑格尔派的错误思想，就不仅是现实斗争的需要，而且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科学世界观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早在1841年写作的《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就已与青年黑格尔派在思维与存在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柏林“自由人”集团脱离现实和沉醉于抽象的哲学争论的错误倾向，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指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述和发挥，要求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①，并与他们断绝了私人交往。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第一次公开批判了鲍威尔的错误。

为了与马克思和卢格所办的《德法年鉴》相对抗，鲍威尔兄弟、法赫尔、莱格尼茨和施里加等青年黑格尔派分子，于1843年12月在柏林附近的沙格顿堡办起了《文学总汇报》(德文月刊)，发表文章，攻击马克思背叛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基本原则，公开反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观点。这使马克思认识到，曾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6页。

度对他思想发展起过促进作用的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已完全走向了反面。所以，只有彻底清算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错误，才能为革命思想的发展和传播扫清道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言中，马克思表示了准备对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进行总清算的意愿。

与此同时，恩格斯在英国工业中心曼彻斯特通过对无产阶级状况的深入调查，认识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从而在对科学世界观的探索过程中，沿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取得了与马克思大体相同的思想成果。

1844年8月，恩格斯在返回德国途中，在巴黎再次拜访了马克思。这次历史性的会见，开始了两位革命导师终生合作的伟大友谊。他们通过交谈，互相了解到在一切理论观点上的一致，并深感对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开展批判的迫切性，于是决定写一部著作对它进行批判，这就是著名的《神圣家族》一书。恩格斯后来回忆说："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①

在恩格斯逗留巴黎的10天中，他们共同拟定了全书的大纲，并合写了序言；恩格斯还完成了他所承担的部分。马克思则承担了该书的主要部分的写作任务。他在写作过程中，充分利用了他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成果和对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的心得，并作了重要的发展和发挥，因而使篇幅大大突破了原定计划，直到1844年11月底才写完。

马克思恩格斯最初把这部著作命名为《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以体现其论战性。在出版排印过程中，马克思又采纳了出版人列文塔尔博士的建议，冠之以富于讽喻意味的书名——《神圣家族》，而原名则改为副标题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2页。

1845年2月,《神圣家族》在法兰克福出版。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青年黑格尔派种种谬论的清算 深化了他们在《德法年鉴》时期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制定了正在形成中的科学世界观的一系列重要原则,进一步接近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体系。《神圣家族》发表之后不久,马克思又回到了政治经济学领域,写出了《评弗里德里希 李斯特的著作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恩格斯则完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写作。在这两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不同的途径,接近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的思想。恩格斯还从经济上进一步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从而使他们对科学世界观的探索进入了由量变到质变的前夜。

第一节 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唯心主义,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唯物主义解决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对以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为代表的思辨唯心主义的彻底批判,首先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展开的。

一、对“批判哲学”的批判,论述思维和现实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在“序言”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的要害在于从根本上颠倒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他们说:“在德国,对真正的人道主义说来,没有比唯灵论即思辨唯心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了。它用 ‘自我意识’即 ‘精神’代替现实的个体的人,并且同福音传播者一道教诲说: ‘精神创造众生,肉体则软弱无能。’显而易见,这种超脱肉体的精神只是在自己的想象中才具有精神力量。鲍威尔的批判中为我们所驳斥的东西,正是以漫画的形式再现出来的思辨。我们认为这种思辨是基督教德意志原则的最完备的表现,这种原则的最终目的就是要通过变 ‘批判’本

身为某种超经验的力量的办法使自己得以确立。”①

众所周知，自我意识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在黑格尔哲学中，是指人的意识对意识活动本身的认识。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把自我意识看作是人的意识发展的一个阶段。他认为，人的意识首先必须以他物为认识对象，这是狭义的“意识”的阶段，还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只有从认识他物进到“意识自身”，才可能认识事物的本质，这就是自我意识的阶段。如同“实体”、“意识”等其它哲学范畴一样，对自我意识既可以作唯物主义的理解，也可以作唯心主义的理解。唯物主义认为，自我意识在实质上就是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对周围世界及其自身的反映和认识，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反映的一个重要特点。恩格斯说：“从最初的动物中，主要由于进一步的分化而发展出无数的纲、目、科、属、种的动物，最后发展出神经系统获得最充分发展的那种形态，即脊椎动物的形态，而最后在这些脊椎动物中，又发展出这样一种脊椎动物，在它身上自然界达到了自我意识，这就是人。”② 列宁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功绩就在于使工人阶级认识到资本主义的本质以及自己的历史使命，“他们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③。然而，鲍威尔却把自我意识看作人的本质，并使之成为完全脱离现实的人的独立主体，即变成了世界本原、“神化了的绝对”。所以，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是一种思辨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

在鲍威尔看来，这种自我意识和物质实体是绝对对立的，自我意识也只有在不断地克服物质实体的过程中，使自己得到发展，而这种克服实质就是批判。所以，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就是批判哲学。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批判是他（鲍威尔）手中的武器，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6页。

③ 《列宁选集》第1卷，第87页。

他用这个武器把在无限的自我意识之外还以有限的物质存在自居的一切，都变成单纯的假象和纯粹的思想。"①

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唯心主义的直接理论来源，是黑格尔哲学。马克思指出："施特劳斯和鲍威尔关于实体和自我意识的争论，是在黑格尔的思辨范围之内的争论。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② 施特劳斯和鲍威尔围绕基督教的起源所发生的关于"实体"和"自我意识"的争论，其实都未超出黑格尔的思辨范围，而只是各自抓住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一个因素，使之片面化和绝对化。正如马克思在谈到这场争论时所指出的，施特劳斯以斯宾诺莎主义为出发点，鲍威尔以费希特主义为出发点，他们两人都各自使黑格尔体系中的一个因素获得了片面的、彻底的发展，但同时他们两人都继续停留在黑格尔思辨范围内，他们之中无论哪一个都只是代表了黑格尔体系的一个方面。

这也就是说，施特劳斯在同鲍威尔的争论中，仅仅抓住了黑格尔体系中的"实体"，即通过向自然界的外化而摆脱了赤裸裸的抽象逻辑形式的绝对精神，把"实体"和"自我意识"绝对对立起来，割裂了黑格尔所主张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使精神完全变成了体现为自然界的脱离人的精神。而鲍威尔则相反，他仅仅抓住了黑格尔体系中的"自我意识"，并把它同"实体"绝对对立起来，割裂了黑格尔所主张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使精神活动完全脱离了具体的现实，从而用"无限的自我意识"取代了黑格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8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76页。

尔的绝对精神，走向主观唯心主义立场。可见，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从根本上颠倒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否认客观物质世界的存在，认为“自我意识即精神就是一切。在它之外没有任何东西”①。

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批判。他们说：“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同时也巧妙地拟定了对黑格尔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本要点。”② 这说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对马克思恩格斯批判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唯物主义地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是，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索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社会历史是完全脱离的。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要深化对“批判哲学”的批判，就必须既借助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又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使其向上发展，把被唯心主义颠倒了的在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颠倒”过来，作出唯物主义的解决，从而彻底唯物地解决哲学基本问题，修盖好唯物主义这所大厦的上层。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由于费尔巴哈揭露了宗教世界是世俗世界的幻想……，在德国理论面前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个费尔巴哈所没有回答的问题：人们是怎样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这个问题甚至为德国理论家开辟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③。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回答费尔巴哈所没有回答的问题过程中，研究了国家和法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探讨了宗教的世俗基础，实现了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7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7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61页。

开始对科学世界观的探索。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开始，经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最后到标志唯物史观形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就是这一过程的展开。而在这一过程中，《神圣家族》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在对"批判哲学"的批判过程中，进一步发展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生产劳动在历史上起支配作用的观点，强调了现实的粗糙的物质生产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通过对人的"实物"本质的分析，提出了接近于生产关系的社会关系的思想，并由此说明政治、文学、宗教和哲学等等，向科学地回答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关系问题迈进了一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认为《神圣家族》"奠定了革命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基础"①。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鲍威尔一伙是如何颠倒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时，能够深刻地指出：这种主观唯心主义实质上就是不承认任何有别于思维的存在，任何有别于精神的自发性的自然力，任何有别于主体的客体，任何有别于理论的实践，任何有别于抽象的普遍性的现实的共同性，等等。但是，"世界的感性的现实是不顾他（鲍威尔）这种想象的。他的每一种感觉都迫使他相信世界和他以外的其他人的存在，甚至他那世俗的胃也每天都提醒他在他以外的世界并不是空虚的，而真正是把他灌饱的东西。"② 至于工人群众，更不会认为"用'纯粹的思维'即单靠一些议论就可以摆脱自己的主人和自己实际上所处的屈辱地位。他们非常痛苦地感觉到存在和思维、意识和生活之间的差别"③。

二、揭露思辨哲学的秘密，阐明个别与一般的辩证关系

为了彻底清算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揭露了它的理论来源，而且还进一步剖析了它的认识论根源。

---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90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4、66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鲍威尔的哲学是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支脉，而这种哲学的“秘密”就在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在这部著作中，黑格尔用自我意识来代替现实的人，把最纷繁复杂的人类现实看作只是自我意识的特定的形式，只是自我意识的规定性。而且，由于这些规定是“纯粹的范畴”，是赤裸裸的“思想”，因而可以把人类自我意识的各种异化形式所具有的物质的、感性的、实物的基础置之不顾，而只在“纯”思维中来加以扬弃和克服。这样，黑格尔的否定性辩证法也就成为最保守的哲学。“因此，‘现象学’最后完全合乎逻辑地用‘绝对知识’来代替全部人类现实，——之所以用知识来代替，是因为知识是自我意识的唯一存在方式，而自我意识则被看做人的唯一存在方式；之所以用绝对知识来代替，是因为自我意识只知道它自己，并且不再受任何实物世界的拘束。”① 简言之，就是把“绝对知识”作为一个万能的概念来取代人类的全部现实，把世界头足倒置起来。而鲍威尔等人只不过是将其改名为“批判”来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

那末，黑格尔是如何建立起这种“把世界头足倒置”的哲学的呢？其认识论根源何在呢？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果实”这一概念为例，通过具体剖析，揭露了思辨哲学结构的秘密，指明了它在认识论上的根源就在于颠倒个别与一般的关系，论述了个别与一般的辩证法，从而在更深的层次上批判了鲍威尔一伙的“批判哲学”，加深了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唯物主义理解。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说明了人们的认识过程总是由认识个别的特殊的事物，逐步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例如，人们从认识现实的梨、苹果、扁桃等具体水果开始，逐渐从它们中抽象“果实”这个一般，因而个别的具体的水果是第一性的，是一般“果实”概念产生的基础；一般是第二性的，是个别的具体的事物本质的概括和反映，因而，一般“果实”这个概念虽然更深刻、更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44－245页。

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现实，更接近真理，但它只能来自个别，只能寓于个别之中。然而，思辨哲学歪曲、颠倒了个别与一般的关系，认为“果实”这个一般是先于个别具体的水果而存在，是其真正的本质，而个别的具体的现实的各种水果，反而是“果实”这个一般的存在形式和样态。然而，当思辨哲学把一般实体化，把具体的现实的个别虚幻化时，他们的一般也就变成了贫乏空洞的抽象概念，而不可能获得丰富的知识了。马克思恩格斯说：“用这种方法是得不到内容特别丰富的规定的。如果有一位矿物学家，他的全部学问仅限于说一切矿物实际上都是‘矿物’，那末，这位矿物学家不过是他自己想象中的矿物学家而已。这位思辨的矿物学家看到任何一种矿物都说，这是‘矿物’；而他的学问就是天下有多少种矿物就说多少遍‘矿物’这个词。”①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说明了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诸种事物的共同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认识为指导，继续研究尚未研究过的或尚未深入研究过的各种具体事物，找出其特殊本质，从而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认识。但是，思辨哲学却把这种认识绝对化，抽象地发展了“认识的能动方面”，从而把一般到个别的过程，歪曲为一般创造个别的过程。在它看来，“果实”这个一般概念并不是僵死的、无差别的、静止的，而是具有活生生的、自相区别的、能动的本质的，因而是具体果实的创造主体。这样一来，“果实”一般与具体果实之间的关系就变成了一般创造个别的关系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时，按照思辨哲学的观点，就不能根据我们从实体观念得出的看法再说梨是“果实”，苹果是“果实”，扁桃是“果实”；相反地应该说“果实”确定自己为苹果、梨、扁桃等等；苹果、梨、扁桃相互之间的差别，正是“果实”的自我差别，这些差别使各种特殊的果实正好成为“一般果实”生活过程中的千差万别的环节。这样，“果实”就不再是无内容、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72页。

差别的统一体，而是作为总和、作为各种果实的“总体”或统一体，这些果实构成一个“被有机地划分为各个环节的系列”。

由上可见，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秘密就在于首先从个别中抽象出一般，再颠倒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并使之实体化，最后，从一般观念中重新创造出个别的、具体的事物，从而颠倒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指出：“把实体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内部的过程，了解为绝对的人格。这种了解方式就是黑格尔方法的基本特征”②。黑格尔正是从绝对精神出发，运用这种方法，来构造整个世界和人类历史的，所以，黑格尔哲学只能是精神生出自然界、儿子生出母亲的头足倒置的唯心主义哲学。

列宁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摘要》中曾说过：“原始的唯心主义认为：一般（概念、观念）是单个的存在物。这看来是野蛮的、骇人听闻的（确切些说：幼稚的）、荒谬的。可是现代的唯心主义，康德、黑格尔以及神的观念难道不正是这样的（完全是这样的）吗？”③列宁还指出：“从粗陋的、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不过是胡说。相反地，“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个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④“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⑤这就是说，唯心主义虽然荒谬，但并不都是简单的胡说。人类的认识是一个无限复杂的、辩证的过程。如果把这个过程的某一部分、某一方面片面夸大而使之成为脱离物质、脱离自然和神化了的绝对，就会陷入唯心主义。正因为如此，哲学唯心主义也往往包含有一定的合理性。黑格尔哲学就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在揭露了黑格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7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75页。

③④⑤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20－421、421、412页。

尔哲学思辨结构的秘密之后，紧接着指出："黑格尔常常在思辨的叙述中作出把握住事物本身的、真实的叙述。这种思辨发展之中的现实的发展会使读者把思辨的发展当作现实的发展，而把现实的发展当作思辨的发展。"①

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秘密，实际上也就揭露了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思辨唯心主义的秘密。所不同的是，当鲍威尔用"自我意识"来取代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时，他并不能象黑格尔那样，在"思辨的叙述中作出把握事物本身的、真实的叙述"，而是使之进一步片面化、庸俗化和漫画化。

总之，通过对思辨哲学结构秘密的揭示，使马克思恩格斯从哲学基本问题的高度认识到思辨哲学从一般构造具体事物，同上帝创造万物在本质上是同一的；然而甚至它从一般概念构造个别具体事物时，在实际上也不能不以具体事物为依据。这些情况表明，《神圣家族》已经接近于科学解决哲学基本问题，为科学世界观的诞生奠定了唯物主义的基础。

三、对 17- 18 世纪唯物主义发展史的考察

马克思在他的青少年时代，就受到了 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思想影响。从他在中学毕业时所写作的《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就可以看到 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关于人的使命是寻求普遍幸福的这种信念以及关于人依赖于周围环境等观点的痕迹。1843 年 9 月，马克思来到巴黎这所"古老的哲学大学"和"新世界的首府"之后，又认真地研读了许多 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著作。按照梅林的说法，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是照耀着年轻马克思在巴黎研究工作的两颗明星。列宁在谈到马克思恩格斯同 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关系时，也认为他们坚决捍卫了 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传统。当然，他们没有停止在 18 世纪的法国唯物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76 页。

义上，而是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优秀成果，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丰富和发展了唯物主义哲学。

所以，如何科学地评价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问题。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针对鲍威尔一伙对唯物主义的攻击以及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歪曲，从哲学基本问题的高度，考察了17－18世纪唯物主义发展史，开始建立唯物主义的哲学史观。

应当说，鲍威尔在哲学史方面是有所研究的，他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对宗教的批判有相当的理解。例如，鲍威尔曾接受霍尔巴赫的观点，认为神学把实际上是自然的力量说成是上帝的万能，并宣布坚决同这种“宗教利己主义”断绝关系。但是，由于他的唯心主义偏见，限制了他的视野，决定了他不可能对哲学发展史作出科学的评价。

首先，在理论来源上，鲍威尔错误地把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自然神论都看作是从斯宾诺莎的学说中产生的。他说：“18世纪，斯宾诺莎主义不仅在他那以物质为实体的法国后嗣学说中占统治地位，而且也在予物质以精神名称的自然神论中占统治地位……法国的斯宾诺莎学派和自然神论的信徒只不过是在斯宾诺莎体系的真谛这个问题上互相争辩的两个流派”①。

其次，在发展趋势上，由于鲍威尔用自我意识是自因的原则取代了斯宾诺莎实体是自因的原则，认为实体是精神的自我异化，并且必然要导向自我意识。因此，他认为自我意识哲学是唯物主义的真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注定要灭亡。他宣称：“法国唯物主义者的确曾把自我意识的运动看作普遍本质即物质运动，但是他们还未能看出，宇宙的运动只有作为自我意识的运动，才能真正成为自为的运动，从而达到与本身的统一。”②

---

①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8－159页。

②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78页。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鲍威尔关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观点，从根本上来讲，是在唯心主义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前提下，抹煞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根本对立，把绝对的、即至高无上、无拘无束的唯心主义当作唯物主义的真理。而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则是在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中产生、发展的。他们写道："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法国唯物主义，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是反对现存宗教和神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反对一切形而上学，特别是反对笛卡尔、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的公开而鲜明的斗争。"①

马克思恩格斯还从哲学上两个基本派别斗争的角度，说明了近代欧洲哲学的历史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他们说，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所击败的17世纪的形而上学，在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中曾有过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而按照哲学自身发展的逻辑，必然是新的唯物主义起来反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思辨哲学。费尔巴哈哲学就是这种唯物主义，因它以清醒的哲学来对抗醉醺醺的思辨。

针对鲍威尔把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理论来源归结为斯宾诺莎哲学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培根、洛克、霍布斯、斯宾诺莎、笛卡尔、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等人的哲学思想的研究，具体地考察了从17到18世纪唯物主义的发展史，揭示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理论来源，说明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有两个派别：一派是源于笛卡尔，一派起源于洛克。后一派主要是法国有教养的分子，它直接导向社会主义。前一派是机械唯物主义，它成为真正的法国自然科学的财产。这两个派别在发展过程中是相互交错的。"②

---

① 《马列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0页。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分析17－18世纪唯物主义发展史时，还注意揭示哲学思想发展的社会根源，注意自然科学发展与哲学发展的联系。在他们看来，17世纪的形而上学之所以会被18世纪唯物主义战胜，其根本原因是由当时法国生活实践促成的，他们说："17世纪的形而上学的衰败可以说是由18世纪唯物主义理论的影响造成的，这正如同这种理论运动本身是由当时法国生活的实践性质所促成的一样。这种生活趋向于直接的现实，趋向于尘世的享乐和尘世的利益，趋向于尘世的世界。和它那反神学、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实践相适应的，必然是反神学、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理论。"①

马克思恩格斯还依据17－18世纪唯物主义发展的史实，说明了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十分密切，当哲学的发展与自然科学紧密相联时，哲学就有积极的内容，反之，则走向反面。所以，17世纪形而上学之所以会被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战胜，从其自身的原因来讲，是由其与自然科学发展相脱节所促成的。他们说："17世纪的形而上学（想想笛卡尔、莱布尼茨等人）还是有积极的、世俗的内容的。它在数学、物理学以及与它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精密科学方面都有所发现。但是在18世纪初这种表面现象就已经消失了。实证科学脱离了形而上学，给自己划定了单独的活动范围。现在，正当实在的本质和尘世的事物开始把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形而上学的全部财富只剩下想象的本质和神灵的事物了。形而上学变得枯燥乏味了。"②

更为可贵的是，马克思恩格斯针对鲍威尔关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注定要被唯心主义取代而导致灭亡的错误观点，揭示了它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必然联系，说明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他们指出："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

---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1－162页。

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① 因为，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么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人能认识到自己是人；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么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既然从唯物主义意义上说人类是不自由的，就是说，既然人不是由于有逃避某种事物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得到自由，那么就不应当惩罚个别人的犯罪行为，而应当消灭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根源，并使每个人都有必要的社会活动场所来显露他的重要生命力；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么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生物，那么他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而对于他的天性力量的判断，也不应当以单个人的力量为准绳。

可见，法国唯物主义中关于人性、智力和教育等方面的思想，尤其是环境塑造人的思想，给社会主义者以极大的启示。所以，从唯物主义理论出发，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恩格斯举例说，对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倾向具有代表性的，是洛克的英国的早期学生之一的孟德维尔对恶习的辩护；傅立叶是直接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学说出发的；巴贝夫主义者是粗鲁的、不文明的唯物主义者；边沁根据爱尔维修的道德学说建立了他的利益的体系；而欧文则从边沁的体系出发论证英国的共产主义；卡贝亡命英国，受到了当地共产主义思潮的影响和鼓舞，当他回到法国时，已经成了一个最有声望然而也是最肤浅的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法国共产主义者德萨米、盖伊等人，像欧文一样，也把唯物主义理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6页。

当做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指出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之间的必然联系，而且还指出："成熟的共产主义也是直接起源于法国唯物主义的"①。这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现代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②因此，从源头上说，我们还可以看到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某种联系，尽管这种联系是以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学说为中介的。

综上所述，《神圣家族》在批判青年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的过程中，已经唯物主义地论述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阐明了个别与一般的辩证法，开始建立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史观，从而为唯物主义地彻底解决哲学基本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也应看到，马克思恩格斯这时虽然已唯物主义地论述了哲学基本问题，然而，由于他们这时还未彻底解决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也还没有把个别与一般的辩证法置于真正科学的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在对17－18世纪唯物主义历史的叙述中只重视经验论一派，并把斯宾诺莎的唯物主义直接视为思辨的形而上学，因而还没有能够把自己的唯物主义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最终明确区别开来，只是接近于用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解决哲学基本问题，而不是最终科学地解决。

第二节　唯物史观基本原则的初步阐述

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在社会历史领域必然表现为唯心史观。鲍威尔一伙的表现尤为露骨。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4页。

鲍威尔等人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的批判，发展了他们在新世界探索过程中取得的理论成果，论述了正在形成过程中的唯物史观的一系列重要原理。恩格斯后来在回顾唯物史观形成的过程时说："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因此，任务在于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但是，这个任务费尔巴哈是完成不了的。"① 当然，"费尔巴哈所没有走的一步，终究是有人要走的。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须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②

一、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

社会历史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什么？是精神、观念，还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这是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一个根本分歧。鲍威尔一伙从主观唯心主义出发，认为自我意识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历史除了自我意识的发展、变化以外，没有任何意义。在他们看来，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自我意识的确证，人为了历史而存在，而历史则为了证明真理而存在，也即为了证明自我意识而存在。总之，世界历史归根到底就是自我意识发展的历史。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驳斥鲍威尔一伙的观点时，首先指出，历史是人的活动的历史，离开现实存在的人和人的活动，也就无所谓历史。鲍威尔认为人为历史而存在，也就是把历史看成"脱离物质群众的主体"③。针对这种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反驳说："历史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2页。

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①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用'人'本身来代替包括'无限的自我意识'在内的破烂货”② 这一工作，费尔巴哈也已经做了。但是由于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理性、意志、感情，因而他对历史的了解还是抽象的、贫乏的，而且也未走出历史唯心主义的巢臼。和费尔巴哈不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把生产劳动看作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并认识到自然科学和工业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指出，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提出了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对社会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思想，认为只有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才能正确地了解历史。他们在批驳鲍威尔一伙贬斥把历史与自然科学及工业结合起来研究是“群众的唯物主义”的谬论时写道：“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他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它就能达到即使是才开始的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吗？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去认识（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诚然，唯灵论的、神学的批判的批判仅仅知道（至少它在自己的想象中知道）历史上的政治、文学和神学方面的重大事件。正像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页。

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① 这段论述不仅是对鲍威尔一伙的深刻批判，而且也表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思想的重大进展：他们已不再像《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那样，把现实的劳动、工业看作是人的本质的丧失，而是直截了当地把“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看作“历史的发源地”。还应指出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强调生产实践重要性时，是以承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为前提的。他们说：“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② 就是说，生产实践只是改变了物质存在的形态，而没有创造物质本身。

从上述立论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批判了鲍威尔等人把“精神”、观念变成超验的存在物，而“物质”“群众”不过是“纯粹的无”③ 的谬论，论证了精神、观念包括像宗教、哲学这类远离物质生活的社会意识形式，也仍然植根于物质的经济事实之中。他们在分析宗教产生的根源时指出，鲍威尔等人把宗教意识当作某种独立的本质，而不了解宗教的世俗基础，所以，他们只能用犹太教去解释现实的犹太人而不是相反。但在实际上，犹太精神是依赖历史，通过历史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而且这种发展不是神学家的眼睛，也不是在宗教学说中所能看到的，而只有世俗人的眼睛，只有在工业商业实践中才能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指出：“现实的世俗的犹太精神，因而宗教的犹太精神，是由现今的市民生活所不断地产生出来的，并且在货币制度中获得了高度的发展。”④ “现代犹太人的生活不能以他们的宗教……来解释；相反地，犹太教的生命力只能用虚幻地反映在犹太教中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19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58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119－120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140 页。

的市民社会的实际基础来解释。”①因此，“克服犹太本质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消灭市民社会中犹太精神的任务，消灭现代生活实践中的非人性的任务，这种非人性的最高表现就是货币制度。”② 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说明了犹太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其产生、发展和消灭，是由其基础社会生活（社会存在）所决定的。正因为如此，列宁在读到《神圣家族》这些论述时，认为“马克思在这里尖锐而明确地强调指出了自己的全部世界观的基本原则（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则－－引者注）。”③

马克思恩格斯在驳斥青年黑格尔派关于哲学不依赖于社会生活的唯心主义观点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们说：“正因为哲学（唯心主义哲学——引者注）过去只是事物现状的超验的、抽象的表现，正由于它自己的这种超验性和抽象性，由于它在想象中独立于世界之外，所以它一定要幻想它高高地超越于事物的现状和现实的人之上；另一方面，因为哲学过去并没有真正独立于世界之外，所以它也就未能对世界做出任何真正的判决，未能对世界使用任何真正的鉴别力，也就是说，未能实际地干预事物的进程，而至多只是不得不满足 in abstracto ［抽象形式的］实践。”①

鲍威尔在《犹太人问题的最新论文》中认为：“犹太人现在在理论领域内有什么程度的进展，他们就真正获得什么程度的解放；他们有什么程度的自由愿望，他们就获得什么程度的自由。”⑤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事实恰恰相反，理论必须以社会生活为基础，而社会的解放从来就没有什么纯社会意识的解放。他们说：“世俗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原理就否认纯理论领域内的解放，认为这是幻想，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14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140－141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22 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49 页。

⑤ 转引自《马列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120 页。

为了真正的自由它除了要求唯心的"意志"外，还要求完全能感触得到的物质的条件。'群众'认为，甚至为了争得一些只是用来从事"理论"研究的时间和经费，也必须进行物质的、实际的变革"①。

在此基础之上，马克思恩格斯还作出以下的重要论断："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② 这说明，思想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而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因此，它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超出反映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而不能直接改变旧世界秩序本身；它只有同使用实践力量的人结合起来，才能达到改变旧世界秩序的目的。这个论断显然深化了《德法年鉴》时期的有关思想。

二、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概念的接近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历史领域的基本矛盾。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科学概念的制定，对于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说，生产力的概念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的政治经济学中就已存在，那么生产关系的概念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特有的；而且也只有生产关系概念的形成，才能赋予生产力概念以新的科学内容。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生产关系科学概念的制定，是经历了长期的探索过程的。《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在研究社会生活现象时，曾使用过社会的"客观关系"的术语，不过，这时他对"客观关系"的理解是笼统的，并未从中区分出物质关系。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第一次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结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2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2页。

论，而所谓“市民社会”，按照马克思后来的说明，是指“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这比《莱茵报》时期的“客观关系”显然深入了一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研究，从人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这两个侧面，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矛盾，论述了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产品的占有以及生产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等问题，实际上已认识到经济关系在一切关系中的决定作用。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是用“市民社会”的术语来概括现实的社会关系的，但在内容上已有了新的进展。他们在评述蒲鲁东的“平等占有”的观念时，批驳了鲍威尔等人对蒲鲁东经济学说的曲解，并进一步从人对物质生产资料的依赖关系中得出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必然发生的相互关系。他们说：“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的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① 这就是说，“实物”（劳动产品）是人的生存所必需的，是人的社会存在，社会每个成员各以其特定的生产活动和具体产品构成他人的生存条件，从而构成了他和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人们的这种用各自的生产活动和劳动产品相互补充、相互满足需要的关系，就是真正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在当时的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论是私有制还是蒲鲁东的“平等占有”都把这种关系歪曲了，这是真正的人的社会关系异化的表现。这段话虽然仍旧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色彩，但是，从它把“实物”看作人们社会关系的基础这一点来说，则是马克思恩格斯形成自己“生产关系”概念的重要步骤，具有重大意义。列宁认为，“这一段话极富有代表性，因为它表明马克思是如何接近自己的整个‘体系’（如果可以用这个名词的话）的基本思想的，——即如何接近生产的社会关系这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2页。

个思想的。”①

在写完《神圣家族》之后不久，马克思再次回到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他在1845年3月写出的《评弗里德里希 李斯特的著作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进一步探讨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问题，并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早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英国古典政治学在研究财富的来源和性质的过程中，已提出了“生产力”这个概念。但是，在他们的这一理论中，却存在两个根本缺陷：(1) 只看到生产力中物的因素，着重强调自然条件，而无视人的作用；(2) 没有生产关系的概念，根本不理解生产过程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方面的统一，因而完全撇开社会关系孤立地考察生产力。

李斯特针对英国古典经济学把物质财富或交换价值作为研究的唯一对象的错误，强调指出财富是由生产力所生产的，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不知要重要到多少倍。他举例说，西班牙原来既富且强，但由于倍受专制和僧侣势力的折磨，虽然它的国内环境比较和平，可总不能摆脱贫困，而且越陷越深。照耀着西班牙人的还是同一个太阳，他们所据有的还是同样的土地，矿藏还是同样丰富，他们还是与美洲发现和宗教法庭成立以前同样的人民，但是这个国家逐渐丧失了它的生产力，因此日趋贫困。美国在独立战争中损失了无数资财，但是它在赢得了独立以后，生产力有了迅速提高，因而使它在和平以后短短几年中，就在财富上获得了空前规模的增长。所以，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只讨论研究物质财富或交换价值，不注意生产力，是一种狭隘的理论。

李斯特还认为，社会生产不仅是物质生产，而且还应包括精神生产。他说：“一国之中最重要的工作划分是精神工作与物质工作之间的划分。两方是相互依存的。精神的生产者的任务在于促进道德、宗教、文化和知识，在于扩大自由权，提高政治制度的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3页。

完善程度，在于对内巩固人身和财产安全，对外巩固国家的独立主权；他们在这方面的成就越大，则物质财富的产量越大。反过来也是一样的，物质生产者的物资越多，精神生产就越加能够获得推进。”① 由此出发，他认为，不仅那些养猪的、制琴的、制药工是生产者，而且教育家、音乐家、医生、科学家、法官和行政官也是生产者，都是生产力，而且是比物质生产力更重要的生产力。“一国的最大部分消耗，是应该用于后一代的教育，应该用于国家未来生产力的促进和培养的。”②

由上可见，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是包含有一定合理成分的。但是，他在反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只注重研究物质财富或交换价值而不重视生产力的错误倾向时，却又表现出对价值理论不应有的轻视；在研究生产力时，错误地把宗教、政权、司法等都包括在生产力之内，并使之神秘化，进而在肯定生产力在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的同时，认为精神也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马克思在吸取李斯特的合理思想的同时，也批判了他把生产力神秘化的错误。他说：“为了破除美化‘生产力’的神秘灵光，只要翻一下任何一本统计材料也就够了。那里谈到水力、蒸汽力、人力、马力。所有这些都是‘生产力’。”③ 这就是说，生产力并不神秘，实质上它是人们在劳动过程中用以改造自然界的人力和物力，是现实的物质力量。

马克思还认为，只有把生产力与一定的社会条件联系起来，才能更深刻地认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他在论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时指出：“工业用符咒招引出来（唤起）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对工业的关系，同无产阶级对工业的关系完全一样。今天，这些力量仍然是资产者的奴隶，资产者无非把它们看作是实现他的自

---

①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 140 页。

②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 123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261 页。

私的（肮脏的）利润欲的工具（承担者）；明天，它们将砸碎自身的锁链，表明自己是会把资产者连同只有肮脏外壳（资产者把这个外壳看成是工业的本质）的工业一起炸毁的人类发展的承担者，这时人类的核心也就赢得了足够的力量来炸毁这个外壳并以它自己的形式表现出来。明天，这些力量将炸毁资产者用以把它们同人分开并因此把它们从一种真正的社会联系变为（歪曲为）社会桎梏的那种锁链。"① 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已触及到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和性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并用以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冲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新的生产力必然要为未来的新的社会制度提供物质基础，以及生产力和创造未来新社会制度的无产阶级之间的联系。马克思还深刻地指出：如果把生产力从现实社会中抽象出来加以考察，那就可以发现它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力量。他说："如果这样看待工业，那就撇开了当前工业从事活动的，工业作为工业所处的环境；那就不是处身于工业时代之中，而是在它之上；那就不是按照工业目前对人来说是什么，而是按照现在的人对人类历史来说是什么，即历史地说他是什么来看待工业；所认识的就不是工业本身。不是它现在的存在，倒不如说是工业意识不到的并违反工业的意志而存在于工业中的力量，这种力量消灭工业并为人的生存奠定基础。"②

以上说明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马克思通过对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的合理思想的批判吸取，考察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制度）之间的矛盾关系，已接近了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的规律。在此基础之上，通过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终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制定了生产关系的科学概念，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58－25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57页。

系统地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过程，说明了这一矛盾是社会各种矛盾中最基本的矛盾，是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

三、对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的进一步探讨

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得出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的结论和对生产关系概念的日益接近，他们对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了。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已得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重要结论，但无论对市民社会还是国家本身都还没有作出进一步的具体说明。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他用政治异化的理论解释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认为正像人在宗教领域中过着与人间相对立的上天生活一样，公民在政治国家中也过着与市民社会相对立的类生活。但是和人的上天生活一样，他也只是以虚幻的方式，在想象中过着这种生活，因为政治国家也和上帝一样，作为一种抽象物，并没有把人的社会本质作为自己的具体内容。马克思还认为，"完备的政治国家，按其本质来说，是和人的物质生活相反的一种类生活。物质生活这种自私生活的一切前提正是作为市民社会的特性继续存在于国家的范围以外，存在于市民社会。"① 就是说，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是相分离、对立的。在《神圣家族》中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强调的已不再是这种分离和对立，而是强调它们的统一和一致。他们指出，作为现代国家的基础是资产阶级社会，而"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的代表是资产阶级。"② 他们把国家"看做自己的排他的权力的官方表现，看做自己的特殊利益的政治上的确认"③。这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已开始触及国家的阶级李质。鲍威尔认为，市民社会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8页。

成员是利己主义的原子，应当由“普遍国家秩序”把这些孤立的原子联合起来以组成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驳斥说，把市民社会成员连接起来的不是国家，而是利益；各社会成员之间的现实联系不是政治生活，而是市民生活。“在今天，只有政治上的迷信才会以为国家应当巩固市民生活，而事实上却相反，正是市民生活巩固国家。”①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强调市民社会对国家的决定作用，而且也看到了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反作用。他们指出，封建的特权和中世纪的宗教严重地阻碍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面对这种情况，从市民社会中产生出来并与封建制度相对立的资产阶级国家，并不是消极无为的，它通过宣布“普遍人权”承认自己的出生权，并通过采取各种措施来废除封建特权以保护自己的物质基础和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种措施越彻底，市民社会的自发生命越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去运动，资本主义经济就越发展，国家的基础也就越巩固和壮大。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批判地考察了资产阶级所鼓吹的“自由的人性”和“天赋人权”的实质。指出，承认“自由的人性”，实际上就是承认利己的市民个人，承认构成这种个人的生活内容，即构成资产阶级社会内容的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的不可抑制的运动。“市民社会的奴隶制恰恰在表面上看来是最大的自由，因为它似乎是独立个人的完备形式”，而实际上它是“个人的完备的奴隶制和人性的直接对立物”②。马克思和恩格斯引用黑格尔的话说，“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历史地产生的”③，现代国家承认人权同古代国家承认奴隶制是一个意思。事实说明，“人权并没有使人摆脱宗教，而只是使人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人权并没有使人摆脱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4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46页。

财产，而只是使人有占有财产的自由；人权并没有使人放弃追求财富的龌龊行为，而只是使人有经营的自由。”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正如古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奴隶制一样，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它通过宣布普遍人权来承认和巩固自己的自然基础，但并没有创立这个基础。

以上思想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正在向着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原理接近。

第三节　批判“英雄”和“群众”的对立，阐明历史的活动是群众的事业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用劳动把自然和社会联结起来，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在这个论断中，已逻辑地蕴涵着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由于马克思这时把劳动理解为“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把现实的劳动看作为异化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的丧失，因而他没有、也不可能把这个思想揭示出来。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得出了现实的物质生产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观点，因而他们就在批判鲍威尔一伙的英雄史观的同时，深刻地阐明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

一、“批判哲学”关于“英雄”和“群众”对立的观点是黑格尔历史观的拙劣翻版

鲍威尔一伙把世界的发展归结为“自我意识”和“实体”的对立，在历史观上突出地表现为制造“精神”和“群众”的对立。他们把“英雄”等同于“精神”，把“群众”等同于“粗糙的物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145 页。

质”，进而认为全部历史就是“英雄”反对“群众”的历史。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概括的：“它把‘群众’和‘精神’之间的斗争‘规定’为过去全部历史的‘目的’；它宣称‘群众’是‘卑贱’的‘纯粹的无’，直截了当地把群众称为‘物质’，并把‘精神’当做真理性的东西和‘物质’对立起来。”① 不仅如此，鲍威尔等人还把“精神和群众的对立跟‘批判’和群众的对立等同起来”②，认为只有他们这伙具有全能的自我意识的、批判地思维的哲学家，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人民群众则是“精神空虚”、“毫无生气”的“历史发展的障碍”。他们甚至公然宣称：“精神的真正敌人应该到群众中去寻找，而不是像以前的自由主义的群众捍卫者所想象的那样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寻找。”③

针对鲍威尔一伙的英雄史观，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指出它不过是黑格尔的历史观的拙劣翻版和漫画式的完成。

黑格尔作为客观唯心主义者，把“历史的绝对精神”看作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基础，把群众看作是绝对精神创造历史的的材料，是绝对精神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承担者，而哲学家只不过是在创造历史的绝对精神的运动完成之后用来回顾既往以求意识到自身的一种工具。这就是说，真正的运动已由绝对精神无意识地完成了，所以哲学家只是在事后才登上场的。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黑格尔的历史观中存在着唯心主义的双重的不彻底性：(1) 他宣布哲学是绝对精神的定在，同时又不肯宣布现实的哲学家就是绝对精神；(2) 他仅仅在表面上把作为绝对精神的绝对精神变成了历史的创造者。既然绝对精神只是事后才通过哲学家意识到这个具有创造力的世界精神，所以它的捏造历史的行动也只是发生在哲学家的意识中，而真正的已经发生的历史没有

---

①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119－120 页。

②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120 页。

③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104 页。

因此而有丝毫的改变。所以，尽管黑格尔的历史观有其“思辨的原罪”，但他不能不照顾到历史的真实，并且常常在他的思辨的结构中作出把握真实历史内容的有价值的见解，从而在许多方面提供了真实地评述人类关系的因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与黑格尔相比较，鲍威尔一伙从其主观唯心主义立场出发，抛弃了黑格尔历史观中的双重不彻底性，使其思辨的唯心主义方面得到了恶性的发展：(1) 他们认为，批判就是绝对精神；而自己就是批判；(2) 所以，他们这些具有批判头脑的思辨哲学家就是积极的因素和历史的创造者，而群众则是消极的、精神空虚的历史材料，是其批判的对象。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指出，鲍威尔一伙关于“英雄”和“群众”对立的观点，“事实上不过是黑格尔历史观的批判的、漫画式的完成”。其主要特征就在于：“一方面是群众，他们是消极的、精神空虚的、非历史的、物质的历史因素；另一方面是精神、批判、布鲁诺先生及其伙伴，他们是积极的因素，一切历史行动都是由这种因素产生的。改造社会的事业被归结为批判的大脑活动”②。

二、对法国革命的分析，物质利益的作用

以鲍威尔为代表的“批判哲学”的英雄史观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把英雄和群众以及思想原则和物质利益绝对对立起来，否定人民群众和物质利益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们宣称，“到现在为止，历史上的一切伟大的活动之所以一开始就是不成功的和没有实际成效的，正是因为它们引起了群众的关怀和唤起了群众的热情。换句话说，这些活动之所以必然得到悲惨的结局，是因为作为它们的基础的思想是这样一种观念：它必须满足于对自己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9页。

表面了解，因而也就是指望博得群众的喝彩。”① 这也就是说，历史上一切伟大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满足纯粹思想的要求，仅仅指望博得群众的喝彩。在这里，他们所依据的首先是1789年法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按照鲍威尔的说法，由于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迎合了群众的利益和广大群众参加，因而是不成功的和没有实际成效的。因为启蒙学者关于解放人类、理性国家、普遍幸福的理想最后以市侩的、鄙俗的专政而告终。

马克思恩格斯对这种论调作了透彻的分析和批判，并论述了物质利益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他们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② 历史经验表明，“任何得到历史承认的群众的‘利益’，当它最初出现于世界舞台时，总是在‘思想’或‘观念’中远远地超出自己的实际界限，很容易使自己和全人类的利益混淆起来。这种错觉构成傅立叶所谓的每个时代的色调。”③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情况就是如此。启蒙思想家关于解放全人类的理想之所以未能实现，并不是因为它迎合了群众的利益，而是因为它“离开”了并“远远地超出”了它所实际反映的那部分群众即资产阶级的利益。把资产阶级利益和全人类利益“混淆起来”，期待在资产阶级解放运动中实现全人类的理想，当然不可能取得成功。但是，资产阶级在1789年革命中的利益决不是“不成功的”，它“压倒了”一切，并获得了“实际成效”。“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顺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党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④这次革命只有对那样的群众来说才是不成功的，这种群众的政治“观念”，并不是关于自己的实际“利益”的观念，所以他们的真正的主导原则和革命的主导原则并不是一致的，他们获得解放的现实条件和资产阶级借以获得自身和社会解放的条件是根

①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2页。

②③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3页。

本不同的。所以，“如果说革命是不成功的，那么，并不是因为革命 唤起了’群众的 热情，，并不是因为它引起了群众的 关怀’，而是因为对不同于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群众来说，革命的原则并不代表他们的实际利益，不是他们自己的革命原则，而仅仅是一种 观念’，因而也仅仅是暂时的热情和表面的热潮之类的东西。”至于鲍威尔等人所评论的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和拿破仑以及波旁王朝的血统等等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思想原则已不符合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的悲剧在于他们企图仿照古代的奴隶制为基础的民主共和国形式来建立资产阶级国家。拿破仑则把国家当作目的本身，而把市民社会仅仅看作他的司库和他的不能有自己的意志的下属。当资产阶级社会最重要的物质利益和他的政治原则发生冲突时，他仍然只重视后者而轻视前者，从而最终导致了自己的失败和波旁王朝的复辟；但是，由于波旁王朝是与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根本对立的，因而它也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法国革命史的考察，已得出了物质利益决定思想原则的重要结论，并看到了物质利益和思想原则相互联系中的复杂情况，从而为他们进一步阐明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

从现实的物质生产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和物质利益决定思想原则的观点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鲍威尔自我意识错误观点的过程中，进一步得出了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的重要结论，确立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重要地位。他们说：“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 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 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 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 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

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①

把历史看作是人的历史，而且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的历史，这就既与黑格尔所谓的绝对精神的历史和费尔巴哈所谓感性的自然的人的历史划清了界限，也与鲍威尔所谓自我意识的历史划清了界限。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历史作为客观过程并不具有目的性，然而，历史的客观过程又存在于现实的人的活动之中，是由追求着自己目的的现实的人的活动构成的，这就为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类社会历史主体的角度来解决谁是历史创造者的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

这是因为，既然“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②而人的活动又主要是物质资料的生产，那么作为历史发源地的物质资料生产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就理所当然是历史的创造者。《神圣家族》正是立足于此，并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视角，说明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他们在驳斥埃德加尔诬蔑工人群众什么也没有创造时指出：“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了一切，甚至就以他们的精神创造来说，也会使得整个批判感到羞愧。”③马克思恩格斯还认为，人民群众是实现社会革命的主要力量，任何革命、任何伟大的历史活动，只有代表群众的利益和唤起群众，才能获得成功。因此，人民群众决不是什么“消极的”、“非历史的”因素，恰恰相反，只有他们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而且，随着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斗争的深入发展，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也将日益发展，作用越来越大。马克思恩格斯高瞻远瞩地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④这就把对历史主体人民群众的活动在历史上作用的认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2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

识，提高到了规律性的高度。

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相比较，马克思恩格斯这时已不再是用人的本质异化和复归的观点来解释人类社会历史，而是开始从现实的物质生产以及物质利益的原则的视角，深入到历史发源地内部来观察分析历史活动，这就使他们日益接近于新世界观的科学体系。

第四节　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论证

列宁曾指出："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一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①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时，特别注重强调无产阶级创造历史的革命作用，着力揭示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并由此引出其历史使命。列宁认为，在《神圣家族》中已经"非常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的几乎已经形成了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作用的观点。"② 恩格斯在继《神圣家族》发表一个月之后完成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进一步从经济上对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作了更为具体的论证。

一、资产者和无产者的辩证法

如何看待无产者和资产者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学说中的一个重要问题。19世纪初的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提出了人类解放的问题，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唯心史观的限制，他们看不到无产者和资产者根本利益的对立以及这种对立的社会根源，仅仅把无产阶级看作一个受苦受难的阶级，而不是一个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的阶级。他们寄希望于劝说资产者发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437页。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9页。

善心，来改善无产者的悲惨处境，因而不能不陷入空想。

马克思恩格斯在走出哲学、创立新哲学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对无产者和资产者的关系问题的探讨。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问题，并使之与人类解放有机地联系起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开始从经济上具体地探讨资产者和无产者的相互关系。他具体地论述了在私有制条件下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发展过程，说明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非人的力量统治一切”，它不仅适用于无产者，也适用于资产者，“凡是在工人那里表现为外化、异化的活动的，在非工人那里都表现为外化、异化的状态。”① 但是，由于工人是受到剥削的生产者，因而他的异化最集中地表现在劳动者同他的劳动活动相异化上；而资本家由于是生产资料占有者，因而他的异化最集中地表现在无偿占有工人的劳动产品，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因而资产者和无产者在资本主义异化状态中是根本对立的。他说：“凡是工人做的对自身不利的事，非工人都对工人做了，但是，非工人做的对工人不利的事，他对自身却不做。”②也就是说，资产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虽然也受到物的力量支配，但他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受害者，而是压迫工人的得利者。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继续发挥和深化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这一思想，阐明了资产者和无产者的辩证法。

首先，《神圣家族》指出了资产者和无产者同是私有制世界产生的一对双生子，在它们之间构成了一个矛盾的对立统一体。

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在谈论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对立面的富有和贫穷时，他们先是把这二者人为地结合为一个整体，然后按照神学的方式到这个整体之外的某个地方去寻找这一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3页。

整体的前提，以显示“批判的批判”是高居于两个对立面之上的。实际上是掩盖了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的这两者对立的事实。

针对这种论调，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贫富之间的这一全部对立正是对立的两个方面的运动，整体存在的前提正是包含在这两个方面的本性中"①。所以，对贫富之间对立的认识运动应当遵循它们对立运动本身的逻辑，而不能到它们对立以外去寻找认识运动的逻辑。由此，马克思恩格斯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和富有是两个对立面。它们本身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二者都是由私有制世界产生的。"②

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仅仅宣布无产者和资产者是矛盾统一的两个方面是不够的，还必须阐明在这两个方面中的每一个方面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产者是这个对立统一体中的肯定方面。因为作为私有制来说，作为富有来说，不能不保持自身的存在，因而也就不能不保持自身的对立面——无产阶级的存在。这是对立的肯定方面，是得到自我满足的私有制。相反地，无产者是这个对立统一体的否定方面。因为作为无产者来说，不能不消灭自身，因而也不能不消灭制约着它而使它成为无产者的那个对立面——私有制。这是对立的否定方面，是对立内部的不安，是已被消灭的并且正在消灭自身的私有制。

马克思恩格斯还运用异化的观点，具体考察了资产者和无产者两个对立面在统一体中的各自地位，说明了虽然资产者和无产者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资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作是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了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这个阶级，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在被唾弃的状况下对这种状

---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3页。

况的愤慨。这个阶级之所以必然产生这种愤慨，是由于它的人类本性和它那种公开地、全面地否定这种本性的生活状况相矛盾。由此可见，在这个统一体中，资产阶级是保守方面，采取了保持对立的行动，而无产阶级是破坏方面，采取了消灭对立的行动。因为它如果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如果它不能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

第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要消灭资本主义异化的状况，消灭资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对立，就必须采取革命行动，消灭私有制，而决不是靠空谈就能改变无产者所处的屈辱地位的。而无产者由于在它和资产者的矛盾中所处的地位，也必将采取这种革命行动，成为私有制的埋葬者。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无产阶级在获得胜利之后，也决不会成为社会的绝对方面，因为它只有消灭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对立面才能获得胜利，随着无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本身以及制约着它的私有制都必将趋于消灭。

二、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初步论证

通过对资产者和无产者辩证关系的分析，使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资产者和无产者的对立统一关系，看到了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者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起着决定作用，而无产者则处于被支配的矛盾的次要方面，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矛盾的双方必然互易其位。进而，他们试图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作为历史主体无产者的相互关系的视角，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作更深一步的论证。

就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而言，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产者和无产者的辩证运动的分析，说明了私有制的灭亡决不是根源于某种外部因素，而是“在自己的经济运动中自己把自己推向灭

亡"①，这是"为客观事物的本性所制约的发展"②，是不以任何一个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趋势。但是，私有制灭亡的这种客观必然性并不能自发地实现，而必须通过无产者的能动活动即推翻私有制的革命活动才能实现。

当然，无产者也不能自发地完成自己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历史使命。这是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作为矛盾的否定方面，要担负起埋葬资本主义的历史重担，其先决条件就在于它必须"意识到自己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贫困的贫困……意识到自己的非人性"③。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赞扬当时的英、法无产阶级，其原因在于"英法两国的无产阶级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任务，并且不断地努力使这种意识达到完全明显的地步"④。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和雇佣工人的非人生活状况后所明确指出的，"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⑤。他们写道："问题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做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无产阶级不是白白地经受了劳动那种严酷的但是能够把人锻炼成钢铁的教育的。"⑥"它的目的和它的历史任务已由它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最明显地无可辩驳地预示出来了。"⑦这就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把"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归于无产阶级"，决不是像鲍威尔一伙所攻击的那样，由于他们把无产者看做神的缘故，而是依据无产阶级所处的客观的历史地位得出的科学结论。不管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是否已自觉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任务，但是它迟早会行动起来，

---

①②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5页。

⑤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5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5页。

执行旧制度的埋葬者和新社会建设者的历史使命。

由上可见，《神圣家族》一书对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论证，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人的本质”异化论的影响，但是它已开始着重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和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出发去解决这个问题，并取得重要进展。

三、《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进一步论证

在《神圣家族》出版后不久，恩格斯利用他在英国所做的21个月的调查研究材料，于1845年3月写成《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并于同年在莱比锡出版。在这一著作中，恩格斯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作出了进一步的论证，深化了《神圣家族》中的这一思想。

英国工人阶级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因此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调查研究，是从工业革命开始的。他说：“近六十年来英国工业的历史，在人类的编年史中无与伦比的历史”。在这里所说的六十多年前的英国和其它国家一样，城市很小，工业还很不发达，人口稀疏而且多半是农业人口。然而，正是那时以来的工业革命，使英国变得已不同于任何其它国家：有居民达250万的首都，有许多巨大的工业城市，有供给全世界的产品，而以几乎一切东西都是用机器生产的工业，有勤劳而明智的稠密的人口，这些人口有三分之二从事工业，他们完全是由另外的阶级组成的，而且和过去比较起来实际上完全是具有另外的习惯和另外的需要的另外一个民族。所以，在恩格斯看来，“产业革命对于英国的意义，就像政治革命对于法国，哲学革命对于德国一样。而且1760年的英国和1844年的英国之间的差别至少像ancien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95页

regime〔旧制度〕下的法国和七月革命的法国之间的差别一样大。”①

对产业革命前后英国状况的具体考察分析，使恩格斯认识到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历史发展具有基础和动力的意义。他指出，产业革命既是生产领域的革命，也是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恩格斯说："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是从18世纪后半期，从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开始的。大家知道，这些发明推动了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同时又引起了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而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只是在现在才开始被认识清楚。”②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正是从产业革命引起市民社会全面变革的事实出发，说明英国阶级关系的变化和工人运动的发展的。

首先，恩格斯指出："产业革命的最重要的产物是英国无产阶级”。从历史上看，产业革命引起了工业的迅速发展，而工业的迅速发展既导致了以前的一些阶级和阶层生存基础被破坏，又引起了对人手的大量需要，于是劳动力成群结队地从农村迁往城市，涌入工厂，从而形成了巨大的工业和商业中心和无产阶级队伍。事实表明，在这些工业和商业中心中，至少有四分之三的居民属于工人阶级，而小资产阶级只是一些小商人和很少的手工业者。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机器对手工业以及工厂对手工作坊的不断取代，中等阶级中的劳动分子也将变成工业无产者，而从前的大商人变成了工厂主；它排挤了小资产阶级，并把居民间的一切差别化为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在手工业和商业方面，也发生了相同的情况。所以，也只是从这时候起，“工人阶级才第一次真正成为居民中的一个稳定的阶级……现在，谁要是生而为工人，那末他除了一辈子做工人，就再没有别的前途了。所以，只是在现在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9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81页。

产阶级才能组织自己的独立运动。”①

其次，产业革命在社会关系方面的另一个重要产物就是英国资产阶级上升为真正的贵族。这是因为，在产业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依靠对工人剥削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程度的不断加深，以惊人的速度增殖了自己的资本。恩格斯指出：“小工业创造了资产阶级，大工业创造了工人阶级，并把资产阶级队伍中的少数选民拥上宝座”②。

第三，恩格斯还具体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有力地揭示了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无产阶级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③。

恩格斯指出：依靠剥削无产阶级致富的资产阶级从不正视工人们的贫穷状况，反而冒充自己是全民族利益的代表。但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就是人剥削人。“资产阶级的利益——剥削工人”④。他说：“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⑤ 也正因为如此，产业革命给工人阶级带来的是更加残酷的剥削和更加深重的灾难。恩格斯以实地调查取得的大量事实，强有力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在生活方面是工人阶级的悲惨世界。“资本主义工厂是工人 地狱’的真正入口”，“工人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有产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奴隶”⑥，它与旧形式的公开的奴隶之间的全部差别仅仅在于现代的工人似乎是自由的，因为他不是一次就永远卖掉，而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9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0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7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00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64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63页。

日、按星期、按年卖掉的，因为不是一个主人把他卖给另一个主人，而是他自己不得不这样出卖自己，因为他不是某一个人的奴隶，而是整个资产阶级的奴隶。对于他，事情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这种表面的自由一方面虽然也一定会给他带来某些真正的自由，可是另一方面也有它的坏处，即没有人保障他的生计。他的主人(资产阶级)如果对他的工作、对他的生存不再感到兴趣，就随时可以把他赶出去，让他去饿死。可是，对资产阶级来说，现在的情况比起旧的奴隶制来却是无比地有利，他们可以随便在什么时候辞退自己的工人，同时并不因此使投下的资本受到损失，工人劳动的代价无论如何要比奴隶劳动的代价便宜得多。

然而，与空想社会主义者仅仅把工人阶级看作是一个受苦受难的阶级不同，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通过对英国工人阶级经济地位的考察，不仅说明了它是一个受苦的阶级，而且还第一个说明了正是它所处的那种低贱的经济地位，无可遏止地推动它前进，使它在争取本身的最终解放的斗争中是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的。

首先，恩格斯从英国工人的经济地位和从他们同现代大工业的联系这个客观存在出发，揭示了大工业是如何为无产阶级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使之能够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和从事革命活动的。

恩格斯指出，工业革命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用机器大生产取代了工场手工业，而机器大生产又把许许多多工人集中在工厂里共同劳动，使他们拥挤在城市中共同生活。正是这种共同的劳动和生活条件使其阶级意识有了发展，逐渐认识到自己是一个阶级的整体，因而虽然自己分散时是软弱的，但一联合起来就形成了强大的力量。工人的卑贱的经济地位与资产阶级高贵的经济地位的强烈反差，也使工人阶级逐步认清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并站到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最前列。大城市成了工人运动的发源地。

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虽然工人由于生活的贫困而丧失了接

受教育的机会，但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使他们接受了实际的教育。他们虽然不会读和写，但对什么是他们自己和全民族的利益知道得很清楚。例如，他们虽然不会算，可是对政治经济学概念的理解足以使他们看穿主张取消谷物税的资产者，并且驳倒他们。他们虽然完全不了解教士们费尽心机讲的天国问题，可是很了解人间的即政治的和社会的间题。正是由于他们感觉到自己的卑贱的非人的经济地位而必然要奋起反抗，以便把自己从资产阶级的羁绊下解放出来。

简言之，在恩格斯看来，英国无产阶级是一个最有前途的革命阶级，它本身的阶级地位决定了它作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是“国家力量所系并能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阶级”①。

其次，恩格斯还通过对工业革命以来英国工人运动的初次总结，进一步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恩格斯指出，在工业革命刚刚开始时，无产阶级就开始了对资产阶级的反抗和斗争。不过，这时的斗争还是仅仅局限于为反抗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而采取原始的恐怖的形式，在个别地区采取暴力反对使用机器。但斗争的结果使工人很快地认识到这种单枪匹马的或孤立的反抗形式，只是针对现存制度的某一方面来反对资产阶级的统治是难以奏效的，因为资产阶级总是能动员整个社会的力量并以绝对的优势镇压工人，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寻求新的反抗形式。

工会和罢工就是这种斗争的新形式。恩格斯针对当时英、法的社会主义者把工会和罢工当作歧途加以拒绝的错误做法，明确指出，工会作为群众性的反抗组织，可以消除工人内部的竞争并使之集中组织起来，帮助工人提高阶级觉悟，使之能够进行有组织的反抗资产阶级斗争。罢工则是工人的军事学校，他们在这个学校里经受了严格的训练，从而为自己准备投入反对资产阶级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29页。

伟大斗争作了充分的准备。恩格斯认为当时的宪章主义运动就是这种斗争的新形式，并对它作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在宪章主义旗帜下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是整个工人阶级，他们首先向资产阶级的政权进攻，向资产阶级用来保护自己的这道法律围墙进攻。"①

当然，单纯的工会和罢工运动，虽然能以强大的力量反对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个别弊端，但它尽其一切力量也不能改变工资决定于劳动市场的供求关系这一经济规律，因而为了使无产阶级获得彻底的解放，就必须在社会主义和宪章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使之超越自己的范围向前发展。但这种结合是不能在旧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而必须在扬弃旧理论的基础上创立新的理论，才是可能的。工人运动一旦获得了这种新理论的指导，无产阶级就会成为"有自己的利益和原则、有自己的世界观的独立的阶级，是和一切有产阶级相对立的阶级，同时也是国家力量所系并能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阶级"②，它总有一天会把"资产阶级的整个国家的和社会的建筑物将连同它的基础一同倾复"③。

恩格斯对英国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论证，对于其它国家也具有普遍的意义。这是因为："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④，而当时的英国又是产业革命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在英国发生的规律性现象，在其它一切资本主义的国家都将会发生。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明确指出："只有在大不列颠，特别是在英国本土，无产阶级的境况才具有完备的典型的形式；而且也只有在英国，才能搜集到这样完整的并为官方的调查所证实了的必要材料，这正是对这个问题进行稍微详尽的阐述所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1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2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4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78页。

必需的。"[1] 这就是从个别物中引出普遍物。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作论证时，还存在着一定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影响，恩格斯自己在50年后重版此书时曾指出这一点，他说："几乎用不着指出，本书在哲学、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总的理论观点，和我现在的观点绝不是完全一致的。1844年还没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从那时起，首先是并且几乎完全是由于马克思的功绩，它才彻底发展成为科学。我这本书只是它的胚胎发展的一个阶段。正如人的胚胎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还要再现出我们的祖先鱼类的鳃弧一样，在本书中到处都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之一德国古典哲学起源的痕迹。例如本书，特别在末尾，很强调这样一个论点：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仅是无益的，甚至还要更坏。既然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所以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2]

但是，恩格斯通过对产业革命的考察，通过对资产阶级社会中阶级关系及其相互斗争的变化和发展的研究，具体地从经济上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深化了《神圣家族》中的这一思想。列宁在谈到这部著作时指出：它"第一个说明了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说明了正是它所处的那种低贱的经济地位；无可遏止地推动它前进，使它去争取本身的最终解放。而战斗的无产阶级是能够自己帮助自己的。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必然会使工人认识到，他们除了社会主义以外，再没有别的出路。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只有成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的目标时，才会成为一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7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72页。

力量。这就是恩格斯的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一书的基本思想。”①

从本章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神圣家族》在与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决裂过程中，对无产阶级的新世界观进行了可贵的新的探索，提出了正在形成中的唯物史观的一系列基本原理，表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观的根本问题上已经离开费尔巴哈而接近新哲学的科学体系。列宁指出，“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者确切地说，彻底发挥唯物主义，即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就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社会条件的变更。”②《神圣家族》在消除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主要缺点方面，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部著作中，虽然已经找到了思想动机后面的物质原因，但还没有能够对物质资料生产本身进行具体的科学的分析，还不能科学地了解生产活动自身的矛盾，更没有从物质资料的生产出发去阐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从而说明物质生产和各种社会现象的内在逻辑关系，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而且，由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影响尚未完全消除，因而历史的最后动力还不是归结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冲突，而是仍然用人类不变的本性和违反这种本性的外部现实之间的冲突来说明。例如，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已经注意到把社会关系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区分开来，并从人们对“实物”的依赖关系推出人们在物质

---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89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586页。

生产中必然结成的社会关系，从而接近于得出“生产的社会关系”的思想，但同时又把私有制基础上的现实的生产关系看作是真正的人的社会关系异化的表现，而不是把它看作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人的本质问题上，他们一方面开始用“实物”来说明人的本质，即从现实的物质生产状况去说明人，但另一方面仍然从假定人有一种超历史、超阶级的不变本质出发，认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即人的本质的丧失，而不是把它们看作是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处的阶级地位不同而形成各自特殊的本质。在与旧哲学的关系上，他们一方面已经远远超越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另一方面又还存在对费尔巴哈的迷信，对他的哲学作了过高的评价。

所以，《神圣家族》还没有从根本上克服以往一切社会历史理论所具有的两个主要缺点，形成唯物史观，而只是接近了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体系。

简短的结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合写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以及随后分别写出的《评弗里德里希 李斯特的著作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进一步把对科学世界观的探索推向前进。如果说，在此之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异化劳动理论显示了马克思理论研究的成果，在此之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形成，那么，《神圣家族》等著作则是从异化劳动理论到唯物史观的过渡。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入批判了鲍威尔等人的自我意识哲学，并追根溯源，揭示了黑格尔思辨哲学结构的秘密，阐述了个别和一般的辩证关系，批判地考察了17－18世纪英、法唯物主义发展的历史，从而进一步用唯物辩证的观点，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作为马克思解答“历史之谜”的出发点的，还是理想化的、抽象的劳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而在《神圣家族》等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着眼点已转向“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把它看作“历史的发源地”。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他们还通过对人的“实物本质”的分析，得出了接近于生产的社会关系的思想；他们还初步地揭示了国家的经济根源和阶级实质，阐明了物质利益对思想原则的决定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批判了鲍威尔等人的英雄史观，作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的著名论断，论证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无产阶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如果说，在《德法年鉴》时期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论证主要是从“人的本质异化论”出发，那么，在《神圣家族》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已日益侧重于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社会结构和雇佣劳动者的生活地位，说明无产阶级是旧制度的掘墓人和新社会的建设者。

总之，《神圣家族》等著作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已日益接近于历史（辩证）的唯物主义。当然，也应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思想，还未形成为独立的思想体系，因而也还没有完全摆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他们仍把自己的理论称为“真正的人道主义”，在与旧哲学的关系上还存在“对费尔巴哈的迷信”和过高的评价等。这些不足之处，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克服的。

第六章　新世界观的创立

1844 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他们对新世界观作了全面探讨，批判了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唯心主义，深化了他们的思想，为科学世界观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人类哲学思想发展来看，当时首当其冲的问题是解决历史观的问题。因为不论是认识论还是辩证法在马克思以前都发展到相当的高度，而历史观则是不可逾越的界限。只有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才能不仅使认识论和辩证法建立在更为科学的基础之上，而且使科学的完整的新世界观的问世成为可能。正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是从费尔巴哈那里产生出来的，是在与庸才们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自然他们所特别注意的是使唯物主义哲学向上发展，也就是说，他们所特别注意的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1] 历史赋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任务，首先就是“在理论上发展唯物主义”，“修盖好唯物主义哲学这所建筑物的上层”[2]，创立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以便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没有历史唯物主义，便不可能有真正的哲学社会科学，所以列宁称之为“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3]。

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的新世界观的创立，标志着人类哲学

---

①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336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2 卷，248 页。

③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413 页。

思想的革命变革。这一新的世界观集中体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1845-1846年写作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尽管《形态》在他们生前未能公开发表，但这丝毫也不能抹杀这部著作所闪烁出的新世界观的天才光辉，以及它在马克思主义史上的极为重要的地位。

第一节　哲学领域革命变革的新起点

人的问题和实践问题在马克思早期思想活动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到1845年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发生了根本性转折，其标志是对费尔巴哈由赞扬转为批判。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开始离开这个“中间环节”，走向全面阐发自己新世界观和历史观的阶段。这一转折的关键，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形成自己的科学实践观和关于人的学说，从而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彻底划清了界限。这两个观点的深刻变化，最终促成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诞生，实现了哲学领域的深刻变革。

一、对社会生活本质的认识和科学实践观的确立

历史就是人们实践的历史。要了解历史，就必须了解人及其实践，以确立唯物史观的理论出发点，否则就不会有科学的历史观。过去历史观的根本缺陷就是没有把历史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不可能对历史作唯物主义的理解。

马克思从他哲学活动初始就十分重视实践的问题，但对实践的科学理解，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在撰写《博士论文》时，他所讲的实践是哲学的实践，即理论批判。哲学的实践的结果应是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哲学化。实践的力量来自本身自由的理论精神。“一个本身自由的理论精神变成实践的力量，并且作为一种意志走出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转而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

的世俗的现实，——这是一条心理学的规律。”①

重视理论批判，强调理论批判的能动性，以及它在改造现实中的作用无疑是深刻的。但是，实践不仅仅是而且主要不是理论批判，实践还包括政治实践阶级斗争实践、物质生产实践等等，马克思只谈到哲学的实践，即理论批判，还没有涉及到政治实践、生产实践等。因此，也不能了解理论批判与生产实践的真正关系，不了解理论批判的力量和能动性的根源是政治实践和生产实践。他把它们归结为本身自由的理论精神，而他所说的本身自由的理论精神，不是别的，正是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这种实践观还没有超出唯心主义。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所从事的活动就是对专制制度和私人利益进行理论批判，以便用理性国家代替专制制度，否认私人利益，维护人民的利益。但其结果不是理性国家战胜专制制度，人民的利益战胜私人利益，而是相反。这促使马克思重新研究黑格尔法哲学，促使马克思由理论批判转向政治批判。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论述了政治异化与宗教异化的关系，他认为不是宗教异化决定政治异化，而是政治异化决定宗教异化。宗教的存在是一个缺陷的存在，这个缺陷的根源只应该到国家自身的本质中去寻找。他明确指出了批判政治异化的必要性。他说："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②这个时期马克思所说的实践主要是指政治批判，实际斗争。他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做同一件事情，更重要的是，他认为从事政治批判，不但需要理论，也需要物质力量。特别强调物质力量在改造世界方面的重要性。他说，批判的武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5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3页。

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他把实践与群众和无产阶级联系起来，认为实践的力量来源于为理论所掌握的群众，为哲学所武装的无产阶级。这无疑更接近唯物主义。不过，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并没有研究生产实践，不了解生产实践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马克思对生产实践的看法最初表现在《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在这里，马克思谈到两种生产劳动，一种是作为人的本质的生产，即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一种是异化劳动。他对自由自觉活动和异化劳动的论述，表达了他对生产实践的看法。

马克思认为，自由自觉活动是人的本质，是有意识的活动，这一点使人和动物区别开来，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而人则把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需要来建造，而人却能按着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按着美的规律进行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则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只要人的自由自觉活动能够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都会迎刃而解，这里清楚表明马克思已经看到了人的生产实践的能动性、创造性。马克思在肯定人的生产实践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同时，还肯定生产实践的物质性。他认为只有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人的自由自觉活动才得到证明。人的改造世界的活动，人的对象化活动，离不开自然界。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人所以能创造世界，只是因为它本身是被对象所设定的，它本来就是自然界。马克思肯定生产活动具有能动性创造性和物质性，指出人的生产实践不同于动物的生产，这无疑是对的。但是他把是否有意识看作

是人的生产实践和动物的生产的最根本区别则是不全面的。当然人的生产是有意识的而动物的生产是无意识的，这是两者的重大区别，但不是最根本的区别。两者的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人使用工具，动物基本上不使用工具；人类的生产与符号语言相联系，而动物则没有符号语言；因此人类的生产技能、经验等等能够不断的交流、积累和提高，而动物不能交流积累和提高。

马克思所讲的自由自觉活动在未来共产主义是可能实现的，只有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的生产实践才主要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使人全面发展的活动，才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才能更自觉地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就能预见到共产主义社会生产的特征是难能可贵的。他所讲的谋生的劳动、也即异化劳动，是一种与私有制相联系的强制性活动，是现实的生产活动。马克思对人的劳动活动的性质作了这两种划分，表明他对生产劳动认识的深入，但也要看到，他是把理想的生产作为人类社会的基础，从理想的生产出发去批判现实的生产。只注意现实生产的非人的性质，而对现实的生产本身条件、内在矛盾和发展规律缺乏认识。

把现实的物质生产作为历史基础的观点是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把历史和自然科学与工业分开的观点，他们提出：(1) 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基础，历史的发源地就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不在天上的云雾中。(2) 不去认识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生活本身的直接生产方式，就不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这里提出了一个明确的任务，研究现实的物质生产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在《评弗里德里希 李斯特的著作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不能混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的物质生产和自由的人的社会劳动即理想的生产。马克思还指出，也不能脱离工业所处的环境来谈论工业，把它与存在于工业中的生产力

混为一谈。

在《提纲》和《形态》中，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形成了。其主要表现是：(1) 明确地把生产实践活动与其他活动区别开来，指出这种活动是物质活动，它决定一切其他的活动，“如脑力活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2) 深刻地揭示了生产实践的内在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以及生产实践的发展规律，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3) 把生产实践看作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环境赖以存在的基础，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的思维和存在之间相互联系的中介。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看来，人们的生产实践，就是人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改造物质世界的活动，它受物质世界和人们本身的自然所制约，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物质活动，所以具有物质性。人们在进行物质生产时，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在生产关系基础上形成一定阶级关系、政治法律关系和思想关系，形成一个社会有机体。人的实践总是一定社会关系下的实践，因此，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

从另一方面看，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因为物质生产是社会的起源和基础。劳动创造了人，同时也创造了人类社会，创造了历史。没有物质生产，便没有人类社会，更没有历史的发展了。其次，实践活动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作为人类最基本的活动的物质生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它制约着人类其它活动，如政治活动，科学、艺术的实验和创造活动，以及宗教的活动等等。社会生活包含各种形式的实践活动，没有这些实践活动，社会生活便成为不可思议的。再次，它揭示了社会发展规律的特点。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都是客观必然性的反映，但它们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自然规律是自然自身的规律，而社会规律离不开人的参与，离不开各种各样的实践活动。所以，社会规律不存在于人们的实践活动之外，而存在于其中，表现为一种最终决定人们行为结局的力量。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和利用都离不开人们的实践。然而，这并不是说社会规律是主观的，因、

为不论是人们的实践活动，还是这种活动所产生的结果，也就是对象性活动的结果、“人化自然”，都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力量。所以，尽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和愿望，但他们在活动中所形成的客观关系及其发展方向，却是不依个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最基本的、首要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仅把实践引入认识论，更重要的是发现了实践在社会历史中的基础地位。实践观与历史观的结合，是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时期哲学研究活动的显著特色。从把劳动作为人的本质到作为社会生活的本质，在人类实践活动中来考察社会，终于打开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大门，并从而彻底克服了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局限，把人类哲学认识真正奠定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所以，恩格斯把标志这一哲学成果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①，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②。《德意志意识形态》就是对这一天才思想的深入探讨和科学阐发。

实践观点是新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的生长点和立足点，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与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根本分界线。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将他们正在阐发的历史唯物主义，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因为，没有对实践的科学阐明，便没有历史唯物主义。但这决不意味他们把实践置于本体论的地位，因为，无论主体的活动对社会历史起着怎样巨大的作用，他们的活动决不是没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必须承认“自然界优先存在”的事实，同时，这种实践活动对历史影响的程度，以及它自身的状况，还受着前人实践活动的结果的制约。因此，无视实践的重要意义就不可能突破旧唯物主义的束缚，上升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而离开物质的决定作用，把实践抬高到本体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1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24页。

论的地位，使实践脱离物质，或颠倒物质与实践的关系，这无疑又会走向另一个错误的极端。离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本意，把“实践唯物主义”看成是“从主体出发”而排斥物质第一性原则，否定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都是不正确的。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无疑应该、也必须加以创造性的发挥，但必须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向前推进，而不能背离它的基本原则追求“创新”。

二、人的本质的科学解答

对人和人的本质的看法，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直都是哲学所关注的中心，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不论就其关注程度还是认识深度都达到最高点。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们，尽管对人的认识也提出过一些有价值的思想，但从总体上看，都没有对人的问题给予科学的回答，都没有摆脱历史唯心主义的影响。他们不是用自然性或理性去说明人的本质，就是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人自身”。要真正理解人，认识人，必须转换一个新的角度，即从人的实践活动和社会关系去理解人，认识人。这一转换的结果，不仅导致对人的伺题的科学解答，同时也促成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作为《提纲》的根本性命题：人的现实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作为新的历史观问世的标志而提出的。

同实践观点一样，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人的科学探讨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即从受黑格尔影响用自由理性界定人的本质,到接受费尔巴哈影响，从人自身、从个体和类的关系去观察人的本质，再到把人的现实本质视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始终紧紧结合总结新的实践经验，批判地考察在人的问题上人类认识所取得的成果，不断深化自己的思想。因此，即使是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影响下，他也能提出完全不同于他们的新见解，并使之发展、壮大成为自己新世界观的重要观点。比如，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人的本质不是他的肉体本性、肉体存在，不是指人的胡子、血液等，而是

“人的社会特质”。接着，他又强调人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之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就是社会。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把劳动看成人的本质。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看到决定人的是经济状况和工业状况，他说，18世纪的人不是古代共和国的人，“正像他的经济状况和工业状况不是古代的一样”①。这就为把人看成为社会的、阶级的、历史的人创造了条件，也就是为最终科学地解决人的问题创造了条件。马克思认识的这一演进过程，不仅仅是马克思自己思想发生的质的飞跃，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整个哲学认识的深刻的革命变革。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这个论断，是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发展的一个总的概括。它不仅表明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给予了科学规定，而且表明他摒弃了费尔巴哈关于个体、类、类本质的观点，为全面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扫清了道路。

首先，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论断，摒弃了费尔巴哈式的人类个体的观点。诚然，现实的人，都表现为个体，离开了个体，人必然是一个虚幻的抽象的存在。但人类个体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彼此孤立的人类个体，只能存在于想象之中，不是现实的人。把这种人看作人类个体，只能是人本主义。它不可能从人与人的关系去观察人，而只能从“人自身”去看人。任何人都是属于一定社会形态的人。但社会不是个人的简单集合，而是表示这些现实的个人由于其进行的活动而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因此，属于一定社会形态的人，是处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之中的。离群索居、与世隔绝的人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在阶级社会中，个人——集团（阶级）－－社会是统一的，个人属于一定的集团（阶级），而各个集团（阶级）构成特定的社会。因此，人类社会

---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的关系是个人——集团——社会，而不是个体——种——类的关系。马克思把后者称为对历史科学的“奚落”。个人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取决于他所属的阶级的命运，而阶级的前途，则取决于社会形态的变化。

其次，马克思的这个论断，把人与人的关系，从个体与类的关系转变为人与社会的关系。类与社会不是同一概念，前者强调的是个体的自然同一性，即个体所共同的自然属性，而后者表示的是积极活动的个人之间的全部联系和关系。马克思所讲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指的就是社会。正如他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所说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① 把人从个体和类的关系转变为人与社会的关系，对于历史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个体和类的观点出发，必然把着眼点集中在探求个体的类本质，即寻找个体的永恒不变的本质，只能看到人的抽象的同一性——人就是人；而从人与社会的观点出发，必然是研究人与社会的关系，研究人的社会属性及其历史发展，在阶级社会中，则首先看到人的阶级属性。如果在阶级尖锐对立的社会中，仅仅看到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都是人，这显然是抹煞事物的实质，违反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

基于以上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完全摒弃了费尔巴哈从孤立的个体中探求人的本质，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个体内在所固有的、把所有个体自然地联系在一起的共同性，而是从人与社会的关系来考察人，把人置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认识到人的现实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离开社会关系，便无法正确说明人和人的本质。实际上，关于人的本质的概念，无非是人的生活和社会关系的理论表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明确指出，人们在其中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3页。

产关系，以及由此所决定的个人的关系和社会关系，当它们以观念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即在意识中表现为从一般人的概念中、从人的本质中、从人的本性中、从人自身中产生的规定”①。人们是什么，反映在意识中，就是“关于人的生存方式或关于人的最切近的逻辑规定的观念”②。这就清楚地表明，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本性的概念，只是移植于人们头脑中的由生产的物质条件和生产关系所决定的个人的关系和社会关系。人们对于人和人的本质的认识，概出于这个现实基础，只不过有的是科学的抽象，有的是思辨的歪曲罢了。

三、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实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以往的社会历史理论、尤其是德国的历史哲学，都离开人们的现实生活去说明社会历史。所以，它们不论是把神还是把“人”、理性或绝对观念、作为历史的前提，实质上都是把人类历史视为观念的发展史，都只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看到宗教的一般理论的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与以往的思想家根本不同，由于他们把现实的个人，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条件作为历史的前提和理论的出发点，所以，他们极为重视人们的物质活动与物质关系。首先，他们把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看作是社会的最基本的活动。他们指出，物质生产是第一个历史活动，“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即使感性在圣布鲁诺那里被归结为像一根棍子那样微不足道的东西，但它仍须以生产这根棍子的活动为前提。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以应有的重视。”③其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99－20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1－32页。

次，他们把人们的物质生产资料的再生产看成是社会的最基本的活动。在分析物质生产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① 这就是说，物质生产过程不仅是满足生存需要的过程，也是产生新的社会需要，推动人们进行再生产的过程。可见，像物质生产一样，物质生活资料的再生产也是最基本的历史活动。第三，他们把人类自身的生产，即人口增殖看成是社会的基本活动。他们指出："一开始就纳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就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活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②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在考察人们的基本社会活动过程中，发现了人们在社会中的最基本的关系，即由生产所决定的人们之间的物质关系。他们指出："这样，生活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活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活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意又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至于这种合作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则是无关紧要的。"③他们认为，这种社会关系就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物质关系，它的历史和人的历史一样长久，它的不断发展表现为历史。

从社会活动中区分出物质活动，从社会关系中区分出物质关系，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论上的又一重大贡献。虽然物质活动和物质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人们都能接触到的，但并不等于人们都能认识它们。唯心主义者把一切活动都看成是精神活动，把一切关系都看成思想关系，根本不认识物质活动和物质关系。旧唯物主义者也不能从社会活动中区分出物质活动，从社会关系中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页。

区分出物质关系，不认识物质活动和物质关系的重要性。其结果就是他们中有的人尽管想在社会历史领域中贯彻唯物主义原则，还是不能摆脱唯心主义。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就是如此，他们从唯物主义感觉论出发去说明社会历史，得出了环境决定人的结论。但是，由于他们不了解构成人的环境有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而物质关系才是最基本的关系，他们便把人们的意见，人们的法律制度看成是人们社会环境中的基本因素，所以还是陷入了唯心主义，从环境决定人走向意见决定人和法律制度决定人。

一旦把人们的物质活动和物质关系从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中区别出来之后，那么，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思想关系和物质关系之间的联系就一目了然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在把物质活动和物质关系从整个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中区别开来之后，考察思想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他们曾明确指明了这一点："当我们已经考察了最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四个方面之后，我们才发现：人也具有 意识"①。

他们认为，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和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意识是由人们物质交往的需要产生的。"意识起初只是对周围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以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②。这是由人们的物质活动能力低下决定的。正因为人们的物质活动能力低下，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人们同它的关系就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这样一种人与自然的关系，决定了人们的意识只能是一种动物式的意识。意识通过语言实现出来，语言本身是一种物质活动，它不是别的，乃是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它也是由物质活动和物质交往的需要产生的。

随着物质活动的发展，出现了分工。在出现了物质劳动和精

---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4、34－35页。

神劳动的区分之后，人们的精神活动能力也发展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真实地这样想象：它是同对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其他的东西；它不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① 这些意识形态也都是物质活动和物质关系的产物。哲学以现有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为基础，"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②。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在阶级社会，意识形态是同一定阶级利益相联系的。尤其是法学和政治思想总是反映一定的阶级关系，以一定的阶级关系为基础。例如，在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争夺统治因而统治是分享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会是关于分权的学说，人们把分权当作"永恒的规律"来谈论。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尽管具有代表普遍利益的外观，但它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利益的理论表达。共产主义文献是以一定国家里的一定阶级的生活条件的总和为基础的。宗教是世俗世界自我矛盾和自我分裂的产物，对宗教的解释，要到一向存在的生产和交往的方式中去寻找。要知道基督教关于世界的观念在中世纪为什么采取这样的形式，后来又怎么转变为另一种形式，就要研究中世纪的现实历史。道德观念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下也总是这样那样地受着阶级关系的制约。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是资产阶级存在条件的表现。资产阶级在冠冕堂皇的词句和普遍虚伪掩盖下的神圣的家庭概念，是同资产阶级家庭的肮脏存在相适应的。艺术受分工制约。艺术天才完全集中在个别人身上，广大群众的艺术天才受到压抑是分工造成的。"像拉斐尔这样的个人是否能顺利地发展他的天才，这就完全取决于需要，而这种需要又取决于分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5-36、43页。

工以及由分工产生的人们所受教育的条件。”① 一个艺术家必然要受到他以前的艺术所达到的技术成就、社会组织、当地的分工以及与当地有交往的世界各国的分工等条件的制约。

总之，人们的观念不论是个人思想还是作为意识形态，不外乎是“关于他们同自然界的关系，或者是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关于他们自己的肉体组织的观念。显然，在这几种情况下，这些观念都是他们的现实关系和活动、他们的生产、他们的交往、他们的社会政治组织的有意识的表现”②。即使人们头脑中的假象也是来自现实，是对现实的反映，不过是颠倒的反映。“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像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那末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象在眼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③“人们头脑中模糊的东西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④。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有时会和现实的关系发生矛盾，这也是由现实的物质活动和物质关系造成的。

他们认为，意识没有自己独立的历史，但却有相对独立性。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意识一经产生出来也是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人们不能任意改变它。这是因为它所反映和表现的物质关系是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第二，意识虽然是现实的反映和表现，可是它又常常表现为一种神秘的、独立的力量。这是分工造成的。人们的生产关系又表现为法律关系和政治关系，表现为思想概念。在分工的范围内，人们的生产关系、法律关系和政治关系变成独立于个人的、人们无法控制的神秘的独立的力量、异己力量。“相信这些一般性和概念是神秘力量，这是这些一般性和概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5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3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页。

念所表现的实际关系获得独立存在以后的必然结果。”①

意识以物质活动、物质关系为基础，由它们所决定，也必然随着它们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②。要真正消灭某种意识，只有消灭产生这种意识的根源，改变这种意识赖以存在的条件，而不是靠理论上的演绎。

用物质关系说明思想关系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实质。他们曾明确指出：“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全部过程（因而也就能够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了。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③。正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精辟地阐明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④“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⑤这种毫不含糊的、鲜明的唯物主义观点，为科学社会历史观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真正实现了哲学领域中的革命变革，并给唯心主义以沉重的打击。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讲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2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2-4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页。

的："人们的意识决定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①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有不少思想家也看到了物质生活对人们思想的深刻影响，比如费尔巴哈就曾讲过，"皇宫中的人所想的，和茅屋中的人所想的是不同的。" "如果你因为饥饿、贫困而身体内没有营养物，那末你的头脑中、你的感觉中，以及你的心中便没有供道德用的食物了。"② 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法国启蒙思想家等也都有过类似的见解，但他们没有从生产关系、阶级关系来说明这种现象，更不可能对此作出科学的概括和总结了。所以，他们也只能停留于不自觉、不系统的表面的认识，没有升华为理性的认识。尽管他们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观点形成仍起了积极的启迪作用。但是，必须清楚地看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根本分水岭，是新的历史观赖以建立的基石。

四、揭露黑格尔关于精神统治历史的思辨观念

唯心主义历史观既然舍弃物质前提，而把精神作为历史的出发点和归宿，它必然不能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而只能在每个时代寻找某种观念，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这样，精神变成了人类历史的本质和基础。在马克思以前正是这种历史观主宰着人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并在黑格尔《历史哲学》中达到它最完备的表现形式。

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整个德国历史编纂学的最终的、达到自己'最纯粹的表现'的产物"③。黑格尔这样来结束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117– 118 页。

②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33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44 页。

自己的《历史哲学》，他说，“‘景象万千，事态纷纭的世界历史’，是‘精神’的发展和实现的过程。”“‘哲学’所关心的只是‘观念’在‘世界历史’的明镜中照射出来的光辉”，“是要认识‘观念’在实现它自己时所经历的发展过程”①。于是，在黑格尔那里，历史不是人们的物质生活过程，而是一部观念发展史。在他身外的一切事物也都通过异化的形式变成了观念的产物。

青年黑格尔派的历史观并没有超出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范围，而只是黑格尔思辨观念最极端和最露骨的表现形式。他们不过是用诸如“自我意识”、“人”、“唯一者”等等术语替换了黑格尔的绝对观念罢了。黑格尔的纯粹的思想后来在鲍威尔那里被看作一连串的“思想”，其中一个吞噬另一个，并最后消溶于“自我意识”中。施蒂纳更加彻底，他认为历史过程只不过是盗贼和怪影的历史，是围绕着哲学范畴兜圈子的历史。他们同黑格尔一样，迷信精神万能，相信普遍物、观念对历史的绝对统治。

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关于精神在世界历史中的统治的观念，虽然荒诞无稽，但也并非纯系主观臆造，它是从现实社会关系中产生出来的，也是人们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马克思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揭露了这种历史哲学产生的社会阶级根源，深刻地指出，它是统治阶级意识，是统治阶级利益在意识形态中的反映。

马克思提出一个重要思想作为自己批判的立足点，即每一时代居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他们不仅大量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控制各个意识形态部门，而且拥有传播自己思想的工具和场所，因此，“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表现为思想

① 黑格尔：《历史哲学》，第 503 页。

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①。可是，思辨哲学家却竭力宣扬，似乎居统治地位的思想，并非统治阶级的思想，而是代表整个社会利益的普遍观念，于是编造出一种思想统治历史的奇谈怪论，这完全是歪曲事实，掩盖历史的真相。

每一个时代处于支配地位的统治思想，都是统治阶级利益的反映，阶级统治之所以被歪曲成不代表任何阶级利益的一般的思想统治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首先是由于分工。社会分工是过去历史进步的重要因素之一，精神劳动与物质劳动的分工产生以来，它存在于迄今的各个历史阶段，这种分工存在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但在统治阶级内部也出现另一种类型的分工。在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思想家，他们以编造关于这一阶级的幻想作为谋生的主要来源；而另一部分人则主要从事其它实际活动，他们是该阶级的积极代表，虽不从事编造幻想，却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用以指导自己的活动。由于职业的不同，活动性质的区别，这两部分人往往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对立和敌视，甚至在不危害本阶级根本利益的范围内会发生激烈的冲突。这种现象可能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思想家们编造的思想和幻想，不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和幻想，而是属于整个社会的，从而获得一种普遍性和独立性的外观。马克思指出，“在考察历史运动时，如果把统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阶级本身分割开来，使这些思想独立化，如果不顾生产这些思想的条件和它们的生产者而硬说该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是这些或那些思想……例如，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忠诚信义等等概念，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则是自由平等等等概念。总之，统治阶级自己为自己编造出诸如此类的幻想”②。于是，思想就被看成是统治历史的力量。

其次，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之所以愈来愈成为具有普遍性形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3页。

的思想。是由于统治阶级的需要和欺骗。统治阶级愈是意识到自己利益同被统治阶级利益的对立，便愈是需要把自己阶级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在理论上便愈要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

马克思在批判施蒂纳关于“圣物”的虚构时，深刻地指出：“当前社会的交往形式以及统治阶级的条件同走在前面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愈大，由此产生的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以及它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分裂愈大，那末当初与这种交往形式相适应的意识当然也就愈不真实，也就是说，它不再是与这种交往形式相适应的意识了；这种交往形式中的旧的传统观念（在这些观念中，现实的个人利益往往被说成是普遍的利益）也就愈发下降为唯心的词句、有意识的幻想和有目的的虚伪。但是，这些东西被生活揭穿得愈多，他们对意识本身的作用愈小，那末它们对自身的捍卫也就愈坚决，而这个标准社会的语言也就愈加虚伪，愈加道德化，愈加神圣化。”①

马克思在这里揭露了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发展的一个普遍规律：新的统治阶级在开始反对旧的统治阶级的斗争中，多少还反映着其它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在他们争得统治地位的初期，也能多少满足一些未能争得统治地位的阶级的要求，因此，他们总是把自己的特殊利益说成是全人类的普遍利益，并“真诚地”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的进一步发展使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日益变得不真实的时候，为了捍卫统治阶级的利益，他们不得不采取更加虚伪，更加道德化和神圣化的语言来欺骗人民。思辨哲学把统治的思想抽象化和神圣化，并把它上升到统治世界历史的高度，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马克思的深刻论断，给人们指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道理：在

---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1页。

阶级社会里，考察任何社会意识，都必须从当时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利益入手。如果不去揭露某种意识背后隐藏着的阶级利益，那就不仅不能认识社会意识的本质，而且必然为统治阶级的虚伪宣传所欺骗。

最后，马克思把思辨哲学编造精神统治世界历史的全部戏法，归结为三个手段：第一，把统治者的思想同统治者本人分开，使思想离开自己赖以产生的经验前提，从而获得独立性的外观；第二，为了使思想统治具有某种秩序和历史感，赋予它一种神秘的联系，这就必须使思想成为“概念的自我规定”，并使历史成为概念自我实现的过程；第三，为了消除“自我规定着的概念”的神秘外观，把它变成哲学家，思想家等等。① 这样，“整个历史发展都归结为历史发展进程在‘当代所有的哲学家和理论家’的‘头脑’中形成的理论抽象”②。可见，宣扬精神对世界历史的统治，其实是宣扬思想家自己的观念统治历史，这归根结底是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

思辨终止的地方，正是研究人们的物质生活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黑格尔唯心主义历史哲学的彻底破产，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扫清了道路。

第二节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社会历史规律的科学揭示

唯物史观的基本特征是把物质生产看成是历史的前提和基础，认为物质生产的运动规律最终决定着历史的发展，所以揭示物质生产的运动规律，阐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就成了唯物史观的核心问题。唯物史观的实质是用社会存在说明社会意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5－5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31页.

识，用物质关系说明思想关系，只有揭示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才能揭示出社会存在和物质关系的内在本质，使它们得到科学的说明，并且真正做到唯物而又辩证地说明社会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通过揭示物质生产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才实现其哲学领域中的革命变革，创立唯物史观的。正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做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①。“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②。

一、分工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

研究历史的人，首先碰到的是社会关系、物质关系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对历史主体的统治和驾驭。过去的历史学家们都这样或那样地用一种神秘的、精神的力量来说明这种现象。马克思也曾用异化方法来描绘它，尝试揭示这种现象产生的真实原因。但思辨的方法是不能帮助马克思得出正确答案的。随着他思想的进一步深化，他越来越发现，历史上存在的社会分工，才是产生这种异己力量的真实原因。于是，他用对社会分工的研究代替了对异化劳动的研究，并经过这一研究，不仅正确解释了异化这种社会历史现象，而且推动他科学地认识劳动生产与社会关系的辩证联系。

分工是人类历史进步的重要因素。人类生产活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分工，有生产的合作，便有社会的分工。人类最初的分工是自然产生的分工，如男女性别的分工，因体力和天赋差别而产生的分工等等。这种分工完全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不带有任何强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6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第8页。

制性。真正的社会分工，即“文明产生的分工”，是随着文明的开始才出现的。第一次真正的社会分工是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离，以及随之而出现的城乡之间的对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形态》中指出，这“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于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①。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相继发生了农业与畜牧业的分离，工商业与农业的分离，商业与工业的分离，而且在各个部门内部也在进行着越来越细的分工。分工发展的这些主要阶段，同历史上曾存在过的几种社会形态或几种所有制形式，是完全相适应的。分工之所以有着如此重要的意义，是因为它同生产活动和交往关系内在地联系在一起。

一方面，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表现和结果。“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任何新的生产力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②。分工的发展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它归根结底受着生产力发展的制约。生产力决定着分工发展的程度和性质。

另一方面，分工又是形成和制约着生产关系和各种社会关系的现实基础。在分工的每一阶段，个人与劳动材料、工具和产品的关系决定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财富在各个私有者之间的劈分，也包含着财富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的区分。分工发生变化，个人与劳动资料、工具、产品的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③。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7页。

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生产力和分工不同出现了下列不同的所有制形式：

部落所有制。“它是与生产的不发达的阶段相适应的，当时人们是靠狩猎、捕鱼、牧畜，或者最多是靠务农生活的。……在这个阶段上，分工还很不发达，仅限于家庭中现有的自然产生的分工的进一步扩大。”①

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这种所有制是由于几个部落通过契约或征服联合为一个城市而产生的。”② 在这个阶段，城乡分离、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离，农业与带有手工业性质的工业分离、城市中工业和海外贸易的对立已经出现，分工比较发展。从属于公社所有制的私有制开始发展起来。

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它“一方面是地产和束缚于地产上的农奴劳动，另一方面是拥有少量资本并支配着帮工劳动的自身劳动。这两种所有制的结构都是由狭隘的生产关系——粗陋原始的土地耕作和手工业式的工业所决定的。在封建制度繁荣时代，分工不大发达。……农业中的分工由于土地的小块经营而受到了阻碍，与这种经营方式同时产生的还有农民自己的家庭工业；在工业中，在各手工行业内部根本没有实行分工，而各手工行业之间的分工也是很少的。在比较老的城市中工业和商业早就分工了；而在比较新的城市中，只是在后来当这些城市彼此发生了关系的时候，这样的分工才日益显著”③。

资产阶级所有制。它是由不同城市之间的分工发展的结果。不同城市之间的分工，产生了工场手工业。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出现，所有制关系开始变化，它摆脱了行会束缚，促进了竞争和封建制度的解体以及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形成。而随着工场手工业发展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8页。

大工业，普遍采用机器和实行最广泛的分工，创造了高度生产力，使资产阶级所有制成了过时的，必然为更高的所有制形式所代替。

分工与阶级的产生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由于分工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使人们处于不同的地位，由于分工不仅使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各种不同的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所以必然形成不同的阶级。“在分工的范围内，私人关系必然地、不可避免地会发展为阶级关系，并作为这样的关系固定下来”①。印度人和埃及人借以实现分工的原始形态，在这些民族的国家和宗教中产生了等级。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造成城乡对立，造成两大阶级的对立，这种划分是直接以分工和生产工具为基础的。随着分工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阶级关系也不断发生着新的变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社会分工的探讨，深刻认识到他们曾经用“异化”概念表述的那种异己的、在人们之外的社会力量产生的根源。人们活动与人相异化，原因不在于个体和类的矛盾，而在于旧式的社会分工。只要人们还处在自发地形成的社会中，只要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还有分裂，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末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这种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由于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发地形成的，因此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权力。关于这种权力的起源和发展趋向，他们一点也不了解；因而他们就不再能驾驭这种力量，相反地，这种力量现在却经历着一系列独特的、不仅不以人们的意志和行为为转移的，反而支配着人们的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3页。

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①

同时，分工使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反映这种社会关系的观点和意识成为异化物。由于分工产生私有制，使人们之间私人关系发展为阶级关系，并使阶级关系变成人以外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必须屈从的异己的力量。由于分工，人们的生产关系必然表现为法律的和政治的关系，变成人以外的、异己的力量。因此，“在分工的范围里，这些关系必然取得对个人来说是独立的存在。一切关系表现在语言里，只能是概念。相信这些一般性和概念是神秘力量，这是这些一般性和概念所表现的实际关系获得独立存在以后的必然结果。……分工的结果使政治家和法学家注定要崇拜概念并认为一切实际的财产关系的真实基础不是生产关系，而是这些概念。”② 总之，思想和观念成为独立力量是个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和联系独立化的结果。而这种结果不是抽象的思辨造成的，而是社会分工的产物。这种分析，深刻地揭露了使观念游离于社会生活的思辨唯心主义哲学的反科学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分工的探讨，深化了他们关于物质关系与思想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联系的思想，对于他们正确认识社会历史现象及其发展规律具有重要作用。从探讨异化劳动，到研究社会分工，再到揭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他们早期思想发展、并终于敲开科学历史观之门的主导线索。

二、生产力思想的新探讨

关于生产力的观点，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里就已有之，但对生产力作出科学的概括，并把它视为历史的最终动因，则是马克思的功绩。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探讨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时，实质上已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8－3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21页。

经触及到生产力这一重要问题。起初，重商主义者把商业活动看成是财富的唯一源泉。接着，重农主义者把农业劳动看成是财富的唯一源泉。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们把工业看成是财富的源泉。他们克服了重商主义者和重农主义者的狭隘见解，认为劳动者用于生产各个部门的社会劳动总量是财富的源泉，并提出了“劳动生产力”，“自然生产力”等概念。在他们看来，财富的增长既取决于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条件，又取决于劳动同其对象的结合，取决于生产力。正是基于这种看法，他们特别注重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在谈到李嘉图时指出，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是李嘉图评价经济现象的基本原则。① 重视生产力的发展，把劳动看成财富的源泉，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贡献。

不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讲的生产力，只是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表现。他们只看到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资产阶级的一面，看不到生产力的发展不利于资产阶级的一面。他们只看到生产力是增长财富的手段，能给资产阶级带来财富，看不到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生产力发展的条件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方式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的灭亡。他们只看到劳动者是财富的创造者，是增殖资本的工具，看不到劳动者会成长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私有制的埋葬者，是历史的主人。他们把劳动者仅仅当作工人来考察，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工人，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而把这种考察交给刑事、司法、医生、宗教、统计表、政治和乞丐管理人去做。

德国的后起的资产阶级也热衷于发展生产力以增殖其物质财富。他们的理论家李斯特把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表现形式与生产力混为一谈，把发展资本主义工业，追求物质财富，说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124页。

成是发展生产力，并把生产力说成是一种神秘的精神力量。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客观存在的物质生产力，不是什么神秘的、精神的东西。水力、蒸汽力、马力、人力都是生产力。生产力对于人类整个历史来说，是人们占有自己和自然力量，创造人的生活条件，使自身对象化的能力，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承担者和动力。其次，不能把一定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力和生产力混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力是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工具，是奴役人、使人畸形发展的东西，而不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再次，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不能总处在某一种生产方式下，生产力的发展要突破其现有的形式。今天表现为资产阶级的奴隶的生产力，明天将砸碎自身的锁链，表明自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承担者。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生产力作了进一步说明。

第一，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社会的生产力，它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又与人们的社会关系紧紧联系在一起。生产力一方面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与工具和对象有关。在不同的劳动工具和不同的劳动对象的情况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不同，人们的生产力也就不同。在不同的生产力条件下有着不同的人与自然的统一。另一方面，它表现为社会关系。它是在社会中形成的，是一种社会生产力，是通过人们的共同活动实现的。他们指出："生活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活的生产或他人生活的生产——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 生产力 "①。

第二，生产力是历史的基础，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总和决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页。

着社会状况。不同的生产力状况造成了不同的社会面貌和不同的意识形态。“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①

第三，生产力是一种既得的物质力量。“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②。这就是说，生产力虽然是人的活动的产物，由于人的活动而发展，但是它却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虽然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但是，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都不能只用该时代的人的活动来说明。还必须充分注意历史遗留下来的生产力状况、物质生产条件的作用。离开了生产力状况和物质生产条件来谈论人的活动，人的活动就变成神秘的不可理解的东西了，就无法说明人为什么这样活动而不是那样活动。离开了生产力状况和物质生产条件来谈论历史，必然割断历史。历史的发展正是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根源于生产力的发展。前人对后人、过去对现在的影响正是通过已取得的生产力和物质生产条件实现的。生产力与物质生产条件既是前人活动的物化，又是后人活动的基础。离开了历史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历史也就无法说明。

三、生产关系概念的形成

与生产力思想形成的同时，科学的生产关系的概念也逐步地确立起来。如果说，生产力的概念在马克思以前的政治经济学中就已经提出，它只是在新的理论体系中被赋予了新的含义，那末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3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页。

生产关系的概念则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有的范畴，是由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首次制定并加以科学表述的。

同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也是一种客观的物质的关系，它不仅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且对人们发生着决定性的影响。对这种客观存在，马克思以前的理论家们虽未能给以科学的解释，但也不是漠然视之，都力图以各种方式予以回答。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已经开始用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来说明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关系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描述了未来的理想的社会。尽管它不可避免地带有空想的色彩，然而这一理论活动本身却向人们证明资本主义关系是历史上的暂时的关系。这是“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①。在当时，社会阶级关系也已成为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研究的对象，并且已经开始从现代社会经济结构去寻找阶级对立的原因。他们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经济现象，“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4 内部联系”②。但是，他们不可能揭示同阶级利益密切相关的生产关系的间题，更不可能用它来说明历史的发展和社会阶级斗争现象。他们的研究目的，不是为了人类解放和历史的进步，而是一方面为了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比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进步，另一方面为了证明资本主义制度是“绝对的最后的形式”。因此，资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开展，便“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③。使它们不敢进入当时科学研究的这块“禁区”。

在哲学的领域里，情况也大致相仿。生产关系问题不仅是实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7页。

践的迫切问题，而且也是理论发展的关键问题，哲学家们既不能回避市民社会的物质关系，又无法科学地予以解决，而徘徊于科学的入口处。法国唯物主义者关于“人是环境的产物”的著名论断，常常被人们说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然而，只要深究其对环境的理解，问题便自然清楚了。他们所谓的环境，不仅包括市民的物质生活，经济基础，而且包括政治生活，意识等上层建筑。法国唯物主义的著名代表爱尔维修，把环境主要理解为法律和政治制度，认为法律决定人的行为和精神面貌。他用一句话把他的观点表述为：“法律决定一切”。于是，作为意识形态的法律被夸大为社会历史的动力。进而又认为，法律不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而是由理性决定的。只有产生出掌握理性的天才人物，“才能用好的法律代替坏的法律”。法国唯物主义者之所以陷入“循环论”,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从人们的社会生活总和中区分开思想关系和物质关系，再从物质关系中划分出决定这一切关系的最基本的关系。由此可见，尽管“人是环境的产物”的论断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因素，但只要生产关系的范畴还没有从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划分出来,还没有认识到各种社会联系的从属关系和相互作用，就不可能形成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

德国哲学家虽然是在更发达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基础上接触到这个问题，但他们也不可能有实质性的突破。众所周知，黑格尔把人视为自我意识，因而在他看来，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仅仅是一种精神关系。他说：“自我意识是自在自为的，这由于并且也就因为它是为另一个自在自为的自我意识而存在的；这就是说，它所以存在只是由于被对方承认”①。黑格尔以神秘的思辨方式，表述了人与人的关系。如果把他的自我意识换成现实的人，那末这里反映的正是“人与他人”的关系，“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

---

①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第122页。

人的社会关系"①。按照列宁的说法，这就是生产关系的基本思想②。可见，在黑格尔的思辨外衣下，包藏着合理的思想内容。他较前人更加接近了这个问题。

费尔巴哈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用自然的人代替了自我意识，他不是从自我意识，而是从"人自身"引出人与人的关系。他认为，人之区别于动物的本质，是由于人是类存在物。所谓"类"，是指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也就是你和我的统一。人与人之间必然发生这种关系，是由于人们是互相需要的。同费尔巴哈的整个哲学一样，他的这一观点也表现出明显的两重性：一方面他从人们的需要出发推论出人与人的关系，这里含有合理因素，似乎把人们的社会关系归结于由交往而产生的物质的关系。所以马克思说："费尔巴哈在力图理解这一事实的时候，达到了理论家一般可能达到的地步"③。另一方面，他只是"一位理论家和哲学家"，他关于人的关系的全部推论只是从他的"人"所进行的逻辑演绎。这又是由于费尔巴哈仅仅把人看作类，而没有进一步把人的类的本质视为生产活动，因而他所谓的"需要"，不是真正的物质需要，而是友情与爱情的需要，他所谓的"人的关系"也只是理想化了的爱情与友情的关系。因此，费尔巴哈关于需要，关于人与人的关系的观点，虽然包含着合理的因素但只不过是一些零星的猜测，但是，费尔巴哈哲学中关于"需要"的思想，却比当时任何思想家都更直接地启发和推动着马克思。他说：个人"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但由于他们相互间不是作为纯粹的我，而是作为处在生产力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52 页。
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13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47 页。

和需要的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个人而发生交往的，同时由于这种交往又决定着生产和需要，所以正是个人相互间的这种私人的个人关系，他们作为个人的相互关系，创立了——并且每天都在重新创立着——现存的关系”①。马克思也是从人的需要出发来说明社会关系的产生，但是同费尔巴哈的观点却不可相提并论。马克思的人是从事着生产和交往的个人，而费尔巴哈的人只是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是“纯粹的我”；马克思的需要是同生产活动相联系的物质需要，而费尔巴哈把需要只限于个人情感的范围；因此，马克思所谓的社会关系，是从事生产活动的个人在生产需要的同时生产的社会关系，而费尔巴哈仅仅从人的本质中推论出这种关系来。可见马克思关于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的概念，虽然与过去理论家的观点有一定的联系，但不论就其形式还是就其内容，都与他们有着本质的区别。

马克思之所以能够超越他的思想先驱者，制定出生产关系的科学概念，根本原因在于：从客观条件来看，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高度发展，使各种社会联系明朗化，从而有可能从理论上进行分析和概括；从主观方面来看，马克思转到无产阶级立场，使他能够站在历史上最先进阶级的高度对人类社会历史进行科学的总结，同时又由于他掌握有最犀利的辩证法武器，使他能够透过层层思想迷雾而深入事物的本质。

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科学概念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然而，它也经历一个曲折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同马克思世界观的发展相适应的。首先，在马克思世界观转变时期，他“从纯粹的政治转向经济关系”。接着，在1844年马克思深化自己的观点的时候，“接近了”自己关于生产关系的基本思想。

马克思在评述蒲鲁东的“平等占有”观念时，明确地指出，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4－515页。

“平等占有”是下面这个事实的异化表现：“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①。就是说，劳动产品既是作为劳动者的人的存在的确证，又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的表现。这种关系在生产过程中，就是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这一观点，无疑是1844年期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最重要的结晶。

’列宁对马克思的这个论断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这一段话极富有代表性，因为它表明马克思是如何接近自己的整个‘体系’(如果可以用这个名词的话)的基本思想的，——即如何接近生产的社会关系这个思想的。”② 列宁首先指明，马克思的上述思想正是处于形成中的关于生产关系的基本思想。这个思想在马克思整个学说中的地位是如此重要，以致列宁把它看成是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基本思想。其次，列宁确切地用“接近”二字来说明马克思观点的成熟程度。“接近”即尚未形成，马克思这样讲，不仅是由于他还未能找到适当的表达自己思想的术语，以及在他的表述中还留有旧哲学的印迹，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还没有揭示生产关系各要素之间的联系，使之形成完整的科学概念。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划时代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以生产力为基础，对人们社会关系的发生和发展作了深入的历史考察和理论分析。

人们的社会关系并不神秘，更不是施蒂纳所谓的“圣物”，它是随着生产和需要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起来的。人类最初的社会关系，是人们为了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种族的延续而建立的家庭关系。人们在这种关系中从事生产活动和各种交往，分工也只限于自然分工。人们之间的这种唯一的社会关系，直接地就是他们的物质生产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2页。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3页。

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了。”① 随着需要和生产的发展，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不断产生了各式各样的新的社会关系。交换关系也只是随着产品的增长和劳动分工的发展才逐渐成为一种经常的和范围越来越广的交往关系。“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②。它的“萌芽和原始形态”早在原始家庭中孕育着，只是随着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才发展成为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典型形式‘由于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除物质关系之外，又产生了阶级关系和各种形式的政治关系。同时，人们之间的精神交往关系，也随着物质交往的发展而愈益复杂。马克思说：“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③ 后来，随着生产和分工的发展，精神交往才具有了更为复杂的形式，出现了多种思想关系，而且由于阶级统治的需要，精神越来越脱离物质关系成为统治历史的独立的力量。于是，物质的社会关系便笼罩在精神的烟雾之中。

正像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的研究从社会的横断面透视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诸种关系一样，他通过对各种社会关系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考察，更清楚地认识到它们的内在联系，从而使他有可能从社会生活的总和中揭示出物质关系——政治关系——思想关系的从属关系。与 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不同，马克思从市民社会中划分出物质关系，并把它视为决定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的关系，这就使他站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之上。

历史唯物主义并不限于把精神现象归结于物质现象，更为重要的是，从社会关系中划分出决定其它关系的最后的动因。在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32—3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37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29 页。

克思看来，交往，即物质交往关系仅仅是区别于精神交往的最一般的概念，它只是区分了精神的东西和物质的东西，此外并未说明更多的内容。因此，马克思进而从一般物质交往关系中揭示出具体的、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物质交往关系，称之为“交往形式”，即交往的一定类型。马克思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① 可见，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交往形式和市民社会，正是马克思后来表述为生产关系的东西。马克思在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交往形式以后，甚至把私有财产视为“是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上必然的交往形式”②。

正是基于这一根本性的认识，马克思对生产关系的概念作了如下概括：“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根据个人与劳动的材料、工具和产品的关系决定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③。这里，不仅指明了生产关系是由分工（生产力发展的表现和结果）决定的，而且揭示了生产关系的诸基本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即对劳动材料和工具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以及由所有制关系和产品分配关系决定的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这正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内涵。所有制关系不外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用它来表述生产关系的概念，无疑表明马克思已经把握住问题的实质，表明他关于生产关系的思想已经基本形成。

无庸讳言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生产关系的概念尚未完全确定下来。他常常把生产力和交往形式联系起来表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有时直接使用生产关系的概念，有时也把生产关系和交往形式并列使用。这说明，生产关系的概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10－41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5页。

还处于从交往、交往关系、交往方式、交往形式等概念的“脱胎”过程中，马克思正在交往形式和生产关系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中进行选择。看到差别意味着前进。一年以后，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就完全用生产关系的概念代替了交往形式的概念，并指出所有制和分配关系以及由它们所制约的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总和，是决定其它一切社会关系的关系。但是“交往”和“交往关系”的术语也并未完全消失，而是作为表示一般社会关系的概念在马克思晚期著作中继续被使用着。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概念的演变，清楚地表明了他走向成熟的过程。

生产关系概念的形成，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不仅表明马克思已经远远地超越了他的思想前驱者，使他们思想中的一点微弱闪光发展为科学的形态，而且为他制定完整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奠定了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的原理，经济结构和社会经济形态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运动规律的揭示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科学概念的形成，为揭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规律提供了思想前提。但要揭明两者的内在联系,必须深入考察物质生产的内在结构及其运动过程。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认识到人类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一种社会的活动,人们只有在社会中,结成一定形式的社会关系，才能同自然界发生关系和从事有目的的生产活动。然而，马克思并未就此止步，而是把它作为确定不移的前提，沿着这个方向继续进行探讨。

在《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劳动活动的两重性和社会分工在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中介作用的分析，明确地认识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了作为这两者统一的生产本身的内在结构，阐明了生产的这两个方面的基本联系及

其发展的辩证法。

物质生产活动是“第一个历史活动”，它指的是人同自然界的关系，即人们借助于某些手段和工具改造自然对象以满足自己的各种物质需要。但是，生产活动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不是孤立地进行的。实际上，人们在同自然界发生关系的同时，就已经与其他人发生关系。没有人们的合作，生产便不可能进行。生产的这种性质，正是人之区别于动物的最本质的特性。正如《形态》所阐明的，生活的生产“立即表现为双重的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至于这种合作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则是无关紧要的”①。问题在于，必须发生这种合作关系，这是生产得以进行的先决条件。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两者的关系作了如下明确规定：“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②。可见，生产和交往是同一生产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它们同时并存，互为前提。

通过对社会分工的分析，他们对两者关系的认识更加具体化和明确化。分工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起着结合两者的“中介”作用。一方面，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表现和结果，另一方面，它又是形成和制约生产关系和各种社会关系的现实基础。分工和所有制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也发生着影响，但归根结底它们是由生产力发展所决定的。通过对分工的研究，他们终于揭示出生产力和以所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联系，从而表明他们的思想已经达到成熟的境界。

如上所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同一生产过程的两个相互依存的方面，两者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生产力制约着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过来也制约着生产力。因此，不论在哪个时代，都不能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4页。

离开生产力来考察生产关系，也不能离开生产关系来考察生产力的发展，就是说，必须将两者看成矛盾的统一体。但也不能将两者的作用简单并列、等量齐观。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制约的关系中，生产力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和发展。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在工业发展一定阶段上必然会产生私有制，同样，也只有在大工业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消灭私有制。同时，生产力的发展也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交往形式之间的区别，正是由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水平决定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① 所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是一个基于生产力发展之上的矛盾的、历史的过程。旧的统一体破裂，又必然会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形成新的统一体。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历史辩证法。

这一历史辩证法，集中地凝结在关于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和性质的规律中。这个基本思想在《形态》中已经得到明确的表述：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地发生变化。“起初本是自主活动的条件，后来却变成了它的桎梏，它们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上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为各个新的一代所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② 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思想，在这里已经形成并得到科学的阐明，后来对这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1页。

一原理的经典性表述，正是对这个基本思想的进一步精确化和发挥。

这个原理，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正是基于这个认识，得出这样明确的结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①。"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它在以往的历史中曾多次发生过，然而并没有威胁这种形式的基础）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表现为冲突的总和，表现为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表现为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等等、政治斗争等等。"②这里深刻阐明了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及其表现形式，指明了历史上的革命与现代进行的共产主义革命的原则区别就在于，是否"威胁"生产关系的基础，即私有制。

按照上述观点，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关键在于变革不合理的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的变革，在阶级社会里必然要表现为激烈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一定的生产关系，即"那些使一定的生产力能够得到利用的条件，是一定的社会阶级实行统治的条件，这个阶级的由其财产状况产生的社会权力，每一次都在相应的国家形式中获得实践的观念的表现"③。一个阶级之所以是社会的统治阶级，首先因为它在财产关系上居支配地位，与它切身利害休戚相关的生产关系，正是它赖以生存的社会条件。因此，它必然采取一切（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甚至军事的）手段来保卫这生产关系。相反，被统治阶级在这种生产关系下则无法生活下去，因为，统治阶级对生产力的控制，实质上是对劳动者的控制，利用生产力的社会条件实质上是对劳动者进行统治的条件。所以，被剥削的阶级为了自身的生存，必须变革旧的生产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3－8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8页。

关系，而"一切革命斗争的锋芒都是指向在此以前实行统治的阶级的"①。可见，革命的实质是变革生产关系，而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下，它必然表现为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

历史上的每次革命，都不是在人们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内发生的。而过去进行的革命的基础是有限的生产力，受这种生产力制约的、不能满足整个社会的生产，使得人们的发展只能具有这样的形式：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少数掌握生产资料的人取得支配权，而大多数失去生产资料的人只能处于被剥削、被奴役的屈从地位。因此，"到现在为止，社会一直是在对立的范围内发展的，在古代是自由民和奴隶之间的对立，在中世纪是贵族和农奴之间的对立，近代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②

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决不是任意杜撰的，而是建立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基础之上、对历史和现实经验的科学总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这一历史辩证法的揭示，就为正确认识社会历史现象指出了一条清晰的思想线索。

五、历史主体和历史发展规律，社会形态理论的确立

社会历史是人们实践活动的历史。人是历史的主体，离开人们的实践活动也就无所谓社会历史。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就是对历史主体的最充分的肯定。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阐明了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的思想。他们针对青年黑格尔派高扬"观念"，蔑视群众的思辨唯心主义观点，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7页。

扩大。”① 深刻地阐明了群众、利益和历史运动这三者的内在联系和辩证关系。

接着，他们基于“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认识，首先确定了历史的前提，指出，“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的、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② 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③。这里，首先揭明了人类社会和历史的特点，即这个领域是人的领域，是人的活动形成人类世界。因此，离开人这个主体去研究历史是不可思议的。其次指明这种人不是费尔巴哈的“人自身”，而是“现实中的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的表现自己的”④ 人，是“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⑤。这里实际上阐明了历史主体和历史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人类历史是历史主体，即人们的能动的创造活动的过程。历史的发展，离不开人这个主体的积极活动。但是，主体能动作用的发挥也不是无条件的，它不仅受着人们之外的自然界的制约，而且还受着作为自己活动结果的社会关系和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物质生活条件下，人们才能从事创造历史的活动，同时，随着这种社会存在的发展，人们创造历史的能力、对自然界影响的能力也将增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德国思辨唯心主义哲学时进一步发挥了上述思想。青年黑格尔派完全离开生产活动和工业的发展来谈人对自然的关系，于是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关于“实体”和“自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10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30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23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29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28- 29 页。

我意识”的一切“高深莫测的创造物”的问题。也就是把一种现实的、人对自然的改造的关系变成为一个抽象的哲学问题，抽象化了的主体与客体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只要考虑到在工业中向来就存在的“人和自然的统一性”间题，而且这种统一性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快或慢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并相应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那末关于人与自然对立的问题，关于这个“高深莫测的创造物”的问题，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同时，他们也批评了费尔巴哈无视主体的能动作用，看不到“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只要它哪怕只停顿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费尔巴哈）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就没有了。”① 尽管主体的能动的创造活动对历史发展有着如此巨大的作用，但是它丝毫也不排斥“自然界的优先地位”②。就是说，主体的创造活动，始终都受着自然界和人类世界，即所谓的“人化的自然”的制约。

历史的动力不是精神的活动，也不是抽象的“人”的活动，而是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历史并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③ 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就是形成主体特殊性质和主体创造能力的现实基础，这就深刻揭示了历史主体和

---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页。

客体的唯物辩证的关系，并为认识历史的过程和历史的发展规律奠定了思想前提。

历史活动离不开人的参与，历史规律也是通过历史主体的活动而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然而，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既不能任意创造，也不能任意改变一种历史规律。只有认识并利用这种客观规律，才能更有效地发挥自己的创造作用，并达到自己的目的。人类社会的根本规律是基于生产力发展之上的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在这一规律的支配下，人类社会的进化呈现为一个“社会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历史主体的活动就体现于这个“自然历史过程”之中。因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历史就是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更替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为各个新一代所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①。所以，不能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只见物，不见人。问题在于，要给人、历史主体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以科学说明。

社会形态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重要的范畴之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即生产方式，是社会形态的物质基础。但是，要了解一种社会类型，当然不能只限于了解它的物质方面，还必须了解受其制约的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以及其它各种社会现象。《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实质性进展，不仅在于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原理，达到对历史过程的科学认识，而且还在于把生产关系总和作为国家和观念的上层建筑的现实基础，从而达到对社会结构的科学认识，即认识到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从属关系和相互作用。也就是认识到，社会机体是各种关系和现象有机联系的完整的形态。列宁谈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研究时指出：“他专门以生产关系说明该社会形态的结构和发展，但又随时随地探究适合于这种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1页。

产关系的上层建筑，使骨骼有血有肉。”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这样阐明问题的。他们认为，构成社会的基本因素，是“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而“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②。还指出，“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③这里的“社会状况”、“社会组织”，指的就是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

可见，正是生产关系的总和直接决定着整个社会面貌，构成任何社会形态的最基本内容。但是，生产关系在任何时候也不能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因此，社会形态把生产力作为自己的最根本的基础也包含在自身之中。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正是人们在生产活动中产生出来的。“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④ 所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再批判那种观察历史的先验的、思辨的方法，强调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

把生产力作为根本基础，特别是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运动规律的揭示，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社会形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按一定规律发展变化的。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是由该历史阶段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的；所有社会形态又有其共同的运动规律，这个规律受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一般规律的支配。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形态更替的最根本动因。由此可见，要真正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成自然历史过程，就必须从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生产关系的类型看成是由生产力的性质和状况决定的。

---

①《列宁选集》第1卷，第9页。

②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6、33、41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8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历史的经验的考察，根据生产力发展的不同程度，第一次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依次更替的五种社会形态：部落所有制，即原始社会，古代国家所有制和公社所有制，即奴隶社会，封建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共产主义所有制。每一种社会形态，由于该历史阶段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状况，决定它有着不同于其它社会形态的独特的所有制形式、社会关系和阶级结构；同时又由于其内部固有的矛盾性，又决定它必然遵循一定的规律向另一更高的社会形态发展。人类社会历史，虽然有历史主体、人们活动的参与，但它同自然界一样，也受着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支配。

然而，人们并不是必然性的奴隶，随着对社会规律的愈益深刻的认识和对客观自然的把握，他们对历史的影响也将越来越大。历史的发展就是从必然到自由的过程。在以往的历史发展中，由于生产和交往的不发达，分工和协作还是自发产生的，由于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关系以及其各种社会关系成为人们之外的力量和人相对立，所以，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受着盲目的必然性的支配。这种异己的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的、不受我们控制的、与我们愿望背道而驰的并抹煞我们的打算的物质力量，这是过去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① 只有消灭私有制和旧式的分子，消除生产和交往的自发性，使生产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人们才能消除异化活动，真正获得不再是强制性的自主活动和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这种理想社会的实现，一方面取决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普遍发展，另一方面需要对社会“实行全面变革”。这一切都只能是以往历史发展的总的结果。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7页。

第三节　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奠定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不单纯是为了建立理论体系而去研究理论。他们始终把自己的理论活动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紧紧结合在一起。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形成以前，他们已经对社会主义问题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在《形态》中，他们运用刚刚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沿着以往对社会主义探索的思想轨迹，阐明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观点。他们关于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不仅是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分析现实而得出的结论，而且表明，科学共产主义也是他们新历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科学共产主义

如前所述，对共产主义进行“理论论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思想活动的中心。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形成以前，他们把当时所理解的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视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哲学基础”。唯物主义历史观一经形成，他们便从中直接引出共产主义的结论，并用以指导当时的工人运动。关心现实的政治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活动的强大动力，反过来，他们又用自己的理论服务于当前的政治斗争。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论上能以取得卓越建树的根本关键。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共产主义学说的科学论证，取决于他们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所获得的思想成就。

1842年在《莱茵报》时，马克思第一次接触到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他明确表示自己对此缺乏研究，还没有本事用一句空话来解决那些由英法两个民族正在解决的问题。他当时对空想社会主义持否定的态度，但不是轻率地做出结论，而是认真地进行研究。在他看来，对于像勒鲁、孔西得朗的著作，特别是对蒲鲁东的作品，不能根据肤浅的、片刻的想象去批判，只有在不断的、深

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评论。为此，马克思开始研究空想社会主义学说，1842年10月到1843年初，他阅读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卡贝、德萨米、勒鲁、孔西得朗、蒲鲁东等人的著作。在《德法年鉴》的文章中，马克思提出了人类解放的问题，并且初步论述了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思想。但由于马克思还没有研究政治经济学，所以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论述，更多地建立在哲学思辨的基础上，打上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烙印。或者说，他这时的思想还停留在"哲学共产主义"的阶段。

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即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分析之上。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就是力图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从经济学角度来论证共产主义，并对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进行批判。诚然，这个时期，费尔巴哈的影响仍然存在，因而对共产主义的人本主义论证和经济学的分析交织在一起，有时内容是现实的，而形式和方法则是思辨的，表现了还没有完全成熟时期的特点。但是，重要的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多大程度上仍然存在费尔巴哈的影响，而是他们把共产主义学说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结合所显示的方向：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①。这种结合，在整个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开创了一个新方向，使社会主义迈出了由空想到科学转变的决定性的一步。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反对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人类历史最终的完美状态，而是看作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环节，并提出了共产主义行动的问题。同所有空想社会主义相反，马克思不是把共产主义问题看成传道，而是看成革命。他明确指出："要消灭私有财产的思想，有共产主义的思想就完全够了。而要消灭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121页。

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①。这充分表明了科学共产主义的革命性质。更为可贵的是，年轻的马克思高瞻远瞩，并没有把共产主义的实现看成可以一蹴而就，而是看作必然的，但又是十分漫长的过程。他说，“历史将会带来这种共产主义行动，而我们在思想中已经认识到的那个正在进行自我扬弃的运动，实际上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②这里，他把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最终确立区别开来。这个思想无疑是十分卓越的。

马克思这时虽然对共产主义作了颇有见地的论述，但他并不把自己观点径直地称作共产主义，而是把它称为“实践的人道主义”，“积极的人道主义”，甚至赞扬是费尔巴哈为当时的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可以看出，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思想正在形成，但还没有摆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束缚。恩格斯接触社会主义问题和对经济学研究比马克思要早一些，但就思想成熟程度而言，他们处于同一发展阶段。

在《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自己系统阐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为共产主义提供了科学的哲学论证。他们清楚地看到，正像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代替封建主义社会形态一样，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也必然战胜资本主义。历史的这种进步趋势，决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它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决定的，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结果。他们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达到这一点，即生产力在其中得到发展的那个交往形式（生产关系），开始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于是，生产力也就变成带来社会灾难的破坏力量。这个矛盾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有通过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才能解决。与此同时，资本主义还造就了解决这个任务的社会力量，即革命的无产阶级。从这个阶级的实际生活中，产生出必须实行根本革命的意识。共产主义学说，正是这个革命阶级的地位、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40页。

利益和作用的理论表达。可见，《形态》的这个最初的、总括性结论，已经同用人的异化来说明共产主义的思辨学说不可同日而语了。

众所周知，在马克思“成为马克思”以前，曾是“哲学共产主义”的赞同者，至少恩格斯是把他同赫斯一起列入“哲学共产主义”的“行列”之中的①。至于恩格斯也同赫斯过从甚密。在他们看来，“哲学共产主义”与“真正的人道主义”是一致的，是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来说明人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即主张消灭非人的现实，使人过着符合人性的生活。这种思想之所以是不成熟的，非科学的，不是由于它同哲学有着一种内在的联系，而是由于作为它的理论根据的那种哲学本身是不科学的。它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看成是克服人的本质的“异化”，向真正的人“复归”，就使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带有一种神秘的思辨的性质。要正确认识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前景，唯一的办法就是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科学地认识社会历史的规律性。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经形成自己的科学历史观，便立即认识到，共产主义不是“从寻找‘本质’开始的”，它“是用实际手段来追求实际目的的最实际的运动”②。他们还指出，“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普遍而高度的发展，以及基于这两者矛盾之上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是这种现实的前提。这种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只能是唯物主义历史观，而不能是任何其它哲学。

与此相反，第一个提出“哲学共产主义”的赫斯，始终没有离开过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基地，或者说，他始终坚持用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的学说解释共产主义，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1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6、40页。

因此，他不但没有能过渡到科学共产主义的立场，反而堕落成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奠基者，鼓吹共产主义不是为了人的实际物质利益，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是为了追求“人”的某种永恒的“本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尖锐地批判了这种理论，表明与过去曾经深深影响过他们的那种哲学观点彻底割断了联系。

二、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和历史必然性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问世，使社会主义运动真正奠定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变成工人阶级的自觉的行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了科学预见,首先揭明了人类社会这一更高形态的基本特征。他们将共产主义称为最高的、不受单个国家所限制的人们之间的交往形式，是没有私有制和人剥削人的无阶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消灭了三大差别，消灭了旧式分工和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联系的所谓“自由劳动”，即雇佣劳动，因而使个人体力和智力都得到真正全面的、自由的发展。根本的问题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随着基础、即私有制的消灭，随着对生产实行共产主义的调节（这种调节消灭人们对于自己产品的异化关系），供求关系的统治也将消失，人们将使交换、生产及其相互关系的方式重新受自己的支配。”① “私有制和分工的消灭同时也就是个人在现代生产力和世界交往所建立的基础上的联合”。这种联合“就是个人自由发展的共同条件”②。

第二，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地揭示了共产主义运动的经济根源和历史必然性。他们依据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冲突必然导致革命的原理，指出共产主义革命是大工业生产和私有制之间矛盾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6页。

产物。因为“在大工业中，生产工具和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才第一次作为大工业所产生的结果表现出来；这种矛盾只有在大工业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因此，只有在大工业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消灭私有制。”① 在私有制条件下，大工业的发展，一方面使生产力总和具有物的形式脱离人，变成私有制的力量；另一方面使大多数人与生产力分离、丧失了现实生活内容。所以，个人必须占有生产力总和。这种占有与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性质相适应，与大工业相适应，只有通过人们的普遍联合才能实现。私有制必定被消灭，人们通过普遍联合来占有生产力总和的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生产力的发展是共产主义的“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一切腐朽的东西都会死灰复燃。没有大工业造成的普遍交往和世界历史的形成，共产主义只能成为地域性的，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正因为如此，所以，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

第三，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地说明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物质力量。他们认为，是资本主义大工业使无产阶级成为一无所有的阶级，使他们与整个旧世界对立，赋予他们推翻旧世界的伟大历史使命。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大工业使无产者一无所有，“他连他那些和大家一样的需要都不能满足；他每天必须像牛马一样工作十四小时；竞争使他降为物品，降为买卖的对象；他从单纯的生产力的地位中，即从他唯一赖以糊口的地位中，被其他更强大的生产力排挤掉了，——因此这个无产者已经有了现实的任务：使现存的关系发生革命”②。资本主义大工业不仅赋予了无产阶级历史使命，也为无产阶级实现其使命创造了条件，它使无产阶级在所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26－327页。

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它提供了现代交通工具，使无产阶级的联合成为可能，就是说资本主义大工业不仅使无产阶级成为一个彼此竞争的受苦阶级，也使他们成为联合起来的革命阶级，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第四，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地揭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他们认为："以竞争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它的资产阶级国家由于它的整个物质基础，不能容许公民间除了竞争以外还有任何其他的斗争，而且一旦人们要'互相扼住脖子'，资产阶级社会和国家却不是以'精神'的身分，而是用刺刀武装起来出现的"①。无产阶级要通过革命来实现共产主义，"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达到目的本身，都必须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建立社会的新基础"②。

第五，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共产主义革命与以往的革命的根本区别。过去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而共产主义革命则反对活动的旧有性质，消灭劳动"③。这就是说，以往的一切革命都没有消除生产劳动的谋生性质、异化性质，只有共产主义革命才消灭了生产活动的谋生性质和异化性质，使它成了人们的自主活动。过去的一切革命都和私有制不矛盾，不触动私有制本身，只有共产主义革命才和私有制相对立，彻底消灭私有制。过去的一切革命对生产力的占有，受当时的生产力、生产工具和交往状况的束缚，都是有限的。他们占有的只是有限的生产工具，他们只达到了新的局限性。他们的生产工具成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18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第78页。

了他们的财产，但是他们本身的自主活动受到有限的生产工具和有限的交往的束缚，他们始终屈从于分工和自己所有的生产工具，不能全面地发展。共产主义革命通过联合占有全部生产力总和，消灭旧式分工，使人们的自主活动与物质生活一致起来，使人们的才能得以全面发展。过去的在分工条件中进行的一切革命都不能不导致新的政治机构的产生，而消灭分工的共产主义革命，最终会清除旧有的政治机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共产主义思想与他们以前的共产主义思想有本质的不同，这时的共产主义思想完全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分析得出来的，摆脱了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共产主义思想更不同于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第一，理论基础不同。前者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后者以唯心主义人性论为理论基础。前者以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为出发点；后者以人的天性——理性为出发点。第二，阶级基础不同。前者以现代无产者为自己的阶级基础，代表现代无产阶级利益；后者反映的是作为现代无产阶级前身的早期无产者的愿望和要求。第三，主要理论内容不同。前者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发展的规律，依据这些规律得出共产主义的结论和实现共产主义的条件和道路的学说，并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某些基本特征作出预测。后者主要是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及其反人道性质，在头脑中构造未来理想社会的宏伟蓝图。第四，依靠的力量与实现共产主义道路不同。前者主要依靠现代无产阶级的觉悟和斗争；后者主要依靠有产者的主动退让和学者的宣传。前者认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只有这样才能消灭旧社会形态，实现共产主义。后者认为只要通过典型示范和宣传呼吁，使人们看到现代社会的不合理以及理想社会之美好，并为建立美好的理想社会而出力，理

想社会就实现了。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思想，是共产主义理论领域中的伟大的变革，它使共产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最重要的贡献不在于那些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和方法的具体结论，也不在于那些关于未来共产主义基本特征的预测；而在于他们分析共产主义运动的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方法的具体论述和他们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某些预测，都是根据对19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的分析得出来的，随着历史的前进，资本主义也在不断地变化，根据它们所作的结论和预测也应当有所改变。很明显，我们不能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具体结论原封不动地套用于垄断资本主义，也不能把它们原封不动地套用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或者资本主义还很不发达、工业比较落后的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是研究当代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变化给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应该从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阶级关系的分析中，得出当代共产主义运动的结论，来检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原理。

三、国家的阶级实质，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提出

国家权力是上层建筑的核心。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研究深化了关于经济基础的概念，同样，他对国家和法的探讨，也深化了对上层建筑的认识。随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一般原理的制定，马克思对国家和私有制、国家的阶级本质也作了深刻的揭露，同时进一步批判了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国家观。

在此以前，马克思在国家问题上达到的认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看到国家对市民社会的依赖，国家建立在市民社会的分裂之上，即建筑在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的矛盾之上，建筑在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之上。其次是，他开始认识

到国家的阶级本质，认为现代国家对“自由人性”的肯定，无非是肯定“经营的自由”和“占有财产的自由”。现代国家是完备的奴隶制，它同古代奴隶制的区别仅在于，“在表面上看来是最大的自由”，实际上是在“自由人性”外观掩饰下的最完备的、典型的奴隶制。在这种制度下，人完全沦为“自己营业的奴隶”，沦为“自己以及别人的私欲的奴隶”①。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根据已经获得的新的理论观点，加深了自己的认识，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础。

国家建立在社会分裂的基础之上。由于社会分工而产生的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以及特殊利益真正地反对公共利益，使得公共利益采取普遍的共同体的形式“来对特殊利益进行实际的干涉和约束成为必要”②，于是，便产生了与特殊利益脱离的，凌驾于社会之上并统治社会的国家。然而，国家只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它掩盖着“一个阶级统治着其它一切阶级”的实质。马克思深刻地洞察到，国家不过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统治阶级保卫自己利益的常设机关。他说：“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③这种斗争愈激烈，国家便愈以虚幻的形式出现。

最完善的资产阶级国家，其实是最虚伪的国家形式。它在自由、民主的外观下，隐藏着财产占有者对整个社会的有效统治。它不过是私有者满足自己利益的工具而已。资产阶级由于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因而也必然控制着国家大权。马克思尖锐地指出：“现代国家由于捐税逐渐被私有者所操纵，并由于借国债而完全为他们所控制；这样国家的命运既受到交易所中国家债券行市涨落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45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8页。

的调节，所以它完全取决于私有者即资产者提供给他的商业信贷。”①比如，现在的美国，无论哪个党执政，如果它得不到几个财团的有效支持，或者说，如果它不能满足这些财团的实际利益，那末，它便无法存在下去，更不可能得到巩固。因此，现代国家尽管获得了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但是在实际上，它“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②。可见，作为共同利益形式出现的国家，实质上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③罢了。

既然国家建立在阶级利益的对抗之上，那末，剥削阶级的国家，特别是达到其最高形式的资产阶级国家，对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来说，只能是一种“虚假的集体”，是“虚幻的共同体”。而且它越是体现自己阶级的特殊利益，便越要赋予这种特殊利益以普遍性的形式；它越是意识到这两种利益的对立，便越要采取更加虚伪的形式，以千方百计掩盖它产生的基础——私有制。“可见，政治理智越是片面，因而越是成熟，它就越相信意志是万能的，就越分不清意志的自然界限和精神界限”④。混淆这两者的界限，正是唯心主义国家观产生的重要的社会根源。

既然国家是维护剥削阶级经济利益的组织形式，那末，无产阶级要争取经济上的解放，就不能不争得一定的政治权利。马克思在嘲讽青年黑格尔派的纯理论的解放时指出，“甚至为了争得一些只是用来从事　理论，研究的时间和经费，也必须进行物质的、实际的变革”⑤。无产阶级要获得彻底解放，不进行空前伟大的革命和掌握政治权利，是根本不可能的。

马克思不仅通过当时的革命实践，尤其是1844年发生的德国

①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0－48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21页。

西里西亚织工起义达到了这种认识。他在《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已经提出了“每一次革命都推翻旧政权”，“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1]。随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和对国家的阶级本质的深刻理解，使他的这个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实质上是表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思想。马克思指出：“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如果它的统治就像无产阶级的统治那样，预定要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态和一切统治，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2]，这里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任务是要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态和一切统治”，或如他一再强调的“使现存的关系发生革命”，“推翻整个资产阶级制度”[3]。为此，无产阶级必须首先夺取政权，“取得统治”，也就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这里，这个思想可以说十分明确。它不是一种偶然的提法，而是伴随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发现，作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成熟的一种必然结论。

许多人认为这个重要思想是《共产党宣言》首次表述的。这同列宁对它的论述有着一定的联系。《共产党宣言》写道：“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使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等等。列宁在援引这些思想时指出，这是“在国家问题上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思想的表述”[4]。列宁的论述，无疑是正确的，他强调了无产阶级国家的实质，“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5]。他指明，这是马克思最早表述出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但是，在列宁生前，《德意志意识形态》并未出版。事实上，这两本著作对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论述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应该把列宁的上述评价，向前推到《德意志意识形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27页。

①⑤ 《列宁选集》第3卷，第190页

众所周知，马克思第一次正式使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是在1850年。他对1848年欧洲革命经验进行总结时，直接了当地指出，“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1]接着，在致魏德迈的信中，马克思进一步把它表述为：“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2]，并且对这个专政的任务作了更为科学而明确的规定。马克思50年代初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科学表述，无疑是他在40年代已经形成的思想的逻辑发展。可以说，《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最初著作，同时也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并奠定了这个学说的理论基础。由于《共产党宣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具体的革命形势”[3]，因而作为指导工人运动的纲领性意见，它就对这个思想作了更明确更集中的表述。接着，在总结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又使之进一步完善化和精确化。历史事实就是如此。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不断地得到验证、丰富和发展，而《德意志意识形态》由于对此起了奠基作用，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最光辉的篇章之一。

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之点”。但这个学说，也只是由于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产生，它才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科学学说。如前所说，马克思在1844年首次提出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观点，但那时并未得到理论论证，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它仍然受着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观点的影响。只是随着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阐明，它才臻于成熟。这时，它不再需要用“人的本质异化”和“扬弃”来说明，而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可以把两者视为同一的东西，一个是目的，一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它们的统一，才构成马克思理论的完整性。在实践上，马克思正是用这个学说，不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7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页。

③ 《列宁选集》第3卷，第189页。

仅教育工人阶级懂得自己的历史任务，而且懂得实现自己任务的根本途径。用列宁的话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①。可见，马克思国家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产生，不仅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而且推动了工人运动由自在阶段发展到自为阶段。

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是实现自身解放的任务，同时也是实现解放全人类的任务。因而，无产阶级只有推翻一切统治，自己才能获得彻底解放，它“只有把一切阶级的个人从那些至今仍然套在他们头上的枷锁下解放出来，才能真正地推翻自己面前的统治阶级”②。因此，无产者只有使一切阶级的个人摆脱政治和经济的桎梏，消灭阶级统治存在的条件，它才能最后获得解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解放全人类作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我们知道，历史上的统治阶级在取得自己的统治以前，也往往把自己装扮成全体人民的代表，把自己阶级的解放任务，说成是“全人类的任务”，但这只能是欺骗，不过是企图利用群众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已。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真正代表，因而也只有它的任务才真正是“全人类的任务”。可见，马克思已完全摆脱了思辨哲学的影响，把这个学说建立在科学和现实阶级关系的基础之上。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形成表明，无论国家关系如何远离它的经济基础，也无论统治阶级如何在国家问题上制造种种思想迷雾，但只要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从由经济原因而产生的阶级利益的对立去考察国家，就能揭示它的实质，推翻唯心主义种种胡说，得出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结论。

---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8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27页。

第四节　对施蒂纳个人无政府主义哲学基础的批判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一次对刚刚创立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作比较全面、系统的阐述的同时，就花了几乎占全书十分之七的篇幅，对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所代表的个人无政府主义的哲学基础进行了深入的批判。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批判，对于深入理解《形态》所阐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

麦克斯·施蒂纳是卡斯帕尔·施米特的笔名，他1806年10月25日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拜洛伊特一个制作长笛牧师的家庭。1826年他进入柏林大学哲学系，中间经过周折于1835年毕业于柏林大学，但毕业论文《论教育法》没有获得通过。

大学期间，他曾听过黑格尔的课并深受其影响。从1842年起，他参加青年黑格尔派，开始自己的著述活动。先后在《莱茵报》、《莱比锡总汇报》、《柏林月刊》等刊物上发表了《关于布·鲍威尔的〈末日的宣告〉》、《爱的国家的若干暂时的东西》等文章，抨击普鲁士当局与教会，反对书报检查制度，表现出他否定确定的道德准则来抬高自我和反对任何国家的思想倾向。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是施蒂纳这一时期思想的集中反映，也是他一生最主要的著作。该书写于1843－1844年。1844年10月由出版商奥托·维干德在德国莱比锡出版（出版标明的日期是1845年）。它既是青年黑格尔派后期的一部重要著作，又是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代表作之一。恩格斯据此称他为“现代无政府主义的

先知"[1]。

全书模仿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立论结构。正如《基督教的本质》分成"宗教之真正的、即本身的本质"和"宗教之不真的（或神学的）本质"两大部分来分别论述神和人，《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分成"人"和"我"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逻辑范围内的历史"，主要通过历史虚构的手法，说明所有意识、道德、宗教、法律、真理、国家、社会、人民、民族、祖国、人类以至世界本身都是旨在通过各种非个人的普遍的东西来奴役压迫个人，都是"否定你自己"。所以，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利己的，利己主义是世界发展的趋势和真理，因而"唯一者"当然是利己主义的。第二部分"历史中的逻辑"，主要通过逻辑虚构的手法，指出了作为"唯一者"我的自我彻底解放的道路，即通过创造性的"我"的自我意识才能"回到你自己那里去"的解放道路，否定各种非个人的普遍的东西对个人的统治和压迫，达到利己主义的我自身——"唯一者"。

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虽然深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但由于施蒂纳的"抛弃自己以外的一切"的主张，与费尔巴哈把人作为类的存在物来崇拜的观点则是矛盾的。所以，他又举起了批判费尔巴哈的旗帜，认为费尔巴哈的人是从上帝那里引来的，带有神学色彩，他的爱是普遍人类之爱，还未上升到利己主义之爱。但是，他的这种批判是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倒退。因为费尔巴哈揭露了宗教是世俗世界的幻想；认为神圣的不是上帝而是爱，而施蒂纳却用幻想中的"唯一者"来代替人类，用爱来取代经验世界，进而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爱而不是现实。

简言之，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哲学基础是极端的唯心主义的唯我论。他从超脱一切、不被任何约束的、绝对自由的主体"唯一者"即"自我"出发，把它看作是世界的核心、万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3页。

物的尺度、真理的标准，而“唯一者”之外的任何事物都不具备真理性，因而实质也是虚幻的、非现实的，凡与“唯一者”相抵触的一切都是应当抛弃的“怪影”和“怪物”。因为“唯一者”“向来就是抛却除自己之外的一切，因为他估价、评价任何东西都不会大于、高于其自身……因为他从自身出发并返回自身”①。

正因为如此，他把导言冠以这样的标题：“我把无当作自己事业的基础。”最后一段话是：

“神的事是神的事业，人的事是‘人’的事业。我的事业不是神的事，不是人的事，也不是真、善、正义和自由等等，而仅仅只是我自己的事，我的事业并非是普通的，而是唯一的，就如同我是唯一的那样。

“对我来说，我是高于一切的。”②

据此，施蒂纳得出了他的个人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在施蒂纳看来，“国家总是只把限制个人、束缚个人和使其服从，使个人臣服于任何一种普遍的东西作为它的目标。”③所以，个人与国家是不共戴天的仇人，“唯一者”必须消灭国家，而这一对国家的消灭，也是公正的，因为“唯一者”是不受一切束缚的世界核心。当然他不承认国家权利的存在，国家的存在只是由于个人对自己的不尊重，随着个人对自己轻视的消失和确立创造性的“我”的自我意识而达到“唯一者”，国家就自然归于消失。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作为青年黑格尔派重要成员的施蒂纳是以激进的“革命”面貌出现的，他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也披上了激进的、批判的和美丽语言的华丽斗篷，从而给人以革命的假象，甚至连恩格斯也一度把他看作是“转向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唯心主义者”，把“唯一者”视为由费尔巴哈的“人”向

---

①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 176 页。

②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 5 页。

③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 246 页。

"经验的人"过渡的中间阶段。只是后来，与马克思通信之后，他才和马克思取得一致意见，认识到《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就是由小资产阶级哲学幻想编织起来的唯心史观的独特体系，并和马克思一起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之作了全面的清算，并在这一清算过程中使刚刚形成的唯物史观得到了具体的应用和深化。

二、对施蒂纳虚构历史的唯心史观的批判

施蒂纳为了给他的个人无政府主义寻求理论基础，把历史归结为"人"的历史，自我意识的历史，怪想的历史，怪物的历史，认为一部人类社会的历史就如同一个人的历史一样，也有着自己的童年、青年和成年。

童年是唯实主义的化身，他犹如儿童迷恋于事物，如贪玩、好奇、喜欢摔破东西和搜索隐蔽的角落，因而他们把事物世界当作真理，热衷于世界事物并受他的束缚，而成为"普通的利己主义者"。

青年是唯心主义的化身，他犹如青年人那样力求掌握并陶醉于真理的思想之中，他们的心灵受到了真理、自由、人类、人等等思想世界光辉形象的鼓舞和照耀，因而把精神看作真理，热衷于精神并受它的束缚而成为"自我牺牲的利己主义者"。

成年是真正利己主义的化身。他犹如成年人那样，既不迷恋于事物，也不迷恋于精神，他们不是把事物世界或思想世界当作真理，而把"我"、即"有形体的精神"作为真理，在"我"身上精神与"我"以及事物世界和思想世界达到了真正的统一，因而"我"就是真理和世界的创造者。因而成年人成了从"我"出发去看待一切的真正利己主义者。

为了使唯实主义、唯心主义和利己主义这个概念具有包罗万象、囊括全部历史的性质，施蒂纳又进一步在人类学和世界历史中各找到了个对应体。这就是，在人类学中童年是黑人，青年是蒙古人，成年是高加索人；在世界历史中童年是古代人，青年是

近代人，成年是完善的人。正是在人类的这一发展中，“人”的发展的唯一结果就是达到唯实主义和唯心主义否定的统一，即达到真正利己主义的完善的人—— “我”、“唯一者”。

在施蒂纳看来，不同历史时期的差别，仅仅是意识的差别，而历史之所以能够向前发展：童年（黑人、古代人）发展为青年（蒙古人、近代人）和完善的人，其推动力完全在于人们的意识。古代人由于探寻世界的真理性，结果发现了它的非真理性，于是古代人就不再把世界看成是真理了，而把精神看成是真理，历史就从童年时代——古代，进入青年时代——近代。同样由于人们不再把精神看成是真理而能按照世界本来面目把握世界，把“我”作为真理，于是历史就进入了“唯一者”的时代。

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入地剖析了这种唯心主义历史观。他们指出：

(一)施蒂纳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把人们关于自己生活的种种幻想和他们的实际生活混淆起来了。他批评青年把自己的热病时的胡想当成真理，当成独立力量。但是他只相信青年的胡想，认为正是这些胡想使青年受奴役并支配历史。“而得出的结论也总是德意志民族的。不仅如此，我们的圣者的想法和教育不只是德国的，而且还完全是柏林的。他让黑格尔哲学扮演的角色也就是黑格尔哲学在柏林所扮演的角色，——施蒂纳把柏林跟世界和世界历史混为一谈了。青年’是一个柏林人；在书中常常碰到的善良的市民是柏林的庸人、啤酒铺的老主顾。从这些前提出发，只能得出局限在狭隘的民族范围和地方范围内的结论。”①

(二)施蒂纳之所以把人们的历史变成自我意识和自我发现的历史，变成观念的历史，变成怪影、怪想和圣物的历史，正是由于他抛开了意识、观念的现实基础。“如果抛开这些观念的现实基础（施蒂纳本来就把它抛开了），这些观念就被了解为意识范围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0- 201页。

内的观念，被了解为人的头脑中的思想了，就从它们的对象性方面被撤回到主观方面来了，就从实体被提升为自我意识了；这些观念就是怪想或固定观念”。施蒂纳之所以把历史时期的差别看成是意识的差别，就在于他看不到产生意识变化的物质变化和社会变化。施蒂纳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完全可以从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矛盾中得到说明：“当前社会的交往形式以及统治阶级的条件同走在前面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愈大，由此产生的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以及它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分裂愈大，那末当初与这种交往形式相适应的意识当然也就愈不真实，也就是说，它不再是与这种交往形式相适应的意识了；这种交往形式中的旧的传统观念(在这些观念中，现实的个人利益往往被说成是普遍的利益)也就愈发下降为唯心的词句、有意识的幻想和有目的的虚伪。但是，这些东西被生活揭穿得愈多，它们对意识本身的作用愈小，那末它们对自身的捍卫也就愈坚决，而这个标准社会的语言也就愈加虚伪，愈加道德化，愈加神圣化。这个社会变得愈虚伪，那末像桑乔这样轻信的人也就愈容易到处发现关于圣物、关于理想的观念。”② 施蒂纳就是这种虚伪的受害者。

(三)施蒂纳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是建立在诡辩基础上的，他为了使历史变成圣物统治的历史，把一切事物变成圣物，首先，把事物看成是与我有差别的、非同一的；然后，再把它说成是与我对立的事物；最后再把与我对立的事物说成是圣物，由此得出一切与我不同的事物、我之外的一切事物都是我的异化，与我处于异化关系。例如，按照施蒂纳的诡辩逻辑，从我不是人民和两者有差别出发，就可以推出人民＝非我，人民的自由＝非我的自由、人民的自由＝我的非自由、人民的自由＝我的不自由。这里明显把与我有差别的、不同一的东西和与我对立的东西等同或者说混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7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1页。

淆了，把人民的自由与我的自由有差别等同于人民的自由与我的自由相对立了。施蒂纳能实现这种推论 (1) 是由于他借助于同位语把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人民”和“非我”等同起来，(2) 是由于他利用“非”具有差别、“不同一”、“对立”等不同含义，把它们当成同义语使用。这就使非我的自由变成了我的不自由，我的自由的否定。施蒂纳通过诡辩把一切事物变成圣物也就为他靠思想去占有世界奠定了基础。既然一切事物都是由人们的迷信所形成的圣物，是人的异化，那末，只要人看到，它不但是人的对象与人对立，还是人的创造物和属于人就行了。在施蒂纳那里，重要的不是现实关系如何和对现实关系进行改造，重要的是如何解释现实。同一事物既可以把它解释为奴役我的圣物，又可以把它解释成我的财产、所有物。当我说这个物是“我的对象”，重点放在“对象”上时，这个物就是圣物。当我说这个物是“我的对象”，重点放在“我的”上时，这个物就是我的财产和所有物。

(四) 施蒂纳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极其脱离现实。由于施蒂纳抛开了现实，抛开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所以，他就不可避免地抛开历史时代、民族、阶级等等。施蒂纳把青年的热病时的胡想当成现实，靠从头脑中挤出这些胡想来改变现实，其实他否定的只是青年头脑中热病时的胡想，根本没有触及现实和作为现实表现的思想范畴。“成人在青年阶段把各种有关皇帝、祖国、国家等等占统治地位的力量和关系的荒谬想法塞进自己的头脑，并且他认识到这些力量和关系仅仅是自己的观念，是自己的‘热病时的胡想’。这个成人，在圣麦克斯看来，只要他把有关这些力量的错误想法从头脑中挤出去，就可以把这些力量真正摧毁。事情恰恰相反：只要他不再用他的幻想的眼镜观察世界，他就得考虑这一世界的实际的相互关系，研究和顺应这些关系。只要他摧毁了他所赋予世界的幻想的形体性，他就会在自己的幻想之外发现世界的真实的形体性。当他认为皇帝的怪影的形体性消失的时候，其实不是皇帝的形体性消失了，而是皇帝的怪影性消失了，这

时他也就可以领教皇帝的全部实权了。……成为成人的青年，甚至没有批判地对待那些对别人也有效并作为范畴流行的思想，他只是批判作为‘纯粹是他的头脑的产物’的思想，即在他头脑中再现的关于现存关系的一般观念。例如，他甚至没有取消‘祖国’这个范畴，而只是取消他对这个范畴的个人想法，这样一来，有普遍意义的范畴仍然有效；甚至在‘哲学思维’的领域中，工作还刚刚开始。”①

（五）施蒂纳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严重歪曲历史。内容丰富的历史在施蒂纳那里变成了人的认识史、哲学史，而且是黑格尔所理解的哲学史。历史事实在施蒂纳那里总是头足倒置，明明是古代世界的解体引起人们去探寻古代世界的真理性，可是在施蒂纳看来，却是这种探寻成了古代世界解体的原因。在罗马世界，明明是客观的流浪生涯使旅客成为基督教徒，可是在施蒂纳看来，却是基督教使世上的旅客成为流浪者。施蒂纳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基本方法是儿子生父亲，后生的东西影响先有的东西。正是基于这种方法，它总是把历史的最新结果看成是它们以前的历史的目的，用它说明它以前的历史，把它以前的历史看成为了实现它而存在的。例如宣布基督教的目的是实现人，地产制度的目的是羊吃人等等。于是它以前的历史，例如地产制度、基督教就获得奇异的从未有过的面貌，似乎被说明了。其实什么也没有说明，他把对历史的认识变成了简单的套语。施蒂纳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把一切事物都归结为圣物，归结为迷信，看成是圣物的表现，迷信的产物。这样，认识的任务就在于指出事物是圣物，无须研究其具体规定性，然而正是事物的具体规定性决定事物，其结果是事物的特殊本质、事物间的差别被抹杀了。

（六）施蒂纳唯心主义历史观所得出的结论是非常保守的，它不是要改变世界，而是要通过对现实的不同的解释来维护现实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126 页。

界。他号召人们不要把圣物看成是凌驾于他们之上的力量，把自己看成奴隶，而要把自己看成是唯一独立的力量，把一切事物看成是自己的创造物和所有物，自己的财产。认为只要这样，人们就可以成为世界的主人，占有世界了。其实这种作法不仅不能改变世界，而且是以另一种方式承认不合理的世界。按照这种方法，一个人没有饭吃，被迫挨饿，只要他把饥饿看成是自己的本性和所有物，他就成了饥饿的主人，摆脱了饥饿的压迫。这个人饿死了，不是由于他没有食物，而是由于他拥有饥饿的本性。一个人无力改变宗教和国家的压迫，只要他宣布信仰宗教和从事政治活动是他的本性和所有物，他是他的这些属性和所有物的主人就行了。特别荒谬的是施蒂纳还把凡是与他的感官相联系的，作为他的感觉的对象都说成是他的所有物和财富。按这种逻辑，一个人嗅到了鸡味，鸡就成了他的所有物和财产。一个人挨了毒打，作为他的四肢、他的感觉对象的这顿毒打，就成了他的所有物和财产。施蒂纳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充满了豪言壮语，但与这些豪言壮语相适应的正是这些保守的结论。

（七）施蒂纳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基本上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翻版。施蒂纳颠倒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思辨方法也抄自黑格尔，他甚至照搬黑格尔关于历史分期的某些思想。“这种关于人生阶段的全部虚构的原型，早就在黑格尔‘哲学全书’第三部中出现过，而它的‘各种转变’也在黑格尔著作的其他地方出现过。”① 施蒂纳在很多具体问题上的观点也是抄自黑格尔。“黑格尔（1）把法国革命看作是这种精神的统治的新的更完备的阶段；（2）认为哲学家是19世纪世界的统治者；（3）肯定现在人们中间只有抽象思想在统治着；（4）在他那里，婚姻、家庭、国家、自力所得、市民秩序、财产等等已被看作是‘神的和神圣的东西’，已被看作是‘宗教的东西’了；（5）作为世俗化了的神圣性或神圣化了的世俗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30页。

生活的道德被描写成精神统治世界的最高形式和最后形式，——所有这一切都是‘施蒂纳’所逐字逐句重复的东西。”①

(八)施蒂纳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是德国现实在小资产阶级头脑中的反映，具有明显的民族狭隘性和阶级局限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施蒂纳的“唯一的历史起初发生在雅典斯多葛学派中，后来几乎完全发生在德国，最后则发生在柏林的库弗尔格拉班，即‘近代哲学或者近代’的暴君建立了自己的城堡之处。由此已经可以看出，这里谈的完全是民族的和地方的事情。圣麦克斯并没有对世界史而是对德国的神学和哲学的历史作了一些解释”②。

三、对施蒂纳唯心主义国家观的剖析

对国家、法的曲解是施蒂纳唯心主义国家观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入批判了施蒂纳的唯心主义观点，进一步论证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国家、法与私有财产关系的原理。

施蒂纳认为，国家是凌驾于现实经济基础之上的权力，私有财产只有靠法的恩惠才能存在。他说：“财产问题只决定于政权，既然只有国家是掌权者，……那末只有国家才是所有者。”③“国家拥有工厂是根据所有权，而厂主拥有工厂则只是根据采邑权和占有权。”④ 例如，对我的财产的继承就决定于继承法的存在，这就完全颠倒了国家、法与私有财产的真实关系。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经济关系在社会中的基础地位，说明了经济关系是财产关系的本质内容，因为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所以，只能是财产关系所体现的、与一定生产力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每一个社会的基础并决定其国家与法，而不会相反。马克思恩格斯说：“在资产阶级统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89–19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0页。
③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11页。
④ 转引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13页。

下和在其它一切时代一样，财产是和一定的条件，首先是同以生产力和交往的发展程度为转移的经济条件有联系的，而这种经济条件必然会在政治上和法律上表现出来”①。针对施蒂纳把继承法作为他关于私有财产依赖于法的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反驳说，继承法的产生，是由于生产力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而积累了相当多的剩余产品并形成了一夫一妻制家庭的结果，因而“继承法最清楚地说明了法对于生产关系的依存性”②。

其次，揭露了施蒂纳唯心主义国家观的阶级、社会、认识根源。

就阶级根源而言，这是小资产阶级关于国家万能的幻想造成的，在实质上，资产阶级国家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看家狗。因为资产阶级是经济上为统治阶级的阶级，而它赋予国家的权力则限于维护其本阶级共同利益的范围之内。马克思和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者、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成员被迫结合成 我们，、法人、国家，以便保证他们的共同利益，并把由此获得的集体权力赋予——由于分工需要这样做——少数人”③。

就社会根源而言，这是由分工造成的。因为在分工的范围内，这些关系造成了一种超越现实关系的假象，再加上一切现实的生产关系只能通过概念形式反映出来，换言之，“一切关系表现在语言里只能是概念”，从而造成了对概念神秘力量的崇拜。施蒂纳正是由此把私有财产归结为合法财产，把合法财产归结为法的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地指出:“分工的结果使政治家和法学家注定要崇拜概念并认为一切实际的财产关系的真实基础不是生产关系，而是这些概念”④。

就认识根源而言，这是颠倒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而造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1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2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1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21页。

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国家是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而统治阶级的“由其财产状况产生的社会权力，每一次都在相应的国家形式中获得实践的观念的表现”①。而施蒂纳在把握经济基础与国家的关系时，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财产关系的经济内容上，而是集中在其法律表现上，进而把后者当作国家的实质，这就唯心主义地颠倒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

最后，揭露了施蒂纳唯心主义国家观的反动实质及其空想性质。

施蒂纳企图在保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消灭资产阶级国家。例如，施蒂纳针对资本主义劳动奴隶制，认为只要消灭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就能获得自由。但他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国家正是建立在这种“自由劳动”，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剥削制度之上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针锋相对地指出:“现代国家、即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建立在劳动的自由之上的。……劳动的自由是工人彼此之间的自由竞争。……劳动在所有文明国家中已经是自由的了；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解放劳动，而在于消灭这种自由的劳动。”② 施蒂纳思想的实质，是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

施蒂纳把国家看作是与个人不可调和的仇敌，主张利己主义的个人否定一切权威。他说：“什么对我来说是正当的，那么它就是正当的。……而如若某物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是不正当的，对我来说却可能是正当的，这就叫做我喜好某物，而根本不管整个世界。”③ 所以，他主张消灭国家，代之以一种建立在利己主义爱(设定自我)的原则之上的。“利己主义者的联合”。然而，这只能是“那些想变成真正资产者的现代德国小资产者的期望”④ 和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23－224页。

③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20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1页。

想。因为国家是现实经济关系的表现，这些关系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只要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使竞争成为多余的东西，因而还这样或那样地不断产生竞争，那么，尽管被统治阶级有消灭竞争、消灭国家和法律的'意志'，然而它们所想的毕竟是一种不可能的事。"①

四、批判施蒂纳对共产主义的曲解

施蒂纳对共产主义（他歪曲为政治自由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和人道自由主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批判更清楚地暴露了他的哲学思想的唯心主义性质及其狭隘民族性和阶级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些批判的批判，更进一步表明了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

施蒂纳不了解政治自由主义，他把政治自由主义看成是资产阶级的理想，是圣物。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施蒂纳的这些观点，他们指出：

（一）法国的政治自由主义是以物质利益和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为基础的，是资产阶级现实利益的理论表现。施蒂纳不懂得这一点。他不从自由主义与它所由产生的并赖以存在的现实利益的联系上去理解自由主义。

（二）德国的自由主义是法国的政治自由主义在德国的表现，康德哲学就是以现实的阶级利益为基础的法国自由主义在德国的表现。康德哲学把法国自由主义理论和它所表达的利益割裂开来，把法国资产阶级的意志变成自由意志，把由物质动机决定的意志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法国的自由主义者追求现实的政治经济利益，而康德则以善良意志为理想，"哪怕这个善良意志毫无效果他也心安理得，他把这个善良意志的实现以及它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78页。

与个人的需要和欲望之间的协调都推到彼岸世界”①。施蒂纳只知道德国的自由主义，并把法国自由主义当成了德国自由主义，把它变成了纯粹理念的产物。

（三）德国的自由主义有其深刻的社会阶级根源和理论根源。当时德国的经济、政治都比较落后。经济上，在英国已被排挤掉了的亚麻纺织工厂，亦即以脚踏车和手织机为基础的工业还在起作用，几乎全部贸易都受荷兰控制。与这种经济状况相适应，德国资产阶级的发展软弱无力，没有共同的利益，只有分散的小眼小孔的利益，与这种经济落后、利益分散的状况相适应，政治上也不集中，国家分裂为许多小公国和帝国自由市。因此，在德国，既谈不上等级也谈不上阶级，顶多只能谈已属过去的等级和尚未形成的阶级，每一个生活领域都软弱无力，不能获得绝对统治。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国家构成了貌似独立的力量，产生了循规蹈矩的官僚意识，关于国家的幻想，以及德国理论家不依赖市民的虚假独立性。“七月革命从外面迫使德国人接受适合于发展成熟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形式。由于德国的经济关系还远远没有达到与这些政治形式相适应的发展阶段，所以市民们只把这些形式当作抽象观念、自在和自为的原则、虔诚的心愿和词句、康德式的意志的自我规定和市民们所应该成为的那种人的自我规定”②。施蒂纳看不到法国自由主义与现实的阶级利益的联系，正是由于他局限于德国范围，没有超出德国市民的眼界。也是由于他不懂得一个阶级的理论家对这个阶级的真实关系，而为其表面矛盾的假象所迷惑。

施蒂纳也不理解共产主义，为贬低共产主义，他把它称作社会自由主义，使之与在德国名声不好的自由主义相联系，并且对共产主义进行肆意歪曲和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施蒂纳的歪曲和攻击归结为两类，一类是逻辑虚构，一类是历史虚构。施蒂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11－21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14页。

对共产主义的逻辑虚构有如下表现：

占有财产总是特定的占有，例如，作为地主、食利者、商人、工厂主或工人的占有。共产主义否定私有者对财产的占有，而施蒂纳却把否定私有者的占有说成否定一般占有，并认为把财产归于社会之后，社会的成员就都变成了乞丐和游民。

共产主义否定私有者的占有，主要是对剥削他人的资产者进行剥夺，是对资产者掠夺到的东西的彻底掠夺。可是施蒂纳却认定共产主义是对个人进行的第二次掠夺。

共产主义否定私有者的占有，它当然不会抽象地谈人应占有多少财产问题。可是施蒂纳却认定共产主义提出了这个间题。并要求共产主义按“我能占有多少，就得有多少”来解决这个问题。

资产阶级人权的实质是私有财产权，它与特权、优先权不同。特权、优先权符合于与等级相联系的私有制，而人权符合于竞争、自由私有制的状态。从人权所得出的公理似乎能导向共产主义，实质上是私有制的公理，所以共产主义对人权持批判态度。而施蒂纳却说：“按照共产主义者的意见，每个人应该享有永久的人权。”①

共产主义者批判现存社会，而施蒂纳却认定共产主义者总是在国家中寻找过错，其实在国家中寻找过错，认为是国家赋予资产阶级以财产，使劳动人民陷于贫困的正是他。共产主义主张改变现存社会，施蒂纳却说共产主义者要发现真正的社会。共产主义者在革命活动中，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改变自身。施蒂纳却认为人应当从自身寻找社会不好的原因，“当组成和构成社会的那些人依然是旧人的时候，社会就不能更新”②。按照这种逻辑，现实的人需要改变的不是现实，而是自身。那些使社会革命化，并把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置于新的基础之上，置于新的生活方式之上

---

①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228 页。

②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234 页。

的共产主义者依然是旧人。其实，只有当他们不改变环境，只在自身中寻找过错时，他们才是旧人。

共产主义是用实际手段来追求实际目的的最实际的运动，它只是在德国为了反对德国哲学家，才会稍微研究一下本质问题，而施蒂纳却认为共产主义是从寻找本质开始的。他从人的本质是彼此相互依存出发，推导出人只有靠他人而生存，作为工人而生存，共产主义是个普遍劳动的王国，应当工资平等，并把这一切强加给共产主义者，说成是共产主义者的主张。这样一来，他就把通过平分和雇佣劳动这两种形式表现出来的私有制带进了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主张消灭食利者的幸福，施蒂纳则笼统地认为共产主义主张大家幸福。大家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神圣的幸福。他甚至认为大家幸福和消灭食利者的幸福是矛盾的。这实质上是让无产阶级安心地受食利者、商人和实业家等等的永久剥削，因为共产主义不消灭食利者的幸福，就不能消灭这种剥削。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施蒂纳的逻辑虚构的批判，主要是揭露施蒂纳如何把资产阶级的东西歪曲为共产主义的东西，或者说如何从资产阶级观念出发去理解共产主义，篡改共产主义的性质和内容。

施蒂纳对共产主义的历史虚构主要表现如下：

施蒂纳虚构被压迫阶级发展的历史。例如，工人发展的历史本来是从事斗争的历史，“过去的工人起义的形式都是与劳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以及由此决定的所有制形式联系在一起的；直接或间接的共产主义起义则是与大工业联系在一起的。”① 施蒂纳则把被压迫阶级发展的历史歪曲为从能忍耐的被压迫阶级转化为不能忍耐的被压迫阶级的历史。施蒂纳不去研究被压迫阶级发展的复杂过程和斗争的阶段，却虚构什么能忍耐的和不能忍耐的被压迫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42页。

阶级，这就舍本逐末了。

施蒂纳虚构资产阶级的历史。他认为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追求“物质享乐”。其实，“根据物质的历史，是贵族第一次用世俗享乐的福音代替了福音的享乐；而清醒的资产阶级先是辛辛苦苦地劳动，并且非常机智地去使贵族得到资产阶级自己的法律所禁止自己得到的享乐（同时贵族的权力通过金钱的形式落入资产者的口袋中了）。”①

施蒂纳虚构资产阶级解放性质。资产阶级解放是使资产阶级从同业工会、行会、等级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可是施蒂纳却说资产阶级是从“个别人的命令和专横下解放出来”，并使整个社会的群众从个别人的命令和专横下解放出来，其实，它只是取消了个别封建统治者的命令和专横，却代之以具有粗野的物质形式的命令和专横，即资产者对工人实行命令和专横，这种命令和专横不再受集中于君主、贵族和同业工会手中的政治权力的限制，至多只受反映在资产阶级法律中的整个资产阶级的一般利益的限制。

资产阶级解放所形成的资产阶级制度下的各种关系，是共产主义的现实基础。施蒂纳则把它歪曲为“各种情况的偶然性”，以此取消共产主义的现实基础。施蒂纳还虚构农奴制与共产主义的联系。共产主义是大工业的产物，可是施蒂纳却直接从农奴制的废除中引申出共产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施蒂纳历史虚构的批判，主要是揭露施蒂纳如何歪曲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现实基础。

施蒂纳还创造了“新的”剥削理论：“别针工厂的每个工人只做别针的一部分，他把自己做成的一部分交到别的工人手里，并被这位别的工人利用、剥削。”② 这种理论歪曲了工人受剥削的根源，认为工人受剥削是由于他从事局部工作。从此出发，他认为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243 页。

②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247 页。

共产主义的目的在于使人成为工作中的能手,能完成整体工作。具体地说,当人不是只制造别针头,而能制造整个别针时,他就满足了,共产主义的目的就达到了,这是对共产主义的严重歪曲。

共产主义主张消灭私有财产,而施蒂纳把私有财产变成财产的概念,利用"财产"和"自有的"这两词的字源学上的联系,把"自有的"这个词说成是永恒真理,从而把"财产"、"私有财产"说成是永恒的。例如,在共产主义也会发生胃痛这样的事,即也会有"自有的东西",所以在共产主义也会有"私有财产"。其实,"私有财产"和"自有的"东西不是一回事。"私有财产"是可以买卖的东西,它能使我支配他人的劳动,而"自有的"东西不一定具有这一特性。"私有财产"不仅夺去人的个性也夺去物的特性,它不是物的固有的特性,而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地租、利润等这些私有财产的现实存在形式是与生产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社会关系"①。它与个人的独特性很少有共同点,甚至还直接与个人的独特性相对立。无产者没有私有财产,他们并未丧失个比,相反,正是在他们之中个性发展得最为强烈。

施蒂纳也不了解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无神论思想。费尔巴哈反对宗教,把上帝归结为人的本质,归结为爱,认为上帝是人的本质的虚幻的表现,是人类之爱的异化。施蒂纳认为费尔巴哈的反宗教斗争没有超出宗教,把上帝归结为人的本质,崇拜人的本质,和崇拜上帝是一样的。因为人的本质不是人本身,所以把它看作在人之外并把它看成是"神",或者把它看作在人之内并称之为"人的本质",这完全一样。于是,他开展了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斗争。这个斗争充分暴露了施蒂纳哲学的唯心主义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施蒂纳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批判。他们指出:

(一)施蒂纳形式上反对费尔巴哈,实际上他无条件地接受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55页。

费尔巴哈的幻想。费尔巴哈把上帝归结为人的本质，归结为“爱”，神圣的不是上帝而是“爱”。施蒂纳就真的相信爱是统治世界，爱是圣物。并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爱”。他“所反对的不是物质关系的现实形式，甚至也不是作为实际上拘泥于现代世界的人们对这些物质关系所怀的世俗幻想，而是这些世俗关系的天国精炼品，即上帝的宾词、神的流出、天使”①。

（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有积极意义，应该沿着费尔巴哈指示的方向前进。施蒂纳所做的同他责备费尔巴哈所作的完全相同，而且比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更带有幻想性质。费尔巴哈揭露了宗教世界是世俗世界的幻想，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人们是怎样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这个间题推动人们去研究现实，开辟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而施蒂纳却不是这样，他用“爱”来代替经验世界，这就使他更加脱离现实。费尔巴哈虽然过分地强调了反宗教斗争的意义，他还是看到了上帝是幻想的产物和力量，而施蒂纳却把“爱”看成是统治世界的现实力量。费尔巴哈还有反宗教是反对某种幻想的思想，而施蒂纳则不把反对“爱”的斗争看成是反对某种幻想的斗争，而是看成反对现实的斗争。

五、对施蒂纳利己主义思想的揭露

施蒂纳的无政府主义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国家观基础之上的个人无政府主义，他是从否定一切的极端利己主义的“唯一者”出发，得出他的无政府主义的结论的。因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施蒂纳唯心主义国家观作批判的过程中，不能不剖析他的绝对利己主义。

施蒂纳的绝对利己主义主要包括以下的主要观点：(1) 从横向上，利己主义笼罩着整个世界，神、人类、君主、祖国、善、正义、心灵等等的事业都是利己主义的，而个人只是它们的工具。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261 页。

以，与其继续无私地为这些大利己主义者服务，不如个人自己当利己主义者。因为神和人类都不关心别的，只关心它们自己，让我也同样关心我自己吧——我自己和神一样，不是其他任何人的什么。我自己是我的一切，我自己就是唯一者。(2) 从纵向上看，利己主义论述了“通常理解的利己主义”、“自我牺牲的利己主义”达到“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而前二者并不是真正的利己主义，而只有第三者才是“真正的利己主义”。因为只有它才是前二者的“否定的统一”和存在与本质的统一，才是全部历史的目的、使命、真理、概念等等，从而也是达到利己主义意识的“我”和“唯一者”。(3) 从总体上看，利己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现实生活中的最高真理，随着“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这个历史最高阶段的到来，必将是由“唯一者”通过“爱”的联合而否定国家和一切权威。

施蒂纳绝对利己主义理论的根本错误在于颠倒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主张意识决定生活。他从意识决定人的本质出发，而不是从一定历史时代的、由经济条件所决定的现实的个人和他们的社会关系出发，去揭示意识的本质，因而他只能把利己主义的自我意识作为衡量利己主义者的标准，并以此去规定利己主义的历史发展，认为“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同“通常理解的利己主义”和“自我牺牲的利己主义”的区别是由意识决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对之作了深刻的批判。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你们的意识也就属于什么。而且，因为你们是利己主义者，所以你们也就具有与你们的利己主义相符合的意识”①。个人的欲望和特性“不决定于意识，而决定于存在；不决定于思维，而决定于生活；这决定于个人生活的经验发展和表现，这两者又决定于社会关系。”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279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295 页。

所以，施蒂纳所说的“通常理解的利己主义”和“自我牺牲的利己主义”产生的原因，并不在于它们对利己主义的自我意识认识程度的不同以及现象与本质的不相符合，而在于它们都是一种历史性观念，起源于人类共同利益的分裂。这是因为，个人利益总是要违反个人的意志而发展为阶级利益，发展为共同利益，从而取得独立性的外观；反之，这种取得独立性外观的共同利益又与真正的个人利益发生矛盾。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个人利益变为阶级利益而获得独立存在的这个过程中，个人的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物化、异化，同时又表现为不依赖于个人的、通过交往而形成的力量，从而个人的行为转化为社会关系，转化为某些力量，决定着和管制着个人，因此这些力量在观念中就成为‘神圣的’力量”①。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这种区分只是在现存在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范围内才有意义，至于由历史发展的特殊条件和分工所决定的个人是较多地代表利己主义者这一面，还是较多地代表利己主义者那一面，“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时代内对一定的个人提出，才可能具有任何一点意义。否则这种问题的提出只能导致在道德上虚伪骗人的江湖话。”② 这就是说，不仅意识的发展方向和程度决定于客观对象，而且个人的意识发展的方向和程度也取决于个人的物质发展条件，而“通常理解的利己主义”和“自我牺牲的利己主义”思维发展的片面性，也只能由物质发展条件的限制以及阶级的局限性所造成而决不会相反。对此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正因为思维（以思维为例）是这一确定的个人的思维，所以这个思维就是他的由他的个性和他在其中生活的那些关系所决定的思维”③。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6页。

针对施蒂纳把个人利益与普遍利益绝对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和独断主义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阐明了这两者的辩证关系和对历史条件的依赖关系。他们指出："个别人的私人利益和所谓普遍利益，总是互相伴随的。"① 因为这种对立的一面，即所谓普遍的一面，总是不断地由私人利益的一面产生的，它决不是作为一种具有独立历史的独立力量而与私人利益相对抗，所以这种对立在实践中总是产生了消灭，消灭了又产生。因此，我们在这儿见到的不是黑格尔式的对立面的"否定统一"，而是过去由物质条件所决定的个人生存方式又由物质条件的发展决定其消灭，随着这种生存方式的消灭，这种对立连同它的统一也同时跟着消灭。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了共产主义者对这个问题应有的科学态度是：在实践上"共产主义者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在理论上，共产主义"既不是从那情感的形式，也不是从那夸张的思想形式去领会这个对立，而是在于揭示这个对立的物质根源，随着物质根源的消灭，这种对立自然而然也就消灭"。因此，"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例如你们应该彼此互爱呀，不要做利己主义者呀等等"②。

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揭露了施蒂纳个人利己主义的理论来源，他指出："爱尔维修和边沁是要向资产者先生们证明，他们目光短浅，实际上是危害着自己，而圣麦克斯'自己的'把戏却在于向他们证明，这些资产者不符合利己主义的'理想'、'概念'、'本质'、'使命'等，并且不是作为自己的绝对否定来对待自己。这里，在他的头脑里出现的仍然是那个德国的小资产者。"③ 这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有的资产者表现为直接的贪得无厌的利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2—27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1页。

己主义者，有的现象上表现为“有教养的”虚伪的利己主义者，而施蒂纳却企图从“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原则出发否定现实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代之以小资产阶级关于利己主义的幻想，在实质上是爱尔维修和边沁对资产阶级理论批判的翻版。

总之，对施蒂纳个人利己主义的批判，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化了自己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强调了不是原则创造生活，而是生活创造原则，揭露了施蒂纳“唯一者”的非科学性和虚伪性，这就搞掉了他个人无政府主义的基础，从而有力地说明了施蒂纳的利己主义者的联合只不过幻想地“表达了那些想变成真正资产者的现代德国小资产者的期望”①。

第五节　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

“真正的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同科学社会主义相对立，在政治上起了反对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反动作用。它从1844年起，像瘟疫一样在德国传播开来，1845年以后又通过格律恩、克利盖等人传入国际工人组织“正义者同盟”，成为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健康发展的重大障碍。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它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不仅深化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刚刚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而且表明他们自己同从前信仰过的那种哲学彻底划清了界限。

一、“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特征和阶级实质

“真正的社会主义”是19世纪40年代流行于德国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莫斯泽·赫斯、卡尔·格律恩、奥托·吕宁、弗里德里希·施纳克、海尔曼·皮特曼和海尔曼·克利盖等。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1页。

“真正的社会主义”虽然也批评资本主义，但他们并不是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而是用小资产阶级的眼光看问题。他们崇尚小土地所有制，把小生产者的生活当作社会主义的理想。因此，在当时德国封建主义尚未铲除的情况下，它既俱怕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而主张在社会各阶层的合作，特别是上层社会的资助下，通过平均分配土地的办法，使小生产者摆脱剥削，达到共同富裕，就可以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种梦想就像梦想把一切人变成帝王和教皇一样，既无法实现，也不是共产主义的。”①

“真正的社会主义”在理论上的基本特征，是把英国和法国的某些共产主义思想和德国的哲学前提混为一团，企图用德国的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意识形态来阐明英、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的思想，“用真正的、绝对的意识即德国哲学的意识的尺度来衡量”这些思想，于是他们就把各个具体的一定的个人间的关系变成“人”的关系，把这些一定的个人关于他们自身的思想变成关于“人”的思想，离开实在的历史基础而转到思想基础上去。“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他们当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俘虏，根本不懂得英、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现实运动的表现和产物，“是以一定国家里的一定阶级的生活条件的总和为基础的”②。由于他们把英、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当作纯粹思想的产物，“同时又由于他们不知道现实的联系，所以他们也就很容易用 绝对的’或者另外的思想方法虚构出幻想的联系。”③“这样任意捏造共产主义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也就形成了所谓 真正的社会主义 ”④。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本质上是无产阶级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3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36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36页。

的共产主义和英国、法国那些或多或少同它相近的党派在德国人的精神太空和德国人的心灵太空的变形。真正的社会主义硬要人们相信它是以“科学”为基础的，其实它本身是一种神秘的学说，在理论上诉诸思维着的精神，在公开宣传中诉诸心灵。“它所关心的既然已经不是实在的人而是‘人’，所以它就丧失了一切革命热情，它就不是宣扬革命热情，而是宣扬对于人们的普遍的爱了”①。这就表明“真正的社会主义”根本不是无产者的学说，而是抱有博爱幻想的小资产者以及小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意识。因而它也不得不愈来愈多地只在小资产者中间寻找自己的群众，而在那些萎靡和堕落的著作家中寻找这些群众的代表。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分析了德国产生“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历史原因。他们指出，由于当时德国事实上存在着的各种关系，还没有达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那种尖锐的阶级对立，所以不可避免地形成这个中间派别，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想把共产主义和流行观念调和起来的企图。同时，由于德国原来没有现实的、激烈的、实际的党派斗争，德国人在开始时甚至把社会运动也变成了纯粹的文学运动。“‘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这种社会文学运动的最完全的表现”②。

二、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的剖析

“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德国的思辨哲学，特别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和以“爱”为最高原则的伦理学。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派别，是“从赫斯的‘哲学’开始的”③。赫斯从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3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3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50页。

出发，认为人的本质的异化不仅表现在宗教上，而且也表现在经济领域中，资本主义社会的货币和金钱就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因此他就把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和法国共产主义思想结合起来，用费尔巴哈的原则和方法来批判资本主义，主张用共产主义去代替资本主义，从而建立起他的哲学共产主义学说，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正因为如此，“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都和费尔巴哈一样，从抽象的“人”出发去说明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变迁，认为只有人道主义世界观才能开辟人类未来生活的道路；也和费尔巴哈一样，把“爱”当作随时随地都可以创造奇迹的神，认为通过一切阶级的彼此相爱的、合乎理性的行为，就能改变现实的社会关系，建立起“爱的王国”、“爱的世界”。恩格斯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实际上正是费尔巴哈哲学的两个缺陷：“它以美文学的词句代替了科学的认识，主张靠‘爱’来实现人类的解放，而不主张用经济上改革生产的办法来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一句话，它沉溺在令人厌恶的美文学和泛爱的空谈中了。”①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也毫不隐讳地把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作为他们理论的哲学依据，宣称他们的最高原则就是人道主义。他们在谈到法国的共产主义和德国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区别时说：“法国人通过政治走向共产主义；德国人通过最后变成人类学的形而上学走向社会主义”②。他们责难法国的共产主义“没有超越政治上的对立”，“没有达到无条件的、无前提的自由”，把人“引导到对粗暴的物质的依赖”，“人不能达到自由的道德活动”，总之就是没有帮助“人”意识到“自己的本质”。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对于法国人的一切责难就在于：法国人没有以费尔巴哈的哲学作为自己的整个运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8页。

②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39－540页。

动的最高原则。”①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既然自称摆脱了“对粗暴的物质的依赖”而诉诸“人的本质”和“自由活动”，因而他们不仅指责了法国的共产主义，而且对其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也一概加上“独断独裁”的罪名予以否定。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② 只是宣布所有这些体系都是独断的和独裁性的，这丝毫没有说明共产主义体系的基础和内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虽然自称已经摆脱对物质的依赖性，其实，他们也“只能从他们出身的那个等级的生活条件中攫取自己体系的基础”，他们的思想体系不过是“法国思想在受小手工业关系限制的那种世界观范围内的复制”而已。

“真正的社会主义”为了装饰门面，有时也转向现实。但它不能真实地说明现实，总是歪曲现实。他们从抽象的“人”出发，撇开一切现实的社会关系，用虚构的“人的本质”同“现在的社会”对立。例如，“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泽米希认为，“活动和享乐在人的特性中是一致的。二者都是由这种特性来决定的，而不是由我们之外的产品来决定的。”④但是，现在的社会“野蛮化”了：一些人由于游手好闲而让自己“固有本质”腐化了；另一些人的“固有本质”则由于“被迫像机器一样地工作”而丧失了，于是出现了食利者和无产者的两极对立，这“二者都依赖于他们之外的物”。而赫斯对政治幻想的批判“摧毁了资产”，使人认识到自己的本质，于是就结束了人的生活分裂，产生了真正人的生活，使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1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4页。

①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5页。

人重新恢复了自己的尊严。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这种对于现代社会的唯心主义的歪曲。他们指出，从抽象的“人”和“人的本质”出发，是不可能对社会问题作出科学分析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根本不能回答如何从“劳动和享受的一致”转变到现代社会，也不能说明为什么现在的社会会“野蛮”起来。“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是研究各个不同阶段的食利者和无产者的对立，而是把无产者和食利者发展的完全不同阶段变成“一个发展阶段”；不是从分析现存社会中看出“我们社会中的两极”，而是从抽象的食利者和无产者的对立中看出“我们社会中的两极”，这不过是重复(历史上)所有道德论者的陈词滥调。针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谓由“人的特性”决定劳动和享受的一致，而不决定于我们之外的物的谬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事情恰恰相反，人的特性是他们的活动和被活动所制约的享乐方式的结果。如果这种观点的鼓吹者到周围的活动和享乐中间寻找这个特性，那么，“他很快就会看到我们之外的产品在这里也在起着多么大的作用”①。而所谓“不决定于我们之外的物”的自由活动，是一种纯粹抽象的活动，不过是“纯粹思维”的幻想；作为这种纯粹活动的基础的主体，决不可能是实在的有感觉的人，只能是思维着的精神。至于赫斯用批判“摧毁了资产”，则更表明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理论的思辨唯心主义本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既然他们充满了关于概念能够创造世界和毁灭世界这一哲学信念，他们当然也就会认为某一个人能够通过消灭某种概念而消灭生活的分裂。”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对现代社会的唯心主义歪曲的同时，还通过对马特伊的论文的剖析，揭露了他们借以杜撰未来社会图景的哲学理论和方法。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理论特点是用德国思辨哲学去解释法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51页。

国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而他们惯用的基本方法之一，就是首先把自然界加以神秘理解，然后根据人和自然的一致，从自然界得出关于人和社会的结论。例如“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首先假定在自然界中一切生物的生命活动和幸福、享乐是统一的，然后根据人与自然有共同性，论证人的生命活动与幸福和享乐也应该一致，不需要在彼岸世界中寻找自己的幸福。其实，自然界不仅存在统一，也存在着斗争，生物的生命活动有的表现为幸福、享乐，有的也表现为受压抑、受摧残。“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自然观是虚构的、神秘的。自然界和人所共有的特性乃是一种内聚性、不可入性、体积、重量等等，从这里推不出反对人在彼岸世界寻找自己的幸福的理由。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就是用这种方法来解释法国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建立他们的“社会主义建筑”的。

法国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曾强调社会应保证所有的人的天资得到最自由的发展。“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则宣称自然界是一切生命的基础，单个的生命在生命的总和中找到自己的基础、自己的泉源和养料。像单个植物要求土壤、热度、阳光、空气和雨水来生长枝叶、花朵和果实一样，人也想在社会中寻找全面发展和满足自己的一切要求、倾向和天资的条件，像自然界给生物以养料和生存基础一样，社会应当赋予人们以争取自己幸福的机会。这样，圣西门的思想就借助于空洞的类比、借助于“个别性”和“普遍性”两个范畴，得到了论证。但是由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满足于这种空洞的类比，就不能深入考察社会历史的发展，也不清楚为什么在任何时代社会都不是自然界的正确反映，都与自然界不一致。由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是从社会的现实发展引出单个人对社会的要求，而是从个别性和普遍性的虚构的相互关系引出单个人的要求，这个要求就变成了胡说八道，变成了两个相互矛盾的要求：一方面要求构成社会的个人保持自己的现在的样子，一方面要求社会来一个只有在人们自身发生变化后才会发生的变化。

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主张平等、团结、利益一致，“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则宣称个人既有其特殊的本质使他和其他的个人相对立，又有其普遍的本性使他和其他的个人相等。“因此，承认人类平等，承认每个人生存的权利，是以一切人所共有的对人的本性的意识为基础的”。这样，借助于人的普遍本性，法国社会主义的平等思想又得到了论证。但是这种论证把一切人所共有的关系看成了“人的本质”的产物，人的本性的产物，“而实际上，这些关系像对平等的意识一样是历史的产物”①。“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宣称，他们对未来社会的这种论证，是以“对人类自然联系和一致的感觉”为基础的。其实，无论“封建义务”也好，奴隶制也好，或者历来的一切的社会不平等的现象也好，都是以这个“自然联系”为基础的。“这种‘人类自然联系’是每天都在被人们改造着的历史产物，这种产物向来都是十分自然的，——虽然它不仅在‘人’看来，而且在任何一个革命的后代看来，都会显得多么惨无人道和违反自然。”②“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还标榜未来的社会是一种“以对内在人类本性的意识即理性为基础”的理想的真正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因而，这种社会是以意识的意识、思维的思维为基础的。”③这样，他们就在表达方法上也和思辨哲学家没有区别了。“他忘记了：不管是人们的‘内在本性’，或者是人们的对这种本性的‘意识’，即‘他们的‘理性’，向来都是历史的产物”④。

法国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想用诱人的劳动来代替现今的使人厌恶的劳动。“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则假定生活在自己的每一个表现中都应当提供享乐，并由此得出结论说，生活在其作为劳动的表现中也应当提供享乐，这样“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就通过假设和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6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67页。
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67页。

把假设变为结论的作法论证了法国社会主义关于劳动的思想。但是，这种论证没有说明为什么劳动并不从来就是提供享乐的东西，为什么它现在就应当是提供享乐的东西，为什么它应当成为那种直到现在都由于必然性而还没有成为的东西。

三、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对共产主义的歪曲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以极其自满的情绪把他们的虚无缥缈的王国、"人的本质"的王国同其他民族相对立，宣布这个王国是全世界历史的完成和目的，在一切领域中都把自己的幻想看成是他们对其他民族的活动所下的最后判决。格律恩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他是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出发去认识外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他"装备有对德国哲学如费尔巴哈所说的那些结果的坚定信念，即深信'人，，纯粹的、真正的人'似乎是世界历史的最终目的，宗教是异化了的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和万物的尺度；格律恩先生还装备有德国社会主义的其他真理，如货币、雇佣劳动等等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德国社会主义是德国哲学的实现，是外国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理论真理等等。"① 格律恩在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中到处寻找"人"和"人的"这个词，在他看来只有大讲"人"和"人的"，像费尔巴哈一样把一切归结为人的异化才是深刻的，而从事政治、有民族性、信仰宗教、研究经济学等等都是目光短浅，这也就是他对政治、民族性、宗教性的彻底批判。

格律恩以极其傲慢的态度对待其他的国家和前人。他说："我想知道，法国人、英国人、比利时人和北美人是否还应当向我们学一学。"回答自然是肯定的。他认为：北美人是十足的庸人，尽管他们的法律赋予他们一切自由，但是他们必须向德国人学习社会主义。比利时的民主主义者所走的道路没有德国人所走的一半。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76页。

法国的精神肤浅并有缺陷。法国社会主义应当在德国科学中找出对自己的补充。其实，格律恩所编纂的共产主义思想史是建立在无知和抄袭基础上的。他抄袭赫斯，把法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德国哲学的发展综合在一起，赫斯说："费尔巴哈是德国的蒲鲁东"，格律恩则说："蒲鲁东是法国的费尔巴哈"。赫斯说理论体系构成实践运动的社会背景和理论基础。格律恩则写道："18世纪政治问题的社会背景同时也是两种哲学派别的产物。"① 格律恩还抄袭施泰因的著作，但比施泰因低劣得多。施泰因起码还试图叙述社会主义文献和法国社会的现实发展的联系。而格律恩则对他的前辈采取轻蔑傲慢态度。

格律恩所编纂的共产主义思想史充满着唯心主义谬论。他宣称"不管国家的经济情况及其目前的政治局势会导致什么结果，在任何情况下，只有人道主义的世界观才可能开辟通向人类未来生活的道路"②。他把现实的生活关系说成是表现，而把宗教和政治说成是这些表现的基础和根源，把一切归结为对人的本质的研究，归结为人关于自身的意识。马克思和恩格斯着重分析批判了格律恩是如何从这种观点出发来建立关于生产和消费的庸俗理论的。格律恩认为，生产和消费"按其本质来说，它们是没有矛盾的"，生产同时也就是消费。他从消费出发去说明生产，并要求通过对生产和消费的真正本质的认识，实现"人的消费"来消除生产和消费的矛盾。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格律恩由于无知而将经济学中复杂的问题庸俗化了。"在任何一本政治经济学著作中关于再生产的消费那一章中，他都可以看到，在这种关系中产生出多么复杂的相互联系"③。格律恩宣扬生产和消费的无矛盾的一致，否定生产决定消费，更是错误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现在生产面

---

①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80页。

②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7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11页。

包是用蒸汽磨，而从前是用风力磨和水力磨，更早的时候是用手推磨；生产面包的这些不同方式完全不取决于他吃面包这一简单的行为”①，而且“随着这些不同的生产阶段生产的还有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各种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各种矛盾……如果不研究这些生产方式中的每一种方式和以此为基础的整个社会制度，就不可能了解这些矛盾，而这些矛盾只有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和这种制度的实际改变，才能得到解决”②。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对于生产和消费的关系的研究，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出发点：“如果从生产出发，那末就应当考虑生产的实际条件和人们的生产活动。如果从消费出发，那末可以满足于宣称现在人们不'像人一样地'消费，满足于关于'人的消费'、关于用真正消费的精神进行教育的公设以及诸如此类的空洞词句，而丝毫不去考虑人们的现实的生活关系和他们的活动。”③由于格律恩对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一无所知，所以他只好躲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最后避难所——人的本质——中去。因此他必然不以生产为出发点，而以消费为出发点，陷入十足的思辨唯心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是他们对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思潮的初次战斗，也是他们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特别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批判的进一步深入。这场批判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已同各种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划清了界限，而且开始为克服阻碍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走上正确道路的小资产阶级社会思潮而斗争。他们还通过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的分析、批判，进一步阐明在人道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建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探索新世界观的过程中，由于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曾把自己的理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1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14页。

论称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① 或“真正的人道主义”②，那么，在他们确立了自己的科学世界观之后，就理所当然地要清算旧哲学的影响，摒弃这些称谓，而准确地把自己的历史哲学称为唯物主义历史观。

简短的结论

列宁曾对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作过正确的说明，指出马克思是从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进一步从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这后一步是从1845年春天拟定《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开始的。这里所包含的“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在《形态》中发展成为历史唯物主义完整体系，即以现实的人和他们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前提，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为核心，系统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完成了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随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最终被置于它的科学基础之上。因此，马克思也才真正“成为马克思”，即成为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

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成熟与不成熟的分界线是在1845年春天。而在此以前，关于“人”、“异化”、“真正的人道主义”概念，以及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和使用，是他们早期思想发展的一定阶段的特殊理论现象，而这种现象的发生又是同他们世界观的不成熟相联系的。随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马克思和恩格斯彻底消除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消极影响，对“人的本质”和曾用“异化”说明的那种历史现象作了科学解释，这些不成熟的概念和用语也自然得以克服。“异化”现象实际是在私有制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7页。

条件下、由于旧式分工而产生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变成与活动主体相对立的、异己的力量。异化既不是像黑格尔所说的作为主体的绝对精神分裂出与自己本性不符合的对象，也不是费尔巴哈所谓的“个体和类的矛盾”，即“人的本质的异化”，而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劳动者同自己活动及其结果相分离。其发生的根源就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制与旧式分工的消灭，这种“异化”现象也将不复存在。

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思想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这是两个质的不同阶段，但也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马克思1844年的著作是《形态》的思想准备，而《形态》是前者发展的直接结果。因此，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个阶段思想的科学考察，就既不能停留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更不能从《形态》退回到《手稿》，而应该揭示这两者之间的真实的思想联系，揭示他们思想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转变是如何实现的，以廓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思想发展的研究上的种种迷雾。

《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第一部成熟作品，这是由它阐发的思想内容和在马克思主义史上的重要地位所规定的。但是，它只是论述了新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一些基本原理，这些原理，随着他们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对新的实际经验的进一步总结，将得到不断的完善、丰富和发展。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公开问世

由于官方的压力和出版商的阻挠，马克思、恩格斯生前仅能在杂志上发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二卷第四章，而经由他们系统阐述的新的哲学世界观仍然不为世人所知。直到在 1847 年出版的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他们的见解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论点才通过与蒲鲁东论战的形式第一次向世界公开作了科学的表达。在其后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他们的新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被用来系统地探讨历史、分析现状和预见未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在工人运动中扎下根来。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相比，《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在理论的表达和概念的使用上更为精确，与现实的结合更为紧密。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次被应用来研究政治经济学和指导革命实践，标志着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这一崭新的哲学理论已成为一种成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恩格斯后来回忆道："我们这一世界观，首先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问世"①。

第一节　对蒲鲁东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从 19 世纪 40 年代起，一种与比埃尔　约瑟夫　蒲鲁东的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49 页。

字相联系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逐渐在欧洲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流行起来。蒲鲁东的观点反映了某些农民、手工业者、小企业主以及一部分同这些阶层有联系的工人的心理和渴望，在以这些阶层为主要成分的国家的工人运动中有着相当多的支持者和拥护者。蒲鲁东将自己的著作诩为震撼社会科学基础的福音书，认为在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方面做出了史无前例的贡献。实际上，他既不懂得黑格尔的哲学方法，又不理解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他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庸俗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出发，提出了一种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改革方案，在工人运动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同时也阻碍着马克思、恩格斯刚刚创立的新哲学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传播。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除了坚决反对蒲鲁东主义之外，别无选择。只有从理论上彻底清算和批判蒲鲁东的经济学和哲学观点，才能帮助无产阶级从思想上与小资产阶级划清界限，也才能够进一步促进马克思、恩格斯的新哲学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结合。马克思1847年出版的《哲学的贫困》，就是反对蒲鲁东主义的主要成果。

一、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新起点

在马克思的思想进程中，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一直是他探索领域中的一对密不可分的孪生姐妹。他的兴趣时而从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时而又从政治经济学转回哲学。这两门学科在他的研究视野中交替出现，而每一次的交替都使马克思的思想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

马克思早在1842–1843年在《莱茵报》工作期间，就开始注意经济问题了。在此之前，马克思还习惯于从他继承下来的德国哲学的角度来考察历史和现实。然而这时作为《莱茵报》的主编，他却第一次遇到了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题。现实生活使马克思看到了自己政治经济学知识的不足，也使他认识到，解剖“市民社会”的钥匙存在于政治经济学之中。恩格斯在政治

经济学的研究中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在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影响下，马克思利用第一次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的机会，开始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系统研究。

1843年10月马克思迁居巴黎之后，埋头钻研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在作了大量阅读笔记和摘录的基础上，产生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部手稿是马克思首次系统研究政治经济学取得的重大成果，而手稿中提出的异化劳动理论，则是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基础上得到的一个哲学果实。通过这一理论，马克思接触到了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的思想，揭示了物质生产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通过阐述经济异化与人的其他一切异化的关系，马克思接近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同时，他还从扬弃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角度对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作了论证。虽然，由于异化劳动理论本身带有的抽象的思辨性造成的局限，使它还不能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概念，然而它却使得马克思在创建自己的新哲学的道路上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如果仅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马克思这时显然还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虽然探讨了诸如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以及工资、利润、地租等经济范畴，并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了批判，但从根本上看却还没有完全摆脱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在很多问题上他都是逐段抄录或归纳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尚未完全跳出他们的巢臼而形成自己独立的见解。马克思此时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真正意义并不是表现在他的经济学研究成果上，而是表现在哲学上。对经济学的首次系统钻研，使他早先关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的关系的思想更为具体化了。通过对具体的经济关系的探讨，马克思更为确信物质的生活关系在人类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加看清了物质生产力和物质生活关系在社会各个构成因素中的基础性的意义。因而，到1845年春，马克思蕴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才能诞生，而到1845年4月初，马克思已经能够向

恩格斯叙述他的大致已经完成了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梗概了。新哲学创立的进程这时大大加快了，这不能说与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没有密切关系。在马克思的面前展现了一个新的广阔的研究领域——政治经济学领域，而对这一领域进行研究的第一批成熟的果实，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1845年底至1846年5月写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被第一次确立在科学的基石上，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催生出了哲学之果。

如果说马克思在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促进了历史唯物主义诞生的话，那末马克思写于1847年上半年的《哲学的贫困》，运用刚刚创立的唯物史观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诞生。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从此获得了一个新的起点，从而为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在马克思的思想进程中，这已经是第二次使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相结合在一起了。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用相当大的精力和相当多的篇幅着力批判了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思想，涉及到了很多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问题。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不同的是，马克思这时已经获得了正确的哲学思维方法——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这一科学方法始终是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批判蒲鲁东的经济学思想，探索和建设新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基本方法。正确的哲学方法第一次被运用于政治经济学领域就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不仅蒲鲁东苦心经营的经济学体系被批判得体无完肤，宣告瓦解，而且使得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获得了第一批丰硕的果实。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确立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但为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创立开辟了新的道路，而且也孕育着剩余价值论的思想。历史唯物主义在经济学研究中的第一次运用，标志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进行的革命变革已经开始，同时也

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方法的强大威力。

马克思的思想进程表明，政治经济学与哲学始终是密切相关、互相影响的。在1844年，是政治经济学推动着哲学前进，而在1847年，则是哲学指导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当科学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尚未建立的时候，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促进着马克思的哲学思维，而当这种科学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形成之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就被提高到了一种新的境界。哲学，作为世界普遍运动规律的抽象反映，不仅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它始终指导着人们对各门具体科学的研究。马克思在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之后向政治经济学领域展开的新的进军，是由抽象到具体这一人类思维发展普遍规律在马克思思想进程中的表现。

二、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思想

蒲鲁东1809年出生于法国东部贝桑松的一个贫苦农民兼手工业者的家庭。由于家庭破产，他12岁起就辍学开始独立谋生。他曾先后当过旅馆的仆役、排字工人。由于生活的艰难，他曾想投河自尽。青少年时期的不幸遭遇使他痛恨资本主义制度，决心致力于发现某种能够改善人数最多而且最穷困的阶级的身体上、道德上和文化上的状况的方法。为此他刻苦自学。1837年，他以《论普通文法》一书获得贝桑松学院的胥阿尔奖学金，从此得以迁居巴黎，正式从事理论研究和著述活动。蒲鲁东一生致力于以改良主义方案改造社会的活动，并有很多著作。《什么是所有权，或对权利和政治的原理的研究》、《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和《社会问题的改革方案》是他的代表作。其他重要的作品还有：《论人类秩序的建立》、《一个革命家的自白》、《战争与和平》、《19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从12月2日政变看社会革命》以及《1815年的条约已不存在了吗？未来的代表大会决议》等等。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后，蒲鲁东出任法国国会议员。由于他在报刊上批判资本主义制度。1849年3月被判刑3年。蒲鲁东晚年继

续从事理论著述和改良主义活动，1865年1月在法国去世。

蒲鲁东1840年出版的他的成名之作《什么是所有权，或对权利和政治的原理的研究》一书，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尖锐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私有财产，并借用法国大革命时期布里索的名言得出结论："所有权就是盗窃！"他认为，从法权观念上看，每个人都应有平等的权利来享受自己的劳动产品；但地主和资本家却以地租和利息的形式夺去劳动者的一部分产品，这实际上是侵犯了他们的权利，这是一种盗窃行为。但蒲鲁东反对的只是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权，并不反对小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权，更不反对泛指的"一切财产"的私有权。他认为小资产阶级的财产私有权是一种"个人的占有"。它是"社会生活的条件"，是"一种权利"，因而应当予以保护。他从小资产阶级的矛盾立场出发，既反对资产阶级的私有权，又反对共产主义，幻想建立"第三种社会形式"，这实质上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私有制。蒲鲁东在这本书中只是从法权观点出发来评论私有财产，并没有论及经济关系。这时蒲鲁东对政治经济学还一无所知。马克思后来评论道："在政治经济学的严格科学的历史中，这本书几乎是不值得一提的。"①

《什么是所有权》问世以后，蒲鲁东感到必须从政治经济学中寻找自己所提问题的答案。他由此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并于1846年写成和出版《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在这本书中，蒲鲁东开始进入政治经济学和哲学领域，利用被他歪曲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化了的黑格尔辩证法来装点他的小资产阶级空想主义。

蒲鲁东在该书中用唯心主义的哲学观点来解释交换价值的起源。他认为，由于个人的生产无法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于是就向别人建议进行分工和交换，这就有了交换价值。与此同时，蒲鲁东还把商品的内部矛盾变成虚构的矛盾，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1页。

值的矛盾混同于供给与需求的矛盾，而最后把这种矛盾说成是“自由意志”造成的。在蒲鲁东看来，只有通过他臆造出来的“构成价值”或“综合价值”理论，才能解决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他认为社会财富是由各种产品按比例组成的。如果某种产品的数量超过按比例所需求的份额，那么多余的部分便不能被列入社会财富，也就是说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凡是在交换时得到社会承认而被列入社会财富的产品，就成为“构成价值”，那些不被社会承认、无法进入社会财富领域的产品，就是“非价值”。在取得了构成价值的产品中，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得到了综合与调和，所以蒲鲁东又把“构成价值”称为“综合价值”。

蒲鲁东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消灭货币而保留商品生产与流通的主张。他认为，综合价值或构成价值是表现交换中的确定的比例，这种比例本身的基础是人们的劳动。按照他的说法，金银本来是普通的商品，后来在交换的历史中最先成为货币，开始按照它的价值在市场上进行交换，取得了构成价值。照此推论，如果一切产品都变成了货币，都能按照在生产它时所耗费的劳动量随时随地直接进行交换，成为构成价值，那末，对货币的需要就会消失。货币消失了，资本、剥削和一切非劳动的收入也都会相继消失，社会就会摆脱由于货币与资本的支配而发生的各种矛盾，而社会的一切成员都会改变成为交换同量劳动的工人，人人就会获得平等自由。

蒲鲁东将经济范畴看成创造现实经济关系的先验产物，把客观的社会经济关系看作只是永恒存在的概念与范畴的体现。在他看来，每一个经济范畴都有所谓“好”和“坏”两个对立的方面，问题就在于保存“好”的方面而消除“坏”的方面，以使这些范畴从一个过渡到另一个，从而形成一个经济范畴发展的序列。蒲鲁东按照他的主观想法，将一些经济范畴按一定顺序排列起来，构成了一个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从这样的经济学观点出发，蒲鲁东形成了自己的带有空想色

彩的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政治主张。他反对用革命的手段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反对工人的一切经济和政治斗争。为了使他的消灭货币，保留商品交换的想法具体化，他在其后出版的《社会问题的解决》一书中又进一步提出了所谓的“信用改革计划”，企图以建立“交换银行”或“人民银行”、发行劳动证券以及向工人提供无息贷款的方法，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蒲鲁东的这种改革计划明显地表现出他的理论既反对资产阶级统治又反对共产主义学说的小资产阶级两重性。不言而喻，这种空想主义定然会在严酷的资本主义现实面前碰壁。终其一生，蒲鲁东的学说虽然在拉丁语系各国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但却从未结出任何现实的果实。

三、对蒲鲁东经济学思想的批判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的奠定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于1842年10月第一次接触到蒲鲁东的著作的。当时，蒲鲁东激烈地反对现存的私有制关系的观点，尤其是他的《什么是所有权》一书，给这两位正处于急剧的思想转变时期的年青思想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马克思将蒲鲁东的著作称为“智慧的作品”，并准备对之进行“不断的、深入的研究”①；恩格斯则认为，蒲鲁东在揭露私有制以及这一制度造成的竞争、道德沦丧和贫困上，“表现了非凡的智慧和真正科学研究精神”，这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② 可以说，蒲鲁东对资产阶级私有制的批判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立场的转变，对于他们从所有制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确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马克思、恩格斯1844年9月－11月写作的《神圣家族》中，他们驳斥了“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对蒲鲁东的攻击，认为蒲鲁东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3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84页。

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像“青年黑格尔派”分子那样追求“抽象的科学目的”，而是从社会的现实出发，“向社会提出一些直接实践的要求”①。蒲鲁东写作的出发点不是追求人为的、抽象的利益，而是追求“群众的、现实的、历史的利益”②。仅从这一点讲，蒲鲁东就比“青年黑格尔派”的“纯粹的批判”或“批判的批判”高明得多。

蒲鲁东对私有制做了“第一次带有决定性的、严峻而又科学的”批判性的考察，“这就是蒲鲁东在科学上所完成的巨大进步”③。他们认为，蒲鲁东不同于古典经济学家的地方，在于“以往的政治经济学从私有制的运动似乎使人民富有这个事实出发，得出了替私有制辩护的结论。蒲鲁东从政治经济学中被诡辩所掩盖的相反的事实出发，即从私有制的运动造成贫穷这个事实出发，得出了否定私有制的结论。”④蒲鲁东不像其他经济学家那样仅从私有制的这种或那种个别形式出发，“而是把整个私有制十分透彻地描述为经济关系的伪造者”⑤。他们当时还认为，从蒲鲁东无情地批判资产阶级私有制这一点来讲，他是在为无产者的利益写作的，“他的著作是法国无产阶级的科学宣言”⑥。

从马克思、恩格斯上述对蒲鲁东的评价可以看出，他们于1844年开始形成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作用的观点、关于经济关系的基础作用的思想以及这时展开的首次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都与蒲鲁东的思想有着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甚至到了1845年3月，马克思还将蒲鲁东看成“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

---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9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2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0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1页。

者"[1] 之一，并打算进一步译介他的著作。

当然，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思想这时正处在一个逐渐走向成熟的阶段，加之他们此时也是初次接触古典经济学，因而对于蒲鲁东的评价确有不尽准确之处。例如认为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使政治经济学革命化了，并且第一次使政治经济学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并认为"从政治经济学观点出发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时所能做的一切，他都已经做了。"[2] 这些评价显然过高估计了蒲鲁东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的意义。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后的著作中，他们对此做了实事求是的更正。[3]

但是，即使在肯定蒲鲁东思想的积极因素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从未忘记他的思想的消极方面。早在1844年7月，马克思就感到蒲鲁东的理论在很多方面不如魏特林[4]；而在其后写作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则更为明确地指出，蒲鲁东并不真正懂得私有财产的本质，因为他只是从"客体"方面来考察私有财产；蒲鲁东对资产阶级私有财产的批判并不彻底，他不过是个"细节上的改良主义者"[5]。在紧接着写作的《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蒲鲁东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也并不彻底，"由于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还受着政治经济学的前提的支配，因此，蒲鲁东仍以政治经济学的占有形式来表现实物世界的重新争得。"[6] 马克思还指出，蒲鲁东赖以出发的哲学基础是德国的唯心主义，他是从理性原则出发得出消灭财产不平等的结论的。在蒲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7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9、40页。

③ 马克思在1847年写的《哲学的贫困》中称蒲鲁东是一个"拙劣的经济学家"；在1865年写的《论蒲鲁东》中认为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在经济学的严格科学的历史中"，"几乎是不值得一提的"。认为蒲鲁东"拐弯抹角地又回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上去"。

④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56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2页。

鲁东那里，“平等作为理性的创造原则是财产赖以构成的基础，而作为这种理性的根据，它又是证明财产的一切论据的基础”①。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一方面指出蒲鲁东试图模仿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②，另一方面指出蒲鲁东在论及劳动与资本的现实关系时，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③，因此，“共产主义者从他那里所接受的除他对所有制的批判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④。

马克思是1844年7月在巴黎居住期间，开始同蒲鲁东进行私人交往的。他们经常会晤，争论问题。为了影响蒲鲁东，使其向积极方面发展，马克思曾给他讲解过黑格尔的辩证法，并在自己的文章和著作中多次直接或间接地指出他理论上的缺陷和错误。马克思被逐出巴黎后，于1846年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6年5月5日，马克思给在巴黎的蒲鲁东写信，试图使他与通讯委员会建立联系，充当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言人。马克思在信中同时还提醒蒲鲁东提防在巴黎的德国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家、“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卡尔 格律恩。蒲鲁东很快回信拒绝参加通讯委员会的通讯活动，并为格律恩辩护，还声称他反对共产主义和革命斗争的方法。与此同时，他与格律恩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日益暴露出他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面目。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得知蒲鲁东即将付印和出版一本宣扬小资产阶级空想主义的书《贫困的哲学》的消息时，他们意识到自己与蒲鲁东的分歧是一种原则的分歧，蒲鲁东的“和平药方”和济世的“万应灵药”与格律恩等人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一样，“是反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和庸人的东西”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2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0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6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70页。

马克思在1846年底写给俄国自由派的著作家巴 瓦 安年柯夫的信中，明确宣布要对蒲鲁东的这本“很坏的书”进行彻底的批判。在这封信中，马克思详尽地论述了他和恩格斯与蒲鲁东在理论上的一系列原则分歧，运用刚刚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批判了蒲鲁东的哲学唯心主义和庸俗经济学思想，为他即将写作的《哲学的贫困》一书确定了理论基调和写作提纲。整个1847年的上半年，马克思都在忙于写作这本回答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的论战性小册子。7月初，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出版，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蒲鲁东建立在沙滩上的理论体系在马克思的这本书面前动摇了。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新哲学在批判蒲鲁东的过程中，显示了巨大的威力。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始终是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经济学思想和阐述自己的新的经济学思想的基本方法。

马克思首先指出，蒲鲁东关于交换价值起源的观点完全不是在对交换价值进行历史考察的基础上得出的，而是建立在假定和所谓的“建议”的基础上的一种唯心史观。他根本不懂分工和交换的历史性。在他看来，“分工和这种分工所包含的交换等都是凭空掉下来的”①。实际上，交换价值是现实世界的产物。在现实世界中，“供给者之间的竞争和需求者之间的竞争构成购买者和出卖者之间斗争的必然要素，而交换价值就是这个斗争的产物。”② 交换和交换价值有它自己的历史，它经历了各个不同的阶段。在中世纪，人们交换的只是生产超过消费的过剩品；而资本主义初期的交换，则不仅是剩余品，这时一切产品，整个工业活动都处在商业范围之内，一切生产这时都完全取决于交换；而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期，则“是一切精神的或物质的东西都变成交换价值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87页。

并到市场上去寻找最符合它的真正价值的评价的时期"①。在这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中，生产和分工的发展始终是交换发展的动力。而蒲鲁东则将交换的发展解释成"假定有人曾　向别人，即向各行各业中他的合作者建议"，的结果②。蒲鲁东使抽象达到了极端。

马克思接着指出，蒲鲁东关于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关系是一种"互相对立"、"互相矛盾"和"成反比"的关系的观点，并不是一种由他发明的新鲜见解。西斯蒙第、罗德戴尔和李嘉图等经济学家早就有过类似的观点。蒲鲁东在不谈论"需求"的情况下大讲"凡属日用必需而数量又是无穷的东西就一钱不值，毫无用处但极端稀少的东西价格就不可估量"③。这样就是把交换价值和稀少、把使用价值和众多混为一谈了。在蒲鲁东看来，众多的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代表着供给，而稀少的具有交换价值的东西才代表着需求。这二者的对立，蒲鲁东认为实际上也就是"效用"与"由意见决定的价值"（"交换价值"）之间的对立。蒲鲁东不是从现实的经济运动中来寻找这二者对立的根源，而是最终将之归结为"自由意志引起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对立"④。马克思认为，蒲鲁东的这种观点是建立在空洞的抽象概念之上。实际上，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对立并不是发生在蒲鲁东所谓的"效用"与"意见"之间，而是发生在出卖者所要求的交换价值与购买者所提出的交换价值之间。产品的交换价值每次都是这些互相矛盾的估价的合力。

马克思认为，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正是供给和需求才使生产和消费互相接触的，生产和消费的基础是个人交换。马克思特别强调生产在整个需要体系中的决定性作用，认为"需要往往直接来自生产或以生产为基础的情况。"⑤决定世界贸易的，并不是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80页、79页。

③④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82、84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84页。

个人消费的需要，而是生产。无论是生产还是消费，都不是由“意见”和“自由意志”决定的，因为生产者和消费者都不能随心所欲。对于生产者来说，“现在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责成他在一定的限度内进行生产”。对于消费者来说，“他的意见是以他的资金和他的需要为基础的。这两者都由他的社会地位来决定，而社会地位却又取决于整个社会组织。”① 蒲鲁东只看到了人们在经济生活中根据本人的意见行事这一表面现象，而不懂他们之间的意见差别是由于他们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不同，“而这种社会地位的差别却又是社会组织的产物”②。

在反驳了蒲鲁东关干交换价值的起源和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关系方面的观点之后，马克思将批判的笔锋指向了他的“构成价值”理论。

马克思指出，蒲鲁东关于“构成价值”的某些观点是盗用李嘉图和布雷等经济学家的思想并加以歪曲的结果。不难看出，蒲鲁东的综合或构成价值理论实际上就是英国古典经济学派的劳动价值论。不过，在古典学派那里，这一理论只是反映了资本主义的某种客观经济规律，而在蒲鲁东那里，它却成了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的万应灵药。马克思认为，蒲鲁东的构成价值理论只是对李嘉图的理论的乌托邦式的解释，并荒谬地把它当成改造社会的药方，妄图用它来建立一个新世界，这不过是幻想罢了。

蒲鲁东关于通过他的“构成价值”就可以解决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二律背反，从而实现完全以相同劳动量进行平等的商品交换的想法不过是一种“假定”。他的根本错误就在于混淆了商品价值和劳动的价值。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下，“劳动本身就是商品”，而“劳动的自然价格无非就是工资的最低额。”③ 在现存的阶级对抗条件下，蒲鲁东的“平等交换”没有改变生产者之间的相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86、86－87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94 页。

互地位，更没有改变工人与工厂之间的相互关系。工资最低额的存在使得工人的劳动价值与工人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并不相等，这就造成了劳动产品在“直接劳动者”与“积累劳动占有者”之间的不平等分配。蒲鲁东忽视了这一客观的经济事实，也就是忽视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所以，他的理论“注定是工人遭受现代奴役的公式，而不是蒲鲁东先生所希望的无产阶级求得解放的革命理论”①。

蒲鲁东关于“构成价值”是表现交换中的某种“比例关系”，人们可以通过这种比例关系按照生产商品的劳动量进行平等交换，从而达到供求平衡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认为，蒲鲁东在这个问题上恰好把实际情况弄颠倒了。在现实生活中是，当供求平衡时，产品可以按照生产它的劳动量来确定其相对价值，也就是说，这种相对价值恰好表现了某种确定性的比例关系。而蒲鲁东却倒果为因，认为只要先开始用产品中包含的劳动量来衡量产品的相对价值，使其达到某种比例性关系，供求关系就必然会达到平衡。这就如同将由于天气好人们才出来散步，说成是为了使天气好人们必须出去散步一样荒谬。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完全构成了的“比例性关系”是不存在的，只有构成这种关系的运动。随着大工业的产生，供求之间的正确比例早已不存在了。在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作用下，生产一定要经过繁荣、衰退、危机、停滞、新的繁荣等等周而复始的更替。所以，现代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灾难丛生的根源，同时又是进步的原因”②。

马克思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指出，真正决定交换的是生产方式。“产品的交换方式取决于生产力的交换方式。总的说来，产品的交换形式是和生产的形式相适应的。生产形式一有变化，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9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9页。

换形式也就随之变化。因此在社会的历史中，我们就看到产品交换方式常常是由它的生产方式来调节。”① 在私有制度中，个人交换同样也受一定的生产方式的制约。而这种生产方式又是和阶级对抗相适应的。“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② 没有生产的发展，没有阶级的对抗，就没有个人的交换，更没有历史的进步。总之，“产品的使用取决于消费者所处的社会条件”③。蒲鲁东在谈论交换时把这一切全部撇开了，只能说明他“颠倒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④。

蒲鲁东将他的构成价值理论推延为一种消灭货币的主张，表明他完全不懂货币的本质和它产生的历史。马克思认为，货币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的表现。它是其他经济关系的整个锁链中的一个环节，是与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蒲鲁东的作法就是首先把货币从现在的生产方式的总体中分离出来，然后使它成为想象中的系列，这是一种典型的唯心主义手法。他将货币的产生解释为君主意志的产物。在他看来，“君主的专横就是政治经济学中的最高原因!” 他认为，“经过君主的神圣化以后就产生了货币：君主们占有金银，并且在上面打了自己的印章。”⑤ 但是，经济发展的历史却与蒲鲁东的说法完全相反。事实上，货币并不是产生于君主的主观意志，而是产生于特定的经济条件。“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⑥ 君主只不过是在普遍的交换手段的左右之下，才给金银盖上印章并使之神圣化的。不是意志，而是经济条件决定了货币的产生和它的历史，法律只是承认这一事实罢了。金银之所以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17页。

②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4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21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21-122页。

在事实上具有交换能力，是由于它们具有作为普遍的交换手段的特殊职能，而生产组织又需要普遍的交换手段；“金银之所以在法律上具有交换能力，只是由于它们具有事实上的交换能力。”① 所以，金银作为货币同样也是受生产和经济条件左右的。蒲鲁东关于将一切商品都变成像金银那样的货币，从而消灭货币，实现公平交换的设想，不过是一种脱离现实经济关系发展的幻想。在强大的客观经济规律面前，任何诉诸主观意志的作法注定都要碰壁。马克思最后说，蒲鲁东的这些书斋里的奇想其实并不新鲜，在法国路易十四那个时代就有过使绵羊和葡萄具有货币的特性的想法；在法国最老的经济学家之一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中，也有类似消灭货币的主张。“可见，资产阶级最初的幻想也正是他们最后的幻想。”② 从马克思以上对于蒲鲁东经济学思想的批判可以看到，他始终是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形成的哲学思想为理论武器的。历史唯物主义提供的科学方法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进行新的开拓打下了基础，并使他获得了第一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概括说来，这些成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确立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马克思以前的一些有成就的经济学家，虽然在涉及流通领域和生产领域的研究中能够取得一定的成果，但由于他们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武器，因而无法自觉地确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他们的理论中，更多地是对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很难透过这些表面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去深入把握隐蔽于其间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例如在重商主义那里，流通领域中的货币是他们研究的重点；在重农学派那里，农业生产领域中的物质资料等财富的积累是他们注意的中心。他们大都很难从具体的经济现象中摆脱出来，抓住经济运动的实质。可以说，他们的经济学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2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27页。

成果都是在一种不自觉的状态下取得的。

马克思在应用唯物史观批判蒲鲁东的唯心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的过程中，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确立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是由一系列范畴组成的体系。如何看待这些范畴的实质，对于确立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有着重要意义。蒲鲁东从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出发，将他的一系列经济学范畴看成是“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看成是先验的观念和思想的产物。他颠倒了范畴与现实的关系，认为现实关系只不过是睡在“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的怀抱里的一些原理或范畴的化身。蒲鲁东的这种观点使他的政治经济学成为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使得他既不能正确地理解历史的发展，又无法科学地认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蒲鲁东看来，历史不过是观念的历史，不过是一种普遍理性的自我表现；而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在蒲鲁东眼中则成为一切现实的经济运动的本原或实体。因此，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并不是在研究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而是脱离这些现实的经济关系来主观地排列范畴的次序。正如他自己所说的：“经济理论有它自己的逻辑顺序和理性中的一定系列，经济理论的这种次序，如所预期的那样，已被我们发现了。”① 他认为自己的经济学范畴的排列顺序正是“适应观念顺序的历史”，只要“发现”和认识了这些范畴的历史，现实的经济运动史就会自然而然地被把握了。所以，蒲鲁东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是现实的经济关系及其运动规律，而是理性本身。

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的这种唯心主义观点，在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指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② 马克思的这一论述正确地解决了关于

---

①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3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3页。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在这里，他一方面指出，由一系列范畴组成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只不过是对现实事物的一种理性上的反映，经济范畴从属于现实，服从于现实，它只是人们对现实的经济关系的一种认识成果；另一方面他也指出，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在理论上反映和表现的是“生产方面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的运动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经济范畴是这一关系在理论上的表现。① “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② 马克思的这些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论述，科学地阐明了经济范畴与经济关系的真正关系，阐明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关注的真正对象。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既不是观念，也不是表面的物－物关系。政治经济学必须透过现象去抓住本质，即认识隐藏在物－物关系之后的人－人的社会关系。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阐明了作为社会关系的基础关系的生产关系的概念，但这仅仅是从哲学角度作的概括的阐述，对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进行更为具体的经济学研究的任务，是要由政治经济学来完成的。这样，马克思不仅指明了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也为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可以说，没有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立，也就没有日后《资本论》的诞生。最后，马克思还指出，政治经济学的“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③这就是说，各种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是历史的产物，同样，政治经济学的各种形态和学派也不是永恒的。政治经济学是一种开放型的理论体系，随着现实历史的发展，反映这种历史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也必然要不断地充实新内容、发展新范畴。那些不再反映新的经济现实的经济学范畴，将会被新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0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4页。

概念和原理所代替。历史和现实在发展，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也不能停步不前。

第二，奠定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

劳动价值论的提出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的重要贡献。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的著作中，交换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得到了透彻的表述和发挥。虽然这一理论由于阶级偏见的支配和认识能力的局限，还带有很大的缺陷，但它的基本内容却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汲取，成为日后创立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

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探讨，是经历了一个从否定到肯定的发展过程。在《巴黎笔记》中，马克思对之持否定态度，认为供给关系对价值起决定作用。他说："穆勒——完全和李嘉图学派一样——犯了这样的错误：在表述抽象规律的时候忽视了这种规律的变化或不断扬弃，而抽象规律正是通过变化和不断扬弃才得以实现的。……的确，由于需求和供给的波动，由于生产费用和交换价值之间的不相适应，需求和供给只是暂时地相适应，而紧接着暂时相适应又开始波动和不相适应。这种现实的运动——上面说到的规律只是它的抽象的、偶然的和片面的因素——被现代国民经济学家歪曲成偶然性、非本质的东西。"①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已由公开的否定转为采取沉默慎重的态度。他说："如何更详细地规定这个价值以及这个价值为何成为价格，应当在其他地方加以探讨。"②

在其后写作的《神圣家族》中，马克思的观点发生了急剧变化，他开始看到劳动与价值之间的一些重要联系，认为物品的价值问题的解决，本质上取决于生产该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正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8页。

如列宁评述的，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接近劳动价值的理论了”①。在时隔不久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则明显地站到了劳动价值论的立场上了。在这本著作中，他认为商品的价值或价格，最终是由“生产成本”，亦即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来决定的。可见，劳动价值论这时已经得到了马克思的肯定。马克思的这一经济学观点没有能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本哲学著作中详细阐述，直到他后来写作《哲学的贫困》时，这一经济学思想才得以充分的运用和展开。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完全站在赞同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立场上，并从这一理论出发批判了蒲鲁东的经济学思想。马克思认为，“李嘉图的价值论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②，这一理论是能够“科学地”阐明作为现代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虽然这一评价表明他此时并没有全面认识李嘉图的价值论，但也说明他已经感到劳动价值论的重要理论价值。马克思在18年后写的《论蒲鲁东》一文中回顾他这一时期的思想时曾谈到，他这时已经认识到对“交换价值的理解”，是“整个问题的基础”。这表明，他已经将劳动决定价值的思想看成了建立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最值得肯定的地方也恰恰正是在这里。事实也正是这样发展的。马克思此后正是在批判地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在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并将其当作整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点。

应当指出，由于马克思这时尚没有从批判的立场出发来评价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所以他在分析经济问题和批判蒲鲁东的观点时还没有完全摆脱这一理论本身局限性的束缚。在对决定价值的劳动的认识上，他虽然在李嘉图理论的基础上对劳动过程的复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93页。

杂性有所认识，但尚未提出自己有关劳动二重性的理论，对劳动与劳动力也没有做出科学的区分；在对计量价值的劳动量的分析上，虽然他依据李嘉图的理论提出了用生产某种物品所需的“最低额”或“最低限度”时间来衡量其价值的原理，但还没有提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因而对价值的定性定量分析尚待进一步深入。

第三，孕育着剩余价值的思想。

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成果，也是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实质的一个关键。在《哲学的贫困》中，这一理论虽然还没有以完备的理论形式出现，但马克思却已准确地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为进一步提出剩余价值理论做好了准备。

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是商品，工资是劳动的价格的思想，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最早提出来的。比马克思更早涉猎经济学领域的恩格斯，在考察资本主义的现状和批判地研究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这一思想的过程中，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首先提出劳动（力）的“自然”价格（即正常价格）和工资的最低额相等，也就是和保证工人活命以及延续后代所绝对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相等的论点。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采用了恩格斯的这一论点，并做了进一步的阐述。

马克思认为，如果商品的相对价值由生产商品所需的劳动量来决定，那末自然就会得出结论说，劳动的相对价值或工资也由生产工资所必需的劳动量来决定。工资，即劳动的相对价值或价格，也就是由生产工人的一切生活必需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来决定的。他进一步指出，在“劳动本身就是商品”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价值或价格，不过是由需要为了生产维持不断的劳动，即供给工人活命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物品的劳动时间来衡量的。

“劳动的自然价格无非就是工资的最低额。” 工资的“市场价格”超过它的“自然价格”的现象是存在的，但这不过是受供求关系波动的影响而造成的后果，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资的最低额始终是工资市场价格趋向的中心”②。

可以看出，马克思此时虽然仍然从李嘉图的观点出发，把劳动与劳动力混为一谈，对价值与价格也没有做出严格的区分，但在分析劳动的“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时，却从恩格斯的观点出发断定工资的市场价格的总趋势在竞争中不是上升，而是始终指向工资的最低额，工人劳动的“自然价格”是与工资的最低额相等的。这表明，马克思已发现在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与工资(劳动的自然价格)之间有一个差额，这就为揭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指示了一条正确的路径。马克思得出结论说：“由劳动时间衡量的相对价值注定是工人遭受现代奴役的公式”③，它与现存的阶级对搞以及劳动产品在直接劳动者与积累劳动占有者之间的不平等分配是一致的。恩格斯后来回忆道：早在 40 年代，马克思“不仅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 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 产生’的，而且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它是怎样 产生，的。这一点，从 1847 年《哲学的贫困》和 1847 年在布鲁塞尔所作的、1849 年发表在《新莱茵报》第 264－269 号上的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演讲，可以得到证明。”④

恩格斯这里提到的演讲，是马克思 1847 年 12 月下半月为布鲁塞尔的“德意志工人协会”所作的多次政治经济学讲演的一个未完成稿。马克思在这部题为《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讲稿中正面表述了自己的一系列经济学观点，通过对工资、资本的分析，将在《哲学的贫困》中阐明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思想的萌芽，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9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95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95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4 卷，第 12 页。

大大发展了一步。

马克思认为，工资是工人们所出卖的商品——劳动的价格的特种名称，因此，工资也与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受商品价值规律的作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的实际价格始终不是高于生产费用就是低于生产费用，始终依据生产费用而上下波动。各种商品是依其生产费用而互相交换的，所以它们的价格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而“价格由生产费用决定，就等于说价格由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①，因为生产费用本身是由物化劳动和直接劳动组成的，它们都是以劳动时间来计量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价格的波动涨落绝不如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价值规律运动的必然规律，“实际上，只有在这种波动的进程中，价格才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②。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不仅清楚地表明了他的劳动决定价值的观念，而且也首次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商品价值规律的运动所造成的无政府状态和破坏作用，为他进一步创立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时，给资本下了一个定义，认为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③ 资本与雇佣劳动是密切相关的。资本只有同劳动相交换，引起雇佣劳动的产生，自己才能增殖；而雇佣劳动只有在奴役它的资本的权力加强时，才能和资本交换，以使自身得以存在。资本的增加既是无产阶级的增加，也是奴役和剥削无产阶级统治力量的增加，无产阶级的命运始终取决于资本的命运。马克思具体考察了资本与劳动的交换，认为在交换中“工人拿自己的劳动换到生活资料，而资本家拿归他所有的生活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8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8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87页。

料换到劳动，即工人的生产活动，亦即创造力量。这种力量不仅能补偿工人所消费的东西，并且还使积累起来的劳动具有比以前更大的价值。"① 一个每天工资为5便士的工人可以生产出相当于10便士的价值，这样他不仅补偿了他从主人那里得到的价值，还为主人生产了一个"附加价值"。马克思这里分析的附加价值，无疑就是他后来以"剩余价值"命名的那部分价值。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生产资本的构成，认为生产资本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供加工用的原料，第二部分是机器和开动机器所需的材料、建筑物等等，第三部分则是用于工人生活费，亦即支付工人工资的那部分资本。资本构成的前两部分并不创造价值。它们的价值只是转移到新生产出来的产品中去，而第三部分资本则随着生产资本的增加而相对减少。这就是说，"生产资本愈增加，工人的就业手段或生活资料就相对地愈减少，换句话说，和就业手段相比，工人人口增长得就愈快，而且，这种不均衡现象总是和一般生产资本同等地增长的。"② 可以看出，马克思在这里不仅向创立"剩余价值"理论大大迈进了一步，而且对随着剩余价值的增加而带来的生产总资本的增加，以及这种增加对工人造成的影响也进行了科学的概括，同时也提出了后来被称为资本的有机构成理论的基本思想。

第二节　历史唯物主义的更精确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系统阐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内容，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然而，毋庸讳言，这一著作在阐述作为一个哲学理论体系的新世界观时，其中的一些表述在细节上还有不够精确之处，并且仍然沿用了一些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8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54页。

旧的术语，这就是说，在思想达到的程度与文字的表述形式之间还存在着一些差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过程与其他事物的形成过程一样，内容的发展总是先于形式的发展，往往思想达到了某种高度，但文字的表述以及术语概念的制定却落在后面，这是认识的一个普遍规律。恩格斯说："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① 这种"术语革命"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字表达形式上的变化，它同时也是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以及一些新的范畴、概念的形成过程。当1847年马克思写作《哲学的贫困》时，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概念和范畴较前有了更确切的表达方式，整个理论体系也更为完善和严谨了。正因如此，马克思才说："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表述。"②

一、经济范畴是社会经济关系的理论表现

蒲鲁东的哲学唯心主义体现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之中。当他在《什么是所有权》中论及财产权时，它表现为法学唯心主义；当他在《哲学的贫困》中论及政治经济学时，它又表现为经济学上的唯心主义。蒲鲁东自称是黑格尔的信徒，但他从黑格尔那里没有汲取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却不折不扣地继承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当蒲鲁东研究政治经济学时，他首先看到的不是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而是一系列观念形态的经济学范畴。他把经济范畴看成是"原始的原因"。而实在的社会经济关系不过是这些抽象经济范畴的体现。蒲鲁东将一系列经济范畴生硬地凑在一起，排列成一定的顺序，例如分工、机器、竞争、垄断、税收或警察、贸易平衡、信贷、所有制，在他看来，他的这些范畴总合起来就构成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4页。

所谓所有制的社会关系，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之所以有运动和变化，恰恰是由于他的理论体系中的一系列范畴依据一定的排列顺序不断运动变化的结果。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这种彻头彻尾的哲学唯心主义是完全不相容的。马克思尖锐地批判了蒲鲁东的唯心主义观点，通过批判，马克思不仅把政治经济学完全奠定在新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上，从而确立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而且也重申了对待历史唯物主义基本问题的唯物主义原则。

马克思指出，蒲鲁东神秘地颠倒了经济关系与经济范畴的关系。他不是把政治经济学的范畴看做实在的、暂时的、历史的社会关系的抽象，而是“神秘地颠倒黑白，把实在的关系只看做这些抽象的体现”。在蒲鲁东眼中，“这些抽象本身竟是从世界开始存在时起就存在于天父心怀中的公式。”① 因此，他探讨的并不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历史，也不是世俗的人类的历史，而是神圣的观念的历史。他提供的经济范畴的发展顺序不过是这些范畴在他头脑中排列的次序。在他看来，人不过是观念或永恒理性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使用的工具。因而“蒲鲁东先生所说的进化，是在绝对观念的神秘怀抱中发生的进化。”②

蒲鲁东不是从现代社会制度的联结中去了解现代社会制度，而是从“普遍理性”、“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出发去探讨经济关系的运动，因而给人们提供的仅是一种“可笑的哲学”。他的那些关于历史的议论是在想象的云雾中发生并高高超越于时间和空间之上的，因此，它们不过是“黑格尔式的废物”。说穿了，他不过是想“借软弱的黑格尔主义来把自己装扮成坚强的思想家”③。马克思明确指出，蒲鲁东的这些思想完全是黑格尔主义的翻版。“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8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7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77页。

格尔为宗教、法等做过的事情，蒲鲁东先生也想在政治经济学上如法炮制。"[1]他从黑格尔那里找到了一种“绝对方法”，这就是把一切存在物都经过抽象而归结为逻辑范畴，把“整个现实世界都淹没在抽象世界之中，即淹没在逻辑范畴的世界之中”[2]。它所说的运动不过是运动的抽象或抽象形态的运动，不过是“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或者纯理性的运动”。蒲鲁东并没有真正学会黑格尔的辩证方法，却把他的哲学降低到了极可怜的程度。他像黑格尔一样，认为世界上过去和现在发生的一切就是他自己的思维中发生的一切；在他看来，没有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只有观念在理性中的顺序。他妄自尊大地自以为他是在通过思想的运动来建设世界；而实际上，“他只是根据自己的绝对方法把所有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加以系统的改组和排列而已。"[3]

马克思揭示了蒲鲁东的这种唯心主义观点的认识根源和阶级根源。他指出，蒲鲁东确实看到了实现于历史中的进步，但他同时也发现，人们作为个人来说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事情，他们的社会发展初看起来似乎是和他们的个人发展不同、分离和毫不相干的。蒲鲁东无法解释这些事实，只好假设它们是一种普遍理性的自我表现。因为“发明一些神秘的原因即不合常理的空话，那是最容易不过的了。"[4]蒲鲁东沉缅于唯心主义的幻想，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他彻头彻尾地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小资产者由于本身所处的社会地位，必然既迷恋于大资产阶级的豪华，又同情人民的苦难。他们本身就是社会矛盾的体现。他们信奉的是所谓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和“真正的平衡”。他们一方面渴望现实的改变，另一方面又本能地惧怕这种改变。所以，他们很自然地倾向和赞同那种主张只要改变思想和范畴就能改变现实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77页。

生活的哲学。这就是作为小资产者的蒲鲁东之所以沉迷于作为软弱的资产阶级代表的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原因。

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唯心主义观点的同时，实际上已经重申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这就是，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相互关系上，只能是前者决定后者，而不能是相反。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① “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②这些道理，蒲鲁东是一概不了解的。“根据他的意见，创造历史的，正是抽象、范畴，而不是人。”③ 这样，在蒲鲁东那里，当做范畴形式来看的经济关系，就成了既无起源，又无发展的永恒公式。马克思指出，蒲鲁东实际上是间接地肯定了资产阶级生活的永恒性。因为他神化了以观念形式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他将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想象为范畴和观念的形式，实际上是把这些产物视为自行产生、具有自己的生命的、永恒的东西了。而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④ 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同历史上的一切其他的具体形态的社会关系一样，都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而作为这种社会关系或社会存在的反映的观念形态的范畴、理论等等，同样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思想的产生都是不断变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 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的。”⑤

二、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原理的科学表述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毫无疑问，当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84—485页。

④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4页。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尝试着全面阐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时，这一对范畴在理论上已经基本得到了说明。但是也应看到，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尚未完全从旧的术语的影响中摆脱出来，因而这一对范畴的制定工作严格说来并未结束。在《哲学的贫困》中，唯物史观的理论内容和表述形式达到了统一，马克思完全是以一种独有的科学术语来阐述他的崭新的历史哲学。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对重要范畴，在理论内容和表达形式上也得到了更准确、更科学的规定。

我们首先来看“生产力”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大量使用了“生产力”这一概念，对于它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所具有的特定涵义也做了详细的说明。他们论述了生产力是人同自然之间的关系的一种表现，强调了生产力的客观性和它在历史发展中的基础作用，同时对构成生产力的诸要素(作为直接劳动的人的要素和作为劳动材料的工具、土地、水力等等物的要素）也做了分析；当他们将生产工具区分为“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和“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时，实际上已经把科学技术的因素考虑在生产力的概念之中了。然而，马克思恩格斯这时使用生产力概念时，确实也有一些不够确切的含混之处。例如，他们在书中往往是将“生产力”与“物质生产”、“生产方式”、“分工”等相提并论；对于构成生产力的诸种要素的地位和作用也缺乏分析。而在《哲学的贫困》中，这些不足之处则得到了弥补，生产力这一概念变得更为精确了。

当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使用“生产力”这一概念时，它已完全变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特有的一个理论术语。可以看出，马克思这时心目中是明确的，他所指的“生产力”，是指那种相对于“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而言的、人类改变自然的能力。对于构成生产力的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的不同地位和作用，马克思也做了专门的分析。他强调了作为能动的直接劳动的人的要素在生产力中的基础性作用。无论将出现何种生产工具，无论生产力以

何种历史水平表现出来，作为直接劳动力的人都永远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基本因素；离开了处于特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一切生产工具和劳动材料都将会变为被动因素。因此，“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① 另一方面，马克思对于生产力中的物的要素，尤其是生产工具的作用也作了充分的肯定。正如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指出的那样，生产工具形成生产力的物质前提，每一历史时代的生产力的水平总是以生产工具发展的水平为标志的。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生产工具不仅标志着某一时代生产力的水平，而且也标志着某一时代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气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② 可以看到，社会发展的最基本原因在这里被归结为生产力（生产工具）的高度，生产力在历史上的作用在这里得到了最明确的说明。马克思还指出：“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单是由于后来的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都是前一代人已经取得而被他们当做原料来为新生产服务这一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③ 马克思的这段话应该是迄今为止对生产力及其历史作用所作的最透辟的解释了。

我们再来看生产关系的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197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144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7 卷，第 477- 478 页。

克思恩格斯已经使用了“生产关系”这一概念。但是通篇看来，不但用得较少，而且其涵义也并未确定。在书中，有的地方“生产关系”似乎与“生产力”的涵义相类似，有的地方又似乎将“生产关系”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提并论。在这部著作中，更多的地方是将“生产关系”与直接的生产活动中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相联系，这种对“生产关系”的解释显然还是较为含混和不确切的。书中使用最多的是“交往关系”或“交往形式”。严格来说，它只能说是“生产关系”的雏形，并不等于“生产关系”这一概念本身。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交往”一词含义很多，它不但包括人们之间的“物质交往”和“外部交往”，甚至“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①；马克思恩格斯这时不仅在物质生产中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意义上使用“交往形式”或“交往关系”，而且还在社会关系，即比生产中的人与人的关系更宽泛的关系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

到了马克思写作《哲学的贫困》时，“生产关系”这一概念进一步精确化了，可以说，它已作为唯物史观的中心范畴而被确定下来了。正如列宁后来评价的，这本书谈及的一切问题“都是援引生产关系的”②。在这里，“交往形式”已被“生产关系”所代替，“社会关系”与“生产关系”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已作了明确的界定。当马克思在准备写作《哲学的贫困》而致书巴·瓦·安年柯夫时，曾有这样一段说明唯物史观的话：“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6页。

② 《列宁全集》第1卷，第122-123页。

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① 马克思这段话的本意是阐释唯物史观的历史决定论的，但从中不难看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已经被马克思进行了区分。社会以及社会关系是人们在交往或交互作用中形成的最宽泛、含义最广的一种关系，它不仅包括物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包括经济活动、政治活动等方面人与人的关系。而生产关系（虽然这里没有明确出现这个术语），不过是一种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状况相适应的物质生产关系，它主要包括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这种说法与马克思日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1858年）中从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四方面来解释生产关系固然仍有差距，但从中不难看到，“生产关系”已经被明确地规定为人们在物质生产中形成的相互关系。正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的：“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范围内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② 人们的物质的生产关系是人们的物质的生产活动的产物，同时也是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人们的物质生产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③。离开了生产关系，其他的一切社会关系都只能是空中楼阁。

由于这时“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概念得到了更为明确的规定，当论及二者的相互关系时就不必再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那样只是论述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关系了，马克思这时都是直接地谈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论及二者之间的辩证运动，并由此而论述历史过程及其动力的。④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7 卷，第 477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143－144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7 卷，第 478 页。.

④ 当然，马克思此后仍有时用“社会关系”来指称“生产关系”，但这时的“社会关系”已经指的是“生产方面的社会关系”了。

当论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时，马克思首先强调的是生产力的能动作用，认为生产力的变化是导致生产关系和整个社会变化的首要原因。可以说，历史的发展已被最终归结到生产力的高度。马克思一方面指出，人们如果不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交换其活动，就不能进行生产。只有在一定的生产关系范围内，才会有人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但马克思另一方面又强调："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① 他在稍后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中以军队为例指出，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内部的整个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也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总之，正像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明确阐明的那样，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关系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生产关系是物质生产借以实现的条件和前提，而生产力的变化则是引起生产关系乃至整个社会关系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东西，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②

马克思在此基础上批驳了古典经济学家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美化为"自然的、因而是永恒的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的观点，具体分析了无论是封建生产关系还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都是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运动的必然结果，都是历史过程的暂时产物。他指出，为了正确地判断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5页。

产，“必须把它当做以对抗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来考察”①。在这种对抗的生产方式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必然表现为一种阶级的对抗式关系。事实上，“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② 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中，被压迫阶级的存在是这个社会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促使社会发生变化的革命因素。这个作为革命因素的被压迫阶级，一般说来总是与生产力相联系着的，成为生产力的代表，即是说，“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③ 另一方面，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一般说来总是与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相联系的。随着生产力的变化，旧的生产关系将会变为不再适应生产力的社会关系，从而必然导致分别代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同阶级的对抗的发展，“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继续并存。”④也就是说，必须改变陈旧的生产关系，“必须粉碎生产力在其中产生的那些传统形式”⑤。马克思具体分析了封建生产中两个对抗因素而导致的阶级斗争，指出封建社会的灭亡正是这种对抗和斗争的必然结果。而当资产阶级得势以后，“资产阶级把它在封建主义统治下发展起来的生产力掌握起来。一切旧的经济形式、一切与之相适应的市民关系以及作为旧日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政治制度都被粉碎了。”⑥

马克思接着指出，从此以后，从前的革命阶级将成为保守阶级。资产阶级运动在其中进行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是两重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15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104 页。
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197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155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154 页。

“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 这就是说，资产阶级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发展它的对抗性质。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现代无产阶级在它内部发展起来；而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日益加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也就日益剧烈化了。这种斗争最初是表现为局部的暂时的冲突，局限在经济斗争（维护工资等）领域；随着斗争的开展，工人们逐渐联合起来，孤立的同盟开始组成为集团，工人阶级开始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使阶级斗争具有了政治斗争的性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一旦达到最紧张的地步，就将成为“全面的革命”。“因为政权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阶级对立的正式表现。”② 所以一切革命的矛头首先是指向旧的统治政权。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作为社会运动的革命决不排斥政治运动，它必然是一场政治革命。马克思指出，正是这种政治革命导致了社会的进化，导致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全盘改造。他从当时的社会状况出发预言:“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的社会最终将成为最大的矛盾，将导致人们的肉搏”③。在一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血战”之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整个社会关系将被彻底清除。

三、关于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思想

当人们试图用各种各样的历史观解释历史过程时，首先会遇到几个互相关联而又带有根本性质的理论问题，那就是：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以及人的能动活动与客观规律的关系。马克思在用唯物史观解释历史发展时，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体现出他关于历史发展的深刻的辩证法思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15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197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198 页。

想。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的各种历史观，基本上只看到历史的主体、个体和人的活动，看不到或无视历史的客体，社会关系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规律。这样做的结果，或者是将历史看成是某些个人意志的产物，或者是将历史看成人的毫无规律的主观活动的堆积；这些历史观不是从历史本身来寻找历史变化的原因，而往往是从历史之外来寻找历史的动因（例如作为某种超自然的意志力量的“神”、“观念”，或作为人的主观精神的抽象的“自我意识”等等）。黑格尔历史观的巨大功绩在于它看到了历史的发展，并将这种发展描绘为依照某种必然性规律而前进的过程；但是黑格尔的强烈的唯心主义观点严重地束缚了他关于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思想，最终还是从历史之外的所谓“绝对精神”来解释历史的发展变化，仍然没有脱出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巢臼。蒲鲁东没有从黑格尔那里学到真正的辩证法，却完全继承了他的唯心主义。蒲鲁东从所谓的“普遍理性”、“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乃至“上帝”出发来解释历史，将历史看作是依照他头脑中某些范畴的排列顺序而变化的过程。马克思在写作《哲学的贫困》的过程中，深刻地批判了蒲鲁东的这种唯心主义历史观，指出他是企图“借软弱的黑格尔主义来把自己装扮成坚强的思想家”，实际上这等于承认他“完全不理解人类的历史发展”①。事实恰是如此，无论是黑格尔还是蒲鲁东，都无法正确地理解历史的主体与客体、个体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也无法正确解释在人的历史活动中体现出来的历史规律。

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唯物史观形成的过程中已经探讨了历史的主客体、个体与社会以及人的能动活动与历史客观规律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当他们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来说明历史的发展时，事实上已经明确地宣告，历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77页。

史发展的真正原因并不存在于历史之外，也不存在于某种思想或范畴的逻辑之中，而只能从历史本身出发来解释历史，只能从历史自身之中来寻找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因。

从这一基本的理论前提出发，历史的主体只能被理解为从事着现实活动的“现实的人”，而绝不是唯心主义所说的“理念”、“普遍理性”、“绝对精神”或“上帝”等等。早在写作《神圣家族》时，马克思就揭露了唯心史观歪曲历史的主体的谬误的实质，他指出，黑格尔方法的基本特征“就是把实体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内部的过程，了解为绝对的人格。”① 正是这个把现实性变成抽象的谓语的行动本身导致把关于社会、国家、历史等这样一些现象的概念本身变成了特殊的人格、独特的形而上学的主体，而“现实的人类个体反倒仅仅变成了这一形而上学的主体的体现者”②。与唯心史观相反，唯物史观认为历史的主体只能是那些以自己的活动创造着历史的活生生的人们，“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③ 马克思恩格斯从这种对历史总体的认识出发，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现实的人”，即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并从事现实活动的人规定为历史唯物主义考察历史的出发点，详尽描述了由现实的人的现实的实践活动构成的历史过程。马克思在写作《哲学的贫困》时继续阐发这一关于历史主体的思想，指出社会无非是人们交互作用，即人们的现实活动的产物，正是“历史的运动创造了社会关系”④。离开现实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7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101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118－119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141 页。

人及其活动，只能得到一幅关于社会发展的歪曲了的图画。蒲鲁东不了解历史的真正主体，便向读者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范畴怪论”，他把范畴当做存在的本质、当做历史的主体。这样一来，他便用他自己头脑中的范畴运动代替了“实在的历史运动”。

在马克思看来，历史的主体既然是从事着现实活动的人们，那末，作为这种活动的结果和产物的东西自然就构成为历史的客体。从根本上看，人们的活动首先在人与自然的交往中进行，这种活动的产物就是一代代传下来，并将一代代传下去的生产力，“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①；另一方面，人们的活动也同时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进行，因为人们从来不是孤立地面对自然的，这种活动和交往的产物就是人们的社会关系；这就是说，“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②；“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③。再次，人们的思想活动也是一种人们的现实的、历史的活动，而作为这种思想活动产物的思想、观念和范畴，不过是人们对现实社会关系的一种反映，它们与生产力、社会关系一样，同样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总之，“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④ 生产力、一定的社会关系和一定的观念，是历史活动的产物和结果，同时也是人们赖以进行活动的条件和前提。从作为历史主体的活动着的人的角度看，它们构成历史客体。当然，这种对历史主体与客体的区分只是相对的，它仅是一种理论上的抽象。因为在现实的历史中，主体与客体、人与他们活动的产物，是密不可分、互相制约的。没有脱离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相应的思想观念的人和人的活动；而离开了现实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7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8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3－14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4页。

活生生的人，社会关系和思想观念就只能是一种纯粹的抽象。

马克思在阐释历史的主体和客体时，还同时阐明了与此相联的另一个问题——历史发展中的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早在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马克思就写道："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同样地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主体的自为的存在，正如他在现实中既作为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① 人一方面以单个的、有生命的个体形式出现，另一方面在这些个人身上又体现着深刻的社会性质。人实际上是个体与整体、个人与社会的辩证统一。个人离不开他赖以生存的客观条件和社会关系，社会也必须通过每一个个人的存在、活动和交互作用才能产生。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言简意赅地说明了这一点。在批判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仅仅归结为一种抽象的人的本质时他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脱离了社会，就无法认识人的本质，离开社会关系来考察的个人只能是"抽象的个人"，任何个人实际上都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③。既然个人与社会是一种辩证的统一关系，那末历史的发展自然也就是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一致。马克思在写作《哲学的贫困》过程中指出，人们的社会发展"初看起来似乎是和他们的个人发展不同、分离和毫不相干的。"④ 在历史运动中，人们作为个人来说似乎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事情。但是透过这种历史的表象我们可以看到，个人的发展和个体的活动，总是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依据的。"由此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3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77页。

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些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① 历史的发展必然通过个体的发展体现出来，而个体的发展却只能借助一定的社会物质关系来实现。这样，马克思就在辩证法的基础上科学地解决了历史发展中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阐释了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从实质上看，这个问题也就是人类的能动活动与历史的必然规律的相互关系问题。因为人正是通过其能动的实践活动来体现其主体性质的，而作为主体的活动对象和创造物的客体同时又成为主体的制约者，从而使人的活动呈现出某种必然的规律性。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论，是人的能动活动与客观的历史规律的制约性的统一论。

历史唯物主义决不能被歪曲成为一种带有神秘的宿命性质的历史决定论，因为它将现实的人看成是历史的主体，将现实的人的现实活动看成是理论的出发点。马克思始终强调，人是自身历史的创造者，历史不外是人的活动，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正因为如此，在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经济制约性和历史必然性的后面站着的始终是人和人们的活动，是人们的需求、利益和理想。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对历史必然性的理解才不同于以往的种种神学历史观和唯心史观。在他们看来，这种必然性决不是一种凌驾于人类历史之上、将自己的超世的意志强加于人的力量，而是人们自身的力量。人们通过自身的能动活动发展着物质的生产力，建立起相应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同时创立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历史正是在人类的能动的自主活动中被创造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主体的能动性和主体的实践活动，就根本不会有历史。

然而，历史唯物主义又决不能与种种主观意志论的历史观相提并论。它所主张的主体能动性是一种受到主体自身创造的客体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7 卷，第 478 页.

的制约的人类活动，不是随心所欲、毫无限制的主观活动。历史正是在人类能动性与客体的制约性的相互作用中呈现出规律性的。现实的历史正是人类的能动的、带有规律性的活动。以往的种种历史观大多只看到人类的历史活动这一表面现象，没有也不可能透过人类活动来探寻这些活动的必然性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有了巨大的突破。它一方面强调历史是人类自身活动的创造物，另一方面又强调这种人类活动不管表面上看起来是多么盲目、多么杂乱无章，但实际上总是遵循着某种必然的历史规律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恩格斯是把他们的社会历史观建立在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这一思想基础上的。他们不是就人和人的活动本身来谈人和人的活动，而是透过人和人的活动进而分析人的社会关系，分析各社会构成要素之间以及历史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并由此出发来说明人和人的历史。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研究每个世纪中人们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11 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 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在每个世纪中，人们的需求、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① 这是应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唯一正确的方法。

马克思在写作《哲学的贫困》时，以更多篇幅强调的，正是客体对主体的制约和历史规律的必然性，因为这是唯物史观的实质和精髓。这种必然性表现在人们在历史活动中一方面无法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另一方面也不能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作为全部历史的基础的物质生产力，是人们实践能力的结果，是以往人类活动的产物，它是一种“既得的力量”。生产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也决定于前一代创立的社会形式。人们必须在历史的基础上继承前一代遗留下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148－149 页。

来的生产力，并将其当作创造新生产力的起点。正是这一事实形成了人类在历史中的某种必然的联系。马克思还指出，作为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的社会，是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制约的。在生产力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生产关系，进而也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政治国家和思想意识形态。尽管人们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组织最符合本人和本阶级意愿的社会形式，但最终在历史上站住脚的，却是那些最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形式。历史并不顺从某些个人的意愿，而是循着自己的必然道路不停顿的前进。历史的发展表明，人类的活动总是受到它所创造的客体，即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制约。人们在历史上的自由只是表现在他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和掌握程度上，表现在他自觉地应用客观历史规律推动历史前进的能动性上。马克思把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形象地比喻为历史戏剧的"剧作者"和"剧中人物"。人作为主体，一方面像剧作者那样自主地创造着历史，另一方面又像剧中人那样必须依照某种必然的秩序来演出这幕活生生的戏剧。人既是历史的创造者，又是历史的参加者和演员。正是在现实的人身上体现了历史的主体与客体、人类能动活动与客观的历史必然规律的辩证的统一。正像马克思说的："只要你们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发点，因为你们抛弃了最初作为出发点的永恒的原理。"① 在现实的人面前，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是没有立足之地的。

第三节　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批判改造

作为伟大的辩证法家和辩证逻辑的创建者，黑格尔在人类思想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产生了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149 页。

大的影响。然而，黑格尔虽然发现了辩证法，却用唯心主义将其神秘化了，因而这种头脚倒立的辩证法只能在软弱的德国哲学家头脑中引起“风暴”，无法产生任何实际效用。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改造工作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承当的。经过长期的、坚持不懈地努力，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唯心主义杂质被彻底清除掉了，然而这一学说中的一切伟大而有生命力的东西却没有被抛弃，它们在新的理论形态中被加以改造，被提高到了真正的科学水平。从1843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第一次举起批判黑格尔的旗帜开始，在短短四年多的时间里，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艰巨的科学研究和学术探讨，大体上完成了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批判改造工作。到1847年马克思写作《哲学的贫困》时，他已经可以对这一时期他和恩格斯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进行批判性的总结了。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是由于批判蒲鲁东的方法而重又接触到黑格尔辩证法这一论题的。像以前一样，马克思在这里毫不容情地批判了黑格尔及其拙劣的模仿者们的唯心主义，同时评述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有价值的成分，仅用寥寥几笔就勾画出了自己的辩证方法的实质。由于马克思的评述和总结言简意赅，在理论内容上有新的突破，因而《哲学的贫困》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基础

马克思指出，在黑格尔看来，他的思辨的形而上学同整个哲学都可以概括在方法里面。而黑格尔的方法则是把逻辑范畴看做一切事物的实体的绝对方法。所以，黑格尔的方法无论带有多少启迪人的思想的东西,它的基础都是建筑在唯心主义的沙滩上的。在黑格尔主义者看来。进行抽象就是进行分析，越远离物体就是越日益接近物体和深入事物。在抽象的最后阶段，一切事物都成为逻辑范畴，“因而整个现实世界都淹没在抽象世界之中，即淹没

在逻辑范畴的世界之中"①。

由于黑格尔把逻辑范畴看成一切事物的实体，因而他就在自己的逻辑运动的公式中找到了一种"绝对方法"，"它不仅说明每一个事物，而且本身就包含每个事物的运动"②。黑格尔认为他的这种方法"是任何对象所不能抗拒的一种绝对的、唯一的、最高的、无限的力量；这是理性企图在每一个事物中发现和认识自己的意向"③。黑格尔在论述运动时确实带有深刻的历史感和辩证法。但他所讲的运动实际上抽去了一切具体形态的特征，因而是"抽象形态的运动，纯粹形式上的运动，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④。黑格尔的绝对方法只是讲述了运动的抽象或纯理性的运动。理性把自己规定为正题、反题、合题，也就是理性自我肯定，，自我否定和否定自我否定。从简单的范畴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群，从群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系列，最后又从系列的辩证运动中产生黑格尔的整个体系。总之，"黑格尔认为，世界上过去发生的一切和现在还在发生的一切，就是他自己的思维中发生的一切。因此，历史的哲学仅仅是哲学的历史，即他自己的哲学的历史。没有'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只有'观念在理性中的顺序'。他以为他是在通过思想的运动建设世界；其实，他只是根据自己的绝对方法把所有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加以系统的改组和排列而已。"⑤黑格尔的绝对方法只是一种思想和文字的游戏，不能成为一种实际的方法。

马克思在揭露了黑格尔方法的实质之后，笔锋转向蒲鲁东，他指出："黑格尔为宗教、法等做过的事情，蒲鲁东先生也想在政治经济学上如法泡制。"⑥他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方法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上面，罗列了一大堆范畴、群、系列和体系，编造了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1页。
③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3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2页。

一部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他把人所共知的经济范畴翻译成人们不大知道的黑格尔式的语言，使人觉得这些范畴似乎是刚从充满纯粹理性的头脑中产生的。蒲鲁东发明了一种十分特殊的新理性。这种理性在他笔下有时也被称作“社会天才”、“普遍理性”以及“人类理性”。在蒲鲁东看来，“经济范畴是人类理性、社会天才所发现和揭示出来的真理”①。马克思尖锐地指出，“然而这种名目繁多的理性都是蒲鲁东先生的个人理性”②。它们不过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绝对方法的拙劣翻版而已。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或者说是思辨的唯心主义体系。他在自己头脑中将一些经济范畴任意排列了一下顺序，然后将其当作现实的经济关系运动所必须依据的本原意义上的次序。这样，他就应用黑格尔的方法颠倒了经济范畴与现实的经济关系的位置。事实上，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前者是后者的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和抽象。因此，蒲鲁东不过是在经济学领域照搬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

二、拯救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阐明辩证运动的实质

黑格尔系统阐释了一种观念形态上的辩证法，这是他的巨大功绩，然而，由于其阶级和唯心主义基本原则的局限，他的辩证法也有着深刻的缺陷和不彻底性。批判其唯心主义，揭露其辩证法思想的局限性，在新的基础上改造其辩证法，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黑格尔哲学的一贯态度。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全新的辩证法思想。

早在马克思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时候，他就曾一方面高度评价了黑格尔关于矛盾对立的思想，另一方面批判了他的

---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　第150页。

这一思想由于其唯心主义而造成的不彻底性。马克思反对黑格尔中介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对立的企图，认为对立面是不能被中介的，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极端是可能和不可避免的，只有通过对立面之间的斗争才能导致矛盾的解决。①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一方面深刻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思想在"异化"范畴中所表现出来的荒谬的思辨原则，另一方面也高度赞扬了黑格尔的否定性辩证法的积极意义。认为黑格尔把人和历史看作"一个自我产生的过程"，抓住了作为人的发展中的创造性本原的劳动的本质，从而使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在人的活动中得到解决，使其在新的更加深刻的基础上产生出来，并在更高级的程度上重新得到自身的解决。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详细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进一步研究了矛盾对立面的统一和对立，揭示对立面每一方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矛盾的发展和解决的机制。②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又对矛盾双方对抗性对立的本质和发展作了更进一步的论述，认为矛盾双方的对立的前提存在于两个对立面的本性之中，认识运动的逻辑应该遵循对立面运动本身的逻辑。不能到这些对立面以外去寻求认识运动的逻辑，他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双方的矛盾对立为例，说明了这一矛盾运动是私有制本身的"自我运动"，只有通过这两个阶级造成的"对立内部的不安"，才能导致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否定。③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当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为人们描绘出一幅壮阔的历史唯物主义图画时，他们实际上已经肯定，辩证法的原则是考察历史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则，人类社会的前进和历史的发展本身已经清楚地体现出辩证法的一系列规律。可以说，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中深刻地体现出和蕴藏着马克思全新的辩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0－361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0－117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3－44页。

证法思想。

从某种意义上讲，《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辩证法问题的论述，可以说是对他和恩格斯这一时期辩证思想发展的一个总结和概括。虽然他们后来在《资本论》、《反杜林论》以及《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中继续以较大的篇幅论述他们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阐发他们全新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但马克思在1847年写作《哲学的贫困》时，对辩证法问题的论述却有独特而重要的意义。

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用简明的语言概括了黑格尔在描述"纯理性的运动"时包含的辩证法思想。他指出，在黑格尔那里，理性一旦把自己作为"正题"安置下来，它就会分为两个互相矛盾的思想(对立面)，即肯定和否定，"是"和"否"，也就是"反题"中的两个对抗性的因素；通过对立面的斗争，"是"转化为"否"，"否"转化为"是"。"是"同时成为"是„和"否"，"否"同时成为"否"和"是"。对立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互相均衡、互相中和、互相抵消。在反题中这两个彼此矛盾的思想彼此融合，进而形成一个新的思想，即它们的"合题"。而这个在合题中形成的新思想又会分为两个彼此矛盾的对立面，即新的"反题"，通过斗争，它们又会融合成新的合题。这种在思想范围内的范畴的辩证运动通过矛盾的斗争而不断增殖，从简单范畴形成"思想群"，又从思想群形成"思想系列"，"从系列的辩证运动中又产生整个体系"①。

可以看出，马克思是很珍视黑格尔用唯心主义语言阐述的以上思想的。排除掉黑格尔上述思想中的唯心主义原则，将黑格尔在这里说的"思想"和范畴换为现实的事物，我们就可得到一幅较为明晰的关于现实矛盾的对立和发展的历史运动的画面。马克思从中概括出一个很重要的辩证法原则："两个包含在反题中的对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3页。

抗因素的斗争，形成辩证运动。”① 现实事物和人类历史正是通过矛盾对立面双方的斗争来实现其变化和发展的。事物运动的动因来自其内部自身矛盾的对抗和发展。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最值得称道的正是这一思想，它是其整个辩证法中最重要的思想。

关于矛盾双方的对立斗争的思想是现实事物运动规律的一种理论上的抽象，只要按照事物本来的面目来认识事物，矛盾运动的规律也就很自然地会被人们接受和理解。蒲鲁东并不是这样来理解矛盾的。他自称是黑格尔的学生，但他从“黑格尔的辩证法那里只学得了术语”②。当他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应用到政治经济学上去的时候，实际上是将辩证法庸俗化了，所以，“蒲鲁东先生的辩证法背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③。蒲鲁东不是从现实事物本身出发来认识事物自身的矛盾。而是主观任意地来编造“矛盾”，他将任何经济范畴都机械地划分出“好”和“坏”两方面，认为任何经济范畴都有这样所谓对立的两方面，“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在一起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④ 在他看来，应当做的只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只要这样做了，似乎范畴的自身矛盾就可以解决，范畴的系列就自然向前发展了，“一系列的经济进化”也就自然实现了。

例如按照蒲鲁东的说法，一系列的经济进化首先是由“分工”这一范畴开始的。“分工”这一范畴的“好”的方面在于它“是实现条件上和智能上的平等的方法”；“坏”的方面则是“分工变成了贫困的源泉”；人们“应当解决的任务”只是：找寻一种新的劳动结合，“以便消除分工的有害方面而保存其有益的作用”⑤。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14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146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148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145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158－159 页。

照他看来，“机器”这一范畴正是“分工的逻辑反题”，似乎在使用机器的新的劳动组合中，分工的“好”的方面就可以保留下来，而“坏”的方面则可以自然而然被取消，从而实现经济范畴的进化。马克思尖锐地批判和嘲笑了蒲鲁东这一矫揉造作的思想。他指出，“这简直是对历史的侮辱”①。它反映了蒲鲁东对现实的人类史和经济史的了解是多么浮浅。马克思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阐述了人类历史上现实的分工的产生和发展史。指出“市场的大小和它的面貌所赋予各个不同时代的分工的面貌和性质，单从一个 分’字，从观念、范畴中是很难推论出来的。”② 同时指出，“机器正像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生产上的社会关系，才是经济范畴。”③ 马克思还指出，蒲鲁东的这一思想同时也表明他根本不懂辩证法。马克思以直接奴隶制为例指出，这种奴隶制在历史上当然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但是，奴隶制的“好”与“坏”只能从生产力的历史发展的角度去考察和评价，没有奴隶制好与坏的对立，就没有历史。因为“直接奴隶制是资产阶级工业的基础。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现代工业就不可设想。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价值，殖民地产生了世界贸易，世界贸易是大工业的必备条件。”又说：“没有奴隶制，北美这个进步最快的国家就会变成宗法式的国家”。“消灭奴隶制就等于从世界地图上抹掉美洲。”④ 蒲鲁东不是从事物的“矛盾本性”出发来认识矛盾，而是在随意地、脱离历史地编造“矛盾”。他抓住第一个到手的范畴，随心所欲地给它一种特性，然后就提出“把应该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6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9－16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63－16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5－146页。恩格斯在1885年对马克思的最后一句话评论说：“这对1847年说来是完全正确的。”可见，对任何经济现象和经济范畴的评价只能从当时的时代出发。

清除的范畴的缺陷消除"①。他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坏”的方面的“消毒剂”，任意地从一个范畴跳到另一个新范畴的领域，形成了仅属于他自己的“理性中的一定系列”和“经济矛盾的体系”。这样，辩证运动的全部过程就被简单地归结为善和恶的对比，归结为提出消除恶的任务。事物和范畴在蒲鲁东那里都失去了“自己的独立运动”，没有了“内在的生命”。在蒲鲁东那里，范畴的顺序成了一种空洞冰冷的“脚手架”，“辩证法没有了，代替它的至多不过是最纯粹的道德而已。"②

在批判蒲鲁东歪曲辩证法的形而上学观点的基础上，马克思作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任务，就是立即使辩证运动终结。"③ 事物的“矛盾本性”本身就决定了对立的双方缺一不可。取消一个方面，整个矛盾就无法存在，一切事物及其运动也就无从谈起了。黑格尔正是从矛盾双方的对立和共存这一原则出发来研究善恶对立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当他认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 时，恰恰表现出了他对历史辩证法的深刻见解。蒲鲁东的观点不仅表明他根本不理解黑格尔的辩证法，而且表明了他恰恰是在扼杀辩证法最本质的内容。与此相反，马克思关于辩证运动的实质的论述不仅表明了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深刻领悟，而且表明他已经将黑格尔哲学的精粹从其糟粕中拯救出来，在新的基础上加工改造成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基础了。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作出这一结论并不是偶然的。马克思的思想史表明，马克思在考察研究黑格尔的辩证法时，一贯重视他的关于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思想。虽然这一时期他用更多的篇幅批判黑格尔的唯心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3页。

主义，但这是出于与当时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理论论战和建立自己新唯物主义哲学的需要。实际上，马克思从一开始接触黑格尔哲学，就已经敏锐地抓住了黑格尔关于矛盾双方的共存和斗争的思想。在漫长的学术探讨和理论研究过程中，黑格尔的这一思想被马克思逐渐吸收、消化、改造和加工，成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基本规律。列宁在后来提出了“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是辩证法的‘本质’之一，是它的主要的特点或特征之一，甚至是它的最主要的特点或特征）”的思想①，可以说，这一思想正是对马克思这个一贯观点的继承和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发展。

从马克思这一时期的思想发展来看，关于矛盾双方的对立和斗争是事物自身发展动因的思想，已经成为指导他考察历史的重要的辩证方法之一。历史唯物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一方面是马克思恩格斯考察人类社会历史得出的重要成果，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他们依据辩证法关于矛盾双方对立斗争的原则作出的重要结论。马克思指出：“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② 可以说，历史正是在对抗中前进的。撇开了阶级对抗，就是颠倒了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整个生涯中从不惧怕和回避尖锐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对抗，总是敢于迎着斗争的风浪前进，正是植根于他们对辩证法的这种深刻的认识。

三、关于否定之否定规律

否定之否定是黑格尔用以表述理性发展的三段式。早在《1844

---

①《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4页。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曾高度赞扬过黑格尔的这一思想中所包含的否定性辩证法，同时也批判了黑格尔否定之否定公式的唯心主义性质。当时，马克思主要是通过批判地考察黑格尔的异化和异化的扬弃的概念论及这一三段式的。到了1847年，由于马克思在自己的著述中着重论述了事物矛盾的对立统一法则，因而对黑格尔的这一三段式的批判改造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黑格尔用否定之否定这一三段式来构筑自己的整个哲学体系。在他看来，理性是这样发展的：理性以范畴的形式使自己跟另一个范畴相对立，在第三个范畴中这两个对立面达到统了。例如，“有”与“无”的统一是“生成”，“量”与“质”的统一是“度”，“存在”与“本质”的统一是“概念”等等。在这里，第二个范畴对第一个范畴的否定意味着矛盾对立的产生，它并没有结束理性的发展，只是意味着最初的“普遍性”和“直接性”的扬弃，因此必须要由第二个否定，即否定之否定来补充。第二个否定才是矛盾本身的扬弃，即矛盾的解决。通过否定之否定，才终于扬弃了怀疑的因素，达到了肯定的结果。

黑格尔的这个三段式有着显而易见的缺陷。首先，黑格尔这里指的仅是理性、概念的对立和发展；其次，这种唯心主义导致了他的这一否定性辩证法的不彻底。由于他的整个体系要求一个“终点”，因而经过一系列的否定之后，范畴的运动最后停止了，矛盾消失了，最终达到了对立面的“无限统一”；再次，黑格尔的这个三段式不是从客观现实事物的运动发展中抽取出来，而是试图将这个三段式强加给客观现实事物，因而带有牵强附会的色彩。然而，黑格尔的这一思想的合理内核在于：他以头脚倒立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现实事物通过对立面的矛盾斗争而发展的运动方式和过程。黑格尔总是将矛盾的对立统一与否定之否定密切相联地进行论述，并将否定看做联系、发展的环节和范畴前进上升运动的要素，通过一系列的否定，范畴的实体性内容在发展中被

保留了下来。黑格尔的这些重要思想无疑给了马克思以很深的印象。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继续他对黑格尔的否定性辩证法的批判改造时，进一步注意到了他的思想中的合理内核和缺陷。当他在批判蒲鲁东并不真正懂得黑格尔的矛盾运动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时，曾专门阐释了黑格尔的这一思想。他认为，“理性一旦把自己作为正题安置下来，这个正题、这个思想就会自相对置，分为两个互相矛盾的思想，即肯定和否定，是，和 否’。这两个包含在反题中的对抗因素的斗争，形成辩证运动。是’转化为 否，，否，转化为 是，。是，同时成为‘是’和‘否’，‘否’同时成为‘否’和‘是’。对立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互相均衡，互相中和，互相抵消。这两个彼此矛盾的思想的融合，就形成一个新的思想，即它们的合题。这个新的思想又分为两个彼此矛盾的思想，而这两个思想又融合成新的合题。这种增殖过程就构成思想群。同简单的范畴一样，思想群也遵循这个辩证运动，它也有另一个与自己矛盾的群为自己的反题。从这两个思想群中产生出新的思想群，即它们的合题。正如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群一样，从群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系列，从系列的辩证运动中又产生整个体系。”① 从马克思的这段话可以看到，他已经用十分简单的语言概括了黑格尔否定性辩证法的全部合理内容的要点。马克思在这里着重阐发了黑格尔关于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与否定之否定规律二者之间的联系。在马克思看来，矛盾运动是事物运动发展的内在根据，而否定之否定正是矛盾运动得以实现的方式和运动的过程。在否定之否定中包含着矛盾的对立面相互斗争、相互作用的解决形式和具体结果，而矛盾运动则构成了事物按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前进发展的深刻动因。正题构成了旨在保存现有关系的、肯定的方面，而反题则构成了旨在消除现有关系的、否定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2－143页。

方面。这两个矛盾的对立方面在斗争中达到否定的否定，也就是这两个方面的具体综合、具体统一，从而实现在新质基础上的新的矛盾对立和斗争。蒲鲁东由于试图调合矛盾，所以也就根本不懂否定之否定。“他从来没有超越过头两级即简单的正题和反题”①，在他那里是根本没有否定之否定的。他提出了消除“坏”的方面的任务，导致了矛盾对立面的消失，从而根本谈不上矛盾对立双方通过斗争而形成一个新的、第三级的合题。所以，在蒲鲁东那里，范畴通过否定之否定而实现的辩证运动被“终结”了。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基础，也就是在唯物主义基础上重新理解否定之否定规律。他不是像黑格尔那样把发展过程仅仅理解为纯概念的发展，而是首先理解为客观的物质现实的发展。正是有了后者通过否定之否定的方式实现的辩证发展，才进而有了前者的否定之否定式的运动发展。几个月之后，即1847年10月，马克思写了《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一文，更加明确地阐述了他对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唯物主义观点。德国的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理论家卡尔 海因岑只是从“纯道德化”的和“受到伦理限制”的方面来理解否定范畴，认为否定只可能有观念的性质，而在物质世界中否定是不可能的。马克思批判了这种唯心主义的否定观，指出：“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任何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的存在形式。而用道德的语言来讲，否定就是背弃。”②马克思在这里明确地指出，以否定公式实现的辩证发展适用于“一切发展”和“任何领域”，绝不仅限于观念和道德领域。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三段式进行的唯物主义改造不能看做是简单的“颠倒”。被马克思改造过的否定之否定的三段式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29页。

从根本上消除了黑格尔的否定性辩证法的不彻底性和牵强性质，发展成为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规律。在马克思那里，这一三段式不再像黑格尔那样是一个由观念强加给事物的抽象的、牵强的公式和框子，而成为从考察现实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抽象出来的客观规律。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简单地把资产阶级的“现代垄断”同封建垄断混为一谈，并把竞争同垄断对立起来的观点时，具体考察了竞争和垄断的现实发展史，从而得出了历史按照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辩证发展着的结论。他指出，“现代垄断”并不像蒲鲁东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单纯的反题，从现实的历史发展来看，实际上它是“竞争前的封建垄断”与“竞争”这两个正题和反题的“一个真正的合题”。“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不仅可以找到竞争、垄断和它们的对抗，而且可以找到它们的合题，这个合题并不是公式，而是运动。”① 在现实生活中，垄断产生着竞争，竞争也产生着垄断。垄断资本家彼此竞争着，而竞争者则逐渐变成垄断资本家。对于某个国家的垄断资本家来说，无产者群众愈增加，各国垄断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就会愈疯狂，致使垄断只有不断地投入更剧烈的竞争斗争才能维持自己。“因此，现代垄断，资产阶级的垄断就是综合的垄断，是否定的否定，是对立面的统一。”② 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并不是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对黑格尔的三段式的简单搬用，而是在黑格尔的启发下对现实历史作具体考察的结论。在马克思那里，否定之否定不再是黑格尔用来达到他的理性发展的“顶峰”和“终点”的某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公式，而成为描述现实事物和现实历史的无限发展过程的一个理论规律。现实事物和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无穷尽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运动作为这一过程各个阶段互相联系和发展的环节，也就永远不会停止，永远不会有什么历史的终点。这是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形成的彻底的辩证法思想。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78页。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共产主义实践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崭新的理论形态，在它产生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始终是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紧密相联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在关注和亲自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将自己的立场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并在考察无产阶级的历史命运中逐步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当这一新哲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等著作中以成熟的形态被表述出来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又努力将这种新的世界观传播到工人运动中去，使之成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工具和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结合，使这一哲学的科学性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也使它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1848 年 2 月发表的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政治纲领——《共产党宣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工人运动的革命实践中的第一次运用。在这个历史性的纲领文件中，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和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它第一次将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奠定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成为无产阶级的第一个政治纲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共产党宣言》是一部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的著作。

一、《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公开问世

恩格斯在谈到 19 世纪 30 年代以来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时，曾经这样说道：“起初它有两个独立的派别。一方面是纯粹工人运动，即法国工人共产主义的支流；这个运动产生了作为它的发展阶段之一的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其次是由于黑格尔哲学的解体而产生的理论运动；在这一派中马克思的名字从一开始就占有

统治地位。1848年1月出现的《共产党宣言》标志着两个派别的融合，这个融合是在革命熔炉中完成和巩固起来的"①。恩格斯这里所讲的两个派别的"融合"过程，正是德国和欧洲的工人运动为自己的政治斗争寻求一个科学的理论基础的历史过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之前，德国和欧洲的工人运动曾为制定一个科学的行动纲领进行了长期的奋斗。这种奋斗表明了工人运动在没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之前所进行的痛苦探索，在这种探索中工人运动逐步摒弃了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开始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导理论，使欧洲工人运动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19世纪30至40年代，欧洲工人运动主要分为三部分：法国的工人秘密社团、英国的宪章派和以侨居巴黎和伦敦的德国手工业工人为主要成员的正义者同盟。前两部分虽然运动规模大、历史悠久，但却四分五裂，极为松散，唯有正义者同盟在组织上比较严密并富有国际性，所以它虽然规模小，却最有前途。正义者同盟曾长期被魏特林和卡贝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控制。魏特林在其著作《人类的现状及其未来》中吸收了傅立叶、巴贝夫和蒲鲁东等人的思想，创立了一种特别的空想工人社会主义理论。他强调人民群众在实现财产共有制和奔向人道的社会制度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必须用暴力手段消灭私有制，在这一点上他已大大超过了他的思想先导。他的另一本著作《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对资本主义展开了充满激情的批判，曾被马克思称作德国工人的"史无前例光辉灿烂的处女作"②。但是他的关于财产共有制的主张实际上产生于早期基督徒所主张的博爱和人人平等的训诲之中。他把革命只是看作绝望的人民群众自发的，突然的和破坏性的爆发，他不可能认识无产阶级真正的历史使命。魏特林的这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8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3页。

部著作在很长时期内实际上成为正义者同盟的政治纲领。卡贝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是在较长时期内指导正义者同盟的另一种理论。卡贝在其主要著作《伊加里亚旅行记》中主张实行一种温和的空想共产主义，强调通过“和平宣传”来实现其幻想的合理社会。他主张进行口头鼓励和印行文章，并在美洲建立“共产主义”示范移民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魏特林和卡贝的社会主义思想都缺乏科学社会历史观作为理论基础,带有浓厚的空想色彩,因而不可能真正看清资本主义弊病的根源，也不可能为无产阶级指明正确的解放之路。正义者同盟在很长时期内都处于痛苦的探索之中。

40 年代初期，由于现实斗争的挫折提供的教训和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的更加广阔的社会视野，以沙佩尔和鲍威尔等人为首的正义者同盟伦敦支部开始逐渐认识到卡贝和魏特林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局限性。1845 年 2 月至 1846 年 1 月在正义者同盟内部进行的关于共产主义的重要讨论（著名的“伦敦讨论”）中，以沙佩尔、鲍威尔和莫尔为首的伦敦支部在诸如阶级和阶级斗争、历史发展的动力，实行共产主义的历史条件、革命的主要力量以及革命的方式和步骤等问题上，已经与魏特林等人有了明显的分歧。他们这时虽然尚未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水平，却已经看到了魏特林、卡贝等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缺陷。他们认识到，以往的一切空想的理论体系都无法满足日益发展着的工人运动的需要，必须寻求和建立新的理论基础。“伦敦讨论”表明，伦敦的正义者同盟支部的领导成员已经摆脱了魏特林、卡贝等人的影响,这就为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扫清了道路。40 年后恩格斯回忆这段历史时指出:“所有这些情况都促进了同盟中,特别是伦敦领导者当中不知不觉发生的转变。他们越来越明白,过去的共产主义观点，无论是法国原始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还是魏特林共产主义，都是

不够的。”① 正义者同盟在经历了长期的探索之后，开始摒弃各种形式的空想理论，向刚刚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接近了。

马克思恩格斯对正义者同盟的活动一直是十分关注的。早在1843年，沙佩尔就曾建议恩格斯加入同盟，由于恩格斯不同意当时正义者同盟中盛行的各种空想社会主义观点和宗派主义的密谋活动方式，因而拒绝加入。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同伦敦和巴黎的正义者同盟领导成员却经常保持通讯联系。他们通过口头、书信、著作和报刊，影响着主要盟员的理论观点。正义者同盟的大多数成员已经日益看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正确性。

184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正义者同盟的主要领导成员热烈支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在各地发展通讯委员会的思想，并在伦敦也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为了将正义者同盟改造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恩格斯从理论上批判了魏特林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同时开展了反对这时已像瘟疫一样在工人运动中泛滥起来的以克利盖等人为代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斗争。1847年春天，正义者同盟委派莫尔到布鲁塞尔和巴黎找到马克思恩格斯，正式邀请他们加入同盟，莫尔明确表示，正义者同盟确信马克思恩格斯观点的正确性，认为必须在新的理论基础上改变同盟的活动方式。他们希望马克思恩格斯在同盟的代表大会上以宣言的形式阐明自己的思想，并帮助同盟改组。在这种新的历史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欣然加入了同盟组织。

1847年夏天，恩格斯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正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提议，将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见，同盟的章程明确载明：“同盟的目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4－195页。

有制的新社会。”① 为了给共产主义者同盟制定一个建立在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行动纲领，恩格斯在 1847 年 6 月至 11 月期间先后起草了两个纲领稿本，即《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共产主义原理》。《草案》和《原理》以唯物史观为哲学武器，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状况、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和前途，为起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宣言做好了准备。1847 年 11 月底至 12 月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在伦敦召开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近 10 天的长时间辩论，他们宣传和捍卫了自己的理论原则，并消除了同盟内部的分歧和怀疑，使同盟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宣言。会后，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很快写完了宣言，并于 1848 年 2 月在伦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流亡者布尔哈特开设的一个小印刷所里印刷出来，这就是著名的《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刚刚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无产阶级政党起草的第一个政治纲领，它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革命实践中的第一次运用，也是对这一哲学的一次精辟的阐述。正如列宁评价的那样：“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理论。”②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部无产阶级的行动纲领中得到了实际的应用，并且使本身更为系统化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虽然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确立，但却沿用了某些旧的术语；《哲学的贫困》虽然不再沿用旧的术语，但并没有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共产党宣言》则用全新的哲学概念和术语透彻鲜明地阐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572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578 页。

述了崭新的社会历史观，并使之成为无产阶级行动纲领的理论基础。从此，无产阶级的行动开始摆脱盲目性和自发性，成为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自觉地改造世界的行动。《共产党宣言》问世以后，很快便传播到世界各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部篇幅不长，但内容却相当丰富的著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指明了摆脱资本主义枷锁和实现自身解放的正确道路，“它的精神至今还鼓舞着、推动着文明世界全体有组织的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①

二、深刻揭示了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共产党宣言》诞生以前的欧洲工人运动由于缺少科学的社会历史观的指导，始终不能制定出正确的行动纲领来，对人类历史的理解也始终停留在虚构和空想的水平上。而对于工人运动迫切需要解答的一些问题，诸如如何看待阶级和阶级斗争？如何看待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如何看待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将要创建的共产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应该通过怎样的斗争方式和经过怎样的道路达到自己的历史目的？等等，他们都无法找到正确的答案。例如魏特林对历史的发展缺乏认识，妄想在一个早上实现共产主义，认为只有反动派才会说实行共产主义的条件不成熟；而克利盖则干脆认为历史根本不能为我们证明任何东西。在对革命力量的认识上，魏特林认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积极的社会力量主要包括那些抱有善良愿望的公侯贵族、流氓无产阶级、经常可以激动的青年以及感情用事的妇女等等。沙佩尔和鲍威尔等工人领袖对历史发展和共产主义也仍然持一种比较幼稚的观点，他们看不到历史发展和阶级斗争的最终的经济根源，认为未来共产主义的实现主要在于人民群众对这种最符合人性的社会制度优越性的认识上。共产主义之所以迄今没有实现，主要因为人们对此缺乏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91页。

知识。因此，他们认为实现共产主义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反对普遍落后和消除文盲，以便为启蒙工作扫清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用他们创建的新的哲学观点考察历史，对这些当时工人运动迫切需要解答的重要问题做了科学的回答，第一次将无产阶级的行动纲领奠定在了科学的基础上。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的序言曳曾经指出："《宣言》中始终贯彻的基本思想，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①。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所讲的是贯穿于《共产党宣言》之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原理。他们将这一原理应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摒弃了一切从抽象的理性或人性看待历史的唯心主义观点，将历史前进的动因归之于在经济生产发展基础上产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这就为真正认识历史和社会提供了正确的哲学基础。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体现在具体的社会历史内容中，体现在他们对该时代的社会矛盾冲突的分析和认识上，因而成为最彻底的唯物主义和最全面最深刻的辩证法。

马克思恩格斯首先运用新的哲学观点考察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历史。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因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生产力的发展是历史前进的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2页。

根本的动力。因此，现代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绝不是从天而降和永恒不变的，而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和交换方式多次变革的产物。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和交换资料，都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当这些生产和交换资料发展到一定阶段，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封建所有制关系（体现为封建的农业和制造业组织）就不再能与已经发展了的生产力相适应了，这种生产关系已不能促进生产而变成了生产发展的障碍。这时，打破这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封建桎梏就成为必须和必然的了。现代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正是在这种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是从中世纪的农奴中间分化出来的初期城市自由居民中产生的。由于美洲和非洲新航路的开拓，给这些新兴资产阶级分子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以及贸易、交换资料和商品的增加，大大刺激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的发展。这就造成了正在崩溃着的封建社会内部革命因素的迅速发展。从前封建的或者行会的工业组织不再能够满足日益发展的生产力的需要，取而代之的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初期形式的工场手工业组织。然而，随着新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随着蒸气和机器引起的工业革命的发生，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工场手工业也不能满足这种需求了。于是，现代的大工业组织代替了工场手工业，随之而来的则是现代资产阶级的产生。可以说，现代资产阶级的发展是与世界市场的扩大和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发展紧密结合着的。现代资产阶级不断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都排挤到后面去了，使自己成为现代社会和现代产业的统领。

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和自由竞争相适应，必然会产生相应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实现资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的统治。资产阶级的每一步发展都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通过

资产阶级革命，这个阶级以现代的代议制国家代替了封建等级制的贵族专制制度，而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发展则成为这种现代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与这种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相适应，资产阶级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纯朴的关系统统破坏了，起而代之的则是以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为代表的赤裸裸的利害关系。资产阶级摧毁了一切陈旧生锈的关系和素被尊崇的见解和观点，创造了与中世纪根本不同的文化艺术，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中经常不断的变革，一切社会关系接连不断的震荡，恒久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其他时代的根本特点。

资本主义社会同封建社会一样，仍然是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个特定的阶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类似的运动又会重复出现。那曾经像魔术一样造成了极其庞大的生产和交换资料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却像一个魔术师那样不能再对付他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与日益发展着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发生了矛盾。因此，几十年以来的资本主义历史，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的历史，即反抗资产阶级及其所有制关系的历史。这种矛盾的具体表现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它愈来愈凶猛地周期性地威胁着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在危机期间，生产大量过剩，大量商品被毁掉。为了克服危机，资产阶级一方面大量破坏生产力，另一方面又设法夺取更大更新的市场，同时设法更加彻底地榨取旧的市场。但这样做只能为下一次更猛烈更全面的经济危机准备条件。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说明社会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商业规模太大。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增长到这种关系所不能容纳的地步，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已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而当生产力一开始突破这种障碍的时候，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状态。

总之，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也容纳不了它们本

身所造成的财富了。社会化的大生产曾经是资产阶级用来摧毁封建制度的一个武器，而现在这个武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当社会化的大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同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之间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为要求摧毁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无产阶级与企图保存旧关系的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社会必将被新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其固有的内在矛盾的作用，它的最后灭亡是不可避免的，这是资本主义的客观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恩格斯还运用新的哲学观点分析了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

他们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出，迄今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社会的史前状态除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从灭亡了的封建社会里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矛盾，只不过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和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罢了。资产阶级社会里的阶级斗争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使阶级矛盾简单化了：社会日益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直接对立的对抗阶级。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即资本愈发展，现代工人阶级也就愈发展。自由竞争使得大量的中层等级的下层——小工业家、小商人、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破产。他们失去生产资料之后大量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随着工业的进步，统治阶级中的许多阶层也被抛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使得无产阶级的人数不断增加。所以，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而且也造就了运用这一武器来反对它自己的无产阶级。

在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这是因为其余的一切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衰落和灭亡，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无产阶级失去了任何私产，处在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现代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他们能够找到工作的唯一条件是当

他们的劳动还能为资本家增殖资本的时候。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变成了同其他货物一样的商品，因而无产者的劳动已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也失去了对工人的任何吸引力。随着机器采用范围的日益广泛，分工越来越细，劳动量也就越来越增加，而工资反而愈来愈减少。工人们不仅是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而且每日每时都受机器、监工和厂主的奴役。这种专横的制度在工人眼中愈益显得刻薄、可憎和令人痛恨。因此，在这种处境中的无产阶级要求改变现状的革命性是任何其他阶级所不能比拟的。无产阶级只有消灭自己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消灭全部至今存在的占有方式，才能获得社会生产力。无产阶级本身并没有什么必须加以保护的东西，他们必须打破至今保护过和保障过私有财产的一切。因此，无产阶级的运动同历史上的一切运动不同。至今发生过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参加的运动，或者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而无产阶级的运动则是绝大多数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自主的运动。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的最下层，它如果不摧毁压在自己头上的，由那些组成官方社会的阶层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就不能抬起头挺起腰来。正因为如此，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彻底性也是历史上任何其他阶级的革命运动所无法比拟的。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从它存在的第一天就开始了。这种斗争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最初是发生在个别工人，个别工厂和个别部门的自发的斗争。工人们毁坏商品，捣毁机器，烧毁工厂，这时的斗争还是盲目的和分散的。随着工业的发展和工人人数的增加，工人们的斗争开始转变为阶级对阶级的斗争。工人们组成反对资产阶级的同盟，建立了经常性的团体。有些地方甚至将斗争转变成为武装起义，而斗争的性质日益从经济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了。随着大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借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底下抽掉了。它首先生产的就是无产阶级这个它自身的掘墓人。因此，“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

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结论“决不是以某一个世界改革家所臆想或发现的思想或原则为根据的”②。它是历史自身发展的辩证法的必然规律。他们在考察和分析历史和社会现状时，从来没有离开历史和现实本身，到它们之外的什么地方去寻求历史的动力和社会发展的答案，而是严格遵循从历史本身出发来解释历史的原则。无论是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考察还是对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分析，.他们都将社会生产力的变革当作历史运动的最根本的内在动因，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运动中寻求社会发展的科学答案。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信心并不是他们自身的某种主观愿望，而是建筑在历史辩证法的科学逻辑之上的坚定的信仰。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深刻揭示了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了资本主义必然崩溃,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历史前景。从此，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新世界观日益深入人心，开始成为无产阶级的科学共产主义信仰的哲学基础。

《共产党宣言》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和历史观考察历史运动的光辉典范。这种世界观和历史观要求人们将历史自身的经济运动当做历史的出发点。任何离开历史、离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从其他方面（例如抽象的理性、人性等）寻找历史发展的根据和解释历史的作法，都是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在这个问题上，尤其应该注意的是那种从抽象的，永恒的一般人性出发，将历史解释为一种人性的异化和复归的过程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这种历史观曾经是新兴资产阶级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空想社会主义者揭露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一种理论武器，它也确曾起过某种积极的作用；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之后，它就必然沦为一种与唯物主义历史观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9页。

对立的非科学的思想体系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写作《共产党宣言》的前几年已经着力批判了那种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出发和用抽象人道主义来解释历史和社会主义的所谓“真正社会主义者”们的异化观。

从《共产党宣言》所坚持的基本哲学原则出发来考察关于人性的异化和复归的历史观，可以明显地看到它是与唯物史观根本不同的一种历史哲学，异化概念也是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概念性质根本不同的概念范畴。人、人性、人的发展等问题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研究的重要间题之一。但当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之后，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历史的物质前提来考察过人的问题。在现实的历史中，抽象的人和人的本性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随着生产力和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着的、具体的、现实的和历史的人和人性。超历史、超阶级、普遍适用于一切人的抽象人性实际上不过是哲学家把自己或本阶级理想的人性加以普遍化而已。马克思恩格斯从他们所处历史时代的社会现实出发，特别强调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阶级斗争在他们看来又不过是现实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的一种具体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任何社会形态都不过是历史无尽的长河中的一个特定的必经阶段，都有着较之前一个阶段更为进步的历史因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绝不是什么真正人的实现或人的本性的复归，而恰恰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所谓的“人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一种主观的臆想，而科学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只能通过现实的共产主义实践来逐步实现。

由上可见，关于人性的异化和复归的理论是一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历史观。它不是从现实的社会矛盾和物质生产关系出发去考察历史,而是用抽象的概念和公式去任意剪裁和描绘历史,因而根本不可能科学地认识和解释历史,更不可能真正地评价过去,认识现实和预见未来。在这种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支配下，历史永

远是一团无法辨认的乱麻，社会生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永远不可能被真正揭示出来。相反，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从生产力和社会基本矛盾的高度来观察历史，才能真正认识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正确道路。这正是《共产党宣言》在世界观和历史观上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

三、共产主义革命与人的自由发展

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日益发展的时代，工人阶级怎样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呢?乌克思恩格斯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为无产阶级制定了明确的斗争纲领。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必须首先形成领导工人运动自己的政党——共产党。共产党人是世界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最先进的一部分；它始终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始终代表着整个工人运动的利益。共产党人以科学的世界观和社会历史观作为自己的理论原则的基础，因而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更善于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共产党人的理论原则用一句话来表示就是：消灭私有制。共产党人把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和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运动的未来的目的。改变所有制是社会革命的基本目标，因此共产党人最为注重的是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整个运动的基本问题。但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是资产阶级赖以维持其经济所有制的保障，因此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首要目标就是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马克思恩格斯据此规定了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最近目的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必须从现实的社会状况和历史条件出发，既为工人阶级最近的目的和利益奋斗，又在当前的运动中坚持着运动的未来。19世纪中叶，德国和欧洲的许多国家实际上还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决

不拒绝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它必须联合那些愿意采取革命行动的资产阶级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和封建土地所有制。这种资产阶级革命实际上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在这个革命过程中，共产党必须坚持自己运动的未来方向，并不断培养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意识，以便使工人能立刻利用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后所必然带来的那种政治的和社会的条件，来作为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武器，并在推翻各反动阶级之后，能够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为了争取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胜利，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认为只有经过全世界各民族整个无产阶级的共同行动和共同努力，它们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联合的努力，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努力，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①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革命策略思想和行动纲领，明确反映了他们坚定的信念和灵活斗争方式的统一。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他们既看到了现实的革命条件，又看到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未来；既主张革命的发展是有阶段的，又主张各个革命阶段是互相衔接、紧密相联的。在紧接而来的欧洲 1848 年资产阶级革命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是依据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制定的这些策略原则来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的。

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当无产阶级革命完成其第一步的任务，即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并争得民主之后，无产阶级必须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都集中在国家手里，并且尽可能更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因此，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是无产阶级以统治阶级的资格，运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改变所有制，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的必要保障。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488 页。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人们的观念、观点、概念和意识，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的，因而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无产阶级革命不仅要打破过去传下来的所有制关系，而且要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最坚决地打破和扬弃过去传下来的各种传统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建立无产阶级的统治。无产阶级的统治并不是为了使这种阶级统治永恒化，而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对立，实现共产主义。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不再有剥削和压迫，不再有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那时，已经积累的劳动只不过是扩大、丰富和促进工人的生活过程的一种手段而已。当阶级消灭之后，无产阶级的统治本身也会随之而消失，“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

恩格斯后来将《共产党宣言》中的这句名言看作马克思最重要的思想之一，看作是科学共产主义的核心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一个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对立、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条件的联合体的思想，表明他们把人的，首先是每个个人的自由发展看作共产主义的重要特征和人类历史发展的美好理想。资产阶级攻击共产主义要消灭人的个性和自由，完全是一种恶意的歪曲。共产主义不但不否定人的个性和自由，相反正是将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当作自己的目的。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一方面得以成为真正的、自由的个人，每个人在社会中都具有平等、独立、自主的个性；另一方面，个人也与他人发生自由的交往，形成“自由人的联合体”。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曾在自己的新哲学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基础上论述过这个问题，指出在未来的自由人联合体中，“个人是作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

个人参加的。它是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已经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①。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的这一重要思想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理论基础上得出的，决不能被曲解为某种抽象人道主义的结论。有些人脱离历史唯物主义和现实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用一种抽象的、非历史的人性尺度来看待和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思想，显然有悖于他的原意。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得出这一结论之前，曾对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演进的历史过程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并批驳了资产阶级分子对共产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诬蔑。

有人责备共产党人要“消灭那种构成一切个人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的财产”，从而消灭个性和自由。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从生产力的高度驳斥了这种责难。他们指出，财产、个性和自由都不是抽象的结论，而是特定生产力水平下的历史产物。“现今的这种财产是在资本同雇佣劳动的对立中演进的。”②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拥有独立性和个性，而劳动的个体却被剥夺了独立性和个性。在现今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只不过意味着贸易的自由和买卖的自由。因此，对于这种只允许有资产阶级的个性和自由，泯灭劳动者的自由和个性的资产阶级财产和资产阶级私有制，共产党人确实要消灭。因为资产者所认为的个性，“不外是资产者，即不外是资产阶级的私有者。”③ 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正是要消灭资产阶级的个性、资产阶级的独立性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在阶级社会里个性总是带有阶级性的，只有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里，个性中的这种阶级烙印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2－483页。

才会消失，真正的个性自由才能实现。

当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并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以后，根据各国各民族的不同情况，分别采取不同的措施来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在新的生产关系中的发展，阶级存在的条件也会日益被消灭，一切阶级以及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本身将会逐步消灭。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也曾指出："阶级的存在是由分工引起的，到那时现在这种分工也将完全消失，因为要把工业和农业生产提高到上述的那种水平，单靠机械的和化学的辅助工具是不够的，还必须相应地发展运用这些工具的人的能力。"① 旧式的分工把人局限在某一狭窄的工作领域，使每一个人都只隶属于某一生产部门，受它束缚，听它剥削，每一个人都只能发展自己能力的一方面而偏废其他各方面。而随着使人的能力片面化的旧式分工的消灭，共产主义将使自己的社会成员能够全面地发挥他们各方面的才能。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而有计划地尽量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全体成员需要的规模；消灭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情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这一切都将是废除私有制的最主要的结果。"②

由上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个人的自由发展完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结论，它与那种从抽象的人性和人的要求出发，虚幻地许诺一切人都将无条件地、非历史地获得自由发展的唯心主义结论具有本质的不同。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个性的自由和个人的全面发展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共产主义革命和生产力变革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7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71页。

的产物，而绝非某种抽象的伦理意念的实现。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离开阶级和旧式分工的消灭来谈个人的自由发展，只能是一种空谈和幻想。

四、对历史上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的批判

19世纪40年代末期，在欧洲工人运动中泛滥着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流派和思潮。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分析和批判这些流派和思潮，使无产阶级从思想上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与其他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线，是引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走上健康发展道路的当务之急。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关于历史发展的观点对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流派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历史的无尽长河中，每个阶级都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都是一定生产关系的产物，任何阶级都有自己独有的时代。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要求人们应善于鉴别不同的阶级在历史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并识别不同的思想流派所代表的不同的阶级。在每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流派的背后，都隐藏着一定的阶级利益和要求。它们在历史上的价值是由它们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地位来决定的。只有从物质利益和阶级观点出发，才能找到这些流派和思潮的真正根源，认清它们的本质，辨别它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各种流派和思潮进行分析批判的过程中指出，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各阶级历史地位的变迁，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流派在历史上的作用也不断变化，越是距离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远的阶级，它们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历史上的作用越是反动。

被马克思恩格斯称作“反动的社会主义”的，主要有“封建

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封建的社会主义是站在被资产阶级推翻的封建贵族的立场上来攻击资本主义制度的。他们写出一些刺激的文字来讥讽资产阶级，并向他们低声说出一些不详的预言，这其中半是哀怨，半是讥讽，半是过去的余音，半是未来的恫吓；他们偶尔也能用辛辣尖刻的批判刺中资产阶级的要害，但由于他们完全不了解历史的进程，总是妄想倒转历史的车轮，回到封建时代去，因而常常使人感到可笑。他们为了赢得人心，常常以无产阶级的名义来骗取人们的信任，但是当人民发现他们臀部后面的封建纹章时，就会哈哈大笑地散去。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以小资产阶级的眼光来看待现代资产阶级的统治，他们所代表的是一些在近代文明国家里作为资产阶级的补充部分的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在现代国家中，这个阶级的地位很不稳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它们逐渐失去了在现代社会中的独立地位。代表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固然很会揭示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矛盾，但他们却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来批评和衡量资本主义制度。按其实质来说，他们要恢复的乃是行会式的手工业组织和宗法式的农业。他们力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和交换资料硬塞进已被这些生产和交换资料突破的那种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因此，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也是一种企图使历史倒退的反动的社会主义。至于那种早已被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过的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其历史作用同样也是反动的。他们站在刚刚开始反对封建制度的软弱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批判资产阶级国家。他们把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照搬到德国来，却忘记了德国当时并没有法国那样的生活条件，因此在德国这种资产阶级处于弱小和落后状态的国家中，法国的文献就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他们按照德国资产阶级勇于言词、怯于行动的特点，把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变成了一种关于实现人性的无谓冥想的纯粹著作界的流派。在他们那里，社会主义不再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

争，而成为以“爱”来调和阶级矛盾，和为保全现存的德国专制制度服务的东西。

另一类是被马克思恩格斯称为“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以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改良主义者为代表。他们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想要医好资本主义社会的痼疾，以求巩固资产阶级社会。他们希望保全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又不希望保全由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他们要保全现代社会，但又不要那些使这个社会发生革命和陷于解体的因素。他们力图使工人阶级满足于资本主义的现状，力图通过改变工人的一些物质生活条件来使工人阶级否定一切政治改革。由于这种社会主义对一切革命运动都持否定态度，因而根本不可能触动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相反它倒是一种替现代资产阶级的统治帮忙的东西。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统治着的世界当然是最美好的世界。

还有一类是以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等人代表的“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是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发展的最初时期产生的。由于这时无产阶级还处于很不发展的状态，因而对本身所处的地位还抱有一种幻想。这种社会主义一方面反映着刚刚诞生的无产阶级希望改造资产阶级社会的愿望，另一方面也表现出这个阶级此时必然存在的幼稚和不成熟。他们虽然看出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看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破坏因素的作用，但却看不出无产阶级自身的历史首创作用。由于工业和阶级对抗的不发展状态，他们更不可能发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仅仅是一个受苦最深的阶级。他们虽然试图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却找不出任何达到这一目的的现实道路。这样，社会的活动必然由他们个人的发明活动所代替，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历史条件必然由他们幻想出来的条件来代替，无产阶级逐步组织成为阶级的进程也必然由按照他们臆想出来的方案组织社会的努力来代替。他

们拒绝一切政治行动和革命行动，迷恋于用和平手段达到目的的幻想，企图通过某些宣传和细小的、不成功的试验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拓道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不加区别地向整个社会，包括统治阶级呼吁。他们认为，只要人们理解了他们的体系，就自然会承认它是建设最美好社会的最优良的计划。这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由于脱离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缺乏科学理论的依据，不可能引导工人运动走向胜利，只能停留于空想和幻想的水平。然而，这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本身也含有批判的成分。他们尖锐地抨击了现存资产阶级社会的全部基础，揭露了这个社会的种种弊病，因而提供了启发工人阶级意识的极为宝贵的材料。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一些积极设想，也包含有天才的揣测的成分。这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义在历史上曾起过一定的积极的作用，但阶级斗争愈是发展，它就愈失去任何实际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它的作用是与历史的发展进程成反比的。到了傅立叶、欧文等人的门徒那里，它就变为反动的学派，堕落到反动的或保守的社会主义者的队伍中去了。

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上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流派的分析批判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方法评价各种思想体系的典范。在这个问题上，简单的肯定或简单的否定都是不可取的。只有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历史主义地分析和看待一切，才能真正认清各种思潮和流派的实质和历史作用。同时，这种分析和批判也更加使我们认识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正确性。只有这种思想才真正代表了大工业条件下产业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反映了历史发展的真实进程。它是唯一指明了无产阶级解放道路和历史必然归宿的科学的思想体系。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新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实际的应用。它第一次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共产主义的实践结合起来。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也

变得更为系统化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虽然标志着马克思“第一个发现”的完成，但却沿用了某些旧的术语；《哲学的贫困》虽然不再使用旧的哲学术语，但并没有系统地阐述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共产党宣言》则用全新的哲学术语和概念透彻、鲜明地阐述了崭新的社会历史哲学，在分析实际的历史进程中体现了彻底的唯物主义和全面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并使之成为无产阶级行动纲领的理论基础。从此，无产阶级的行动不再是盲目和自发的，而成为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自觉的改造世界的行动。

应该指出的是，《共产党宣言》在发表以后一直受着历史和实践的严格检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发表25年以后就曾经说过，25年的情况表明，“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①。他们指出，由于25年来大工业和工人实际斗争的发展，“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②。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的这种科学态度仍然是我们今天评价它的榜样和典范。《共产党宣言》发表距今已100多年了，尽管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共产党宣言》根据唯物史观所阐发的基本精神仍然被证明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19世纪40年代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中毫无疑问包含着关于人类命运的普遍真理。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和将来，人们都会从中汲取和坚定自己的共产主义信念。然而也应看到，当今的时代已同《共产党宣言》发表时的时代大大不同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为工人阶级制定的行动纲领和策略思想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19世纪中叶工人运动和资本主义社会状况的产物。这个时代的特点是无产阶级的赤贫状态和阶级矛盾的激化。《共产党宣言》中的战略和策略思想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9页。

基本符合当时这种历史条件的需要的。马克思恩格斯为人们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然而我们却不能苛求他们对100年以后的历史做出分毫不差的预测。他们当然不可能完全预料到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对于当今无产阶级状况和社会形势的新变化，他们更是无法想象出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共产党宣言》昭示的普遍原理应不断充实新的具体内容并改变它的某些表现形式，它为工人阶级制定的斗争方针和策略原则也应以时代的需要为标尺来决定取舍。共产主义的实现不是一代两代人所能完成的任务，而是要有许多代人不懈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但是，无论时代怎样变迁，无论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情况怎样不同，无论无产阶级在其解放斗争中会遇到多少艰难和曲折威胁资本主义制度的那个"共产主义幽灵"却始终存在。因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将胜利。

简 短 的 结 论

马克思写于1846年春天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他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它们都未能在当时公开出版。

在此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斗争实践和理论研究中进一步发挥和完善了自己的学说。在1847年出版的《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通过对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的批判，对唯物史观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论点，首先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原理作了更为精确、科学的表述，并进一步批判和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首次表述了"辩证运动的实质"。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工人运动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于1848年初合写并出版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通过总结历史，分析现状，预见未来，鲜明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斗争提

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因此，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在《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问世的。

从此，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了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运用、验证和创造性发展的新时期。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1－8卷)
MAKESIZHUYI ZHEXUESHI(DIYI-BAJUAN)
主　　编　黄楠森　庄福龄　林　利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 京 出 版 社 总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朝阳展望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62.5印张　4300000字
1996年12月第1版　　199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200－03206－9
B　63　定价:252.00元(精)

责任编辑:岳民英
装帧设计:方　众




MAKESI ZHUYI
ZHEXUE SHI